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长篇小说卷
短篇小说卷
散文卷
诗歌卷
评论卷
随笔
报告文学
戏剧卷
曲艺卷
舞蹈卷
杂技
美术
摄影

1945-2005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总主编：怀忠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DAIJIAN YOUXIU WENXUHE YISHU
ZHUOPIN XUAN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散文卷

总主编 怀中民
主编 张玉珠

纪念大连解放90周年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散文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总编委会

总 顾 问 孙春兰 夏德仁 李永金 林庆民

总 主 编 怀忠民

副总主编 魏小鹏 贺 旻

委 员 张玉珠 洪文成 周大新 王家胜

邓 刚 张国平 季福林 张 超

艺术顾问 邵默夏 余定华 沈西牧 董志正

李勤明 王永林 阎德荣 郑述诚

康文金 王世昌 张 毅 张家瑞

编选委员会

主 编 张玉珠
副主编 康文金（特邀） 王家胜 王晓峰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刁成国 马世顺 马志广 王大斌
王忠玲 车培晶 邓 刚 卢 奕
田 耒 刘美华 刘益令 齐春生
曲致正 沙仁昌 宋 民 宋延平
杜 明 李卓毅 李振远 李紫娟
何永娟 迟德顺 张本义 张廷起
张秉加 张 玲 张俊英 阿 拜
邵勋功 郑海英 林 丹 杨友臣
杨 赤 津子围 郝宏春 高志华
素 素 晁德仁 徐 铎 阎太恩
矫红本 满 涛 蔺剑梅 蔡永武
滕毓旭

编选办公室

主 任 王晓峰
成 员 何永娟 王长丽 吕克文 石轶鹏
张远凤 刘晓牧 郭 军

短篇小说卷

主 编 素 素 田 耒
助 理 肖 正

总序

1945年8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们这座被日、俄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了半个世纪的城市，终于获得了解放，长期饱受凌辱的大连人民，终于呼吸了自由、民主的空气。一轮红日，在这片土地上跃然升起。

时光走过了60年，我们这座城市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过去满目疮痍的废墟，如今已经变成了美丽壮观、繁荣昌盛的北方明珠。伴随城市前进的脚步，我们的文艺事业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60年来，我市的各类文艺创作硕果累累，璀璨夺目，它们记录了时代的风采，闪射着世纪的光华。为了庆祝大连解放60周年，我们编选了这套《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其目的是：回顾历史，展示成果，面向未来。

早在大连刚刚解放不久，一批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如文学界的李一氓、方冰、柳青、白朗、罗烽，戏剧界的阿英、田风，美术界的朱鸣岗，音乐界的刘炽等，先后从革命根据地来到大连，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传播革命文艺的种子，催生革命文艺的发展、壮大。他们带来的延安革命传统和精神，像春风吹拂，像细雨般般，滋润着大连的文艺芳草园，迅速出现了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本地的一批有志的文学青年也在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的带动和影响下，投身革命文艺事业，走上了文艺创作之路，形成了我市最早一支新老结合的创作队伍。这期间，柳青等人在大连创作了长篇小说《种谷记》等，本市的业余作者也创作了一批反奸锄霸、歌颂新生活的文学、戏剧作品，如《穷汉岭》、《一二〇新纪录》等，这批作品敲击着时代的战鼓，紧密配合了当时的民主革命斗争，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人民的新生，城市的新生，文艺的新生，大连市的文艺事业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怀着胜利的喜悦和革命的激情，推动了全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各类专业文艺团体相继成立，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蓬勃开展，锻炼了一大批专业和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他们以广阔的视角，关注新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门类的作品，也

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而出，有的作品如话剧《红旗》、《人往高处走》等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57年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我市歌舞团编演的《花鼓舞》一举夺得金质奖章，不仅成为我市歌舞团传统的保留节目，也成为全国许多歌舞团学演的节目之一。此后，尽管也受到了“左”和右的干扰，但我市的文艺创作总体上还是积极、健康的，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各个时期都有佳作问世，并卓有影响。著名作家高玉宝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就是在这期间出版的。1958年，大连京剧团编演的现代京剧《菊花石》，运用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在全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先驱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我市歌舞团创作演出的《摇篮曲》、《俺是快乐的饲养员》唱遍大江南北。这期间，我市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相结合，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剧（节）目，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复县（瓦房店市）创作演出的二人传《镶牙记》，单出头《三到刘家》、《放猪姑娘》在辽宁省新戏曲汇演中轰动省城。旅顺口区演出的《出车之前》、金县（金州区）演出的《跨海办学》以及大连京剧团演出的《松骨峰》、《迎风斗浪》，也都轰动一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市的文艺事业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文艺创作在低谷中徘徊。但是，严冬过去是春天。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春天到了，树上绽出了新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激发了我市文艺工作者的无比热情，文艺创作又出现了新的生机。宣传画《迎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且很快便被全国多家报刊、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也被上海、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大幅街头广告临摹。从此，我市的文艺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各个艺术门类，竞相争辉，新作迭出。在全国性的许多文艺评奖和大赛中，我市的作品均榜上有名。电视剧的创作，可谓佼佼者。从《篱笆、女人和狗》农村三部曲叫响国内外以后，已有23部电视剧荣获全国“飞天奖”，其中获“飞天奖”一等奖的就有《太阳小队》、《相依年年》、《远山远水》、《轻松一点》4部，《相依年年》和《轻松一点》还先后获亚洲电视剧金、银奖；摄影艺术的创作，全国共6次评出60名“金像奖”获得者，我市就有5名同志获此殊荣，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独占鳌头；文学创作自1981年《路障》、《敬礼，妈妈》、《阵痛》等6篇连续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后，《迷人的海》、《爸爸，我一定回来》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散文集《独语东北》获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创作成绩喜人，《神秘的猎人》、《轰然作响的记忆》等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戏剧创作方面，《海蓬花》、《勾魂唢呐》、《西门豹》、《三月桃花水》等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杂技有《水流星》、《顶碗》、《转动地图》、《大连女孩——车技》等获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软钢丝》、《水流星》

等在国际比赛中获大奖；舞蹈获全国“荷花奖”银奖；书法获全国“兰亭奖”创作奖；民间文艺《荷花龙舞》获全国首届“山花奖”；曲艺《说说心里话》获全国相声大赛“牡丹奖”一等奖；还有一些作品获“文华奖”及“群星奖”。其他艺术门类也都有在国家和省级以上评奖中获奖的作品。为了推动我市的文艺创作，1987年，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十条规定》，并决定设立全市文艺创作最高奖——“金苹果奖”，有力地推动了我市文艺创作的发展，至目前，已进行8届“金苹果奖”评选活动，共有15人荣获“金苹果奖”，383部（篇）作品获优秀创作奖。在全国和省级“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我市共有12部（篇）作品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36部（篇）作品荣获省级“五个一工程”奖。总之，新时期以来，我市的文艺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预示着一个更加辉煌的鼎盛时期就要来临。

回顾60年来我市文艺创作发展的历程，我们感到欣慰和自豪，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是在我们未来的工作中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一是弘扬主旋律，注重多样化。大连市的文艺创作，从起步伊始，就是在老一辈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的启蒙、影响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那种来自延安的革命传统和精神，在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中间传承和发扬，他们自觉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理论作为导航的灯塔。高唱时代主旋律，与时俱进，形成了大连市文艺创作的鲜明特点。当我们汇编这套丛书的时候，时时感到一股股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我们的文艺作品既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又推动和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创作者们在自我完善的同时，笔下流淌着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诚与信念。在深化作品思想内涵的同时，也注重了群众多样化的jiedawang7848要求。大连市的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的教导，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养育我们的土地。

二是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越是成功的作品，其生活底蕴就越丰厚扎实。笔力来自生活的“底气”。这是创作实践验证的真理。多年来，大连市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积极深入生活，有的长期挂职生活在第一线，有的不定期到生活基地或用其他方式，保持与生活前沿的密切联系，他们在生活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分享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感受人民群众的爱恨情仇。他们用心去感悟生活，用笔传达人民群众的呼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激励着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用优异的作品回报人民。

三是十分活跃的群众文艺创作。这是我市文艺创作显著的特点之一。大连素有“音乐之乡”、“舞蹈之乡”的美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

面的文化需求，群众性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普遍开展。事实证明，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辽南渔乡的风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群众性文艺创作是我们文艺创作的生力军，也是我们文艺创作产生精品的广泛基础，而多种文艺精品的产生，又进一步推动和提高了群众性的文艺创作。

四是在改革中发展，在开放中前进。这是我市文艺创作发展总的趋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文艺创作的生产力，使我们摆脱了思想上的许多陈腐观念和局限。大连的优越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我们加快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时期以来，我市举办的许多大型涉外文化活动，如国际服装节、赏槐会、烟花爆竹节等，不仅面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风韵，也让我们更多地接触了外来的文化艺术。这些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活动，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活跃了我们的思维。吸收、融会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创造性地建造我们新的民族文化大厦，是我们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

以上是仅就文艺创作而不是总体文艺工作而言的。由于我们这次编选的着眼点主要是各艺术门类的一度创作，因而对于表演、导演、舞美设计等二度创作就无法在这里体现，这也是一种遗憾，但是二度创作在我们整个文艺创作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大连市文艺创作的明天会更好。

我们编选的这套系列丛书，是按各艺术门类分编的，计17卷。其中文学、戏剧、曲艺、歌曲、电视电影、民间文艺等12卷以文字形式成卷出版；美术、书法、摄影、舞蹈、杂技等5卷以光盘形式合集出版。

为这套丛书的编选和出版，文联的同志们历时两年，精心策划，认真组织，从大量散存的作品资料中收集整理和选编出几百万字的宝贵文献，为大连留下一套十分有价值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文学艺术优秀作品丛书。所有参与其事的同志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许多文艺界的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也多次热情地予以关怀和帮助，文化艺术出版社和大连理工大学印刷厂也多方为我们提供方便，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总编委会

2005年3月

目 录

总序.....	3
王大化的日记（节选）.....	14
窗 下.....	19
草地八个月.....	23
中山广场的清晨.....	29
大连湾抒怀.....	31
五月反“扫荡”回忆片断.....	35
南沙沟之夜.....	46
四十有感.....	50
将门虎子.....	52
——访冯玉祥之子冯洪达.....	52
红豆生南国.....	55
旅顺口的山.....	57
悠悠琴思.....	58
悉尼情.....	61
初到法国印象记.....	63
我的蒙族额吉.....	67
闪亮的小绿灯.....	70
源 头.....	72
枫红时节.....	75

一段乡情.....	77
留在心底的那个夜晚.....	79
老夫老妻.....	82
美哉，莫高窟.....	84
生命.....	86
望儿山高.....	90
佛眼.....	93
发誓，不再来这.....	96
有怨无悔.....	99
晴雨此时观纽约.....	101
记上田喜代子.....	104
儿子的世界.....	106
从江上看两岸.....	109
银带蛇酒.....	113
乡情赋.....	115
珍藏亲情.....	122
德拉瓦的鸟群.....	124
顶针.....	127
空巢.....	129
先生.....	138
麒麟东巷的朋友们.....	147
繁华都市中的冷艳.....	150

槐花瀑	152
故乡的老房子	154
日子，你别回头	156
老 街	158
太阳雨	160
老大连有一个商业学堂	163
家住人民路	166
戒烟记趣	169
检验爱情	174
倾听“法布尔”	176
秋千应该荡多高	178
花园里的天堂	179
——记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179
无知己	182
散文二题	184
最后的童趣	188
放蛇者	192
我的家庭	196
三过浮桥	199
旅欧杂记	201
落地东京	204
大连老建筑	210

品 茶	213
我的非正常生活	216
回家的感觉	219
父 亲	221
鸽 魂	227
黄昏的祭奠	229
母爱的芬芳	233
走过德国	235
万众缅怀称永生	238
——我与臧克家老师	238
我住的城市有海	242
在心灵的维度里成长	248
阿妈妮	250
散文二题	253
关于爱情的话题	256
杂文 随笔	260
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	260
不废江河万古流	262
唐陆贽论九弊	263
脱胎而出	265
从武则天和花想到的	267
避聒与没字碑	269

闲话《骂鸭》	271
识才者得才	273
弄潮真当立涛头	275
赞美后的思索	276
“不卑不亢”好	277
研究一下“劣根性”	279
不要请个“爹”来	281
“母子观灯”与“小卡特”	282
“井底葫芦”反正观	284
气球·风筝·奠基石及其他	285
关于举办“狗尾巴花”节的补充通知	287
韦驮上增天王书	289
水清也有鱼	291
流行性扁豆症	292
一个民族的反思	294
——读《夏令营中的较量》	294
我们是“害虫”	297
随笔二则	299
词人莫要学“牛哥”	301
历史不是“情场厮杀”	302
猫头鹰的叫声	304
那是你家的东西	306

另一种溃堤.....	308
“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310
卡拉未必“OK”.....	312
杂文二题.....	314
杂感二题.....	317
漫话人生“三看”.....	320
赵本山、末代皇妃与张艺谋.....	322
报告文学.....	325
岁老根弥壮 阳骄叶更阴.....	325
最干净的人.....	328
安居巷的报告.....	335
张学思将军（节选）.....	344
老树.....	349
——大连1986夏天的故事.....	349
橄榄绿色的叶片.....	361
走出谷底.....	366
奇女子梁静枝.....	374
企业家身边的女人（节选）.....	379
那死者，那活者，那火葬场.....	384
清风两袖 正气一身.....	388
——郭世宽轶事 之一.....	388
生命无字书.....	399

肩起一面智业的大旗.....	404
老乔大叔.....	408
生命之歌.....	411
为了这方土地（节选）.....	415
长跑中历练的“地下爱情”开花结果.....	426
——“中国田径第一人”曲云霞.....	426
独特的爱情与婚姻.....	426
横渡渤海海峡世界第一男人.....	433
——张健（节选）.....	433
维和高官传奇（节选）.....	437
后 记.....	447

散文

王大化的日记（节选）

王大化

1945 年末之夜

一个领导者确是不容易，他要解决各种不好处理的问题，要使同志们满意、心服，但又要合原则，这是一个磨练，如能达到一分就是一大进步。

一个冲动，也是责任，促使我应当留在前锋，帮助把这个可怜的团体扶植起来。我需要工作，我要为革命多做工作，我要在这个过程中来改造我自己，我不要求什么地位和物质上的享受，我要为革命立功，但不一定要把我说成功臣。

1946 年 1 月 6 日

工作做了，群众当中有好的影响，不管好的坏的都拥护你，你就要警惕，这对一个做工作的人说是一个进步，那么，落后的人，从个人出发的人，就会对你有意见，抱着成见。你要能自持，要能够与这些同志好好的谈，要在行动中努力团结这些同志。

能够一切为了革命，把自己抛开，这是自己进步努力的目标，自己工作不一定马上叫人了解，时间久了自然会明白的。

工作不是为了叫人看的，因为你是做革命工作。

1 月 7 日

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地亲自下手，打入下层，与下层群众相结合。不要摆老资格的架子，不要以为自己下去做工作，人家会看不起，相反地，他们反而会真正团结在你的周围，你能达到真正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这样才真正在群众中生根。

革命工作的年龄，不是一面牌子，而是一支鞭策自己进步的鞭子。

什么时候人不从个人出发了，不斤斤计较自己的名利的时候，天下就太平了。口口声声“我不想当官儿”，但是，实际却为了自己的地位而不满，这是难以捉摸的一种想法。

我要求多给我工作做，多给我工作做，我衷心地对组织上屡次表明我的想法。在不妨碍组织的原则下，满足某些同志的愿望吧！我只要求多多给我工作做。

1月8日

我要立戒烟酒，要以对待工作的毅力来克服自己的惰性。我相信如能在工作上克服了困难的话，我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会对不起自己。这虽不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但是，我要做到这样。

一个党的文化宣传工作者，不但是指你作品，而最主要的，你这个人就是党最具体的宣传品。

今天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遇见了十一年前的老同学，心里很高兴。

2月1日

今天是农历除夕，繁重的工作愉快地完成了。感到无限的愉悦。

天下竟有如此荒谬的事，说延安有火车，车站在西门外。有河，离城一二里地。水是四季常清。河的两岸是树木茂盛。一到礼拜六，男女同志携手去划船。有一个电影院，一个大戏院。有城东南的新大陆……这也是除夕夜的一个娱乐，哈哈！

躺在被窝了看颖、潍、盟的照片。越看越想，都在对我笑。好人们，亲爱的，固然想你们，并没有妨碍工作。

8月4日

毛主席是我们心里的灯笼，我爱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国民党炸延安，引起心上愤怒的火，这是全面内战的前声。但我们是相信我们的力量的。想起了宫原士兵大会的话——政委问：“假如国民党进攻我们，怎么办？”“消灭他们。”士兵们一个声音，坚强而有力。

当工作做的顺利了，会产生一种惰性，就不愿多去用脑子，不愿多说，形成简单化与老一套的领导作风。发现不了新鲜事物，不能多方面去解决问题。这是危险的，渐渐地要与群众脱离。因为自己工作顺利，都做得也还差不多，于是就只看到别人的不对，有毛病，自己好像没有，这是自己进步的绊脚石。

同志的爱是与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绝然不同的。这种爱是实际的，是基于阶级的情感的。这种爱，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每人注入新生的血球。

8月28日

与队伍分开了四五天，四五天内尝到了离开队伍的滋味，体验到了革命集体的温暖。

听到了前方回来的战士讲战斗的故事。“前方兵工厂”，“土造飞机”，“一八四师的士兵”，“咱们的新战士”。讲的人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听的人被这信心鼓舞着。讲故事的人是今年春天才参加新的战士。然而他的战斗意志却有着惊人的进步。

有一百多新的战士住在招待所，有唱有跳的，都是十八九岁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看上去是一群不知忧愁的人。他们都是自愿地乐意参加的。一个战士对我说：“现在参军的真多啊！数都数不清多少！”这使我想起了国民党时期抓壮丁都抓不到，而咱们这里参军的数都数不清。这说明了一个趋势。下级干部的作风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总是惦记着毛主席每一句教诲。

8月30日

遇到了雷加，安东造纸厂厂长。他领着我们参观了整个造纸的过程，从那企业的每一个环节上，我回想到咱们边区的手工业那艰巨的工程。又想到了现代的企业掌握在我们手里，照样地动起来了，而正像雷加讲的起了质的变化。工人开始把厂认为自己的厂了。再偷纸觉得惭愧，因为这是自己的东西了。还有好多的例子。我特别感到党的力量的伟大。

9月7日

9月19日 河沿村

我在河沿村看到了翻身后的农民。他们的情绪是那么高涨。从农会主任的谈话里，我又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已变得很有组织，有井有条地计划着分配，管理和发展。组织起来合作社，把一切精力放到如何战胜自己的阶级敌人的工作上，也活跃地热烈地发动起斗争来。都理直气壮的。我与自卫队长谈了话，我感动得要哭出来。我参加了斗争大会：地主哭丧着脸在农民面前屈膝了，农民的情绪就像一盆火。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组织的力量。

在会上打消了我那种人情论的“爱”与“同情”。想到了《白毛女》写作过程及处理。反映了具体的群众观点问题。

阶级投降主义就是牺牲自己阶级利益。成全了地主资产阶级。结果把自己变成阶级叛变者。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与斗争相接触的尖锐时，往往就反映出一些空洞的想法。也往往最容易心软。这是最可怕与最可耻呀。

9月23日

四年多没有见到哥哥的字，今天王彬由海南给我带到海北来。九年来，别离了的家庭的亲密的声音在我耳边呼唤。六十七岁的老妈妈，六十多岁的老爹爹，还有身体病弱的可爱的哥哥。他们在家盼望，等待着我和外面的这个小家。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已经属于党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如果想他们的话，不是回家，而是如何地多为老百姓做些好事。

大化，我对你自己说，你丢下一切不实际的想法吧！忍痛割掉一些东西吧！幻想是可怕的，不实际的幻想是会毁灭了你自己与别的同志。记住，决不要使大家对你失望啊，需脚踏实地的从头做起，学习你所需要知道的任何一件微小的事件，追求你所没有掌握的一切。记着自己会得到人民给你的荣誉，那不会凭空得来的，要宝贵这个东西，就是尊重党对你的培养。一刻都不要休息地为了那个光荣的目标，光荣地要向那个方向走，我要争取那个光荣的旗帜。

也不能光把自己寄托于那光荣的理想中。目前实际工作，就是那光荣事业的基石。你要抓紧这个东西，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完成你当前的这事业。一分一分地，老老实实地把这个基石打稳。

9月27日

整天在混沌中，肚子阵阵作痛，头又昏了，似乎又感冒了，真是讨厌，身子怎么这样不济事了呢？心里有一阵灰溜溜的，但又很快地被自己否定了，那主要是情绪问题。我相信那超人意志，他是物质的。他可以解决我这些问题，我相信明天又可以很健康的工作了。为了使别人多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去参加装台去。与李牧谈关于剧本问题。谈到几点：

一、不受话剧幕的限制，要活泼地利用旧形式分场的办法，要把他活泼、机动而又尖锐地对照出所要表现的东西。

二、演出的形式不怕它是个四不像，只要他是能表现的，由每个要表演的片段与整体的内容去决定。

另外谈到上海的“弄堂剧”，这是由于谈“田庄”剧而引起的，由于这些，我想到了哈市以后，可以搞街头剧，这街头剧打破以往的形式，而利用街头的建筑来演出。

又与十一师宣传队开座谈会，很有感触。

爬在车厢的床上写日记。

10月22日—27日

几天来，画画素描、速写。倒是唤起了不少回忆，这些回忆给了不少勇气，多少年来没有像这几天车上生活如此消闲。

我再读《处女地》。肖洛霍夫深刻细腻地描写着集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活的，在我面前跳动，他们叫我看他们的每一个侧面，那每一个侧面都唤起我在中国土地与农民中间的事件的联想。一根无名软链，紧结住我的心，使我窒息，我是多么想把这些劳苦的民族，深刻地喊出来啊！

自然的景色，引不起我什么内心的感触，倒是肖洛霍夫所写的达维多夫和可爱的农民……的思想给了我以最深的感染，达维多夫对玛尔加承认错误的原则态度，却又是以最大的布尔什维克的“爱”对玛尔加。因为，照达维多夫自己的话：“是我们的人。”这两天在思想上很受达维多夫他们思想的影响，我觉得这样处理一切是对的。

窗下

邵默夏

在我的窗下有一块窄长的空地，一面临着马路，三面被楼房包围。往常，这块小小的地方，倒是十分热闹，孩子们在这里打弹子，掀开石头捉蟋蟀；老太太们坐在这里拉家常；卖青菜和糖果的小贩也喜欢在这里落落脚。然而，转到今年春天，这块小小空地就变得拥挤起来，有种新出现的力量，在逐渐排挤着这里的常客，以至完全把他们驱逐。

春天，刮来了暖风，墙阴处的积雪早已融化了，人们把封闭了一冬的窗子都打开，让春天的和风和阳光进入自己的室内。住在南楼的老太太第一个走进这块空地。她坐下来，用那断了把柄的鹤嘴镐，艰难地，一下一下把建筑工人踏得坚硬如石的土地刨松，然后，往这松软的土里，栽种下了蛋黄和墨紫的地瓜花，浓艳的美人蕉……菊花栽得特别多，它耐寒、美丽，又是她儿子顶喜欢的花草。在角落里，她为孙女种下了染指甲的风仙花，沿着地边又替孙子种上了向日葵。她知道孙子也种向日葵，但她不相信他会得到收获的。

她是我们这三座大楼最后迁进的住户。她儿子说，所以搬到这里，是因为原来的住宅太旧，又没法修。而老太太却从来都和儿子说的不一样。她对邻居们重复着：“房子旧是旧了，可并没倒塌。”她说，她很留恋那所房子哪！那里有一个小院，小院周围有用木板架成的墙，挺规矩。老太太在那里种花、种菜，还养了鸡鸭。一年又一年，共住了三十年，她在那里种了三十年的花草。最遗憾的是一棵大梨树没法挪过来，那是她死去的丈夫亲手栽的。是一棵多么大的梨树呀！它的茂密的枝叶就像一张大伞一样笼罩着整个院子。春天，盛开的梨花使小院溢满了清香。三伏天，老太太整夜整夜地坐在树下打盹，听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秋天，这棵大树就给你吃不完的甜梨。然而，挪不动，只好留给那些老邻居们享用了。

老太太已经七十岁了，她最小的孙子都上初中了。她长的干瘪、瘦小，躬着腰走路只有成年人一半高。但精神倒还旺盛，每天，她起得最早，帮助媳妇做好饭，坐下来，眼瞅着她的五十二岁的独生子把摆在桌子上的饭吃光，又赶忙为他包好饭盒，送到门口，把饭盒亲手交给儿子，目送着他的背影消逝在匆忙奔走的行人中。十年以前，她这样一天一天地送丈夫，而在今天，她又照样地送着儿子。

吃过早饭，她就坐在小花园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像一尊石雕像。她要一直坐到儿孙们回来。

她丝毫也没有个人打算，好像她活着就是为了儿孙们。她为他们缝衣做饭，也为他们种花。在漫长的日伪统治年代，她的花激起了儿孙们对新生活的追求；而在人民掌握了政权的今天，她的花就给儿孙们以创造新生活的力量。

在这个新开垦的花园里，孩子们经常跑到她的眼前嚷：

“老奶奶！长出芽来了！”

“哦！”她总是用力地睁着那对已经干枯了的眼睛，皱纹重叠的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

“那是豆子吧？长了两个瓣啦！”

“不，那是菊花。”她随口纠正着。

她在想：儿子喜欢的花草今年会最先长出来的。

在对面楼上住着一个科学家，他养着许多名贵的盆花，天一转暖他就把它们搬进小花园里来。每天傍晚，科学家围着花草转上半个小时，这时候他会一声不响，就像在化验室里那样。

科学家有一个儿子，是个复员军人，朝鲜的战火夺去他半条腿，如今他在父亲指导下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儿子从朝鲜的战场上带回来两粒松子，也把它种在老奶奶开辟的花园里。

那是在一次猛烈的炮火轰击中，排炮把山岭上的泥土和草木一大片一大片抛到高空，前沿阵地上到处烧着熊熊的大火。那时他一动不动地伏在炮弹坑里，向前望望，前面悬崖上傲然地峙立着一棵苍翠的松树，炮弹在它旁边爆炸，它摇一摇青绿的枝叶又站定了。他凝视着它，忘记初上战场的恐惧，想起了战后的生活。就在那个时候，他下定决心要成为科学家。炮火停熄之后，他从松树下找到两粒松子，装进贴身的衣袋里，他决定把它带回祖国来。他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穿破了许多件衣服，但是这两粒松子一直没有失落。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受了伤，他带着松子进了医院，又带着它回到家乡。

如今他把它种下了，怀着欣慰而又焦躁的心情盼望它长出来。一个月过去了，没有长出来。他扒开土看看，种子依然如故，只是外皮有点潮湿。他想：大概会长出来的，就又把它的培上。两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长出来，他再次扒开看看，原来种子的皮壳反倒干了些。他来火了，拿起石块将一粒松子砸得粉碎，又要砸第二粒，这时从背后传来制止他的声音：

“又急躁啦！”

他回头看看，头发斑白的老父亲严肃地站在他的身后。他没有吭声。

“你要考大学啦！将来要搞科学，这样急躁是不会有有什么成就的。”

父亲蹲下来，把那粒砸碎的种子摊到手心里，瞅了几分钟，对儿子说：“你看一看，它的皮壳这么厚，水分是不容易进去的。必须把皮壳弄上一个小缝，让水分进去，促使他内部发生变化，皮壳自然就挣裂了，不然你浇的水再多也不起作用。”

儿子高兴起来，他又充满了信心。

一个月之后，在小花园里，一棵朝鲜的松树顶破地皮长出来了。

这个消息马上轰动了四周的邻居。孩子们来了，家庭主妇们来了，住在东楼的朝鲜族医生来了，南楼的老太太也来了，她还带来两个鸡蛋壳，说那里边还有养料，扣在旁边可以使小树长得更壮。

最高兴的是那位复员军人，他差不多一整天一整天地守着那棵小树。

一天夜里，两只猫闯进了小花园，它们追逐着，打闹着，碰倒了矮墙，踏倒了小松树。第二天清晨，儿子耐心地把它扶起来，这次他没有声张。

老父亲清清楚楚看到儿子的动作。他满意地感到这个暴躁的小伙子被花草磨炼得老练起来，说不定他正琢磨着这样一个真理：这棵松树长大后会很坚强的，但培养它却不容易。而最主要的是使它内部产生出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

一个“米丘林植物小组”也被这座小花园吸引来了。小组的成员选定这个地方实施他们的“小五年计划”。

他们像一群勤劳的小蜜蜂，一来到就动手扩大花园，把老太太剩下的边边角角都开垦出来。从市外找到一些碎石断砖，给小花园砌了一排矮墙。

大家热烈地欢迎这群孩子，老太太送来了向日葵种子，科学家帮助孩子们搞来炉灰。他对孩子们说，生土的粘结性太大，不宜栽种，只有掺点炉灰，土质才能松散。

土地搞好了，种什么呢？第一项是向日葵。绕着花园种上一大排，到秋天，长得又高又壮，每一棵都顶着一个圆圆的花盘，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就像站在操场上的少年先锋队。再种些苞米、大豆，还有别的花草。他们还试验了压条和嫁接。孩子们的兴趣是多种多样的。

孩子们在花园里一边劳动一边谈着自己的志愿，一个男孩向一个女孩问：

“小翠，你长大干什么？”

“我么？我想……当个花木培植家。你看春天的花开得多美，要是能够一年到头的开，那该多好啊！王老师说南方的花可多啦，他说可以把它们搬到北方来，叫山茶花在雪里开，叫……”她侧着脑袋思索起来，她脑子里的未来世界不知有多么美丽哟！

“女孩子就是花呀草呀！顶什么用。我要学习米丘林，叫苹果长得有西瓜那么大。”一个瘦高个子的男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子说。

“苹果有什么好，也不能当饭吃。我要改良苞米的品种，让苞米……”又一个孩子插上嘴了。

“那时候日子好过了，谁还吃苞米。你的大苞米专门预备开展览会吧！”

“哈哈……”孩子们都笑了。

年龄小的孩子还谈不上什么志愿。他们只希望种在地里的种子，赶快长出果实来。他们瞅着刚出地皮的嫩芽，希望它马上长得有大人那么高，上面结满了饱满的向日葵籽和他们所需要的别的东西。但是，瞅啊！瞅啊！幼苗一动也不动。孩子们急了。

“科学家爷爷，怎么还不长大呀？”

“焦急什么，得给它们时间啊！比如你们吧，要长成大人，还得吃这么——他用手比量着——十口袋咸盐哪！”

“啊！”孩子们愣了。

科学家笑得胡子一撇一撇。

年轻的家庭主妇在小花园里种下她们喜爱的蔬菜。

街道办事处送来了树苗，种在花园的四角。

就这样，这块空地被花木挤得密密麻麻的。动手晚的人，向这个繁茂的小花园，投下了羡慕的眼光。心里想：要是我也能在这花园里种点东西该多好。

然而，土地总是有限的，种满了就不能再下种，只好另找出路了。于是，在各家的窗台上，密密层层地摆上了盆花，窗台不够用，再把它吊到半空。圆叶子的一品官，绿纱似的云片松，随着微风，在窗口荡来荡去。

我每天从这万紫千红覆盖了的窄长地带走过，便想：这块小小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可贵的，在几年以前，在这几座楼房未建成前，这地方不是一年又一年地生长着自生自败的杂草吗？然而今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块地方也随着变了样，人们知道：只有让这儿长满芳香、艳丽的花果才能和今天的新生活相称。

生活，你是多么美好啊！

草地八个月

黄良成

1935年11月间，红四方面军被数倍于我们的敌人压回雪山草地。

队伍一到懋功，张国焘就下令：不准随便使用粮食做饭吃，要把现有的粮食带回草地作长期打算，谁要随便做饭吃粮，以违犯军令论处。当时，沿着大、小金川还有些著名的“雪梨”，梨子尚未成熟，这些青疙瘩梨子也就变成我们惟一的“饭”了。雪梨，的确是好吃的水果，起初吃一两顿还不错，吃多了就要泻肚子，而我们天天吃梨，也天天拉梨，这一来肚子也拉得光光的了。一开始，有梨吃还算好，但不到三五天，这几万人的军队便连梨树叶子也吃得精光了。

这一带本来人烟就稀少，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和恫吓，藏民早就跑得一千二净了。国民党为了给我们造成“绝境”，还给藏民规定了各种威吓的条例：“凡给红军引路，当通司（翻译），不肯坚壁清野，卖粮食给红军者，一律处死，财产全部没收；不听从指挥，不和红军作战者，以叛逆论罪……”因此在这一带休想买到一粒粮食。

在草地，最大的困难就是吃粮问题，维持生存是严重的斗争。一进草地，首先吃回回菜、野葱，几天工夫，这些东西就都吃光了，随着便开始吃起野草根来了。最初吃野葱、野草时没有经验，中毒的人不少，那时药物很少，救治不及时，便造成死亡。

野草根吃完了，怎么办？于是各个单位只得派一部分人出草地，到附近的山上去摘野果子、打野物。

我们电台的一个小报务员陈小柱同志，一天，从清早出去找食物，到晚间还未归来，像这样的情况，总是凶多吉少。我们正在念叨他，正要去寻找他的时候，忽然下起了瓢泼似的大雨来了。风把油灯吹得忽闪忽闪的，雨点飞溅到屋内。暴雨在草原上喧嚷，一片黑暗，一片雨声，此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是不可能回来了……”我难过地自语起来，“我们要是随着毛主席北上早已到陕北了，那有多好！哪会有今天。那里有党中央，有毛主席，有根据地，有群众，也有粮食……可是我们究竟要留在草地干什么？这满目荒凉的草地能建立个什么根据地？要叫我们过着原始时代的非人生活吗？使得多少英勇的同志都无辜地牺牲在这荒山僻野里，干什么呢？”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上了床，我默默地念着：“他是不可能回来了……”

天亮了，但是雾气仍然紧锁着天空，阴沉沉的使人窒息。我带着监护排的几名同志去找陈小柱。这时天晴了，但昨夜的大雨又把好多地方的草丛淹没了，更增加了行路的困难。我们向草地经常弄粮食、摘野菜的地方走去，小心翼翼地踏着草丛走着，积水浸没了脚背，冰沁沁的格外寒冷。从来草地后，我们的脚除了上床睡觉之外就没有干过，毒水已把脚泡得浮肿了。

在一个山谷里，找到了陈小柱同志的尸体，原来他从峭壁滚跌到山谷里牺牲了。地上一大摊鲜血，他头部撞得稀烂，脸面被雨水冲刷得雪白，点点地留下了一些血痕。手里还握着装满野果子的口袋，他为革命、为同志们的生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弄些草、石块把他埋葬了。我拾起一块石板，用铅笔写上：红军战士陈小柱之墓，折把野花放在坟前，向小柱同志默默致哀：小柱同志，你安眠吧！我们将继承你的未竟事业。我们就这样，又和一位同志永别了。

不久，不但把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粮食吃干净了，而且附近地区的地里的山上的一切可吃的东西，也都一扫精光。敌人在四处驻扎重兵，严密地封锁着我们。再出外到更远的地方去弄粮食，已经不可能，人少不敢走远，人多弄到一点也不够来回路上吃的。

困难迫使我们不得不忍痛屠宰自己心爱的马来吃了。

有一天，我和不久前才由五军团电台调来我台当政委的钟真益同志商量，决定杀我们的马了。我们俩互相争着杀自己的马，争了好长时间。

“决定杀我的那匹马吧，不用再争论了。”我下结论似的说。

“不行，决定杀我的那匹马。你负过伤！”

“别老提负过伤的事，我的伤几个月前就好了。再说，你们为什么老是拿负伤来照顾我呢？从前，李白同志是这样的，现在你也是这样，我是好人，已不是个伤员了。”我生气地说。

“好了，我们不必再争论了。反正，我的身体比你结实，决定杀我的马。”

钟真益同志不管我同意不同意，跑出去把他的饲养员老常叫了进来。钟政委对老常说：

“我们不得不杀马吃了。我想，这种情况你是了解的，不用我多讲。现在，你快去牵马吧。”

老常哭丧着脸，不说话也不走。

“不杀马，那你又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钟政委焦急地问。

自然，老常也提不出更好的办法。他纹丝不动地站了好一会儿，才眼泪花花地点了点头，低着头出去了。

我看见老常耷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步子慢腾腾地把马牵到靠河边的空地，这个空地是经常杀马的。只见老常温柔地抚摩着马鬃，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水，呆呆地凝望着他的马儿。马儿乖乖地站着享受着主人最后一次抚爱，它不时地还用头挨擦着它主人的身子。老常沉重而难过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曾经为了它付出过多少心血！饲养它，训练它，它已经成了他的亲密伙伴。我叹了一口气，仰望着天空，天阴沉得快要塌下来，阵阵冷风呼啸不停，草原更加苍凉了。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杀马的同志，要开始动手了。老常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马儿，他不忍心看见马儿倒下，最后，他绝望地掩着面走了。同志们见那跟随我们长征有过功绩的马儿倒下了，不忍心再看，也都很快地离去了。

“我们还要在草地住多久啊？现在杀马，以后只好喝风了。”

“这个鬼地方——唉，谁知道他张国焘要搞啥名堂。”

“跟毛主席到陕北去多好呀！”

“那，我们就不遭这些洋罪啦！”

“朱总司令都到麦地里搓麦，他（指张国焘）呢……”在路上，我听见几个同志悄声地嘀咕着。他们渐渐走远，我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了。

朱总司令到麦地里搓麦子，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总部在卓克基住的时候，有一天，虽然刮着阴风，但太阳终于从一块黑云里射出了光芒。那天，我们许多人为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北上抗日救国，准备过草地的干粮，不得不到附近的麦地里搓麦子。同志们正弯着腰双手揉着尚未成熟的麦穗，忽然听见旁边的同志惊喜而又像是行军传话似的说：“朱总司令来啦！”我忽地抬起身来张望，跟着也说了一句，传给旁边的同志了。同志们随着“朱总司令来啦”的话声，都抬起身子，带着崇敬而欣喜的眼光看着他。朱总司令消瘦多了，但还是精神奕奕。他满面笑容向同志们频频点头招呼。总司令是多么热爱这些由党、毛主席和他亲自教导成长起来的红军战士啊！

每当想起在遵义医院里，朱总司令去慰问我们时的情景，我的心头就按捺不住的激动。朱总司令满面透露出慈祥、谦逊和厚道的笑容。他穿着和我们一样带补丁的衣裳，穿着草鞋。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温厚长者的谈话，使人在他面前感觉不到任何拘束，就像在自己家里和父亲在一起一样。

朱总司令和我们一起搓麦子，我们感到温暖和鼓励。我们心里乐滋滋的，兴奋得忘记了肚饿、腰酸、脚胀、手疼。我们猛干起来，搓麦子的效率比以前高多了，就像我们在总司令指挥下勇猛地斩杀敌人一样。

到了中午，大家各自拿着茶缸、脸盆就地炒麦做饭吃。吃午饭了，同志们团团地围坐在朱总司令身旁，带着劳动后的困乏，有的坐着，有的歪斜着，有的彼此依靠着，有个小鬼干脆躺着把头放在旁人的大腿上，大家一面嚼着麦粒，一面静听他讲述井冈山的故事。看见朱总司令也和我们一样吃着炒麦粒，我们都感到难过。然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用浓重的四川口音绘声绘色地讲着。

他说：红军在井冈山时，也很苦，不比现在好多少。敌人紧紧地包围我们，没有吃，没有穿，有的同志说怪话，发牢骚，说什么“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当时红军用禾草当棉花，野果当粮食，坚持了斗争，克服了困难。后来红军发展了，建立了根据地，不是不吃南瓜了吗？……现在，我们又遇到严重的困难，没有粮食，自己下地搓麦子。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坚持革命到底，草地总要出去的。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将来我们走出草地到达陕北就好了。

朱总司令的讲话，一字一句都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就像铅水灌在字模上凝铸铅字一样。我们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加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忍受着暂时的艰难，继续向困难作斗争。

偶然，我们发现了朱总司令的双手和我们一样也已经磨破了，大家更加难受起来。我心想：“要是他和毛主席一起北上有多好……”可是，党需要他率领左纵队，为了革命，他和同志们一起忍饥挨冻，同甘共苦，住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地里，党需要他留在这里坚持向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斗争。他耐心地说服张国焘，促使他觉悟。

到草地后，朱总司令有暇时经常到我们电台来玩，同大家下棋，聊天，讲革命道理给同志们听。为了党的团结，为了爱护同志，在谈话中他没有直接指责张国焘，但他从侧面来教育同志们认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那时，他只要一讲话就提到毛主席北上的正确路线，告诉我们，毛主席是怎样带领红一方面军到了陕北，打了胜仗，与陕北红军会师，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又开始搓麦穗了。同志们都要求朱总司令回去休息，但他怎么也不肯，他还说他身体很结实，从小就干地里活。真的，干起活来，我们一些同志还比不上他呢。“朱总司令真是老当益壮啊！”同志们赞叹地说。虽然他的头发有些斑白了，消瘦得多了，但他的身体却是健康的。然而，只要我们仔细一想，从南下到草地以来，他担着多么沉重的担子，他为革命和同志们的艰苦生活，又操着多么大的心啊！他在草地和同志们一样煎熬着饥寒，还要和张国焘进行斗争，只有像他那样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久经革命锻炼，有着革命乐观主义的人，才能经受得住这个千折万磨，才能战胜一切困难，永远忠

诚地、辛勤地、愉快地为革命工作。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这一点，是每个同志所深切认识到的。

我一边回忆着往事，一边带着沉甸甸的心情回到了屋内，屋内充满了使人窒息的沉郁气氛，几个同志在久已不响一声的发报机旁失神地坐着，他们从前那红润的脸膛已经变得灰黄，两颊已深陷了下去，他们消瘦多了。我知道我也和他们是一样的。

吃的越来越困难了，马肉吃光了，一百五十多斤的马肉，我们一百二十多人足足吃了一个月。当时不论宰杀牛马或是猎取的野兽，都规定“三不吃”，即：皮外面的（毛）不吃，肠里面的（粪）不吃，啃不动的（骨头）不吃，其余一律吃之。实际上啃不动的骨头，也没有扔的，放在锅里煮上一两个月，骨髓吃光了，最后取出再用火烤焦，碾压成粉，骨粉也吃掉了，三不吃早已改为两不吃了。是啊！那时一颗粮食，一把野菜，一块皮子，总之一切可以充饥、顶饿的东西就像生命一样宝贵，哪有随意舍弃的呢！

那时，一天照例两餐，一百多人煮一大锅皮子、草根、树叶掺上二三斤米麦的饭。那二三斤米麦，在一口大锅里简直成了沧海一粟了，大家去盛饭时，还开玩笑地说：“脱了衣服下去也捞不着呀！”就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红军战士仍然你尊我让。这是多么高贵的阶级友爱啊！

在草地八个月，有六个月没有见着米麦，红军不得不以树叶、草根、野果、皮带（腰带和枪带）、马鞍皮，甚至到各处垃圾堆里去寻找藏民丢掉的破皮靴来充饥，维持生存，坚持斗争。在草地八个月中，约有四个月没有吃着咸盐。那时的盐真比金子还珍贵。从四川带来的盐巴（块盐），一人分了指头大小一块，用布包着，用火柴匣装着，每到吃饭时，便拿出来用舌头舔一舔。人们吃不到咸盐，身子软搭搭的没有力气。那些上山、过河摔死的，淹死的同志，恐怕与没有吃盐身上无力有很大关系。

吃野葱、野草，不断发生中毒，加上长期的饥饿劳累，长期生活在风霜雨雪之中，使得病号大量增加。那时，生病的同志躺在床上，别说吃药治疗，就是想喝一点稀饭都很难得到。同志们目睹这种情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难过、不安。爱莫能助，眼含泪珠，对自己的同志只能做口头上的安慰。就这样，数以百计的同志在恶劣的气候下，在饥饿的煎熬下，在没有药物医治下，在劳累的折磨下结束了他们革命的青春。

吃的问题正令人愁虑万状的时候，无情的冬寒又降临了。在四川平原，仍是葱绿遍地，蝉声四起的秋暖季节，而这里却已是雪海银山，冷风刺骨的严冬了。康藏高原的寒冷无情地折磨着我们。这个康藏高原地方就是在夏天也是十分阴冷，当然更不必说冬天了。

当时，我们的衣服破烂得不堪言状，原来在江西发的棉衣已经“三变化身”：棉变夹，夹变单，袖子、裤脚剪去补破洞，上衣变成衬褂，长裤变成裤衩。同志们想要坐下的时候，得先将裤腿往上提提，免得一不小心屁股有“开花”的危险。这怎么能度过严冬呢？于是大家为战胜冬寒，开始忙活起来。但要找布匹和棉花，那是比上天还难。怎么办？只得用草了。我们拾了许多草来晒干，垫也是它，盖也是它。至于衣服，我们则东奔西跑地去找藏民扔弃的牛羊毛和自己杀马留下的马毛。当时，大家白天搞吃的，夜间就捻毛线。捻毛线，这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第一，这些毛并未加工，易断。第二，没有工具。成天成夜地用双手搓，手都搓烂了。但艰难困苦折磨不了红军的斗志和硬骨头。我们不会捻毛线，就学习，开始捻成的是指头粗的“毛绳”，这哪能织成衣服呢？不行，又松开它再用手搓、棍捶，拆了再捻，捻了再拆……终于捻成了细细的毛线，又一针一针地把它织成毛衣、毛裤、毛袜、毛鞋。同志们兴奋地穿上自己亲手制成的衣物。可是，没有衬衫，没有衬裤，那硬而粗的土制毛衣穿在身上，毛茸茸的，满身都像长了毛虫一样，刺扎得光痒痒，走起路来把两腿刺扎得火辣辣地痛。左刺右扎，有的同志竟把腿都磨破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天很冷脱不下来，只好忍痛让它刺扎，于是一出汗水，毛和破烂的皮肉就如漆似胶地粘在一起，破烂之处渐渐地化脓溃烂了。

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了草地里的冬天！

草地八个月，我们不知翻越了多少高山峻岭，跋涉过多少河川，磨破了多少双草鞋，吃过多少酸涩的野果啊！而那些令人难以形容的艰苦生活，并没有动摇我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这光荣的红军队伍。

但是，草地八个月的苦难生活，却深刻地教育了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对张国焘背叛党中央，坚持个人错误路线的罪行，已经认识得一清二楚了。在部队里，普遍地要求迅速离开草地，北上和一方面军会师，重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以便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开展新的革命斗争。

选自《忆长征》

春风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中山广场的清晨

伍友明

有机会得以欣赏中山广场的晨景，使我感慨万端。

灰暗的夜幕徐徐升起，晨曦像显影剂一样，把广场周围的高楼，宽广的环行道和点缀着鲜花的广场的情影，逐渐地显现出来。这时的广场，空气清新，环境静谧，令人格外心旷神怡！

参加晨练的人们，陆续从四面八方广场聚拢，越来越多。有的长跑，有的散步，有的舞剑，有的练拳，因人而异，各练所好。

有些人稍事锻炼之后，便开卷阅读：有的学外语，有的读科技书，也有的在预习功课，一个个是那样地聚精会神，分秒必争。

人们，是这样的无忧无虑而又热烈紧张。这是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人才具有的表现。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如今，抚摩伤疤过日子的人，只会叹息，而那些意志坚强的人，却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努力治愈祖国母亲身上的创伤，在四化建设中大显身手，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一切。

滨城是美丽的，而中山广场就是这美丽画卷上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今天和明天的建设者的心灵，他们崇高的理想，不正像珍珠一样晶莹美丽吗？

一天的时间是短暂的，然而漫长的历史，却是由这一天一天接起来的。正是那些珍惜今天、创造未来的人们，才配称做历史的主人。我们亲爱的母亲——祖国，有过灿烂过去，但近一百多年来，也曾蒙受过巨大的苦难和屈辱。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强占了旅大。接着，这块宝地又易手沙俄。沙俄为称霸远东，用中国的“赔款”和劳力，用中国人的血汗打下了这座城市的基础。在第一期工程中，就修建了这座广场，并以沙皇皇后的姓氏命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卡娅广场”。广场四周修建了辐射形的八条大街，什么“莫斯科大街”、“基辅大街”等等。沙俄殖民者原来打算以旅大为侵略基地，即便不能鲸吞全部中国，至少也要占据中国北部的半壁河山。然而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沙俄被日本打败，这里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广场改名为“大广场”。日本侵略军衙和侵略军头目的

名字取代了沙俄统治时期的街道名称。“山县通”代替了“莫斯科大街”，“监部通”代替了“基辅大街”，如此等等。

为了宣扬1905年到1912年间第一任关东都督、子爵、陆军大将大岛义昌的侵略“功绩”，竟然在广场上树起了他的铜像。广场周围建起了大和旅馆、市役所、朝鲜银行、正金银行等建筑。

当年踌躇满志的殖民者在这广场上漫步的时候，他们脚下踏着的是中国人民的血肉和尸骨。旅大人民在苦难中呻吟、挣扎、反抗、斗争，其势如风暴，如雷电，从未止息，从未间断。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还在同盟会成立不久的1906年，孙中山先生就曾派人到大连、沈阳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1907年，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先生，来到大连、沈阳一带进行活动。因此，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之后，顾人宜、隋守真领导的复州、庄河军立即响应，打响了辽南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然后，辽东总机关部（名义上叫同学会）就设在中山广场北面的“浪速町二十八番地”（今天津街），为民军筹饷、购械，招募官兵，制订作战计划，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为烟台的北伐军运送了枪支弹药，顾人宜以“中华民国征清满洲第一军司令”的名义，向关东都督府发出通告，要求他们遵守“中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退位。十四日，辽东军民奉命开赴烟台。但是，辛亥革命播下的种子，在大连地区却起了唤起民众觉醒的巨大作用。

正因为如此，1945年旅大解放后，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大广场”改名为“中山广场”，从中山广场到解放广场这条城市最宽最长的马路被命名为“中山路”。

辛亥革命距今天已有70年了。7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中国人民坚强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懂得：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从遐思中抬起头来。这时，迎着初升的朝阳，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和阿姨的带领下，欢快地走进广场，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嬉戏于花丛间。他们今天有权享受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他们赢得的一切。明天，他们将肩负起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重任。

中山广场，滨城的明珠，愿你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辉。

发表于1981年10月11日《大连日报》

大连湾抒怀

董志正

大连湾，波澜壮阔，气势不凡！

大连湾，景色秀美，令人神往！

她，曾催动多少长于选取角度和画面的摄影师、画家，用娴熟的手法，把自己的观察和选择的画面凝结到相纸或画布上，创作出令人赞赏的艺术品；她，曾使多少诗人情不能已，留下了优美而动人心弦的诗章！

我对摄影和绘画，是门外汉。但，一有机会，我便想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她，欣赏她。偶有所得，便喜不自胜。把这种喜悦和美感深深刻在自己的记忆里，我把这也看成是一种享受。前不久，乘船去上海出差，我得以从海上观赏了大连湾的夜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沉思良久，浮想联翩……

客轮“长更”号按规定应于午后四点启程。因装货，推迟半小时才开船。当时，我不无遗憾地想：又失去了一次观赏大连湾景色的机会。

当轮船驶出大连港时，夜幕已经降临。繁忙的码头、热闹的市区，甘井子工业区、湾北的渔港区，均罩上了一层纱幕。远山近水，变得模糊起来了。

不多久，大连湾沿岸千万盏电灯相继亮了，密者如灯市，疏者似晨星，但却用辉煌的光芒勾勒出大连湾雄伟而秀美的轮廓，增添了无穷诱人的魅力。

啊，大连湾的夜景原来是这样美呀！

客轮播音室播出了《大连好》歌曲，悠扬悦耳；音员用充满激情的语调，向旅客们介绍大连的概况。这一切，都给聚集在甲板上观赏夜景的旅客们，增加了兴致和欢乐！

一些初次乘船的旅客，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地观赏着，议论着，不时地发出兴高采烈的赞美声。

有一对旅行结婚的情侣，在赏景的过程中，偶尔相顾一笑，那明亮的眸子里洋溢着惬意的喜悦。这大连湾美丽的夜景，给他们新婚的喜字上又增添了一层闪闪发光的金色。你看，那满足的神色早已飞上他们的眉梢。他们在畅想未来吧？肯定是的。生活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绝不仅仅是欣赏美景；爱情是幸福的，幸福的爱情绝非只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结婚标志着跨过了人生的一个里程碑，由幼稚而成熟起来，更懂得生活

的意义：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惊涛骇浪，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and 未来……

有一个初次随父母乘船远游的小男孩，大约只有五六岁，头戴儿童海军帽，胸前挂着一支做工精巧的玩具机枪。他一边欣赏夜景，一边惊奇地喊着：“大海！大轮船！大海鸥……”欢喜得手舞足蹈。欢乐吧，未来的国家主人！你把一切景物头前都冠个“大”字。是啊！展现在你面前的大好河山，不就是你们将来大显身手的宽广舞台吗！不知谁喊了一声：“看！锚地上停泊那么多的轮船！”

我凭栏远眺，只见锚地上，有五十余艘货轮散泊在数华里长的海面上，远远望去，犹如一座灯火辉煌的不夜城！这些等待入港卸装货物的船只，大部分是外国货轮。可惜看不清都是哪些国家的。但我知道，它们的主桅上，都悬挂着一面五星红旗，以表示对我国主权的尊重和敬意。

“长更”轮离港后，便开足马力向前行驶着。我们这些普通旅客，俨然是些检阅官，站在甲板上检阅着停泊在锚地上的一艘艘船只。我不禁挺起胸脯，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自豪感。

是的，我们应该自豪。当年，帝国主义霸占大连地区，侵略者的船只，在大连湾里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而今，这种耻辱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怎么能不自豪呢！

我们自豪之余，又怎能忘记过去？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吉利炮舰轰击中国“大门”的时候，它的海盗船就屡次侵扰地处要津的大连地区沿海，刺探军情，抢劫财物，狼虎之心已露！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的一百七十余艘舰艇载着一万八千余名官兵侵占这里达一个多月之久，横行海上，劫船害命，登岸掳掠，无恶不作。为纪念他们的“胜利”，竟以英国女皇的名字维多利亚命名大连湾，其阴险用心，不言自明。

从1894年到1904年的十年间，这里曾先后遭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洗劫。村镇化废墟，人民遭涂炭。沙俄占领七年、日寇统治四十年，留下了积山白骨和世界罕有的奇冤，国家的耻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血和泪，仇和怨，就是十个、百个大连湾也容纳不下呀！巍巍青山曾为之泣血，滔滔黄海屡掀怒涛。不屈的大连人民，进行了千百次的英勇反抗，涌现了徐邦道、阎世开、苑铁匠、陈永发，马成魁、涂景涛、关向应，金伯阳等为代表的无数爱国志士和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1945年8月，结束了殖民地的历史，大连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解放后三十八年来，昔日的殖民地被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港口城市、工业基地、军事要塞、旅游胜地。大连湾以她的勃勃英姿，出现在中国的北方。

从凄风苦雨的黑夜中过来的人，更珍惜光明的可贵和阳光的温暖，饱尝过亡国奴苦味的人，深知国家尊严的可贵。

历史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殖民地留下的百孔千疮被治愈了，人们心灵上的自卑感被扫除了。历史的教训却不应忘掉，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罪证却不应销毁。旅顺的“万忠墓”，大狱，大连的红房子，以及帝国主义争夺厮杀过的古战场遗址，均应保留。“中华工学会办事处”遗址、地下党秘密联络点、“四·二七”纪念碑，应加以保护。树立了金伯阳纪念碑，还应当树立一批抗敌英雄的纪念碑。我认为，还应当保留一些地方，如胜利桥北，应保留一条俄国街。须知沙俄当年曾企图在大连湾沿岸建筑一座东方的巴黎，留在那里的颓废派俄式建筑，就是他们的杰作。南山也应保留一条日本街，当年日本人在那里建筑了晋绅区，把这殖民者的乐园和海港工人的“红房子”——一座人间地狱，加以对照，可清楚地看出“共存共荣”背后的蛇蝎之心。在西岗或香炉礁也应保留一条中国街，让子孙后代搞清，殖民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大事件发生在这里或与这里有关。今天，人们在游览大连风景区之余，一睹这个近代史上比较典型的大展览馆，不会是无益处的吧？因为这里是中国除香港、九龙、台湾以外，时间最长的殖民地。人们从比较中，才会发现人民当家作主人之后的巨大创造力！人们从比较中，才会明白靠掠夺殖民地而暴发的“发达国家”和被掠夺一空的殖民地人民在废墟上创业有本质上的差别！

今天，我们对外开放，以便向发达国家学科学、学管理、学一切有益的东西，这无疑是有必要的。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渗透以及往昔那种奴性自卑心理的复萌，同样也是必要的。

一位日本老船员，曾问过一位海港老工人：“我是被迫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每次都怀着赎罪的沉重心情来中国，请您老实告诉我，你们对我这样的人恨不恨？”老工人告诉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党教育我们，要把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因为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老船员被深深地感动了，流着热泪向老工人鞠躬致意，是啊，中国人民是宽宏大度的！

一位外国记者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没有外国人，恐怕就没有大连这座城市吧？”我们回答的是：“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建设速度要更快！沙俄和日寇用中国的

钱财、中国的劳力、中国的原材料，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营殖民地，掠夺难以胜计的中国财富，屠杀了无数中国人，是罪恶，决不是功劳。”

这位记者的挑衅性的问话，正说明他有偏见和顽固无知。可惜，这种偏见没有也不可能马上消除。中国人民的宽宏大度决不是软弱可欺！

一声汽笛声唤醒了我，一只汽艇从锚地驶向港口。这是海关船。他们完成了海关检验任务以后，回港去了。这些国门的卫士，日夜操劳，迎接一切友好的外国人，同时也警惕一切渗透、挑衅。我默默地向他们致敬！

过了锚地，便看到三山岛上的指航灯一闪一闪地转动，给轮船指引航向。

大连湾北新港上的灯光也在闪亮！

今日的大连湾是秀美的，明日的大连湾将更加璀璨！

“大连好，像串串珍珠在闪亮……”我耳畔又响起了这优美的歌曲。这不是播音室播放的，而是两个青年人在低声吟唱……

“长更”轮乘风破浪前进着，前进着！

大连、全中国，也像这巨轮一样，乘风破浪前进着，前进着！

发表于1983年第5期《海燕》

五月反“扫荡”回忆片断

林 火

一 转移待命

1942年5月中旬，接到总部通知，要准备反“扫荡”。当时报社同志白天照样工作，依然按时出报，一到晚间，大家一方面分散准备，有的科室，如参考室，各自埋藏需要隐蔽的东西；另一方面，又集中一部分人力，帮助印刷厂掩埋机器、铅字等以及其他笨重物资。最后直到5月24日晚上，将最后一批需要隐蔽的东西埋藏完毕，并由各科室亲自检查战时空舍清野保密的措施，决定不留一点痕迹，以防万一敌人在“扫荡”中搜山，搜到报社驻地，进行破坏。

原来，为了适应打游击，报社队伍临时组成了战时编制，驻山庄的编辑部、通联部、印刷部等 其他经理部，还有另外几个印刷厂，分驻另外几处山村和麻田，共二百左右人的队伍，编成两个中队，由史纪言、周永生同志分别担任队长，何云同志知道我住过抗大，命令我担任指导员。25日拂晓，报社大队人马 对外称八路军教导队，在大队长何云同志率领下，从山庄出发，爬上东山，向报社游击根据地南艾铺附近的小寺子沟进发。

经过一路的急行军，大约在上午10点左右，顺利来到了小寺子沟。这是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分为南北两处，坐落在大山沟底，当时队伍就在那里休息，准备待命出发。

谁知在那里吃过了午饭，又吃过了晚饭，大家一直焦急地盼望消息，但始终没有动静，到了黄昏时候，同志们眼望西山，依然不见通讯员的影子。直到夜色降临，何云同志特派人专程去总部请示命令。这天夜里，大家有的在老乡家里借宿，有的在村边上的茅草棚里过夜。记得史纪言同志和我们大约二十来个同志一起，挤卧在这个山村的一座小小寺院独间正殿堂屋内。殿堂小佛龛前的空地有限，开初大家仰卧挤不下，忘记是哪个同志想出的高招，要大家一律侧卧。当我们个个两臂附身，两脚伸直，呈现出好像卧地侧身立正的姿势，一个个都倒下了以后，这下子果然全部都得以安身了，一时引起同志们一阵哄笑……

这天夜里，虽然经过大队长的细心安排，除了警卫排站岗放哨之外，另有干部轮流值班守夜，何云同志嘱咐大家安心休息，但大家还总是时睡时醒，盼望消息，一直盼到次日拂晓，盼到日出东山。不久，突然听到从西边高山远处隐隐传来枪声，待到半晌午左右，枪炮声越来越响，大家纷纷焦急、思虑、不安，面向西山仰观远望，我们的送信人仍未归来。这时有的同志表示担心，是否发生了什么意外？我则凭着自己在部队采访时的体会和印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一定是我军主力正在包围歼灭敌人，在打硬仗了，后来才知道，事实与主观想象的完全相反……

直到第二天中午左右，突然发现几架敌人的飞机自东而西，紧贴着山峰上空向西窥视着驶去，接着就翅膀一栽，机身倾斜，从西面山那边传来轰轰巨响的爆炸声。这时报社的人马，在山沟谷中、树丛中分散隐蔽，眼望西山，忧心如焚，切盼佳音。

待到黄昏时分，太阳落山时节，突然，在西山梁上的路上处影影绰绰发现有人影竖立，仔细看来，有哨兵在那里站岗。我立即请示何云同志由我前去侦察、联系，他嘱我多加小心，我当即翻身跨上那匹栗黑色的矮骡子，带着马夫小鬼，沿着西路爬了上去。等爬到山岭路口，得知乃是我军某部，原来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那天白天又酣战一整天，已疲惫不堪，正在那里卧地休息。哨兵同志听说我是报社的，就好心告诉我：“野政罗主任就在前边”。我沿着卧睡在路边阵地上的战士队伍向前走了不远，看到高高身材的罗瑞卿同志，在黄昏烟幕中，正坐在草地上休息。当他看清是我以后，立即问道：“何云呢？”我说：“我们队伍都在下边沟里，等着命令呢！”他马上说：“让他把队伍带上来，跟我们走！”我当时立即转身，小跑飞奔下山向何云同志报告消息，他立即发出命令，全体紧急集合，当即急速把队伍引上了山梁，总算与总部汇合了。

二 兵分三路

那天晚上，报社队伍拉上大山梁以后，何云、克寒同志带我们几个人立即见罗主任。听罗主任说：原来，今天拂晓时分，我总部按预定计划，为了反“扫荡”，总部司政等大队人马正由驻地出发，准备朝冀西方向转移，开拔跳出内线圈子，到外线去打游击。突然却被从西面辽县、武乡、榆社等地窜出的日寇，配合另外南北两路的敌人，采取突击奔袭的诡计，窜侵到总部驻地山村外线的几面群山险隘之中，使我部临时处于被包围紧急状态。当时在总部警卫团的奋勇火拼下，幸好又遇到刚从外线回返的一二九师主力七七一团在附近行军路过，闻讯立即向东飞奔，赶到总部附近高山阵地，参加战斗，这样经过一场生死搏斗，猛烈火拼，终于掩护总部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副总司令率

领向西突围之后，朝武乡方向而去；另一路则由罗主任率领野政包括宣传、民运、敌工部等向东南突围来到十字岭东南一带大山梁上。这时因已甩掉了敌人，天色已晚，正在那里准备露营休息。我们报社大队当即在野政队伍后面，也在山梁上就地露营安歇。

经过一夜山岭露宿之后，第二天拂晓前，即由罗主任亲自率领野政和报社大队人马沿着崎岖的高山险路，行军向偏东南方向前进。拂晓时分，忽然从队伍先头传来命令，当时低声细语，一个传一个，向后传，首长命令，把帽子摘下来，这时大家猛然醒悟到，原来天将黎明时分，戴着帽子行军，像这样一条长线游龙似的队伍，较容易被敌人侦察发觉。从此大家又增加了一条行军的常识。老红军战斗经验是多么丰富啊！同志们事后每逢谈到，无不又是感动，又是敬佩！

当天行军到晌午左右，忽然前哨回来报告，前面远方山下发现敌人。于是罗主任命令全体大队人马兵分几路，分段行动，分头向西转移。报社大队人马在何云同志指挥下，匆匆沿着山坡向西急行军前进。不久，突然听到后面远方有机枪响，当时我正在报社分队行列前后奔走，招呼大家紧紧跟上，不要慌，不要掉队。谁知这时，我的马夫小鬼忽然尖叫一声，原来在行军到山坡道边时，他手中拉着的骑骡一失足，顺着山坡翻烧饼似的滚了下去，一时急得小鬼直要哭。我一面安慰他，一面赶紧飞步跑下坡。同时电台的张连德等两三位同志，也闻声抢步赶来。山坡的坡度虽然不大，并且底下是梯田，但不知什么缘故，同志们尽管低声吆喝，又拉又踢，但骡子怎么也爬不起来。最后我赶紧说：“算了吧，赶路要紧，千万不能掉队啊！”就这样，我们又归队前进。这事直到最近几年，去北京见到原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张连德同志，共同回忆当时的情景，往昔烽火年代，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同志情谊，犹历历在目……报社大队急匆匆行军下到沟底，来到了河南武安县的馆陶川（现属河北省），又越过馆陶川底，爬上西边高山下的坡底深谷旁边，与野政大队人马汇合在一起了。等各分队全部汇合之后，野政罗主任立即集合队伍讲话。

“同志们，我们身边的主力部队另有作战任务，我们不能拖住他们。我们要放虎归山，让他们担负起粉碎日寇扫荡的战斗任务。我们要独立行动，一定要胜利冲出去，到外线去打游击！”

他简短有力地说了几句之后，最后要求各单位火速分别开小型民主会，讨论如何行军突围，各献良策。通联部由吴宏毅提出，报社可兵分三路，一路由何云同志率领少数编辑、电务、印刷工友等组成轻装小分队，随野政罗主任突围转移到冀北继续出报。另一路包括少数记者等，随一团随军到太南采访。最后，其余人员，就地分散隐蔽，和老

乡们一起打游击。当我把这个建议汇报以后，何云同志表示同意，并立即向罗主任报告，得到允准。

原来，报社为了争取在反“扫荡”中能够打游击继续出报，已由我们的发明家王显周同志发明，创造了轻便小型脚踏印刷机，轻便小型活铅字架，统共只需用四头骡子就可以驮着走。何云同志豪迈地管这叫“背着报馆打游击”。其余两路，就地隐蔽的，由史纪言同志带队。随军突围的，由克寒同志和我带队。就这样，当时报社人马就兵分三路，大家分头对敌游击作战了。

（三）树下缅怀

那天下午，报社兵分三路以后，克寒我们十来个人，有记者华山、吴宏毅，参考室的浦一之同志等，由克寒带队与一团团长马忠全同志取得了联系。他热情地邀我们随团部一起突围，并嘱咐一位政工干事在身边随时照顾我们。当我们看到连日拼杀的年轻战士们，虽然身上淡绿色的土布军装，沾满泥土，有的脚穿的粗布军鞋也开了口子，但个个精神抖擞，毫无倦容。我们这些文化战士，也迈开大步，紧紧跟上他们的行列，沿着山路，快步向南前进。

待到行军到了一个山口，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半山坡下，马团长集合队伍进行动员讲话。他简短有力地号召说：

“同志们。我们身边的干粮差不多用光了，我们要回太南自己的根据地去取干粮！不管遇到小日本怎样包围、阻击，我们一定要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出一条路来，等我们装满干粮，那就是胜利，我们要为反‘扫荡’胜利而流血、流汗，我们一定要胜利！”

那时由于行军途中情况紧急，虽然战士们不能用高声呐喊，响雷一样的喊杀声表示决心，但马团长的几句动员令，活像一把火炬，立刻在他们的胸中燃烧，在他们的脸庞上激荡起火热的红光……

在这次行军途中，曾有一次遇到敌人的阻击，我们猛虎般的战士们，确实用刺刀和手榴弹狠狠教训了敌人，杀开了一条血路，终于胜利返回太南，袋子里装满了干粮 子弹，然后毅然奉命奔赴反“扫荡”的前线。

随军转移到太南以后，我们报社十来个人先在太南五分区司令部驻地休息了几天，然后同志们分头到部队或地方去采访，克寒和我便到涉县南部的西达城一二九师师部临时驻地。

这天下午，正当我俩沐浴着初夏的阳光走进西达城东边村口时，远远望见一棵高高的槐树阴下，刘师长和邓政委正坐在那里谈话、乘凉。我俩刚一走近，伯承同志、小平同志满面春风地站了起来，频频招手，伯承同志幽默地说：“远远望见两位秀才向这边走来，一个是‘诗云子曰’，一个是‘A B C D’，原来是你们俩呀！”小平同志也微笑着招呼我们坐下。

原来，克寒我们俩年龄相仿，他身材比较瘦弱。清癯的面孔，戴一副近视眼镜，走路来，文质彬彬。我则走路身板挺直。伯承同志幽默形象的比喻，亲切长者的热情关怀，使我们听了格外感到安慰和温暖。当详细询问了报社转移的情况之后，伯承同志、小平同志突然面部表情十分沉痛，心神激动地告诉我们：左权参谋长、何云同志牺牲了！突然，在我们面前不幸的噩耗果然证实，我俩一下子不知说什么才好，真是欲哭无泪，悲痛无声。悲切之情，实在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看到我俩悲哀的表情和痛楚的心境，伯承同志悲痛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一文，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我们光悲痛是没有用的，我们要用战斗和胜利来永远纪念他们！……”

原来，正是5月26日那天，正在敌我两军猛烈对战，包围与反包围，冲锋与反冲锋的紧要关头，正是我们这位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威震敌胆的名将左权亲临浓烈的炮火硝烟第一线，稳如泰山，指挥若定，巍然屹立在十字岭上。正是在他的英明指挥下，调动我钢铁长城一般的英勇战士，猛打猛冲，一直战斗到最后，终于迫使疯狂嚎叫“铁壁合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被打得豺狼一样地蹿上山来，龟蛇一样地滚下山去……

这时，又立刻引起了我们俩人的回想：不错，正是5月26日那天，在小寺子沟隐蔽待命的时候，报社同志从早到晚整天听到自西而东不断传来阵阵的枪炮声，天上并有敌机轰叫。大家整整一天，近看西山，远望十字岭。翘首云天，渴望佳音……当我俩把此景此情向刘邓首长沉痛表述之后，立刻又引起了他们深切的缅怀，痛切的哀思。就这样无言无声，沉默一会儿之后，刘师长亲切地告诉我们说：根据当前形势，侵袭太北的敌人，已成了强弩之末，看样子，太北反“扫荡”快要胜利结束了。估计下一步，狡猾的敌人可能乘机来太南袭扰。他要我俩留在师部待命，等整个反“扫荡”全部胜利结束后，再返回工作岗位，继续战斗。我俩欣然从命。

我曾有机会重新阅读当年伯承、小平同志合写的《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的文章，其中有这样几句：

最好的纪念，不是在死者血泊的周围踟蹰，而是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向死者和我们所共同坚信的真理前进！

今天重读这几句名言，不觉又使我重新回忆起当年。为了缅怀先烈，个人曾作短诗一首《悼念左权将军》，现抄录如下，以表回忆、沉痛悼念之情。

巍巍太行垂青史，
涛涛清漳忆风云。
十字岭上千秋立，
名将英灵万代魂！

(四) 高山盼水

我与克寒同志在一二九师师部刚住上几天，果然，敌人对太北的“扫荡”被粉碎之后，又窜来太南袭扰了。

原来，日寇侵略军对我野战总部的突然包围袭击被一举粉碎之后，敌人狂妄叫嚣的所谓“铁桶合击”、“铁壁合围”，早已成为泡影。但事后，东京日本军国主义的喉舌，报纸广播却疯狂宣传，扬言我十八集团军刘伯承部于南艾铺、十字岭全部覆灭，并焚毁我飞机场两处。日本法西斯的弥天大谎，竟成了千古笑话。

事实是：自当年6月2日，敌人向我武涉路全线展开宽大正面的游击攻势，我军从此即进入反“扫荡”的高潮。深入太北之敌，经我军民二十多天的内外夹击展开轰轰烈烈的人民游击战争，自6月4日开始撤退，至10日太北地区全告平复。最后，我军主力在林县北的东岗伏击狼狈退却之敌，这是最后又对窜犯的日寇来了个火力欢送礼，一战大捷，毙敌甚众，太北地区的反“扫荡”从此胜利结束。

太南的反“扫荡”，自6月10日开始。克寒同志我俩随师部打游击，整天爬山越岭，有时昼伏夜出，有时白天行军，晚上露天宿营，在太南林县、涉县等地区的太行山主脉大山里来回往返，迂回绕圈子，与敌周旋。

6月中旬的太行山，白天红日高照，骄阳闪闪。但早晚行军，还有点春寒料峭的味道。记得有一天拂晓，我们随师直属队行军在大山梁上，最前边有警卫部队护卫、侦察开路，在直属队前面，刘师长骑着一匹白马，他那高大魁伟的身躯，披一件草绿色的土布棉军大衣，格外显得威武雄壮。他和小平同志一前一后，率队游击。小平同志有时骑着一匹黑骡子，有时和大家一样徒步行军。他矮矮健壮的身躯，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精

神格外饱满充沛。克寒我俩在他们身边步行相随，有时也和身边的政治部同志一起行进。

在行军途中，不但有预先派出的侦察员、先遣班，到远距离外侦察敌情，随时派人回来报告。有时遇到可疑情况，我们的队伍则随时奉命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记得就在那天，当师部直属队和边区政府机关队伍在山上某地行军途中正好相遇，汇合在一起。此刻时间大概已近中午。当这条长长的既似铁练又似长城一样的队伍，正顽强地在太行山脉崇高的山岭和险峻的陡坡蜿蜒前伸，沿着无边无际的山路不断行军前进的时候，突然前边发现敌情。这时，刘师长立即下令队伍停止前进，就地休息。

等到天已正午，烈日当空，队伍中逐渐出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缺水喝。干粮袋子里的炒米炒面，虽然还有点剩余，但人人口干舌燥，吞咽不下。更令人着急不安的是，越是口渴，越是心急如焚，越是满头流汗……开初是身边带着行军小水壶的同志慷慨出来支援接济，大家也十分注意节约用水，宁可咳嗽几声，多咽几口唾沫，也不随便喝一滴水。但越熬越渴，越渴越难熬……

克寒我俩幸亏刘邓首长的警卫员，不畏艰险，爬山越岭，走好几里路跳到大山涧里，终于在山岩石头缝里找到一股小小泉水。等他俩找水回来时，刘、邓首长总是照顾我俩多喝几口，这真好比久旱逢甘雨呀！但我俩哪里好意思呢？不要说这滴滴水珠，象征着警卫战士的点点汗珠和性命，为了照顾领导同志指挥千军万马，不使他们受到干渴的折磨，我们又怎能不把这银光闪闪的水珠，看作比耀眼的珍珠还高贵不知多少倍呢……

最困难的时刻到了。天傍下午二时左右，前方远山外隐隐约约传来阵阵机枪声，这时就是带有行军水壶的同志，也不能离开队伍前去找水。大家一面听着枪声，一面望着远山。对于敌人的袭击，同志们个个心里有底，我们的警卫部队坚如山石，决不会让敌人爬上山来。大家最关心的是太阳走得太慢，日已过午，好像火热的太阳老爷有意作对，依然放出灼人的火花。大队人马口渴难熬，同志们一面时时抬头望望太阳，打心眼儿里盼望它快快日落西山，一面想起红军长征时节的爬雪山，过草地，强渡金沙江，猛过大渡河……开初还有人在说话，打比喻，讲故事，用这来互相激励、鼓舞和安慰，最后，实在口干嗓哑，舌焦唇燥，连说话也有些困难，实在心中有话，口内无声，有苦难言了。

这时，同志们深切体会到：渴比饿还痛苦，难熬啊！

这时，突然从边区政府机关队伍中传来一个有趣的故事：

原来，杨秀峰主席夫妇在行军中身边带着一个他们刚从冀南接回不久年仅三五岁的小男孩。前几年在冀南，当时这孩子刚刚呱呱落地，由于平原游击战十分艰苦，秀峰和夫人孙文淑同志就把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托付给农村一位老大娘代养，最近刚刚把孩子接上太行山来不久，就遇上敌人的残酷“扫荡”。于是，他们夫妇就抱着孩子骑着马和大队一起打起游击来。恰巧，队伍在山中被困那天，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队伍，也和师部队伍一样，找不到水喝。正在大家口渴难耐，嗓子冒烟的时候，秀峰夫妇随身带的小男孩要撒尿了，于是有人就跑到孩子跟前，用洋瓷茶缸亲手来接孩子的小便喝，用来解渴。谁知这样你接，他接，连着接了几次以后，孩子旁边的叔叔阿姨接连不断地有人来问：“孩子，是不是还要撒尿？要撒尿的话叔叔愿意来帮助照顾你。”秀峰的小男孩非常懂事，这时当有谁再来问，这孩子便噘着小嘴，慢声细语喃喃地说：“叔叔，我也渴了，你小便点叫我喝吧！”……

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来一时在全边区传为佳话。

当时克寒我俩正在刘、邓的身边，当这个故事传过来以后，刘、邓首长听了并没有笑。他们正在运筹决策呀……突然，刘师长看了看克寒和我，语重心长地说：“太行山，太行山，无怪自古以来乃是千载兵家必争之地呀！这山的功劳，确实不小啊！”

这时，小平同志同样回头望了望西面高山岭上缓缓而下的太阳，同时伸出食指来用手一指，然后掉过头来，对我俩说：“现在就是要等天黑……”当时刘、邓二位首长的话虽只有一两句，但他们那种军事家、政治家的胸怀，文韬武略，他们时时处处联系到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来思考问题，他们那种勇敢和智慧的眼光，确实使我们深受教育，永远不忘……

果然，那天黄昏之后，在刘、邓的亲自率领下，师部和边区政府的大队人马胜利地冲出重围。不几天，太南反“扫荡”经过一周的艰苦战斗，就胜利结束了。

（五）永悼英魂

太南反“扫荡”刚一胜利结束，克寒同志立即回返报社，我则到部队去采访几天。6月25日，我从太南到报社，馆址已迁移到熟峪村。这里坐落在山庄西南山脚下的一条小溪旁，村北依山，村南傍水，小溪流水，村前潺潺流过，岸边的几行绿树，早已成荫，风景比较秀美。

这时，报社同志大部已陆续回来。当时一面忙于准备报纸复刊，同时，人人时刻都在关心反“扫荡”中战友的行踪。今天这几个同志胜利归来，大家握手言欢；明天那儿

个伙伴安全回返，又是一阵欢笑。虽然这样但总是掩盖不住同志们深处的悲伤、忧愤，特别是当听到与何云同志一起打游击，一起隐蔽的同志，含泪述说他们当时亲眼所见关于何云同志在南艾铺一带遭到日寇搜山残暴袭击，不幸中弹牺牲的情景，何云同志那威武不屈，壮烈殉国，坚贞忠烈的情操，使得大家个个眼含热泪，相对无言。

在准备复刊的几天过程中，出了几期战时版，于7月1日，报纸正式复刊。同时接到北方局党报委员会的通知，任命克寒同志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杜毓运同志仍任副社长，魏克明同志和我任副总编辑。高戈同志任秘书长，原秘书长纪言同志因负伤暂时修养。

记得就在七一，党的诞生二十二周年那天晚饭后，夕阳西下，克寒同志和我在村前小溪边树林里散步，他悄声对我说：听说毛主席提出了“两年胜利的口号”，这个绝密消息，当时在我听来，真是有如春雷一般，莫大的喜讯，兴奋鼓舞之情，实难回忆。

果然，没过几天，电台即收到党中央为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明确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我们应有此信心，应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事实上，斯大林同志在1942年五一节命令中，已经明确地指出：“1942年为德国法西斯军队最后崩溃的一年。”

关于争取两年胜利，不久即在华北版刊物以及《中国人》报上进行宣传，这在当时正处在刚刚战胜日寇空前残酷的五月“扫荡”，敌后抗战正在出现空前艰难困苦的时期，起了极大地鼓舞动员军心民心的作用。后来“八一五”日寇投降的历史事实，同样足以说明，当时党中央的战略预测，何等的英明伟大！

7月8日，是报社同志最难忘的一天，最悲痛的一天，举行悼念的一天，也是大宣誓、大誓师，准备继续大进军的一天！为了准备悼念报社在五月反“扫荡”中以何云同志为首壮烈殉国的四十几名烈士，举行一次庄严隆重的追悼大会，自七一开始的大会筹备周当中，同志们在报纸刚刚复刊，工作紧张繁忙之中，都在合力抽出时间制挽联，扎花圈，写悼念诗词、文章……全体党员职工都在积极响应党支部的号召：一是悼念死者，永悼先烈；二是激励生者，全面锻炼身体，继续前进。

当时要我参加了悼念筹委会，同志们并要我到时在会上发言。追悼会场前边长桌上，庄严地陈列着几件纪念品和何云同志生前的遗物。那三年零五个月，确实像何云同志所说的那样：“一颗铅字，一粒子弹！”它完全代表着华北亿万人民抗日救国的心声！还有何云同志在三十年代国民党监狱中，为了追求真理，孜孜不倦，立志攻读马列原著而刻苦学习外文的德文、日文字典，那几件十分珍贵的文物，更足以说明，何云同志身外无他物，一心为党献忠贞！

最使我永世不忘的就是何云同志从1939年报纸创刊时起，每次遇到敌人“扫荡”，每次总是他亲自带着少数编辑、电务和工人同志编成武装小分队，荷枪实弹，打游击，坚持出战时油印报。1942年5月反“扫荡”，开初是带上轻便印刷装备，准备在打游击中，坚持出战时铅印报。他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使党的声音，在华北敌后亿万人民心中长期回响。不致中断……

当时听到在反“扫荡”中和何云同志一起隐蔽打游击的同志说，他曾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当敌人在庄子岭疯狂搜山时，躲藏在半山腰树丛中的何云同志，已被山下敌人发现，正在凶恶的敌人用枪猛烈扫射中，何云同志临危不惧，依然嘱咐在他附近的同志：“不要把子弹打光，最后留下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决不当俘虏！”这真是字字血潮，声声心音，用浩然正气，激励自己，感召同志。忠肝烈胆，光照日月！

黄君珏同志牺牲时的凛然正气，同样使我特别感动。当她和年仅17岁的小同志王健和韩医生三个女同志一起隐蔽在庄子岭上岩石间的一个山洞里，最后被窜到她们藏身的洞顶上搜山的敌人发现，这时情况说明已经无法摆脱敌人，她们就更坚强地坚持战斗。在野蛮的敌人一面开枪射击，一面喊话诱惑下，这三位女英雄从早晨一直到下午，始终坚守阵地。最后有十来个鬼子兵从侧面包抄过去，被黄君珏同志用手枪瞄准射倒了几个。鬼子用绳子捆着大捆柴草从石洞顶上面往下放火，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君珏同志猛然跑出洞口，用最后一颗子弹又消灭一个鬼子，她自己则大喊一声，痛骂敌人，然后纵身跳下万丈深渊。她的凛然正气，真是使得高山欲崩，大地欲裂，她勇敢怒骂敌人的声音，将永远回荡在太行山上！王健同志和韩医生也同样在烈火中永生……

在追悼会的墙报上，我当时写了一首痛悼何云同志的短诗：

声似洪钟笔似刀，
昼看文稿夜挥毫。①
三载游击千日尽，
一腔碧血万年潮！

华山同志当时主编墙报，他将最后一句诗，引作报头的题词，并以此为内容，画了一幅报头画：先烈们的碧血如潮涌，好似大海波涛一样奔腾澎湃，使你看去，仿佛听到那惊天动地的潮音有如晨钟轰鸣。激励当代，唤醒来人！

最后，另外附上短诗一首，作为拙作这篇回忆文章的结语，同时并献给当年华北新华日报为国捐躯的先烈同志们，也献给当年在报社辛勤笔耕，奋勇笔战，为坚持敌后新

闻阵地而流血流汗又流泪，在近些年来，已陆续离开人间的老战友、老同志们，如陈克寒、王显周、史纪言、魏克明、王春、赵树理、袁勃、华山、张戎、齐语、孙健秋、吴宏毅等同志，以及当年报社其他部门阵地，如经理、印刷、出版、电务、总务等各个岗位上的老战士，近些年来已经逝世的老同志们，以示永生的纪念！

往事堪回首，重忆太行山。
千秋争战地，八年游击圈。
清漳吐血花，风雷唤山川。
铁笔作钢枪，横眉扫敌歼。
先烈洒血开新宇，今朝四化念前贤。②

原载于《太行新闻史料汇编》

注：①“昼看文稿夜挥毫”——当年报社同志习惯称审阅修改稿件为“看稿”。

②拙作这篇回忆文章，由于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其中有些具体情节，如回忆的不准确，敬望知情的老同志、老战友们，不吝赐教来信提出更正意见感激不尽。

南沙沟之夜

张德言

也是偶遇机缘，终于实现了我多年的宿愿。那是一个仲夏之夜，清爽的晚风驱走了白昼的暑热，北京西郊南沙沟一带显得静谧清幽。

在一个整洁肃静的住宅小区里，我找到了黄葳同志的家。

开门的是一位相貌端庄而俊秀的姑娘，她热情地引我进到客厅。

宽敞的客厅里，朴素雅致。蓦地，我的目光在一张彩色照片上凝住了。这是黄葳同志最亲密的战友、爱人欧阳钦同志生前的照片。欧阳钦同志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在大连担任过市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对支援解放战争，对大连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作过不小的贡献，给大连人民留下难忘的印象。多好的同志，想不到在遭受“四人帮”迫害摧残之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惟一的爱子欧阳湘……

我不忍再往下想，只在隐隐地担心：黄葳同志能承受得了吗？

“啊，你来了！”

背后传来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这声音是那么近，又似从遥远的空间和时间传来。我猛地回头，紧紧握住她的手。激动中，我细细地端详她：除了黑发变成了银丝，那豪放的性格、利落的动作、爽朗的笑声……都没有变。虽已离别三十多年，岁月催人老，但她目光炯炯，精神矍铄，使我惊异，我的担心一下子消失了。

我们兴奋地笑着，深情地望着。

黄葳关切地问及我的情况，我说一直在做新闻工作，并告诉她，我是在今年6月6日我们的报纸——《大连日报》上看到关于她的消息的。这时，为我开门的姑娘有礼貌地端来一杯冷饮。黄葳介绍说，这是她的大女儿欧阳晓光，又指着晓光身后的姑娘说，这是二姑娘欧阳晓明。她们都出生在大连，在哈尔滨长大。两个姑娘热情可亲，我暗暗祝愿：有这两个好姑娘相伴，黄葳晚年一定会更幸福。

提到报纸刊登她姐姐戴中明逝世后向大连赠献万元的事，黄葳告诉我，她的姐姐早年当过小学教员，用她微薄的收入，供三个弟弟妹妹读了大学，并为此终生未嫁。谈到这里，欧阳晓明拿来了《大连日报》的剪报给我看，以十分尊敬的口吻对我说：“我姨一生默默无闻，然而一生都在奋斗，她活着几乎都是为了别人。‘四人帮’迫害我们全

家，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我姨冒着危险从她下放的辽宁来到我们身边……”黄葳立刻接着说：“大连是我们的第二故乡。由于姐姐在大连工作时，热爱幼儿教育事业，她去世后，我们兄妹相聚北京，决定依照姐姐生前的愿望，把她积攒的一万块钱赠献给大连幼儿教育事业。”她又讲述了戴中明许多生活小事。这些既普通又不平凡的小事，深深感染了我。戴中明以及黄葳和她亲属们的崇高思想和行为，是永远会受到大连的孩子和他们家长的尊敬的。

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30多年前。那久逝的难以忘怀的往事，竟像一群知情的鸿雁，从心底联翩飞出……

黄葳是我的革命引路人。1946年冬，在我的家乡齐齐哈尔，有一座革命的摇篮——青年学园。我们这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在寒假期间来到了这里。那时，我们如同襁褓里的婴儿，需要乳汁，渴望哺育。黄葳是党的负责人，她和许多革命老前辈一起，敲开了我们的心扉之窗，使我们在迷惘中惊醒，在彷徨中看到光明。她以质朴的作风，谦逊的态度，疏导的工作方法，很快赢得了青年们的爱戴……

黄葳也沉浸在回忆中了。她说：“那个时候哪有官儿呀！党叫我来做青年工作，我就要和你们在一起吃住，听课、讨论，唱歌，扭秧歌……如今，你们都成了骨干啦！”我们被这些耐人回味的往事，逗得大笑起来；这笑声中，又包含着多少自豪感啊！

“我1936年在清华大学入党。曾作为陕西省候补代表出席过党的‘七大’。现在的大连起重机器厂，曾是我工作过的单位。我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还是抓人材的培养，给革命，给党壮大力量……”从她兴奋的笑脸，可以看出她是多么激动，自豪！我深知，她向来不愿谈自己，或许回忆起峥嵘岁月引起她的兴奋，第一次向我谈起了她的过去。现在，她是国家劳动人事部的顾问。年已逾花甲，还在为培育人材孜孜不倦，还乐意为培育人材日夜奔波。

谈到培养人材，我不禁想到欧阳湘。欧阳湘是欧阳钦和黄葳同志惟一的男孩。1946年冬在青年学园，他和母亲住在一起，那年他六岁。他一身小八路的装束，十分讨人喜欢。一次，不知是谁画了一张扭秧歌的画，他看见了笑着质问：“为啥，没有群众呀！”小大人似的语调，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想着想着，我不由脱口说道：“湘湘真是个好孩子，我还记得他那个小模样……”

突然，我醒悟过来，心挛缩了一下。请原谅吧，我不该去触疼您，可我怎能抹去那段回忆啊！我心中正在不安，黄葳理了理头发。目光移向窗外，语调深沉地说：“湘湘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懂道理，能吃苦，肯听话……”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慢慢

走出了客厅。晓明悄悄对我说：“哥哥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平时都不愿谈起哥哥，怕妈妈伤心……”我真有些懊悔了。

黄葳拿着影集和一些纸袋走了进来，把影集递给我。这时我多少平静一些，急忙打开，一页一页贪婪地翻阅着：延安、齐齐哈尔、大连、哈尔滨、北京……一幅幅照片，记载着欧阳湘短暂一生的足迹，闪耀着他青春的光彩。

忽地，黄葳用微微颤抖的手，从一个白色的纸袋里抽出一叠照片，递到我的眼前，我定睛一看，啊！我的头轰地一下膨胀起来。这是什么？欧阳湘被反绑着双手，嘴里塞着手巾，头发被揪着……一幅“文化大革命”中惨不忍睹的情景，顿时映现在眼前。一张张照片记下了“四人帮”的血腥罪行，我强忍着眼泪，压抑着愤怒……当我抬起头，黄葳庄严得像一尊雕像。她坚毅的双眼里闪着泪花，指着照片说：“这是给湘湘平反后我坚决要来的，有人怕我受不了，我说，我顶得住！”我噙着泪，静静地听着她凄楚而庄重的倾诉。

欧阳钦同志和她对湘湘既疼爱，又严格，以他们自己模范的身教影响着幼年的湘湘，使他从小到大，始终是在好的家风中成长，也是在好的党风熏陶下，从小学上到了大学。读大学期间，每逢假期回哈尔滨，他们都安排他和省委的一些同志下乡，到基层接受锻炼和改造。1961年，他在北京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第一年，他到安徽省肥西县农村参加社教工作时，住在一个五保户老奶奶家里，他把自己的口粮领到老奶奶家，喂猪、担水、割草……什么都干。他衣着朴素，作风扎实，受到群众的爱戴。他走后，社员才知道他竟是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的儿子。谁能料到，这个年仅28岁的好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呼出真理的声音竟被活活整死？！

还能用什么话语来安慰为失去爱子而伤痛的慈母之心啊！

“湘湘是个好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尽到了责任，他在‘四人帮’的酷刑面前，威武不屈，至死没有丢掉共产党员的品德。为了真理，他牺牲了，孩子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他在大学和参加工作后节省下来的200元钱，我仍然保存着，准备把它寄给安徽省肥西县农村那位疼爱他的老奶奶，实现湘湘的遗愿……”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您这不仅仅是实现欧阳湘的遗愿，您是在继续履行老一辈革命者教育青年一代的责任，是对青年一代最殷切的期望，您——坚强的母亲，已经顶住了个人的巨大不幸和悲痛，您默默地为壮大党的力量，为四化建设培育、选拔着人材。我看出您已从这里找到了安慰、欢乐和力量，作为您的学生，这就是我惟一的盼念和愿望了。

夜幕已低垂。在依恋中告别了老师，我踏着月光在寂静的大道上走着。月光透过浓蔽的树阴洒下斑驳的光影，像是一片片碎银熠熠闪光。晚风轻拂，树叶沙沙。难忘的相见，深深的教诲，将留在我心间，永远不会泯灭……

发表于1983年8月《大连日报》

四十有感

蔡永武

孩提是梦，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神秘的：一只手是爸爸的太阳，一只手是妈妈的月亮，眼睛是老师的星星，嘴巴是万能的魔方……

三十而立。认识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知道我们曾经苦苦追求的真理和铭记的若干定律都是相对的；明白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才晓得当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相遇其实都是偶然的；读了巴尔扎克、莫泊桑和托尔斯泰，才幡然悟出时下“知道得越多人越迷茫”的观点很流行。

四十不惑。自认人生的百般滋味差不多都经历了：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天灾人祸苦辣酸甜；自觉人世的千种风情差不多都领略了：真善美假丑恶红白曲直是非忠奸。并不都是以年龄为衡量。生活中不乏五六十岁的“老顽童”，青春只是一种心态；现实中亦不乏二三十岁的“小老头”，年龄只是一种表象。动辄在人前炫耀自己年龄还小的人是浅薄；动辄在人前表白自己年长的人是迂腐；而不愿随便将自己的真实年龄示人的人，最不成熟的也觉得比上述两种人强。年龄不是判定成熟与否的惟一标准。于是便每每作天真状：如果这世界能少一些违心的理智和幼稚的情感，少一些关于文凭关于房子关于钱等等总想整明白却总也整不明白的话题，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爱心多一些付出多一些奉献且每个人都能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个世界是不是将更加充满真诚与魅力？如此，充塞于胸的是否便少了些许岁月蹉跎光阴不再的遗憾？

于是便痴迷于一种心灵的揭示——用一个个方块字重新组合绚丽的人生。但无论是昂首高歌表现出来壮怀激烈的阳刚之美，抑或是娓娓道来不失谦谦君子的阴柔之辞，都无法摆脱存在与意识相互牵制的羁绊。

“今后只有两种人才会选择文学与创作——傻子与天才。”不知谁说的。可我偏偏既不是傻子，又不是天才。难免竟不知该持何种心态：欣喜还是悲哀？因为麻木的心灵是永远不会产生艺术的。一如诗人若不能时时被生活的激情所点燃，就无法吟唱出令人怦怦心跳的恐惧；渴望在一次次经验中成熟，又担心因成熟而失去那份纯真。便想：吕端、郑燮，愚耶？智耶？又怎一个“惑”字了得！

流年似水。当走完了人生第四十个驿站，便不再相信命运和那个冥冥之中且百思不得其解的劳什子。自认人生就是无数次偶然与必然有差别的相互交错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足够的应付各种变故的心理承受能力，就算正常的人生了；假如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不放过一丝机会不放弃一切希望，就算是优秀的人生了；倘若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把握每一次机会的偶然与必然，则无疑是杰出的人生了。

等待偶然、善待偶然、创造偶然和把握偶然是一种素质，是一种生命的感悟。但杰出与我无缘。所以不会企望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大彻大悟，做人如是，做文亦然。不相信天才，也从不苦苦寻觅灵感，自信勤奋和才能是打开成功之门的惟一的钥匙。

因为每个人面临的环境、条件、机会都不尽相同；每个人所具有的才智、能力、水平大相径庭，幸福和成功之神则注定不会公平垂青于每一个人。

明志是一种追求。

淡泊是一种境界。

追求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目标是否能够达到，而在于为达到目标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苦苦求索的过程。这过程是绝然不能缺少一种淡泊的心境，否则心理就会不平衡，就会急功近利，就会功亏一篑。

孤独是一种风景。

寂寞是一种本份。

难怪夫子曰：四十五十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想想也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无穷的未知世界。

也常常想起王朔那句“身不由己做人的尴尬和不做人的不可能”的话。

于是安然。四十有感。

将门虎子

——访冯玉祥之子冯洪达

张德言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盛名传妇孺，雄略震非欧”郭沫若语 的著名将领。他戎马一生，爱国爱民，有许多事迹至今在国内广为流传，受人敬佩。人们对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也不陌生。这位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动家，曾担任过新中国的卫生部长。如今他们都是过世之人了，而后代都很争气。他们夫妇共有三个子女，两个女儿在北京，最小的儿子冯洪达现在大连海军水面舰艇学院任副院长，是一位军级领导干部。笔者早就听说这位无论是相貌身材，还是声音，都酷似父亲的“冯二世”，性情豁达，治军严明，深受部属爱戴。于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访了他。

傍着美丽的老虎滩海滨，在海军水面舰艇学院内，一座不大的日式平房掩映在绿树浓荫中。进到朴素雅致的小小客厅，在寒暄中，我才仔细打量起男女主人公。冯洪达，高大魁梧，肩阔背厚，一字浓眉下，扑闪着明亮亮的眼睛，一股威武式的典型的军人气魄！夫人余华心，身材颀长，仪态端庄，文文静静，一看便知是个有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我端详着他们，对冯洪达说：“听说你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他笑道：“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一部关于我父亲的影片，父亲的老部下里有人建议让我来扮演父亲的角色……”我觉得真合适，不等他说完，就插话说：“那就不用化妆了。”他风趣地说：“可惜我没有艺术细胞，不是这个材料！”说得我们三人都大笑起来。

在这个只有夫妇俩的小家庭里，最近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他们的儿子冯丹宁，一个有九年军龄的海军干部，去年从舰艇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舰上当见习航海长，由于工作出色，被破格提前半年定级，担任了副航海长。“你们这是三代军人之家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地说。冯洪达伸出四个指头说：“四代了！我祖父就是军人，在清朝军队里，当个小连长。”说起他们的女儿冯丹龙，余华心更是高兴了。女儿从山东大学外语系刚刚毕业，就被中美合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录取为外语教师。“你们这两个孩子真争气。”听了我的话，冯洪达说：“他们算是赶上了好时候了。”“也真不容易啊！”余华心接过来说：“孩子们从小生活在十年动乱中，没有学过多少知识，以后女孩当工人，男孩当兵，一干就是五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

大家才又重看到希望。孩子们利用业余时间拼命自学，女孩攻了三次，儿子攻了两次，才如愿以偿上了大学。”

“祝贺你们双喜临门！”我由衷地说。

“还有一喜，请到这屋来看看。”冯洪达站起来把我领进卧室，指着镶在木镜框里的两幅水粉画说：“这是华心小的时候，我父亲给她母女俩画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去年在中央有关领导的亲自过问下，经过多方查找，终于在今年五月份归还了。这是我们家的无价之宝啊！”我细看两幅画上的题词，都是关于抗日必胜的誓言，不由想到冯玉祥将军遇难牺牲后，在他的周年忌日和骨灰安放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两次亲笔题词，充分表达了领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敬重和高度评价。中央人民政府为冯玉祥在泰山脚下修了一座陵墓，他当年的刻石遗墨均保存得完整无缺，1984年还在那里建起了“冯玉祥纪念馆”，永远缅怀这位和共产党合作的爱国民主战士。冯洪达深情地回忆说：“我小时候，曾跟随父亲走遍四川北部二十几个县，当时父亲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以慰劳抗日将领和充裕国库、建军建国为旨，奔走呼号，广泛发动献金救国运动。前几年，我和华心重返四川，沿着父亲的足迹走了七八个县市，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欢迎。在都江堰、合江、三峡一带，父亲题字的石刻已成了旅游一景。合江有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父亲来时他给做过饭，这次听说我们来，不顾年高，亲自给我俩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尤其是1982年9月26日，在北京纪念冯玉祥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俩和其他几位亲属时说，冯玉祥先生是位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的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好朋友。这些话，对冯玉祥的后人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冯洪达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在客厅墙上挂着原海军大将萧劲光赠他的题字“雷厉风行，为国争光”，这大概不仅是对他的期望和鼓励，也是对他的赞许和信赖。冯洪达自幼就受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立志从军报国。1953年，他从苏联海军学校毕业回国后，参加了人民海军，他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海军高级指挥人员、实干家，航海界的知名人士。三十二个春秋，他为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自从到学院任副院长两年来，他为改善教职员工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日夜操劳，成绩卓著。大家说：“我们这里非有这样一个人才行。”在他的倡导下，学院建起了旱冰场、网球场、棒球场，大面积铺设草坪，绿化环境，近期又落成了大连市最大的一座玻璃花房。学院的生活正在日益丰富多彩。

谈到工作，冯洪达非常谦虚，但谈到为海军争光的事，他却津津有味。他拿出一张大彩色照片，这是去年在首都北京国庆节当天海军干部方队通过天安门时的情景。这个方队就是他指挥领导的，在国庆阅兵式上，以威武雄壮、整齐划一的步伐，走出了公认的最佳成绩，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

我知道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一生崇尚简朴，冯玉祥以过平民生活而被人称为“布衣将军”，这个家风直到如今仍能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找到。这四间不大的房间，陈设简单，一目了然，床上叠放着蓝布面的军用被，俨然军旅生活。冯洪达虽然已经五十出头，身居高位，但洗衣服、刷碗筷，凡是出力的事他都干，是家里出色的劳动力！他们的两个孩子不在身边，也像当年李德全让洪达远离自己去基层锻炼一样，两个孩子都早早独立生活，不在父母身边养尊处优。

冯洪达工作之余，喜欢读小说，而辛勤经营院里的小花圃，自有一番乐趣。余华心是大连远洋运输公司航海学会的秘书，工作之余多是埋头写作或整理冯玉祥将军的历史资料。她是位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学修养的人。前几年，她和爱人合作由她执笔写了回忆冯将军在美国生活和斗争的《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从发行量之大可以看出，冯玉祥在中国人民大众中的影响至今不衰。余华心写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材料充实，文字生动，在《大连日报》连载两个月，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近年来，她发表的有关冯玉祥的文章已有四十余万字。

冯洪达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父亲的高度评价和纪念。他说，父亲一生都寄希望于中国能在改革中日臻强盛。现在，改革之风已在中华大地遍地吹拂，前人今人的理想付诸实现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相信，在他们这一代里，祖国一定会被建设得繁荣昌盛，无愧于祖先，无愧于后人。

发表于1985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

红豆生南国

张琳

小时候就会背一首王维的五言绝句：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劝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这首明白如话而又意境高远的唐诗，寄托了多少人类美好的感情啊！年纪越长，越觉得它内涵深邃，韵味无穷。然而红豆，这个又名“相思子”的美丽的豆儿，到底什么样儿呢？生长在北国的我，总也想像不出具体的模样。这次要去生红豆的南国了，能否一睹芳容，甚至带几颗回来，一边吟诗一边把玩？我私下里暗自祷告，但是好像听说那红豆纯系野生，茫茫大地，上哪儿找去？只能碰碰运气了。好在同行的S君是见过红豆的，只是它长在什么树上，怎么结的，不甚了了。更加上我们一路主要跑的是城市，事情好像很难有什么指望。

11月底，我们来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榆林港海军基地招待所“大东海”。这是一座花园般的宾馆，靠山临海。院内一片热带植物，除了高耸入云的椰子树外，还有许多北方根本看不到的奇花异草。夜幕降临，蛙声、虫声阵阵入耳。好一派夏天景象！更有那可以游泳的温暖的海水，使我们三个刚刚穿着棉衣，冒着雪花从大连上飞机的北方佬乐不可支了，寻找红豆的事竟然撂到了脖子后边。

这一天晚饭后，我们三人在院内散步，忽然变戏法似的，S君从地下拾起一个东西，惊喜地喊：“红豆！”

我俩急忙靠过去看。啊！果然一颗红澄澄、亮晶晶、黄豆大小的椭圆形的豆子托在他的掌心。再细看，尾部还有一块漆黑的斑点，像瞪着的黑眼珠，想不到植物竟能生出红玉般的宝石！太美了！

但是奇怪，这附近除了高高的椰子树，再也没有别的植物，红豆是哪里来的呢？是风刮来的，抑或人们失落的？不管怎样，这是一个信息：“大东海”有红豆。于是我们打听了招待所的服务员，她竟毫不打艮儿地告诉我们，海边那座小山包的丛林里就有，须得细心找寻。木本藤蔓，羽状叶片，宽豆荚。大约见我们一副急渴渴的模样，特意嘱咐一句：“草里有蛇，可要小心！”然而我们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宝地，哪还管得了许多。于是在临走的前一天，花了一个上午向海边小山包的丛林进发，我们兵分两路，Y君从山前，我与S君绕山后。结果不久便发现那一串串攀附在灌木林上的羽状叶片，宽宽的豆荚。忙剥开一看，果是红豆，也来不及细看，忙喊Y君快来，哪知他回答：“这里更多！”

于是我们也顾不得草里有蛇了，也顾不得荆棘刺手刮衣了，更不在乎大汗淋漓，湿胸浹背了，只知道争先恐后大干一场。不是“劝君多采撷”么，哈，多多益善。不大会儿的工夫黄褐色成熟的豆荚采完了。剩下一些绿色的怎么办？我按照下放农村时的经验说：“豆荚只要鼓到数了，绿点无妨，摘！”结果，那些豆粒已硬，豆色嫌淡的荚子也被我们摘了下来。后来查书才晓得，这红豆成熟期在冬季，这时候“小雪”刚过，还不是十足的冬天，倘若再过个十天半月，恐怕全树的豆荚皆熟，定会大获全收了。

为了使粉红的豆粒在荚中继续成熟，我们把它们用纸小心包起，在归来的路上，每到一处必拿出通风阴晒，惟恐太阳晒死，整整侍弄了一个月后回到大连。剥开豆荚一看，竟然全都变得猩红猩红，与那些成熟的红豆毫无二致。

红豆，红豆！多么富有诗意的小精灵！我把它分赠给爱好文学的亲朋好友，无不报以欣喜的微笑，一位朋友还曾建议：这样美的东西，为什么不做成工艺品、装饰品、旅游纪念品出售？想想也是。如果在南方把红豆人工栽培繁殖起来，用透明的塑料镶裹着做成耳坠、戒指、发卡，或者再加上书法家写的红豆诗一起做成钥匙坠、镇纸、小摆饰等等，一方面给人增添了美，一方面又传播了高雅的文化，一定会受人欢迎的吧。

旅顺口的山

王世昌 赵锡顺

在山的家族中，老铁山，你平凡又平凡。然而你也是山的骄傲，山的中坚：有战士的铮铮风骨，耿耿肝胆，和战士并肩耸立，镇守边关！

你——钢铁铸成的防线，在你的脚下，逆流湍急，惊涛扑岸，在你的身后，是五彩斑斓的山家族：泰山、庐山、万寿山……

黄金山，你的倩影，像你的名字一样璀璨：一座珍珠般闪光的信号台，日日夜夜召唤着征帆……

战舰启航，你灯语闪闪，给了水兵比黄金还要宝贵的胜利信念，战舰归来，你旗语飞扬，给了水兵比黄金还要宝贵的母亲的温暖。水兵啊，怎能不用黄金般的青春守卫你这黄金的山！

朝霞中，白玉山，你婷婷玉立，似春翠欲滴的水仙；晨雾中，你婀娜多姿，似青春焕发的舞伴。

你为何不去都市的名园，却站在这边陲的海边？你颌首指指山下，那里有绿阴一片：万余不屈的忠魂，在那里含恨长眠。怪不得每当山雨欲来，你满山的松涛就发出高亢的呐喊！

啊——

旅顺的山，起伏连绵，波涛和着你们的舞姿，战舰偎在你们胸前。

啊——

旅顺的山，威武壮观，多少候鸟到此相聚，多少游人流连忘返。旅顺的山啊，你是祖国的一束鲜花，永远盛开在人们心间。

1989年10月

悠悠琴思

杜 敏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音乐。常倚着门框听父亲拉二胡。那缠着丝弦的二胡，他拉得有滋有味儿。拉“京调”，拉“梅花三弄”，常常摇着脑袋，沉醉良久，高兴时，母亲也矜持地随声哼上几句。我觉得歌儿真好听，曲儿真美，会拉琴真棒。

十岁那年的国庆节，父亲带我去看一场演出，我一下子就被小提琴绝无伦比的美妙声音迷住了。“我要学它。”我指着那琴，扭过头望着父亲。父亲是万分疼爱我的。但，此时，他只是看着我，并没有回答。

一个多月过去，我已把这事淡忘了。

新年前夕，父亲兴致勃勃地捧回了送给我的礼物，说是他特地邀了一位音乐界朋友，刚刚在商场为我选购的。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嗨！一把金红色的小提琴。漂亮的琴身光洁如镜，乌黑笔直的弓杆绷紧了雪白雪白的马尾，黝黑的琴盒宛如一尊辉煌的宝匣。我知道，十八元五角钱，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我们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知道，父母亲并不奢望我成个出色的小提琴手，仍希望我能好好读书，出息成全家第一个大学生。

锯木头般“吱吱嘎嘎”地拉着，居然也能拉出调调来。不久，我参加了市红领巾歌舞团，常为国内外朋友演出。

后来，父亲为我珍藏着一份精美的节目单，那上面还印着我小小的名字呐。

我记得他曾笑眯眯地对我说：“能坚持练下来吗？有志气的话，二十年后，我再听听你的琴。”他温柔宽厚的手掌在我的头顶摩挲着。我很幸福，很自信，冲着他骄傲地笑了。

迷人的小提琴哟，至高无上的弦乐之王。世上最神圣最庄重最深沉最震撼人心的乐器莫过于你，世上最动听最甜美最悦耳最富于情感的声音莫过于你……

四根银亮的琴弦架起通向音乐圣殿的桥梁，一把飞舞的琴弓激起回肠荡气的联想；乌黑泛光的指板上，跳跃着灵巧欢快的手指，小夜曲、奏鸣曲、独奏曲，协奏曲……牵着魂，撼着魄，扯着心，系着情，令多少历尽沧桑之士为你震颤，使多少超凡脱俗之人为你陶醉！

悠悠琴声中，我弹拨着稚童的心弦，谱写着我自己的歌，编织着二十年后能为父亲专场演奏的玫瑰色的梦……

然而，梦，毕竟是梦。

我的梦，像一团五光十色的肥皂泡，还没升到空中就坠落了，就破碎了。因为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升腾起一场更大的噩梦。在梦中，我们不再去学校，不再读书了，在梦中，我们不再练基本功，不再排合奏。小伙伴们一起参加了戴红袖章的文艺宣传队，蹦蹦跳跳在街头；在梦中，我看到我所敬重的父亲的名字，被红笔划上道道，贴到市中心的大墙上，在这场混混沌沌的噩梦中，我不幸永远永远地失去了融融的父爱，再也不能亲昵地呼唤他：“爸爸！”

噩耗传来，肝胆欲裂，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在濛濛细雨中，惶惶地奔回家里。凄惨的家中，昏暗静寂。没有任何生灵般的静寂。

一切都和原来一样，独独少了父亲。四岁的小弟还不懂事，正缠着妈妈“要爸爸”，我强忍泪水引他到一边儿玩，自己却再也忍不住，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

爸爸不应该“走”，他还很年轻，他仅仅活了四十一岁。

“有志气吗？二十年后，我再听听你的琴。”分明是父亲正在对我说，声音还是那么洪亮，语气还是那么温柔，神志还是那么慈祥……

恍惚如在雾中，似在梦里。哽哽呜咽中，我看到挂在墙上蒙一层灰尘的二胡，涌流的泪水中，我看到父亲正凝神地望着我——他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我们，他还没看到我们长大，没听到我拉的琴。我猛然意识到，系他一腔深情的我，还未专门为他拉过一曲。这醒悟，顿时使我懊悔万分，这懊悔铸成的遗憾，从那天起就缠绕着我，伴随着我……。

颤抖着，在琴码上夹好父亲为我制做的小小弱音器，我捧起了心爱的小提琴。

幽暗的灯光下，苍白冰冷的手指在漆黑的指板上颤栗着，细亮的金属弦发出的声音比牛筋弦还沉闷。没有曲名，没有调式，没有旋律，只有泪水裹着欲裂的音符，溢满眼眶，滚落在腮下的琴身上，一滴一弦，一滴一声……

任那悲怆的音乐从我淌着血的心中萌生，从我涌着泪的血管流过。

苦涩的小提琴啊，从那一刻起，我长大了。我知道了，音乐并不都是甜蜜的；我懂得了，悲哀比欢愉更深刻，更伟大。

我没出息成大学生，倒真的当了小提琴手。命运之舟载着我，驶入这博大幽邃奥秘渊深的艺术之洋。

二十多年来，我与这四根弦厮磨着，掏出了一颗心，抛洒着晶莹的汗。我沉浸于《圣母颂》的庄严、《梁祝》的纯情，激情于拉罗的奔放、帕格尼尼的华丽；震颤于贝多芬的深沉凝重，痴迷于柴可夫斯基的酣畅淋漓……

悠悠琴声中，一页页的谱纸翻过去，一年年的岁月度过去，魔一样的小提琴哪，蕴着父亲的舐犊之情，始终伴着我，伴着我。

每练好一首乐曲，我多么希冀父亲能亲耳听一听；每参加一场演出，我多么企盼父亲能在观众席上坐一坐；我使用过好几把小提琴，有中国的，有日本的，也有德国的，那琴身都有纹理极好的虎皮花纹，那琴声有极强的穿透力，极美妙的共鸣。我多么希望能用这每一把琴专门为父亲演奏……只有他，才能听得懂这琴这曲，听得懂这苦苦的思念凝成的旋律，只有他，才能领悟出这情这音，体味出这不尽的遗憾织成的乐章，掂得出这沉甸甸的分量，晓得这绵绵女儿心。

我还算“有志气”，但，父亲却没能听到这琴声。

二十年过去了，我也有了女儿，女儿也有了她自己的琴——一架乌黑铮亮的钢琴，那是我们积攒了八年的全部储蓄。当黑白相间的琴键被敲响，第一首练习曲从那胖胖的稚嫩的小手中流泻出来，弥漫着小小居室时，家中充满着甜蜜、幸福、温馨。

我想起了二胡，想起了小提琴，便凝神地看着女儿晶亮晶亮的眼睛。我对她说：“好好弹吧。二十年后，我再听听你的琴。”

女儿怔怔地望着我。她才五岁。她尚不晓得琴的珍贵，她还不懂父母心。更不晓得她的妈妈曾经历过一场噩梦。

我们依然不希望她成为一名乐手，仍殷殷地望她将来能好好读书。

她会有出息的。她不应该重复我。

“叮咚”“叮咚”……我非常喜欢夕阳西下时，坐在沙发上听女儿练琴。我憧憬着二十年后，她更加娴熟的技艺、更加绚丽激情的琴声；我向往着自己度过好几个“二十年后”而老态龙钟的时候，依然能够看到女儿的演奏，能够听到那梦萦魂绕的悠悠琴声。

会如愿以偿的吧！

我真的这样想。

悉尼情

田 樱

悉尼美，悉尼的大铁桥和悉尼歌剧院美名传天下，然而我和悉尼朋友之间的友谊之情更美。

我刚从澳大利亚返连，一路风尘，一往深情，我的感情始终沉浸在友谊的海洋里，下意识地走到玻璃橱前，耀眼纸上的《赴澳日记》呈现在眼前，日记里夹着一片郁金香花叶，看见这一片花叶，我的脑海里立刻闪出个人影来。

那是我刚到悉尼的当天，住在一家意大利式的宾馆，忽然一阵铃声响过，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飘过，接着是一句熟悉的中国话：“您好！”我的一位同事介绍说：“这是赛米尔先生，悉尼市澳中友协主席。”赛米尔约摸40多岁，高高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蔼的面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畅谈了过去的友好合作，贸易往来。他高兴地谈到他在经营大理石加工业务，并希望从中国进口花岗岩、大理石荒料和硅灰石，他还表示愿向我们介绍更多的朋友，输入更多的中国商品。真是一见如故，短促的会见，合作是诚心的，感情是真摯的。赛米尔火一样燃烧着的感情在奔涌，幽默的话语给人留下快意。他深情地说：“我真高兴在悉尼见到你们，我要给我的妻子和朋友打电话，欢迎您们到我家作客。”看到他那热切的样子，我们盛情难却，只好欣然前往。他说他的家就在悉尼大铁桥和悉尼歌剧院旁，现在正是郁金香花盛开的季节，欢迎中国朋友欢聚赏花。

悉尼的夜美极了。轿车驶向悉尼大铁桥，大铁桥雄伟壮观，宛如一条玉带腾空而起，桥下便是被称为“悉尼湖”的内海港。桥的四周，山如围屏，红砖红瓦的建筑物，层层叠叠，衬着暗绿色的桉树、榕树、棕树、芭蕉树，密密浓浓。桥旁，举目远望，闻名于世的悉尼歌剧院雄伟壮观，五光十色的灯光相映交辉，悦耳的乐声仿佛回荡在耳边。

轿车驶过铁桥，停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坪环抱的一幢别致的房前，赛米尔的爽朗笑声又回荡起来，出来迎接我们的还有赛米尔的好友和他的小儿子。赛米尔的房间宽敞豁亮，热情的主人向客人介绍了他的妻子和朋友，顿时房间里充满了友谊和欢乐的气氛。赛米尔指着桌上的一瓶鲜花说：“这是郁金香花，我的院子里栽满了这种花，每当朋友

来访，我的妻子便在花瓶里插上这种花。”欢乐的晚宴开始了，赛米尔的妻子用丰盛的中国饭菜招待我们。席间，彼此交谈了友谊，交谈了爱好，交谈了业务，赛米尔幽默的话语，爽朗的笑声充满席间。我即席赋诗赠友人，

悉尼友人，
一见情深。
郁金香美，
光照乾坤。
宾客同饮，
友谊长存。

夜深了，桌子上那花瓶里郁金香的芳香，朋友间的亲切话语，交织在一起。欢乐的晚宴结束了，赛米尔兴致勃勃地约我们到他的院子里观赏。院落秀丽，花草繁茂，其间一座游泳池坐落在鲜花丛中，细细端详正是赛米尔妻子插在花瓶里的那种花，啊，原来也是郁金香，芳香醇厚，醉人心脾。赛米尔顺手摘下一片叶子送到我手中，并富有诗意地说：“欢迎你再来，郁金香会把你吸引来的。”这时，我顺口吟了一句诗话：“请客客不到，花香吸人来。”赛米尔兴高采烈地说：“O K。我希望澳中友谊像郁金香一样，常开不败，吸引中国朋友常来悉尼。”为了永久的纪念，我用笔记本把这片郁金香花叶夹在本子里。

海角天涯，转瞬快一年了，因为工作忙，彼此再没通信。不久前，我们公司驻澳大利亚的业务代表郭先生回大连，捎来一个块茎，告诉我：“这是赛米尔先生送你的郁金香块茎，并让我转告你欢迎你再去悉尼。”一枚块茎，一片心意，我把块茎拿到家里精心地栽在花盆里……

每当我走到书橱前，打开《赴澳日记》，看到珍存的郁金香花叶，仿佛那芳香醇厚，醉人心脾的郁金香又呈现在眼前，赛米尔那幽默的言语，爽朗的笑声又回荡在心田。啊，郁金香花，友谊的花，常引起我情思切切。

初到法国印象记

李勤明

去年11月28日十八时，随大连京剧团乘中国民航班机赴法国，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演出。29日当地时间八点（北京时间为十五点）抵法国戴高乐机场，踏上了法国大地。从此，作为第一次到法国的陌生人，以特有的敏感和好奇的心情，按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认识这个西方大国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社会风貌。

西方的太阳好像比东方出来的晚，八点就像我们六点的时辰，天灰蒙蒙的，在飞机上隐约可见埃菲尔铁塔，“巴黎到了！”大家不约而同喊了一句。下了飞机，见地面结着薄薄一层冰，前来迎接我们的拉圭尔夫人说：“今天气温下降，到摄氏零度。飞机差一点转到别的机场降落。”她看我们穿的比较单薄，嘱咐要防止感冒，按理出远门应多加衣服，但根据以前到过法国演出的杂技团同志介绍，法国冬季气候温和，多雨，无需多带衣服。四个月的生活证明，杂技团同志们说的是对的。近几年来法国冬季平均气温不断升高。在前两个月，我们几乎看不到太阳，小雨淅淅沥沥，好像中国的黄梅雨季节。据报纸报道，西部地区的果农、菜农，连连叫苦，果树提前开花，蔬菜提前发芽，万一春寒度不过，全年的收成就要报废。春节前后，从多佛尔海峡布勒斯特市登陆的暴风雨袭击了法国大陆，给这个现代化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电视屏幕经常出现灾区镜头，死亡三十多人，民房，树林成片被摧毁，连从不停电的剧场也因暴风雨的影响而停电。巴黎一座火车站被暴风吹翻了房盖。一位妇女走在塞纳河的桥上被暴风吹到河里溺水而死。一些城市暴发了山洪，市内水流成河。许多人无家可归。法国政府和一些慈善机构为救济灾民花了不少代价。由于气温升高的影响，做冬季滑雪运动的人大量减少，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场减少，卖滑雪运动用品的商店无人问津，老板连连叫苦，今年生意亏了本。

历史的风暴推动了法国社会的演变。法国无产阶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拉雪兹神甫大公墓内，我们瞻仰了巴黎公社社员墙。那是一面一人多高的极普通的石墙，也是拉雪兹神甫公墓北部的围墙。法共中央献的花圈，一年四季挂在墙上，好像向人们诉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的悲惨遭遇，使人们心情难以平静。巴黎公社的失败，马克思已作了科学论述。

巴黎公社的原则指导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法国资产阶级也可谓波澜壮阔，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几经较量，经过无数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建立了五届法兰西共和国，现今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如果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武装起义算起，1792年建立了第一共和国，那么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已经经历了整整二百年的历史。象征着封建贵族统治的巴士底狱被起义的人民摧毁夷为平地，今天已成为巴黎西北部重要广场，1989年7月14日为法国二百周年国庆，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因为拍摄欢度国庆场面，法国电视一台和电视五台打了一场官司。原因是当时官方只准许电视一台拍摄，不准其他电视台拍摄；而电视五台却不管那些限制，拍摄了全过程，并在电视五台播放。直至今年初，因为对庆祝国庆场面的拍摄法律规定新闻机构都有权拍摄和报道，但电视五台要向电视一台赔点款，以此结案。看来，法国的新闻自由也要依靠法律来保证，自由与法律也是对立的统一。

由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10月创建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没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4年1月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大连京剧团曾于去年12月到戴高乐的故乡里尔市演出两周，受到当地法中友协和市民的热烈欢迎。法社会党书记、里尔市市长莫洛瓦携全家观看了京剧演出，并会见了全体演员。为缅怀抗击法西斯的英雄和杰出政治家戴高乐，里尔市建立了戴高乐纪念馆，陈列了戴高乐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用品。1989年正是戴高乐将军诞生一百周年，由巴黎市市长希拉克发起，戴派组织了戴高乐诞生百周年纪念会活动，搞得很热闹。他们办展览，出书刊画册，发行纪念邮票，等等，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戴高乐热。当然，希拉克作为政府首脑掀起纪念戴高乐活动，远非只有纪念意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标榜的口号是卢梭哲学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面积为五十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为五千三百万，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被百分之三十的人所占有的国家里，如何实现这个口号呢？我们在巴黎附近的一座卫星城马恩拉瓦来市演出，据剧场经理介绍，这座城市曾是一个极富有的家庭财富，当地居民都是这个家族的雇工，现在他们的子孙虽然把财产卖掉，但仍然是法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他们拥有着法国最漂亮的古城堡别墅。在鲁昂剧场工作的一位老工人，见到我们到该市演出，表现出诚挚的热情，当我们转到下个城市演出时，他特意寄给每位演员一束鲜花，以表示良好的祝愿。据他讲，儿子在中国大连一所大学工作，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说，法国现在没有人情可谈，生活非常苦闷，想迁居到别的国家居住。一位随同我团工作的工人讲，法国人只讲钱，不讲人情，人与人之间只是金钱关系，生活很冷寞。人情没有

了，要钱有什么用？说着便拿出打火机要把面值500法郎（合人民币420元）的钞票烧掉，经大家劝说才把打火机收起。

有的说，法国资产阶级专政从开始那一天，就是中央集权制。从法国整个建筑布局来看，确实如此。巴黎市现今一千多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全市有六个火车站，从一地到另一地乘火车，非经巴黎不可。如从北部城市到东部城市没有直线可通，只能绕道巴黎。巴黎是法国的象征，是法国的代名词，是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交通的中心。近几年来，法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较高，再加上法国移民较多，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有的议员提出要修改移民法，对非法移民严加惩处，严格限制合法移民，以保护法国本民族利益。市场物价上涨，引起百姓不满，时有学生和职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法政府拟采取稳定物价的方式来缓和矛盾，但这样又刺激不了生产发展。据介绍，法国四个造船厂已关闭了三个，许多工厂生产不景气。工人的工资每月约八千到一万法郎，但房租就要支出工资的三分之一，再养活一台汽车也需要三至四千法郎，扣除个人所得税，所剩不多了。市场上的大虾二百多法郎一公斤，连小菠菜也要十五六个法郎一公斤，所以海鲜及高档商品普通市民不敢问津，周末购物只好跑到郊区的大超级商场捡便宜货购买。年轻夫妇带着婴儿在街上要小钱，向过路人讨要钱物的乞丐，我们碰到的不少。奇怪的是在巴黎香榭丽大街当乞丐也要向管理部门交费，否则不准在这条所谓汇集世界各民族的大街上要饭。在布勒斯特市，我们进一鱼具商店购买鱼杆，一看都是日本、南朝鲜和台湾货，我们问老板：“为什么法国不出这种产品？”老板玩世不恭地说：“法国还能生产什么？将来我们要与日本结合生产孩子了。”

作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里电子计算机应用得非常广泛，这可能是生产力较高的标志之一。法国人民的文化素养较高，尽管有的报纸报道法国还有为数不少的青年文盲，许多地方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京剧，然而观众们却表现出相当高的欣赏水平。法国朋友说：“对于表演艺术不在于能否听懂唱词，我们的歌剧有些唱词也听不懂，但只要表演美，服装美，造型美，舞台设计美，观众就欢迎。”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演出结束谢幕时，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就可以看到观众对中国京剧的欢迎程度。如果说法国观众喜欢抽象的表演艺术的话，那么中国京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抽象艺术，是表演艺术的典范。许多观众和旅馆、餐厅的服务人员对中国艺术家的作风严谨，演出认真，遵守纪律表示由衷的敬佩。他们说：“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艺术家是最朴实的。”在离开尚贝里市依毕斯旅馆时，服务员跑到楼上平台挥手送行，流下了惜别的热泪，许多法国朋友赞美中国，赞美十多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秩序的生活。他们

希望通过文化交流增强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贡佛郎市国际民间艺术节主席古热萨尔先生在招待宴会上讲：“艺术家应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世界和平和进步作出贡献！”

1990年

我的蒙族额吉

武冬梅

又是一年秋风至，粗犷的北方又将采撷来一个丰收的金秋。那与太阳接壤的地方是一片墨绿，一片湛蓝；那绿是大海一样广袤的草原，那蓝是草原一样辽阔的大海。洁白的蒙古包前，缀满红珍珠般山丁子果的绿树下，是否还会闪过您那胖胖的身影，是否还会响起您那朗朗的笑声？哦，久违了，我的蒙族额吉！岁月流进时间的海底，记忆却留在永恒的海面上，就像那粼粼的绿浪，流连在这秋的背景。

三十年前，当我来到西拉沐沦河畔的贡格尔草原时，也是这样一个金秋时节，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我第一次见到了额吉。像脚下这片黑土地一样，额吉的脸是黝黑色的，两根斑白的辫子垂在胸前，是典型的蒙族妇女打扮。额吉身着中式本色粗纹短衫，黑色的裤子，很是洁净，手里还捧着一束红彤彤的山里红。在众多的蒙族牧民中，有好一会儿，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额吉，额吉也在看着我，她眯着眼睛瞅我，目光柔柔的，仿佛是从妈妈眼里放射出来的光。

那时，刚刚离开家庭走向社会的我，想家的感觉十分强烈。而额吉便成为我想家时情感寄托的对象，一有时间就往额吉家里跑。额吉与我妈妈同庚，属狗。也和妈妈一样有两片薄薄的唇和周正的鼻子，也都一样的为人热情和直爽。不同的是额吉过早地衰老了，细细的鱼尾纹从她的两只眼角扇开，一直穿过她的面颊。额吉一生中共生育过七个孩子，却只活下来五个儿女。除大女儿已出嫁外，其余几个孩子还都在念书。那个年代，国家正处于初级阶段，国家的经济形势严峻，牧民生活水平较低，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不得靠劳动来挣啊，缺少劳力的额吉家日子过得很艰难。

即使是这样，额吉以她草原一样广阔的情怀，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着我们这些来自大连的知青，并常常为我们十几岁便离开家，离开父母而流泪。但在额吉心中，最疼爱的人还是我。

插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到了，青年点每人都分了月饼。捧着月饼，不知怎的，眼泪不听话地滚落下来。正在这时，额吉的女儿来了，抓住我的手就往她家拽。来到家里，额吉正坐在炕上包饺子。额吉亲切地看着我，用不很熟练的汉话对我说：“过节了，饺子的吃。”只见额吉的面前放着一个陶瓷盆，里面装着拌好的肉馅，沾满了白面的手上

拿着一块小面团，手指沿面团拿捏，不一会儿小面团就变成了碗状，放上肉馅，面皮一合，一个活生生的，胖胖的饺子便做好了。额吉包饺子的方式与我们汉族包饺子方法不太一样，纯属游牧民族特有的包饺子方式。为此，我还曾专门进行了一番研究。发现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和风俗与他们从事的畜牧业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游牧民族要经常更换草场，人畜迁移过程中路途遥远，一切以简便为宜。额吉这种独特的包饺子方法就是由他们创造出来的，既不用擀面杖，也不需要面板，只用手就全解决了，而且不易破肚，又劲道。饺子包完了，额吉用干牛粪点燃灶火，开始煮饺子，一边煮一边往锅里放进几撮面条，说这是蒙族的习俗，祝我平安无事，顺顺利利的。饺子煮好了，额吉把第一碗放在我面前，热气腾腾的饺子真诱人呀！额吉几个孩子的目光不住地落在饺子上，对于生活艰难的额吉家来说，吃顿饺子是多么不容易啊，面对那一碗热乎乎的饺子，我如何吃得下……

一次打草大会战，我病倒了，躺在冷清的宿舍里，心里一阵发酸，强烈的思乡思母之情挥之不去。就在这个时候，额吉出现在宿舍的门口。当她从女儿口中得知我生病了，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用头巾包了几样奶食匆匆赶到我这里。常年的劳作，额吉的手很是粗糙，但当额吉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时，我感到这手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绵软，犹如妈妈的手！感情就这样被征服，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妈妈，就一头扑进额吉的怀里。

几年光景，一块来的伙伴相继走了。一个秋夜，额吉来到青年点，悄声对我说：听说又要招工了，这次你就走吧。她打开一个小包，“家里下了犒子，这些你的吃，吃胖了回去妈妈高兴。”那是块方头巾，里面包着额吉亲手制作的奶豆腐、奶酪和酥巴。额吉穿着一件自己缝制的中式平纹白色长衫，脸上的纹线更深了，细细的辫子已呈灰白。在我的印象中，额吉从未穿过现成的衣服，我决定把一件从大连带来的新白底蓝条的确良衬衣送给额吉。您看一看，喜不喜欢？额吉抖抖地接过衣服，抚摸着，好一会儿才轻声说：“给我的？我也能穿？”我使劲点了点头，鼻子酸酸的。

1978年8月，当我就要离开额吉回大连的时候，额吉紧紧拉着我的手凝视着，眼圈红红的，半天没说一句话，又红又大的熟鸡蛋塞满我的包，仿佛生离死别。我也在额吉的肩头哭成了泪人。额吉呀，四年里，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今生今世我将铭记在心，您就是我的蒙族妈妈！车子越来越远地离开了额吉，额吉的身影渐渐看不见了。

那时候，额吉的大儿子恰巧在大连当兵，因为我和额吉的特殊关系，也因为额吉儿子作为来自大草原的蒙族兄弟，我的家成了他在异乡的温情驿站。额吉知道后很高兴，说这个丫头没有忘记我们！在我回到家乡的第二年，额吉带着小女儿千里迢迢来到大连

看望儿子，我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额吉。额吉仍然是那样的慈祥，只是脸上添了不少新皱纹。我执意要额吉住在我家，可额吉却非要到儿子的部队去住。我也理解，好几年没见儿子的额吉要与儿子说点悄悄话，乃人之常情。于是我和额吉说好了，呆一两天我就接额吉来家做客。谁知当我骑着自行车赶到部队时，额吉已登上北去的火车回内蒙了，没能让额吉吃上我亲手做的饭菜，没能亲自把额吉送上火车，成了我一生的遗憾！不久，额吉的儿子也复员回了内蒙。从此，我与额吉一家失去了联系。

光阴荏苒，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多年。2002年7月，我终于回到了曾经挥洒过青春岁月的贡格尔草原。此时此刻，我最想见的人就是额吉！额吉，这些年里，您过的好吗？车一进村，凭着多年的记忆，我快步朝额吉家当年住过的地方走去。二十多年过去了，额吉家的老宅早已易人，从那个牧人口中，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额吉家早就搬走了，我思念的额吉也于几年前去世了。刹那间，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会？额吉和我的妈妈一般大，还不到七十岁呀？在现任村支书那里，我证实了那个牧人说的话，千真万确，最疼我的额吉走了！千里迢迢回到内蒙，原以为能与二十多年未谋面的额吉好好唠唠家常，在额吉面前尽尽汉族女儿的孝心，表达我的一份感恩之情。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额吉已永远地离开了深爱她的儿女们，近在咫尺却阴阳相隔！

在额吉大女儿家，我含泪问她额吉葬在哪里？姐姐指着绿色的草原说，就在那里。这美丽的草原，每一棵草都是有灵性的。它是蒙古人的家，也是额吉的家。生于斯，长于斯的额吉，和许多蒙古族先人一样，在走完人生的旅程后，永远地与草原相伴。是夜，当我走在通往额吉家的路上时，一缕清风迎面拂来，我立刻明白了，是额吉来了！来看看她当年牵挂的汉族姑娘，看看她深爱着的土地。我伸出双手，轻轻地说，额吉，我好想您啊！我感到有一双手正在我的身上抚摸，软软的，绵绵的。当我拼命想抓住这双手时，它却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1990年12月《大连日报》“北国之秋”文学征文三等奖

闪亮的小绿灯

宋广玉

妻要我上街买拖鞋，我迟迟不肯行动。

那是腊月，我们刚刚搬进新楼，屋里还没有装修，整天却要为双鞋换来换去的，何必呢？妻却不满意了“哼，为你呀，怕你那皮鞋净钉子，满地喀嚓喀嚓，吵人楼下！”

原来为的是这个，我还以为她“摆谱”呢，看来还是妻子心细。

生活中真的有那么些不起眼的小事，处理不好，便会成为矛盾的种子；而注意到了呢，往往又会结成充满人情味的甜果……

我们原来的住房，是一幢旧楼，30多户人家走一个楼道口，那楼道又矮又暗，黑咕隆咚的很不好走。尤其是我这500度的近视眼，晚间走楼道得摸着墙壁往前挪。有一次我急着下楼，一拐弯撞到楼口那家门边放着的轮椅上，脚扭了，眼镜也跌碎了，气得我将那轮椅掀出楼口，踢着那扇小门喊道：“楼道不准放东西！”

奇怪的是，屋里响了好一阵子，却不见有人出来。

也不知什么时候，楼口那家的门上边安了盏小绿灯。天一黑，它就亮了，悄悄驱走了楼道里的黑暗。这会儿，上下楼的大人孩子可以亮亮地走了。

小绿灯亮了，而我却不以为然，倒觉得它本来就该有的，就像它本来就没有一样。

有一次我回家很晚，整个小镇都入睡了，我们那幢楼房也漆黑一片。可是，当我一踏进楼口，那盏小绿灯忽然亮了，眼前的氛围立刻变得亲切起来。我心里陡地涌出一股暖流：小绿灯是为我而亮的！那一瞬间，我感动地真想去敲开那扇小门，看看是谁为我拉亮了小绿灯，对他（她）说声谢谢！

那一夜，我感到生活真美好……

我开始留心那扇小门，希望有一天从那里走出一位姑娘，或者是位小伙，那怕是一个孩子吧，我也会送给他一个微笑。但是，那扇小门始终不见有人走动，只是那盏小绿灯在熠熠发光，一到了傍晚，一听到楼道口有脚步声……

又是一个晚间，我从外面回来，那盏小绿灯不知怎么没有点亮，走进楼道，仿佛突然陷进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每迈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此时我才感到小绿灯的可爱，感到它是那样必不可少。那晚，我不知是怎么磕磕绊绊摸上楼去的，心里总挂念着那盏

小绿灯，想着小绿灯带给我的那一份方便和亲切。以后一连几天，每次从楼道走过，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抬头去望，希望那盏小绿灯重新点亮……

有一天，妻说：楼口那家瘫老人死了。我听了一怔，急急地跑下楼去。那是间窄窄的小屋，靠楼道的那面墙边放着张木床，床头上，缠着那盏小绿灯开关拉线。而床的一旁，赫然停放着被我掀翻过的那辆轮椅！啊，这些年来，每天为人们拉亮小绿灯的，竟是这样一位不能行动的老人！

以后我们搬了家，但那盏小绿灯始终闪亮在我的心里，教我去品味着人生的意义，教我去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为别人，为自己，也为了曾有过那位闪光老人的世界……

我觉得，应该考虑妻子的意见，去买一双拖鞋了，而且要告诉售货员：请给选双软底的。

原文发表于《美报》，

1991年第11期转载《青年文摘》

源 头

王天民

隔着世纪，我的身影和玄奘高僧的身影重叠，车窗外，耸峙的雪山令人感到神圣，广袤的草原令人感到神秘，阒无人迹的旅途更令人感到神兮兮的。心中想着和古人影的重叠，也生一种寻觅的感觉——玄奘是在寻找释迦牟尼的真谛，我呢？是在寻找人生……

大学毕业，我站在全国地图面前，毅然选择了这块地广人稀的冰雪世界。我喜欢恬静，我厌恶都市喧嚣，受不了那万头攒动的人流——那万颗跳动的心每天不知会演绎出些什么故事来。似乎是为了逃脱尘世，我果决地踏上了青藏之路。

现在，无边无际的宁静正在向我走来——一路上，漫漫戈壁铺陈着一片片寂寞，巍巍昆仑连绵着一个个孤独，莽莽草原涌动着一缕缕怅惘……两天两夜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发现我是一位叶公，当庞大的宁静真正到来的时候，却感到仓皇和窒息，胸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我企盼见到一人。

此时此地倍感人的亲切。家乡那闹市的嘈杂、车厢里的拥挤、居民楼的纷扰，都在这无涯的寂寞中得到稀释，成了美好的回忆伴随在旅途。思绪就有了分量，慢慢地爬着一道道山，慢慢地踱着一道道河，实实在在感受到家乡的遥远。情愫像青藤一样缠绕在家乡的槐树上，炊烟一样缭绕在家乡的瓦房顶。这么着，我就心无芥蒂，为过去同事间不必要的纠葛而懊悔，为邻里间没意思的纷争而赧颜。哦，恢宏博大的青藏高原哟，一下子拓宽了我的心胸。我更加热切地盼望见到人——没有人的世界使我感到难耐，没有人，我就觉得是在走向远古，走向洪荒，而决不是走向新世纪。

有人！只有一个人。在奈齐郭勒河的那一边，一个藏女放牧着羊群。这是我进藏路上见到的第一个人。看不清她的面孔，听不见她的声音，只见她频频向这边招手。她一定有我的同感——见到人时的喜悦。牧女模糊的身影像梦一样滑过去，却又那样清晰地永驻在我的梦中。迄今我仍常常猜测：她在河边背水吗？她在帐前煮茶吗？在青藏高原上见到的第一个人，竟这样令我梦牵魂绕。

少儿时，有回跟着大伯走夜路。大伯问：“你说现在最怕遇见什么？”我说：“狼。”大伯说：“不对。”我又说：“虎。”大伯说：“也不对。”我眨动着眼睛：“那是啥？”大伯低沉地说：“人。”这意外的回话使我幼小的心紧紧地一缩。岁月的流水冲淡了过去的一切，然而，这段简单而又复杂的对话却一直萦回耳畔，有时彻悟，有时懵懂。在这渺无人烟的风雪高原，我突兀憎恶起大伯——我渴盼见到人。

——又有人！在唐古拉山麓，一伙儿藏民在野炊。我兴奋地跳下汽车直奔过去。突然，我驻足了，畏葸了：他们身着奇特的民族服装，几支猎枪架在篝火旁，无论男女，都佩带长刀，正用匕首剔着生牦牛肉大口大口地咀嚼，手上嘴角全都血糊糊的。我仿佛一步踏进了原始社会。只一会儿，我立刻释然了。我看到那群星一样闪烁的眼睛。男的没有揶揄，女的没有献媚，有的是坦诚、真挚、热情。一位藏族女人敬茶的情景令我没齿不忘。她腰间系着黄绿相间条状花纹的“帮典”围裙，撩起一角，把木碗转一圈又一圈地擦拭干净放在碧绿的草地上，两手端起铝壶，深深地弓着腰，一只宽大的袖子耷拉在地上，极像弯腰敬礼。她回眸轻轻一笑，虽不嫣美，却很坦荡。我酣畅淋漓地一气喝了三大碗酥油茶。为了迎接远方客人，伴随着激越的六弦琴音，牧民们亢奋地跳起“锅庄”舞，顿地为节，嘴里不时发出“休休休”“曲曲曲”的喊声为之助兴。我和他们手挽手肩挨肩，没有拘谨，没有腼腆，没有板板正正做人的面纱。就那么洒洒脱脱，就那么浪浪漫漫。我真惊讶：生平第一次跳舞，竟是如此合拍合节合流合群，神差鬼使一般。我如醉如痴，舞之蹈之，完全是一种少儿时的欢欣。

登上高高的冰山，
采来十九束雪莲。
我只要其中一朵花，
其余的谁爱拿去就拿去吧！

一个戴着金丝帽的小伙子唱着高昂的萨迦民歌，采撷一簇雪莲送给我。万没想到雪莲花不是玉一样白，却是血一样红。我捧着花儿在水晶宫般的冰崖下徜徉，脚下，一泓山泉汨汨流淌，锵然有声，如同牦牛脖上的铜铃叮咚作响。我禁不住俯身掬起一捧豪饮而尽。多么甘甜，多么清醇，溶了雪莲花的馨香，溶了藏民们的情意，在心头滋润蔓延开来——一时间，人间万物都像是在清泉中浸过了似的，一切都干干净净，一切都痛痛快快。我突然感悟到：足踏的唐古拉山，不正是穿山过谷万里长江的源头吗？我心头豁然如洗，一种庄严感油然而生，眼前一片明亮，仿佛高原之行，正是为了寻觅这气势磅

磅礴涤中华大地的长江的发源地。我怀着崇敬，又掬起一捧没有星点尘埃的山泉水，让它穿肠而过……

汽车雪狮一样疾驰，冰川似屏，银峰如林，满目奇异的雪域风光。回首望，雄伟的唐古拉山云雾缭绕，巨人般耸立在天地之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首赞歌从冥冥远古传来，久久地回荡胸间……

1992年

枫红时节

田 樱

那是一个枫叶正红，橡树赭黄的时节，我一路风尘，由纽约经多伦多来到了温哥华。

这是北美一块多情的土地。一下飞机，迎着我的便是满目的枫树。那嫣红的枫叶，像燃烧的火炬，使我漂泊寂寞的心里，立刻注满了温暖的回家的感觉。当轿车进入市内的红叶区，看见不仅仅是道路两旁、庭院公园枫红盈目，连宾馆、商店、汽车、火车也飘满枫叶图案时，这种感觉愈发地浓了。最后，我的车在一幢棕色的、周围也是枫树红叶的楼前停了下来。

站在那里迎候的中年人，便是北美环球贸易有限公司总裁朱淑汉先生，我们相识已有十多年了，他是我贸易上的老伙伴。

在会客室里，朱先生向我介绍了他的几位朋友后，又送我一本印有枫叶标志的样本。这是一本别致的、折叠式的样本，前页是一个球，用英文写着：我们愿和最好的伙伴打球。打开样本，中间又是一个球，球两边是公司经营的各种商品，上面用英文写着：我们的合作都是会成功的！样本背面还是一个球，球的上面用英文写着：你们愿意合作吗？

我知道，朱先生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经商之道不同凡响。样本上的这个球，就是他公司的名牌产品，平平常常的一个球，如今已在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独领风骚。

朱先生是商人，也是赤子。对华贸易，他总是带着感情去做，而且是下了苦功的，他与生养他的祖国首先是从铸锻件开始做生意的。做此生意要懂技术，会看图纸，费工夫，金额又不大，但朱先生认为铸锻件适合在中国做。他曾对我说，中国有那么多乡镇企业，可以为国家多创外汇，我要尽心尽力，做好中国生意。为此，他拿来了一份又一份图纸，送来了一种又一种样品，把一个又一个订单拿到大连。大连与温哥华，有一条枫叶铺成的路。

周末，朱先生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做客，与公司不同，他的家坐落在一个绿草茵茵的幽静山冈上，两株枫树掩映着一幢白色二层小楼，院里的草坪，青且翠。刚到门前，朱先生的太太和三个孩子迎了出来。屋里多了来客，顿时热闹起来。

桌子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束枫枝，花瓶旁是两盘糖果。朱先生高兴地对我说：“这是枫糖，用枫树汁制作的。”我们品尝着，味甘似蜜。朱先生接着说，每年三四月间是温哥华一年一度的“枫糖节”，人们纷纷来到市郊的枫树林中，生产枫糖的农场也粉饰一新，披上盛装，喜迎客人。他让我明年“枫糖节”时再来加拿大，共享节日的欢乐。

晚宴是欢快的，饭菜是朱先生夫妇亲手做的，显然是他们的家乡广东风味。

席间，朱先生深情地对我说：“友谊比金子还可贵。我十多年来奔忙于温哥华、香港、北京、沈阳和大连之间，一是为了友情，二是为了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我们回顾起在澳门的相见。那是1988年，大连出口商品洽谈会在这里开幕。他从温哥华刚到香港，闻讯便乘船赶到澳门。在美丽的凼仔岛凯悦酒店里，他把带来的新订单一一向我作了介绍。为了保证质量和按期交货，他主动提出派一个技术小组来进行指导，并提供模具和技术。那种诚恳，让人看不出商场的竞争，只感觉到朋友间的默契。

离开温哥华时，朱先生赶来送我，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他对我说：“中加之间早在1870年就开始了贸易往来，温哥华到上海的航线，素享‘海上丝绸之路’的美誉。孙中山先生曾三次来此，白求恩大夫率领的美加医疗队也是由这里启航的。我是一个华侨，根系中国，我要专心经营中国商品。愿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合作锦上添花！”亲聆这样的话语，我的心大受感动。我甚至想，朱先生就像一片丹枫，一片根植在异国他乡的红叶。

至今，在我的笔记本里，仍珍藏着一枚采自温哥华的枫叶。望着那枚枫叶，就感到温哥华有一颗滚烫的心，大连也有一颗炽热的心。

一段乡情

马述勋

拾掇拾掇那些过去的动感情的事儿，大都伴着岁月的云烟而零星飘散了，惟我曾经走过的那条漫长的山路，什么时候在脑海中闪回都铺陈出一片执拗，像漆黑结实的带状布匹随着记忆的步履延伸开来，总也磨不坏总也不掉颜色总让我生发出万端感慨。

那条山路从我们村口丈量，通往我们的学校，足有2.5华里。每天天不亮就得背起书包赶路。14岁的我是我们屯子里惟一个步行上学的中学生。那时候山里有狼有狐，还有许许多多可怕的传说和故事，但我并不害怕，因为我有一位最忠实的伙伴天天陪伴着我。它是一条灰色的狼狗，健壮机警，围着我身前身后地跑动，使漆黑的四周立时变得柔和起来。它很通人性，当我感到前边一团黑暗像蹲伏的怪兽对我构成威胁时，它便箭一般“嗖”地射出去；当我感到后边的黑暗令我不安时，它就又转到我的身后保护着我。途中有一个乱坟岗子，有风的时候，树木魔鬼般摇曳，坟丘就在脚下，每走一步都使我心惊胆战。而每每到了这个时候，灰虎（我叫它灰虎）就像个忠实的护兵，挨近我一步也不肯离开。

过了乱坟岗子，东边的天际就泛出白色，渐渐亮了。天一亮，灰虎就兴高采烈，撒起欢来，我的心情也甭提有多舒畅了，我会掏出一块饼子扔给它作为奖赏。它每当接到我喂给它的东西时，那双眼睛都定定地瞅瞅我，说不清是一种探询还是一种感谢，反正挺深情的（我看过村子里别人家的狗在吃食时的那副贪婪相，可我们的灰虎，总有几分斯文几分高贵。这大概和我们家庭的规矩有关。）

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她也特别讲究卫生，屋里外头总拾掇得挺干净，最让我感动的是，母亲每天总是最后一个睡下，又总是最早起来，她怕我睡过了，早早就起来，把风匣拉得轻轻，我有时在梦中都嗅到了那丝丝缕缕飘入屋中的饭香，和那轻音乐般悦耳动听的风匣声，于是，我便睡得更香更沉。

母亲为了让我多睡哪怕一小会儿，把热腾腾的苞米粥提前盛了一碗又一碗，沿着锅台边儿摆放成一溜，每一碗粥的表面都凝结了一层金黄灿烂的粘层，好等我醒来时不凉不热稀里忽隆喝下肚。这时，母亲就在一边笑吟吟地瞅着我，而灰虎也十分乖巧地在屋地中央静静蹲着，两眼一眨不眨地瞅着我，我知道它也饿了，我总要弄点什么东西扔给

它吃。母亲不让我在这时候喂它，便催我快吃。我有点不忍心让灰虎饿着肚子陪我上学，就悄悄往兜里揣上块饼子或地瓜什么的。母亲没注意我的衣兜搞得鼓鼓的，可灰虎注意了，每天只要我把书包往背上一背，把饼子往兜里一塞，它就一撒欢儿抢在我的前头出了家门。

灰虎什么都明白，它叼着我赏给它的饼子细嚼慢咽，仿佛在细细地品味着我们的友谊。

到了校门口，我不用撵它，它就在一个高处停下了，目送着我，一直把我送进教室。有时学校有事我放学回家晚了，天一落黑，灰虎就会突然在半路上出现，把我接回家。每天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灰虎在一起，而灰虎最高兴的时候，也肯定是我在一起。从早到晚，它和我分手也不过八九个小时，可一见到我，那股热情劲儿就像分别了好久好久。对我来说，再远的路途，再不顺心的事儿，都会在这欢快的瞬间烟消云散。灰虎陪伴着我走过了三年的路程，风雨不误。以后许多年来，只要一想到那一瞬间，眼前就跳动着它那灰黑的影子，内心就会立时充满欢快与甜蜜，我真希望灰虎永远陪伴着我。

然而，在我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厄运却降临到灰虎头上。在一次送我上学回家的途中，灰虎被打死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灰虎，我的伙伴，怎么会被打死呢？！

.....

如今，这一切都成了遥远的往事。我当年上学的那条山路修成了大路，并通上了汽车。我的孩子都是在城里长大，他们疏远了乡村，自然，他们也无法体味我对灰虎的怀念。然而，我却忘不了灰虎，因为，在灰虎身上，系着我永远眷恋的乡情呀！

发表于1992年第7期《辽宁青年》

留在心底的那个夜晚

周莹

望着临窗那条渐渐擦黑下去的街道，依稀可辨的行人中一直不见杨兰的影子。又变天了，北风吹得电线杆呜呜尖叫，窗棂发出呼嗒呼嗒的响声，挂钟当当敲了七下，杨兰为什么还不来？

早上去趟菜市，随意地溜来溜去，眼瞅着一个个菜摊子，却不知要买什么，吃什么，怎么吃，似乎提不起丝毫兴趣。偶尔抬头见到一张熟悉面孔，冷漠的眼神令我赶忙低下头去。作为走资派家属也是有罪的啊，过去相处甚密的朋友、同事、邻居都已断了来往，见了面故意别过去，假装没看见，但我不能不常常想起杨兰。

杨兰是我同乡，又是丈夫厂里的技术员，往常周末或者星期天，总爱到我家改善生活，喜欢吃我做的南方菜，红烧猪肉、糖醋黄花鱼，同我嘻嘻哈哈说笑着。那段时光里，我们相处很快乐。自从丈夫关进牛棚，半年多了，杨兰再没来过，我没理由责备任何人，处于多事之秋，有谁愿拣包袱背呢！

“周姐——”听出菜场一端杨兰的招呼声，给了我意外的惊喜，杨兰小跑着过来，也显得有些激动，附着我耳朵说，“江厂长只是执行错误路线，没别的问题……”

“你具体说说吧，他好吗？”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我死死不放。

“不要问，这里不是说话地方！”杨兰惊虚虚地瞥我一眼，“今晚我去你家！”说完转身就走，仿佛怕我追上去似的，踏着大大的步子。

我顾不得买什么菜，披一身暖暖阳光跑进家门，把好消息告诉小女儿，虹跟我同样地兴奋，一整天都在期待着，可是杨兰还没来！今晚会不会不来呢？丈夫的消息在漫长的期待中很渺茫了，家成了一座孤岛，静静地没有声，没有热，没有可以谈心的人来，我好孤独好寂寞好忧虑呀……

我在地板上走了又走，这头踱到那头，竖起耳朵听动静！外面的风声更紧了，街口汽车“嘟嘟”声，自行车“丁零”声，行人脚步的“踢哒”声，风吹门窗的“吱呛”声……哪怕极小的声音都钻进耳朵，触动我的神经。就是没有我熟悉的杨兰的脚步声。

“妈，你看！”白炽灯光下我家花猫逮住一只幼小的小耗子，神气活现地把它当耍物，猫爪打一下，耗子“吱——吱吱”叫一声，不打不叫，也不逃跑，漆黑小眼珠滴溜转，还伸出粉红小舌头全身舔个遍，那身灰皮毛显得油光光的，十分逗人爱怜。

“吱吱”，花猫又一次扑过去，发出凶狠的“夫夫”声，小耗子索索发抖，一口接一口喘粗气，黑眼珠充满恐惧与悲哀，只要花猫张开嘴，它会立即毙命。我的心紧缩了，产生一股莫名其妙的怜悯：这是个凶残的世界，失去人性的世界，我不能不对弱小者同情。女儿的心情比我更甚：“妈，救救它吧！”眼泪快掉下来了。

我平素最恨耗子作践人，咬破粮食口袋，咬书咬衣服，到处屙屎尿，还传播病菌……可我今晚心情有些异样：“好！”我下了极大的决心，对女儿说，“我逮猫，你放耗子，快……”我把花猫送进厨房插上门栓，任它发狂地挠门，“喵喵”地吼叫，女儿找到那块裂缝的地板，轻轻将小耗子放了进去。

“笃笃！”有人敲门。那声音轻得像风在呼嗒，我们母女警觉地仄起耳朵。“笃笃笃。”这次敲门声大了些，无疑是杨兰来了，她是怕人看见，才拖延这么晚的吧，真够朋友！我压抑心头的喜悦：“谁？”“是我，大妹子！”尽管她的声音压得极低，我还是听出那是贴墙邻居娟娟妈。

这位四十开外的女人，过早地耷拉薄嘴唇，在她藏着脏话的仓库里，随时都会甩出一句：“丧门！”这女人的听觉异常的灵敏，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我家大门吱呀响动，她准会探出头来：“呸！走资派也有今天！”好像我们之间有过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在这之前，她送给我的笑容是妩媚的：“远亲不如近邻，大妹子有啥事，只管言语一声，谁不用谁呀！”她家缺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她就笑着过来要，借钱更是常有的事……

“大妹子，快开门！”深更半夜她来干什么？既然来了不管善意恶意，总得弄个明白，我没听女儿的劝阻，开门请她进来。她坐床沿未说话眼圈先红了，骂自己不是人。我十分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请她慢慢说。她说她家出身高，怕受牵连，才故意骂我给别人看，表示划清界限。“大妹子对我好，我哪能没肝没肺！”说着眼泪吧嗒掉下来。我拉住她的手，一时间心里五味俱全，人总有头脑发热的时候，只要清醒过来也就行了，我对她平日怨恨，顷刻化为乌有。“你过得好吗？”我口不由心地说着关怀的话。“好个屁！娟娟下乡插队，要买这买那，连双胶鞋也买不起，上哪弄钱？我……”我似乎完全明白她的来意了。

“我跟孩子爸说：大妹子眼前落了难，我们老不登门，反而外道了，今儿来看看，顺便借点钱，换着别人这份境况，我们再穷也不登门的……”她越说我越懵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她来向我借钱，倒是瞧得起我，我若是不借，岂不是不识抬举？今晚这

出戏演得令人啼笑皆非，我的心头又一次涌上莫名其妙的感情。说不上是自尊还是自卑，我决定借钱给她，打发她满心欢喜。

“谢谢你来看我！”送客出门时，我竟道了谢。

夜深了，杨兰自然没有来！

躺在床上，我感到心力憔悴，弄不明白今晚发生了什么，我又干了些什么呀，我还是我吗？

1992年12月

老夫老妻

周莹

近年来，我对散文入了迷，时不时提笔写几篇，打算正儿巴经地出本“集子”。白天要买菜做饭，一摊子家务等我去做。晚上就着灯光写写，白内障眼疾又逼我头晕眼花恶心，我赶紧用冷水洗洗脸，做做眼睛操，再回桌上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从小记住这句话。

“你写，我帮你抄。”老伴始终支持我。他也退休赋闲了，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总不时有人登门以高薪聘请的，而他从不动情，婉言谢绝，还调侃说他正给身边的老夫人当秘书，说完一脸的自得。

他是我第一个读者，作品好不好，看他表情就知道。他霍地站起来一拍巴掌说：“好，又成功一篇！”我便高兴地落一块石头，轻松得想飞。

他没有别的嗜好，不抽烟，不饮酒，就喜欢吃豆制品。我买本《美味豆腐》菜谱，照着冷拌油煎炒烹溜，一盘一个味儿，顿顿不重样。他吃得津津有味，朝我咂咂嘴说：“人若有福，一辈子摊个好老婆！”其实，他才真是好丈夫，脾气温和，胸怀宽广，一年四季如春，不像我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他帮我抄稿，那手字工整稳健，绝不潦草，连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不清楚的地方他就查字典，动不动还给我指点错误。有一次文中有个倒装句，很文学的，他说：“这句话挺别扭，不如颠倒过来顺溜，怎样？”我正忙别的事，没来得及思考，他自作主张，在稿纸上落下笔，我过来瞅瞅，便摔下脸子：

“这句话叫你一改，整个变了味，不行！”

“怎么不行？意思一样嘛！”他停下笔和我争。

“你不懂文学，以后不许随便改动，这张重抄！”我语气十分霸道。

“我不懂，你懂，你是文豪，我没资格抄你文章！”说完，真的搁下笔，脸子沉下来，皮肤里往外冒冷气。我第一次见他发那么大火，愣愣地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收场。我的毛病向来说话冲，但多年和睦相处，相敬如宾，很少用这种口气。

我慢慢踱进客厅，取来两只香蕉剥开皮递给他：“吃吧！香蕉能顺气，还能调整情绪！”他看我好半天，终于咧嘴笑了，阴雨转晴。我得了个教训，记住任何时刻都要尊重人，尽管我们是老夫老妻。

写作的时候，我喜欢我的世界没有牵挂，没有诱惑，没有喧哗，拉下湖色窗纱，关好我的房门，让文思在寂静中流淌。然而，突然之间小孙女会从天而降，跑来敲门：

“奶奶！——”稚嫩的声调请求我：“奶奶，讲个故事嘛！”只要她来，这样那样像根绳子缠住我，心在接受爱的冲动，但又舍不得丢下手中的笔，此刻帮助我解脱困境的依然是老伴：“来！爷爷陪你下棋、跳舞好吗？”……我听到优雅的轻音乐，祖孙俩在客厅跳“迪斯科”，声音很轻，爷爷时刻提醒孙女儿：“奶奶写文章怕打扰，懂吗？”我心中一热，眼睛会潮湿起来。

他从不想啥心事，每晚头一落枕便打呼噜，我神经衰弱，加之睡前写东西，大脑处于兴奋状态，很难一下子入睡，听他呼噜大作，有时还“吐吐”地出怪音，我便心烦意乱，翻来覆去搞得大床直晃悠，他醒了很抱歉地侧过身去睡，然而不到五分钟又……我索性起来，卷卷被子到北屋卧室去睡，空荡荡的床，身边缺了他的大身躯，呼吸不到那股极熟悉的气息，突然觉得很孤寂，手脚不知往哪儿放好，唉！老习惯难改，只好悄悄再搬回去。

清晨他通常比我早起，怕扰我睡眠，总是轻手轻脚地行动。等我醒来才逗趣道：“怎样，老鸳鸯分不开吧！”一句话勾起我遥远的记忆：初恋时，他邀我逛公园，蔚蓝的湖面漂来一对美丽的鸳鸯，他指指说：“那就是我俩……”顿时我羞红了脸，恨不能啐他一口。四十余年过去了。至今感觉心头仍保存那份甜蜜。

自从我开始作文，两人世界里，自然地形成了我是中心，写文章是中心的中心。家庭的环境卫生他主动地包下来：清扫吸尘，抹桌擦窗，金鱼换水，浇花剪枝，我们的三间居室，窗明几净，一派幽静雅致。

午饭之后，阳光洒进来，暖融融地包裹着两颗和谐的心，我喜欢躺在沙发上小憩，他便取来报刊，念一段当日新闻或者老年保健知识，沉浸在快乐的氛围里。想起这个家——辛勤建造的人生小舟将载着我们渡过一生一世，无论过去经历多少人生风雨，都成了生活中美好的点缀。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我心头便涌上极其幸福的感觉。

金秋季节，我的创作获得丰收，一篇篇作品问世。老伴兴高采烈地奔过车水马龙的街道，走进一家又一家书亭去买有我文章的那页纸。捧着散发油墨清香的报刊，他笑我笑，俩人笑声飞向天外……

1992年10月

美哉，莫高窟

蔡永武

也曾徜徉于松花江畔，也曾弄潮于黄渤岸边。泰山的雄拔，长城的伟岸，苏杭的情丽，故宫的神奇，却从不曾有过如此的经验。啊，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抑或是一种情绪，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感。起初似乎并不见得怎样激动，怎样亢奋，但随着时日，你的潜意识里会越来越强烈地滋生出一种期盼，一种渴望，一种刻骨铭心的思恋，远远比第一次身临其境更真实，更清晰，更有一种摄魂勾魄的向心力，使你每每想起，心中都会荡起巨大的波澜，并不由自主地将它的过去、现在、将来毫不犹豫地熔铸进你的骨髓，使你终生不会忘却，也不能忘却——那便是敦煌莫高窟——一个久远的辉煌。

莫高窟，那实在是一个神秘得我自认无缘拜谒的风景。没想到今年陇原上飘起的“金丝带”竟使我有幸目睹了它的风采。

敦煌莫高窟，在敦煌市南约25公里的鸣沙山悬崖上，其洞窟形如蜂房鸽舍，错落相叠四五层，高高低低排列了千余米。据唐初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记载：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距今已1600多年。传说最早有个沙门乐僧和尚“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故造窟一龕”。不久，又有个叫张良的禅师，在第一窟的旁边凿建了第二窟。从此，这里一代一代建窟造像不止，朝拜香火不绝。到武则天时，已有“窟室一千余龕”。至今，在漫长的岁月中，莫高窟虽然不时受自然和人为的损毁，但仍然保留了从十六国后期到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代的洞窟492个，彩塑2200余身，壁画4.5万多平方米，堪为神州一绝。

其实，一踏上这片净土，我就发现，有一种久远的东西在突突地潜入我的肺腑，一种失落了的东西似乎又回到了我的心里。这个无形的东西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在走进古色古香的莫高窟牌楼的那一刻，在一尊尊泥塑大佛飞天壁画赫然突现在我面前使我的心为之亮为之一动的那一瞬，便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氛围的裹挟。也许正是这种感受牵引着我，直到我走近了它，亲眼目睹了它，那种神秘感依然没有拂去，依然萦绕在我的心间。

这里所有的洞窟都不装照明设备，亦不准拍照，据说是为了保护壁画的色彩。冥冥中只有一束束争先恐后的手电光柱，在柔柔地创造灿烂。便越发觉得有一种扑朔迷离的

神圣。一股超尘脱俗的仙气在热热地斑驳着我的目光和心灵。这里是“飞天”的宫阙，这里是菩萨的殿堂，并以其数量浩繁、规模宏大和艺术上的无与伦比，向世人展示着中国长达千余年间生动的社会历史场景，一部包罗万象的形象的“百科全书”。只是你冷不丁一看，也许它并不动人，既无突如其来的美的震撼，也无一见钟情的美的诱惑，你甚至可以说它不美，也可以说它具有另一种美，这种美，只有沉下心来，细细地咀嚼，慢慢地品味，你才能隐隐地感悟出它那种博大丰厚经久不衰的美的内涵。

但是，灿烂的敦煌艺术，如同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在近代史上也同样未能幸免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蹂躏。据介绍，仅从光绪二十六年 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箎发现第17号窟的“藏经洞”以后，便陆续有英、美、法、俄、日等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先后染指了这块净地。他们不仅盗走了大量古书、经卷和珍贵的文化遗物，而且还明火执杖地窃取了26块壁画和一尊精美的彩塑……能说这不是令人发指的浩劫？能说这不是人类文明的灾难？尤其当我们目睹了那劫后疮痍，痛心疾首之余，更有愤然于胸。

是新中国重新焕发了莫高窟的艺术光彩，解放后，国家先后在这里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研究院。经过40多年的研究、保护，现在，莫高窟的面貌基本保持了原貌，研究工作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如今展现在游人面前的莫高窟，雄伟壮观，多姿多彩，成了名副其实的艺术殿堂。

“飞天无恙，菩萨安详”。望着眼前这历经千载电光石火也不肯毁灭的莫高窟，望着远处那苍茫广袤的沙漠戈壁，我不禁想到，也许上苍真是公平的，它没有给与这方土地以山之美水之秀，但却赋予了它灵性，赋予了它神奇，赋予了它一份独有的永远不会失落的魅力——啊，拂去岁月的风尘，美哉，莫高窟！

1992年

生命

曲圣文

岳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躺在他身边的病床上。

岳父患的是癌，胃癌，晚期。

这夜轮到我陪护。病房里有四张床，有一张床上刚刚逝去了一个老人，后来住了个小伙子，大概知道了这事，便调了出去。其实何必！医院的病床上，尤其是医院肿瘤科的病床上，已流逝了多少年老的、年轻的生命？大概谁也无法说清。也许小伙子还年轻，也许那死离得太近，而年轻的小伙子——哪怕是有病的小伙子，属于他的该是辉煌灿烂的明天——他搬到别的房间去了，因而留下了一张空床。另两张病床上的病人都不太重，只白天来打“滴流”，打完“滴流”便回家去了。夜里便又空下两张床。岳父睡在属于他的床上，我就睡在回家了的病人的床上。

岳父已多日不能吃饭，即使喝水也全都吐出来，所以没有大便，也不用打饭。五点钟打饭时，走廊上照例要忙乱一阵，而岳父的房间静悄悄。岳父微闭着眼，躺着不动，似睡非睡。这现实太残酷：吃饭已是别人的事情！而他的胃里已无食物却还要不断地呕吐！怕不当的问话刺激他，呆在屋里便没有话说，于是便静静呆着。医院里特有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岳父合上眼便有时断时续的梦呓，叫人生出许多遐想，关于生活、生命和死亡……岳父杂乱无序地说着、含含糊糊地睡着，眼角便慢慢渗出一颗一颗浑浊的泪！我听到我心之弦怦然有声，那就是他内心的痛苦和依恋吗？谁能破解那无以言说的话语呢？岳父虚岁六十三，刚刚退休，我的妻子是他最小的孩子，而我们的孩子都快五周岁了，他正可得享天年而无所牵挂。难道是命中注定？辛劳一生，使命完成之际就要撒手而归了吗？对死的惧怯与对生的眷恋于此时强烈地搅扰着老人的心！人大概于此时才更强烈地体味出生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即便是艰难的生活大概也无法同安乐死相提并论吧！

岳父兄弟姊妹六人，他排行老大。他常常念及他幼时就学的艰难与生活的窘迫，他要帮助母亲经营家人赖以糊口的一块菜地，常常担着做铁匠的父亲特为他而制的一副小水桶，还要带弟弟妹妹。他的父亲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具有典型的说一不二的家长风范，在父亲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便要为此付出代价——忍受训斥和受皮

肉之苦。于是他在继承了他父亲的吃苦耐劳诸多优秀品质的同时，也继承了他父亲那种封建家长式的作风，并常常为自己的权威受到撼动而感慨不已，“你爷爷那时候……”便成为他的常用词汇。岳父在艰苦的环境里以优异的成绩读到高小毕业，并在成年时走进城里，成为一名国家干部。此后的几十年他便和共和国一起波澜起伏而无须赘述了。因为我和我的家庭经历似比岳父还波澜起伏一些，岳父的一些生活也为我在“文革”中所经验过，听岳父讲便也常常想到自己，便常常陪他感慨唏嘘一番，品尝着生活的滋味，这样我们的感情似乎就近了一些。这时岳父会现出他的本色：一个谦和敦厚的长者。这时我便会想起他的另一些故事。有一年的冬天，他和他的父亲拉了一车白菜到市内去卖，在中山公园附近被一人买下，而他却说眼下无钱，改日再付。可是以后去了数次，不是见不着，就是被他以种种借口支走，而终于没有兑现。那一年冬天，他和他的父亲以有些淳朴的窝囊，向大连某市民奉献了一车白菜。还有一年冬天，大概刚刚解放，他和他的父亲拉了一车烧柴进城卖，走到沙河口火车站附近遭人围抢。赶了这边，那边又上，寡不敌众，一车柴所剩无几，终于作了悲壮的牺牲。泪在我心里汨汨地流。我想，我给家长前面加上“封建”二字似有不妥，他是怎样的懦弱和善良啊！难道冬天竟在他人生的履历中设下了道道路障吗？

岳父平生勤劳干净，居家、工作、外出，诸般杂务都料理得井井有条，但他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兴趣爱好。诸如游玩、听戏、下棋，甚或搓麻将打扑克皆无兴趣，一尘不染。我很遗憾他曾去了大半个中国的那么多地方，竟从不曾出去游玩，办完公务便匆匆赶回；即便尚有余暇，他也是在屋里读报——拿一份报纸从第一版读到第四版。却也有过一次历险，是在武汉或宜昌的江轮上。当时船泊在码头，船体已渗水而旅客尚未知晓，大家都悠闲自若。而当广播通知大家离船时，这才慌了手脚，都没命地往出口涌去，一片混乱。当时的恐怖气氛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恐怖与混乱中，益发刺激了人们的求生欲望，而其他一切便统统置诸脑后了，于是岳父丢弃了二十斤橘子。而我却总把这橘子与那白菜、那烧柴联系在一起，构筑着岳父的形象。当然这并非他性格的全部。

遗憾的是我和岳父接触时间不长，而交谈又极少，我不曾了解更多的他的故事。他参加革命工作这么多年，且又多年做基层领导工作，想必会有更多不平凡的故事……

这些天岳父的病已然见得重了，他便显出无比悲观的冷静，亲友、同事的劝慰他都是一副姑妄听之的神态。他太熟悉自己的身体状况了：从十几年前便开始靠注射胰岛素维持身体的代谢功能，以至于各种疾病的治疗都要受到影响；也许是糖尿病吃糖少的缘故吧，他常常低血糖；大约在1982年前后，他的左肾因囊肿而切除，仅存的一个肾加重了工作负担，便也时常陷于危机；后来，1988年冬发现胃已长癌，且是晚期，

好在尚可手术，便做了胃切除手术。开始并没告诉他，怕引起他情绪波动而影响疾病的治疗与身体的康复，但他终于知道。自那以后便增加了住院的频率与住院的时间，而且很多时都需陪护。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领略到医院病房的滋味、病房里的床与板凳的滋味。医院里的白色对生命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诱惑：婴儿的诞生与衰老的死亡，始于白色的纯洁，归于白色的永恒，而五光十色的生活则不过是匆匆的旅程。于是浓浓淡淡的来苏儿气味便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不知是该感到亲切还是该感到恐惧。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中断断续续睡到天明，再侍候岳父洗漱完毕，打两壶开水，等着人来接替之后便匆匆去上班。

那一夜我便感到岳父的病有加重的迹象：闭目之后意识便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呓语不断，时而清晰，时而含混，他在同疾病进行着怎样的抗争！冥冥之中他感到死神向他招手了吗？清醒时他仍然无话。两天后的夜里他病逝于医院，那是十二月里的一天，也是那个冬天里少有的几个冷天之一。临终时他仍然清醒但已不能说话，他很清醒地终止了自己的生命。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十分痛苦。他在知道自己患癌症的时候，尤其是此次胃癌的复发，他能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等待死亡。这是多么残酷！

躺在医院静静的病房里的时候，我曾想到列宁所喜欢的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陷入困境的猎人求生的意志那样强烈地震撼着人心，但他毕竟有与之搏斗的对象：垂危的狼和严酷的环境。但岳父强烈的求生欲望却无可表达，而看不见摸不着的癌细胞却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他的抗争是无言的等待，他无比平静。是看不见的意志力顽强运行于他的体内，支撑他垂危的生命——但癌细胞胜利了。

其实他已多活了两年。虽然现代医学于癌症还无能为力，但毕竟延续了他的生命，也向亲属发出了一个不祥的信息。从那时起，家人亲友都在准备接受这样的现实。今春的沈阳之行似乎又是他生命的终点了——其时小便不通，医院诊为肾功能衰竭，离大连时医院便已暗示家属准备后事，而他在沈阳治疗期间也曾一度数小时失去知觉……但现代医学又一次使他从死亡的边缘回到家人的身边——想像不到他竟能在住了五十多天医院之后又坐了六小时火车平安回到大连。

这一次是我送他去医院的，但想不到那竟是他生命的最后历程，是他最后看到的“外面的世界”。

向遗体告别的时候我哭了。岳父的去世于我似乎留下了很多遗憾：岳父那样喜欢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眷恋着姥爷，但岳父已逝而我的儿子尚处于懵懂之中！想到岳父一生经历坎坷，如今可以轻松安稳以享天年之际竟撒手而归，只有叹人生无常、生死有命！在岳父的子女及媳婿之中，我的学历最高，而介入这个家庭又最晚，他似曾对我抱

有一个朦胧的期待，如今我却一事无成！似乎还有许多无法形诸笔墨的种种都于此际汇聚心头，又向周身荡漾，最后又化成泪……

经历了亲友的死亡似会使人成熟。终日生活在一起的人突然离去不再回来，在每个活着的人心中留下无法填补的空白和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这样想着，便常常会照见内心的委琐和许多无聊，便会踏踏实实地开始明天的生活，会更加从容不迫地面对人生。

发表于1993年第1期《晋阳文艺》

望儿山高

仇大川

明末清初，古城熊岳一位举子，渡海进京赶考，一去不归。孤苦伶仃的老母亲望儿心切，每日登山远眺，年复一年，终于化为石像。儿子呢，却再也没回来。

此山清康熙年间得名——望儿山。

这就是望儿山？苍穹低垂，大野空寂，一座指头也似的山峰屹立在雾霭沉沉的天地之间，似向人间诉说着什么亘古的寓言……

那是在女儿考高中亡故后，我与妻北去途经熊岳，参谒了这座留诵着古老、凄凉传说的望儿山。

这就是望儿山。停在山脚殷红厚积的苔藓上仰视，这山委实算不得什么巍峨，但四面刀削斧剁似的立陡立崖，兀立于坦荡的田畴之中，因而别有一种崔嵬、挺拔之势。枯藤古木挂个满山。顶上并不见什么石像，只有座灰砖古塔，雪给它披上层洁白清冷的素衣。山前有座水泥柱凉亭，跟生命一样质朴，跟母爱一样醇真。

妻与我沿人工开凿的陡峭石梯拾阶而上。这背阴处积雪很厚、很滑，不得不用手，路很艰难，需互相搀扶，人生大抵也若此。

终于登上绝顶。

顶上，有两丈方圆平地，小塔正立中央，经过岁月的侵蚀，已是砖石剥落，一副苍老憔悴的模样了。飒飒的山风从远方浩荡而来，扫过塔顶，不时发出一两声凄厉的呼啸，宛若人在撕心裂肺地恸哭。这塔也怪，在山下望，驮着个背极像位年迈残朽的老妪，近看却是笔直。塔基上有历代各式题词，其中杂有朝鲜文、日文，都镌刻着为人子嗣的寸草之心。似乎最早一个是1902年题的，那已是近百年前的满清末年了。

倚塔纵目，冰封千里北国，茫茫山、茫茫水、茫茫大野，都静静地笼罩在一片茫茫紫雾里。西望，是一片瓦蓝瓦蓝的烟波水气，无际无涯，那是深藏着惊涛骇浪的渤海湾，那是儿子的一条不归路，那是母亲的一条伤心路……

妻扫我一眼，刚要开口，我用食指堵住她嘴：“别提孩子，我们有约在先。”

是的，别提，我们都别提，像这位老妈妈一样，百年风雨中缄口不言，只是痴痴地凝望。女儿，是另一个悠长、凄婉的故事，留着将来再说，留着……眼下，我们共同面对的是这座小塔，是这位妈妈。妻，我知道，人类千百种纷纭繁复的感情中，即便是诗

人们吟哦千载的男女之情也罢，惟一只有奉献、惟一没有功利索报之心的只有母爱，所以女人比男人更富于献身精神。女儿说她要“归于大海”，她如愿了，所以，妻，你也只好常去海边徜徉、凝望了。

冷风掠过小塔，老妈妈呻吟着的那首古老、凄迷的民谣，妻，我听得懂，只有我听得懂……

儿子走后，家中的日子好凄凉呵。花开了，落了。又开了，又落了。儿子还能不能回来啦？老妈妈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爬到山顶，望啊，望啊，望的是渤海上渺茫的孤帆远影。春天的燕子劝她回去，她摇摇头；夏天的晨雾劝她回去，她摇摇头；秋天的清风劝她回去，她摇摇头；冬天的雪花不用劝她回去了，她已化为石头了！她佝偻着腰，依旧直勾勾地望着苍茫的大海。

这白白的霜雪就是满头银发；

这红红的苔藓就是她不尽的血泪……

哦，谢谢先人们给子孙留下的这座立体的哀歌、这章流响的挽诗。

妻望望我，嘴角又蠕动。我忙歪头一笑：“别提，她也去赶考了。”我拼命笑得十分顽皮。

她去赶考了又怎么样，她去没去赶考又怎么样？那是她的故事。而现在，妻，我们倒是要对老妈妈诉说诉说我们自己的故事了，这是一个而今相濡以沫、而后相依为命，相互搀扶着走过人生暮年的故事……老妈妈听得懂，只有她听得懂！

女儿说她“太累了”，于是，去了，赶考去了，一去不归了。可，女儿，你知道你给人间留下了多少“累”吗？孩子，你问问这位老奶奶，你问问这座望儿山……

妻，不要抱怨什么，在这位老母亲面前，女儿、你、我都是孩子，而孩子的一切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只要有爱，就像这位老母亲一样，即使化而为石也将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

我扶着塔基喋喋地讲。

妻望着大海嘤嘤地泣。

夕阳下山了。

“我要……回家。”妻抬起眼。

“对，我们回家。”我点点头。

人头攒动，熙攘嘈杂的车站上，我回头望去：平坦的原野上，凄艳的晚霞中，望儿山的老妇人显得特别清晰。

啊，老妈妈，您还望着什么呐？

.....

发表于1994年1月10日《大连日报》
此文在省、东三省、全国报刊副刊均获奖

佛眼

素素

生长在中国，从识字开始，就知道有佛。识了很多字以后，佛就无处不在了。及至做了文人，读过经史子集，读过儒释老庄，又有了走山访水的阅历，对佛，则是想忘也忘不掉了。

你当然看得出，我对佛，只是一种文化上的理解，是一种淡然的熟悉，就像淡然地熟悉窗外那座天天望得见的远山。我从未试着做一次善男信女，从未因什么不解的疑惑或某种太强的欲望去祈求佛的明鉴和超度。三月，为参加一次笔会，我走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我是张大了胃口一气吞咽下江南的，许多东西至今消化不掉，却是了断一根情肠，再也不用牵挂江南了。然而，忆江南，最忆那双佛眼。也许是我的灵魂里已漂浮起一张不安的帆，也许是我的生命已对前面那些未可知的东西感到逼仄和惊恐，总之我一路都在入寺看佛，而且拜佛。我以为我已经由知佛而达信佛的境界了，却不尽然。

灵谷寺在中山陵东侧，与中山陵比，像一座农家土院。但是，因为有灵谷塔、无梁殿前呼后拥，灵谷寺自有一份庄严。寺虽小，各殿俱全。这一行文人，学各位香客游人的样子，先掏钱买香，然后找一尊佛敬上，这尊佛当然就是普度众生的如来释迦牟尼。至此还不算完，有人已双膝跪下，磕出三个中国式的头。且每磕一下，嘴里咕噜一句什么。我从未进入过这种氛围，也从未做出这样的仪式，就有一种激动。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买香敬佛，也是第一次跪地磕头。第一下磕得十分害羞，第二下磕得十分仓促，第三下才发现姿势不对。因这时旁边来了一位颇有气质的老妇人，她先是在佛前站定，两手合十，仰头凝望一会儿再跪下，又合十，才隆重地磕出第一个头。磕头时又将两只手心翻在上面，以手心托额，如是者三。我再看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严谨这样规范，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参佛大书，触目惊心。我想学她的样子重磕一遍，旁边朋友却拉住我说，佛祖一定知道你是个新教徒，不会计较，再说，敬香磕头是个形式，心里的感觉才是内容。新教徒？是的，对我而言，灵谷寺确是一个开始。因为是第一次拜佛，也便第一次有了祈语，记得我每磕一次头停下来时，喉咙里似有万语千言，但我没有咕噜出声音，只是那么聚集着情绪，酸甜苦辣混混沌沌的一片，也不管冥冥之中是否有佛接纳。一个事实却是，我匆匆忙忙完成了“新教徒仪式”，匆匆忙忙泄漏了连自己

也感到陌生的心灵秘密。原来我并不是偶然进入这个空间的，我对佛是有所求的，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自觉。比如这一次以笔会方式的远行，心情苍茫而寂寞，灵谷寺好像是特地在这儿等我上门的，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去寒山寺之前，就从佛经上录过一段“寒山问拾得语”：“寒山问拾得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这段话曾让我感叹过佛与人的距离，世间只有佛能无烦无恼无愤无怒，因为佛无血无性，高高在上。人不行，人有七情六欲，人要面子，要平衡，人还要超过别人、压倒别人、吃掉别人，所以没有人能洗耳恭听拾得那些大话。但是我暗地里是着实做了拾得的信徒的，当我决定离开一个人却惧怕命运的时候，它给了我走出那间屋子的全部勇气。这是曾经。所以我是怀着感激来拜访寒山寺的。来了才知，拾得与寒山建成寒山寺后，就渡海去日本了，他在日本又建了“拾得寺”。我想，拾得不应该只停留在日本，他应该在世界所有的地方修寺传经，让所有爱生命却惧怕命运的人都成佛，这样，他起码解救了人类的一半或大半，谤人欺人辱人笑人轻人贱人骗人的毕竟少数，在这样汪洋的佛心感召下，或许就把那少数瓦解成粉末了。于是我以一种朝圣的心情，仰看寒山与拾得。没想到，寒山与拾得竟是一副邈邈装扮，我立刻泄气，他们不过是早我几百年的佛教徒，原也是凡夫俗子，便无论如何对他们恭敬不起来了。

扭头去西园。它在寒山寺左近，曾经在书中影影绰绰的五百罗汉、千手观音，一下子拉到目前，看得我背心发凉，毛骨悚然。千手观音每只手上都有一只眼，手多法力大，眼多智慧深，所谓手眼通天。五百罗汉都是大嘴巴大肚皮，让他们坐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岂不是让神仙缺氧？我一路紧张张张地走着，生怕他们中的某一位因为对生存状态不满而打我一掌。直到这时才明白，我对谁都不相信，佛界里也有庸常之辈，我胸膛里突突狂跳的心，我喉咙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说不尽的话，只能对一个人开启，而且我保证，只有在他面前，我不发抖。

最后去灵隐寺。

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大雄宝殿中最大最辉煌的一座了，这也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释迦牟尼金像中最崇高最神秘的一座了。在灵谷寺寒山寺西园寺，都是佛眼看我，而我几乎从未认真看佛，只管敬香，只管磕头，只管向佛密语心事。现在，我才真正来到了佛祖的憩所，以前不论在哪里见到的释迦牟尼，都不是真身，我千山万水找的，就是他了。因为，就在我仰头一望时，泪水已涌流如注，而且无休无止。我这时对自己却是既明白又糊涂，并不去擦泪，就透过泪水一直去迎接那两束目光，并不断地问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什么呢？那目光，对我的一切似都了然，既有母性的慈爱，又有父性的温

暖，似乎还有爱人的关怀和呵护，直感就是像流浪过后一下子找到了家，找到了家长，便觉委屈……

我也是这时才认清自己的虚弱。人在天地之间，肉体是可以独立支撑的，精神却绝对需要皈依，对一纯粹的文明人而言，最能摧残毁他的，不是自然灾害与战争，而是心灵的无家可归。虔诚的佛教徒之所以幸运，是因为有释迦牟尼做他们灵魂的家园，我不能算作新教徒，也不是异教徒，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无家可归者，突然间闯到他面前，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孤单，便对他有所求，渴望得到在人尘难以得到的圣爱，我是相当自私和现实的一个俗人。就因为这些，我才站在那里流了足足五分钟的泪。

泪终于流完，我仍一动不动，只是平静多了。然而，事情就发生在我要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像与一位至亲的人告别一样，又一次抬头去看那目光，感觉竟有些不同。我分明看见，那也是凡人的目光，因为在人世间走过千遍，才显得能包容一切，洞察一切，理解一切。但是，我突然发现，这双目光既让你亲近，又让你陌生，还隐藏着很深的冷漠，似乎佛祖在普度众生的同时又拒绝众生。总之，含在他目光里的东西太多面太复杂。那一阵儿，我就站成一个转身又回头的定格，足足又愣怔了五分钟。好在我已不流泪了，好在我刚刚学会拜佛，就觉知自己中了一个圈套。但我丝毫没有受骗的感觉，如佛祖理解我一样，我也理解佛祖。佛祖未必喜欢千年万年地正襟危坐在那里，耐心地面对红尘中真真假假善善恶恶参参差差的心灵，这对他是一种折磨，因为他早就告诉过众生：净土并不远，就在你心中。而众生却没有看出佛眼的秋波。

我的泪其实是坚硬的，它在迷与悟之间流下来，正是时候。

1994年8月

发誓，不再来这

季福林

金秋九月，正是鲅鱼旺发季节，自然我们这些钓鱼迷的手又痒痒啦。

一般说来甩鲅鱼最理想的是天亮之后的个把小时，因为鲅鱼喜欢在这个时辰游近岸边觅食，所以上钩率也就比较高。

那天凌晨三时半，我背上鱼竿出了门儿后，跳上自行车就猛蹬，兵贵神速。钓鱼早去占场地极为重要。刚过虎滩桥，后面有位骑车的追上来了：“大哥上哪？”我回头一瞧，也背鱼竿，便回答道：“去一湾水儿。”

他撵了上来，与我齐肩时，很神秘地问：“大哥没听说昨天早晨洪门出鱼不少？”
“听说了。”我不以为然。

“出鱼”是钓鱼的行话，即甩着了鲅鱼。在我们这个城市，钓鱼信息的流通挺邪门儿，如果哪天哪个地场出鱼多，那么当天晚上必然成为许多钓鱼迷神侃的话题。然而，一提石槽村东南二三百米远的洪门那地方，我着实打怵、心悸。去那鬼地方必须越过几十米几乎呈垂直状的崖壁，前些年，曾有钓鱼迷在那丧生。先前，我去那里钓过一次鱼，但过后想想，牙根都发寒。如此为何一些钓者却乐意去那里冒险呢？稍有经验的不难发现：那里水老（深），一道三角形的海流子近在咫尺，很容易“窝鱼”哩。你说，这样的地方能不诱人？不过我想，拿性命开玩笑，绝不是钓者的初衷。想到这里，我劝他一句：“洪门太危险，我说——你也别去了。”

他乐了：“啥？危险？五六十岁的都敢下，而且一出溜的，你大哥还在乎个鸟！”
我笑笑，只两字：“不去！”

“我先下，再接应你，怎么样？万无一失。”

“不！……”

“去！大哥。”他似乎下了命令，但话语里渗着亲切，“我保证你大哥丁点儿毛病都不犯！”

几句“大哥”，犹如几杯好酒下肚。也是，人家这般热情地“保驾护航”，走它一遭又何妨！再说倒霉的事怎么就能让我摊上……

一切顺利，当下到悬崖峭壁之下时，洪门这约有三十米长的狭窄岸边已站满了二三十位钓者。我挤进一个当儿，急急地准备停当。一支烟没吸完，东方海天交接处泛出了

鱼肚白。于是，一场大战开始了。甩线，收线，异常活跃，高度紧张。几十把约一拃长、120克重的钩子轮番飞出，将近百米的弧形海面惹得水花点点。太快了，红艳艳、湿漉漉的太阳从海面上露出了半个脸儿，看来，甩钩已到了“冲刺”阶段。我的神经绷得紧紧，全神贯注地收线，当把滑轮摇了五六圈，只觉鱼线狠狠地一顿，我逆着劲儿狠狠地摇了三圈。嘿，咬上了！不大会儿，一条足有三公斤的鲑鱼被拖了上来。这是一个让我心房发颤、相当幸福的时刻！事实上，每个钓者在这样的时刻都会有这种感觉。我知趣地将鲑鱼提到人墙之后四五米远的地方摘钩，因为“见鱼眼红”似乎“四海而皆准”，理儿就是这样摆着：你已经握着一张胜券，还在人家屁股后面碍事，对不起哥儿们，连招呼都不用打，那鱼钩子可没长眼，钩着耳朵、鼻子什么的，与我无关，节骨眼上，即使是亲爹热娘也顾不上了！

摘好钩。直直腰。心挺甜。这当口，但见鱼钩纷飞落水急，大战激烈又壮观。但再没出鱼。看来，今晨惟我独斩。知足吧，见好就收。一看表，六时过五。走，打道回府，别误了上班。于是，我收拾一下，朝同路来的那位喊了一嗓子，手一摆，算是作别。而正在收线的他只回头一笑。分秒必争。我获而他无，彼此理解。

我背着鱼竿，提着鲑鱼朝崖上爬去。当爬至约二十米处时，头顶的崖壁不见石窝。走错了！尚未感到祸已临头，只知应该稳一下。我慢慢回转头一望，妈呀，坡度约八十五，而下面就是礁石、大海！退？难啦！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蓦地，只觉一股滚烫的热泪直冲脑门！紧接着，头发梢似乎竖起，额头立即冒出汗珠，眼镜片也被热气蒙住，双腿开始抖动！怎么办？扔掉左手提的鲑鱼？不，它标志着一种成果，显示着一种骄傲。我镇定一下，将身子紧贴崖壁，慢慢地将捆着鱼尾巴的小绳拴到了裤腰带上。之后，腾出手来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擦再戴上。

不成想，这时下面有几个小崽子起哄看笑话：“噢——噢！噢……”这一“噢”不打紧，慌得我腿肚子愈发抖起来。

人生，可能就这么完结了吗？再一转念：不能慌，家里还有老人、妻子、儿子和女儿！一咬牙，左手朝胸脯和右胳膊狠狠地拧了几把，暗道：“稳住——一定！”

“别——急！”下面传来一老者的喊声，“抓住！右脚往右，慢慢伸！”之后，他又重复着。

容我日后再向那老者磕头致谢。我目光向右一斜，眼睛突然大亮：约一米处有两个小石窝儿，而与脚一齐的右方一米多处也有一个大点儿的石窝。天救我也……

似乎不必再交代了，终于，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脱离了险境。我知道那汗百分之百是惊吓的结晶。

爬上山顶，我将拴在腰带上的鲑鱼一把拽了下来，往草地上狠狠一摔。之后，我就地一躺。眼望着天上缓缓游移的白云，蓦地，我突然大声喊起：“发誓！不再来这！”能记住吗？能有脑性吗？能抵得住这里及类似的诱惑吗？

哦，人生漫漫，我猛地跳将起来，又匆匆上路……

1994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大连晚报》社举办的“热电杯”全国散文征文一等奖

有怨无悔

季福林

平生只谈过两个对象，第二个便是现在的妻子。

“第一个”的长相、个头和举止都不错，是高中时的同学介绍的。那年我二十五岁，在一家工厂的政工组当办事员，爸妈都在乡下，只我一个在城里，嫌孤单，很有早成家之意。

是清清爽爽的一个星期天儿。那女孩子到了我家，一唠，双方都感觉挺好。大院的邻居听说我家来了个姑娘，觉得新鲜，纷纷猜测；之后，便有几位婶子、嫂子编着话儿登门看那女孩子，把她看得竟有些不好意思。她们走后我解释说：“邻居都不错，人家是好意。”随之，我俩相视一笑……

过了几天，我出差去南方。半个多月回来后，打电话给她。从电话中可以感到她的高兴劲儿：“后天是星期日，你来我家吧。”

我听说她爸早逝，很想知道她妈的“意思”，便问：“你妈……”我说了半截话。

“我妈同意，”她有些急不可耐，“后天上午九时，我在C车站接你，定下来了！嗯？”

我挺积极的，两天后的上午八时半，赶到了C车站。穿着入时的她似乎更怀一把火，已在路旁等待。看来形势发展很快，我心里甜滋滋的。

进门。她妈迎了上来。我叫声“伯母”，没敢仔细看，只觉她苦笑了一下。落坐。包饺子。我只会擀皮，擀吧，也是个难得的表现机会。不过，我心里直嘀咕：曾听我妈说过，喜事应当吃面条，又称吃“喜面”，顺顺溜溜的嘛！可这饺子，与馄饨差不多，莫非有“滚蛋”拉倒之意？

“伯母”趁女儿煮饺子之机，同我谈起“实质”问题。她问：“你几级工？”“一级。一个月三十三块。”

“那你还得养活你爸你妈。”

废话！一股怒气在我心底升腾，但表面还算平静：“老人把我从小养大，我有义务养活老人到终。每月，除了缴团费、月票费和电、水、煤气、房费以及买粮买菜后，省下十多元给我爸妈捎去……”

“嗯……将来结婚后有了孩子，那日子就更紧巴了。”

“是这样。”说罢，我真想起身告辞。但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此时，“伯母”却把女儿“支”进厨房，议论了一阵子，最后只听“伯母”说：“不行！”紧接，母女俩走了出来，她女儿眼角湿湿的，我已知道事情的结局，但我觉得我应当有点修养什么的，于是，便吃了几个“滚蛋”饺子……

走时，“对象”执意去送。整整一程，她止不住抽泣，只说了句：“我妈不同意。”我安慰她：“不同意就算了。”但我真想再说：“都什么年代了？婚姻大事的自主权是握在你的手里呀！”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话我只留在了喉头。女孩子应当温柔些，但她身上不缺点什么吗？“再见。”我上了公汽。从车窗望见，她在路旁抹泪。一种悲哀掠过。我替她难过，心酸酸的。

下车后，风紧了些。大片云彩也涌了上来。在青泥洼一家报亭买了张当日的《旅大日报》，哦，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一个多月前我写了一首歌颂他老人家的短诗登了出来！挺高兴。回家。家里空荡荡，光线挺暗。拿出一瓶白酒，没有菜，“咕咚”三下。燥热，但没醉。钻进被窝，只嘟囔了一句：“明天，肯定是个晴朗的天儿……”

1994年获东北地区晚报副刊优秀作品散文奖

1995年获第六届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

晴雨此时观纽约

王正寅

在被河、海割裂，又被隧道和桥梁连接起来的四大岛上，那是一片楼的森林。当我们的汽车还在新泽西州的高速公路上，宽阔似海的赫德逊河对岸，这一大片黑岑岑或高或矮连接得密不透风的楼群，便跳入眼帘。接着，汽车又跑了十英里，才驶进新泽西州，钻进名叫荷兰隧道的河底大隧道，足有三分多钟始得出了隧道后，便进入了曼哈顿岛的街头，也就是说，我们到了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了。我们的车在贯穿曼哈顿南北的一条主要大道——百老汇大街上从北向南地驶向繁华的下曼哈顿，回首望去，透过车窗玻璃，马路两旁高楼的顶端几乎要碰到一起，呈现着一线天似的景观。而从楼的形状看得出美国人由于竞争意识，做事绝不统一和一致，在20世纪初和上个世纪罗马艺术浮雕的宫殿式建筑物中间，耸立起无法计数的数十层的摩天高楼，形状和结构俱不相同，三角形的，多棱形的，圆锥形的，庞大的底楼上耸立着哥特式尖顶形的，以及相同形状并立的姐妹楼、兄弟楼、双子楼，等等，可谓形形色色争奇斗艳。在森林似的高楼群体中，鹤立鸡群的，应推第五大道第三十四街的帝国大厦和纽约港附近的世界贸易中心了。在1976年世贸中心落成之前，建成于1931年一百零二层的宝塔型建筑的帝国大厦是世界第一高楼，登高望远的人们都到帝国大厦。而今双峰突起的称为双子楼的一百一十层的世界贸易中心超过了它，它只好屈尊第二，并降低了登楼门票的价格。世贸中心是纽约港务局出资修建的，成为世界第一高楼不久，芝加哥的歇尔斯公司大楼便拔地而起，取代了纽约世贸中心高度的霸主地位。然而，世贸中心的高度也确实惊人，加上是双子楼，两座同等高度的摩天大楼并排卓立，也算夺尽了全纽约摩天楼的风采。我们在到达纽约的当天晚上，就乘电梯登上了一百零七层的瞭望厅。厅内共有八个均用特殊玻璃镶就的瞭望孔，每孔都设有一台投二十五美分硬币即可开启使用的瞭望镜，因之，我称这种瞭望镜是“见钱眼开”。在“见钱眼开”的帮助下，你可以看到一大片一大片交错纷杂的灯火掩映中四岛五区的夜纽约，五颜六色的灯火不停地眨眼，不停地流动。眨眼的灯火是从每栋楼自下而上的窗户中流泻出来的；流动的灯火是连接各大岛的跨河大桥上飞彩流虹的照明灯和穿行在楼的森林中现在看来形同蛛网似的马路上奔驰的如同火柴盒似的汽车车灯。登泰山一览众山小，如今在世贸中心的瞭望厅上看到全市的楼群，俱都矮去了一大截儿，一幢幢楼身，如同一根根粗大的树桩，那么拥挤那么见缝

插针地插在那里。哦，真是一座楼的森林之城。纽约，从1524年被第一个法国探险家吉尔威尼发现这块地方算起，已近五个世纪了。如今它已是美国的工业、商业、娱乐旅游和出版业集于一体的城市，人口密度大约每平方英里二万三千多人，是全美第一大城市，是一个富有的、忙碌的、快节奏的、犯罪率高的现代化世界级大都会。

突然，远处的灯光被遮住了，一大片一大片地。从赫德逊河对岸的新泽西州渐渐漫过曼哈顿南端的斯迪顿岛。为什么要连成片地熄灯？恐怕不是停电。恰巧这时“见钱眼开”因过了时间不连续投钱而闭眼了。后来我看清楚了，那是乌云，连成片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曼哈顿岛，向世贸中心大楼袭来，四周一片漆黑，没有了眨眼的灯火，没有了流动的灯火。没啥可看了，于是，我们登履带式电梯，到一百一十层顶层的晾台上观光。

顶层晾台上，已有许多西方人、亚洲人、拉美人在那里消遣了。向下俯瞰，依然黑蒙蒙的漆黑一片。只有中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帝国大厦宝塔型的顶部灯光，依然清晰明亮，与我们脚下的世贸中心大楼遥遥相对。这两幢摩天大楼都是写字楼，为多家公司所租用。水泥钢骨宝塔型的帝国大厦内有四千多家公司，名单列在一楼四壁，标明各家公司所在的楼层和电话号码。钢架玻璃结构的世贸中心比它高了八层，有着四万九千吨重的世界最大的单一空调系统，可给一万五千个房间供冷。光窗户就有四万三千六百个，六十万平方英尺玻璃，由自动洗窗机洗玻璃。

许多美国人在拍照。哦，原来这顶层晾台上也有一景，那就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悬在空中。我猛然想到，原来乌云遮过的高度没有达到这顶层，也没有达到帝国大厦的圆顶，而在它们顶层的下方五六十层的部位上。而在这顶层上，依然是一派晴朗的天气，当然，我们也是在那乌云的云端之上了。哦，我感到那月亮分外明亮，不知是楼高还是月低，此时的她比往时看到的高度要低下许许多多，离人们很近很近，似乎举手可摘。真的，她在向后躲闪，躲着人们的手呢。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已不是高高在上地在人们的头顶上，而是在人们的身侧，是的，那感觉她就在人们的脑前，或者是在脑前偏上的地方，怯生生地盯着你，生怕你把她摘了下来。

我们重又乘电梯下来。同上去一样，耳膜凸得如同乘飞机起飞和降落那般难受，直到地面始恢复正常——楼，确是太高了。

走出世贸中心，发现刚刚落过了雨似的，马路两侧流淌着潺潺细流，不禁环顾四周楼房，亦都水洗过一般滴着水滴。我于是恍然大悟，在瞭望厅上看到遮住全城灯光的乌云，那是雨云——全城在下雨啊，而在顶层上，却是一片阴云也没有的大晴天。方才，我们原来是置身于晴雨同一时刻里，真好似被美国著名魔术师大卫的魔法所捉弄，实际

上，是楼的高度在作祟。我走过了几条马路始得仰首向楼顶看去，哦，好一幢摩天大楼！

由于四岛五区这一地理环境的限制，纽约地价寸土尺金，只有向空中拓展，向上帝要土地了。我想，这会是纽约摩天楼林立的主要原因。游过纽约，令我蓦然感到，纽约这个世界级大都会，原来是搭在楼的森林之上的。

发表于1995年第5期《海燕》

记上田喜代子

张景勋

如果遗传基因绝对有灵，上田喜代子女士的丈夫便不会过早地离开人间。她公公于1978年逝世，享年87岁。她婆婆于1994年8月15日去世，享年101岁。公婆的平均年龄为94岁，即使丈夫活不到94岁，也该是公公的享年吧。然而，天不遂人愿，上田喜代子的婆婆刚过世不到一个月，她的悲痛的泪花尚未干，1994年9月13日，残酷的现实降临了，无情的死神又夺走了她亲爱的78岁的丈夫，这使她陷入无比的悲苦之中。上田喜代子朝夕相依的伴侣走了，唯一的一个儿子郭昂又移居海外，年逾古稀的她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那该是多么孤独，生活多么难熬。于是，大连高尔基路的一座日式住宅，便空空如也。上田喜代子也移居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

上田喜代子的中国名字叫郭喜代。我认识郭喜代女士，那还是10年前的事。1985年8月中旬，我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要采访埋头苦干于科研的中外专家。化物所工会的同志告诉我，可到图书情报研究室去采访高级馆员郭喜代。说这位日本籍专家是郭沫若的大儿媳妇，她的事迹生动感人。于是，我又来到图书情报研究室。

郭喜代是年62岁，职务为课题指导兼国际科技资料交换组组长。1983、1984年，她连续被评为大连化物所先进工作者。虽然她已退到第二线，但工作起来丝毫不减分量。仅1984年，她与国际上581个地区和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人数达831人次。交换本所没有的资料达880份，而且不少是非卖品。她同日本交换的颇有价值的膜处理资料，国内17个兄弟单位要求复制。通过资料交换工作，收集了大批专题催化文献，为科技人员出国进修选择单位和导师提供了情报，为国外学者来所讲学时需要了解该学者发表的文献提供了信息。郭喜代编写的《编制催化为主的国际新情报的二次文献数据库》，被1984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研究会选为重点交流文章之一。她工作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她提出图书管理的规范化问题，受到行家们的称颂。她乐于助人，在所内传为佳话。郭喜代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有一年，她患肝炎病休息，按照我国劳保规定，工资照发，可她一再回拒，说她没工作，不应拿报酬。累计的5000元工资，她一直不领取，最后她欣然捐给一所小学校，受到大家的夸赞。

我在办公室等候。片刻，研究室的同志把郭喜代请来并介绍给我。

“请多关照！”她温文尔雅，施行了日本的礼节。

我说：“您的事迹我略知一二，颇为感人，了不起。请您谈谈。”

“不成的，我不同意报道！郭和夫也不会同意报道我。你要报道就报道我家太太夫人！她值得报道！”郭喜代执意不谈她的事，便有礼貌地告辞了。

从此，我再没有考虑采写她的事。因为我知道郭喜代的丈夫、郭老的长子郭和夫先生，为人真诚耿直，说一不二，他们夫妇定下的“规则”，连丈夫本人也不同意报道他自己的事。星转斗移，数年来，我确实采写过郭喜代称之为她家太太夫人、郭沫若日裔夫人郭安娜女士的中篇纪实文学《郭安娜》。不过，郭和夫先生再执意不报道他，也拗不过记者的“好事多磨”，我总算也写了一些有关他的文字。然而，郭喜代的文章没有完成，则老是我的一块“心病”。

去年，我正要再生采写郭喜代女士的念头，不幸的事发生了。郭喜代的婆婆郭安娜女士刚逝世不久，她的丈夫郭和夫先生因公出差途中，在哈尔滨突然病倒，因脑出血病情严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逝世。这对郭喜代的打击太大了。她随丈夫郭和夫在大连工作、生活了40余载，丈夫历任大连化物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副所长等职务，并被选为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郭喜代料理完丈夫的丧事后，便离开她大连的家。

上田喜代子女士要和她的爱子郭昂住在一起，儿子在日本一家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儿媳妇是日本人，是个医生。人老身边喜亲人，再加上两个绕膝的小孙女，上田喜代子可以在那里一享天伦之乐。她说，她虽然迁居川崎，但她会往来于这一衣带水之间，因为大连是她的家，她在这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浓厚的人情沉淀在这里。这里不仅有她多年相处的同事和友谊常在的朋友，更有她的忠贞丈夫安息在青山绿水的乔山公墓，她是会常来探望他的。

发表于1995年5月18日《大连日报》

儿子的世界

杨道立

还在我腹中对我拳脚相加时，我就断定，这个从我体内分裂出去的生命，定是个赳赳武夫。果然，那一声啼哭，大有刺破青天锷未残的锐气。虽然我们相见的第一面彼此都很丑，但谁也不嫌弃谁，他当然说不出什么，而我也只有默默地许诺：尽我所能，给他快乐，给他幸福。这个大手大脚大鼻子大眼睛的大块头，就这样一天天长大。我也一直在盼着和他对话。但儿子的话很经济，能用目光和点头、招手示意的，他就免了话语，而且刚刚能使用词汇，亦就极节省了。

稍一长大，儿子便活得不轻松了。提琴、钢琴还有唐诗宋词，对他组成了全面的“围剿”，他挨打受骂，但喜怒哀乐却很恣肆、很洒脱。最有趣那眉头肌，一拧一蹙，常做思考状，且不时沉默半天。一次在餐桌上，他停下筷子，手抵下巴颏，目视前方，似已入境。我们不知他要发表什么，配合地缩小了咀嚼声。“咱们现在哪都好，就是计划生育不怎么好。”他说。我一面喷饭一面朝他喝斥：“说什么反动言论！”他索性搁下筷子，继续阐释：“小孩在妈妈肚子里往外跑，说，我要出来我要出来，你们在外面摠住，说，快回去回去……唉！”他发出一声惺惺惜惺惺的叹息，一脸的困惑与悲哀。这个问题真是太大了，要用三言两语说服一个学龄前儿童真不是易事。但从此后，我注意到，必须对他进行性启蒙教育。对他的教育跟不上，很可能出现心理畸形。我想至少从这一天起，我的主要交谈对象，便是儿子了。

老人们留下的话总是闪着智慧的光芒——“七岁八岁讨狗嫌”，我的儿子正是如此。丢书包，晚回家，乃至需要动用派出所的力量去追踪他的去向，我为他而憔悴，而暴躁，一张妈妈嘴变得絮絮叨叨。这一天，我把他叫到跟前，我就不信，积30余年生活之经验，打动不了一颗浑然朦胧的心！两个小时训话之后，我屏息静候他的回答。我猜想，即使他不从此要当爱因斯坦，也可以下决心为长大开好拖拉机刻苦学习，或立志保卫国防而早起锻炼什么的。“说，你将来究竟最想干什么？”激将出真言，我寄希望于此。“我说真的吗？”他怯怯地问。“真的。”我严厉而又欣喜——那颗小脑袋里装着什么秘密呢？他咽了口唾沫，说：“我想来想去，还是玩最好。”那分郑重，由不得你去笑。

我撒气了。经历了如此“白色恐怖”，对于“玩”这孩子的天性，他还是矢志不移，我实在不忍心去戕害他的真诚和纯洁。唉，我叹了好长一口气，儿子啊，我陪着你慢慢长吧。

他是辽宁省十小画家之一和全国优秀少先队干部的身份进入中学校门的。当然，儿子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干扰时，我们都把自己的打算向对方通报，在才智上、情感上，我们彼此依恋，相互给予。眨眼间，他进入升学的紧要时刻，我不得不摆出长辈的威严：“听着，不许生病。”我并不反对儿子吹着口哨向前进的现代生活作风，但知儿者，其母也，我必须提醒他要抓紧。

偏偏大祸临头。待我赶到病床边，儿子断了的腿，已被紧紧缚住不能动弹。我趴在床边，不知该说什么。儿子显得非常不安，抓住我的手，歉意深深地说：“妈妈，真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还能责备他么？当第二次接骨失败以后，我们都陷入恐慌。是夜，他抱着我放声哭叫起来：“为什么我看不见天空，看不见大街，我就要一辈子躺在床上吗？”一切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我只有狠下心来，让医生将接上的部位拉开再接，再拉开，再接。我相信我儿子是好样的。

我们要上班，家中陪伴他的，是他心爱的中华学习机和他一天也不可或缺的音乐、书籍。整整5个半月没有上学。当他终于可以像正常人那样自己背着书包去上学时，儿子忽地成为1.78米的英俊少年了。他是那么富有生气，抓紧享受着活泼泼的一切。当他在中学生手抄报比赛中拿了个全市第一之后，又提出要参加东三省及内蒙古10城市的中学生计算机比赛。我是电脑盲，无法判断他已有的程度，但就像战胜腿疾一样，我相信儿子的勇气。整整一个暑假，他没有出门，每天坐在机器前敲得汗流浹背。看着他忙着操作连冷饮都顾不上喝的投入劲，我时不时想起关于“玩”的那场谈话，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林大树老师很想见你，你不去看看他吗？”他没有停下来，只是点点头。我隐隐有了担忧：现在的孩子，莫非把竞争看得大于一切？临到赛前的深夜，儿子还在帮别的选手修改程序，我很欣赏，但只是默默地支持，其实我又多了一分担心，这样帮助竞争对手，他能拿第一吗？

那天晚上，儿子回来得很晚，我不敢开口问他比赛结果，虽然事先我向他讲了不少淡泊名利的大道理，但最想拿第一的，是我这个望子成龙的妈妈。他说得很平静“妈，我的名次出来了，明天下午咱们去看林老师吧。”和林老师相见的一幕很是感人。儿子对老师说，没有他在小学六年里手把手地教他画画，他不会顺利地制作出动画软件。

“我是毫无争议的一等奖。”学生这样告诉他的恩师。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想起每回有个什么小成功，耳边总有人叮嘱着，别骄傲，别翘尾巴，自然觉

得有必要跟他叨叨几句，因为今后他要攀登的高峰很多。像所有我们这一代人曾经背过的诗那样，我讲起“麦穗低下沉甸甸的头”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他耐心地听着，直到我发挥彻底。这时，他睁着黑黑的大眼睛，有几分不解地望着我，说：“妈妈，你以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吗？东三省、内蒙的电脑水平，是很低的。和上海、广州根本没法比。我在这里拿一等奖都这么吃力，明年参加全国比赛……”他突然打住，大概是怕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哑然了，但我很幸福，我们是该抓紧讨论今后的事情了。

于是，我，一个矮小的、没有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女人，同一个高大的、对现代科技有着浓厚兴趣的男子，开始为一个新的题目愉快地筹划起来……

从江上看两岸

杨道立

倘若我说长江是神州的动脉，是中华的乳泉，大概不会有人对我进行指责，许多人已经这样比喻过了。我相信即使是重复也是倾注了某些个人的真情。

但我说长江是中华的手臂。

这是一个折射的意念。

长江两岸，那有人烟和无人烟的山坡上，那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的栈道口，被紧挽的“手臂”连成了不断的线：船在长江航行了四天五夜，日夜相望，不见那“手臂”垂落，这长线缠住了我的肝胆魂魄。

我究竟看见了什么？

同行人一再问：“你数什么来着？”

我反问道：“你看见电线的起端了吗？”我拉他转到船尾，两岸青山立时如大门洞开，豁然入目。“看！左右开弓——同样的电线杆，撑着两条电线，沿江伸去……”是为了照明？为了通讯？还是国防建设的专用？没有人回答。只见那越过村寨城郭，紧贴山壁依次排去的电线杆，衬水性风姿，格外显出庄重。让人不由得想到国宾馆门前的卫士，投在眉宇间的表情，只服从神圣而剔除其余。远远望去，百把米的距离，就有一根新的电线杆把前头扯过来的电线送往再前头，那杆子的笔直、电线的衔接，实在像挺胸展臂的武士，指腕相扣，便将心的热流贯通全军。哦，在开阔的视野里，那电线杆和电线都太单薄太清寡了；可这人为的纤纤细物，实在比百媚千态，雄浑厚重的青山翠峦，更让我感悟到一种精神的力量。因为那不靠地壳运动，物质衍化自然生就的奇景佳丽，是在体现人类自身改造社会，求索真理的意志。

我不能不关心是谁，又是如何，将那些沉重的杆子和电线，安放到指定的地点。

走山路？常常见不到山坡上有履痕蜿蜒，哪怕羊肠小径，也难以开辟；脚踩在哪儿呢？安全带的依托又缚在哪儿呢？明明见巉岩上立着杆子，并被格外用铁链和木架作了加固，使其险而不危，却无法想象施工人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走水路？岸陡壁峭，不是码头船难靠上，即使有那玲珑小舟的栖息之地，又怎么截得住巨大的圆柱并送往山腰？偏偏在那科学测定的必需处，要杆有杆要线有线，仿佛自然天成，与山水同宗。

“千里施工，多大的工程，只有靠解放军来完成这个任务了。”我说。

同行的人沉吟片刻，说：“少不了要死人。”

我无语。低头看江水，江水也沉默。恰似人，不说，却是在抑制爆涨的情感。船上的女广播员又在讲三峡古老的故事，说西王母的小女儿，为樵夫驱虎豹，为农人保丰收，为病人种灵芝……音画相辅，传说是动人的。但在我心里，有难以名状的距离感，因为我的目光在神女峰山麓寻觅，并思索着“死人”的字眼，而弃仙境迷现实。我突发奇想，对同行人道：“……我有一个新故事：18岁的战士，从未见过长江，却被派到江岸架电线。神秘的长江从此与他相伴。江涛，取代了母亲烦琐的絮语；江轮，传送着大千世界缤纷的信息。他忠于职责，像江水东去般的虔诚，干活，受伤，流汗，架线，亲手树起十根、百根电杆，也树起了他的人生信念。送电的那天，小战士跌落江中倏然而逝……战友们沿江打捞，呼喊着他的名字，喊叫声在峡谷回荡，直震得村寨灯火齐明；这时，所有的电杆都化作小战士的身影。一个声音在说，长江要我留下，长江要我留下……”

“你把这个故事说给广播员听听。”

我晃头。宣传一种观念比杜撰一个故事要复杂得多。

落日复明，泊船又发，广播员行云流水般的介绍着文人墨客颂诵再三的典故，我收听在耳，却醉发着自己的故事，眼中的电线像心电图的波纹，随心之跳动而延伸，故事的主人公凸现出音貌：忽而是雷锋的亲切，忽而是王杰的淳朴，忽而是那些记熟模样的老山战士的自信。这草绿色的不老形象，带着青春气息，与不老的山山水水交相生辉。我忽然明白，解放军战士特有的牺牲自我造福人民的品德，已在我心里积淀成一种情感符号，一旦受到某种触动，情感符号就迸射出思想的电光，影响我的审美，制约我的思路，导演我的心态！旋即，我思绪翩跹：活着的架线战士，会为自己留在长江两岸的人文景观而自豪么？受福于电能文明的人们，会记住战士的功绩而尊敬这些平凡的大兵么？

枕水而卧，思路荡漾。葛洲坝恢宏的缜密让梦也随之雀跃；长江两岸水土流失，污染甚烈的现状又将甜梦撞成失眠。披衣踱到舱外，“紧挽的手臂”在清月中平添了几分悲壮，令我景仰。我不禁扪心自问：在需要的时候，能否像那个小战士，喜于平凡地活着，安于默默地牺牲？

江水陶冶了江轮的性情。人在江轮上，目光也缱绻柔软了。看山，不仅看山的肌理肤色，还要看山的地位、山的珍藏；看水，则少不了打量长江的流速，核计长江的容量，议论长江的宽宽窄窄，但这毕竟是在欣赏无心无肝的立体画卷。最让游客怦然心动的，是窥见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景中之人。一阵一阵地，当你恨不能伸手抚一抚垂帘

流翠的山田，抓一把穿雨织雾的炊烟，急切地希望有人可与之对视，与之交流的欲望就会搅得你探颈翘首而不惜眼涩背疼。

多半是失望。

越是清幽淡恬，如画若诗的幻境，越是人迹稀罕。突然，在烟岚横黛、瀑布飞泉的画幅里，一个小小的物体在移动。是人吗？是人……是人！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呢？犹如诗眼迸出脑海，精美得让人颤抖又稍纵即逝。“快抓住那小人影儿，跟上他从容执著的步子，”你在心里对自己命令。于是，你的情绪“呼”地漫开了热情，随着他忽高忽低地，在山梁上绕行，在想象的空间起伏。待看清了他的背篓，看清了他那红得如火如荼的衣裳，甚至看清了他的表情，那诗的意境就从朦胧变得明朗，你就不能不盼望他走出神秘，来到人间，与你互诉衷肠了。但是，他木然而立，见多不怪地呆望着你和你乘的江轮，全然没有了你在远望中所见的人影飘移时的那种生动。

嘻，这又何尝不是一次失望。

你曾以为，他发现你会和你见到他同样的振奋。因为他孤单、寂寞，他是更应当为带着繁华气息的人向他微笑而快乐的呀！相反，他绝不反馈什么，极其吝啬地将心灵封闭。你不解，你着急，你想扑上去，扒开他的心扉，辨认其中的冷暖。

“他不会向你伸出手来的。”同行提醒的语气像山岩一样世故。

我却不肯幡然悔悟，依旧挥动着手臂，我相信，对方不会嘲笑我的热情，因为他置遥遥行程于不顾，痴痴地吮吸我的身影。在暮色将尽的时刻，再慷慨的行者也不会把时间送给毫无干系的路人。不知道是艰难的生存殚尽了他的心血，使他连表情神经也砥砺出僵硬的茧子，还是山神的法规限制他学会谋生以外的事情，总之，他实在是羞于呼应旅游人表达情感的文明。

啊，启迪了李杜文章的山川，养育了神情麻木的山民。

赶上来两个孩子，矮矮的，停在他的身旁。书包！我的眼一亮，放下的手臂又重新举了起来。你好，大山的精灵，你好，古老生活中的当代人！无论你们的第一声啼哭是在茅屋的竹床上，还是在瓦房的灯光下，无论你们是随爹爹到集上去用鸡蛋换回盐巴，还是跟老师卖药材买回课本，我都希望你们接受一个陌生人的访问，而享受到交流的快慰和被爱的温馨。为什么你手臂刚一抽动，就犹豫地停下了呢？举起来吧，像长江一样奔腾我们的情感，开放我们的灵性，在彼此的给予中，礼赞生存，膜拜互助。

我的同行也把手举起来了。船栏前的一堆人助威似地挥动着手臂。我们一齐朝那两个孩子，拼命地招手。终于，山坡上，一只小手羞赧地举过头，另一个孩子还用双手加倍地回报，他们晃呀晃呀，满脸泛着快乐的笑容。

船走远了。人们还在寻找那两个孩子：他们的衣服色彩暗淡，时时隐没于岩丛，但那背篓的汉子，穿着血红色的绒衣，一闪一现地，如烛光在跳跃，孩子一前一后追随大人，只要看见血红的一点，就可想见另外两个点的蠕动。这不光是小小的满足。山峦尽管模糊了，许多人还在想，他们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呢？瞧，互相招了一次手，就留下这样多的挂念，人呐，全是因为有情感，才活得有滋味，有想头。

逆水行舟，南征考察，我拜谒长江已是数月以前的事情了。我常常回忆这次旅行，每每思念长江，那电线的象征和招手的细节，就会响起瓷实的基音，在我心的宇宙轰鸣。我终于彻悟：手，是袒露在外的心；手，是无限延伸的心；手，是输出爱和献出力的心！慢慢地，长江化作一只巨臂，从唐古拉伸向东海，从远古伸向当代，把中华的爱和力，献给世界……

银带蛇酒

刘汝达

黑厚的云层罩了小山村，又大又密的雪片漫天恣肆，窗纸像有无数大蛾撞击，沙沙沙。心情总也不开朗，又是大年初二，青年点的同学都回城过年了，为了表现自己，我主动要求留下来看点，这时的心情就更阴暗。于是，决定弄几个菜，晚上请客。

天完全黑透的时候，牛师和尚司徒贼一样溜了进来。大过年的，我们喝几杯，我说。二人惊了一下，不能说我们开黑会吧？望望窗外面黑洞洞的夜色，悄悄坐了下来，我拿出一瓶高粱老烧，说，为取得更好的改造成果，我们先干一杯。二人说，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是知青，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才是来改造的。我说，一样一样，干！尚司徒擎起酒碗，嘟噜嘟噜说了一串外国话。牛师说，什么意思？敬祝万寿无疆，是英语。你还敢说外国话，不怕挨斗？尚司徒立时吓着了似的，又错了么？我说，世界各国人民都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没有错，没有错。大家嘻嘻笑起来。

牛师、尚司徒原先都是大学的助教，听说1957年那阵就有问题，去年秋天被遣送这个穷山沟当“五七”战士，往日里我和他俩亲近，也谈得拢，常从他们手里抠本好书看，他俩对我放心，知道我不会出卖人。

酒至半酣，尚司徒说，当年曹孟德青梅煮酒论英雄，牛师说，今天我们是高粱老烧论狗熊？尚司徒不服，焉知没有鸿鹄之志？一句话激起了他们的某根神经，语气一扫颓唐，变得大气而沉雄，人生、理想、社会被他们阐释的如此透辟，言词充满灵动的个性光彩。进而激愤了，凭什么这般改造我们？什么叫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是一个人的脊梁，是整个人类前进的璀璨灯塔！

这就是整日战战兢兢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原来他们不但有知识，还有气节！

在我的记忆中，尚司徒每次参加队里开会都揣上两盒“大生产”香烟，队长是个烟鬼，尚司徒一见他来了，赶忙撕开一盒，哈着腰敬上去，然后悄悄坐在队长身后的暗影里，队长刚抽半截，就捅过一支，每次开完会，队长耳朵上都夹一支或两支烟卷，兜里揣许多半截“大生产”烟头，高兴地哼着小曲回家。那时尚司徒不敢送整盒香烟，心里没底，叫人揭发出来可了不得。边开会边吸支烟很正常。时间长了尚司徒还真被队长表扬过几回，尚司徒蛮高兴的。

牛师是南方人，爱干净，刚来时衬衣领总是很白很白。晚上开会队长就说了，白的扎贫下中农眼珠子！发配你到这来是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那一套赶紧丢到粪坑里！从那以后，牛师变得十分邋遢，还在腰上捆了根稻草绳。有一次，他在队长跟前猴子似的挠身子，说，生了虱子了，队长说，这就对了，说明你和贫下中农近了，穷生虱子富生疥，俺贫下中农穷，越穷越革命，懂么？懂懂懂。牛师一脸卑琐的样子。一瓶老烧喝光了。还有没有酒？他俩瞪着红眼球问我。我秋天在山里捉了一条银带蛇，农民说这蛇毒性大，泡酒治腰最好，我已蜡封了五个月，准备捎回城里给父亲喝。我拿出来，酒呈绿色，瓶底盘一条小蛇。这是银带蛇酒，你们敢喝？我说。

什么酒不敢喝？打开！他俩还说东汉的张仲景明代李时珍都有关于蛇酒的论述，又说，他们的腰也很不好，受了病，软塌塌的不硬朗，需要治。喝得更为来劲，谈话的声调也从激愤变为悲壮。

夜色已深，他俩异常兴奋踉跄走了，不知谁还嚎了几嗓子，解恨似的，可第二天一大早，他俩不约而同跑到青年点，把我堵在被窝里，直问，昨夜说了什么吗？酒后狂言，不事张扬，还要好好改造……我迷惑地望望他俩，懒懒地说，我也喝大了，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相信酒精的作用，却怀疑银带蛇酒的功效。

乡情赋

修成国

1

乡情，是久居家乡的人对家乡产生的一种留恋之情。

乡情，是远离和久离家乡的人产生的一种思念之情。

乡情，是人们情感世界诸种情感中的一种重要的情感。

古人对于乡情有过很多深刻而生动的描写。《诗经》中写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屈原在其《九章》中写道：“愁叹苦种，灵遥思今。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更有唐代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陈子昂的“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等尽人皆知的名句。宋代陈师道在《九日寄秦观》中写道：“九日清樽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毛泽东同志在七律《到韶山》中也曾写道：“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尽管三十二年前故乡还笼罩在旧社会的黑暗之中，但他对故乡仍是一往情深。

故乡之情，没有“离异”，没有“反目”，没有因时间长久而产生的淡忘，没有因贫困坎坷而产生的怨恨，更没有那种无情无义的背叛。作为游子，故乡越是贫穷，越是十倍百倍的牵肠挂肚；离开故乡的日子越长久，思念之情就越是浓烈；越是在他乡遭到磨难，就越是想回到故乡的怀抱；越是于他乡万事如意，就越是感谢故乡的养育之恩……

故乡情，是人的感情世界上最深厚最淳朴最美好最长久最浓烈最忠贞最伟大的一种感情。

2

故乡情，仁父慈母的养育之情。

是父亲那辛勤劳动的身影，是母亲那充满深情的呼唤。骑在父亲脖子上看戏，躺在母亲怀抱里睡觉；跟着父亲下地间苗，扯着母亲衣襟上地摘瓜；上学贪黑回家，村头路口，是父亲那焦急等待的身影；顽皮淘气，上树爬墙，是母亲那耳提面命的殷切叮

嘱……乡情，染透着父母之爱，留下的是永远的甜蜜，永久的温馨，永世的感激。乡情，融入父母之爱，才如此的无法淡漠，无法替代。

从普通百姓到领袖人物，对于乡情都无法拒绝无法摆脱。曾叱咤风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胸中荡漾着浓浓的乡情，他曾于6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回到故乡韶山，去拜访乡亲，去为父母扫墓。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占领奉化时，毛泽东曾于1949年5月6日致电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1956年春，毛泽东委托赴香港的章士钊先生转去一封中共中央致蒋介石的信，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办法，信的末尾处，毛泽东动之以情地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众人皆知，溪口是蒋介石的故乡，那里有蒋母之墓。此信曾牵动了蒋介石的悠悠乡情，后来因国内外种种原因，和平解放台湾未能实现。

3

故乡情，兄弟伙伴的手足之情。

是两小无猜永不记恨的玩耍打闹，是天真无邪的心灵碰撞，是微弱能力之间的相帮相助，是纯洁无私的感情的交流。

荡秋千捉迷藏娶媳妇过家家，追飞蓬拣庄稼挖野菜摘山梨……高兴时手扯着手又蹦又跳，恼怒时打拳踢脚直哭直闹，转过身来，眼泪未干，又热热闹闹有说有笑。幼小的心灵，那么纯净那么无瑕，不会给别人使坏，也无须防备别人的不测。故乡童年的感情世界里，没有怨恨没有忧愁没有嫉妒没有猜疑。童言无忌，骂人像音乐般动听，打架似演戏般好看。

唐朝诗人王维那“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著名诗句，将故乡儿时的兄弟之情凝结在字里行间，千百年来一直令人为之心动，且引起人们对童年兄弟伙伴的多少深情的回忆。鲁迅先生对童年伙伴闰土的回忆，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对伙伴的同情上升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对那黑暗社会的憎恶，奠定了其由一个进步青年走向民主主义者走向社会主义者乃至走向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感情的基础。

面对极其复杂的人世，谁不怀念故乡儿时那充满乐趣的生活经历，谁不珍惜故乡童年人之初的那份真情。如果人类能够永远保留着故乡儿时的那份珍贵的淳朴，那份可爱的天真，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4

故乡情，山水田园的留恋之情。

是小院旁杨树的嫩叶，是小河边柳树的长丝；是村道边紫色的马兰花，是田垅旁金色的蒲公英；是粉色的桃花白色的梨花，是翠绿的茶园金色的麦田；是蓝色的海湾柔软的沙滩，是玲珑的小桥丁冬的泉水……

故乡，可能并不富裕，那土地瘠薄含有盐碱，那山顶光秃没有森林，那小河时常干涸遇有洪水又会泛滥。故乡，可能没有风景名胜，没有石窟岩洞，没有古塔寺院，没有名山秀水……然而，在游子心中，故乡永远是美丽的。那片土地，那条小路，那眼水井，那条小溪，那栋茅屋，那缕炊烟……是你走入人间的第一道风景线，是印在你记忆中的第一幅彩照。无论年代多么久远，故乡的山水田园风光在你记忆的荧屏上永不消逝，且越来越灿烂。任何他乡的山水，任何异域风光，都无法将它替代。

“谁不说俺家乡好”，是人们的心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是故乡的亲，水是故乡的甜，月是故乡的明，花是故乡的艳……在湖南作家沈从文的笔下，湘西那古老的小山城茶峒，那沅水支流上的小码头，那江流上的木排，那沿河的吊脚楼……在江苏作家汪曾祺的笔下，普通水乡高邮那紫灰色的芦穗，那开着四瓣小花的菱角，蒲棒通红像一枝枝蜡烛那么诱人，那叽叽叫的小鸡鸭，扑噜噜的青桩鸟，连长脚蚊子、水蜘蛛似乎都令人可爱。还有林青笔下那一向被称为北大荒的三江平原上的摇铃的大豆，呼玛河边枝干挺直的青柳；曹靖华笔下辽远南疆边陲云南苍山的金花，洱海的蝴蝶……尽管祖国处处并非都如诗如画，然而，由于人们对故乡山水有着特别的深情厚意，于是便产生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情感效应，于是在人们的心中，故乡便完美无缺了，便绚丽多彩了，便永远充满着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

对故乡山水田园的热爱，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种共同的情感素质。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笔下，他的故乡顿河沿岸的哥萨克的生活及风土民情，是那么美丽诱人。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对他的故乡莱茵河一往情深，那河中的扁舟，那岸边的菩提树，那落日，那晚霞，在他的笔下都格外灿烂。

5

故乡情，乡土文化的陶冶之情。

是呜呜哇哇的喇叭，是铿铿锵锵的锣鼓；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是江河流水的马头琴；是花鼓戏二人转采茶大秧歌，是驴皮影大鼓书秦腔越调……

故乡的音乐可能有些单调有些原始，然而听起来是那么亲切那么动听；故乡的小戏是那么传统那么通俗，然而，是那么热烈那么淳美。没有多少人去为其投资赞助，没有谁去为其评说颁奖。只因其曲调悠扬动听，只因其内容健康向上，只因其办起来省钱省事，这乡土文化才像大豆小麦玉米高粱扎根在肥田沃土一样，深植于广大乡亲们生活之中，世代相传，永葆艺术青春。

你可能听过各种高级乐器的演奏，钢琴竖琴风琴扬琴，长号短号圆号小号……可未必比得上故乡的二胡琐呐马头琴和三弦，未必比得上横笛竹板梆子和牛皮鼓；你可能听过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和巴赫这些乐王和乐父的名曲，可未必比故乡的山歌和信天游更悠扬更醉人；你可能看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可未必赶得上花灯、采茶和二人转令人忘情。孙犁热爱乡土文化，创立了“荷花淀派”，后来又被刘绍棠营造出一片“运河滩文学”；赵树理立足山西开创了“山药蛋派”。还有贾平凹的“商州文化”，叶蔚林的“潇水风情”，周立波的“茶子花”，古华的“芙蓉镇”，正是这些一乡一地的各具特色的文化溪流，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汹涌澎湃的海洋，正是这些一片一簇的颜色各异的乡土文化的山花，繁荣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的百花园，正是这民族文化的沃土培育了世代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

6

故乡情，村姑乡妹的爱恋之情。

在小村的井台边，姑娘给你送去微笑；在村外的小河旁，姑娘为你洗过衣裳；在山坡桃园里，你和姑娘并肩劳作；在田野的青纱帐里，你亲过姑娘的脸庞……

故乡的春风里，飘荡着你们欢乐的歌声；故乡的月光里，闪动着你们绰约的身影；故乡的沃土里，孕育着你们共同播下的种子；故乡的土炕上，活跃着你们爱情的结晶……

村姑乡妹虽然皮肤不那么细嫩，但有着一双勤劳灵巧的手，描写青山滴翠大地如画；村姑乡妹虽然不那么能说会道，可有一片温柔善良的心田，她们爱得专一执著，恨也恨得无所畏惧。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丈夫去当兵，为妻将你送一程。”“春风杨柳开百花，站在门前想起了他，河水流不尽心里话……月上柳梢会冤家”……当你

离开故乡后，心上人的微笑，将永远荡起你心湖的涟漪；心上人的叮咛，将永远吹响你心阵中的号角。虽然你和故乡千里万里，心上人永远同你在一起；虽然征途上有千难万险，心上人永远伴你度难关。

7

故乡情，父老乡亲的信赖之情。

是春天田垅上充满希望的禾苗，是秋天令人满足的金黄稻菽；是一间间能遮风挡雨的泥屋土窑，是热腾腾的小米饭猪肉炖粉条……虽是低等温饱，却在心中产生了强烈的信赖和依靠——故乡对于游子，是叶的根，是鸟儿的巢，是鱼儿的塘，是船的港。

故乡可能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柏油马路，没有音乐喷泉，没有灯红酒绿，但那黄土地黑土地，看一眼就使人踏实，踏上它就力量无比。煎饼卷大葱羊肉泡馍虽不如山珍海味，但吃起来可口，是它养育了无数的儿女；泥房土炕虽不如高楼大厦，但睡出的娃娃个个结结实实。你无论走到哪里，想起故乡，就感到甜蜜，就感到年轻，就感到坚强。

故乡，不仅是你成长的摇篮，还是你停泊的港湾。著名作家峻青在遭受磨难时，曾深刻地吟出“每逢苦难倍思亲”。很多游子在仕途或生活中遭难时，首先想到的是回归故乡。宋代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在祖国山河破碎的情况下，极力主战。在其爱国和报国壮志得不到实现并常遭排斥的情况下，数次回到故乡山阴（今浙江绍兴），并深情地吟诗：“南村北村鹁鸽声，水刺新秧漫漫平。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陆游一生为官，曾到过福建江西四川甘肃，走遍大半个中国，最后仍回到故乡，终老在故乡。曾任过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寄居国外10多年，尽管物质生活并不薄，但还是在晚年毅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实现了落叶归根。

8

故乡情，爱乡及国的忠贞之情。

是伊犁河的月光，是漓江的烟雨，是逶迤的五岭山脉，是辽阔的三江平原，是雨后的西湖，是雪裹的贺兰……是几亿儿女的故乡，组成了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壮丽画卷，是每一个人的故乡情，汇集成势不可挡战无不胜的爱国波澜。

“山河破碎人难聚”，“日月不圆家怎圆”……从故乡情到爱国情，是横向的凝聚，纵向的升华。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一曲《苏武牧羊》唱了十几个世纪。汉朝

爱国志士苏武一方面思念亲人，忍受着“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的亲人离散的痛苦，一方面“心存汉社稷”，“任海枯石烂，大节不少亏”，“宁叫匈奴惊心破胆，拱服汉德威。”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在匈奴过了19年“渴饮雪，饥吞毡”的备受凌辱的生活。在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子里，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激起了流离失所的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为了恢复家园，为了国家的完整统一，人们高唱着“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战歌，冲上了抗日第一线，终于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争，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激励多少年轻人，把保卫美丽的家乡同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融为一体，他们放弃舒适的家庭生活环境，“为了你的建设更加美好，我愿驻守在风雪的边疆”，已成为新一代边防战士的誓言。这里，乡情已不再是单纯的思乡恋乡，已经升华为一种伟大的爱国情怀，升华为一种伟大的忠贞之志，升华为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升华为人类最高尚最美好的情感。

9

故乡情，是普通的感情，又是神奇的感情。

故乡情，是朴素的感情，又是神圣的感情。

故乡情，不仅仅是离开故乡的游子独具的感情，而且是每个人都固有的一种感情。

前几年从报刊上看到，在国家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提高的情况下，我国西北部的一些居住在偏僻荒凉长年缺水的山区的人们，生活仍处在困苦之中。当党和政府为了使他们摆脱贫困，决定把这些群众迁出山区，帮助他们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安家落户时，那动员工作极其困难，原因就是那些群众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对那长期生活的地方一往深情，宁可受穷也不愿离开。这其中不能排除落后保守的观念，但更多的是一种故乡情结，他们不愿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那片黄土地呀！也有一些在农村生活惯了的老年人，来到城市，住进高楼大厦，睡着柔软的席梦思，使着一拧就来的自来水，用着一点就着的煤气……但他们住上一些日子，便要回到乡下去，他们宁可去住那茅屋，睡那土炕，喝那井水，烧那山柴……

故乡那草那树，那稻那果，那牛那羊，那鸡那狗，那屋那墙，那溪那河，那路那桥，那日那月，那风那云，那雨那雪，那人那事，那情那景……故乡的一切，在人们日日月月年年的生活中，已成为人们完整的生活乃至生命的组成部分，不能泯灭，不能动摇，不能伤害，不能割舍。

啊，刻骨铭心的故乡情

1996年4月

珍藏亲情

毕馥华

在老母亲留下的遗物中，有一个牛皮纸小信封，它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邮局特制的保价信封，里面装着100市斤全国粮票，这沓粮票的外面还裹着一张邮局填写的保价单。这是我那在西安工作的二哥寄回家的。老母亲就这样原封不动地珍藏了不知多少年。

我捧着这些如今已变成废纸的粮票，读着这历经沧桑的历史遗存，心里一阵阵痛：二哥远在贫穷落后的西北，拖家带口，何以竟能从嘴里省出这许多口粮？在那时，这是一沓可以救活一家人的纸片片，为什么在家里粮食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没舍得动用一张？我猜，母亲一定想到二哥二嫂和两个孩子勒紧裤带省出这些生命之食的情景，才不忍心去动用它。老人把那一一张张纸片看作是儿子、儿媳和孙子们送回家的一颗颗爱心，爱惜着，珍藏着。

在我们兄弟姊妹当中，二哥在家里生活的时间最少。因生活所迫父母曾把二哥和二姐送到乡下的爷爷家读小学，直到念中学才回到父母身边。二哥初中毕业考入沈阳的航空技校，其后就随全班一起被分配到千里之遥的西安郊区。在那荒凉空旷的原野上，在实现造飞机理想的建设者队伍中，有着二哥年轻的身影。从此，一杆焊枪一握就是40年。在国产飞机上有二哥的血汗，也许可以称之为：二哥与他的同学们是为祖国的航空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所经历的艰难与思念亲人的痛苦又有谁知道？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对故乡和亲人的感情最深最浓。二哥在家时感受到的亲情和温馨，在他游子的心里已成为亲切的怀念和向往。那份刻骨铭心的爱成为他节衣缩食的动力，并随着一张张汇款单，一件件包裹飞到家里……以他那微薄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怎么可以不顾及孩子们的发育成长，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呢？家里的父母和姐妹都为此而心疼焦急，多次写信劝阻，可二哥的回答总是：我们过得挺好。母亲曾无奈地说：这孩子吃苦真有个“彪”劲儿。

然而二哥的“彪”劲儿却让我敬重，令我心痛，那里面全是浓浓的亲情。有一件事让我永远难忘。

在那个买东西凭票证的年代，大连的蔬菜特别缺，凭菜证排长队也难买到新鲜的时令菜。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天刚亮，二哥突然风尘仆仆地回到家里，手里提着旅行

袋，身上背着一个行军背包似的大包裹。家里人全都心疼地埋怨他怎么不先拍个电报来，好去火车站接他。二哥憨笑着解释说，归心似箭，争分夺秒往家赶，在北京干脆没出站就换车了，没法拍电报。他让我把那个大背包打开。背包上的一道道手指粗的绳子，让我颇费了些力气。背包解开了，我却愣住了：摊在我面前的竟是几十斤的豆角！父母疼爱地说，不该为这可吃可不吃的东西受这份累。二哥告诉我，听同事讲大连缺菜，豆角很难买，爸爸妈妈爱吃豆角馅包子，他背些豆角回来给老人包顿包子吃。余下的分给姐姐家一些。在他脱去衬衫洗脸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肩头上有两道被绳子磨破露出血丝的伤痕。父亲心疼得直摇头叹息，母亲抚摩着二哥肩头的伤痕，已是满眼老泪。二哥依然憨笑着说不要紧。我望着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二哥，仿佛看到他背着沉重的包裹挤在火车上的人流中，仿佛看到他没有座位站在车厢过道里却不肯坐在背包上，仿佛看见他出大连火车站时因超重被罚款的尴尬……我感到心里好痛好痛，鼻子一酸，竟什么也说不出口，忙低头去收拾豆角，泪珠却一滴滴落在豆角上。

现在，宽敞明亮的农贸市场或琳琅满目的超市里，摆满了产自天南海北的新鲜的瓜果蔬菜。每当徜徉其中，面对这些翠嫩欲滴的新鲜蔬菜，真乃感慨万千。在欣喜之余，一丝伤痛就会悄然涌上心头，二哥在老母亲仙逝之后也随着走了。从此，我再不敢碰豆角馅包子，怕它触发我心中永远的伤痛。

母亲留下的那只装着粮票的信封，我也照原样珍藏着，珍藏着这份令人心痛的亲情。

发表于1997年4月18日《大连日报》
获“丽英杯”有奖征文一等奖

德拉瓦的鸟群

王正寅

我的女儿女婿居住的德拉瓦州纽瓦克是一座美国东部地区的学府小城市，城市因德拉瓦大学而诞生。此所大学已建校二百五十余年，早在美国建国前就有了。因为城市小，市中心和居住区与别的美国大城市不同，是连成一片的。居住区内均被绿油油的草坪和粗大繁茂的树木环绕和包围着，除了马路，不露土色。美国城镇的居住区多半规划整洁，马路为水泥或柏油铺就，马路两边是别墅式的木制的或镶嵌着造型别致的砖石贴面的歌特式或维多利亚式的住房，而且多为一层、二层，不超过三层。各家各户房前屋后花团锦簇，篱笆上和绿树上也挂满形状各异色彩鲜艳的北美的花果。小松鼠一只、两只、三只……树上树下吞噬着它们喜食的果实。每天早晨，未等出门，只要一开窗户，花香伴着草香就会扑鼻而来，立刻神清气爽，通身舒畅。

我和妻子到美国探亲，正是深秋季节。一天下午，女儿女婿要开车带我们在公路上兜风，探寻北美的秋光秋色秋情。我刚钻进车里，不经意地向天空掠过一眼，突然被一种奇异景观所震慑，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景象，一大群足有上万只的飞鸟，掩过晴朗的天空和高悬的太阳，遮天蔽日地从西南方向飞了过来。我想，这或许是北方飞向南方过冬的季鸟吧，然而方向不对，它们明明是来自西南面的。女儿告诉我，它们就是本地的留鸟。果然，它们逐渐化整为零，一小群一小群地落在住宅区建筑物四周浓密的绿林中，寻觅过夜的栖所；有的飞到屋前草坪上，搜寻食物。因此我可以走在他们中间，观察它们绿颈黑翅耀眼的秋毫和跳跃啄虫的生态。而他们见了我也毫无惧色，只不过略略抬头看了一眼我这大惊小怪的外国人而已。是啊，不必大惊小怪了。以后的日子里，这样的景象已经司空见惯，异常也便成了正常。

女婿驾车故意低速行驶在各住宅区的汽车路上，以便让我们饱览马路两侧在那高矮不齐的白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银色的洋房四周，那浓密的被高烈的秋染红了缀黄了不分畛域然而却修剪整齐的花草树木，一层层红，一层层黄，层层染透，间或绿叶青枝，那落光了叶子结着一嘟噜一嘟噜小苹果的林檎、亮丽的叶子中挂着串串红果的圣诞树，和肥大的密叶中结着硕大果实的广玉兰，巧夺秋韵的同时兼取春晖，令我蓦的感觉到了那分明是一幅幅列维坦的写实油画名作《金黄色的秋天》，是一帧帧吴冠中的抽象水墨《春与线》。总之，这景象是我在昔日的名人画作中所熟悉，却又在今日的大自然

中所印证。女儿让我快把墨镜戴上，景况会更佳，我照做了。果然，那色彩更深刻更鲜明，似乎连画家的笔触都辨得清楚了。妙啊，戴上一副墨镜，如同扭动了彩色电视机的调色钮。

我们的车以55迈的时速转向高速公路，紧贴公路两侧，是剪得齐齐的草坪，连接草坪的是宽阔浓密的护路林带，间或是人造丛林，高树、葛藤、野花同时泼辣生长，俨然就是原始丛林，在这种丛林边上，有时是用栏杆有时是用铁网围起来，并插着牌警告人们因有野兽出没，不得入内。熙熙攘攘入林的鸟儿此时还在不时地从路左飞往路右往返折腾，选择过夜的枝干，有的居然撞到汽车前挡板玻璃上，不幸殒命。女儿说，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岂止死几只鸟儿，从护路林带和人造丛林里窜出跨越公路的野猪、野兔、穿山甲被汽车辗死的事也时有发生。

美国佬侥幸生在这地大人稀的国度里——美国国土九百三十六万平方公里，仅比我国少二十四万平方公里，而人口据1992统计，仅是我国的零头——两亿五千五百零八万两千人，是我国人口总数的零头，除了纽约，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各大中城市，都绝无寸土必争之势，土地闲散，空余很多，从而广植草木，据报章介绍，美国每日平均植树六百万株，以改善“轮子上的公民”国家汽车众多和工业污染所造成的气候恶劣状况，并补充森林砍伐，使美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不但没因大量砍伐而减少，反而比七十年前工业革命的高峰时期还多，达到七千二百万英亩的地步。在城市，不仅高速公路，就是普通快车公路两侧，护路林带和人造丛林，比比皆是，鸟雀野兽生活其中，无节制地繁衍，大有城市如同乡村之概。而且，那些鸟雀不知被上帝如何训练的，它们不怕车，更不怕人。

那天早晨天刚明，我就被窗外的鸟儿吵醒。那鸟儿，有黄的、红的、蓝的、白的、绿的；有头戴缨毛，如同上个世纪美国将军的统帅帽，有甩着长羽翎如同华尔街老板的燕尾服，有脑后插着几支耀眼羽毛的，如同当代美国雅皮士脑后长发，形状奇异多姿，光彩夺目。我打开了窗子，聒噪声立即停止，接着又爆发新的更大音量的聒噪。我想，这是因为它们发现了我，并对我发表议论。是的，我判断对了，鸟儿们竟然跳到离窗户最近的枝条上，侧动着鸟头转动着朝露似的眼睛观察我。接着，便向我啁啾叫起来。那音调美极了，有的是咏叹调，甩着长长的尾腔；有的婉转多变，如叙家常。它们完全是因了我而一展歌喉。想不到，在美国激烈竞争的社会里，鸟儿也会这么强烈地表现自我，可惜我不是公冶长，不懂它们的语言，但我精通仿生学，尽管这是最初级的——口哨，以口哨模仿鸟类的鸣叫，去同它们交流。意想不到的，鸟群中居然有鸟模仿我的口哨，我怎样花腔花调，它也怎样提高难度。我吃惊了，我仔细地看到，那是只黄嘴绿

羽的长尾鸟，一边模仿我的口哨，一边俏皮地侧首观察我的反应。有趣极了，正欲取录音机把这逗人的音响永久地记录下来，偏巧此时两只小松鼠蹿到树上寻觅果实，踏弯了枝头，立刻惊飞了一树的鸟儿，在晨光曦微中拖着它们那黄的红的蓝的绿的锦缎似的羽毛，飞向空中。

女儿看我如此喜爱鸟，晚饭后带我们到本地社区自筹自建的野鸭湾看野鸭。野鸭湾距我女儿女婿的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是在一块洼地上人工挖掘的河道形的水塘，中间架了一座宽桥，宽桥上有俱乐部和凉棚、坐椅，供人们欣赏湾景，水源是从附近地势高的林子里流下来的雨水，水塘其实是个大蓄水塘，四周生满芦苇和湿地的水草。水塘里，不时有鱼群在咬水，我们站在桥上凭栏观看野鸭，然而野鸭在哪里？在居住区内的人工池塘里，难道会真有野鸭生活其中？女儿说，等着瞧吧！一棵香烟未有吸尽，空中出现了雁阵，自远而近，在水塘的上空盘旋翱翔，不一会儿，扑刷刷地落入水塘中。这时我看清了，它们不是大雁，而是绿颈黑羽扁嘴的鸭，但绝不是家鸭，家鸭不会飞得那么高，不会从遥远的上空飞来，它们落入水塘后便开始啄食水中的小鱼，扑打着双翅，嘎嘎叫着，不住地戏水。而有一些野鸭却嘴衔小鱼，飞进水塘边的一所屋舍。女儿说，那是人们为野鸭生蛋孵化所建的孵卵室，而留在水面上戏水的，可能都是公野鸭。

有趣，是野趣。

女儿说，过些天那些小野鸭长大了，母野鸭会把它们成群结队地从孵化室中带出来，那可真是一景！

在以后的日子里，德拉瓦的鸟群已司空见惯了，尤其是夏日的午夜，公鸟与母鸟在树枝上对话，吵得人们无法入睡。而到了冬天，成群的鸟儿钻进住宅的顶棚里过冬，令人们称之为“冬天的烦恼”，我对德拉瓦鸟群的最初印象便淡漠了。

发表于1997年5月9日《中华工商时报》“海贝”副刊

顶针

马述勋

又逢母亲节，我该给母亲献上一束康乃馨。但我今天不想这样做。还是写篇文章献给我的母亲吧。

母亲今年已89岁高龄了。她一生没有享受过金银首饰的荣耀。她那长满厚茧的手上至今仍戴着10岁时坐在炕上“包小脚”时帮姥姥缝补衣裳用的那个现在已经几乎磨平了的“顶针”。她用这种独特的“首饰”感知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嬗递。我每每看到母亲手上的“顶针”，心中就一阵阵翻腾。

一个人的一生会记忆很多事情，也会忘记许多往事，但母亲用一刻也不离开顶针的手，温暖着家，这是做儿女的永远不会忘记的。每个母亲自打子女来到世上，就意味着她终生不宁。我的母亲给我的记忆就是这样一个从不知疲倦的人。每天每天，她安顿了想要安顿的一切后，连大自然都进入梦乡，可她还在那古老的小油灯下用她戴着磨得光亮的顶针的手，用她的心血为孩子们缝缝补补，一针一线编织着自己的心愿。小油灯昏暗的火苗跳跃着，母亲的手指也不停地跳跃着，可母亲的眼神是那么地专注，那么地出神，那么地让儿子心尖打颤。我每每望着母亲无声无息地为儿子像小油灯那样燃烧在漫长的夜，心里好不是滋味。后来，当我离家到外地读书时，每次回到家里，母亲不仅白天端详我，而且在那没有电灯的夜晚，她也总是在小油灯下端详我，然后再默默地一针一线地为我纳鞋底。每当我走的时候，她总是把一双崭新的凝结着深情的布鞋塞进我的背包。从母亲对我的爱抚中，让我感到一个人可以没有财富，没有地位，没有权势，但却不能没有母爱。

从母亲那始终戴着顶针的长着老茧的手上，我看到了岁月的沧桑。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阳光，离不开空气和水，而母亲也如同这一切。每个人从来到世上都会在母亲的怀抱中吸她的奶汁，在梦中想她的面容，在她的信里读她的叮嘱。我的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她博大得却能包容一切。不管儿女们厮守在身边，还是远在他乡，都会有一种血缘的温馨。她从不因贫穷而吝惜给予，也不因富有而显骄矜。

光阴荏苒，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像一棵树，用她的绿阴庇护着我们。现在我们兄弟姐妹像母亲放飞的一只只鸽子，有的在她身边，有的远在外地，但我们都定期或不定期地回到她的身旁看望她。

晚年的母亲初衷不改，总是闲不住那双戴着顶针的手做这做那，但他对我的爱的方式却转换了，我每次回到家看望她，一进家门，她就开始批评，说我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她，又说有时她站在窗前，看到一个人影像我，但一看又不是，她心里多酸等等，直到我离开家门。从来一个不字都不肯说的母亲，现在又没完没了地“批评”，我感到母爱是条河，而且是世界上任何河流都不能相比的河啊。

儿女们在母亲的心里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母亲对子女的殷切期望时时深藏在她那丝丝缕缕牵挂的心怀里。虽然金银首饰是那么耀眼灿烂、金光闪闪，但母亲手上那颗顶针却永远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

空巢

素素

在我眼中，沈阳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城市。

在沈阳老城内，有两组显赫的建筑。这两组建筑不属于同一时代，却挨得很近。一组是爱新觉罗家族留在关外的故宫，一组是张作霖称王东三省时的帅府。那天给我的感觉是出了故宫就进了帅府，从古代一下子就走到了现代，数百年的历史在这里缩成了一条小胡同。在这条小胡同里，它们有一种同命相怜的意味。这些楼虽然个个根深蒂固，却是行帐，是驻扎。这些楼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又是它的结局。因为这些楼的主人虽身在关外，目光却不约而同地盯着中原乃至全国。它们惟一的区别是，由关外入主中原的角色从来都是土著的游牧者或猎人，爱新觉罗氏只不过是最后一个。张大帅则是一个移民者的后代，一个纯粹的汉人，他想给闯关东的汉人开个先例，学那些少数民族的样子，也来他一个入主中原，但他在北京只呆了两年，当他灰溜溜地坐着火车打道回府时，在皇姑屯把命丧了。

也许是一个错误，也许是命中注定，所有从大东北入主中原的英雄豪杰，不论多么长久多么短促，他们都只有出发，没有回程。他们的老家有的成了遗址，有的成了废墟，有的只留下一个记忆。爱新觉罗氏和张氏的老家还算完好，如今也都空着，它们分别以故宫和故居的名义，陈列在这座由于它们而著名而悲剧的城市里。

的确，沈阳因为至今还覆盖着浓重的琉璃瓦，凝固着罗马式的廊柱，因为曾经散布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霸气，飞扬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王气，而使这个城市有了一种别处无法重复的格局。来沈阳的人大概都要经过这条极有跳跃性的小胡同，经过这条小胡同的人大概都仿佛走了捷径似的新奇。因为站在这捷径的两端，既让你生发观赏了大古董的惊叹，也让你怀有人去楼空的哀惋。历史似乎是一个专门为英雄豪杰们画怪圈的魔法师，既能让你登台，也能让你消失，既给你鲜花，也给你墓地。

那天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张氏帅府，居然像早已来过了那么熟悉，是久别重逢的感觉。我知道，我在书里在历史里曾无数次地穿过它，这个院落里走动的人以及发生过的故事，我与它们在书里历史里也都打过照面。我知道，不管你是谁，只要面向东北，就一定能看见这个院落这对父子。张作霖张学良不止是东北的，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

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父子分别扮演了举世瞩目的角色。他们将自己袒露得太充分太精彩了，他们各自那悲剧的结局太出乎意料太绝无仅有了，当人们终于可以从容地打开历史的那一页时，当不论什么人的功过是非都可以平等的姿态拿到桌面上书写时，张氏父子必然由现代人心灵里的特殊珍藏，变成可以自由贬损自由崇拜的人物。

我一直以为，东北人看张氏父子，是看东北人自己的那种会心会意。因为只有东北这块土地，才会出产这样的父子。只有东北这块土地，才会集结出这样的人群。东北人的性格和人格，打着鲜明的东北烙印。东北人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壮。因为这块颜色深沉的土地原本就悲壮。

这就是张氏帅府。

一座红彤彤的中国式的三进四合院。两座青灰色的罗马式大小洋楼。还有七幢红色的北欧风格的小楼群。它们构成了张氏帅府，但不是帅府的全部。在帅府的院墙外还有帅府舞厅和边业银行。还有一幢日式的小巧的赵四小姐楼。可以看出，昔日的帅府是因主人的不断升迁而不断变幻。越变越大，且由中而西，由土而洋。我发现，就建筑而言，帅府的色彩和造型没有风格。然而，没有风格就是风格。它的风格就是随机应变，就是膨胀和暴发。

看帅府，有一种忍俊不禁，也有一种悲凉。它既主观，又露出模仿和装扮。它把殿的威仪王的派头摆设得很足，却又显得缺少底气面目混浊。它的这种矛盾这种土洋参半，让我一下子回想起世纪初中国的图景。

从国外回来的孙中山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他的追随者们一色穿着笔挺的西装，口诛笔伐地要清王朝退出历史，要让中国改朝换代。他的力量太弱了，不得不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还梳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袁世凯。当袁世凯窃国当权，中国人也只是剪掉了辫子，军人也只是脱下了清兵的黑色勇装换上了民国的大盖帽灰制服。中国历史上，也就出现了一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就出现了靠武力控制时局的那一批人物。那时候，在中国的城市里已有了外国人的租界，有了外国的领事馆，在中国的大街上有洋兵洋绅走来走去，这便让那些土生土长的养着三妻四妾的军阀们纷纷地弃土崇洋。

张作霖的四合院，还是仿清宫王府的样式，那幢大青楼，则是照着天津的曹家花园建的。那位当过中华民国总统的曹锟当然也是从天津的洋人那里照葫芦画瓢。我看帅府，其实就是看中国废除帝制后那一段无序而又滑稽的历史，看那一群野心勃勃又脆弱无比的北洋军阀。

记得那天，我最先走进了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它是帅府的中院。东院是大小青楼，西院是红楼群，它居中间，它也是最初的帅府。张作霖全家搬进这座四合院时，他已是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人们也就从这时开始叫他“大帅”，叫他的家“帅府”。这是一座中国传统的古典式建筑，青砖琉瓦，雕梁画栋，飞檐兽吻挑脊，方砖方石铺地，还有那对面孔熟悉的石狮。在三进院的正房厢房门房乃至山墙的墙裙和础石上，镶有许多寓意深刻的石雕，那石雕有富贵吉祥功名利禄的内容，也有人人皆知的历史典故。在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还有以龙为饰纹的石雕画。龙是朝廷的象征，那时清廷还在紫禁城享有优待，可见这房子主人骨子里早已是不安分。最有意思的是，东北农村盛产的萝卜白菜茄子辣椒高粱谷子，乃至张作霖老家的芦苇河蟹，也被雕刻在石上砖上木头上镶嵌帅府的墙。我想，这就是张作霖，他永远地盯着前面盯着远处，又永远脱不了乡野之气，从萝卜白菜这儿，能看见他淳朴的一角。

在走进这个院子之前，我曾经读过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麦柯马克写的《张作霖在东北》。那本书的开头是这么写的：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是个文盲，个子矮小，外表文弱，留着八字胡。在吸食鸦片和彻夜赌博的间隙里，他常常做着当上中国皇帝的梦。与许多可能也有过这个梦想的其他人不同，张接近于实现这个梦想，因为在称为军阀的那群怪人中，他或许是最大的一个。

麦柯马克显然是没见过张作霖，却能在遥远的英国刻画出他眼中的张作霖，可见在当时的世界，张大帅已经是个很有知名度的人物。

中国一位见过张作霖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作霖身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虽出身武弁，恂雅如一儒生。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怀其惠。

不论中国或外国，凡是写张作霖的人，都对他的长相感兴趣，漫画式的几个线条，就使他活灵活现。在世界政治史中，小个子男人独具魅力，张作霖显然也被忝列其中。

在我看来，张作霖太难描绘了。他几乎让方方面面的人恨之入骨。他杀了张榕，让革命党人怒不可遏。他杀了李大钊，让共产党人忍无可忍。他一会儿助直倒皖，一会儿又联皖倒直，让那些军阀们咬牙切齿。他把日本人当靠山却不听日本人的话，让日本人暗中记着这笔账。他是谁？那套天蓝金黄仿洋的元帅服穿在他身上有点不伦不类，帅府后来建的那些西式的灰楼红楼与他也似乎无关。他只适合做这座四合院的主人，他也只适合穿黑皮小马褂，叼着他那个大烟斗，叫嚷着他那句只有东北人才能听懂的骂人话。但在中国北方，他却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十三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长的军阀。

即使是历史学家也得承认，张作霖是东北独有的一种现象。由穷而匪，由小匪而巨匪，由匪而官，又由小官而高官。他的人生，神秘，传奇，不可思议。林语堂在《中国人》里曾经把中国人分为南北两种，他说，南方人是商人，北方人是强盗。他其实是在说南方人精于算计，而北方人擅于抢夺。在北方人里，东北人更是精通此道。强盗这词儿文了点，在东北就叫土匪。东北盛产土匪。张作霖则是东北土匪集大成者。他把土匪做到了份儿，做成了主角，做得堂而皇之，甚至做出了榜样和偶像。他身边的五虎上将，大都是绿林兄弟，他统帅的奉军，也大都是他招安的各路土匪。他们是他的家丁，他的私军，是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财产。他让东北有了一个独特的土匪时代，他使东北的土匪具有地域的文化的特征。

这恐怕才是张作霖。

如果他安心做这座四合院的主人，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他不可能满足于四合院，东北没有这个传统，东北的传统就是骑着马入主中原。张作霖继承了传统。他不是牧人也不是猎人，而是胡子是马贼。他太想当王。占山为王，是土匪时代的理想。这种理想一直怂恿着他，让他停不下来。这种理想让他当了东北王之后还想当中国王。王，已成了他血里的东西，成了他惟一的激情。于是，继辽、金、元、清，他是大东北最后一个骑士。

这个时候，帅府便是他问鼎中原的跳板，是向那些绿林兄弟们发号施令的大本营。在这个院子里，他发动过两次奉直大战。在那两次大战中，奉系的他与直系的吴佩孚，把成和败表演得跌宕起伏。一个土匪出身，一个秀才出身，一个会玩枪杆子，一个会耍笔杆子。吴佩孚光是舞文弄墨之乎者也写电文就差不多能打赢一场战争，他瞧不起张作霖，总拿土匪这点事讥讽咒骂。短小精干的张作霖内心里有些自卑，外表却对这位秀才从未示过弱，他给他的感觉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然而，第一次奉直大战，秀才胜了，土匪败了，土匪有点无颜见关东父老，回来便宣布东三省独立，其实是养精蓄锐。第二次奉直大战，土匪胜了，秀才败了，秀才无处可去便渡海南逃，逃得很狼狈。然而，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他们后来又成为盟友，联手去打别人。这就是李奶奶说的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哪。

这段秀才和土匪的故事吸引了我。我从这里看见，张作霖最怕别人揭他土匪这个短。他一直遮掩他的机警又一直编织他的网，他嘴上总说他是武人不懂政治却战胜了所有的人。我看见，那北洋军阀们一个个如走马灯，只有张作霖不慌不忙笑在最后。他

一生进了三次关，终于在第三次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空大元帅，把持北洋军阀最后一届政府，也就是麦柯马克说的那个接近于皇帝的梦。

从一个绿林土匪爬上大元帅的宝座，说明他在政治上有成功之处。只是，他成功得太迟。当他这个老军阀走马上任时，北伐军的炮声已经震天响了，接着就有新军阀四面楚歌群起而攻之了。他又露出土匪的马脚，三十六计走为上。征服者，最终总是被征服者所征服。他想回家。这可能是他整个人生最悲壮的一幕。

然而历史已不再给他机会，属于他的时代就这么匆匆地结束了。

麦柯马克说：他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北京政治和全国事务，这种卷入终于成了他垮台的原因。历史是不能如果的，但我宁愿设想几个如果：如果张作霖听信郭松龄等人退守关外保境安民的忠告，如果他不插手中原，不去争坐北京，就不会有后院的空虚，不会有日本人的猖獗，当然也就不会发生皇姑屯的惨祸，不会发生九·一八。大清王朝当年就因为只顾进关夺天下，而让俄国人钻了空子。张作霖则因为一心想当中国总统，而被日本人害了老命，最后又端了老窝。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他的失败，归于他的贪婪。他的失败，是王者的失败。

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途上，遗落着许多王者的头骨王者的隐恨，遗落着许多像张作霖这样惊心动魄的悲剧情节。王者一去不复还，他们的宫殿便前所未有地宁静下来。这种宁静，将王者的故事衬托得更加凄凉。

从帅府向北可以望见故宫的凤凰楼。我突然感觉，故宫老了，故宫没有等待，它已经是历史的一个场景，它在历史的正中央，它不再等谁来往，所有的人都可以走进来看看，像看一件遥远的事物。故居却有等待的意思，它没有故宫那么重的分量，它静静地站在历史的一个角落，它小而简陋，原始而亲切，永远安详，永远焦急。或是等待主人，或是等待主人的子孙。它每日的使命就是翘首以盼。

故居是母性的，故居有家园意味。在这世间，每个人都需要家，每个人又都不安于家。家是一种诱惑，世界也是一种诱惑。而当你真正背井离乡，真正成了一个流浪的人，你才会明白，无家可归是痛苦的，有家不能归更痛苦。

走进大青楼的那一瞬，我体验到了张学良心里的那种疼。

不知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张氏帅府是张氏父子共同的故居，却总以为四合院是老师的，大青楼是少帅的。好像只有走近了大青楼才走近了少帅，他们父子应该是两个不同背景里的人。

大青楼因为高敞华贵，它的空寂就比逼仄曲折的四合院更显得落寞酸楚。它的主人从六十六年前的那个春天离家去北平上任陆海空副总司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年他才

三十岁。他离家的时间太长，他的离家，不是逃婚的那种，不是躲债的那种，更不是杀人避祸的那种。他从未想过离家，他每次离家都很快就会回来。父亲在的时候，他是父亲的儿子，父亲不在的时候，他是东北父老的儿子。他始终让自己扮演儿子这个角色，他喜欢这个角色。儿子意味着年轻，忠诚，有未来。儿子更意味着对家族家乡的责任。他是那年的四月十八日离家的，九月十八日突然间降临的一场灾难，使他再也不能回家。大东北如望儿山上的母亲一样，一夜之间黑发变白发。而他，在想家的路上一程一程苍老。

可以想象出帅府当年的喧嚣和华丽。即使老帅死了，男女老少兄弟姐妹，仍是团团圆圆的一大家人。老帅留下的那些家私家财还秩秩序序的原地未动，少帅的办公室还是他走时的样子，桌上只是落了一层轻尘而已。这儿仍是东北的政治中心，仍是东北的灵魂所在。但这一切，他突然间就再也见不到了。一家人作鸟兽散，所有的宅院都遭到了暴徒式的洗劫抢掠。赫赫帅府，顷刻间就变成了一座空巢。而他，一下子就成了无家无根的人。他与他的父亲不一样，父亲毕竟死在回家的路上，毕竟回到了家。他活着，却被那个时代放逐了。

如今，据说他终于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自由选择一个住的地方，他选择了夏威夷。夏威夷在太平洋上，它美而孤独。我想，当这位世纪老人每天晒着夏威夷黄金般的阳光，听着海浪不断拍打着银色的沙岸时，内心一定翻腾着比夏威夷更孤独的情感。几乎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都不在了，无人可以与他对活，他只有在心里自说自话，或者，只能与历史对话。听说他已在口述他所经历的历史，听说有关西安事变的真相他将在2002年公之于世。难道这世界还有另外一个真相么？难道我们口口声声有鼻有眼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相么？这个像历史一样古老的老人说：历史是人说的。那么，历史并不可靠，历史可以篡改，他要揭穿历史。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也许是这位老人太爱我们人类才一直缄口不语，他在尽可能地让我们多过一些平静的日子。

然而2002年的那一天，他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总觉得，他是在他父亲死后凸现在中国历史的大命运中的。在他的天性里，有他父亲的狂野。他的直率，他的哥们义气，他的生死不辞，都在证明他是东北的一个著名的大土匪的儿子。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被中国封建和西方文明共同铸造过的男人，这使他比他的父亲更复杂更大气。他也有王的概念，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王。否则蒋介石不会在临死前还要告诫后面的人：不要放虎。他的确是一只纯种的东北虎。然而他还有合作的概念，不做独夫，一切为邦国计。那是一种献身精神，一种真正的王者风范。只是，他那种合作的真诚被独裁者欺骗了褻渎了。

历史是这样定格的。他从父亲的身后走上中国的前台时，才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比他父亲更能影响历史的人。他的政治生命很短，但他做的事却很密集。在这密集里，有三次高峰。这三次高峰把他彪炳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罕有人可与伦比。

东北易帜，既是听从蒋介石的呼唤，也是他自己心灵深处的秘密。日本人想让他当满洲皇帝，他没有答应，日本人就选择了溥仪。他手中有孙中山先生专门题赠给他的那四个大字：天下为公。那是孙先生的绝笔，他把它当作是留给自己的遗嘱。从此他的心里就只有天下，只有公家。所以刚刚接过父任，他就再也不能像父亲那样只管争地盘，那是农民式的自私。他让东北的上空，降下了北洋军阀的五色旗，第一次飘扬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他不要东北的独立，不与日本人同流，坚决要以这个方式实现埋在他心底的父仇子报。

易帜不久，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中国的统一受到威胁。于是，他率20万东北军进关，以武力帮助蒋介石调停这场内战。他曾经帮他父亲打了许多年的内战，父命难违。如今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做人，可以亲手熄灭这团鬼火。那场大战因为他的出现而结束了。后面的历史却又证明，在那样一个乱世，他那种善良有点像西班牙那位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接着就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要先安内后攘外，他却要先攘外后安内。那时他在西安，西安面临着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头。面对陕北就是打内战，面对东北就是抗日。如果说九·一八事变让他有家难回，那么西安事变就是为了能早早回家。回家的心情，使他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他的错，或许就在于他以孩子式的天真对待刀光剑影的政治。那场事变，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他在成了中华民族千古功臣的同时，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政治犯，成了永远的囚徒。

千古功臣。这个桂冠很久以后才戴在他的头上。他曾经被这个世界所指责所误会，甚至被自己所信赖的人以委婉的方式出卖和遗弃。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面对的是什么，他的泪已不知往哪儿流。二十年后，周恩来在评价张学良时用了这个绚丽而又抽象的词——千古功臣。共产党的确应该感谢张学良，他为这个党赢得了机会，从而也为这个国家赢得了机会。这个国家，因为他而有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有了团结抗日，有了后来的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是从那场事变开始的。那场事变，却成了他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是终点，使他从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是一颗巨星的那种辉煌的陨落。很多人观看了他的陨落。

我想，那其实是一个没有人格的时代。既没有领袖人格，也没有走卒人格。他却向那些机巧的南方人展示自己纯正的大东北的豪侠人格。在西安的酒桌上，他摔碎了两只

杯子，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情愿投进罗网，而且永不言悔。这真是一种尴尬，当他被他称为兄长的南方人关了禁闭，当他的自由被拴着绳索在南方潮湿的季节里迁来徙去，当他知道自己将为那场事变付出一生的代价时，他该怎样为自己是个东北人而悲哀？

他后来的踪影，严严实实地藏匿在那座翠绿的岛上。手中一部明史，身边一个女人，就是他的日子。有一天，他读着读着，突然发现历史是人说的，是永远也无法真实的，他便扔掉了那本厚厚的古书，读起了《圣经》。曾经的少帅，曾经的关东骄子，曾经的中国栋梁，步履蹒跚着走向上帝，并向上帝跪下。任何一个中国人，望着他苍老的背影，都应该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痛。他不是生来的基督徒，他是在人世间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是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漫长的煎熬之后，是在对自己的同类失去信心却又想拯救并想自己获救之时，毅然决然皈依上帝的。这是一个人绝望之中的潇洒。与基督同在，与上帝同在，才觉安全，才觉真实，这其实也是人类的大不幸。

在台北，他与蒋介石在同一座教堂里祈祷，却从未在那里见过面。他们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却不知他们各自说了些什么。我想，张学良说的就是他要到2002年才说的话吧？

这世界，有智者的孤独，有王者的孤独，张学良是后者。也许他就该是这样的。他身上王的气息太逼人了，让有的人感觉压抑，感觉紧张，甚至威胁。他不是虎落平阳的那种孤独，而是被人畏之如虎的那种孤独。如今，虽然他已经重新回到山野丛林，虎老威犹在。他仍然不能实话实说，他仍能让这世界因为他的某一句话而翻天覆地。可见这世界是多么脆弱，这世界有多少见不得阳光的东西，而我们每天就在这样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过着自以为真实的日子。

夏威夷岸边的老人，你还在想着你年轻时住过的家吗？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朋友告诉我，台湾的报纸上曾登过一句诗的上联：烟锁池塘柳。向读者征它的下联，不仅要对仗，还要分别以“火金水土木”为字旁。你读到了这天的报纸，并很快就对出来了：炮镇海城楼。那位朋友对我说，只有张学良能想出这样的句子，他是将军，又是海城人。是的，海城是你父亲的老家，你的爷爷死在那里，你的父亲也险些死在那里。你们一家从辽南走到辽西，又从辽西走到沈阳。其实东北处处都有你的家，它们因为你不在而一个一个地空空荡荡。这个国家就是你的家，你为它做过，付出过，你理所当然是它的主人。你不回家，是它的耻辱，也是这个家所有的人的耻辱。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夏威夷海边与你不期而遇，我会红着脸告诉你，我们都欠着你，欠得太多，可是，回家吧。

然而，你为什么就站在太平洋的那个小岛上，远远地望着世界，望着故国，却不走近一步呢？你真的就是为了向人类宣布一个真相而静静地等在那里吗？或者，你现在仍是一个戴枷锁的人，所谓的自由都是假相？那么，你的小老乡在这里祝你长寿，祝你在主的世界获救以后，在人的世界最终也能够获救。

可是你听过那支著名的萨克斯曲吗？它的名字叫《等你回家》。每次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就想落泪。因为，我在等你回家。

我们都在——等你回家。

1998年

先生

梁玉氏

我与王青山先生相识一场，现在细细想来，连同我的好友邢海珍当初只是按照礼仪把我介绍给他说：“这是我的老股长。现在是工农教育办副主任”的那一次都算在内，一直到我南迁之前的那一天下午，他来我家作别，前前后后总共也仅仅只有三个年头。

一

为筹划生计对我的盘算，表兄挖好门路，叫我到他那里的T市区去工作。我因一时请调不得，而工作调令又已开到局，我便与海珍去商量。在还没有最后作决定的奔忙请调的间歇里，海珍带我到他的工作室里小憩。

那是一间只能容纳三张办公桌，除配套的椅子还能摆两把椅子的局级办公室。我心不在焉地就近拣一把客人的椅子坐定。那边有一位是长者，那边还有一位也是长者。刮退休风了，都是告退的对象了。我起初无暇去仔细瞻顾他们都是怎样的面孔，只是按照客人的规矩坐在那里。

海珍送上了一杯茶，示意叫我起来，引见。我这时才惊诧地得知，我面前的那一位，竟然是我上小学时便闻听了姓名，而且据说还是我们那一届小学升初中时考试就是他的命题的那一位王青山先生。这惊诧，不能不使我仰望这位乡之先达了。

他穿一件圆领的棉线衫，长脸，习惯地撂下眼镜，他可能是必得戴眼镜了。手很大，骨节也较粗，宽大的个子，腿脚由于坐久的关系不怎么灵便。动作很机械，但看去还很结实。头发很硬，都直站着，脸孔以前是严板着的，而后客人立即会察觉得到，他的笑容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握了手，觉得很有力。喜欢谈话，一说就很久远，可又不怎么游离，叫人无可奈何。当时说了些什么，大部都忘了。现在回忆起来的印象，也只能说，他一个做父亲的人的样子，仅就这么一点凤毛麟角。

这就是我开头说的都算在内的那一次。

二

后来不知是巧遇还是有幸，就都到一个工作室里工作起来了。

我不能请调到表兄那里去，只好到一个中学里去工作，所任的课程仍是高中语文。我本不是讲语文的人，口齿、文字、功底既很不足，且又无雅兴，鸠占鹊巢。总算是局里股里校里组里班里轮番听课的三关五关七关都蒙混了过去，心里也只好安静下来。没有工作的事了，就躲在收发室的小火炉旁译两句古文，后来整理的那一集，题名叫作《古文札记》的，大约有20本，就是那时堵塞的空缺。

海珍这时也不想工农教育办，到了电大工作站兼课，讲他的拿手写作。他说，下期古代汉语没人，你讲。我看你讲得不错。现在有几个老的，恐怕也不是不好对付，人时境一过，往往只留个空有其名，并不可怕。他是个未来派，喜欢这么讲，我也就点了头。这就到了1983年的暑假，我与海珍去东北师大上学之前便协定下来。酬金是每课时一元伍角，算是当时最高的价钱。我又从海珍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王青山先生来电大任站长，他也调出工农教育办，已先先生到了电大站。他是他的三任上级了。我心里很欢喜，因为自从那次晤了面之后，我便留心听到先生在全城中良好的为人了。

我生来就怕做不好工作而被淘汰，况且，这又是额外的兼课，东北师大暑假期间就把一个学期的古汉语，从文选到通论到常用词全部教案都写了出来，而且习题都处理了一遍。中央电大那时只管讲不管练，难题只好由我们讲的人承担。我是费了一番周折后才完成全部习题的。S地区电大听说后，还让我将完成习题给他们使用。

我记不清我上古汉语的第一课时，先生是听了课还是没有，但是，后几次他总是在听课。我当时想，一是出于规矩。二是学员底子不齐，准确说是很差。上学期因不及格淘汰了百分之五十还强。三是他新到任，还有三把火，不能不抓工作，这也是职责所在。

《赤壁之战》一节，有一句“破操军必矣”的“必”是副词做谓语。这在他，此前的一个连夜都把《讲义》核校清楚了，重点轻点，关键机键，确立起来，轻车熟路；而且，他又是上过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人，本科，中文，正是一家板斧，何况明天就要听新到任教师的课了呢。

课堂上我无意中板书了这一句。并且用框线法勾画了结构层次，又叫人练了一回。看得出来，他高兴了。大概是因为现代汉语中副词做谓语的绝无仅有，他才本能地职业地看重的。当时他就站起来，习惯上本应卷一支旱烟，很纯正的旱烟，他动作了一下，拉出烟纸，但没有卷，又把纸揉成团儿，塞在口袋里。他知道，这是课堂了，他就又坐下。

课下他跟我谈了些话，他说：“当先生的，就是自己捧一只墨盒子，顶在头上，弄不好，就是一个黑黑的大花脸。”

这该是第二次的正式交往了。

我想，我应该记下去，“弄不好，就是个黑黑的大花脸”。

这样，我就每逢十五日三十日的每月两次到电大站讲古汉语，也就每逢十五日三十日的一个月两次见到先生，让坐，倒茶，笑容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一个学期结束，他叫我去工作室去，说期末成绩很好，360名学员，不及格的仅有十来个。并且给了我应得的九十三元酬金。

接到酬金，我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当时我的工资每月仅有四十二元，这半年的业余劳金，竟相当于我的两个月薪水。我私下里与海珍研究，应该去看望一下老站长。海珍说这也没有什么别的，完全是出于崇敬，并无攀结的目的。他还说，你不熟悉路线，我可带你去，但你得自己进门，我走。

这样，我买了几元钱的东西，两瓶酒，两斤糖。他正与老爱人在忙。见是我，便让坐，倒茶，加一大勺糖。我学着流行话，记得当时是说，到年底了，该看看您，很关心我的之类的活。他顿时真正地发火了：“我还想去看看你呢！你爱人在家里冻得直骂娘，四壁霜凌，每月那么一点工钱，家都养不活！我每月一百多元，家属又有退休金，反过来去看看你才对！”

可是他见我泪在眼中，且又满含着真心的求乞，就都又顺和着收下了，两包糖，两瓶酒。可是，第二天一来，他就严厉地责备了海珍。

到了这年除夕的前两天，他竟用自行车带来了一整袋尚未开包的面粉，“我没有什么让你过年的，这本来太少，不成礼仪，太多了，你又不肯收。往后当去看望你的老父亲。”

海珍把面粉放在我的自行车上。推我，送我走。我带着面粉，不是，我是带着一块巨大的陨石。三里多路，我竟然迈了一个小时。我简直是用铁杵一下一下捣回去的。在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想起了我前半生的几乎一切。在家，幼年丧母，一个姐姐，一个严父；在外，小的我见过贫苦农民，大的我见过乡长、局长、县长乃至专员。我却又见过了我今天工作室里的他。这同样的都是我的遭际。我先前所遭际的人，都是怎样的人呢？

我说不出。

三

他爱才，但他不忌才。

他也跟我们一样地给学员讲课。他讲现代汉语，他听了一遍录音，还要听一遍。他的讲义比我们都扎实，都丰厚。后来，他还常常碰见问题时翻出来，记上。或是我们谁提出意见来，他以为可以参照的，也记上。

有一回，是为了一个长单句的分析，那句子也特长，叫作什么“他至今还猜疑，暗地里风风火火地给马副厂长提意见的就是那个守门的矮个子刘金”。他要思索一下，他习惯思索一下，再做事，省得出毛病。而我们，在一边漫不经心地勾一通，抹一通，不无揶揄地往他面前一放，以示告他早经分解完毕，走了。

后来，我才明白，我这做法并不算怎样高明，如果同是年轻人，不是当场地面红耳赤，也是心有余毒，五日不解，半载相轻。

而他坐在那儿，分解他自己的看法，然后再拿过去我们的分解，找出彼此的理论，等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时，他才稳妥地和盘托出，互相表里。仍是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让坐，倒茶，笑容是从心里出来的。了一遍。中央电大那时只管藉——他并不去计较学位、年龄、才华，相轻不相轻等等这些所谓的文人大事。不久，他就跑到局里、中学校里，哀告。费去了大半年的光景，跑了许多冤枉路。甚至不惜用掉他个人的老友的代价。于1984年的秋初，终于把我调到他的工作室里来工作了，讲专职的古汉语。一直到1986年夏末我携眷南来，这又整整是两年。

四

他工作很用心，生活很节俭。

因为工作，那一段电大站从职员到教员到站长，没有宣布过星期天。他能熬夜，11点、12点，业务没有处理完不走。他累了，常常往后一仰，说道：“不知你们是不是这样，我上班不愿动，但保证不迟到。”他没有迟到过。偶尔有家事，也是头一天说明。“上了班又不愿意离开。”大概他终于发现自己老下去了，但是他工作一直很用心。

那时，他管的事很多。教学计划、人员、后勤，几乎都是他一个人统盘地拳拳脚脚。我们于是就一起熬夜。他工作，我们自修。他说我们自修也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工作，我放开量地让你们学习，总比那些见了扑克牌的嘻嘻一笑而过，见了学习的就瞪眼睛的人要强些。那一段难忘的光阴里，海珍完成了两本厚厚的诗集。其中《收获的

季节》的赠本还在我这里；我全文抄录了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共七册。他呢，拆阅公文，起草报告，计划教学，把凡是认为干扰我们学习、工作的事都揽过去了。他虽没有几本几大本笔记自慰，但是，他用心血加筑的人格，比我们不知要高多少倍。那种真正的自慰，也同样是另外一些人所无法体味的。

天太晚了，我们就又一起回家。出了门我与海珍往东去，他往西去。有好多回他亦随我们往东。等我们纠正时，他才扣好帽带，将军下了战场一样地坦然地宽大地走下去了。

他骑的自行车是最不佳产品，苏联进口的，快半个世纪了。上班也不加锁，自称“贼不偷”。但竟有一次贼给偷了。海珍我们三个人，夜里摸了一回，没有。他有些急，至少说没有送他回家吃饭的买卖了。不过，他还是终于开口叫我一个人先回去，因为我要远他们许多，我习惯从命，便从命了。第二天来时，听海珍说，在大街的树下找到了。他很高兴，“咱这玩艺儿，还是名符其实的贼不偷。”我想，准是夜里看不清，贼才偷，借了路灯发现是这么个劳什子，扔了。

后来。我就拣了几条包装书籍的废塑条，为他编织了一把钥匙柄，他还是不锁，每每踏上车时，拍拍鞍座道：“咱这玩艺‘贼不偷’，像你们那样小心轻放呢。”

他的生活是节俭的，不单是自行车节俭，穿着什么都很节俭。他说他一辈子没有搽过雪花膏。现在，还有这样的男人吗？

他生活上虽不着意讲求，可穿着一向整洁。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样子，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

五

而他于是非曲直则常常是当仁不让了。

我们背诵“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他呀地叫道：“还有‘行’呢！——‘走马川行雪海边。’”继之，就撂下手中的什么，不无辽西口音地“一川碎石大如斗”地背下去。简直与我们一样是个小孩子。

他有个小黑板，常用写些明天大家或他自己要做的事。空白地，我们就练些字。“你那‘寅卯’的‘寅’当中竖；你那繁体的‘会’字当为中横。”他只要发现错误，便当仁不让地直言不讳了。

这“当仁不让”地直言不讳好是不好呢？

他十年十五年没有升迁。

跟他在一起工作的人，只有一个共震点，那就是“他太认真”。人谁都想做些坏事呢，但只要与他共存，他就会使你感到自己灵魂的污秽，心地的阴私，操行的卑琐，他就犹如一堵改悔的高墙，囚起你来，使你无力自拔而自拔，无力自新而自新。

六

可他又并不如人所说的那样一生一世的土地板结，他有他那一个天地的欢娱与快乐。但这前提必是表里一致的堂堂正正。他没有趋炎附势的庸庸俗俗。

空闲起来，他常喜欢开玩笑，那种纯乡下人的玩笑，他开得比我们都好。他是大伯子与兄弟媳妇开玩笑，他是老同志与小战友开玩笑，他是下级与上级开玩笑，家长式的。他有时也谈些无关紧要的闲天。当他谈到城里人的“窝囊史”时，谈到某某人如何阳奉阴违时，他是疾恶如仇。

他也讲他的爱人，这我们都看得出来，尽管是欲扬还抑。他先后有三房妻室，前两房伤于病患，这一房还健在。她是四十岁才与他结合的。没有生养，他说她不给他生养，以侍奉他先房的三男一女。长子学医，长女学医，他叫他们对老百姓好一点。次子学工，再次子他还没有决定要他将来做什么，我来时，正攻读高三。是个班长，挺体面的一个小伙子。一看仿佛便可推知是个四十年前的他。他爱管家务，从儿媳生孩子到老伴做早炊，都管。人家还没有不耐烦呢，他先不耐烦起来，以为不可救药，孔夫子式的。

他也讲到我们的爱人。这时，他像一个父亲。“你让你的文婕少操持些家务，把电大读完。”“你把你邢夫人的病千万看好。”他也讲到刚来讲外语的小张，“你当考虑婚事了，少数民族更是叫人头疼，降低一下标准。”

这时，他是一个捻着纸烟，盘腿打坐的母亲。

他偶然也指着谁的鼻子吵架，心跳，摔帽子，发抖，他有冠心病。可结果总是他赢的时候居多。这方法好是不好，姑且毋论；但我知道，没有一次是出于他一己的利益。

他还有些小动作，叫人发笑。

比方说，火柴用尽了，空火柴盒全部放在抽屉里。你当真没有火点用时，拉开去，全是空的。

夏季总戴一顶便帽。如果是刚理过头发，他都把它理得那么短，那么整齐。刮大风时，帽子提前扣在头上，从后面向里反扣回半个帽圈，那样就牢牢箍在头顶。我们在平

时，讨他笑地拿起他的帽子，从后面向里反扣回去半个帽圈，箍在头上，在工作室里走一趟，他只是眯起眼睛笑，笑容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他打电话，跟外国人一样，孔夫子式的。“同志，我是王青山。”不管对方多大年纪，是男是女，他都向他们报告姓名，恭恭敬敬地。“请问，线路忙吗？不忙，请接长途。”他的和顺恭谨，果见其效力，常比我们通话得快。

这方法好是坏呢？

不过这三年之中，我们确染上了这数不尽的温良恭俭。

海珍骂他，当面，说他“像一只随顺的公猫”，“你再瞧，那张老脸。”他就接下去道，“一夜也摸不到头儿。”

这，别一天地里的高档赞美诗，是那些拍吹拉扯的修辞家们所无法堂皇冠冕的。

七

他恩义。

我们曾不止五次七次地听到他不厌其烦地叙说，他上小学时，上不起学，是一位老先生卖了自家的一只老母猪和十三只猪崽儿，使他不至于辍学，就像祥林嫂叙说阿毛一样。

这是用怎样的粗俗鄙陋的村言俚语聊存的风雅，祈颂的乐章啊！人有谁能这样呢。

八

我南来的前一年的冬季。我的父亲突然病去了，当时，我正在给中文二班上星期六的最后一堂课。我回到了工作室，他并不知道。我借了五十元钱的公款，他像父亲一样地叮问道：“怎么？钱总不够花呢？”他以为我不节俭。

第二天清晨，他得知了噩耗，立即与海珍赶来我家，他推开门，沉重地脱下帽子，深深地鞠躬，老泪纵横。然后，坐在我父亲睡过的地方，从口袋里掏出他现存所有的钱，十四元，“先拿着用。等会儿叫海珍叫车来，丧事由我负责处理。”

严寒的风雪天，他一直随送到葬场，整整是一个冬日。人散尽了，他也走了。我看他的背没有驼，很像我父亲。他们都是辽宁生人，准确地说，都是西边外人，可他们没有西边外的那种狡猾与奸诈，倒是有那种直朴与刚强。他们同是根根本本地做一个人。

九

我接到代培研究生的联络通知，将要赴浙时，送给他一套民国十七年版的《封神演义》。我是经过选择送他的，我以为这对于他的德高望重是当之无愧。他说他要退居二线了，我想这就算是生活一场的纪念吧。

我临行前的一天下午，他来我家坐，像一个初到生疏场所的小孩子，拣一个什么地方就老老实实在地坐下了。告诉说常来信。并打发他的爱子学军为我整整包装了两天的书籍，一直送到火车站发运完毕。他临走的时候对我的小孩说：“别把普通话忘了。”还说：“天热，买点绿豆糕给你们带着，别的不买什么了。”还叫我们出发时通知他，他自要来送的。

我因那边电报催行，不敢逾期。加上乘坐的火车又是早晨四点，便没有通知他。致使那一次的见面和谈话，竟也许成为我们最后的告别。

十

再见了，那所小房子，它曾是我们一同的工作室；再见了，一个普通的先生！请接受我只能用笔墨寄写的惦念：

你不要把冠心病的小保险药盒忘记了带在身边，以备随时的吞服。

十一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携着我的家眷倚在先生的身旁，去啖下那一杯由绿豆的糕粉含着乳白的甘糖用冷水打成的琼浆，以再一次地挥除我积膺的溽暑和缠身的蒸热，道上一句：“谢谢了，先生。”

十二

先生是平易的，又是冷峻的；先生是宽容的，又是刻板的；先生是陈旧的，又是清新的；先生是一个临别游子的慈母，又是一个长期共处的严父；先生是同一个天地里另外一个天地里的人。

先生是一个人。

后记

这是农历丁卯年的大年之夜。此刻，户外的那一片祭天的烛火尚未完全燃尽，而那一阵阵振奋的爆音却已经停息。我在这渐次黯淡下去的明光和着愈加神秘起来的普天同享的安静里，写下了这篇忆文。这于我自己，总还算是终于付还了我积压已久的文债，同时也暂且地敷衍了我那微茫辽远的报答。

倘使回顾不只是留连，不只是眷念，也能催人醒进，使人激发，那么，我愿将这回顾的空文握成一柄振击的长策，鞭急牛，汗烈马，坠岸夷谷，奋全力而向前，以此告慰先生，无愧于先生，无愧于以先生为代表的江东父老！

麒麟东巷的朋友们

马 力

我常常搞糊涂。

每次，给他们中的某一位寄发报纸或填写稿费笺时，都要在办公桌上东翻西找他们单位的地址，然后，再清点一下脑子里的所有库存，让它们重新排列组合，每找又必败。有次，见到了他们当中的年轻评论家杨锦峰，就拿话开他，你那个单位纯属本城市地址不详单位，关闭了吧。杨评论表情一愣，便归于平静。

麒麟东巷16号。

其实，挺好记挺气派的一个地名。老是让大家搜肠刮肚地记不住，就有问题，问题不在地名，在工作性质的不合时宜。

大连艺术研究所。

想想看：在我们的城市里，有谁会记不起税务工商交通大队银行储蓄所？又有谁会记不起渤海万达欣浪太阳城东方快车？城市在一天天走向商品化走向世俗化，每天，都有旧货大甩卖新店点火开张，每天，都有旧建筑被拆除，新写字楼急着往外炒，大社会小家庭一律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还有人去研究那些既不能给城市引来外资，又不能给城市赚来外汇的抚琴弄弦之辈？迂夫哉，迂夫也。

就冲着这儿，我又挺敬重他们。

个顶个儿地数，他们又都是本城市最有才华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之一。可在眼下的中国，大家都很实际，以金钱论英雄。艺研所的产品，是国家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及其作品。可如今，中国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都得背井离乡地到国外去演出，靠大鼻子小鼻子买票养活，产销不对路，经济状况自然不佳。英雄做不得，正直、清高、斯文，两袖清风倒是做得，所以，凡本城市重要的精神文明场合，都必请艺研所的人到场，到场又必先请他们讲话，他们讲话时，大家都频频点头。

境遇欠佳，人材倒是前赴后继。

李振远，所长，又兼着文化局的副局，对戏剧理论颇有研究。但是，他的另一个特征倒是印在我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的，那就是他常挂于脸上的疲惫而令人不安的笑。对于此，可以作多种解释，诸如文化部门的窘况，知识分子的烦恼，高雅艺术的风雨飘

摇，此笑一般出现在由他主持或参加的会议上，走下会议，和他在走廊里闲聊，他倒是思想掷地有声，谈吐儒雅风流，即便是笑，也笑得完全彻底。

马副所，鸣捷兄，身子长大，脸也长大，本城市真正的国家级戏曲评论家。一般情况下，周围人都喊他作“马老师”，喊的人往往很恭敬。如花脸演员杨赤、刀马旦李萍，包括本城市新闻单位的几位年轻记者、编辑，都自称为“马派弟子”。他常常弓着腰领着弟子们从海城到沈城再到京城，专溜名家戏曲大师房檐儿，请他们传艺说戏。什么难请的主儿，这位五十年代中国戏曲学院科班出身的高材生，都寻请得到。可对付身前后方的事儿，老马就有些着三不着四，有传闻说，某次乔迁新居，老马好几天以后还是找不到家门，就走到数里之外的派出所，让民警同志领着回家去。有传闻说，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叫他回家煮鸡蛋水，老马把煮鸡蛋的水给妻子送去，把煮熟的带壳的鸡蛋自己吃下。传闻传到老马跟前，他并不着恼，只把八字眉往上一立，捏着嗓子来一个兰花指：“谢您了！”众人一听又是一笑，但很快就会收起各自放诞的脸，心里面酸酸楚楚地生出敬重。

还有杨锦峰、宋延平，两位青年评论家。

杨锦峰为何取笔名曰司达，与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司达搅得分不清个儿？宋氏延平为何不苟言笑却常常被同事们喊作“宋女士”？这都是艺研所的内政，外人不得而知，但是，两位刚刚升为副所的年轻评论家，论人品论文品，都应该算作本城市一流水平这倒是外部公论。一位对现代戏剧颇有研究，一位对中日艺术交流史颇深造诣，我常常疑问：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怎么可以陷入此种尴尬，与热火朝天的商品经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呢？可每逢报纸上有了什么难作的文章赶紧的活儿，就忍不住地立马打电话约请他们。《港台电视剧纵横谈》、《炒文化泡沫文化》、《成也王朔败也王朔》、《评说唐明皇》……多为命题文章，可每作社会反响都很好。

有件事儿，至今难忘。今年夏天在旅顺开会，天烦热大家都睡不着，就搬了凳子椅子凑在一起说话。杨所说，他有时候平衡不了，就半夜三更地坐起来抽烟，害得妻披衣起坐反复诘问：有情况啦？几欲改行适应时代大潮，为此他们几个还去饭馆喝过好几回的酒，甚至连下海的公司名字都筹划好了。宋所说，以前马所他们那拨子人在时，他们还觉得自己年轻力壮有的是时间，如今他们都退下了自己站到了第一排，有时不免惶惶，功不成名不就的。两位青年学者的“肺腑”，勾起了与座本市中青年学者的心病，就东一句西一句地务起虚来。人生的终极意义，东西文化的差异，商品经济下的泛文化和反文化，越说越说不清。后来大家就搁下这个话题俗起来，评说谁今年写了多少万字的文章，谁谁今年出了几本书，欠了多少印刷债。话题扯远了，就杂了，有人说，

李白前辈斗酒诗百篇，形骸放浪，走遍祖国大地，有人说，罗贯中把酒舞剑：“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曲《临江仙》包含多少历史哲学，人生抱憾。又有人说，把李白、罗贯中搁到今朝试试，喝酒得要钱，出书得买书号，评职得论资排辈，出门旅游更是步步离不得钱，那晚的“黄金山下夜话”，说得大家心头一阵热一阵冷。

这些年，作为报界和艺研所打交道的人还有，约请他们写的文章年年岁岁的，大都记忆不起来了，可和他们交往中的枝枝末末倒是记忆犹新，忽然间翻弄起来，每提起一件放下一件，都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

一日，忽接到杨评论电话，说艺研所成立十周年了，请我写篇文章纪念一下。

写什么？

十年一觉沉浮梦，这样的清淡雅致的部门，竟能在商潮滚滚的现代都市里，安安静静地于城市一隅活了十年，纯属城市的奇迹。

可见天不当绝。

文人一脉。

繁华都市中的冷艳

周昌辉

东京，一座繁华富丽的大都市。白天，各种设计风格的摩天大楼在阳光的照射下，巍然高耸，争雄斗势；夜晚则华灯齐放，流光溢彩，令人真真切切感受什么叫不夜城。东京人口之稠密，也是名不虚传的，尤其是早晨上班時間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在东京逗留的时间长了，自然会慢慢地感觉到这座世界名城吸引各方人士的魅力所在。

那天早晨，我照旧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品川电车站。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在入口处的前方，拥挤的人流就像江水遇到砥柱一样自动分开，随后又自动合拢。走近一看，才发现那里站立着一位和尚。他脚踏棕色布靴，一顶前倾的斗笠圆满地遮掩了整个脸庞，身着一袭青衣，左手在胸口竖掌施礼，右手高举过头，手心托着一口枣红漆碗——他在化缘。滚滚红尘中，他像一尊黑色大理石塑像一样纹丝不动，一尘不染，那么肃穆，那么凝重，仿佛市廛的喧嚣与拥挤都不曾存在。尽管行人川流不息，但是绝没有人冲撞他，就连那长垂的衣袖也不会被拂动。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庄严、如此独特的化缘方式，不禁为之动容，摸出一枚五百日元硬币，小心翼翼地放进他手心的漆碗里。他似乎感觉到了，微微俯了一下腰，算是致谢，然后慢慢抬起头来，没有斗笠前沿的遮挡，我终于看见了他的脸。然而就在这一刹那，我不由得惊呆了：桃花色的脸庞，润泽的双唇，长睫毛，大眼睛——这不是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吗？对了，应当称作尼姑。她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这让习惯了日本式客气的我感到十分陌生，尤其是她的眼神，那么遥远，又那么冷漠，直穿过我的头颅，又透视着我身后纷忙如蚁的芸芸众生。她很快又缓缓地低下头，斗笠重新将她的脸圆满地遮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慌忙离开那里，冲进站台，懵懵然挤进电车。

大理石塑像般尼姑的形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如此青春年少，怎么就遁入空门了呢？”在隆隆作响的车厢里，我默默地想。

也许是因为生不逢时。校园生活多么纯真浪漫，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生活之对于她，没有悲伤，没有哀愁，有的只是阳光、芳草和笑声。毕业歌唱完了，纪念照拍完了，该祝福的祝福了，该拥抱的拥抱了，曲终人散。但是一出校门，生活完全变了样：持续多年的低迷依然见不到一丝曙光，失业率在增加，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慌心理，一个毕业生就像是一棵无名山上的小草一样渺小而无望。你不知多少次满怀希冀地踏进各类

公司的门，强作笑脸，说尽好话，然而均遭婉拒。曾经描绘的美好蓝图破碎了，无情的现实将多梦的你冲击得不知所措，你感到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失落感。于是你迷惘了，退却了，心灰意冷，从此走进佛门，让晨钟暮鼓来排遣心中的烦恼。

也许是因为伊人另有怀抱。天涯海角何曾犹豫过，名利荣华几时艳羡过，只要和心中的他厮守终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杜鹃啼血挽留不住那颗别恋的心，万般柔情都付流水，一生托付全成泡影。想起曾经许过的诺言和往日相伴的快乐，说不清是怒是悔还是怨。今后的日子只有对月长叹，感花落泪了。于是你万念俱灭，扯散了项链，撕碎了相片，毅然斩断万缕情丝，跪求宝殿，让古佛青灯来抚平心灵的创伤。

也许是因为偶然的机缘，领略了释家的智慧，悟解了三藏的道理，方才明白世间万物皆空，涅槃无苦才是最高境界，身边的繁华只是镜花水月一般的幻影。以往曾经苦读课本，做梦都要考入名牌学府，发誓将来要出人头地，现在想来多么幼稚可笑，羞愧得简直无地自容。好在悟道不论早晚，一旦看破，立即放下，一切犹为未晚。于是你虔诚地剃度皈依，心中充满了喜悦，站在山腰云遮雾罩的禅门，冷眼向满城的凡夫俗子俯视。

也许……

也许没有那么多也许，都是我在胡思乱想。然而在这样一个充满摩登与诱惑的现代大都市，我怎能想到会遇见这样一位出家人。她是东京的组成部分，其蕴涵的内容可能比我所猜想的更为复杂，更为深刻。面对这繁华都市中的冷艳，我迷惑了。东京啊东京，你是这样繁华，又是这样无奈！你是这样熟悉，又是这样陌生！你像庭前花树一样近在咫尺，却又像海市蜃楼一样遥远而神秘！有人热切地投进你的怀抱，有人却默默地回避着你。你创造了人间奇迹，却不能打动所有人的心！

车停了，到站了，我挣脱出车厢，像一棵顺水漂流的浮草，很快又被卷入繁华都市的人流漩涡。

收录于2003年台海出版社《行者之悟》散文集

槐花瀑

车向弘

家居南窗外的山坡上长的都是槐树。逢到花期，挂满枝桠的槐花便依山就势叠成了瀑布。那是一条槐花瀑。

大连是一座素有“东方槐城”美誉的城市，年年都过以槐花为主题的节日。我们家可好，只要守住那一面坡，足不出户便可尽享节日的风光和快乐。

心中常常地感动着这一份拥有，因为知道，人生原是有着太多的理由让我和这一切失之交臂的，所幸它没有。只是在感动的同时，却又不能不责怪自个儿，在真正发现和认识槐花的路上竟然走了那么久。

在北方农村长大或生活过的人谁会不认得槐树槐花呢？几十年前，我就曾是乡村一小丫，春天挖野菜，秋来拾柴草。对于槐花吗，常常是待有清香冲进鼻管儿才猛然醒悟：哦，槐花开了。然后是去闻香寻花。寻到了又怎样？槐花，它既不着大红大紫艳丽缤纷的色为人悦目，又不露大福大贵国色天香的相让人赏心。它只是一嘟噜一串密密实实的和绿叶拥挤在一起，倘不静心去找，往往就忽视了它的存在。一个孩子，怎么会懂得朴素无华的境界和价值，于是视这种貌不惊人的花儿如路边的苦苦菜、婆婆丁一般，它开就开吧，它落就落吧，熟视无睹。槐花也着实让我吃过两惊是后来的事情了。一次是在小学语文书里，有篇叫《古丽亚的道路》的课文，开头就是“海在不远处喧闹着，窗外一阵阵传来洋槐花的香味”这样几句描写，读着，当那熟悉的花香伴着墨香飘出时便有了一种新的情味，入了书的东西总是让我刮目相看，起码在那个年代里是这样。再有就是大连赏槐会刚刚推出的时候，专为槐花设一个节让我心里犯了嘀咕：这种并不名贵的花儿能登上大雅之堂吗？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吗？可是十来年过去后如今你来看，对美的发现实际上成了城市对自己的发现，每年每年在槐香四溢的日子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在因了有槐花而陶醉而骄傲；五洲四海的朋友都会为了看槐花而相约而聚首。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感谢赏槐会，从有了它，人和花寂寞两无主的困境结束了，人运兴花运也兴的好光景到来了。

槐花开放的日子是我神不守舍的日子。只要在家，做饭洗衣看书写字通通都觉得是浪费时间，似乎只有站在窗前赏花才是正事。想想槐树是经过三百多个日夜的积蓄才献上一个芳菲花季的，我们是经过三百多个日夜的等待才迎来这个花的节日的，怎么能不

赶紧卸下所有的人生负荷来赴花之约呢。窗外边，那一挂飞珠溅玉花的瀑啊！那一片纯洁无瑕花的浪啊！看着看着，整个人就进入了仙境。此时，又常有歌声传来，细听，也是咏槐的歌：“是谁牵来了天边的白云，是谁捧出了海里的浪花，一串串一片片如薄雾如轻纱，滨城无处不飞花……”歌儿轻盈，伴着蜜蜂的嗡嗡在花间萦绕，天籁怡然中，真是觉得这样的日子要天天都过才好。

曾经，盯着槐花出神时我有过这样的猜想，别人家都在以怎样的方式过节呢？仿佛是一个答案，一个理喻，去年赏槐会期间看到的一幅节日小景，每每提起我都为它欢欣。有天晚上，我看到窗外的槐花突然地神了起来，竟能在浓重的夜色中熠熠发光，真身尽显，惊喜之余急奔过去看个究竟，发现是旁边一座楼住顶层的人家在平台上安了聚光灯，正夜赏槐花呢。多么动人的一幕，多么诗意的夜晚。望着那边影影绰绰的人们我心头一热，真想大喊一声：谢谢你们了！那束光亮堂了我的眼，也亮堂了我的心，它在向我证明：一颗爱美向善的心不孤独，即便是在夜里。

走过了冬天，我知道槐花的瀑布又要进入丰水期了。按捺住欲要雀跃的心，我告诫自己：请稍安勿躁。你看那槐花是多么懂得操守，不去为世态炎凉而改变自己什么，默默地，只管做着不负春天的准备。

人也应如它。四季轮回，该来的都会来。

故乡的老房子

关尼亚

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值得荣耀的东西。在我的童年乃至少年时代，最感到荣耀的是我们家那一排五间大瓦房。

那时，我们全村人家住的全都是低矮的小平房，房盖儿是由海边的黑色盐碱泥压的。每逢天阴要下雨时，村民们纷纷爬到自家的房顶上，细心地查看是否有老鼠洞和裂痕，以防漏雨。有时，虽然未发现老鼠洞或其他裂痕，但是倘若雨下得时间过长，房子也会漏雨的。特别是新盖的小平房，由于新压的盐碱泥踩不实，头几场雨屋内常常漏得一塌糊涂。故而，每当连雨天来临之际，新盖房的人家都把脸盆、饭钵等器皿准备好用来接雨：屋外大雨哗哗，屋内则四处叮咚，仿佛一少年在愁苦地演奏着小木琴。然而，那些叮咚的声音无不使全家人唉声叹气，愁苦不堪。惟独我们家从未体验过房子漏雨是个啥滋味、啥心情。我家那座大瓦房赫然地矗立在村子中央，真可谓鹤立鸡群！

说起那座老房子的历史并不算太久，之所以称其为老房子，是因为父亲和我们兄弟姊妹的童年都是生长在那座房子里的，以后进了城住进了楼房，便自然地称其为老房子。

奶奶十八岁那年嫁给了当时在哈尔滨大剧院担任琴师的爷爷。结婚刚到十年爷爷就去世了，此时正值解放初期，奶奶就带着她的独生子——我的父亲离开哈尔滨，回到了辽南乡下。这时，奶奶的娘家就为奶奶盖了这座大瓦房。听奶奶说，上梁那日，奶奶请了全村人来家坐席。村民们望着尚未完工的房子无不颌首赞。80年代初，我们全家移居到城里。父亲和母亲恋恋不舍地把五间大瓦房卖给了一村民。当时，村里好多人家都很羡慕那户买房的人家。

1998年的春天，我在搞农村工作调查时，从城里回到了故乡。一走进村里，我的目光就急切地寻找我家的那座大瓦房。先前，每到村里，从远处一眼便可望到大瓦房。可是现在已看不到那些低矮的小平房了，我家的老房子已被一排排崭新的地基拔得高高的捣制房和漂亮的二层小楼遮得严严实实。当我加快脚步来到那座老房子的跟前时，发现在一排排新盖的捣制房和楼房的衬托之下，老房子显得那般矮小、瘦弱、丑陋，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没了一点生气。见此情景，我在心里默默地自语道：她的确有些老了，老得那样快。

老房子的主人介绍说，老房子后面的那幢二层楼是他五年前建成的，自那以后，这五间老房子便不再住人了，成了他们家的仓库。我由衷地对他说：“农村形势发展这样快，这老房子也该成为历史了……”

离开村子时，我的心不再沉重，因为我已经从故乡十几年来发生的巨变，从农村那喜气洋洋的气氛，从乡亲们那欢天喜地的高昂的精神状态，看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日子，你别回头

张可绣

从乡间往城镇里搬家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亲人们曾留下的几样遗物。虽然事过境迁，睹物思人，心里还是隐隐作痛。

为此文以纪之，这不仅仅是我对几位亲人的怀念与追忆……

捶衣棒

捶衣棒，又叫棒槌。姑娘的捶衣棒，就是她当年的“洗衣机”。

姑娘的捶衣棒很光滑，很光亮，沉沉的，活像紫檀色的玉石雕琢品。其实，它是木头做的，一尺八寸长。她究竟出于哪位名工巧匠之手，又是谁传给了姑娘，现在已无法得知。我只记得，它曾捶破了我早先的一件黄条单球衣，我夺下姑娘手中的捶衣棒，逼着姑娘给我买一件新的。姑娘叫我逼得哭笑不得，那时我太淘气。

捶衣棒那古老而又清新的声音，早已飞远，只留下姑娘那缕苦涩的笑容。我一见到姑娘的捶衣棒，就想起姑娘在小溪边捶衣的情景。然而，姑娘离我远去了，带走那个艰辛的岁月，只有她那捶衣棒悦耳动听节奏，在我遥远的记忆中依然清晰。

尽管“爱妻号”全自动洗衣机，在卫生间里哼着逍遥自得的现代流行小调，我还是无法将姑娘的捶衣棒扔进炉膛。姑娘的捶衣棒虽然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但它至少还是山乡那段历史的见证。

姑娘的捶衣棒，捶过春的萌绿，捶过秋的金黄；捶过月缺月圆，捶过朝霞和夕阳；捶过一年又一年贫困与凄凉；捶过几代人的破衣烂衫，捶过几代人的祈祷与希望。

我把姑娘的捶衣棒，珍藏在我的床头柜里，它像山乡一行古老的诗，陈述着山乡的昨天和更遥远的故事。

蓝布裤

继父无儿无女，为了我能到初中读书，他节衣缩食。

继父这条蓝布裤，不知是妈妈什么时候，伴着豆粒大的油灯光，用手缝成的制服裤。那时继父还年轻，也爱穿制服衣裳，他却舍不得花钱到成衣铺去做。

裤子穿脏了，妈妈晚上给洗，放在锅里烘一宿，白天再穿。冬天来了

上破棉絮，就当棉裤；春天到了，抽出破棉絮，就当单裤。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数不清有多少块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补丁，遮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到头来，已经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颜色。

一针一线，补上山乡紧紧巴巴的日子；一块一缕补丁，不管是菱、是角、是方、是圆，重重叠叠，补落山乡冬夏春秋的叹息。它像一部令人揪心的辛酸史，写满岁月的羞涩与沉思，也写完了继父艰辛的人生。

我把继父这条裤子，同我的一些名牌西装一起挂在大衣柜里。大衣柜里，存列着一个昨天一个今天。今天与昨天，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破升瓢

十升就是一斗。妈说，那时做不起个“升”，就找个同升盛东西一般多的瓢当作“升”。

在我知事儿的时候，妈妈这个升瓢就打上了补丁。补丁是破瓢瓦儿补上的，连这些补丁都磨了个溜光铮亮。

仓里的粮越量越少，妈妈的叹息越量越多。借米借面，一升一升，量去了周而复始的春夏秋冬；一升一升，量去了山乡的日出日落；一升一升，量去农家朝朝暮暮的期盼。量去了妈妈暂短而漫长的一生。

妈妈的升瓢量过笑容，也量过泪水；量过苦雨，也量过阳光。一升升的凄凉，量去了妈妈满头秀发；一升升的风霜，量去了妈妈瑰丽年华。打上补丁的日子，落满了量朝量夕的升瓢，妈妈的升瓢没有量出过丰衣足食的时光……

帮我装车的人，忙乱中不小心，一脚踩碎了妈妈的升瓢，我的心也一下被踩碎！我拾起被踩个七零八落的升瓢，往一起对合几次，都没有对上，有几块碎片被风吹到乱草里。心里一阵痛楚，深深一声叹息。一声叹息，划过了半个世纪。它伴着妈妈量去了我半个世纪，我在妈妈升瓢量春量冬的岁月中，走向了成熟，走向了希望。

日子，你别回头！

老 街

姜国升

要说老街，在概念上应如安徽黄山市那条名符其实且至今仍完好保留着明清时期风貌的古老市街，那古色古香中溢出的是一种浓郁的徽州文化气息。相比之下，大连建市不过百年，是不该有老街的，尤其触目皆是十足现代城市派头，想来也都是近些年的光景，能老到哪儿去？住上几年楼房后，就会觉得那曾经挤挤巴巴住过的中国房、日本房仿佛是很久远的事了。可那里还有怎么也割舍不下的老街坊邻居的浓郁情结，有老大连人原汁原味的的生活底蕴，有五方杂处的移民文化与市井韵味，这类文化是不能写到建筑上，是在街市中代代沿袭下来的。如此说来，大连真的就有了老街。

老街之外，马路宽了又宽，沟挖开了缝上又挖，两侧的门脸儿变了又变，建筑越来越洋，灯越来越多彩漂亮。可这老街却依然故我。那该是作老城建筑保护区了。现代大都市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与车水马龙的喧嚣，无法打乱这里市民的生活节奏。住户们也许换了几茬，可看上去只是脸儿有些异样，那老街的本色却是不曾改变的。解放后近六十年，这里的居民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屋里屋外住得满满当当，可谓鸡犬之声相闻，大事小情往来密切。这里少有商气，偶见几处小卖店或小服装店，无奈这老街人不愿意花钱，那店也就老气横秋。房前庭院没有草坪和花坛，狗尾巴花臭海棠倒是常开不败，柿子树葡萄架上胡乱缠绕着豆蔓瓜秧什么的，窗前、院墙上摆满了盛满土的搪瓷盆、钵子、水桶、木头箱子等各类代用花盆，也有挺讲究的花盆，里面经常是长满茂盛的草花和蒜苗韭菜什么的。与老街之外那现代城市的浮华相比，这里真真切切地体味着老大连人的质朴、安详与宁静，如一坛陈年老酒，积淀着醇厚的土著市民文化。老街人兴致高时拍点黄瓜炒个蚰子花生米喝二两，偶尔也能整点如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之雅兴，而《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市井意境却太遥远了。

老街的春秋便是那些实实在在的日子。春风轻拂在窗外的防寒塑料薄膜时，勤劳的老大妈们就忙着赶早市，到你下班时，她们已经从一堆乱七八糟的韭菜中摘理出一小堆齐整的足够全家人包饺子吃的鲜嫩绿叶；或者在一小盆杂乱的小虾中剥出鲜樱桃样嫩的虾仁；或者在收拾一堆杂鱼，用铁丝穿成一串串的晒成鱼干，这里大概是大连正宗的饼子小咸鱼的发祥地，粗茶淡饭把儿女们吃得水水灵灵。夏日的太阳刚落，老爷子就在门前院外把马扎子茶水摆上，不知下了多少年月的象棋，总是惹得“臭手”们围堆儿叫

阵：“聊发少年狂”的老者们喜欢“手把一”与小年轻们的“打滚子”一样叫劲儿；老大妈们得闲了，就摇着大芭蕉扇絮叨着“东家长西家短，李家打了个大花碗”那个永恒的话题，身前身后猫儿狗儿与小儿们戏耍着，好不惬意。秋风乍起，暑意尚未退尽，老大妈在街上铺上凉席和塑料布，坐在上面有板有眼地絮着棉被，那些太空棉、膨胶棉什么的在她们的眼里从来都不是些正经东西。秋风舞黄叶时，院墙根巷道旁齐整地晾着大白菜、大葱，墙头树杆上晒满了切得艺术品一样的咸萝卜条。其实，他们明镜似清楚自己从来都没能吃掉这过冬“贮备”，只是这几十年老辈儿就这么做的，别断了老规矩。憨犟的老爷子总不理会儿女们给安装好的空调，一上秋就把干树枝破木头像厨师在菜板上改刀一样，剁得整整齐齐，码成一垛；再弄点黄泥拖一些煤坯，就等那小北风一刮就把火炉子支上，其乐融融。这日子过得越红火，屋里的东西就越多，儿女们都回来就有点没处放脚了。“扒小房”运动硬是把小偏厦子弄个底朝天，老爷子无奈推出了蒙尘多年的“海燕”在伤感地擦试着，他说这车子真棒，可孩子们一点儿都不稀罕。老伴说，连我早都不指望坐你那二等车了，看那车子就想起那天天上班往后座上绑饭盒的日子。现在没有那种日子了，早就该送农村了。

老街越发老了。前些天还闹闹吵吵的，突然就冷清下来了。再过不多时日，被圈起的老街一角就变戏法般地长出了一片绿地、一幢高楼，如凤凰涅槃了。传统文化以古为贵，可这老街还有点以稀为贵。有了这种情结，我每天上班便安步当车，另绕点弯儿，也要去约会那仍保持着建市初期风貌的似曾住过却未住过的老街。在这老街里，能找到的不仅类似于北京四合院里那种老北京的感觉，更为铭心的是“咱那些日子”都刻在老街坊们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一座城市的百年沧桑都凝在这老街春秋里。

太阳雨

修成国

夏威夷的纬度与我国的海南岛差不多，属热带，四季常绿。我们到那里时，是12月上旬，在我国北方正是隆冬时节。那天一下飞机，地面温度高达27度，被线衣毛衣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立刻燥热起来。

走出机场大厅，是夏威夷时间早晨8点钟，高悬于空中的太阳，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大好的晴日。可是，随着缕缕海风的吹拂便是丝丝细雨撒在人们的头上身上和脸上，给人一种湿润清凉舒适的感觉。我好生奇怪。在去往宾馆的路上，细雨仍是不停，轻轻地洒在车子的玻璃上，还不时随风从开着的车窗钻到车内来。负责接待我们的冯先生告诉大家说：“你们觉得奇怪吧，其实这正是夏威夷的一大景观，叫作太阳雨”，顾名思义，一边是太阳当空，一边下着雨。这时，我将头探出车门，朝头上和四周的天空望一下，太阳还是那么明亮，只是远处天空有一片片薄薄的白云，根本看不出会有什么雨。但是夏威夷不同于其他地区，它孤悬于太平洋深处，四周无高山峻岭遮拦，也由于空中气流变化多端，说不上哪里有片云，也说不上天空是一股什么风，便在响晴的天，把雨水淋在你的头上来了。

冯先生接着说：“这里不仅有太阳雨，还有‘彩虹岛’的美名。”他用手手指指前面车辆后边的牌照说，看夏威夷所有车辆的牌照的底图都是一道鲜艳的彩虹。这是因为夏威夷岛的天空几乎每天都出现彩虹，这是夏威夷独特的景观，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因此，夏威夷又被称为彩虹岛或彩虹城。这里的人为拥有美丽的彩虹而骄傲。听了冯先生的解释，觉得很有趣，我们有意看了一下路上各种车辆的牌照，确是如此。当我们把目光从前边车辆牌照的彩虹图案移向前方时，前边天际果然有一道彩虹，像一个彩门一样横跨在天空，于是大家几乎欢呼起来：“看，真的出彩虹了。”冯先生说，不要新奇，你们在夏威夷的这几天里，天天都会看到的。

果然，那几天，我们几乎天天被太阳雨淋着，可奇怪的是，夏威夷人几乎没有因下雨而打伞的。偶尔看见有打伞的，也不是为了遮雨，而是为了遮太阳。有雨就有虹，一会儿西边天空出现一道，一会儿东边天空出现一道，一会儿北边又出现一道，一天中也不知会出现多少次。那天在州政府大厦前参观时，天空突然出现二道彩虹，上边一道，

下边一道，真是美丽极了。于是大家端起相机，拍摄起来，都想留下夏威夷这美丽的一景。

夏威夷群岛共有八个大岛和一百二十四个小岛。总面积1.6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二十万。夏威夷群岛由火山喷发形成。夏威夷最早的居民是玻利尼西亚人，他们早年乘独木舟从南太平洋来此定居，酋长卡美哈美哈用武力统一了群岛建立了君主制国家。1778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发现了夏威夷群岛，此后夏威夷与外界交流日益增多，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居民到此定居。1898年，夏威夷王国被美国武装兼并，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最后一个州，即第五十州。目前夏威夷的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白人占33%，日本人占30%，菲律宾人占15%，还有美利坚人、夏威夷土著人、朝鲜人等，华人约占5%。

我们来的这个岛叫瓦胡岛，也叫火奴鲁鲁，就是人们熟悉的檀香山，是因为盛产檀香木而闻名于世的。这里是夏威夷州的首府。由于这里属热带，因此，适合各种热带植物生长，虽然正值12月上旬，但在海洋风的吹拂下，在太阳雨的滋润下，高大的椰子树、榕树、棕榈树，用那葱郁的绿衣，展示着热带岛屿的风姿。而盛开的柳桃、扶桑、昙花，则告诉人们这里四季如春。来到郊外，还有漫山遍野的荔枝、香蕉、桔子、苹果树以及这里独有的夏威夷果。冯先生说，夏威夷人来自世界各地，这里的植物，也品种繁多，而且各种植物到这里都能成活并茂盛的生长，用夏威夷人的话说：“外地人带来什么，这里就有了什么。”从他的话中，我们听了出来，这里是几乎任何植物都能成活生长的地方。于是，我们注意到了，这里有了亚洲的荔枝，有了非洲的郁金香……连著名的夏威夷果，也是引进的，但却在夏威夷成了名。

太阳雨使夏威夷变成一座十分洁净的城市，在这里绝没有尘埃污染，整个岛子都是干净清洁的，白色的衬衣穿上十天半月也很少见到污垢。地面也无尘土可言。夏威夷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穿着也十分随意。除了政府官员和外国游人，本地人穿着都很休闲。冯先生还告诉我们说：“夏威夷人形容说，他们有人一生只穿两次西服，一次是结婚庆典，一次是死后由别人给穿上的。”

我们在夏威夷的时间只有三天，无论在繁华的市区还是在郊区住宅区，无论是在美丽的海滨还是在旧日的火山口，到处都是绿树，到处都是鲜花，整个岛子像一个绿色的翡翠球，像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夏威夷也正是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游人，据说，这里每年总收入三百二十亿美元，而旅游收入就占一百零八亿。

那天晚上，我们10点多钟离开夏威夷前往洛杉矶时，也是在飘飘细雨中登上飞机的，只因是夜间，不能叫“太阳雨”了。

发表于1998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老大连有一个商业学堂

张琳

日本投降前的老大连，专门收中国学生的中等学校计有七座。除了旅顺高公、协和实业、金商、大连商业讲习所、金州高女、大同女校之外，再有一座就是大连商业学堂。这座学校坐落在西岗小山上，毗邻西岗露天市场。观其外表，的确其貌不扬。虽然“堂歌”里唱什么“高耸入云的校舍”，其实那校舍的绝大部分是西岗公学堂的，商堂只占西部一隅，仅是二楼的十来间教室。礼堂和操场都是与公学堂合用，连医务室也是合办的；岂止这些，很长时间，连校长都是人家公学堂的校长兼任的呢。就是这样一个硬件极差的学校，却在大连地区出了名，念过六年级的小学生们，大凡在校名列前茅的，除了想升高等学校的例外，没有不争着报考这个学校的。简直可以说是“趋之若鹜”。

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回想，真是挺有趣的问题。

那时我在土佐町公学堂读小学。优等生考商堂，好像是一种时尚，不问为什么，也许知道为什么，因为好像听说这学校的毕业生很“抢手”，学生没等毕业，各个公司、株式会社、银行等财经单位也“趋之若鹜”地来校洽谈聘请就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来学校一看，居然是如此这般的寒酸。记得当时还曾失望了一阵子。可是后来不久就渐渐安好了。因为这些寒酸的条件，对于学业竟是毫无影响。教室少，学生也少，够用就行；没有设备，学商科，不设生物、化学实验室也凑付。虽然有一门“博物”课；礼堂，要用时，打开走廊的门，走进去就是；医务室，只要能治病，两校合用又何妨。惟一不能合用而必须独立的学生寄宿舍，却已在南墙外建造了一幢可容百人的小楼，院子挺宽敞，安上两副架子，可给学生打篮球用，正好补上了合用操场缺乏这种设施的不足。必不可少的有了，可有可无的不备。这种崇尚节俭，不图奢华，在当时虽不感到有什么光彩，如今想想，可还真得佩服日本人的勤俭办学的精神哩。

俗语说，包子馅好不在褶儿上。在这样不讲排场，不摆谱的学校里有的是勤学苦练，敏而好学的作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无论在比赛的科内课珠算，还是科外课各种球类，常常是不但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

当然，日本人办学的初衷是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的，是想把我们教育成有文化的奴隶。可是他们忘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爱国主义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岂是他们仅

用不准称自己是中国人，不教中国历史，不教中国地理即可达到目的！他们更忘了，文化、知识就其纯粹的意识上是没有阶级性的，更没有国界；文化、知识本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可以为你服务，也可以为我服务。可以这么说，在当时，商堂的芸芸学子的勤学苦练，学好本领，皆是为了就业糊口谋生，但是，在他们学好本领，有了文化知识以后，人们就有了思考前途的工具，就产生了尽管为数不多，但是可代表商堂荣誉的佼佼者。比如十二期的学友王文义，二十期的学友林针、方牧、安言兵、李启生、杨本甲，十九期的胡毅明、木林，二十二期的刘辛、二十三期的王陡等，学了汉语去读五四以来的进步书籍和外国名著，学了日语去读马列主义。在当时中文版根本看不到，可在日文书店买到日译本，并且亲身实践，自费去延安，去解放区寻找党，自备经费干革命，积极为党搜集情报，甚至组织一支反满抗日地下组织……直到有的同学回山东参加八路军，还用学到的日语相当成功地做好日本侵略军俘虏的工作，有的在敌人统治下敢于公然反满抗日而惨死于牢狱中。至于早期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的关向应将军，是大连金州区人可能大连市尽人皆知，不过他是大连商业学堂前身商科二年级毕业生的史实，知道的人可能不太多了。关向应同学永垂不朽！我们今天终于喊出了这句早该喊的话，作为他的下级生，我们终生以为光荣。正因为这样，一旦日本侵略者倒台，大连一解放，这帮青年学子就像囚鸟出笼似的，用所学本领为人民，为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的做报纸杂志编辑，有的做党的工作，有的做教员，有的做文工团员，有的参加了解放军，到总参情报部门……

他们工作不遗余力的。但是在左倾主义统治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商业学堂就是日伪学校，学生就是日伪爪牙，就是反革命。我曾见过一个“文革”展览会，摆出的罪证就是那些“莘莘学子，风华正茂”栏的照片，说是学生戴圆帽和战斗帽就是日本军装。闹得同学们相见不敢相认，怕人说是社会关系复杂。在左倾主义统治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商堂的学生大部分都遭过磨难，特嫌、右派、右倾、阶级异己、反革命、走资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终于在二十年前三中全会后，全部平反。当然，商堂学生中也有极少数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被镇压不在其列，从此走上报国有门的康庄大道。他们原本是不幸的一代，风华正茂时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压，日本人投降开国以后正在为祖国尽心尽力之时，又屡屡遭受各种磨难，如今苦尽甘来，又能把所学的本领使出来了，虽然时间稍晚了些，他们已进入了中老年，但总算又生逢盛世，他们又可以当高校院长、银行行长、公司经理、教授、作家、编辑、政府官员……即使退休养老，亦感幸福无穷。几乎每一位诗人的作品里都在高唱邓小平的英明伟大；都在

高唱祖国山河一片大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这是百分之百的真心实意，因此我们不惜篇幅，大登特登：我们也是幸福的一代！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欣喜地发现我校十四期毕业生邵友保，这位日本东京银行香港分行的副总，成为港事顾问、预委会委员，为香港的回归祖国尽了自己一份贡献，同时还是大连市荣誉市民，市政府经济顾问，为他少年时代读书的城市也做了有益的事情。还有一位二十一期的同学张奕夫，这位企业家在台湾定居四十年后，毅然荣归故里投资办企业，也算我们商堂的一份光荣。

人是一个矛盾体，世界的事也是矛盾的，作为敌人，日本人从宏观方面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厌恶和反抗是很自然的，所以，在学校有罢课、有讥骂与反叛，在社会，有破坏殴斗、复仇、打砸等等。但是作为教师，日本人又是教我们本领 文化知识的先生。又有令人尊敬的一面。尤其是日本统治者那一套野蛮行径，为人师表的教员，他们多数也是不拥护的，充其量也只是为糊口不得已而表面服从而已。在某些时候，他们竟然很照顾师生之谊而袒护学生。在课堂上他们俨然是一个传播知识的老师，花尽心思想让学生学到本领，这也许是人类的职责天性吧。所以商堂的学生一般是很尊敬老师的。尤其是当他们年事已高回首往事时，对那些为学生们作出有益贡献的教师们，大都有一份美好的回忆。中国人是很讲师道尊严的。俗语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方牧生前去日本考察工作时，特意去探访在小学教过他的老师土川先生。当时已经八十岁的老先生十分感动。不忘师生之谊，这是中国人也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我们应该大力提倡。

虽然在左倾年代商堂学生大受磨难，但在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在政府系统的大部分成了高干，在学校学术部门大部都有了高级职称，离退休后也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有一个回忆过去，说说今天的园地，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同读同乐，当他们不在的那一天，他们的后代还可以知道父辈的酸甜苦辣咸，不敢说是优秀传统，至少也可以知道他们的父辈没有虚度一生。孩子们，千万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日子！

发表于1999年8月《大连日报》

家住人民路

杜敏

我家住在人民路。这条位于大连城区东部的路很短，尚不足两公里，却颇有知名度。许多外地游客到大连，要慕名来这条“涉外”路上观光；城市西部的居民也常在闲暇之时，来这条很“现代”的路上走一走。

在大连生活了四十多年，我对人民路是很熟了。忘不了孩提时与院里的小伙伴一起，沿这条路往东跑，去码头附近看肤色各异外国海员的那份新奇；忘不了晚饭后，随爸爸妈妈在这条路上散步，那份恬静、惬意。然而，与这条马路有了更深的情意，始于1978年。

那年初一个雪后的日子，阳光柔软地照着。我这个新娘子在宾朋们的簇拥下，走进了充满喜气的婆母家门。婆母家的地脚真好，就在人民路旁的一条小马路边上，那可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黄金地带，不过，那房子，那居住条件之差，可真是让人汗颜。窄小的中国四合院式的二层楼房，塞满了十二户人家六七十口人。没有暖气没有煤气，家家户户门旁窗下堆满了杂物。每当天气渐凉的时候，门前的马路就成了脱煤坯、摊煤饼的作坊。男人们休息时间里去几公里外的南山挖来黄泥，再用水把泥和煤面子搅拌到一起，做成长方形的煤坯或圆溜溜的煤饼，最后让它们躺在马路边直到干透了，算是备好了冬天的燃料。四合院里的居民可会过日子了，所有能再利用的破烂都是宝贝，攒下的划拉来的杂木块、废纸壳子、旧书报……加上煤坯煤饼，再加上同样凭购买证定量买来家的木柴，塞满了家家户户，也堵满了整个小院。

最让人感觉不便和难堪的，是整个院里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旱厕所，于是就有了大清早男女老少排队等候“蹲位”的尴尬和数九寒天去提水，被水龙头下的冰砣子滑倒而跌伤的痛苦。

没想到经历了浪漫的恋爱之旅后，丈夫领我把承载恩爱的小船泊进了这样的港湾。可他除了“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听公爹婆母讲，他们是1950年搬来的。那时节，院里的婶子大娘喊婆母“小媳妇”。“小媳妇提水时一不小心滚了楼梯”的往事，就是楼下的吴姨告诉我的。而今，当年的媳妇熬成婆了，小院却没甚变化。我依旧得往二楼拎吃的、用的水；丈夫照旧得去挖黄泥，脱煤坯。人们叫生活累得陀螺般滴溜溜转，把个日子过成了煤灰色。

就在那年秋天，有件令世人瞩目的大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当桌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告诉我这个新闻时，我正在拨弄炉火。这恼人的炉火经常“欺生”，莫名其妙地不干活。

在炉火的忽明忽暗中，冬天很快过去了。窗外的老树抽出了新枝。人民路迎来了春天。

先是一些破旧的民居被拆掉，代之而起的是富丽堂皇的大连国际酒店、富丽华大酒店、徐园饭店……眼瞅着二三十层高的大楼一幢幢地蹿起来；眼瞅着街上走着越来越多的“老外”；眼瞅着“奔驰”、“宝马”、“皇冠”、“凯迪拉克”飞驰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上，我和邻居们一同瞪大了眼睛。

终于有一天，有人来我们院里召集居民开会，让大伙儿先搬出去住两年，说再回来时，就能住上有暖气有煤气，自家屋里就有上下水和厕所的新楼房了。

那两年的时间过得非常慢。一有空，我就抱着女儿跑回去看：那一片小平房大杂院被夷为平地了；建筑工人画线、挖地基、砌砖了；七层高的住宅楼结结实实地站起来了……工地上，散居各处的老邻居常常不期而遇，住楼下的张大爷更是差不多天天拿着个小“马扎子”，坐在路边的大槐树下看。大伙儿互相见着了，自然就格外亲热，聊着家常聊着近况聊着何时能迁回来这共同的话题。

待到我们两口子迎来结婚十周年的日子时，已搬进朝思暮想的新楼房里了。结婚十年，恰逢祖国改革开放，狠抓经济建设，这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深意义的体验。

就说人民路吧，说它一天一个模样也不为过。最醒目的，就是那摩肩比踵的高楼一个赛一个地“疯长”。继友谊商城、海桥大酒店、中粮大厦、动植检大厦等落成后，又立起了香格里拉大饭店、宏誉商业大厦以及尚未竣工的奔德大厦、亚太国际金融中心等。人民路上还有许多办公大楼，恢宏的新建筑更显其庄重气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大连商检局、大连边防检查站，还有中保人寿保险公司、中信实业银行……一个赛一个的漂亮，让行人把它们当作风景看，美不胜收。

夜晚的人民路更是个灯火世界：高挑的造型独特的路灯，川流不息的车灯，草坪边低矮的脚灯，高楼上闪闪烁烁的装饰彩灯，还有五颜六色的广告灯箱、射灯、霓虹灯……整条大街都在流光溢彩，推远了漆黑的夜幕，照亮了人们的心房。

每年，大连有自己的喜庆节日：赏槐会、服装节、国际马拉松比赛，必有朋自远方来。欢乐的人民路便敞开怀抱，喜迎嘉宾。在那些相映竞辉的星级酒店里，在闻名遐迩的大连国际海员俱乐部、友谊外商俱乐部里，高朋满座的大厅中常传来大连音乐家的丝竹管弦声。

就在昨晚，我们一家人漫步在人民路上，见到富丽华大酒店门前数十面图案各异的旗帜在晚风中飘扬。由大连港主办、加拿大温哥华港和日本横滨港协办的第九届环太平洋港口研讨会正在这里召开。世界上五十多个港口的代表汇集大连。时至今日，这么多的“老外”莅临大连，已不再让孩子们新奇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见多不怪了。

人民路的生活是色彩斑斓的，守着这样一条路，天天看也看不够。徜徉在树影婆娑间，心旷神怡的同时，自豪感也油然而生。丈夫常常“开导”我：“怎么样？幸亏有了我，让你住在了人民路。”

我俩再次举起高脚酒杯，庆祝结婚二十周年的时候，日历已翻到了1998年。忽然发现，至今尚能在这儿居住，真是值得高兴：这儿的居民已经越来越少了，大都一次性动迁后，不再回来住了。附近的明泽小学1990年招生时招了四个班，而去年秋天，只招了两个班，一个班才有三十二名学生。前年，有二百多户人家的万里居民委整个儿地迁走了。这么一大片老房子拆了以后干什么？有人说要盖座四十多层的大高楼。

哦！人民路，二十年的变化历历在目。如今，从我家往东看，富丽华大酒店亭亭玉立；回眸北面，是两座二十四层高的公寓楼；仰望西侧，近三十层楼高的脚手架和长臂吊直指云天，我们这座七层住宅楼简直像个小偏厦子，深深地陷在高楼围成的“井”中。对门邻居跟我讲，听说这儿又要动迁了，要建个大型的现代化停车场。这种“听说”经常有，我宁愿不信。我可不乐意搬走，我非常想在这儿安安稳稳地住下去。

愿望归愿望，自己心里透明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日新月异的人民路已告诉我，待到我这个“媳妇熬成婆”时，这条路一定会变得更加繁华更加美丽，大连也一定是更开放更国际化了。

戒烟记趣

邵默夏

我决定戒烟。

也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理由，就是认识到人不应该抽烟，烟对人没有好处，应该戒掉。

可是我已经抽了许多年烟，瘾很大，要戒掉也不很容易。何况曾戒过两次，未戒成，反而抽得比以前更凶了。

但这次下了决心，一定戒掉！

我戒烟，除了精神准备外，还作了充足的物质准备。事先我访问过曾有戒烟经验的人。人说，要准备糖块，想吸烟时就吃糖。我想这很有道理，以糖之甜换烟之苦，人所欲也，定能戒住。嘿！把苦的扔了，在甜甜蜜蜜中把烟戒了，真是人间一大美事。何乐而不为之呢？当时糖块属于紧缺物资，商店里平常见不到。市里是凭票供应的。乡下不凭证，商店里有时摆上，谁遇上谁买，卖完拉倒。我用了心，常常去逛商店，果然遇上了，我一次就买了三斤糖块，一斤供自己戒烟用的；一斤送给老谷的外孙大斌；另一斤打算回大连时带给我的小女儿。

这样我就正式准备戒烟了。

时间是1974年秋天，那时候多数下放干部已经回到城市。花卉专家谷凤阁一家还留在乡下。公社把他一家从大沟里的金屯迁到沟外的龙王庙。那里有三间房子，挺大的院，也算是发挥技术人员专长吧，公社留他在这里繁殖步云山产的珍奇树苗和花卉。我同这一家人交往非常深。共同的命运，使素不相识的城里人，在乡下亲密起来，而我们在金屯半年之久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生活，使我与这一家城市下放户老老少少亲如一家人。

我跟老谷大嫂说了我的戒烟计划，她立刻说：“就把我家当成你的戒烟所。”便招呼四女美意五女美伶：“把东炕倒给你老邵大叔，他在那炕上戒大烟。”

承她的好意，我开始戒烟了。从当日执行。白天，我出去工作，目的在于把抽烟的事忘掉。晚上回谷家休息。当晚就发起高烧。第二天就出不去了。高烧不退，泪一把，鼻涕一把的。第三日仍然发烧，整日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来，睡又睡不着。第四日，

高烧不退，鼻孔也肿了。这时我想，戒大烟一定很痛苦，我戒小烟尚且如此，何况戒大烟乎。物伤其类，我对戒大烟的人产生了同情。

热情、开朗、好说好笑的大嫂见这样情形，心也软了，先为我做好饭，见我不吃，劝我：“别戒了，弄出病来怎么办。”

少言寡语的谷凤阁递过烟来，“抽吧，兄弟，我今年八十岁了，没见过抽烟抽死的。”我从心里感激这一对老夫妇。他们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也明白，我一旦抽烟，身上不适症状立刻就会消逝。

但我不能接烟，不能开口。如一动摇，所有努力便会统统化为乌有，今后也别想再戒烟了。

吃糖吧，吃糖能帮戒烟。从第一天戒烟起，我就吃糖。每想到抽烟，我就嚼糖块，好像糖块能化作盆水，能浇灭我心中时时蹿起来的欲火。

我先吃自己那一斤。吃完了，再吃打算带给小女儿那一斤。到五六天，两斤糖块都下了肚。糖在嘴里从甜变为咸，再从咸变为苦、涩，还是没能忌下烟。什么事都干不成，一心只想抽烟，所谓精神上“若有所失”“没着没落”当是如此。这种精神折磨的滋味，这一次可真是体会够了。

吃完两斤糖块以后，我只有向大斌求援了，我送他的那一斤，他还没有吃完。

这个四五岁的胖小子，见我泪一把，鼻涕一把的，送我几块糖，两眼笑成一道缝，逗我：“老邵头，想媳妇了吧？”

而我此刻已经没有精神头逗弄这个孩子了。

我想起，许多年前看过一幅漫画，是嘲弄戒烟而没有决心的。似乎是华君武画的。漫画由三张相连接的画面组成。第一张画上画一个决心戒烟的烟客，一狠心把正在吸着的烟斗扔到窗外；紧连的第二幅，这个烟客飞速的跑下楼梯；末幅，他正好伸手接着了扔下来的烟斗，狠命吸着。

我又想起1945年—1946年刚从山东派到旅顺那个年月。没钱买烟吸，曾从苏联“骚达子”士兵手里以物易物换过“马合烟”这种不见烟叶，只由烟茎粉碎而成的烟。抽到嘴里又苦又涩，全闻不到一点烟的香气。还从“骚达子”那里学会卷烟法——“嘶”的一声，撕一条长三角型的俄文报纸，然后用手指捻成喇叭状，就把小块粒的马合烟末装进去，点火抽。

在“文革”当中，我被大连海运学院的“造反派”抓去关了两个月。学生不抽烟，我又是在押的走资派，谁还愿侍候我。托不到看管我的人代买烟，只能硬扛。忍受不了时，我曾捡过丢在走廊里的烟头吸。我有过这么艰苦的经历，也没忘了烟。

这一次就坚持着，硬顶着。顶过半月，遭了两个礼拜的罪，也就忌着了。

而后一段时间，就是同多年养成的传统习惯作斗争了。几十年形成的恶习，改变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但，坚持着，心想抽烟，硬是不抽，也就过去了。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还有，就是警惕与抵抗新的诱惑。我曾戒过两次烟，已经多日不抽了，在遇到新奇香烟时开了戒，自然原因在意志薄弱。

而每一次复辟都比原来抽得更凶。

我与香烟结缘在七八岁。那一天我把一粒橡实挖空，插上一截桔杆，就成了一支烟斗。

我拿了自制的烟斗到爷爷炕头的烟筐里装烟。这时爷爷刚刚吃过晚饭，叔叔们正守在爷爷身边抽烟。见我装烟，五叔说：“哎，小孩抽烟不好。”

我没回话，看着大人们抽烟。

三叔说：“不信，问问爷爷去。”

爷爷也在炕上，正在靠着墙休息，他不待我问，便说：“抽吧，不抽大烟就行。”爷爷是家庭的最高权威，他说完话叔叔们再没言语。可我并没有从此抽起烟来。不过是小孩好奇，愿意模仿大人的行为。但我领教了农民对待抽烟的道德观念。

过了七八年，到了1945年，我已经参加革命多年了。1945年8月，当时我在北海专署工作。我们北海部队正围困着日伪军占领的烟台、龙口、蓬莱、黄县等沿海城市。就要攻城了，为进城作准备，已经不只组织干部学习日语，这是头几年就进行的，而是学进城后的任务、纪律。比如说，进城后见了老人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统称老大爷。要看对象，有的就要称先生。见了女的要叫太太、小姐。与人接触要有礼貌等等。下课后，同志们彼此取笑。有的人说怪话。不几天后，黄县城解放了，北海机关进了黄县城。我学的那一套真的用上了。

从大山沟进入城市环境变了，工作对象不同了，党和人民政府要调查研究，以便及时制订出相应的政策，而且要立刻同新的群众加强联系，向市民宣传党的政策。为此地委立刻组织城乡工作队，来执行这一任务，我被派到城南关当了一名工作组长。

那一年我只有十八岁，但作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派去的干部，我身后有强大的党和人民做靠山，心里有正义，所以胆壮气豪。工作中我接触了大学教授、宗教界领袖、商人，黄县是有名出商人的地方，还有各界劳动群众。我同上层来往，彼此敬烟递茶，不卑不亢，举止大方。

烟是公家发的。卷烟，叫作工作烟。平常不抽，用得着时，向对方敬烟后，自己也陪抽一支。领导上说与人来往时，不能光抽人家的烟。那时我们戏称为革命抽烟。而当时解放区真正抽烟的干部抽的是旱烟。就是地委书记和专署专员也抽不起卷烟。大家都如农民一样抽旱烟。那时没有工资，但每个月发三元钱津贴，作为日常生活用。如买个肥皂、牙粉之类。我记得在根据地当时三元钱可以买一斤旱烟，三元钱也可以买一斤猪肉。

工作队任务完成了，我也就不抽烟了。

真正抽烟是1945年秋天，渡海到了东北，进入新闻界，同文字打上交道。不分黑白的绞脑汁、苦斗，烟就成为相伴多年的朋友。

尤其是在1947年到1949年间，我在《关东日报》当编辑科长，主编要闻版。这段时间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发展迅速阶段，这期间经历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关东日报》住的房子是一幢六层楼，解放前的餐馆，房子又高又大，取暖设备坏了，冬天很冷。伙食也很差。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连轴转，没有休息日。因为新华社重要电稿常常夜里发，所以我们就得每夜跟着等电稿。报纸和前线一线连，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的神经就跟到哪里。解放了大城市，报社出号外，从黑夜一直忙到天亮，号外也从半张报纸大，扩到一张报纸大，直到办公桌那么大。

那时候没有娱乐，没有物质享受，只有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的为革命工作。那时候如果死去，可真是纯洁无瑕，可以说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革命事业了。青春年华，单纯热情，是献给革命祭坛上纯洁的圣体。也就在那个时间，在前线，有我好几个同村儿时的同伴和参加革命后一起工作的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能够顶下来，至少靠着三条：一、革命热情；二、年轻力壮；三、抽烟。那个时候真是离了烟过不了。我最多时候，一天要抽三包烟，一支接一支，烟火不断。手指熏成咖啡色。

1948年的时候，在大连已经发一点工资，然而就这点工资中还含有一点实物，每月发给几包香烟，男女都一样，一律平等。纸烟叫织女牌，是烟厂利用解放前销售过的织女牌的烟盒装的。我科五个人中有三个人不抽烟，不吸烟的同志常常把他们领到的烟无偿支援我。那时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私有观念淡，而同志情谊深。有这雄厚的后勤保障，抽起烟来，我就无后顾之忧了。偶尔不足，从市场买少量的补充一下就可以了。

如今，我戒掉烟的时间已有二十余年，我与烟魔各自独立存在，已经无感情牵连，我可以超然地谈谈戒烟的事，客观地说说看法：我想，烟之与我，非生来所带。烟对人

类，非身体所需，非精神所要。如粮食、蔬菜以及水可以延续生命，可以产生力量；文化则作用于精神，医药可以治病。初吸烟时，烟草对人有兴奋精神作用，倦怠时有提神作用。而如我，吸食多年的老烟鬼，身体已全为烟毒所薰浸透彻，烟对我哪里还有什么兴奋作用？只不过养成一种恶劣习惯，到时候非抽不可就是了。烟魔同我相互依存，烟魔依我而生，我以烟魔为精神寄托罢了。

在我认识到烟的危害，决心戒掉以后，今天我闻着烟，同过去一样觉得烟香，不似有的戒烟人带感情地说闻到烟味是臭的。我虽闻到烟香，但是烟对我已经没有诱引力了，更说不上相互依存生活的一部分了。烟与我各自冷静地客观存在着，你香你的，我做我的。形同路人，各不相扰。

如今戒烟的方法很多，烟对人的危害也宣传得厉害，许多国家相继颁布了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命令，吸烟者渐处于不利地位。这环境大大有利于戒烟。

但是，不下决心，多好的方法也戒不掉烟。

我相信毛泽东的那句话：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收录于小说集文集《蓝天呼唤》

检验爱情

王毅

邻居两个结婚不长时间的年轻人，常常吵架。每次吵架的时候，女方总是说：这辈子跟你算是倒霉了，下辈子说什么也不和你过了。男的则说，下辈子打光棍也不找你了。其实，他们还是热热闹闹地过着。前些天，还生了个胖女儿。从敞开的门缝中听着二人的拌嘴，总觉得好笑，此生不满意，寄托在来生不相遇不牵手，而今生似乎只好打打闹闹凑合着过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种厌倦今生的家庭和配偶，而希望来生不再牵手的故事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也有反映。小说《面相》中说：女主角深深厌倦了爱着她的丈夫，可自己并不爱丈夫。所以，当有一个来自遥远的外星人问女主角：“你们下辈子是希望仍旧在一起，还是永不相遇？”尽管不想伤害丈夫，女主角还是鼓足勇气说：“我们宁可永不相遇。”作家的结论是：只听咔嚓一声，爱的幻象被锁在了大门外。如此看来，古今中外，凑合着今生今世的姻缘，来生却不想再牵手的红尘男女充斥在地球的所有角落。

如此想来，检验家庭是否幸福、检验配偶是否真爱自己、检验婚姻的质量，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便是，问他（她）来生是否愿意继续牵手。可是，那答案却未免太令人恐怖了，如果说愿意，心中会欣喜会安慰；可是如果回答问题是不愿意，那岂不是如昆德拉所写：爱的幻象被锁在了大门外？！原先的自以为爱情当然也就成了自作多情，以后的婚姻之路该怎样维系？！我很想问问丈夫，又恐惧听到和作家笔下的女主角一样的回答。如此，多年自以为浸染在爱中，其实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份幻象。尽管我相信自己很坚强，恐怕也很难承受这残忍的结局。温情脉脉的爱的面纱后面掩盖的则是不爱的事实，脆弱的心灵如何承受得起啊！如此，难道也要抛弃真实的今生，把爱寄托在飘渺的来世。要知道，男人都是博爱的，都是喜新厌旧的呀，我又有什么理由、多少魅力要求一个男人今生、来世都爱我一个。一个小小的游戏，竟然难煞了我。可无论如何问个明白的想法却像雨后阳光下疯长的野草，在心灵深处不可遏止地蔓延着。

终于，有一天，我装作漫不经心、没心没肺、灵机一动的样子问丈夫：“喂！下辈子你还想不想和我一起过日子。”丈夫抬起头，看着我，我觉得他的眼神一下子就看透

了我的鬼把戏。他顿了顿，那瞬间的停顿，我的心好像要跳出来。完了，非要用这种方法检验感情，实在是无事生非！自寻烦恼！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四目相对。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又很认真地说：“想，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过。”要跳出嗓子眼的心终于又回到了原处。我终于没有输掉这盘棋！我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你为什么喜欢和我一起过啊！”暗暗得意的想，丈夫一定能说我多么多么地好，多么多么地值得他爱。我激动地等待着爱的表白。这次，他更认真了，看了我好一会儿，思索着慢吞吞地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个人比较散漫、比较含糊，又不是很勤快。你自己散漫，也就不太管我，和你在一起比较自由也轻松。很多女人的特点也是缺点，就是以管男人能耐，把男人管得在外面累，在家中也累。你不一样，进了咱们家，我的精神就立即松弛下来。你营造的这种家庭气氛很适合生活。所以，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和你结婚的。不过，最好早一点，三十才结婚，太晚了。我们二十岁就结婚吧，可以多过一些年。”

我想笑，却笑不起来。不想哭，眼睛却不由自主的有些湿润。上帝，原来他前世愿意和我牵手的理由竟然全是我的缺点，而那缺点在他眼睛中竟然又变成优点。散漫、懒惰、不会理家，竟然因为这些而爱我，而愿意和我今生今世、来生来世！

丈夫说：“你不高兴了。”我说：“没有，不过，你让我再次明白了那个简单的真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在许多人看来，我那些不适合做妻子的缺点竟然会是优点，这太让我意外了，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丈夫说：“一个太勤快的女人，把家中收拾得一尘不染，男人在家中也要绷紧神经，像被管制的人，处处小心翼翼，别弄脏了弄乱了家，神经总处于紧张之中，我可受不了。我的一个同学，他的老婆就总是把锅里锅外擦得雪亮，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收拾家，让他时刻小心翼翼的，连沙发都不敢随便坐，夫妻俩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你说那日子有什么意思！”我哑然。拍拍他的手：“谢谢你，容忍我的缺点。我们还是好好珍惜、抓住今生吧！”

想知道他（她）爱不爱自己吗？做个游戏，问问他（她）来生是否愿意和你继续一起走吧。而那问答，在是与否两个答案之外的具体原因必然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回答。幸福的家庭也是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不同的。

生活五光十色、千奇百怪，家庭当然也是五光十色、千奇百怪的。我终于释然。

倾听“法布尔”

津子围

我是在20世纪末接触J·H·法布尔的，令我惊讶的是，法布尔和法布尔精神属于19世纪。对于已经39岁的我来说，留下的不仅是遗憾，还有身心俱痛的感慨。

如果说我的感慨缘自对世界文化没有及时有效地共享的话，那么，更多的是对我们缘何迟疑地接受一种文化观念所带来的思考。说起来，法布尔的《昆虫记》并不晦涩难懂，反而流畅好读，利于普及。在法布尔那里，我知道萤火虫用微小的钩子将麻醉汁注入到蜗牛体内，蜗牛的肉体被释化为液体，萤火虫就吸吮“预热化”为汁的猎物；知道蜘蛛网的每一根丝线是管状的，它们上面有孔，并粘着不规则的黏液；知道蝉卵的遭遇，当雌蝉产卵时，一种墨黑的蜂科类飞蝇就会尾随其后，将自己的卵产在蝉卵里，而取代蝉的家族，并“独享一份肥美的蛋黄”。……

现在，我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对动物特别是昆虫类生物的知识实在有限，更谈不上理解，并从人类的角度给予它们以人文关怀。小的时候，我接受的动物和昆虫的知识仅限于简单地区别它们，区别它们主要在于它们的形状不同，那个层面已经算有“知识”了，没人愿意作更深入的了解。在那个时期，我还接受了有助于“想象”的童话和神话，问题在于，我没有真正了解动物和昆虫的时候，就附加了变形的童话和神话，使之离事实的本原越来越远。到我理性地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先天不足的思维方式时常使我产生偏颇和局限。

后来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这样的文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危险”的东西担心有余，而对“没有危险”的东西认识不足。这个认识上的缺陷将给人类带来麻烦。细想一想，像狮子、蛇一类危险的动物一年危害多少人？而死于蚊子等昆虫传染病的数量却极其惊人。

我接触法布尔的时候，我的儿子八岁，放学后，他在楼下玩一个半小时。他回来的时候，几乎每一次脸上都抹着泥道子，腿上划着血痕。他在楼下的草丛里抓蟋蟀。我内心伤感，不仅仅是他外在的狼狈相，在一个到处是钢筋水泥，挤满了人的城市里，儿童与大自然间的联系实在太少了。我儿子把他的成果拿给我，令我惊讶的是，他比我想象的还勇敢，他可以在浓密的草丛和废弃的墙根儿匍匐着、搜索着，他想出了很多我想不

到的诸如向蟋蟀洞里倒水，用石头敲震等方法，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有关蟋蟀的知识，通过尾刺来判断雌雄，通过头和翅膀来分黑将军、黄鹂、大头宝、胖头鱼等。

在台灯下，我们两代人一起读法布尔，倾听法布尔的声音和呼吸，寻找法布尔“探求真相，追求真理”的精神。我知道，法布尔告诉我们的不仅是文字所传达的知识和含义，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太重要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与我的儿子不同的是，这个方式对于他来说是接受而对于我来说则是补课。我希望他长到我这个年龄时，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不是分割的，而是完整和科学的。

发表于《新民晚报》，《青年文摘》、《延河》等转发。

秋千应该荡多高

梁红岩

周末与同事到成园山庄度假，尽管满山遍野依旧是枯草，但心情却一如这郊外的空气，清新着。山庄里有一小块儿童乐园，粗粗拉拉地摆放着几件玩艺，秋千、翘翘板、滑梯等等都是实打实地用生铁、硬木铸成，远不如城里公园中的游艺那么精致。也正因如此，我们这伙成年人才有机会冲上去展示一下自己不再轻盈的身手，追忆一下早已苍白的童趣。

我选择了秋千。秋千对于女孩、女人都是一份浪漫的情怀。站在木板上，双手抓住铁环，使劲儿地悠一下，秋千便荡了起来。可随之，心跳也加快了频率，腿肚子自然地抽动，手心儿竟也沁出了冷汗。慌乱中，只好变换姿势。坐在秋千上，轻轻地荡着。

完全不如从前了。小的时候，我是个疯丫头，秋千这玩意儿，我玩得好着呢。站在秋千上，双手握住铁环，双腿微弯，身子前弓，稍一用劲儿，秋千便荡了起来。荡秋千用的是巧劲儿，荡得越高，用的劲儿越小，越有种鸟儿的感觉。每每荡到妙处，便觉得自己插上了翅膀，不长也不飘逸的头发立即就会跟着飞起来。有时遇到风，头发就乱蓬蓬地迷住了眼，挡住了视线。此时，才是恰到好处。人在高处，只有闭上眼睛或者眼睛望着天，心才不会发慌。

小时候，因为无牵挂、因为无所顾忌，所以才不造作、才胆儿特大；因为不懂得什么是美感，不懂得荡秋千的女孩同时也应该是他人眼中一幅清纯、飘逸的风景，所以才快乐着自己的快乐。而如今，身上的累赘太多太重，心也不再年轻，飞不起来了。

同事见我悠得了无生气，便在背后为我加把劲儿，秋千随之加大了摆荡的力度。见我没什么反应，同事就再加一把劲儿，这下秋千终于有了荡的感觉，“荡起来了，荡起来了。”观者开始兴奋，然而我却失了声地尖叫：“快停下，快停下！”这几下大幅度的摇荡，荡得我心慌、手软，荡得我有种把握不住自己生命的恐惧。

秋千到底应该荡多高？只有荡秋千者自己心里最有数。退一步，尚有闲情逸致，而跃一步，或许生命中就不能承受之轻。生活中的许多事，皆然。

花园里的天堂

——记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李东平

这是一片静悄悄的土地，却占着巴黎市中心五十公顷的黄金地段。中国人去法国旅游常常是看不尽的埃菲尔铁塔、塞纳河，游不够的凡尔赛宫、卢浮宫，品不完的法式大餐、葡萄酒。很少有人会去看看其实同样有名的另一个世界，这就是长眠着法国和世界上不少名人如大作家巴尔扎克、戏剧家莫里哀、作曲家肖邦、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地方——拉雪兹神父公墓。这是巴黎最大的公墓。

说到公墓，许多中国人都会倒吸一口凉气，马上想到山里那一座座坟。更由于小说影视的不断演绎，又会生出各式各样想象中的鬼魅，于是荒野呼啸的风、明灭的火，飘忽的影子长长短短——女儿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不去！问她为什么，她说怕鬼，可能还怕死。

当我们走进拉雪兹神父公墓时，眼前却是一片绿阴和鲜花，柔和的风轻轻地吹，小鸟在唱，让你感到安详、静谧。倘佯在墓地间，就像是走在巴黎的街道上，只是转换了另一个世界的城市。这里同样有和巴黎城市一样以数字排列的城区，有街道名称、门牌号码，每家每户似乎都在安静地睡觉。那一扇扇门似乎马上就会开启，将有人伸着懒腰走出来。墓地多以大理石打造，而墓碑则千姿百态，各有特色，还有许多精美和寓意深刻的雕塑，向你娓娓道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美的文化。这里的建筑和设计及大大小小的雕塑，简直像是艺术家们在这里举办展览会，墓地本身就是法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看那里一定是个大家族，外形上是一座小洋房，白色的外墙，镂花的铁门，房檐雕刻着《圣经》里才有的故事，十字架虽已暗淡，仍透着和善的威严。墓碑上写着1882—1993年间葬在这里的三代人，下面还给后人留着续写的空间，他们一定有着说不完的故事。真羡慕这个大家族世代住在这个离亲人最近的地方，永远与活在世上的亲人同悲欢。有一座墓地是会让所有过客驻足的，这是一间带有精美雕塑的亭式建筑，周围用铁栅栏围着。亭里是一对夫妻并肩躺着塑像，两人都是双手合十，衣着优雅，表情安详。墓碑上的日子是1701年，让人顿生出无限遐想，他们会是什么人？岁月流逝竟丝毫没有冲淡他们的恩爱。还有一个墓地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雕塑着两只伸出的手臂

紧握在一起，你猜手中拿着什么？竟是一枝玫瑰。我真想不到，连死人也可以这样浪漫的。一个小女孩的墓地让我涌起一阵伤感，她只有九岁，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墓碑上有她一张好大的照片，我只记住了她的眼睛又大又亮忽闪忽闪地看着我在笑，她的人生就定格在这灿烂的笑靥上。我在心里轻轻地问：孩子，你在他乡还好吗？

不知不觉中，我竟看到了一个写着中文的墓碑，在众墓碑中格外醒目，我急走几步看清了所有碑文，这是一对任姓中国夫妇之墓，让人感动的是碑文上，除姓氏外只有一句碑文说明：原籍中国浙江瑞安。这些炎黄子孙们至死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顺着清静的大道悠悠地往前走，也会穿过小街胡同而曲径通幽，突然眼前一亮：肖邦的墓！它坐落在11区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墓地很小，白色理石的墓碑上刻着肖邦的鼎鼎大名和他的侧面头像，但他的面部表情已看不太清楚了。还有他的诞辰日1849年10月17日及父母名字，并特别注明他生于波兰。墓碑的顶部是一个低头沉思的少女雕像，她长发披肩头戴花环，手里拿着琴，或许是正在读着乐谱。然而让我激动的是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的墓地，竟放满了鲜花，那扎着彩带的玫瑰，燃烧着的一个个小蜡烛盒，还有些自制的卡片，上面画着心，写着“献给肖邦”

“我永远爱你”“永恒的音乐”等等寄托着怀念。热爱音乐的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正在天堂里弹琴。据说一百多年来，肖邦墓前的鲜花从来没有断过，不止是巴黎人，全世界能走到这里的人都会向这位音乐家、艺术天才献上他们心中的敬佩和热爱。

法国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的墓地相对大得多，铁栅栏围着的墓碑周围一片绿色，碑文十分简单，只有他的天名，非常醒目。上面塑着这位大作家的青铜头像，看着他你会想到《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幽谷百合》等等让人能哭出来笑出来、千古传诵的作品。此时阳光照耀在他的脸上，刚毅的面孔上透着一丝微笑，双目炯炯有神。目光像是要穿透时间和空间的隧道。他的人生喜剧早已落下帷幕，他可以坦然无愧地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里笑看世界上新的一幕幕人间喜剧的上演。

公墓的东北角，便是赫赫有名的“公社社员墙”。时光追溯到1871年5月28日，凡尔赛的反动军队进攻巴黎公社的保卫者，拉雪兹神父墓地便是他们最后的战场，一百七十四位公社战士浴血战斗，全部英勇牺牲，血流成河。第二年万圣节，一些扫墓者在烈士倒下的墙角献上鲜花。30多年后，人们又给那面墙上镶上一块大理石板，刻上“献给公社的烈士”。现在这里格外安静，那些枪炮声早已远去，可那些为自由奋斗的战士们却永远活在巴黎人民心中。

告别公墓时，我抬头看了看紧挨着公墓的高层住宅。法国人爱花，家家窗外都摆着盛开的鲜花，那鲜花和一墙之隔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鲜花一模一样，其实生和死离得很近，也就是一线之隔。如果你感受到了和生一样优美的死，你还会怕死吗？

2001年4月

无知己

任惠敏

父亲是一个极重感情，也极善于把别人感情收集起来的人。他总是把它们一捧捧珍藏起来，放进胸膛，因此他的胸膛很沉重。

刚刚解放的时候，大连的冬天特别冷，街上随时可以看到冻裂的水管，一夜间流出来的水到第二天早晨便成为一座座冰场。平整的柏油马路也随时能见到冻裂的场面，就像被人家用刀切开了似的。

就在那样的一个晚上，父亲行走至中山广场附近，在一座大楼前的圆柱子后面见到一个人蜷蹲在那里，十分可怜。父亲说尽管在那个时代那种场面常常见到，但是每当见到时总是心中难受。父亲走上前去告诉他，说那儿是个风口，风刮到那儿都在旋转，在那儿呆一夜可遭大罪了。又告诉他大连有许多破空房子，日本人撤走以后，倒出来不少。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父亲去码头接船。经过那座大楼的时候，发现那个人仍旧在那儿蜷着，他已经冻得不会讲话了，嘴唇上和两只眼眶里都布着一层冰。父亲说那种场面看了以后让人心碎。当时父亲穿了一件长袍，长袍的表面是黑色的，里面是一层卷曲的羊毛，父亲说他当时什么也没想，只是急忙脱下来，像大包袱皮似的把那人裹了起来。然后他什么也顾不上说，拔腿就往自己住处跑，因为轮船就要进港了，他必须先回去穿好衣服，才能去码头接客人。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遇到那个人。在以后的冬天里，父亲还常常想起他。

大地渐渐苏醒，又渐渐冰冻，转瞬几年的时光飞快逝去，就在又一年的春节，父亲见到了他。

这次是在我们家里见面的，父亲说大年初一的早晨，他来拜年。当时父亲愣了，他一边叩首一边讲起了那一夜……

看到他红润的脸庞，父亲知道他度过了难关。如今大概是已经在大连站住了脚。他告诉父亲那件长袍里有人寄给父亲的信，他始终保留着，所以就按地址找来了。

后来两人成了朋友。

许多年过去，那个人的父亲去世了，他来向我们家借钱。父亲说他一连借了许多人家，人家都不肯借。在倾盆大雨中他跑到我们家。父亲说他太可怜了，就借了五百元钱。他说处理完了丧事，便还。

一直拖了六年，钱始终也没还。这期间他不再来我们家，父亲曾去过他那儿几次，每次还没有开口，他就讲出了许多难处，把父亲顶住了。我的父亲很老实，一肚子想好的话语，又一句不剩地全带回来。

又过了几年，世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绿的变成了红的，红的变成了绿的，世界颠倒了。我正直、善良、忠厚的父亲一夜之间也变成了打倒的对象。在数百张大字报中，最醒目的便是那个父亲曾经救过的人写的。他说解放前他差一点冻死在街头，父亲这个资本家还穿着皮大衣……

就因为他写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父亲就遭了许许多多的罪。父亲说一切都可以忍受，惟有他的伤害无法忍受。

我的冰雪透明的父亲，能用一双眼睛识别真伪黄金，哪怕是稍微有丁点不足的成色，他也能识别，而他很难看清楚一个人。不是他的眼睛不明，是人的伪装胜过世间万物。

一切都过去了，也是在数九寒冬的季节，父亲得了绝症。在弥留的日子里，他和我讲起了他这一生的经历，他说一个人一生假如没有朋友，会很孤单；假如有朋友，务必是知己。交人难啊，不是被朋友保护，就是被朋友暗算。他又提到了前面说的那个人，父亲说他如今也是个老人了，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发表于2001年《散文》

散文二题

车向弘

我心中的图腾

知道图腾崇拜一说，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书上说，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图腾”系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此物即成为该氏族的图腾——保护者和象征……我的理解，这就是说，他们为神秘的生命找了个血肉相连的出处和寄托，很有意思，也很有必要。于是，学着原始人的方式思维，我自问：我有自己的生命图腾吗？如果有，是什么呢？

答曰：是故土与书。

故土与书，这样两个看上去并无关联的所在，对于我，却是有着同等重要意义的。

离乡背井几十年，乡思乡愁在我生活中所有可能的时间与空间里，疯长，初始阶段是一首温馨而又忧伤的朦胧诗，几分浪漫，几分轻飘。是二十多年前在故乡遇到的一件事使它获得了升华，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一个亲叔伯舅，姓杨，族中排行老四，我就叫他四舅。杨四舅的遭遇我都是从母亲口中听来的，知道他打小就能，一辈子祸福皆由“能”生。1957年他由市委组织部长一下子跌落成了异类，其后，便厄运连连。强劳、管制、下放，直至身败名裂、妻离子散。走投无路时孑然一身被遣送回乡，成了一个农民，这才算摔到底儿了，不被人惦记着了。那年我成婚省亲回了趟老家。转到姥娘家门上时，见到了杨四舅。

此时，他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磨难了。从装束上看，四舅与当地一般农民并无太大差异，但形容并不枯槁，精神并不委琐，持一副坦然沉着、引而不发的派头，手里头起粪坑的活儿，一招一式，也干得很在行。过往的老爷爷们儿都恭敬地和他打着招呼，庄稼人，不管那一套，该叫啥叫啥，虎落平川仍然是他们的四爷四叔四哥哥。等四舅装满两筐粪，挑起来往大田里走去时，目送他越走越远的身影直至成为一个黑点儿，华北大平原同时坦坦荡荡地在我眼前伸展开来，广袤、辽远，让我的心灵在那一刻受到了强烈震撼，眼睛湿润了。我感觉，眼前这幅图画把人与故土的关系作了极为生动的写照：故土故土，如果说人是一粒微尘，那么故土是你的出处更是你的终身依托；如果说人是一

叶扁舟，那么故土是你启航的港湾也是你在惊涛骇浪中的最后一块大陆。一股热流涌上喉头，又沉下心底，自此，乡思乡愁在我这里便成了胸中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一首旋律深沉温厚的无字歌。应当说，当年杨四舅被踢回故土是不幸中之万幸，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他的身心才能真正得到安顿，熬到了新时期平反昭雪的一天，讨回一个公道。对我这个游子来说，故乡那份不离不弃的守望就是一份与生俱来的人身“保险”，有朝一日，衣锦还乡也好，落魄而归也罢，都不至于沦为没娘的孩儿了。

生命的另一个寄托是书。一个读书人，提起书来自然是有许多话要说，但我要说的不是书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这方面高论多得很，有一句被称作“徐鲁命题”的话就是问“如果没有书，我们会在哪里？”看似发问，意在接受，实在是有着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效力。我也不是谈读书的好处、妙处，如什么良师益友、情感交流、人生享受等等。更不是研究读书的氛围、心境之类的学问，雅如净手焚香，拥被秉烛，细雨敲窗的。我要说的是书所给予我的感动。远近读书几十年，常常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如鱼得水的时候，或者忙得跟头流星的时候，就把它撂到一边去了。反之，只有在失意时，苦闷时，无聊时，才会想起书的存在，才会回到书中。而书却永远像个忠贞不渝的朋友，不拒绝，不背弃，为我的需要而竭尽所能，无私付出，它还是个伟大的朋友，从不曾让我失望过。我视书海同故乡。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当悟得书的世界和故乡的大地有着相同的品格时，我知道，我找到另一块赖以生存的母土了。

人活一世，江湖险恶，世态炎凉纵是躲不掉的梦魇，但身后能有这样两处大庇大护之地在默默地等候，那么，进退起落，我也就没什么可考虑的了。

我将永远为此而心存感激。

绿梳缘

家中的梳妆台上常放着一把绿梳子，不为用，只为看的。别看它材质并不名贵，造型也不奇特，却被我圣物一般地供着。我把自己的这种“癖”戏称为绿梳子情结，结不大，抖搂开来却也能拖出一串难忘的旧事。

清楚地记得买下第一把绿梳子时的情景，那是在我考上大学的1965年。入学前夕，父亲领着我购置日常生活用品，祖辈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凭谁都可以想见洋溢在我们父女心中的那份儿欣然跃然，于是，一次本属平常的购物过程竟有了仪式般的庄严和神圣。尤其是该买梳子时，想到从小以来都是和姐妹们共用一把，这回可要有专属自己的了，隐隐地，心中就有了要把握一点什么驾驭一点什么的新奇和兴奋，拉着架子要

好好挑把舒心的。可是，柜台里陈列的一排化学梳五颜六色，都很鲜艳夺目，一时竟让我挑花了眼，直到陪在身边的父亲提醒说“我看那把绿的就挺好”时，才终于拿定了主意。那是一把月牙梳，颜色介于翠绿和墨绿之间，绿得生机盎然而又沉实不躁，很像夏初时节树叶们的着色。一弯绿伴随着我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每天清晨，迎着宿舍南窗外吹进的山风——那山是省城的名胜千佛山——舞动它梳理着大长辫子，绿意是由眼入心，生了根的。都说人与人相逢是缘，人与物又何尝不是如此。父亲，三十多年了，有一句话总想对你说：感谢你为女儿择定了一份绿缘。

但不要以为，如今与我在一起的就是那把绿色第一梳，它早丢了。1966年秋，“文革”串联到上海，兴致勃勃地在外滩想撒目个好景点照相时，被一群当地孩子热情地围住指点，事后才知那是一伙“瘪三”，人也散了，相也照了，我的包却被他们掏了。一个穷学生腰包里的钱，丢又能丢多少，恼人的是，他们顺手牵羊误掏——一定是误掏了我的梳子，着实地让我痛惜。想到它曾和我一起走南闯北，有感情了，而今却以这样的方式分手，落到谁的手里，会像我一样懂得它珍爱它呢，免不了会轻易地抬手一扔……唉，不管怎么说，也是丢了。女儿家离不开梳子，大上海也不缺梳子卖，当时我年轻，在我年轻的眼睛里，大千世界里各种颜色都好，于是换了个色，这回买了把红的。可是，是先入为主吗？用了不几天，就怎么看怎么刺眼、闹心、别扭，还是赶紧又去买了一把了事，虽然，此梳非那梳，但有一点是承接起来了，绿色。

缘未尽，事多磨。走出校门进了军营，1971年冬里，部队兴开了徒步行军拉练，学习发扬老八路作风，每天离开宿营地以前，都得把房东的铺草堆放整齐，地扫干净了，才能上路。问题就出在这里。某一天早上等一切收拾停当后要梳洗时，我的梳子又不见了，可能是在忙乱中卷进铺草里去了，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座松软的小山丘虽有满心的惦念和不甘，但毫无办法。不能再摊开翻一遍寻找，更不能为此耽误大部队出发，我甚至不敢由着性儿地表达心里的着急难受，要是别人问，不就是一把梳子吗，值得你这样？我怎么回答？要说它是一件灵通之物，就像那块“通灵宝玉”差不多，那我是贾宝玉式的人物吗？要说世间万物都是有生命的，所以黛玉才要葬花，那我是林黛玉式的人物吗？都不是。我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解放军女战士，基于此，那些说法不仅可笑而且可怕，结果，我就只能是暗中狠下心肠、明里步伐坚定地离开了那个村庄，连一步三回头的感觉都是留在心里的。

这次，我可是毫不迟疑地补上了绿缺儿。在其后的年岁里，又丢失过，还摔坏过，认真说，真查不清我究竟有过几把绿梳子了。自己对颜色的要求还很挑剔，每次续缘，

跑腿受累的非要找准了绿度，深了浅了都是病。既是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供起来，让它静静地陪着我，守一世，过一生。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呢？一个人，她在几十年里几乎是执拗地在生活中保有着一把绿梳子，这是干什么呢？很遗憾，身为当事者，我也难以对这种行为方式作出明确的辨析，一切都是自自然然地发生，并非刻意，是心不由己的一种。如今，做过了，回眸来路，我只能说我也在被这样一个事实感动：无尽时空，漫漫生路，一点绿牵出了点点绿，从而连成了一脉贯穿在我生活、生命里的绿意，还有比这更动人、更让人满意的吗？谁都知道，绿色，它代表的是青春，是希望，是生机啊！

最后的童趣

曾祥明

似乎一提到“最后”，便会想到“悲壮”二字。你看，耶稣经受了“最后的晚餐”（达·芬奇），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小佛郎士上完“最后一课”（都德），就得和自己的母语（法兰西语）拜拜了，你说悲壮不悲壮？

然而，耶稣似乎并没有死，据说他后来复活了，至少，是活在千千万万他的信徒们的心中；而小佛郎士的母语（法兰西语）呢，也并没有与法兰西拜拜，至今，仍像鲜花一样生动地开放在法兰西的土地上。

因此，那“最后”，如果不说出来，也许就是永远的“最后”；而一旦说出来，也许就是并非真正的“最后”了。我希望我们的子孙，也都能像我们当年那样，举手就能摘到野果，哈腰就能逮到鱼虾，世世代代都能“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虽然事实上，原始森林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已经很难一举手就摘到野果了；小河小溪也是干涸的干涸，发臭的发臭，我们早已不能哈腰就逮到鱼虾，也很久听不到“蛙声一片”了。

但越是失去的，也便越觉得可爱，即使是十分普通、十分平常的事儿，因为“最后”，也就是有点“世界遗产”的味道了。所以，每当我看到孩子们争相挤进乌烟瘴气的电子游戏厅，我就会想起当年我们一头钻进大自然的怀抱，享受大自然丰富馈赠的动人情景。

那时候，我很小，如同今天校门口爷爷奶奶们等着接送的孩子那么大。那时候虽然也有爷爷奶奶，但他们并不送我们上学的，那时候的校门口，自然也不会有今天的“车辚马萧萧”。

说我小，不过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其实，我并不比我的同伴小，我们几乎都是一般儿大。

我觉得自己小，是我什么都不会；而我的小伙伴们呢，却又会放牛，又会骑在牛背上吹笛，还会割草、编筐，下田。他们甚至叫得出各种草禾的名字，知道什么草牛爱吃，什么草牛不能吃，还会摸鱼，捉虾，用狗尾巴草编蝈蝈笼子，会扎供江鱼产卵的草排，会把产卵后的鱼放进稻田里生小鱼……总之，他们的本事可大着哩！

我“小”，可不怪我，那得怪我爸我妈，怪他们早早就把我送进了那所办在古庙里的小学，弄得我除了认得几个字外，什么都不会；和小朋友们玩，只能当配角，当编外生，比如那次“神仙宴”吧，我就几乎只出了一张嘴。

那是一个阴天。不知为什么，这天不上学。

早饭后，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我家那三间茅屋的大门口，看那“滚滚长江东逝水”，看那“白发渔樵江渚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忽然，我的眼前一亮：清明、福全、佛生他们牵着牛出门了。我知道，他们又要去江边的草坪上放牛了。我家没有牛，但是，我还是偷偷地溜出了家门，不远不近地跟在了他们的后头。

来到了草坪，牛绳一松，牛儿便自由自在地啃青草去了。小伙伴们聚在了一处，不知是谁问道：“今天玩什么？”佛生胸有成竹地说：“今天咱们吃‘神仙宴’吧！”大家都说：“太好了！太好了！”于是，开始操办。清明水上功夫好，是抓虾捕蟹的能手，他便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提供鲜虾活蟹；福全是爬树高手，树上功夫一流，爬起树来，猴子似的敏捷，大家便选他去弄野果什么的。清明和福全像将军领了令牌，雄赳赳地出征了，草坪上只剩下我和佛生。我急了：“佛生，怎么没有我的活呀？”佛生看了看我说：“你么……阿明，你就跟着我吧！”于是，我便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了佛生的屁股后头。

佛生就地取材，在牛儿们不愿吃的高草丛中东寻寻，西找找，很快便弄到了一大捧圆圆的胖胖的红红的甜甜的软软的“地瓜果”（不是红薯），让我用双手捧着。然后，来到草坪旁边的千金沟里，他把裤腿一挽，便走进了水中。他在沼泽一样的乱草中，像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工夫，就从烂泥中摸出了许多扁扁圆圆甜甜嫩嫩的荸荠来，随即，又在靠近深水的地方，用脚踩出了两只雪白的莲藕。我捧不住了，就脱下衣服来包着，扛在肩上。

佛生从千金沟里走出来，又一头扎进了一个长满了毛竹、野树的大沟里。这种大沟，涨水月份，他们是长江的一部分；枯水季节，则供下大雨时排水用；既不涨水，也不下雨，便长满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是野兔、野鸡、长虫们的栖息地。我怕蛇，不敢进沟。而佛生，却从腰里取出割草刀来握在手里，一点儿犹豫都没有，就钻进了沟里，隐没在竹影树影之中。我害怕，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扑腾扑腾直跳，无论如何也不敢跟着进去，只好在沟口一边抹鼻涕一边数石子，百无聊赖地等着。

当佛生从沟里一头钻出来的时候，满头满身都是树叶和花瓣。他的手里捧了一支白嫩嫩的野葛。一见葛，我立即馋涎欲滴，直吞唾沫。

佛生知道我爱嚼野葛，所以，当他把野葛放到我手里时，说：“馋猫，可别偷吃！”说完，他又一头钻进了他家的苞米地。不一会儿，又神出鬼没地捧出了一个南瓜，像捧着一个宝物似的。看到他那神秘兮兮的样子，我笑了，不料，笑出了个大鼻涕泡。他看见我的鼻涕泡，也憋不住笑，便赶紧放下那个大南瓜，捂着肚子说：“你呀你，害得我差点儿摔坏了宝贝！”

我说：“快别蒙人了，什么宝贝呀，不就是个大南瓜吗？……生南瓜可不能吃。就是煮熟了，我也不爱吃，我早就吃够了，家里天天瓜菜代，哪一顿都少不了它，你怎么还喜欢它呀？”

“不懂了不是？”佛生像个小大人似的，拿腔拿调地说：“这不是南瓜，这是南瓜酒……”

“骗人不长个，骗人不长个……”我起哄道。

见我起哄，佛生不高兴了，他撅起嘴，继续摆弄他的南瓜，不再理我——他一生气就不理人。见佛生不理我，我有点怯了，便讨好道：“佛生，我再也不说你骗人了——可这南瓜酒是怎么弄的呢？”

这一招还真灵，佛生果然忘了生气，说：“这原本是棵野瓜苗，长在我家地垄边上，我妈怕它与苞米争肥，想一把把它拔掉，多亏我手急眼快，一下子按住了妈妈的手，这可怜的瓜秧才侥幸活下来……”

“呀，这南瓜还有个历险记呢！”我禁不住打岔道。

“还有更奇的呢。”他吞了口唾沫说。”后来，这瓜就归我管了……我经常给它浇水施肥。嘿，它还真争气，真给我长了个圆滚滚的大南瓜。等它熟透了，我就从家里拿了些米酒曲子，压成沫，用竹管吹进瓜里。然后，把孔堵好，让它继续长。昨天，我估摸着，这酒该成了，就把竹管插进去，用嘴一吮，嘿，酒香扑鼻……”佛生说得神乎其神，我听得如醉如痴。

“来，你尝尝，”佛生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个竹管，一下子插进去，“阿明，快来吸，不甜不要钱！”

我哈下腰，轻轻地吸了一口：“哇，佛生，好甜！”

“傻瓜，不是佛生好甜，是南瓜酒好甜……”佛生像个得胜的将军似的调侃道。

“是什么东西那么甜？”福全和清明用衣服襟兜着野果和虾蟹回来了，听见这里说“好甜”，接茬道。

“来，咱们准备开宴！”佛生命令道。

大家七手八脚地刚要摆开阵势，不巧，却突然下起雨来，好像要考验我们似的。

“大家不要慌！雨中喝南瓜酒，更有趣——福全，你去割草。清明，你去砍苇。阿明，你去弄马莲……”佛生不愧是佛生，关键时刻，显示出了大将风度。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说时迟，那时快，一会儿工夫，大家准备好了材料，然后，七手八脚地盖了一个小小的草棚。

当瓢泼似的暴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草棚里席地而坐了。牛儿们在雨中啃着青草，我们呢，喝一口南瓜酒，咬一口野果，乐得手舞足蹈。

吃得正高兴时，不远处响起了一阵川江号子。不知为什么，平常听惯了的川江号子，这会儿听起来，是那么高亢，悠远，粗犷。一高兴，福全也吹起了横笛。一时间，笛声和船歌，遥相呼应，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粗粗细细，浓浓谈谈，雅雅俗俗，此乐可极！

笛声，引来几只江鸥，落在我们茅棚的棚顶，更增添了几分野趣。我们索性钻出茅棚，顶着雨，看江中点点白帆，看空中的群群江鸥，在江边追逐着，嬉戏着，喊着，叫着，唱着，欢呼着，雀跃着……

啊，那童真，那童趣，是那么惬意，那么醉人！

此后，我上大学，当兵，教书，做督学，走南闯北，也很去过一些地方。虽然是“山珍海味识不全”吧，但也还是见过几回的。但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在野店还是在酒楼，却再也没有尝过当年“神仙宴”上的那种神仙滋味了。不仅我没再品尝过，就是故乡的孩子们，似乎也品尝不到了，因为树被砍了，草被烧了，江水浑了，河水臭了，大自然的馈赠是越来越吝啬了。所以，我很疑心，我所写的这点儿不起眼的童趣，该不会是最后的童趣吧？

放蛇者

鸿翼

W兄是我二十多年前下乡在旅顺双岛湾公社当知青时认识的。那时他很了不起，虽说只比我们大三四岁，但因为是还乡的老高三学生，其知识水平可比我们这些“文革”中的中学生高多了。尤其是他从小生长在海边，其对付大自然的生存能力真是太强了（这是我后来一点点体会到的）。

当时生产队派他来给我们带队，平时和我们一起生活。一开始，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知青都不服他。他往那儿一站，像个大蟑螂，瘦高的个子，细长的脖子，倒三角形的脑袋，尤其是架在鼻梁上的那副又大又圆的深度近视眼镜，活像蟑螂的两只凸出的眼睛。一些女生一见他就想笑，说他滑稽。但是，后来我们渐渐佩服起他来。

说他生存能力强，在那个物质财富极度贫乏的年代，我们这些离开家，离开父母的孩子真是受惠不少。捕鱼捉蟹自不待言，他眼尖手灵，扔石头打兔子比枪还快捷。他了解鸟的习性，黄昏时在地瓜地里用簸箕扫“黄卵子”（一种小鸟），深夜里用手电在树上照“老鸽子”（一种野雁）……他对付小动物的套路多极了，因此，隔三差五便会有点野物端到我们的饭桌上。这可全是W兄的功劳。可是每当我们一边大嚼特嚼一边夸他、奉承他怎么怎么能时，他却一边美得不行，一边连呼“罪过，罪过……”

我们青年点的草房背靠着草木丛生的青山，因此常有蛇光临我们大院。每逢此时，别说女生，就是我们这些知青好汉们也吓得退避三舍。此时正是W兄表现的好机会。他捉蛇并不遵循什么绕圈子、瞅空子、捉住蛇尾抡圈子等套路，而是闻声而动，径直冲向蛇头，一把就掐住蛇的颌骨，其速度快得真像闪电一般，看得我们目瞪口呆。每值此时，他总忘不了显摆一番，掐着蛇头冲着每个人嬉皮笑脸地兜一转，似乎是说：“看看，还是我能吧！”这时的他天真得孩子一般。

如果说W兄用捉蛇的本领征服了我们男生的话，那么他征服那些女生的本领就是捡海猫蛋。当地人把海鸥叫作海猫子。捡海猫蛋可不是好玩的，海猫子把蛋都下陡峭的岩壁缝隙处，常有捡海猫蛋的人摔伤甚至摔死的事情发生。因为每当海猫子看到有人捡他的蛋时，就群起而攻之，扑啦啦地往捡蛋的人头上、脸上拉白白稀稀的鸟粪，甚至冲过来向人扑啄。而W兄却经常不避艰险地捡回些海猫蛋，煮熟了分给女生（据这里人的说法，吃海猫蛋有利于女孩发育成长）。以至于女生喊他万岁。我们男生则忿忿地指责他

残忍。这时他往往振振有辞地认真辩解：“我采的可是蛇岛上的海猫蛋呀，海猫子多了对蛇岛上的蝮蛇发展不利，吃蛇岛的海猫蛋，这叫生态平衡，懂吗？”我们则顺藤摸瓜：“懂了，懂了，不过，让我们也平衡一下不行吗？”他便无奈地分给我们男生一些蛋，还心疼地念叨着：“你们这些馋小子，不要跟女生争嘛，她们力气小，得多补补。”女生们听了自然是感动得不得了，背后再不说他滑稽，而改说W兄真幽默。

没想到的是我们这些男生吃腥了嘴，竟央求他带我们去捡海猫蛋。别说他还真的带我们去了一次，不过那只能算是参观。

他摇着船载着我们沿蛇岛转了一圈。几尺高的海浪开锅似的在周围翻滚着，被鸟粪涂得雪白的悬崖峭壁在眼前跳舞似的摇晃着，此起彼伏的海猫子在头顶上嗷嗷地嚎叫着……此时别说是攀岩捡蛋，就是想在船里参观也害怕。从此再也没人敢提捡海猫蛋的事了。

W兄对付小动物也并非总是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走麦城的时候，那是1968年的一个秋天。

我们青年点要维修房子，换草房顶，需要又长又硬又有油性的“马草”。这在附近很难找到，W兄要领着我们到海对面的蛇岛上去割。一听说上蛇岛，我们是又兴奋又胆怯，那可是神秘的蛇的王国啊！

登上蛇岛后，W兄更精神了，更像是我们的统帅了，而我们则更听话了，更像是他麾下的小兵了。他先是不厌其烦地介绍蛇岛上蛇的习性。

蛇岛上的蛇是蝮蛇，剧毒，蛇类中只有它是胎生，一般不咬人，它一生中主要的任务就是“守株待鸟”。

说到这儿，他叫我们跟他去看蛇。他雄赳赳地走在前边，我们蹑手蹑脚地跟在后边。来到有棵树下，他指着说，那树枝上有条蛇。我们仔细分辨才看到那树枝上果真趴着一条蝮蛇，它眼望着天，一动不动，并不理睬我们。

此时W兄结结实实又能了一把，俨然大大学教授一般，拿腔拿调地宣讲起来：

“看到吗，这些蝮蛇每天都这样“待鸟望青天”，半年里只要吃一只鸟它们就可以存活。当然，我们这里是南来北往的候鸟鸟站，他们是不愁吃不到鸟的。它们身上有保护色，同树枝的灰褐色一样，鸟儿以为是树枝，可是一落上去就大难临头了。这些蛇晚上要爬回石缝里休息，它们的回归性很强，每天都是固定路线，石缝——树枝，树枝——石缝，别的地方一般没有蛇，不要害怕，明白吗？”

W兄又是保护色，又是回归性好一顿白乎，为了满足他的“显能”心理和感谢他能带我们来蛇岛，我们一齐大声回答：“明白！”

我们开始分散着割马草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忽然发现在我镰刀正要割去的草丛中盘曲着一条蛇，我不禁吓得倒退几步，惊呼：“蛇、蛇……”同学们迅速围了过来，当然只是远远的。这时W兄赶到：“别慌，我把它扔开就是了！”还是那么干净利索的动作，伸出右手，一把掐住蛇头；还是那么强烈的表现欲，扭过头来嬉皮笑脸……但突然他脸上的笑容急剧地颤抖一下，立刻僵住了。原来正当他急于表现能耐的时候，正当他倒手准备把蛇扔出去的时候，一分神，一瞬间，那蛇狠狠地在他左手的拇指上咬了一口。刹那间我们都惊呆了。但此时的W兄，毕竟是W兄。只见他麻利地解下鞋带，先把拇指紧紧地缠起来，又用另一只鞋带把蛇嘴也缠起来。

主帅负伤了，我们狼狈撤兵，载着收割的马草，匆匆乘船逃离蛇岛。

事由我引起，便由我陪着他去医院。可能是伤口麻木了，一路上又恢复了他那特殊的幽默。

在公共汽车里，他嬉皮笑脸地对乘务员说：“我有生命危险，去医院，请开快点好吗？”乘务员以为他恶作剧，不屑理他。他冷不丁从提包里把蛇放出来，那蛇身立即竖起老高，蛇头盘旋着，瞪着蛇眼恶狠狠地四处张望。车厢里顿时一片惊呼“蛇、蛇……”于是车开得风驰电掣一般。

在医院挂号处，一排长队，W兄凑到前边，又是故技重演，嬉笑着说：“各位，我有生命危险，能不能插个档？”接着又是把蛇一亮，惊退一片，他就如愿以偿挂了号。看他那得意开心的样子，真不知被蛇咬是坏事还是好事。

医生查看伤口时，他那拇指已经变成紫茄子色了。医生说幸亏当时处理得当，若不勒住伤口，让蛇毒顺着血液走向心脏可就危险了。医生切开拇指肚，把黑血全挤了出来，又按带来的蛇的种类配药敷上。这过程中W兄还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气得医生大喝：“你还笑？今晚有你哭的时候！”

果然，当天晚上回青年点后，他就开始哼哼了，说手指痛得厉害，但还是保持着尊严，不时勉强地挤出点笑来，但那笑也几乎和哭差不多了。到了深夜，他再也忍不住了，嗷嗷地嚎起来，我们全点的人都惊醒了，起来陪着他。那些女生也伸头伸脑地看热闹，时而又悄悄地评论着：“敢情，大老爷们哭起来，还真是惊天动地啊！”

怎样才能减轻一些他的痛苦呢？灵机一动，我忽然想起当地人有用蛇血涂抹被蛇咬的伤口可以止痛的说法，我抓起菜刀，提着绑着嘴的蛇的提包：“W兄，为你报仇，我现在将它就地正法！”

他突然止住嚎声大喝：“住手，别动它！”我百思不解，留这条毒蛇干什么？

两周后，他还没怎么痊愈，就叫上我，拎着那只装着蛇的包，上船，方向蛇岛，叫我摇橹前进！天哪，我刚学会摇橹不久，哪能摇那么远？他说：“你不是要为我报仇吗，那就出点力吧！”我心想，这W兄够狠，还要将蛇押回原地正法啊。我拼着吃奶的劲，摇到了蛇岛。可没成想他老兄登上蛇岛，解开绑着蛇嘴的鞋带，使劲把蛇扔出去，扔到了远远的草丛中去了。就这么轻松地把咬他的、令他大扫威风、吃尽苦头的毒蛇放了！嗨，W兄呀，我恨得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他却又嬉皮笑脸起来：“好兄弟，别恼，别恼，你先歇着，罚我再割些马草，回去的船我摇、我摇……”

W兄吃小动物的亏决不止这一次，比这轻的不算，比这重的还有一次。

那是大约两年后的又一个秋天。我们到山上砍柴。我们男生在这边砍着砍着，忽然听一群女生在那边喊：“不好了，救人哪，W兄受伤了！”我们赶紧过去，那些女生远远地站着，指着，W兄蹲在树丛中双手捧着头。我们火了，指责她们：“你们怎么干看着，不去救？”女生们却莫名其妙地哄笑着跑散了。我们冲近前一看，呆住了，原来W兄是叫马蜂子蛰了，正巧蛰在头顶的中间处，不大的工夫，头顶上约五厘米一圈内的头发已经掉光了，中间一个黑红色的眼子，往外冒带血线的黄水。W兄痛得已经张不开嘴了，只能蚊子似的小声哼哼：“马蜂、马蜂……”

我们几个人把他抬起来，一看，都禁不住哈哈大笑，原来他正尿尿的时候被马蜂蛰了，痛得他当时只顾着用手捧头了，裤子口还开着，那“家伙”露在外面半截子，难怪把女生们都吓跑了。

事后听他说是尿尿时不小心尿到马蜂窝上了，于是窝里飞出两只马蜂，其中一只就狠狠地回敬了他一下。

那时候我也很顽皮，为了气他，就给他画了一幅漫画，画他骄傲地昂着倒三角形的脑袋，瞪着夸张的凸出的圆眼睛，腆着肚子，掐着“家伙”怒气冲冲地向一个大马蜂窝里撒尿；从马蜂窝里飞出几只旋着螺线轨迹的大马蜂，正盘旋在他的头上准确轰炸。画上题的题目是“淋浴”。我原想，他一定会狠狠地骂我一顿，再把画撕了。可没想到，他如获至宝，竟把那漫画镶进像框里，挂在他的床头上方。他说我的画很有寓意。W兄啊真是个怪人。

后来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都各奔前程了，大都有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而他则一直在镇里，在森林公园当一名平凡的守护员，继续演义着他与动物们的恩恩怨怨。

我的家庭

邓刚

从表面上看，我们一家三口最为幸福美满和谐。首先我这个人幽默风趣，再加上我生有一张忠厚老实的面孔。其实我的忠厚老实最多有百分之六十五，但在客人面前，我会表演成百分之一百二十。其次是我妻子的温文尔雅，因为她不善言词，在客人面前只会羞怯地笑，愈发显得谦逊贤慧。我女儿才十来岁，身上的缺点还没来得及成熟，所以只能像小鸟一样欢快地蹦跳。为此，来我家的客人都一致认定，我们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家庭。

然而，客人一走门一关，情况就不那么美妙了。坦白地说我第一个表现不佳，我那满脸满嘴的风趣随着客人的消失也倏然消失，像收音机断了电，立即就鸦雀无声。接着是妻子的表现也欠佳，她那羞怯的笑容一扫而光，继而代之的是抱怨的神色。她对突然的沉寂感到不快，忍受了几分钟后，便冷冷地说——你只对客人有情感！我知道她还想要我风趣幽默下去，问题是我怎么也风趣不下去，那实在太累了。妻子并不饶我——客人如果还在这里，你就不会累了！没办法，我只好做愤怒状。但我的愤怒更糟，我那小鸟一样的女儿立即变得像小鹰，嘴巴又尖又硬，站在妻子的立场向我进攻。我只好装死，我很伤心并且委屈万分。在恋爱那阵，我对妻子充满了幽默风趣，长达几年忠心耿耿使她快活，可老这样干下去太艰难，整天厮守在一起就平淡无味，再幽默风趣势必会声嘶力竭。我突然悟道，永恒的爱情是欺人之谈，实际上很难永恒。爱情也挺费力气的，爱一气儿得歇一气儿，无休无止地爱下去会爱出麻烦来。这就像天天月月年年吃三鲜饺子，你再见了三鲜饺子就会吓得心惊胆战拔腿飞跑。男女相爱最初是靠新鲜感、靠相貌、靠热血沸腾的激情，不过，在一起长久的过日子，最初相互激动的一切将无可奈何的淡化。最重要的粘合力只能是性格，性格的粘合是夫妻二人一辈子的恩恩怨怨。俗话说——两个人一样，活不到天亮。如果两个人都是急性，都激烈，都粗野，都精明强干，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那绝对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结果怕会折磨得两败俱伤。谢天谢地，我和我爱人不一样，我爱好文学，喜欢读书，她却见了带字的东西就头痛；我愿说说笑笑夸夸其谈，她却沉默文静；我不耐烦干家务，她对家务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于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干的这一行她不懂，我可以在她面前胡吹乱泡，愿怎么骄傲就怎么骄傲。我说写一篇小说多么多么不容易，多么多么痛苦，多么多么损失脑细

胞，呀呀呀不得了，我像演员表演那样大声呻吟。她吓坏了，更加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买菜买粮洗衣做饭，她拼命地干还觉得对不起我。我心中窃喜，继续做痛苦状却又干一二件家务活。她见我如此痛苦还帮着干家务，感动得昏头昏脑，以为我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丈夫。

家庭生活就像锅碗瓢盆，难免要碰碰撞撞叮叮当当。我发现妻子有许多可恨的优点，如她爱干净，干净得令人难以忍受，她逼得我和女儿发疯一样洗澡剪指甲换衬衣，特别是她清扫地面时，我们更倒霉，被弄得凶犯一样画地为牢，甚至得金鸡独立。直等到地面的水迹干了，才允许我们走动。在家庭卫生方面，女儿和我搞统一战线，每当妻子下班敲响门铃，我和女儿就像听到战斗警报，两个人火速将搞乱的东西恢复原状，并将一些碍眼的东西塞到沙发后面和床底下。可是妻子总能洞察一切，看穿我们的伎俩，结果是我们被她弄得更狼狈。妻子另一个可恨的优点是不会撒谎。由于我怕开会，怕应付一些客套的场合，所以每当电话铃声响时，我都示意妻子接，谎说我不在家，谁知她竟面有难色。我说反正打电话对方也见不到面孔，怕什么！她还是惭愧无比，像犯了弥天大罪，结结巴巴地对着话筒说邓刚不……不在……嘻嘻嘻！她竟莫名其妙地笑起来，把我出卖了。我气极了，声色俱厉地教育她，说撒谎也是生活中的技巧，甚至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段，不会撒谎的人相对来说就是缺少智慧。她说她明白了，怪不得你能当作家，原来你会撒谎。我更气得要休克，我说创作和撒谎绝对是两回事。说着我把正在写的稿子念给她听。这是一部中篇小说，主人公的遭遇融合我过去的艰难困苦和悲欢离合，我念着念着却发现妻子的眼睛泪光闪闪，意想不到的女儿的小眼睛也亮晶晶地动了感情。她们俩一起问我——你写的这是真事吗？……我突然发现她们那难过的表情期望这不是真的。我赶紧笑道——什么真的，都是胡编的！妻子无言，女儿却一直不放心，直到临睡前还一个劲地问我是不是胡编的，她不相信胡编的东西能感人。

我的女儿非常善良，善良到胆小怯弱的地步。她看电视，只要屏幕上有打人杀人场面，就吓得掩起面孔，后来发展到她只要感觉到有这样的场面即将出现，就提前用手捂住眼睛。她听到小猫小狗的叫声，小脸上就显露出异常难受的表情。更可笑的是她经常被比她还弱小的小朋友打哭。有一次她哭得格外伤心，我见她皮肤有划破的红痕，便大怒特怒，拎着她去寻找“凶手”，但我怒目四睁却找不着，低头一看“凶手”是还没有我腿肚子高的咿呀学语的孩子。女儿这时勇敢地对他弯下腰，我以为她要报复几下，谁知女儿战抖而理直气壮地说——我爸来了你还敢打我吗？……我觉得女儿完蛋了，将来肯定要受一辈子欺负。有一次女儿画了一张画，一个大的东西在前面跑，一个小的东西

在后面追。她解释说前面大的东西是逃跑的狼，后面追的是兔子。我哭笑不得，她说她想往是这样。

我和妻子对女儿有许多美好的愿望，我们想培养她当画家，想培养她当音乐家，培养她当运动员，为此我们不惜血本，买钢琴买画笔买颜料买各种运动玩具，请家庭教师，带她观摩美术作品，大忙一通，结果女儿还是原先的女儿。我们恼火万分地总结经验，结论是缺乏严厉，舍不得打她。于是我们咬牙切齿，挽袖子捋胳膊，发誓她再要是不认真学习就像对阶级敌人那样狠打狠揍。可到时候，我们的手掌离她的屁股二里远，心就软瘫下来。由于我们管理的意志不坚定，女儿至今惟一的天才是对吃零食有入迷研究。那些花样繁杂的零食，她能绝对准确地说出价钱、形状、口味和产地。就在我们怨恨女儿不懂事时却又惊讶地发现她什么都懂了，该懂的和不该懂的甚至连我们都不敢懂的，她全都懂。这使我们对她胆战心惊又疑神疑鬼。让我们气愤的是她对我们这一代长辈的蔑视。一个女同学对女儿说——爸爸妈妈他们过去真傻！女儿回答说——其实挺可怜的。我像挨了一巴掌似的火辣辣的脸热。我感到可怜比傻还厉害。我再也不讲我过去的艰难困苦，我甚感教育的困惑。女儿这一代很难教育，看焦裕禄电影，女儿哭得手绢浸成水蛋蛋。但出了影院大门，看见两元一支的冰激凌，决不吃一元一支的。她说两元一支的比一元一支的好吃，她说八元一支的美国风味的更好吃。我提醒她说焦裕禄当年连五分钱的冰棍都舍不得吃。她说那阵压根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冰激凌！望着女儿沾满奶油的小嘴，我有一种绝望的激动。

尽管如此，我还是十二万分的疼爱女儿和妻子，她们任何一点微小的委屈都将使我心尖收缩。有一年我去南方的一个城市开会，途中飞机出了点故障，在预感死亡的一刹那，我没有想到生我养我的父母，更没有想到神圣的文学事业，却只想到可爱的女儿和妻子。我觉得再也见不到她俩是我惟一的遗憾。我知道我们三个人就像三条腿的凳子，少一条腿就不能成立。飞机安全着陆后，我认为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我还能回到我那幸福温暖的小家庭。从那以后我即使是外出开会一天，妻子和女儿也依依不舍地送我到机场车站，这使我又幸福万分又恐惧不安，我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以后能干出点事业来，那就是家庭感情的激励；如果什么也干不出来，那就是家庭感情的拖累。

三过浮桥

肖正

浙江仙居的六月温热湿润，没想到“中国记者仙居行采风活动”的重头戏，是把把我们一群大人拉到全国青少年“我能行”体验基地接受“洗礼”。孩子们能消受的岂能难倒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老编老记们。可待排队领取安全帽和救生衣时，心脏却不由自主地怦怦乱跳，跳得晕头涨脑硬是没听清辅导员老师都强调些啥要领，便被赶鸭子般轰到了深不可测的河边，一条若断若续由方型水漂搭成的浮桥横在眼前，几个猛男烈女脱鞋挽裤，喊叫着冲上了无遮无拦的浮桥。

犹豫中见有比我还娇小的女性也跃跃欲试，便壮着胆子拉开架势。浮桥荡在碧水中，撩得我心痒难耐。浮桥漂在悠长的河中央，惊得我心悬到了嗓子眼。后来者一声“你过不过？”情不自禁把我推到了用绳索串连的浮桥上。脚刚落下，水漂撒野般一个劲儿乱晃，幸亏浮桥边靠有宽大的竹排，给我有岸相伴的安慰，才敢贸然一步一蹭地往前挪。心脏狂跳、脚下不稳，但毕竟还能左右摇摆地立着。忽地，竹排被艄公长杆一撑离开浮桥，心儿仿佛一下被摘离躯体，两条腿像筛子似的一个劲直发抖，殃及水漂也跟着不停地打颤。“艄公，别走！快来救我呀！”任我怎样声嘶力竭呼叫，远去的艄公和岸边的人们照旧划桨说笑不理不睬，人家压根就是听不见。前不见救星，后有催命的大叫：“快走，再不让开，咱俩就一块儿撞到河里了。”后悔逞能没与大部队坐竹排到岸；欲回头是岸，退路已被堵死。眼前一阵眩晕，大脑一片空白——死定了。下意识中僵硬的手触到鼓囊囊的救生衣上，便恶狠狠地自骂着：胆小鬼，还在海边长大呢，不是会游泳吗，羞死人啦，全副武装竟吓成这副呆相。连娃娃们都“我能行！”不需他人相助抵达彼岸。想当年，红军也能在枪林弹雨中渡河涉水……这样骂着、想着，嘿，灌铅的双脚能一前一后地抬起来了。为排除恐惧树立自信，一路上不断暗示自己：千万不要往两边河水里看，更别眺望不到尽头的岸。纵身一跃、吐口长气——哇噻，终于活着到岸了。撒欢地在鹅卵石上打滚儿，脚丫子放肆地伸进河里击水，尽情挥洒着战胜自我的激动。

随后，必须返岸拿鞋。想到刚趟过“死亡之旅”——浮桥，打怵得头皮发麻说什么也不肯再沾浮桥的边了。于是，求来艄公用竹排把我载回去。如此外强中干地回到岸边，坐地观景的“旱鸭子”们却给了高度的赞美。顷刻间，周身披上了勇士的盛装。再

返对岸，是乘竹排，还是走浮桥？心里激烈地斗争着。《厦门日报》的同行不断为我打气：“你看，水漂都是用两根粗大的绳索串连的，纵使四名大汉使劲掀也翻不了的。只要你不吓唬自己地发抖打颤，绝对不可能掉进河里。”长得如女中学生似的《贵州日报》同行也怂恿着：“现在身后也没人撵，你跟在我身后慢慢走就是了。”哪能败给这小妹子，自尊心为我平添了万丈豪情，甩掉闷热的救生衣，拎起鞋子，咬紧牙关，紧随其后，背水一走。依然是不往两边看，一门心思盯着脚下的水漂。好啊，不再步履蹒跚，而是一步紧跟一步稳稳地往前赶。虽稍有些紧张，但不至于心慌腿颤，很快就顺达对岸。再次返回，竟能身轻如燕地在水漂上跑了起来，赢得喝彩如潮。

往返三过浮桥，无论体验者的我，还是观望者的大家都感叹着：其实，世上本没有什么可怕的，往往多是我们先被假想的困难和夸大的敌人吓住了。“如果你是懦夫，你自己是你最大的敌人；如果你是强者，你自己乃是你最好的朋友。”弗兰克林的话与仙居清爽的仙风摇响在我的耳畔，很是惬意。不是吗，再没有比自己恐吓自己更残酷更滑稽的事情了。要做自己终生不离不弃最好的朋友，要当主宰自己生活的强者和智者，切应时刻铭记：当束手无策时，惟有一策可用，就是保持勇气和自信！

旅欧杂记

崔梅

“丽都”的浪漫舞步

人人都说巴黎是浪漫之都。名不虚传。走进巴黎，就掉进了形形色色的浪漫：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凡尔赛宫……或气宇轩昂或神圣庄重或奢靡浮华……当然，还有膨胀着现代活力和诱惑的香榭里舍大街、蓬皮杜艺术中心……这是在白天。

巴黎的浪漫更在夜色中的塞纳河上。

迎风站在游艇上，灯火闪烁着两岸千年风情。那一幢幢有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石头建筑：一条条深深的石巷，一扇扇紧闭的百叶窗，一束束幽幽的灯光，让人无法不神思飞扬，想起巴尔扎克、雨果、大小仲马、福楼拜、莫泊桑……一部部旷世名著，向人们讲述着文明的巴黎、浪漫的巴黎、奢华的巴黎、罪恶的巴黎。

都过去了。那是巴黎的昨天。

今天的夜巴黎，还有另一种浪漫，它在“红磨坊”，在“丽都”。说起“丽都”，便想起一件往事。八年前，曾应邀去东南亚进行文化考察，回程途经澳门，导游动员我们去看那里的“丽都”演出。我跃跃欲试，然而领队沉着脸一句“共产党员就不要去了吧”，我们便集体留下了一个遗憾。

看“丽都”演出是自费，一百三十欧元，我没犹豫。一位同游问我：“你怎么看待‘丽都’？”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全世界都知道，“丽都”的女演员是裸着上身和大腿歌舞的。我认为，世间万物，还有什么比人体之美更美的吗？大卫、维纳斯，让人们激动兴奋并产生审美愉悦的是什么？当然，这里的关键是审美主体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修养……我的观点得到了他的认同。

那天，我也认真思考了另一个自费项目：到荷兰观看阿姆斯特丹花街性艺术表演，虽然冠以“艺术”两字，但我觉得，生活中有些东西还是让它保持着一份神秘吧，那样才会永远有魅力。

我拒绝花街。我走进了“丽都”。

入场时，离演出还有四十多分钟，华丽的丽都舞台上已载歌载舞了。细看，那旋转着的竟是观众，一对对、一双双或张扬疯狂，或粘滞缠绵。一对亚裔青年跳上舞台，开始时舞步慌乱，很快就适应了，跳得热烈奔放。我被一对舞姿优美的老夫妇打动了，心跟着他们的舞步跳跃。

“请您跳舞可以吗？”有人发出邀请。我一怔，旋即欣然起身，随他走上舞台。

不用交流，我们跳起了交谊舞。标准的姿势，轻盈稳健的步伐，随着现代音乐明快的节奏抒发着东方式的幽雅。当然，比起满台欧罗巴式的激情，我们显得斯文了些。无意中我发现，紧靠舞台的一张桌子旁，围坐着几位亚裔男女，向我们投来友好的目光。迎着这目光，我们变化舞步，跳得更自由欢快起来。我欣赏自己和舞伴，欣赏我们在“丽都”的舞台上如此自然、和谐。

一组强音宣布了舞曲的终了。我们互相道声谢谢，从容回到座位，把东方人的舞步留在了浪漫之都的舞台上。

萨尔斯堡的小木屋

我们乘坐豪华大巴，在雨中横穿阿尔卑斯山，驶向高山之国奥地利，驶向具有山野风情的莫扎特故乡萨尔斯堡，去参加那里一年一度的音乐节。

雨中的阿尔卑斯山真美，美得令人时而大叫，时而发呆，尤其在雨帘的飘动中，更多了一种神话般的朦胧和梦幻。

纯自然的东西往往良莠杂陈，只有经过人力的加工才完美。窗外连绵几百里的山地，几乎没有一丝杂芜，齐楚的森林苍绿森严，地毯般的精致的三叶草草坪嫩绿明朗。奥地利的山野是完美的。最让人生发情结的是山野里的小屋。

一路上已被比比皆是的神殿式、哥特式、巴洛克式、罗马式宏大建筑搞得审美疲劳的我，情绪一下子锁定在这些巴伐利亚风格的小屋上。小屋一座座分布得疏朗有致，或原木的或砖瓦的，古朴无华；那屋顶、墙壁或白或红或褐或黑，色色入目却不抢眼，它们自然和谐地融入周围的森林、草坪，成为大自然的陪衬和点缀。它们收敛着自己，张扬着自然，让人体会到一种宁静神秘的终极回归。静定而生慧。难怪那么多闪着灵光的名字与这里有缘：莫扎特、舒伯特、施特劳斯、雨果、弗洛伊德，还有那位天性率真的茜茜公主。当然，这里也诞生过一个异类，他叫希特勒。

我们的目的地萨尔斯堡就隐蔽在这森林草坪覆盖的山地间。

然而，由于连日的大雨，山洪暴发了，清澈宁静的萨尔斯河浊流狂吼、汹涌澎湃，水位早已超过警戒线，有的地方眼看河堤要被冲决。

无法不心惊肉跳！

大桥已封锁，我们要参观的莫扎特故居却在河的对岸。难道要留下遗憾？

导游思索再三，最终向守桥警卫走去。一番久久的交涉，为我们赢得了二十分钟。

我们几乎是冲过桥去，跑到这位音乐神童挂着绛紫色窗帘的楼下，来不及调整呼吸，一阵咔嚓咔嚓，把自己的影子印在莫扎特故居上，便往回跑。过桥时，我脚底生风，生怕桥在眨眼间轰然崩溃，自己“魂断蓝桥”。

终于跑回对岸，定定神，发现身边过往的萨尔斯堡人竟个个神色从容，有的还谈笑风生，只是在不经意间，路边、桥头冒出了一堆堆有秩序的白色精致的沙袋，一根根粗大的管子。路上还有警车，警车也很从容，没有尖厉的呼叫。就这么安静从容地，防洪设施各就各位了。

河两边林立着大小商店。已近黄昏，但五点之前，没有一家提前关门。萨尔斯堡的从容，创造了一个安全塌实的氛围，我的心归位了，和同游慧林漫步街头。我们走进一个卖艺术品的小店，想买一件纪念品。在百样精美中，我们选择了凝脂般的彩色水腊。烛光是心灵之光，它的宁静自守，正像这山野中的古城堡。

然而，我还是迷惑，水火无情，萨尔斯堡人，怎么能如此淡定从容，不惊不恐？

来到下榻处，我找到了答案。

我们被分成几组，送进一栋栋萨尔斯堡人的小木屋。小木屋在绿树环绕的山野深处，原木本色，天真稚拙，淳朴野趣。

未及细看，同游中有人激动地大喊：“到家了！”喊声中，我突然找到了那种许久以来渴望着的解脱与归属感——心的解脱，魂的归属。

我理解了萨尔斯堡和她的人民。彻底回归了大自然，他们的人生态度，怎么能不从容不淡定？在他们眼里，自然灾害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

当晚，我们在金碧辉煌的米拉贝尔宫欣赏了一场无标题音乐会。莫扎特、肖邦、李斯特的随想曲、幻想曲，让我的心灵又一次找到了归属感。

回到小木屋，与家人通了电话。家人惊呼：“电视新闻播了，欧洲正在发大水！”我平静地汇报：“我安全极了。”

那夜无梦。人啊，心，只要有了家，魂魄就会守住它。你信不？

落地东京

紫茜

日本是一个盆景

假如在地图上看日本，或许你会想起老舍说的，像根炸烂的油条。那两颗世界惟有的原子弹轰炸，是可以闻到糊焦味的。或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个恶魔的罪有应得。也有说像一条虫的。或许你会说，那也是一条害人的虫，一条让人毛骨悚然的虫。因为你无法忘记日本对我们的祸害。

假如从飞机上往下看日本，或许你会想起梁晓声说的，像地球上的一块溃疡。那是钢筋水泥堆砌的一座座城市，那些城市里飞扬出的是一个个人间神话，是有些让人目眩的。或许你会感觉很不舒服，因为你不愿意看到日本比我们发达，比我们富裕。你也不愿意相信。

假如走进日本看日本，或许你会发现日本是一个精致的盆景。当然是有山有水有房有人的那种，是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的那种。这盆景里面，所有景物都是精雕细镂出来的，就连沓晃里的一个下水井算子，也必是溜光水滑严丝合缝的。花草树木也都像是一掬水一捧土侍弄出来的，其茂盛之极，让人老是辨不清到底是真还是假。人儿全是一丝不苟的，表情是照镜子练出来的，鞠躬度数是用尺子卡出来的。事儿全是做到极致的，马桶能刷得如食器般干净，鞋子能缝得一针不多也不少。颜色全是墨黑和雪白的，别的颜色再多再艳也全是陪衬。气味是大酱汤和章鱼丸的，是一辈接一辈细品细尝传下来的。

假如住在日本看日本，或许你会觉着，日本就是你隔壁的那个左邻或右舍，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那种。垃圾和下水道也能上报纸头条，一只小猫爬到树上下不来了，也能惊动半个城市。他家并不宽敞，窄窄巴巴却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他家挺好，但你却不能在那儿久留，因为那不是你的家。人家的好，是人家的，不是你的。你无论多么有钱，无论多么了解日本，无论多么会说日本话，无论多么懂得日本文化，你也成不了日本人，你只能像个站在人家墙头外面避雨的过路客。人家，就是人家的家，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你的家。

假如离开日本看日本，或许你会远远地看到一幅画：湛蓝的天空下，巍峨挺立的富士山高耸入云，阳光在白雪皑皑的山顶上折射出绮丽而神秘的光环，山腰上的樱花在清凉的海风中怒放，子弹头列车在山脚下风驰电掣般一掠而过。有人说这是日本独特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最完美写照。在这样的画面前，或许你会忍不住地想，日本人真聪明，在那样一个四面环海、山多地少、地震频发的孤岛上，居然能画出那般美丽的图画。

有人说日本人的聪明在于他们知道，大海是无法填满的，大山是无法铲平的，地震是无法阻挡的，只有人是可以改变的，于是他们改造自己。“隐忍”成为他们自我改造的最高境界，“隐忍”造就了他们的执著与精细。越是需要耐心的活，越是需要细致的活儿，他们越是拿手。看日本人做的东西，就是两个字：干净。是没有灰尘的干净，更是没有粗糙的干净，没有瑕疵的干净，没有杂质的干净。干净得不可思议，干净得可怕。

假如拿起笔来写日本，或许你会觉得有些难。你想把日本人的好，告诉我们大家。可是你怕一张嘴，便会有人说你是看日本的月亮圆。只因为我们过去是他们的先生，只因为他们祸害过我们，只因为他们没有向我们认罪，只因为他们还在参拜甲级战犯……反正说日本人的好，不比说别国人的好。你的语气，你的措辞，你的角度，你都要注意。注意别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注意别触动了我们心里的伤疤，注意别犯了众怒。不过，也许你最终还会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哪怕他曾经是我们的仇敌。”或许你最终还会认为，日本人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正是他们肯于向仇敌学习的精神。于是你便又有了说日本人的好的勇气。当然，日本人并非全都是好，只是你更想说的，是日本人的好，而不是日本人的不好。因为你想让我们中国人比日本人做得更好，因为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白：你是个中国人。

受伺候享

在东京消费，不管是名店名牌之类的高级消费，还是一般的普通消费，亦或是最廉价的低档消费，都会有种受人伺候的感觉。这伺候，不是对待老弱病残的那种，而是对待达官显贵的那种，是下人对待主人的那种。不但毕恭毕敬，还俯首贴耳，小心翼翼，想和你永世结好似的。

你随便走进一家店门，随即传入耳中的那声“欢迎光临”，一定是轻声轻气诚惶诚恐的，即使有十个人一起招呼你，也不会让你觉得噪。店员们的表情和姿势，即使店老板的表情和姿势，也全是随时听你使唤的意思。你一张嘴他们便会颠儿颠儿地跑来跑

去，那几步跑绝非单纯为了快，更是为了表示对你的惟命是从。他们对你的眼神，也是在尊敬中带有崇拜的，让你没法不相信自己是个受人敬仰的伟大人物。你站着，他不敢坐着，你坐着，他不敢直着身子，因为他不敢让你仰视他，他必是弓着腰跟你说话，假如一句半句的还说不完，他必是蹲下来或跪下来与你说，说话的语式也全是敬语和自谦语。他愿意让你俯视他，让你觉着你比他高一头，他也愿意让你把他使唤得前后左右地团团转，转得越厉害越说明他在这个岗位上存在得有价值。假如他为你忙乎了一大遭你也没中意，你没花一分钱就要拂袖而去，他也绝不会露出半点怨艾之意，依旧如你刚进门时一样诚惶诚恐，依旧要低声下气地把你送出门去，诚恳地请你再次光临。你不再次光临他就没人伺候了，没人伺候了老板还要他干什么。

不过，伺候归伺候，像下人也好，像小人物也好，他们可是一点儿也不自轻自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伺候着的人何尝不在伺候他们呢。或许就是那个天天给他送饭上门的人，每次都不忘把饭馆桌上摆的那些调味品也如数给他带来；或许就是超市里卖鱼的那个人，把鱼收拾的干干净净，还切得块是块片是片的；或许就是那个生产照相机的人，把人都伺候成“傻瓜”了；或许就是那个生产洗衣机的人，把人伺候的不仅不用洗了，连晒都不用晒了。

其实大家就是互相伺候，只是岗位不同而已。所以，这里人一点儿也不忌讳“伺候”这个词，更不忌讳“伺候人”的工作。人人都很会伺候人，好像是职业的，又好像是天生的。这种伺候，让人对消费充满了好感。消费就是享受，享受物质，也享受精神。做人的尊严，在享受侍候中得到极大的满足。这里人也不忌讳“享受伺候”，会伺候培养了会享受，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身上都带有些雅皮味，连家庭主妇，也要每天到咖啡馆里坐上一气，跷着小拇指捏着小搅勺搅动着细瓷小碗里的咖啡……生活很是享受的样子。

互相伺候与互相享受，不正是现代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吗？这种分工与合作越精良，人们的消费生活才会越轻松越自在。

感受细节

常常就会被感动。东京这座城市里竟然有那么多细心的人，他们在打造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在提供消费与服务的时候，一点儿都没忽略那些容易忽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却最能传递一座城市的人性温暖。这温暖，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心生宁静；让走过这里的人难以忘怀。

容易忽略的也是不容易发现的。比如走在路上的感觉为什么那么踏实？你得留心地看才会明白。原来这里不论地上地下的大街小巷，还是机关学校百货商店的室内室外，所有地面都是抛了光的，有个既防滑又防疲劳的磨擦系数。你很难找到那种用光滑材质铺设的地面，即使在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里。哪怕用于少量的地面美化装饰，似乎都没有。你再在那种人流涌动的地下通道上走走看，你会发现脚底有时忽然就有了踩在小鹅卵石上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提醒你要注意前方道路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你只需一抬头便知分晓。就在最打眼处，肯定会有一个醒目的标志，这标志可能要告诉你前方就是岔道口，也可能要告诉你前方是个拐弯处，也可能要告诉你前方是个坡路，也可能要告诉你前方有电动扶梯或电动步行道，也可能还会顺便告诉你前方还有个洗手间。一路上都会有人与你牵手似的，让你省力又省心。

再比如乘车的感觉为什么那样轻松？你也得留心地看。你看这里的公共汽车，车梯高度是照着矮个人设计的，上车车门的宽度则是照着胖人设计的；各种列车里的地面和站台的地面是一般高的，车门全是地铁那种可以并行两人的宽门。你再看车里的栏杆和把手，还都朝你招手似的，不管站在哪个部位，都能够得着扶得住，是真心实意让你扶让你把的样子。尤其在下车的车门口处，绝不会让你感觉扶好站稳有多么勉强。不论什么车，车座也全是防滑材料的，行李架全是易取易放的，你看不到有提着大包小卷儿，在车上艰难挺立的，或站或坐都保你稳稳当当。

再比如在广场、在花园、在百货公司、在其他公共场所里，为什么都能够那么惬意？你还是得留心地看。你看那些地方，一般都有让你可以坐下歇会儿的座椅，假如是室外，那座椅还是尽可能设在树阴下的，你看不到有人坐在花坛边、水池边，甚至马路边。有些电梯或电话亭之类不便设座的地方，还会横上一根粗管，让你半倚半坐地小歇一下。你再看那些地方的公用洗手间，好像早就潜伏在你周围似的，只要你想找它，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或不远处。洗手间的外边一般都有长椅，洗手间的里边更是体贴入微。你看那根长长的大挂勾，足够你把长短大衣连同大包小卷一起挂上的。你再看那种母子同用的厕所里，孩子的小马桶上还有一个背带，放婴儿的小床上还有一个缚带，这缚带是替妈妈搂住孩子用的，这样的创意只有当爸爸的人才能想出来。

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你会感觉这城市是为人建造的，是为人享受而建造的。这样的城市，让生活在这里的全体人们拥有主人的尊严，难忘主人的责任。你不舍得弄脏它，也不舍得弄坏它，只想让它越来越好越来越美。所以，走在这样的城市里，你很难在墙上、地上和这样或那样的设施上，找到人为的污染和损伤。

傻瓜开车

在东京开车感觉像用傻瓜相机，省心且自如。用傻瓜相机只要能打开镜头盖就行，在东京开车只要会向前看就行。

看到前面有车时便向前面车看齐，越是塞车的时候越要看齐，要像刚入学的小学生站排那样。前面车动你就动，前面车不动你就一点儿也别动。你一动便会让人以为没开化的老土来了。你更不能像在国内那样，溜着车缝朝前拱，或拐到不该用的道上，甚至冲到反道上疯跑一气，哪怕道不便设座的地方，尽头儿一个车影也没有。这种原生态的机智和勇敢，只能留着去游乐场玩碰碰车。除此之外，毫无用武之地。

看到前面有信号灯时你便只管听信号灯的，红就是红，绿就是绿。绝对不用像在国内那样，开着车还得防着车外的人。这里的行人也是傻瓜式的。没有通行信号，打死他也不敢过，连道牙子也不敢靠前。靠前了怕开车人不能放胆地开，也怕行驶的车辆刷着自己。这也是都市人的常识。

看到前面有交通指挥员时，便跟着他们的手势走。他们一般都出现在站前广场或商厦门前广场那种车水马龙的地方。他们不是交警却非常专业。他们能把水涌般的人和车，全都顺顺当当地接过去。并能让车有车道，人有人道，进有进口，出有出口。绝不会让车与车，或车与人纠缠在一起。即使那种临时集会散场时的人山人海，也绝不会把人和车搅到一块儿去。

过去在国内看到这样的地方人车一锅粥似的，总以为是社会公德太差。现在才明白，那是因为没人管。在这里，多小的道上都画着线或写着字，都要把人车分开。多小的道口都有指示牌和信号灯。临时施工或临时装卸货占道的，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也会立刻站出一个指挥员来，划出一个暂用道来。这个道也一定是人和车分离的。

所以，你永远不必为怎么走而费心，永远只管向前看。

有了这样的开车体验，我的野心骤然膨胀，便想自己开车逛遍列岛。话一出口，立刻遭到国内老母亲的反对：就你？一千度的大近视，在家门口走道眼神儿都不够用。是啊，现如今的老母亲，走在路上怕车，坐在车里怕路人，怎能放心女儿在汽车大国里耍大刀呢。就像我刚来东京那会儿，老母亲夜夜梦见我饥寒交迫，日日担心我上当受骗，也是因为对付日常生活连起码的心眼儿都不够用——不认秤、不识货、不会算账、不能讨价还价。老母亲却不知，这些农耕时代的心眼儿，在这里也少有用武之地了。但无论如何，不能让老母亲担心，从此不提开车，只是自己笃信自己肯定行。因为这里的交通，正符合我这种眼神儿不够用的傻瓜。

想起有位法国人说，假如让十二亿法国人，生活在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上，这些法国人非得相互厮打起来不可。我则想，假如我们中国人也家家都有汽车的话，又会怎样呢？我和那位法国人一样，真的很佩服日本人守秩序。但我更佩服能够让日本人守秩序的那种管理。

我发现，日本人的管理，不是赶羊群轰麻雀的那种，而是要安顿好所有人的那种，是给人尊严给人安全给人方便的，是让你在服从中感到省心且自如的。这可能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吧！这绝对需要学问。没有这种学问的管理，就好比牧羊人手中的鞭子，庄稼地里的稻草人。不仅会刺伤被管理者的自尊心，还会引起反感和排斥。

大连老建筑

宋增彬

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大工地。一部分人在忙着挖地下，一部分人在忙着拆地上。挖地下，是因为我们的地下有太多值得打捞的东西，在那些数不清的陵穴和祭坑里，堆满了金铜玉帛。有时候，第一个揭开地下之谜的未必是考古队，而可能是盗墓者。挖地下，让我们有了许多珍藏，但也有许多丢失。拆地上，则是因为不喜欢看见旧，也不懂得保存旧究竟有什么意义。古城是旧的，故居是旧的，遗址更是旧的，有碍观瞻，阻挡交通，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拆掉。过去的内战外侮、政治运动拆掉了一些旧，如今的城市规划又拆掉了一些旧，我们在城市里几乎看不到旧了。虽然每天生活在新里，这种新却让我们觉得陌生。许多人去过巴黎，去过维也纳，发现它们几近完整地保留了旧，它们却是欧洲乃至世界最时髦的城市。许多城市在拆了太多的旧之后虽然变得焕然一新，却让你分辨不出它是谁，好像比巴黎和维也纳旧多了。这个现象太普遍，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如今，那些被粗暴地拆掉的旧，已经是万劫不复。好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些幸存的旧，一些健在的旧，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让它们不再无缘无故地消失。对大连而言，所谓的旧，就是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老建筑。建筑其实是一个城市的编年史。它发生在哪一个时代，就留有哪一个时代的印迹和气息。它是记录历史的载体，是回忆历史的依据。大连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在大连被叫成“三山浦”“青泥浦”“青泥洼”这些名字的时候，它还只是一座城市，而只是一个小渔村。可是小渔村的茅草屋我们已无从追寻，它在漫长的岁月里随风飘零了。大连与中原、与欧洲的城市不能相比，它作为城市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1894年秋天，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震碎了小渔村梦一样的宁静。接着就是沙俄强行租借旅大，一番大兴土木之后，直至1899年，它成为沙俄在远东的“达里尼市”。大连城市的历史就这样被列强的魔爪给揭开了。1905年，在中日战争的发生地又爆发了日俄战争，卷土重来的日本人站在俄国人的肩膀上继续规划大连的城市版图。于是，在俄、日占据大连的半个世纪，大连成为中国近百年来被帝国主义入侵后建设与发展起来的典型城市之一。

曾有人说，一看见那些老建筑，就让人想起那段屈辱的历史，应该把它和俄国大兵、日本鬼子一起赶尽拆光。我认为这种说法太简单了。翻开人类文化发展史，各个地

区、各个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又是互相渗透、互相传播的。战争可以把一国文化带进异国，宗教可以将一族文化传给异族，不论是哪一种方式，不论其原始动机如何，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在宏观上都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融会贯通和共同发展。毋庸讳言，大连就是这样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暴发”起来的城市，是被俄、日两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开放的产物。两次震惊世界的战争，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一方面蹂躏了中国人的灵魂、尊严和生命，一方面又带来了东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当城市重新回到城市主人的怀抱，那些殖民者退逃后留下来的老建筑，在今天就变成了世界性的文化遗产。

大连因为有半个世纪先后处于单一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城市的发展比较有秩序，有统一的规划。19世纪末，由于沙皇俄国在文化上只处于二流地位，历史上一直崇拜比较先进的法国文化，由于大连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是在日本统治时期，而日本建筑师彼时也纷纷仿效欧美洋风，所以，当他们把正在流行的或正在衰退的建筑思潮搬到大连，就形成了大连建筑艺术的琳琅满目和丰富多彩，大连城市基座的千般欧味和万般洋态。歌特式、巴洛克式、古典复兴式、浪漫主义、折衷主义、现代建筑、中国古典等东西方各种建筑艺术流派相继出现，汇聚一堂，使大连的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从一开始就步入现代城市的行列，受到国内外的瞩目。后半世纪，尤其是近20多年来，由于大连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建设步伐越来越快，城市规模也就越来越大。殖民地时代的欧式老建筑被夹杂在崭新的现代建筑之中，“文革”中的“火柴盒”式建筑刚刚竖起几十年就破败不堪，这些形形色色的不同时代的老建筑们，有的因为是危房，有的因为是没有保留价值的旧房，而必须拆除；有的则是因为影响城市规划，有碍观瞻，阻挡交通，而必须拆除。然而，在已经拆除的老建筑里面，的确有一部分是应该保留而没有被合理保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是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

我认为，一个城市的历史，像树的年轮，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而是在岁月里长大的。城市的脸上越有沧桑，说明城市的历史越悠久。大连既然比不上那种发祥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城，大连就应该守住它现代城市的风韵，让它即使只有一百年的履历，也能展示出它应有的长度，应有的复杂，应有的魅力。为此，大连市政府作出了关于保护有价值的老建筑的有关规定。保护并不是目的，保护的目的在于使用，在于建设。其一，大连的老建筑是大连历史的真实写照。比如，当我们站在旅顺船坞、万忠墓、关东都督府旧址，耳边就能响起1894年深秋的炮火，以及两万个生命撕心裂肺的哭喊。当我们站在人民广场，看着上个世纪初日本关东州厅、地方法院、警察署旧址，心里涌起的则是被列强殖民的悲剧不能重演的警醒。由于每一个老建筑都有它特殊的背景，有独属

于它的故事，所以它们是这个城市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既是发展城市旅游的最好资源，也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其二，大连的老建筑有它独特的生命力。有一位建筑大师曾经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一个优秀的建筑作品，一定是艺术、信仰、智慧的化身，是人类对美的深刻理解和最高表现，它有无限的生命力，历史会因为它的存在而不断地连接起来，延续下去。大连的老建筑其实早就向我们暗示了今后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思路与风格，我们在作新的城市规划时必须对它独特的历史有一个观照。让新与旧是和谐的，中与西是融会的。让历史并不沉重，现代并不肤浅。让大连现在和未来的建筑，既含有历史的符号，又富于现代气息，既引人追忆，又引人向前。让今天的大连城市建筑在大连更久远的历史链条上，占据新的一席。让大连不论走到哪一个时代，它的城市建筑仍遗存一定的历史特征，它的城市风格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被记忆、被怀念。

如果我们真的爱自己的城市，真的不想忘记城市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就应该像尊重生命那样，对每一个老建筑备加呵护。

2002年10月31日

品茶

阿琴

壬午年正月初五，应友约品茶。

我们没有去茶艺馆、茶苑和茶房，而是在朋友的家里品茶。未见其茶，先见其器。看得出，主人对茶道的讲究绝非一星半点。小到可以与耳勺相提并论的木制茶甃，大到几乎与茶桌齐肩比美的红木茶船 好像也叫茶海 。所用茶具一律严格配套。茶壶和茶杯据说也都是台湾产的黑鹤系列，玲珑剔透中还透出几分神圣；包装考究的各式名茶如待选宫女般，一溜排开……面对这样的品茶气派，未经品茶，便已经有了茶的圣洁。男主人当仁不让，放下平日里那个总端着领导者的架子，做了今天的“茶人儿”——服务生，还极认真地调侃说，为女人服务本来就是男人的最大荣耀……虽是玩笑，来宾们却极愿意听。

说话间，“茶人儿”的茶艺“工程”开始了：他先把直径很小的，细细的一圈一圈盘起来的褐色薰香点燃，再把点燃的薰香放在带盖子的小香炉里。小香炉坐在一个红木雕制的精巧架子上。不一会儿，丝丝烟缕舞蹈着从香炉盖上排列有致的若干个小孔子里转出来，轻轻婀娜……慢慢地它们便与空间里缓缓低吟的排箫旋律“纠缠”在一起了……青烟袅袅，幽曲低婉，未闻茶香，一种“暖风熏得游人醉”的预备气氛便这样于不觉中营造起来了。

“茶人儿”如数家珍，将他的好茶统统打开，并一一介绍。什么天雾、天梨、冻顶、阿里山、铁观音……应有尽有。我不懂茶，却极怕“今夜无眠”，于是积极主张还是只喝一种吧。听人家说，酒是不能混着喝的，说是那样易醉。不知为什么，我竟下意识地将茶与酒联系起来。同来的人笑我张冠李戴，我却不以为然。须知，“以茶代酒”也是茶的一种升华。一阵笑闹过后，不知是习惯还是偏爱，大家还是选了喝乌龙系列的铁观音。

“茶人儿”开始烫壶、温杯，洗茶、沏茶，一路下来看得人眼花缭乱。只见他“三龙”护顶“莲花指”一翻，将茶从闻杯倒入饮杯。我们也都很“状态”地两只手端着杯子送在鼻前轻轻旋转，真有种说不清的清香，似有兰花、青草的味道。只觉得香气袅袅，直入眼、入鼻、入口、入心……第一口茶，略带些许青涩和淡苦。接着喝下来，似

有米汤的质感，慢慢地在舌尖滑过，轻吸入喉之后，口中便有丝丝甜意，再喝就有了淡淡的茶香。主人说，茶应该是喝到三泡、四泡的时候才色香味最佳，也最有滋味。

据主人介绍，铁观音深受文人雅士喜爱。究其原因，其茶香清淡，余味绵长，越是细细品来，回甘味越好。果然，众人一致赞同，一个写作的女友对铁观音还情有独钟，她闻着茶香很经验地说，铁观音应该是咱们女人的茶，喝着的时候就如同与一个绝不肤浅而又厚道坦诚的男人谈话一样——有滋味。我们为她的感觉放声大笑，同时也在寻找她的那种感受……不觉中已经忘记喝了多少杯，只觉得身上已有微汗，还有些朦胧，有些飘然……接下来，“茶人儿”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并举起杯子向我们示意。我们乖乖地服从……口中、喉中顿时有涓涓甘露似的津液生出，如山泉一样清甜……白水竟然如此甘甜！“茶人儿”说，舌上的味蕾已被茶的各种茶质“锈”住，经白开水一冲，甘味才生。突然就想，白开水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会如此“美丽”，那么，经常被丈夫们指责为“白开水”一样的女人们，她们的“平淡素然”又该作何解释？茶喝到这会儿，已喝出了几分愤愤然……

品茶进入了文化阶段，“茶人儿”开始给我们讲起了《七碗歌》。也就是唐朝诗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篇。据他说，卢仝可以算得上中国茶圣，至少也是茶文化的亚父。他写道：

一碗喉吻润，
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得文章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轻风生。

主人嘎然而止，将接下来的句子留给来宾自己把味。我不觉低声吟道：“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咏着诗人的茶歌，茶文化的感觉更浓了。

面对卢仝的《七碗歌》，我看到了唐朝大茶家喝茶品茶悟茶的境界。我无心考究这个卢仝当时的社会背景个人心境以及生存形式抑或生活状态，还有他的婚姻情感、“工资收入”以及“下岗”与否，只是隐约地感觉到他在饮茶中所得到的安慰、快乐与灵感。喝着茶，他的心是飘然的，思考的。茶不仅令他吻喉滋润，还排遣了积于心中的郁

闷 也许还有愤懑 和孤独。一路喝下去，竟然喝出了“斗酒诗百篇”的功效。怎生了得！“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此时的卢仝，定是喝出了佛缘，于是他淡泊世事，进而“肌骨清、通仙灵”，直至入了身轻欲飞的仙境。

茶品到这会儿，也有若干个时辰了。直觉得喉吻甜润，心情也豁然。虽未见“两腋习习轻风”，不过，走近茶，走近茶艺，走近茶文化——就走进了圣洁、清静与平和。茶是一种氛围，悠悠、淡淡，有青烟缭绕，有幽曲回荡，有四溢的茶香，更何况还有茶祖的《七碗歌》和我们自己的悟语。

离开时，由衷地感谢“茶人”夫妇。他们却乐此不疲，说只要不影响睡眠，一定再来。心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记不清出处的句子“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生”，搞得同路女友硬是说，瞧，效果来了，“三碗搜枯肠，唯得文章五千卷。”

2002年3月

我的非正常生活

楚琦

我一向是最喜欢夏天的。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夏天会是这样的。除了断断续续的阴雨和忽高忽低的气温之外，我的生活也因为一次意外而发生了暂时性的变故：我的生活空间突然变得异常狭窄，我的生活内容也突然变得异常简单。

简单生活是许多现代人“梦寐以求”的。工作越是忙碌，人际越是复杂，压力越是沉重，人们越是向往简单生活，并时常摆出孜孜以求的架势，比如，一觉睡到自然醒，大事小事不用想……可是，当简单生活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突然降临时，能伸手接住并大快朵颐的人恐怕又寥寥无几。简单生活，无非是叶公好的那条龙。

简单生活的典范当属加菲猫，它对自己的简单生活有着极经典的阐释：“除了吃和睡，生活也许还有别的意义，不过我觉得也挺好。”它的别具一格的猫生观认为：“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有猪肉卷才是永恒的；把每顿饭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顿饭来吃，且要今日食、今日毕……”虽然英雄所见略同，但凡夫俗子如我者，毕竟很难企及加菲猫的觉悟和境界。不过，既然一不小心掉进了“简单生活”的陷阱，也只好尽力高举“既来之则安之”的大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当然，对于我的简单生活，我基本上还是能够安之若素的，而某些时候更是几乎回归到了孩童时代最最本真的状态。

住院的人，最怕的除了病痛就是寂寞。幸好，我一直都是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所以，有几本书、几张碟就足以打发病床上的日子。只是，对于夜晚，我还是心存几分畏惧的。因为一到夜晚，不但蚊子成群结队地来了，身体的痛和心里的痛也都毫不客气地一起来了。能入睡还好，无非做几个噩梦，被人追杀、上班迟到或者做节目找不到CD……一早晨起来，除了浑身每一块骨头都疼得像被人痛打了一顿之外，并无大碍；若是睡不着，就只好再做“思想者”——想东想西想南北，想三想四想大令……或者借着窗外的一点亮光潜心研究动植物的习性，比如百合到底是在凌晨几点几分开放、金鱼要不要睡觉会不会便秘、蚊子对何种血型的人更感兴趣……实在不行，索性吃几片安定，强行入睡，一夜无梦。

在医院住久了，便渐渐发现，这也是一个小社会，除了医生护士，更有各种各样的病人，各种各样的家属，各种各样的陪护，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各种各样的故事段子……在这里，我接触到另一个人群，另一种生活。

我的陪护是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北方女人，我称她为“老大”。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尊重，二是为了确立她的“领导”地位，还是尊重。于是，这个称谓很快传开，令老大很有面子。当然，老大本人也很敬业，也挺专业，不仅对病号儿尽心尽力，对医护常识也略知一二。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老大生不逢时、生不逢地，不然肯定更是一人精。老大抽烟，而且有二十年烟龄。我一直都觉得，抽烟的女人一定有着很深的隐痛，一定是有故事的女人。虽然这种感觉不一定完全对，但老大确实是有点故事的。老大从来不在病房里抽烟，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会央求她：“老大，你抽支烟吧。”我喜欢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的感觉，甚至想什么时候陪她抽一支，可是一直没有。两个女人，在白天，在人前，莺歌燕舞；在夜晚，在人后，各怀心事。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获准在下午坐轮椅出去晒晒太阳、放放风。从病房到后面的小花园，这段路不算很长，但会碰到很多人，而他们总是会投来或好奇或同情的目光，当然也经常会有人过来和我攀谈。好奇的人说：“怎么会弄成这样？”同情的人说：“这大热天，遭老罪了！”而我也总是以感激的心态对他们抱以平静的微笑。在100%的回头率中，在简单的问答中，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也愈发地上了层楼。

我有两个老病友，我们经常会在花园里碰头。他们一个快七十岁了，一个快八十岁了；一个已经意识不清了，一个已经不能自理了。每次看到他们，在我心里都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忍不住感慨：年轻时再争名逐利，到老了还不是殊途同归？

骨科的病人基本上都是情况一天比一天好的，因此这里相对多了一点轻松的气氛。然而也有例外的时候。隔壁的阿婆就是在一个午后离开的。那个午后，我在嘈杂中清醒过来，几乎立刻就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担心我害怕，便把我病房的门关了，可我还是能够清楚地听到走廊里的忙碌声和她外孙女嘤嘤的哭泣声。其实，我没有害怕，因为我想起了二十五年前我外婆去世时的情景，而当年的我也是这样嘤嘤地哭泣。傍晚出去放风经过隔壁病房时，已经人去屋空了。于是心里慢慢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受我的非正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三岁的儿子狗狗。我住院以后，只能每天给他打个电话，只能每周见他一次，而他对我的两只脚好像一直不太放心，所以几乎每次在电话里他都会问：“妈妈，你还能走路吗？”或者“妈妈，你的脚好了吗？”甚至有一次，在看过我之后离开时，他本来已经走出病房了，却又折了回来，郑重其事地指着我的脚说：“妈妈，你的脚还没好，千万别下地！”我当下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儿子总是这

样，能用他出人意料的大人话拿住我。比如，他说：“我请求菩萨奶奶保佑，我能和妈妈在一起睡觉。”比如，他说：“如果我是妈妈，妈妈的脚就不疼了。”狗狗虽然淘气，但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所以，每次想起这个三岁的小人儿，我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

其实，当一个人的活动空间变得狭窄简单时，他 她 的心灵空间也就相应地变得宽广丰富了。

只是，身体的痛和心里的痛纠缠在一起，分不清哪一个占了上风。所有的伤口，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里的，愈合的过程，就是一个历练的过程。想起十年前一位听众寄来的两句话：神经百炼成钢缆，心脏百炼成子弹。我，快了。

一生中这样的時候估计不会太多，也希望不会太多。记下这些感受，权且作为纪念。人是很无情的，时间久了，什么都会忘记。

题目套用了洪晃的书名，一是因为懒，不用再想了；二是因为以此题来概括我目前的生活，确实贴切。

2003年8月

回家的感觉

王冬梅

从十八岁离开家乡大连，一直在他乡漂泊。快三十年了。三十年来，回家的渴望一直在心底涌动，但却有种种无形的东西拽住了我回家的脚步。

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也常常回乡去探亲，但每一次都像是一个过客。在家里从不下厨房，被父母及兄弟姐妹像客人一样招待着，同学朋友、儿时的伙伴，也把我的归来当作一次聚会的理由。走在街上，听着熟悉的乡音，就仿佛自己是一个外乡人。常常是住不了几天，就急着走了，因为家乡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一个回家乡工作的机会，便急匆匆踏上了归乡的路。心中也很忐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适应，毕竟在外面工作生活的年头儿太多了。

后来的实践证明，回来工作和回来探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长达二十年的脑力劳动，成功地摧毁了我的睡眠，在三十岁以后的若干年里，让我饱尝了失眠的滋味，安眠药成了我随身携带的药品。读崔永元的书，看到他整日整年地被失眠折磨着，便有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想到中国的一句老话：前三十年睡不够，后三十年睡不着。便以为，失眠已成了我的影子，今生再不会离我而去。

然而，在我回到家乡的第一个月里，我便回到了从前，回到了整夜睡不够的中学时代。这真是一个奇迹，失眠不治而愈，带回来的安眠药被打入了冷宫。

为什么在睡不着的年纪里，这般渴睡？就因为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不是回来探亲，不是回来作客，不是回来了还要走，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回家，使我那颗漂泊不定的心，有了一个锚地，使我那个疲惫无根的灵魂，有了一张安歇的床。是回家，使我重新拥有了美好的深度睡眠，这是我预想不到的收获。

当朋友问我回家的感觉时，我笑着回答：睡觉。

我还想告诉崔永元，睡不着，回家去。

走在三十年前走过的街道上，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景物，我的思绪就像三十年里走过的道路一样绵长。

人生究竟是一条直线，还是一条曲线，或者是一条环形线呢？

当我们从起点出发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过还会回来，那时候想的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那时候总以为，家乡以外的世界才是精彩的，才是能够大有作为的。

那时候喜欢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好男儿志在四方。有很多人，从起点一直走到终点，都没有再回过家乡，直到他们带着对家乡的怀念客死他乡。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非常成功的，正是成功才带来了他们心中的遗憾。

还有一些人，他们的人生之路就像运动场上的跑道，起点也是终点。当他们走过了漫长的人生之路，重新回到起点时，他们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便被回家的喜悦替代了。回到起点，使他们终于结束了漂泊的人生，他们可以像初生的婴儿一样沉沉睡去。这样的人生，即便没有成功，也没有遗憾。

哪一种人生更好一些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主要看每个人的感觉。

父亲

肖正

父亲离开我们二十一年了。年年都想写一篇悼念父亲的文字，可每次都是泪水潜潜、笔下无字。窗外，天一点点地暗了下来，浓雾卷着闷雷轰鸣着。雨，从星星点点地飘着到哗啦啦地砸在玻璃上，都是我思念父亲的泪。

小时候，我最愿站在金色的余晖下等父亲。当父亲高大的身影斜拉在地上，我会欢畅地迎上去。父亲“嘿”的一声抱起我，我捧着他的帆布包美滋滋地把家还。迫不及待地打开父亲的饭盒，总有一条香喷喷的白面发糕卧在那里。我开心地吃着，母亲却埋怨父亲：“干那么累的活儿，本来带的饭就不多，咋又剩了呢。”父亲只顾摸着我的头乐呵呵地问：“好吃吗？”我摇头晃脑地嚼着：“好吃极了。”60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为吃饭穿衣发愁，我家更不例外。父亲在采矿一线工作，因患有胃病，母亲就在父亲的饭盒里抹点油，搥一块撒些葱末的白面团，让他捎到单位当小灶。父亲一米八的壮汉，每天领一群小伙子扛铁道、搬石头，吃那点饭如同肚里掉颗枣。可他每天都给我剩下近一半的发糕，为此，他常常饿得直打晃，我却浑然不知。

五岁那年，山东老家来了贵客；父亲和母亲翻箱倒柜找出几元钱，打发我与哥去买肉打酒。结果我看到一种麻脸小圆果很新奇，在服务员的鼓励下，我们斗胆将手中的钱换成果子，坐在马路牙上你一个我一个地吃起来。本想给家人留一些，哥怕父亲怪罪想出一个馊主意：全吃掉，让我回去说钱丢了。见父亲焦急地等在门口，我惭愧地低着头，吭哧半天吐出的是实情。没想到父亲听后仰头大笑：说我们当了一把杨贵妃，吃到了北方少见的荔枝。还夸我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难忘夏日的正午，哥与小伙伴们去掏鸟蛋，怕跟在后面的我碍事，就合伙将我引进一节废弃的火车帮子里，他们全溜了。我绝望地在里面大喊大叫，我是“郑大帅”——父亲是工段长，人长得帅又满腹诗书，工友们便给他起了这个绰号——的老丫头，快来救我呀。终于，我被一个路过的工人捞到父亲面前。父亲给我洗净脏脸，又用大手指当梳子给我扎小辫，头绳早在摸爬滚打中掉了。父亲一转身，找来一把炮药信子，将它们一根根绑在门把手上抽着。旋即，红、黄、绿、蓝等彩色塑料皮，从铜芯上退了下来。父亲将我抱到有暗影的玻璃上照着，一个头系七彩蝴蝶结的小姑娘正朝我甜甜地笑呢。

那时家里住的是一间半破旧的平房。虽然老少三代挤在一起，父亲也没张嘴向单位要求过改善住房环境。他很自量，凭自己私人出身，念私塾、读国高又懂点外文的臭底子，公私合营后能有单位要，还有地方住就不错了。父亲从繁华的大连商业区服务外国人的账先生的位置上退下来，两手空空与策划外逃的有产阶级们划清界线，来到偏远的矿山出大力、流大汗。至今母亲常挂着泪水念叨：想起来就揪心啊，你爸用握笔的软手搬铁道，一连四五年，回到家里歪到炕上就起不来了。每次帮他扒衣服、脱鞋，内衣、袜子，与刚长的新痂、鲜红的皮肉一块儿撕下来……当父亲细嫩的双肩、手脚磨出厚厚的老茧，脱胎换骨成为优秀党员、先进生产者时，我家有过好几次乔迁新楼的机会，是父亲以自己终被矿工们认可的自豪，把晋级和分房的美事全部拱手让了出去。

当我们姊妹六个都长大，实在不能再摞在一块儿睡觉了，父亲也曾多次虔诚地向组织递交“要房申请”，可分新房的好运一次也没降到我家。在不知愁苦的童年，抹不掉的懊恼是每天吃完晚饭，我们姐妹四个顾不上洗净脸、脚，蜂抢着一起往炕上钻。谁越位了，身上必然落一挨掐遭挠的痕印。常被“淘汰出局”的我，便钻到父母中间撒娇，也怪不懂事的。偶尔听母亲数落父亲：光交申请咋行，你得像人家那样常去催催呀。父亲总是喻声喻语地说，用不着，够条件，组织自然会考虑的。母亲再絮叨，父亲就转身、蒙头给她个不理睬。

间或听到母亲和姐姐们抱怨父亲的无能和窝囊。往往说古道今口才颇佳的父亲，会垂着头蹲在灶台边使劲吸着烟斗。听得极不耐烦时，父亲猛地起身，摘下挂在墙上的京胡招呼我：老丫头，来，咱唱段李铁梅、小常宝。父亲的京胡一响，我张开大嘴：“八年了，别提他了……”我们一大一小一折腾，家里的气氛由阴转晴。想必是为表彰我在关键时刻的特殊贡献，隔三差五父亲迈开大脚出门时，后面总沾着我这个小尾巴。

星期天，拗不过我的磨叽，父亲领着我直奔斯大林广场 现在的人民广场 。下车后，偶遇苏联人到铜像前献花圈，父亲会叽哩哇啦与人家说上一阵子，或支派我细数脚下鹅卵石铺成的花瓣，就是不肯马上领我到当时住在最高楼 三层 的姑妈家。母亲说，甩着两只大手到他妹家，要知道脸皮薄的你爸有多难。我哪里能体会大人的感受，时常吵着去姑妈家，看葵花籽状闪着荧火的瓦斯炉。没玩够，姑妈搂着我说：“甬走了，给姑妈当孩子吧。”我会一个激灵藏在父亲身后叫着：“不，没爸妈的家再好，俺也不住。”父亲则将我擎在空中，用他青青的下巴扎我的小脸，我格格乐着，父亲也哈哈笑着。出了姑妈家门，不论多晚，父亲都要扛着我走到人民路上的海员俱乐部看彩灯。遇到黄头发和黑头发的外国人询问无人听懂作答时，父亲会热情地分别用英、日、俄与他们搭腔，引得老外们耸肩、竖指，一个劲地向我怀里塞糖果……当父亲与老外们

谈兴正浓时，他会打发我去数门外一串串红、黄、绿的小圆灯。那可是大连少见的彩灯和夜景，悬挂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串。看着、数着，我忍不住像飞到天上数清了星星似的快活。

那日，父亲庄严地叫母亲去拿新房的钥匙。一个闷闷的声音传来：郑大帅有问题，不能……父亲的问题是，“文革”时身为小知识分子的父亲，为表明自己对“革命”的虔诚和拥护，曾经按组织的要求，写过不少大字报……

打那以后，每天早晚，父亲领我们到山上采有棱有角带花纹的石头。万没想到，当父亲与同事利用星期天垒墙修屋时，下趟房的邻居拿着镐头抗议。那时人们能忍受共同贫穷，就是不能容忍你别出心裁过有情调的生活。拿镐的邻居有恃无恐拆毁着盖出模样的院墙。哥和母亲想拼命阻止，被父亲撑起臂膀堵在门口。那晚，姐姐和妈都哭了。妈一把鼻涕一把泪水地声讨父亲，自打跟上你不遮雨、不挡风，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爸两手揪着头发一声不吭。我火上加油拽着父亲的胳膊哭着质问：你说，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人动武。早晨，小组长收作业本惟有我的同桌不交，作为班长的我出面协调。谁知他一高弹起嚷着：“咳咳，你爸都被贴了大字报，你还有脸来管老子，要管去管你爸吧。”我头上的血直涌，手不是我的手了，一下被外力扬起来，照着同桌的脸就是一掌。当时正演电影《李双双》，我便被同学们笑为“李双双打喜旺喽”……父亲用他粗硬的大手替我抹眼泪，好半天才低声说：“爸爸年轻时学点手艺，遇到单位没人写写画画时，自然被大家推到前面……爸敢对天起誓，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儿，爸——是个——好人……”

很快，父亲的问题得到了澄清。70年代末，年近花甲的父亲天天哼着小曲，在他精心打造的家园里忙碌着。先是把屋里坑坑洼洼的泥地，抹上了光光亮亮的水泥地。又在院子里种上牡丹、月季、美人蕉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草；墙角不忘给娇宠的老丫头栽几株“口咬”、草莓；墙面铺满牵牛花和爬山虎；墙头立砖砌槽，让粉红的夹竹、绚丽的蚂蚁花热热闹闹地开着；大门口，摆着父亲用麻绳和水泥自制的超大型花盆，栽上高大的夹竹桃花。母亲渍酸菜用的大水缸，被父亲养了水莲和金鱼。太阳刚落，洁白的水莲羞答答地展露娇容，黄绒绒的蕊散着淡淡的香。红头帽、扶桑、茉莉、栀子花溢香争俏。左邻右舍，把每晚到我家赏花聊天当成一大乐事。父母沏茶端水，绽放着笑脸。到了冬季，父亲又不知从哪里采集了黄的、紫的、绿的、白的、球型的、伞状的等各色菊花，让好多人看后都说父亲干脆收门票办花展吧。

谁知临近退休的父亲，却爱上每天在单位看完报，用手心带回怪字来刁难我的嗜好。不识，非让你用字典查准了才罢休。“石”字，谁不认得，他偏让你说出其为计量

单位时的读音 应念 d à n 。在不崇尚学习念书的年代，四处演节目跑野了的我，愣是让父亲催着逼着，对文字有了点亲近感。当听说山西创办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刊授大学，他又寄钱替我报了名。母亲退休，其单位领导好心让我提前毕业接班当秘书。父亲知道后，顶着酷暑，骑着自行车追到母亲单位，死气白赖抽回了我的招工登记表。晚上回来，见我从早上泡在铁盆里的衣服还没洗出来，看了一半的刊授教材扔在地上，人放羊似的没个影儿。他火冒三丈，将铁盆里我最喜爱的衣服倒进垃圾堆里。当乐颠颠的我回家看到这一切时，气昏了头地往外冲。母亲上前拦截，遭到父亲呵斥：“有志气，别回来。”我躲进水泥管子里，听着母亲和姐姐们一声紧一声地呼唤，就是不应声。夜黑人静，我溜进院子里也不肯进家。当望见父亲挥着大手，高声命令刚进家门的姐姐“不把你妹妹找回来，谁也别想回家睡觉”时，我不那么恨父亲了。瞅着父亲也出去寻我的当空，我悄悄潜入被窝。当父亲进家猛然发现了我，他立马咚咚咚地跑出院门，大声喊母亲和姐姐们快回家。长到十七岁。我从未见父亲这样发火，如此失态。

第二天，父亲下班后见我乖乖地在家看书。他摸着我的头问：“生爸的气吗？”我摇头。他激动地说：“人要脸，树要皮。衣服泡久了会腐烂，人脑不用能生锈。全家人就你赶上了考大学的好机会，你可要好好珍惜呀。”我不知趣地犟着：“我们学校没有文科班，我不喜欢理科，一旦考不上咋办？”父亲又动气了：“我不信，人家肩膀上扛一个脑袋能做到的，你的脑袋也架在肩膀上就不好使。一次考不上，咱可以考二次、三次……”话虽这么说，私下里父亲到处打探能否有肯接受插班生的文科学校。有一所学校肯接纳的条件是，插班生必须为学校带进一个煤气罐。父亲欣然与校方达成协议，愿将我家刚分到手的煤气罐献出去。

一切都安排妥当，不想祸从天降。身体硬朗从无大病的父亲，在一次体检中确诊为肺癌晚期。父亲所在单位的领导，破例派专人陪父亲到大连和全国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医治。

先是住进大连附属医院，准备手术治疗。可待开刀时发现，父亲由肺癌转移到肝癌。无奈，又转到沈阳最出名的一家肿瘤医院，改为中医疗法。当接到父亲从沈阳就要回家的消息后，我欢天喜地争着跑到火车站接父亲。见到陪同的大姐和李叔在站台焦急万分的样子时，我吓蒙了。是父亲非让大姐先帮同事李叔搬运亲属给他的大米，说好自己在原地等候的。谁知病入膏肓的父亲，也不愿给他人添麻烦，挣扎着跟在后面一步一步地往外挪……我在寒风中奔跑呼唤着：爸爸，你在哪里，我们来接你了。就是不见父亲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容。人流越来越稀少了，我失魂落魄一步一回头地寻着，恍然看到一张灰黄瘦削的脸，艰难地从铁柱子后面一点一点地往上抬着。“爸爸”未能喊

出声，已是泪如泉涌。父亲用颤巍巍的手摩挲着我的头：“傻孩子，不哭。爸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1982年初春，奇冷。家里的炉子冒着浓烟，父亲一口接一口地咳着带血的痰液。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络绎不绝地来家中看望他，一再询问有什么困难尽管提。父亲总是挺直身子一个劲地说：“谢谢，我很好，不用费心了。”每次，母亲想开口希望单位给解决一间有暖气的房子，都让父亲搪塞过去了。有一次，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刚吐出“房子”两个字，硬是让父亲用手捂住了嘴。送走客人，母亲撞进屋外偏厦子里嚎啕大哭：老郑啊，你死到临头了还要哪门子强呢……我们哭着唤着休克的母亲。再见父亲时，他湿着黄黄的眼珠叮嘱我们：好好照顾你妈。

父亲的腹部肿得又大又硬，晚上，只能披着衣服、拄着垫高的枕头打盹。深夜，父亲剧烈地咳着，我心如刀绞。忙着封堵烟灰、弄旺炉火，傻傻地发现，煤在燃透时才没有一丝烟灰。便蹲在炉旁，一块燃一块地往炉膛里添煤。父亲见了憋青脸地呵斥：还不睡觉，瞎胡闹。不忍父亲动怒爬上床，待父亲小睡时再摸黑下地加煤块儿。望着冉冉的炉火，我梦幻着：若能在我的头上插根稻草，把我换成一间暖气房，让父亲来住该多好啊。

2月13日凌晨，父亲鼓着眼睛张口喘，也没能抓住就要来临的春天。当我们把昏迷的父亲送到医院急救室里，父亲忽然眼睛一亮，坚持自己上厕所。叔叔说，不好，回光返照了。家人围着父亲哭成一团。我又挤不到父亲的眼前了。急中生智跑到父亲的脚下，解开小棉袄，紧紧地搂着父亲冰凉的大脚。下意识地认为，只要脚不凉，人就不能死。我不时用手搓着父亲的脚心：爸啊，爸，你千万不要扔下我们！脚越来越凉。我的胸、我的心也凉透了。我忍不住也尖着嗓子哭起来。泪眼朦胧中，父亲努力扯动嘴角微笑着嘟囔：“别哭……爸……明天就好了……”一大滴混浊的泪珠慢慢跌落在他的耳朵里。

父亲走了，无论我们怎样呼天抢地，也无力挽回他仅有五十九岁的生命。眼前时常闪现：烈日下，父亲挥汗如雨把着车座，教我学自行车时的翘翘；寒风里，父亲握着拳，让冻得瑟瑟发抖的我默念“不冷”时的雄姿；饭菜飘香了，是父亲率我们拍锅盖、敲碟碗，忍饿演奏恭候加班晚归的母亲……

父亲，你看到了吗。老丫头已经实现了你的愿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现在她有足够的能力让你喝美酒、品香茶，你却永远躺在了冰冷的地下，狠心地不给她一次尽孝的机会。父亲啊，你知道吗，老丫头是多么想念你的训斥，渴望你的教诲……可是，无论她怎么努力，再也听不到你洪亮的演讲、爽朗的笑声和铿锵的骂语了……

雨停了，淋湿脸颊的是我的泪。

发表于《海燕》2003年第9期

2004年6月获“三山杯辽宁青年散文新作二等奖”

鸽魂

任惠敏

车子的中间部位坐了一位长者，大约有六十多岁，是这次旅游团中年龄最大的。他左手提了一只袋子，右臂倚在胸上，手里捧了一只鸽子，鸽子的脑袋像木偶似的不停晃动。

他说这是一只信鸽，他外出一般都带着，这回要在黄山上放回上海。他说得有声有色，使得大家很感兴趣，都齐刷刷地伸长脖子望着他。

到了黄山脚下安排好了住处以后，我们开始登山。黄山之美简直令人惊叹、叫绝，那是一种纯粹的自然。

在半山腰的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开始向最高峰进发。就在要到达顶峰的那一刻，那位年龄最大的长者突然被一块青石绊倒，从半米高的地方跌落下来，他的左脚跌伤了，一点也动弹不得，我们估计可能骨折了。

商量了一会儿，旅游团的同志作出决定，准备请几位民工轮流将他背回宾馆，其他同志照常前进。

这时候我们大家十分亲切地将他围住，一方面是说些安慰话，另一方面是都想看看他如何放飞鸽子。

长者背倚在青石上，他很乐观。只见他从衣兜里取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小纸条，然后淡淡地写上了这个事故，请求家里人来黄山宾馆接他，房间号码写得清清楚楚。他打开了扎满窟窿的纸盒，捧出鸽子，将纸条缠在它腿上，最后举起双手将鸽子投向蓝天。

浩浩苍穹，飞荡着一只鸽子。黄山上的人们目光几乎全部投向天空：那里有一个灵魂的光芒在照射，它要穿越生命的本质，肩负着重任去远航。过了很长时间，天空才恢复了往常的平静。但是一种激动，在人心中涌动起来。

我常常想，鸽子的身上那柔软的翅膀为何如此坚强？仿佛是钢和铁铸成的。其实那是它顽强的毅力铸成的。有一年夏天我乘飞机去北京，飞机飞向蓝天的时候正是黄昏，我从舷窗望出去，啊，满天晚霞，天空金碧辉煌，太让人兴奋了。转眼到了北京的上空，在低空飞翔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只鸽子孤零零地在晚霞的边缘飞翔。那肯定是一只信鸽，我想。主人只是说了一句话，一个交代，它就会付出如此的代价——孤零零

地在层层云彩上飞，浩浩蓝天，它是一枚逗号。它在无声地飞，我的心在无声地遐想……

鸽子的记忆力极强，就是在没有任何标记的苍茫海面上飞行三天三夜，照旧不会迷失方向。这一点，是许多动物都不能相比的。

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季，一群鸽子从人民广场准时出发，它们要飞往中苏边境的漠河，然后从那儿返回来。

住了一些日子，绝大部分的鸽子均返回了，名次也评出来了。可邻居家的鸽子一去无踪影，那是一只特别聪明的信鸽，过去，每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经常看到它早早地就飞出去锻炼……

刚开始邻居天天在阳台上等它，天天脑袋绕着天空转，一副焦急万分的样子。时间长了，渐渐地就望不到他那副模样，又专心致志地忙乎别的鸽子了。

大约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有一天清晨，我看见一只鸽子用嘴在啄邻居家阳台的玻璃，我赶忙跑去告诉他，哎哟，是那只参赛的鸽子回来了，只见它蓬头垢面，瘦得让人难以看下去，捧着它，就像捧着一团羽毛。

近两个月啊，天是时有狂风暴雨，雷鸣电闪，它去哪儿觅食？漫漫长夜，它去哪儿睡眠？它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逃脱了鹰的追逐，它含着一丝体温飞回来了。主人把它轻轻抱在胸前，我看见它愧疚的眼神闪了很久，终于慢慢地合上了双眼。主人眼眶里布满了泪水，他说这只鸽子肯定是在中途生病了，所以才断送了生命……

鸽子的一生要有许多次远游，每一次远游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黄昏的祭奠

曲圣文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姐夫才骑着车子下班回家。本该上午或者早晨的上坟祭祖也就只好这时才去，尽管这不符合常规，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请祖宗原谅。姐夫又去邻家借来一辆破自行车——岛里崎岖不平的道路和道路上很重的盐碱，使每家的自行车都是一副历经沧桑的模样。姐夫把他上班骑的那辆好一点的自行车给了我，就陪着我上路了。

姐姐所在的村子叫药王庙，离我的老家下堡村大概有七八里路，虽不算远，但道路年久失修，如今早已呈显出衰败之态，通往外界的路还是多年以前的模样。而姐姐家所在地通往乡政府的路早在几年前就已修成规整的柏油路。好在祖居距乡政府所在地不远，可以借一段路，但离开大路之后就是一阵黑灯瞎火的风景，大概在晚饭前后赶到了那里，径去远房叔叔家。叔叔原以为我们不会去了，上午上坟时已给我们的祖坟上添了新土。但我们既已赶到，就还是陪着我和姐夫往山上走去。叔叔在老家算是能人，尤擅公关。其实，乡里乡亲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关，但邻里交往总少不了各式纠纷和磨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叔叔也是了得，真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化干戈为玉帛，可谓口到病除。乡亲们的评价是“好嘴养活三口家”。

乡下的黄昏是真正的黄昏。太阳落山后，天地间一派混沌，依稀可见山的轮廓，而散乱的民居则显出一种迷茫和深沉——即便是现在，他们也不习惯早早打开电灯。偶见的几处灯火更显高深莫测。祖坟在村子东面的山上，是前些年迁过来的。这里离村子大概也有三四里路的样子，我们三个人在黄昏里说着走着，四周浮荡着渐渐深沉的夜色，像是走在梦境中，也像走在往事里。这条山路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随父母下乡时我正上小学，放学后和假日都要到村子周围的山上拾草，而村东的这座山是我们来得最多的地方。中学毕业后又到生产队干活，这也是经常走的路。尤其是有一段时间我曾在农闲季节牵着两条耕牛在这一带放牧，一次其中的一头发情我一时牵不住，差点撞了人。而这条道又是人们出岛的必经之路，最难忘的就是考上大学之后去报到的情景。一个和我要好的中学同学从我家里开始，推着自行车步行了一个半小时，一直送到岛子东端的渡口——那时跨海大桥尚未修建，岛里的人要出岛只能经这个渡口到东岸乘车，而这一次的出岛也就此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1978年的秋天，收获过的田野一片沉寂，一如乡亲们对我考上大学保持的缄默。

夜色中，路旁绿色的庄稼已是墨一般黑，并不时弄出些可疑的声响和奇异的姿态，渲染出一种遥不可及的情境和伸手可触的神秘。祖坟在山的南麓，有碑，有碑文，字写得尚可，这一点父亲较为满意。因为躺在里面的祖父当年曾给别人书写碑文，在“文革”中已被砸坏的残碑上依稀可寻。父亲算是有一点家学，字也说得过去。惭愧的是到我这里竟然毛笔字都不会写了，而我却是学中文的大学生。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的下堡村，看到一部分的其他村；向西能看到海——那里原来是一片荒凉的海滩，如今已被开发成旅游区；向南能看到贯通海岛东西的公路，视野很开阔。但当时视线所及则是一派混沌中的山野。

这天是农历的七月十五，也就是鬼节，依乡俗要给逝去的亲人祭拜。仪式已无须多说也没必要细写，比起在电视电影中看到的种种祭祀场景，我们三个男人的操作无疑是“简装”的。但我的感受却很奇特，那就是这个活动与当时的氛围真是绝好的契合。这时太阳落山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天色已从黄昏进入到黑夜时分，四周的黑暗就那么无声无息地弥漫着，营造出一种适宜于追思适宜于怀想适宜于忘我的情境。这里远离公路，除了远处村庄散布的灯火，就只有满耳的天籁和渐渐多起来的星星。氤氲着黑暗的大地似乎离我们很远，而天空离我们很近，星星似乎就飘在身边。月亮似乎在我们下山的时候才缓缓登场，似乎专门为我们留下一段清寂的时光。

祖坟里还有曾祖，但对我而言只是一个传说。祖父我曾见过，大概有两次，最后一次我也只有七岁左右。印象中他的身体还算健壮，但性格怪僻。带给我们这个家庭巨大影响的大概有他的性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此刻我要写出下面的话，也是如此艰难和痛苦，但我也还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我现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写出自己真实的情感，而在二十几年前是不堪设想的——他是一个富农分子。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我不愿旧梦重温，往事实在不堪回首，但带给我们这个家庭重大影响的几件大事实在不该忽略：1958年，在大跃进的喧天锣鼓声中，父亲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并将这顶帽子戴到1978年。这一年弟弟出生；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被批斗，被关进牛棚四十多天，家数次被抄；1969年，全家下乡，历经十年艰辛直至1978年全家回城，但姐姐已婚，至今留在那里；1974年，弟弟突患类风湿，父母送他回城治病数月，回来后弟弟已高过了我——这大概也是历史给我们家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我们家，弟弟比我这个哥哥高，妹妹比姐姐高。弟弟的身高可能有因治病而使用激素类药物时所产生的副作用的因素，但妹妹是自然成长的。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我和姐姐都还没有成年就已成为劳动力而像成年人一样风里来雨里去干着超负荷的体力活，而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岁月里，营养的供给自然不足，青春的躯体

为抵抗生活的重压不得不放弃长高的努力而尽量长得壮实一些。似乎只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大自然适应的结果。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在我的兄弟姐妹之中，姐姐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一个，因为排行老大，所以也就最早成为劳动力。姐姐性格内向，又很要强，但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在干体力活上是无法同农家子弟相比的，尽管她付出了超过同龄伙伴多得多的体力，尽管她把分配给自己的那份工干得和他人一样，甚至比那些人干得还要好，但在评工分时却屡屡受到不公正待遇，她总要比别人低一点，这让姐姐痛苦万分。其实曲姓是大姓，在我们那个生产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姓曲，也就是所谓本家，但“本家”就这样把姐姐的努力化为乌有。于是，每一次评工分之后，姐姐回家都要大哭一场。母亲也爱莫能助。姐姐的出嫁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岁月已逝，岁月易逝，岁月留下的痕迹却难逝。今夜我匆匆走近祖坟，依照常规重复着常人的举动，但心情却复杂得难以言说。让长眠这里的这个人理解吗？让长眠这里的这个人承担吗？不知道该由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山无言，土地无言，树木和庄稼窸窣有声，但秋天过后也会沉寂；鸟虫小兽偶或一叫，也不知为谁而鸣。当然我不是来这里寻求答案的，只是在此时此刻这些问题会更强烈地搅扰我刺激我。由是我对故乡的感情就复杂而困惑，完全不是教科书式的怀念与亲切。每当我读到一些作家甚或著名作家描绘故乡情感的美文就感到遥不可及，而当读到一些人武断地将个人体验升华为全人类情感的时候，我就感到无比地悲哀：作为一个作家何以会浅薄至此？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体验，虽然不能说每个人的体验都不相同，但也不会每个人都一样吧？至少要我像他们那样怀念故乡我做不到。

从墓地走出来的时候，月亮已初露端倪，为我们铺出一条光明的归途。但我还是无法自拔。我们家不是一下乡就回的老家，即所谓故乡。而是在1972年，但故乡并没有给我们以家乡人的礼遇，除了此刻走在我身边的叔叔，我体验到的温情极为有限。应该是和祖父有一定的关系，但又没有祖父欺负他人的实据和传闻。在那个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年代里，更多的人表现出政治，更少的人表现出正直。在我离开家乡去上大学之前曾在大队门前看露天电影，是复映的老电影《红色娘子军》，其中有一句台词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还是好人多呀。”看电影时的情景也宛在眼前。当琼花说完这句话后，观众一片大笑，是嘲讽和滑稽的笑。我想那些人有和我一样经历的人毕竟是少数，但这样一句普通的台词竟然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还是发人深思的。但再细想下去又会不寒而栗：还能是坏人多吗？

在我考上大学若干年后，表姐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要说一下，姐姐和表姐是在同一个村子的。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我上大学的情景也在她这里再现：从接到录取通知

书到去学校报到，竟也是无人问津。表姐夫家并不在黑五类之列，家族也并无劣迹史，而且人际关系颇佳，遭此境遇于理不通。但我有些释然，原来并不是乡亲们单单对我忌妒，说他们讲政治显然是抬举了。也许相对恶劣的环境是孳生狭隘偏颇疑忌的温床？看来露天电影场的笑声其来有因。

写下这些并不是要为祖父开脱，我既不会因为当年所受到的种种委屈而格外恨他，也不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对他敬爱有加。今夜来到这里，是履行一种义务，与爱恨无关。

月亮升起来了，天空呈现出黑夜里的明亮。坟冢渐渐远离了我们，村子越来越近了。

2003年12月26日

母爱的芬芳

黄桂华

我酷爱大自然，爱得如醉如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投入到她的怀抱中，让清风抚慰我，让阳光温暖我，让森林沐浴我。大山呼唤我心中的热情，小溪聆听我心中的歌声。

我热恋着春天。春天总是给我憧憬，给我希望，给我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朋友们说我像春天，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春的气息、春的浪漫、春的活力。

这一切都应感谢我的母亲。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她就把我引领到自然的怀抱。教我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是她给了我春的芬芳、春的魅力、春的活力。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大山脚下。太子河从门前流过，整天唱着欢乐的歌。妈妈常常给我讲：水是生命的摇篮，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水，大地将是一片荒漠。要珍惜，莫浪费。妈妈的话像清泉注入我幼小心灵。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爱水、节约用水的习惯。至今，一直贯穿我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谁忘记关水龙头，我都不厌其烦，把它们一个个关上。

我家背靠的大山，位于辽宁东部丘陵地区，它好的植被使它郁郁苍苍，奇花异石，好有气势，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妈妈经常带我们姐妹在晚饭后，踏着夕阳登山。一边走，一边讲山上一草一木的妙用。什么山菜能治病啦，树木全身都是宝啦。要爱护一草一木，不能乱踩乱伐啊！

到了山顶，壮美的景色拥抱着我们、沐浴着我们。青青芳草迎风起舞，玫瑰色的夕阳横贯天际，千姿百态、气势恢弘、壮美绝伦。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醉了。

在那美丽的大自然中，我们的童年是多么充满诗意，多么快活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培养了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

山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无不引起我们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妈妈这是什么草？那是什么花？”“太阳为什么要落山？”……我们总是问个没完，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绘声绘色讲解。也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晚霞的习惯。那些彩色的云经常变换多端，有时像广袤无垠的土地，拖拉机耕耘着春天的希望；有时，恰似波涛滚滚的大海，翻卷着巨浪……

望着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心中生出无限的联想，增添无数瑰丽的憧憬。

我怎能不由衷地感谢妈妈呢！是她把我们带到美丽的大自然中，使我成为自然的女儿。

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投入到她的怀抱中，在其间陶醉、休息、启迪灵感、陶冶性情。尤其是当我感到烦恼和忧伤时大自然更成了抚慰我心灵的灵丹妙药。我会从每棵树、每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植物上，看到大自然的神奇力量无所不在，就会从小草的顽强、花朵的芳香、小溪的执著中获得安慰和力量。这是母爱的芬芳。

搬到闹市区以后，远离了那座曾经给我留下许多美好回忆的大山和那条弯弯清澈的小河。城市的污染、噪音、单色调，代替了清新的草、芬芳的花；高耸的楼群挡住了玫瑰色的晚霞。

然而，每年的春天照样来到我们家。

当我结束了一天工作的疲劳，回到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的书桌上花瓶里插的鲜花。有时是火红的杜鹃花，有时是洁白无暇的野百合。淡淡的幽香弥漫了小房，鲜艳的颜色充满了生机，小小的花瓶盛满了母爱的芬芳。

哦，妈妈，是你不辞劳苦，为我采撷这一束束春花，让我的小屋飘满芬芳，使这平庸、单调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春天又回到我的身旁。

透过这些可爱馨香的小花，我嗅到了母爱的芬芳。烦恼时看到这些洁白无暇的花，母爱的芬芳像和煦的春风吹散了我心头的愁云；快乐时看到这些花，母爱的芬芳像明媚的太阳，使我的生活更加充满阳光；到外面的世界去漫游，母爱的芬芳，充溢我的心房，长长的旅途不再孤单、寂寞。

啊，母亲！您的爱像美丽的春天永驻女儿的心间！

走过德国

毕馥华

这次赴欧参加“东西方文化交流会”，使我有机会接触德国和德国人。尽管，这种接触是浮光掠影式的并非真正“走进”德国，充其量只能算是“走过”德国而已，但是，却使我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有了新的认识，且印象深刻。

进入德国境内，已是晚上，什么也没看清。第二天上午，大巴载着我们穿过汉堡市。汉堡是德国最著名的港口城市，市街整洁而繁华，市区中心的阿尔斯得内湖风光宜人，令人流连。我们的大巴围着湖边绕行一周，然后径直向柏林飞奔。

我们在柏林有一整天的时间。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柏林曾被分为东、西柏林两个市。东柏林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柏林则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一场战争把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亲属朋友一下子划为难以往来的两个城市、两个国家的居民。当时，东、西柏林之间的交界处，在大道上划了一条红线为分割界，人们称它为“检查线”。至今，仍保留着这条红线，只是人们再也不用在此受检，它只是成了历史见证物供人们参观。

当时的东柏林政府，于1961年8月13日，一夜之间在双方向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又在铁丝网的东柏林一边还挖了一道大沟。也许，铁丝网、壕沟，都太刺激人们的神经，太容易让人想起残酷的战争与死亡，后来就把大沟改修为一条水泥墙了——一道真正的高高厚厚的大墙。

1989年，东德的经济不行了，最后竟然只有一周的财力了，然后是东、西德双方领导人之间和谈，再后来就是西德统一了东德。就在这年的11月9日，东柏林的市民一举掀翻了那道水泥墙，砸开了缺口，涌向西柏林，奔到居住在西柏林的亲友那儿，一慰思念之苦。

人们知道，这堵水泥墙再也不会存在了，它将作为“历史遗址”变成了“政治文物”。所以，人们都去砸它，不少人把敲下来的石头保存起来，作为文物收藏。我在柏林所下榻的宾馆商店里就看到有包装得很精美的柏林水泥墙小石头在卖，而且价格不菲。

统一后的柏林政府立即下令保留一段水泥墙作为文物纪念，又请来了许多美术家在残留的水泥墙上分别作画。因此，现在立在我们面前的“柏林墙”，竟是一道亮丽的壁

画墙。由于作者不同，这许多的壁画各有特点，它们构思新颖，立意奇特，技法迥异。其中有一幅很有名的画叫《死亡之吻》，画面上是当时东、西德双方的总统相互亲吻，于是东德不再存在了，德国统一了。我真是佩服画家的丰富想像力和敏锐的政治嗅觉。

记得，当年我从电视播映的新闻中看到东柏林人掀翻水泥墙的报道，只是觉得有点新奇，并没什么更多的想法。如今，当站在双方交界处的红色“检查线”上，面对那堵残留的“柏林墙”，我仿佛看到作为儿女或兄弟姐妹的德国人，排着长队在接受着各种严格得过分的检查，办理过界的手续，为的是到仅隔一条线、一道墙的对面去探望父母或兄弟姐妹；我仿佛看见年迈的老人正拭着迎风流泪的双眸，站在门口翘首张望等待自己的孩子跨过界线来团聚……我难以想象几十年亲人思念之苦是何等的痛。我明白了，终于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那么痛恨那堵水泥墙，会自觉拿起镐锹砸倒水泥墙，因为那是几十年来阻隔他们与亲人团聚的障碍。

我忽然发现：保留下来的红色“检查线”和“柏林墙”，它们绝不仅仅被德国人当作“文物”，而是有着更深的发人深省的目的——让人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要再重演历史的悲剧。

德国人注重总结历史教训，并且敢于承认错误，这在世界上已得到公认。在柏林，随处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柏林市中心有个大学广场，它是因附近有一所著名的红宝石大学而得名。在宽广平坦的广场中间，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吸引了游人的注意。那儿地面上是一块两平方米左右的玻璃窗口，从玻璃窗口俯瞰地下，在这口“旱井”里的是几个空空的书架，玻璃视窗的旁边有一块石刻的碑文，碑文说明“旱井”的由来。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这个广场附近有一所著名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当然里面有许多进步书籍。“二战”爆发了，希特勒的纳粹分子闯进图书馆，借口查禁进步书籍而焚毁了大量的图书，图书馆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为了声讨纳粹分子破坏人类文化的罪行，让后人记住历史的教训，“二战”后德国人修了这样一个置于地面以下的特殊纪念碑。

柏林城边有一座德国著名的大教堂，它就是威廉大帝纪念教堂。大教堂巍峨雄立，但是看上去却总感到不那么顺眼，似有缺憾。原来大教堂上方少了一个塔尖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教堂的塔尖顶被炸掉了。战后，柏林人民决定不再修复塔尖，让它保留着战争的“伤疤”，向所有来瞻仰它的人们诉说战争带来的灾难，让人们时时警惕战争。其实，“二战”不仅给被占领国家人民带来灾难，而且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不幸。对于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造成的苦难，现在的德国政府曾多次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在这一点上，的确值得日本政府学习。柏林市的大学广场附近还有一

个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两位伟人的雕像坐落在那里。许多德国人和外来的游人都过去拜谒两位伟人。这让我很吃惊——资本主义的德国，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是伟人，也因他们是本国国民的精英而自豪。

德国人重视教育，酷爱艺术。对此，我们深有感受。我们在柏林参观了被称为“世界精品”的建筑——柏林国家新美术馆和卡拉扬曾在此指挥过的柏林音乐厅。

离开柏林，我们继续上路，往科隆进发。大巴仍在德国境内奔跑，好在漫长的旅途是在流动的美丽景色中度过的。车窗外是一望无垠的绿色田野，偶有村落的建筑别致的、涂着鲜艳颜色的小房子闪现。美极了，犹如一幅幅欧洲风光油画。

中午，在汉诺威休息。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城市，它是德语的发源地，所以德语又被称为汉诺威语。

傍晚，终于到达科隆。这是一座由古罗马人开始创建的古老而美丽的城市。我们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去拜谒科隆大教堂。它是德国最大的教堂。科隆大教堂的雄伟壮观，规模、高度，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它始建于13世纪40年代，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全部建成。历时六百多年，耗石料二十万吨。它高一百五十七米，建筑面积达八千平方米，属哥特式建筑。教堂正面是两座尖顶塔楼，直插蓝天，周围环绕着许多小型尖顶塔楼，与主塔楼谐调相配。教堂内有五个礼拜堂，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四壁全是有关《圣经》故事的壁画，栩栩如生，光彩夺目。大厅里有许多玻璃窗，上面也是《圣经》故事的彩画。我们原以为这是用颜料绘涂上去的，但是导游告诉我们：那是烧制的彩玻璃。令人叹服。许多德国人也有游人跑到紫檀木色的桌椅前祈祷，那份虔诚与庄重着实具有感染力，让人感动。

走出科隆，我们将去比利时。就在大巴将驶出德国国境的一刹那，我不由地又回头望着那刚刚走过的美丽国家。虽然匆匆忙忙，但是德国人的聪明和他们敢于承认错误的精神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美丽的国家和人民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发表于《都市周刊·旅游》，获2003年“三山杯”辽宁省散文二等奖

万众缅怀称永生

——我与臧克家老师

高云

敬爱的克家老师，请握好您的手杖，慢慢地，一边走着一边倾听后人在为您朗诵您非常熟悉的一首诗：

“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前些日子，当我得知臧克家老人去世的消息时，不由得在心里惋惜地自言自语道：“百年人瑞走了……”于是，我情不自禁沉思于和老人的交往、他对我写作上的关怀与鼓励之中。

年轻时，他的作品是我常读熟读的诗作之一。他早期的诗，抒写了旧中国人们的苦难和不幸。综观他的诗，以其沉郁而明快、热情而忧愤、奔放而不失哲思的诗风，使读者与诗人的思想情感相互交融、浑然一体，以致发生深层次的共鸣。所以，他也是我喜爱的诗人之一。

这位诗坛泰斗，他当了《诗刊》主编之后，亲自向毛泽东同志组稿，并亲自编发。使全国惟一家诗刊，转瞬之间引起极大轰动与注目。

尽管我当时年轻，有股蛮劲、冲劲，但是自知学识浅薄，功力不足，所以仍然和《诗刊》没有任何稿件往来。可有一天，船厂宣传部的同志和我说《诗刊》来了个长途电话，询问你的情况，你向他们投稿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询问什么？确实百思不得一解。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宣传部通知我到宾馆走一趟，说《诗刊》来人要和我谈谈。在宾馆，我见到一位高个的陌生人，四十多岁，戴着高度近视镜，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爽朗明快地自我介绍说：“我是《诗刊》的，是我们主编臧克家同志特意让我来看看你，我叫丁力。”接着就唠了起来。他就是著名诗人丁力，当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他断断续续地介绍说，编辑部人手不多，都做具体工作，臧克家同志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和上海的《萌芽》月刊上陆陆续续看到我的几次发表的诗作，让他们编辑部的

同志都看了。前些日子臧克家同志亲自用电话跟船厂宣传部进行了联系，知道我很年轻，就派他来看看我手里过去发表的诗歌。

听了这些介绍之后，对臧克家先生的这种丝毫没有大诗人架子的高风亮节和细微举措，我确实深为感念。

我记得，午间在天津街的老“山水楼”丁力先生请我吃了一顿饭。下午，他看过我从前发的作品后说：“这些诗如果寄给我们，大多数是可以发表的。”还再三提示我说：“手头如有尚未寄出的诗作我可以带走。”当他知道我手头没有成稿时，说，那就以后再说吧……

两个月后，《诗刊》在“新花集”栏目中发表了著名诗评家李朴先生的评论和介绍我的诗的文章；接着著名评论家宋垒先生相继在《诗刊》上也评论了我的诗。

说实在的，对臧克家先生这种无私关注晚辈，热心提携、培养后生的作为和举动，像是一股令我心颤的冲击波一划而过，对我产生的鼓励和推动力是很大的。

可是事隔不久，一场浩劫开始了，全国都处于瘫痪状态，我也十年没有写诗。

改革开放之后，我被调到专业文学工作者的队伍之中，并从事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和臧克家老人有了往来。

在我爱人张琪退休的时候，我陪她全国旅游了一圈，在北京停留的几天，我们去赵堂子胡同拜会了年近九旬的臧克家老人。他的夫人郑曼女士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让到会客室里说：“他刚刚睡着，让他再睡个十几分钟，我再叫他。”她说，现在基本谢客，“你来了还是和他见见、唠唠吧。”接着她向我们介绍说，这几年，他的心脏不好，脑供血不足，老是处于昏迷、眩晕状态之中，所以每天上、下午都要睡一会儿。现在，他对一些会议基本上都婉言谢绝了。

后来她进卧室轻轻唤醒了老人，时间不长，我崇敬的已经年近九旬的臧克家老人，上身穿着白绸衬衣外罩灰羊毛衫，下身着一条蓝毛料裤子，足登一双中国式圆口布鞋，身体虽然消瘦但却精神矍铄地走到我们面前。他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好！你们好！”我觉得他的声音是那样响亮，手臂是那样有力。他先谈到前些日子我寄他的我那本《高云诗选》，“你那本诗我看了，不错，尤其是短诗，《文艺报》和上海《文学报》对你的诗评我也看了。”接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事似的说：“你的诗选后记中有点差错，你写丁力现在在天津音乐学院，不对，他在北京音乐学院。”说到这里他的神色陡

然黯然下来，“可惜，他身体不好，病得很厉害。”说着流露出惆怅的神情，足可见老人对晚辈的关爱。

我把话题引向他的创作。老人一提到写诗，神态明朗起来，同时说他的诗，是生活之火点燃了诗情，让它们在真挚的情感之中化为诗章，无论是早朝的《烙印》还是《罪恶的黑手》，不管是抗战时期的《从军行》还是《泥土的歌》都是如此。老人侃侃而谈，越说越精神，他说写诗的人，必须紧贴现实生活，自己的脉搏必须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呼吸同命运，要不诗的时代烙印为什么比其他文学样式都深刻都明显，为什么古往今来的好诗都是如此，就是这个道理。

我有点贸然地问他：“现在你是否还写新诗？”他坦然地笑着说：“诗，归根结底是青年人的事业。我现在偶尔还写点旧体诗和散文。”说到这里笑着对我说：“你可要趁着年岁不太大，抓紧多写些呀！”

谈到编辑部的工作，我有些道歉似的和他说：“前几天发的您给一位作者的信，也没提前征询您的意见，就先斩后奏地给发出来。”他笑了笑说：“不先斩后奏你就发不了啦？”听到此话，我更有些疚色地说：“还得请老师您多多原谅。”他笑了笑说：“没什么，没什么。”接着他又谈了些其他情况，越说兴致越高。

我爱人看了看表对我说：“已经一个半小时啦，臧老师好累啦，我们走吧！”我突然想起是该走了。在他的四合院里，我们与老人要留个影，可惜没人会照，正好他女儿小平刚进院，老人说：“小平你来！”小平摆着头说：“我不会照。”我说：“按一下就可以了。”她确实没有摄影经验，还没等我拨开垂在面前的丁香花枝，她就按动按钮。不过今天看来，还得感谢小平，是她给我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他的夫人郑曼、女儿小平和他们家的保姆，把我们送出门外，我们正挥手告别时，热情的臧克家老人急匆匆跨出门外，大声喊道：“高云，这个给你。”说着一晃他手里的一本新书，我急忙上前，接过一看，是近年才出的诗集《放歌集》。我有些激动地说：“您不给我签个字吗？”他点点头说：“写啦，所以出来晚，刚才在屋里写的。”老人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说：“再来北京时，一定来坐。”我热泪欲滴地说：“一定！一定！不过您老一定要时时、事事都保重啊。”“我知道，知道。”他爽朗地应道，随之又以询问的口吻说：“你要去的那几户，都在作家协会的家属宿舍，用不用我让小平送你们去？”我与爱人几乎同声说：“不用不用，我们认识那儿。”就这样臧克家先生颌首微笑、目含寄托，向我们频频挥手送别。我们也心怀挚意和老人与他的亲属依依惜别了……

缅怀这些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细节往事，先生的一笑一颦、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丝毫没有沾上历史的痕迹、时间的风尘，是件件清晰，都历历在目。那真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几年由于健康原因彼此很少联系，但牵挂之情不绝于心。经常在内心深处为他默默祝福着。

“事如青草春常在，人似浮云影不留。”

没想到，老人走了，一位多么善良热忱、爽朗健谈、充满豪情诗意的老人，走了。这怎能不使受益于他的晚生后辈，深沉地悲怆和铭心地惋惜呢？

在我悲痛深思之中，不由得想起道家三大代表人物之一的列子，在他终年之前，非常意味深长地说“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乐也”。列子还说，“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大千世界，人生有始必有终，安处常情，到了人生的终结，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何况吾师克家老人，百年人瑞？何况吾师克家老人的一生，是为人们呼唤呐喊的一生，放声歌唱的一生！你是中国文坛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家。你是作家的楷模，你的诗歌影响了几代人。万众缅怀称永生，你的一生是深受人们爱戴、称赞的一生！

敬爱的克家老师，请握好您的手杖，慢慢地，一边走着一边倾听后人在为您朗诵您非常熟悉的一首诗：

“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发表于2004年2月25日《大连日报》

我住的城市有海

邓刚

当一个人能将他的生存经历用艺术的角度重新扫描，他才能真正理解生活中的喜剧色彩和悲剧意义。今天回忆起那段山狼海贼的生活，我真真地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倒霉但也是最开心的时光。那时城市没有我存活的空间，到处都在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到处都在进行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我这个“狗崽子”只能是丧家之犬，逃之夭夭于城市之外的大海里，才能获得一种安全。

海边好像避难所，当城里的革命达到极度惨烈之时，经常会有一些失败者跑到海边来寻求安慰，常常是一群男女大学生，也就是被另一派打败的倒霉蛋儿，他们站在礁石上痛哭流涕，然后又大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日夜想念毛泽东”等歌，大有集体跳海自杀之悲壮。

我们海碰子全是铁石心肠，坐在礁石上等潮流，远远地望着这群倒霉蛋儿，就指手画脚地开玩笑。有的要那个又高又胖的先跳水自杀，那么胖，肯定吃得好，死了也够本；有的要那个戴眼镜的小白脸先跳海自杀，小白脸都不是好东西，死有余辜；有的要那个四方脸的先自杀，四方脸全是当官的，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我们一会儿就把那群哭哭啼啼的大学生“处理”完了，但处理的全是男大学生，女大学生都留下来。有人不高兴地说，女大学生留下来干啥，还不是都给革委会的官儿当老婆了。于是我们又开始指手画脚地“处理”女大学生，有的说丑的先死，有的说漂亮的先死，有的说应该站在岸边排成队，喊一、二、三，一齐跳下水去死。总之，最后所有的男女大学生全被我们判处死刑。当然，也有人提出，要是女大学生愿意给我们海碰子当老婆的，可以破例赦免。但有人有异议，说大学生当老婆，白给也不要，她们满肚子学问，当老婆不可靠。

我们就是开着这些流氓习气的玩笑，打发等潮流的时间。

然而，真有自杀的大学生，却大都是女大学生；而且一般都是黑夜偷偷地跑来自杀，当天亮时，被海水泡得肿胀变形的身子，就随浪涛漂到岸边，惨不忍睹。不过，我们并没为死者的悲惨而有什么可怜的感觉；相反，却很不理解，既然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海碰子无论怎样失败，也绝不会想到自杀，每当我们从冰冷的水下捕到

海参，总会暗暗地产生出一种幸运感，感谢老天，我住的城市有个海，无论怎样活，都有意思。

辽东半岛初冬的凌晨，海滩上均匀地冻着一层铜钱厚的冰茬，犹如薄薄的刀片刮着你赤裸的脚板。我在沙滩上脱光身上的衣服，只穿着夏天游泳的小裤衩，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泛着寒光的大海时，有些渔民都从船舱里探出灰蓬蓬的脑袋，吃惊地睁开朦胧的睡眼，有的还喊了声，找死呀！我却骄傲地微笑着，因为即将收获的喜悦，使我对脚下咯吱咯吱破碎的冰茬毫不在意。当然，如果此时有一个渔家女在注视我，我会更加精神百倍，犹如海里的公鱼见到母鱼，灰暗的鱼身都能登时放出亮光。我故意有节奏地将碎冰茬踩得更响，一直走到海浪涌动之处。

下水之前我先用冰冷的海水将头部和腹部打湿，让这两个部位首先适应海水的温度。这是老一辈的“海碰子”对我千叮万嘱的经验，不给头部预冷，突然扎进海里会发昏；不给肚腹预冷，在冰冷的水下会过早地出现全身抽搐。我像一条大鱼一样无声地蹿进凌晨平静的海湾里，突袭而来的冰冷，俨然钢刀割遍全身，使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但随即更加精神抖擞。远处的城市传来汽车的第一声鸣叫，海平面突地闪出一丝太阳的光亮，犹如一道闪电，贴着遥远的海面迅疾而来，使我整个身心感受到电击式的鼓舞。我不敢怠慢，在水面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动作敏捷地潜下去。

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就像猛然打开发动机的按钮，我浑身立即发热，眼睛开始放射着凶狠的光束，并灵巧得真就是一条生活在海里的鱼。我恶狼冲进羊群一样，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时刻，又看到一个海参，我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空间里的空气也压进肺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然后我双脚使足力气地朝海底暗礁蹬了一下，反作用的力量把我的身体向上弹去，一旦嘴巴露出水面，我就疯狂地大口喘气，那“呼哧呼哧”的决不亚于蒸汽火车般的喘气声，使我的刚刚逼近绝境的生命再一次充电。

如此上上下下地拼了半个小时后，你就会觉得身子开始冻得打起哆嗦来，但你千万不要慌，但也不能上岸。要冷静并沉着地升到水面上，稳稳地漂浮在那里，闭着双眼，什么事也不要想，像当今练功一样，排除万念，只是随浪波摆动即可。约十来分钟，身体的哆嗦就会渐渐消失，这时你再潜下水底，就会感到奇特的舒服，因为此时你的表层肌肉已经冻麻木了，不但没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即使你被暗礁上锋利的贝壳划破皮肉，也决没有一丝一毫的疼感。只是你突然看到胳膊或腿上冒出缕缕血

花来，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皮肉竟然刚开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这种麻木的舒适会使你又能拼上半个小时，但正是这种麻木舒适的半个小时，却是海碰子最能“拿货”的美好时刻。当你的身体第二次打哆嗦时，就不要硬拼了，你得赶快收兵，朝岸边撤退。因为这时，你是拼尽最后一口气力之时，所以能游回岸边，也是另一种艰难。特别是当你游到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时，浑身痉挛着绝对地站不起来了。你只能是狗一样地爬行，又像一条半冻僵的蛇，或正在蠕动的海参。但拖着沉重的收获，会让你不断地感到这是凯旋，有了凯旋感觉就能令你时时生出挣扎的气力。

如今回忆从海里爬上岸的细节还令我在温暖的书房里不寒而栗。那真是垂死挣扎，我几乎是一寸寸地与陆地缩短距离，干燥的海滩在我模糊的目光中缓缓晃动，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无数次达到那干燥的岸边，但最终的清醒让我明白这是幻觉，自己还是在冰冷的浅水里原地踏步。终于，我爬到岸边，爬到又硬又凉的鹅卵石上，爬到我早已准备好的柴草面前。当火苗燃烧起来时，一阵狂喜令我疯狂地扑向火堆。

我感觉不到火苗灼烫的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活。我一会儿虾一样地勾着身子烤肚皮，一会儿反支着四肢烤脊背，完全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动作。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针尖，穿透皮肤，扎进肉里，钻进骨缝，驱除这几乎要命的寒气，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感觉。当你能感到疼痛就是恢复了知觉，为此哆嗦会打得更厉害，但相对烤火前的痉挛，这种更大摆度的哆嗦却还算舒服，用医学上的理论解释，这是人类对冰冷的积极反应和调整过程。火苗继续蛇一样地舞动并蛇一样地撕咬着我的皮肤，渐渐地，冻得青灰色的皮肤上显出血青陆怪的红光，这也许就是身体开始返回正常温度的血色来。用“海碰子”的行话说就是“烤出花来了”。烤出花来就说明我们这一次的加温结束，必须抓紧时间，再次扎进冰冷的波涛里，捕捉海参。

在冰冷的浪涛里再重复一次我刚刚说过的拼命过程，然后再次痉挛着，再次拖着冻僵的身子爬上岸来烤热烤红，并再再次扎进海里……一个潮汐，“海碰子”们至少要下三次海，也就是说反复烧烤三次。你就是块钢铁吧，不断地在火中烧红，又不断地扔进水里冷却，也会完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正是这种几乎要你完蛋的痛苦和折磨，却让我感到快乐，而这种快乐却又令我对城市充满美丽的想往。当我在凶险的风浪中拼搏之后，带着丰硕的收获，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城市的大街上，更觉得自己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也更强烈地体验着城市的温暖和亲切。

特别是半夜里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我们海碰子抖缩在礁石下面，看到天要塌下来的乌云和暴雨，听到像在耳边炸响的惊雷，直接感受大自然的威力，恐惧之中强化了我

对城市的情感。在那个末日般的黑夜里，我万分强烈地盼望黎明的到来，清晨的光亮不仅让我能看到水下的海参、鲍鱼，还能看到远处城市的轮廓。

痛苦的日子让你觉得漫长，幸福的时光让你觉得短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惊讶地发现，窗外的世界早已面目全非。当年我腾波踏浪的地方，现在已建成了各种各样的花园和娱乐场，曾是我们城市著名的马栏河早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混凝土建成的河道，还有一些人工做成的假山；更陌生的是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这些现代城市的建筑形象，让我有些不知所以然。

我陡然地感到，一个人四十岁以前与他赖以生存的城市是同步的，但四十岁以后尽管他还与这座城市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但却会越来越感到陌生，感到疏远。因为四十年来的城市形象已经牢牢地盘踞在他的脑海里，并融解他的情感，塑造着他的生命。尽管我现在每天都在电脑前构思着我的城市故事，但与这个城市的今天已经毫不相干。实际上，已经成为故事的东西，就是昨天前天乃至过去。你不能不承认，文学的本质内容就是回忆。然而正是这种陌生和疏远却又使一个人有了审视城市的能力。

我突然那么想海，想得火烧火燎，犹似失恋。于是我带着女儿来到海边。

我对女儿说，曾有过这样的年代，咱家附近的海面上有一米来长的带鱼，像一柄柄雪亮的长剑，在水面上飞快地游动，使蓝色的海面上闪耀着一道道银光。坐在小船上的渔人，有时挥动一根木杆可以打到带鱼。水面下的鱼就更多了，有金鳞金翅的黄鱼，有银鳞银翅的黑鱼，有铜钱花纹的梭鱼，有扁如扇面的牙鲆鱼……只要你把耳朵贴到水面上，就能听到吱吱的鱼唱歌。不光是水里，海滩也很富有，退潮后的海滩上，铺满一层小海螺，用手轻轻一扑弄，就是一小堆。脚脖子深的水湾里，小香蟹子成群结队地爬行，千百万条蟹子腿摩挲着礁石和沙滩，发出一片刷刷的响声。威武雄壮的大武士蟹子也常常冒出水面，挥动着粗大的蟹钳横冲直撞，显示霸气。如果你俯下身子细看，还会发现无数蚂蚁大小的海马崽子，跳蚤一样欢蹦乱跳。当秋末刮北风的时候，海面上又漂满了一个个圆球状的大海蜇，远远看去，宛如一枚枚粉红色的大蘑菇，在蔚蓝的色块上缓缓舞动……

女儿笑了——爸爸，你讲的童话太美了！

我说这不是童话，二十多年前，咱们家乡的海就是这样。

女儿更笑了——你撒谎你撒谎……

我无言了，我知道我即使是把嘴巴说掉了，女儿也不会相信。

一个人是活在三个世界里，现实的世界，向往的世界，回忆的世界。年轻人一般是活在向往的世界里，中年人大都活在现实世界里，老年人更多的是活在回忆的世界里。

所以，孩子们总是不满足，总是逆反心理，因为他们充满向往；中年人却能踏实地工作，因为他太现实；老年人更多是喋喋不休地抱怨，因为衰老使他只能亲近回忆的时光。一个人面对世界是否痛苦和幸福，最重要的是调整心态，只要是心态不健康，他就会变得像个小丑一样可笑。

我曾经浪漫地向往过，我曾经踏实地奋斗过，现在，我大概只剩下回忆了。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只要屏幕上闪出蓝色，我就会想到海洋；参加宴会看到盘子里的海参，我就会想到暗礁；甚至年节时人们放鞭炮，我都能想到“文革”的战斗年月。这种回想使我着迷，有种青春再现的幸福，为此我有时大感惊骇。为什么人们回想痛苦的经历也会有甜蜜感呢？难道他想回到那个永远诅咒的年月里吗？不是，细细思索其中原因，你就会渐渐明白，回忆的时光之中，你正年轻。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属于他自己的城市，在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和城市里，他奋斗，他痛苦，他牺牲，他欣喜若狂，他痛不欲生，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把这些强加于另一代人的身上，让他们理解，让他们感动，让他们当作范本，决不会有什么作用。记得女儿小时候看《焦裕禄》电影，感动得大哭，哭得一脸的鼻涕眼泪。但走出电影院的大门，她要我买五元一支的冰淇淋。我说为什么不吃五角钱一支的冰棒，焦裕禄叔叔当年连五角钱的冰棒也吃不到呢。她说那是过去，现在不一样，还有十元一支的美国大杏仁，更好吃。还有一次，我和妻子谈起了我们的过去，很有些情不自禁，我发现女儿正在她的小屋里写作业，虚掩的门肯定使她听见我们在谈什么。于是我就动情地讲述当年，我断定我的动情讲述会使她幼小的心灵感动，并能为此而升华点什么。不出我所料，女儿确实是感动了，但感动的结果让我面红耳赤。她给同学打电话时说了句，爸爸妈妈那一代太可怜了！

我不知女儿的这个可怜是否还包含可笑，但肯定不包含可敬。从此，我决不在女儿面前板着脸孔讲什么艰苦的经历。我深信我的女儿如果生在我的那个时代，也会像我一样痛苦的奋斗。中国有句谚语，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面对甜蜜，你喋喋不休地讲苦涩，只会令人烦躁。我决不做这样的小丑。相反，我和女儿一样，吃完五元钱的冰淇淋，再想法吃十元钱的冰淇淋，并为能吃到二十元的或更高级的冰淇淋而奋斗。

人终究会衰老，但城市却永远年轻。日新月异的城市永远属于年轻人的，如果你感到城市陌生，那就是你衰老了。当然，我尽可以充满深情地回忆过去，女儿尽可以去充满激情地拥抱未来，代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只有僵死的世界才没有代沟。

山狼海贼的生存经历已经强化了我的野性，现在用不着谁来逼迫我去浪涛中拼命，可是每当我脑海里闪出当年潜进水下暗礁的场景，竟能激动得热泪盈眶。至今，太高级

太柔软的沙发我坐在上面还会感到头晕，无论多么昂贵多么高档的宴会都令我吃不饱饭，住五星级酒店的华丽房间使我呼吸不畅通；如果连续参加几天什么会议，我就烦躁不安，望着庄重的会场，听着与会者动听的发言，我有时觉得这是人类的荒唐和幽默。

我的躯体我的灵魂大概已经都被海水浸泡透了，所以到任何一个城市和地区，我第一个意识就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海，没有海至少应该有条河，否则我就索然无趣。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细细琢磨，我最动心的还是大海。我愿意在海浪中漂浮，只有这种漂浮才能给你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觉。陆地上有若干坑坑洼洼和高低不平，但大海永远能公平地托起每一个生命。为此，只要我的身体还有力量支撑我跳进大海，我就会不断地在大海里畅游，奇怪的是在畅游中总要不断地回头去看城市的景致。也许我经常以这种角度眺望我们的城市，成为一种审美的习惯；也许从漂浮的角度眺望，会觉得城市更加坚实和稳定。所以，表面看起来我热烈地扑向大海，但其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欣赏陆地风景。如今最幸福的享受，就是我能在浪涛中发奋地击水向前，向前，然后缓缓地回过头来，用热切但复杂的目光眺望我的城市。

在心灵的维度里成长

孙惠芬

庞博的散文，读后太让我感到陌生，就像她的名字让我感到陌生一样。我熟知的她，不叫庞博，而叫川川，川川是她的小名。川川很小就发表文章，几年前还出过一本书。其实她发表文章和出书，用的名字都是庞博，只是我没有读过，对名字也就没有印象而已。她的妈妈是散文家素素，那时跟她的妈妈素素以及文化圈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说到她，大家都叫川川，哪里知道就是那个川川在大家不知道的时候悄悄长大，变得陌生，变得让人惊奇。

庞博的文字，实在让我惊奇，惊奇得使我对能否写好这篇文章产生怀疑，她文字所抵达的维度，是我无法抵达的维度。很早，还是在她八九岁的时候，就听她妈妈说，时常的，早上起来，会发现门缝底下塞进一张纸条，是川川写给妈妈的信。她在信里写了什么，妈妈没讲。她在信里写了什么，我倒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她天天跟妈妈在一起，居然会觉得话语并不能真实地表达她，而需要文字；居然会觉得她的心情只有书写才可以得到真实呈现。那时，我就觉得，这孩子的身体里，有一个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维度，至于那维度里有什么，贴进的是什么，似乎很难说清。反正最真实的感受，是觉得她的心里边，有股暗流，那暗流所到之处，弥漫又铺张，混沌而汹涌，不书写便不能得到彻底抒发。

事隔多年，给妈妈写信的川川长大成了给读者写文章的庞博，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从没读过她给妈妈写过的信的读者，我宁愿相信，这篇文章，就是从多年以前那些信中长出来的，是那暗流里弥漫和铺张出来的。混沌，依然是混沌，因为她的感受太丰富了，她会在“白天的完整”里看到“人的羞耻”，会在“自由的摇滚中”看到“剧烈的推翻”；汹涌，依然是汹涌，因为她的思维太奇异了，她会看到“青春像一个正在喝水的果实，带着有毒的笑容从灵魂的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

在从暗流中弥漫出来的文章里，每一个字符都跳动着不确定的，又分明是指向变化和成长的瞬间。惟不确定，才见出变化。问题是那字符从文章里蹿出，如同天外来客，你不知它来自何方，你不知它去向哪里。你不知它来去向哪里，却又分明看到一个成长的身体的暗流的涌动。在这涌动着的身体的暗流里，有着一个巨大的现实的维度，那个维度有“城市”这样坚硬的物体，有“厕所”这样具体的场所，有“可乐”这样游移着

的人物，也有提着“箱子”在“铁轨”上“流浪”这样真实的事件。可是，在这个巨大的现实的维度里徘徊走动的灵魂，却有着一个巨大的感觉的维度，在这个维度里，城市的夜晚满街都是桃色新闻的味儿，厕所里的镜子能够照见人格，小小的箱子变成了母亲，小小的酒吧却拥有距离，所有现实的事物都有了另一个面貌，常人所无法辨认的面貌。你无法辨认，却又分明感到它的真实存在，你分明感到了它的存在，却又无从把握，无从追逐。那被庞博指认的另外的面貌，仿佛露珠在日光之下闪烁的光辉，耀眼，然而扑朔迷离。当你感受到庞博指认的扑朔迷离的存在就在眼前，你便不由自主地看到了一个少女的另一个维度，心灵的维度。

心灵的维度，似乎并不巨大，但是有着烫人的热度，是一个少女对世界最初的渴望，虽朦胧，却驱之不去，深入了夜晚和白天。于是困惑便来了，忧伤也来了，迷茫也来了，恼人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在这个恼人的维度里，世界是倾斜的，是夸张变形的，城市里的灯光是美丽的泥泞，与一个人的友情是废墟里的亲密关系。在这个心灵的维度里，少女的庞博经历着少女的一切烦恼，却不像许多少女那样沉溺，有些时候，她简直就是一个大人的模样，一边经历着痛苦，一边对人生作着理性的梳理，上帝、宗教、怀旧、思想这样的词频繁地出现在她的文字里。尤其，她会从少女迷乱而充满困惑的青春中，认识、归结出一个时代——“饮料时代”。那认识着实深刻又精彩，“饮料时代，诱人，不一定美味，里头的激素让你早熟，防腐剂让你憔悴，却满足了你对浑浊、对模糊、对边缘的饥渴，还有对生活那种平衡的破坏欲。”关键在于，她漫不经心地从可乐写起，可乐在她文字的流动中，最初只是一个人物，而当她和这个人物在心灵的维度里厮守、对话，成长、消失，那个人物和她，居然巧妙地转化成一个时代。如同一棵果树，在它悄悄落叶的时节，不自觉地告知给人们一个季节的结束和另一个季节的到来一样，这一处，简直妙不可言，让人惊叹。

一个给妈妈写信的川川，怎么就长成了给读者写文章的庞博，这是一个谜。实际上，庞博并不是在给读者写文章，而是给自己，是在向自己展开心灵的维度，就像当年通过门缝里的纸条向妈妈诉说一样。重要的是，庞博在从现实的维度向感觉的维度、心灵的维度展开她成长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少女文学的天赋和艺术的灵性。看到了比一个少女心灵更开阔的艺术世界。

祝福庞博！

2004年2月4日

阿妈妮

张景勋

母亲逝世十周年的日子，我从大连赶回胶东故乡，走下长途客运汽车后，直奔村西北面苏岚山麓，探望母亲的坟墓。

到墓地一看，我先是吃惊，莫非是错了去处？仔细环顾，千真万确，母亲就埋在这里，但不见了坟墓。后话先说，大哥告诉我，原来坟丘太小，经不起雨水的冲洗，而夷为平地。大哥认为，老人活着，晚辈尽心孝敬，死后入乡随俗，不必讲究那么些形式，大哥自然也就淡忘了母亲的遗骨。可此时此刻，我一看母亲的坟墓没有了，眼睛立刻模糊了，泪水涔涔地流淌下来。年逾花甲的我，不由自主地双膝跪下，忍不住地哭泣：

“阿妈妮，母亲；母亲，阿妈妮。你的儿子来看你……”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思绪万千。

孩提时，母亲告诉我说：“朝鲜话，称母亲为‘阿妈妮’，称父亲为‘阿爸吉’。”

母亲名叫李长荣，系朝鲜人，1894年4月8日，出生于汉城一个贫民家庭。母亲年幼命苦，她阿妈妮和阿爸吉早亡，其兄也病故，两个姐姐先后出嫁。十岁左右的她，住在大姐家，不愿受大姐家的怠慢而出走。于是，母亲被一家华侨餐馆的梁老板收为养女。不久，我父亲到汉城，到梁老板的饭店当学徒。父亲聪颖勤勉，很快掌握了烹调技术。梁老板的夫人见父亲年轻有为，便将其养女许配给父亲做妻。

阿妈妮和阿爸吉婚后，就在汉城东门外33番（号），另辟餐馆，商号为“裕增德”，经营中西菜肴，烹炸煎炒，凉热俱全，生意兴隆。“裕增德”开始为夫妻店，后来买卖日益看好，便雇个把小伙计。

阿妈妮二十四岁时，生个男孩，即我大哥；二十六时，又生下个女孩，即我姐姐。当我大哥四岁时，封建家庭的权威——我爷爷，便风尘仆仆地从故乡文登赶到汉城，要将他的大儿媳妇及其孩子们一起接回故里。阿妈妮从心眼里不愿离开汉城，她泪水涟涟地说：“我和孩子都不走！”爷爷哪里肯答应，他对父亲说，你媳妇不走，我要把孙儿带走。受旧礼教熏陶的父亲，只能惟命是从。爷爷的意图是要把长孙带回故乡，用封建家教，养育其后代。于是，爷爷强行将哭呀叫呀不愿意离开阿妈妮的哥哥抱走。阿妈妮望着泪人似的哥哥，心像刀绞般的难受，她心里想，公公怎么这般无情……当爷爷带着

孙儿走到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时，发现孩子身体发高烧，精神萎靡不振，爷爷好生害怕。于是，他又转身返回汉城，将长孙送给阿妈妮。爷爷自个回国了。哥哥回到阿妈妮身边，阿妈妮感到无比的愉悦。

次年秋末，在父亲的劝说下，阿妈妮终于勉强同意带着孩子移居故乡。于是，父亲将他们母子送回国去。从此，阿妈妮就定居故乡张家产村。父亲的事业在海外，住了若干年，他也回国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许多年后，阿妈妮全“汉”化了。本民族的语言，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阿妈妮”“阿爸吉”之类。

1925年，阿妈妮又生了一男孩，这就是我二哥。1930年10月20日，阿妈妮生下最后一个男孩，这就是我。作为中籍朝裔的阿妈妮的母恩，不仅在于她养育了四个儿女，而更为值得称颂的是她的功德。阿妈妮乐于助人，她的烹饪技术仅次于我父亲，邻里亲友举办红白喜事，灶上需人主理，她是有求必应的；阿妈妮还学有裁缝手艺，加上她从汉城带回来的手摇缝纫机，她经常为他人剪裁缝补，而且不索取任何报酬。阿妈妮在家务上，是个一时闲不住的人，家里人的饮食和穿着，牲畜家禽的喂养，样样活计都少不了她的辛劳。在我国动荡的岁月里，阿妈妮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着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儿。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武工队到我们村时，阿妈妮总是乐于接受“派饭”的任务，做着家里力所能及的好饭菜，送给子弟兵们。

1944年元月，二哥要参加八路军，阿妈妮和父亲一样，积极支持并送儿子上前线。党尚未公开时，大哥是村干部，一些党员和干部常在我们家活动，自然阿妈妮不知道还有什么“地下党”的活动，但她知道大哥和村里人是在做着好事的。因而，她总是腾出适合活动的房间，烧水供茶忙个不迭。1947年，蒋军数十万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时，我们家先后接受两名新四军、八路军伤兵员的安置任务，阿妈妮对其照顾得比自己的亲儿子还上心，吃喝拆洗铺盖样样周全，让子弟兵度过了艰难的日子，最后送归部队。

解放区那时，村里开村民大会，有时还邀请阿妈妮到主席台就座。因为她不只是一位军属代表，而且还是一位少数民族的代表。阿妈妮不习惯这种场合，是被人推拥着上去的。这当儿，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很不自在，但待一会儿，又恢复一副白皙慈祥的面孔。

父亲因病于新中国诞生前夕，便离开了人世。当阿妈妮得知东北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她托我本家叔叔，将我接到大连，考进工厂工作。那时，我是个有志于学的上进心极强的青年，很快又考学，接受高等教育。

阿妈妮晚年是幸福的。大哥大嫂对待老人很孝顺，她愿吃什么，大嫂就做什么；她碗里剩下的饭菜，大哥又一点不丢地吃掉。阿妈妮在大哥家住，有时也到邻村的姐姐家住。姐姐和姐夫对阿妈妮也很孝顺，每顿饭都特为做好吃的，送到老人嘴边。阿妈妮不先吃完饭，姐姐和姐夫是不会动筷子的。在外地工作的二哥和二嫂，也经常给阿妈妮邮寄些滋养品之类的。这些事儿，都是我探亲时，阿妈妮贴着我耳朵告诉我的。阿妈妮身子骨还硬朗的时候，我和二哥分别将她接到河南商丘（二哥由部队转业在那定居）和大连小住一二载。我们亲近阿妈妮，不只是让她老人家尽享通常意义上的天伦之乐，纵然有千万情义，我们做儿女的要永远报答的最好的人，就是阿妈妮。

韶光易逝，岁月催人，阿妈妮老去。1981年10月10日，阿妈妮不幸病故，享年88岁。阿妈妮弥留之际，我哥姐四人都在她身边，守候了近二十天。在我们家乡，人死后一律火葬，早成新风尚。阿妈妮的骨灰如何处理？我提出让大哥选个地方，将阿妈妮的骨灰埋葬起来。大哥说：“咱这里早就不兴土葬，不好破这个例。”我说：“咱不占用耕地……”于是，我们在苏岚山谷，选了个土层薄的荒地场，将装着阿妈妮骨灰的紫红色的匣子，掩埋地下。因土质贫瘠，堆起的土丘，也不像个传统的坟墓，但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有个记号，寄托着晚辈的哀思。

我止住了哭泣，擦干了眼泪，站起身来，环视着周山苍翠的针叶松，虽然这山林树干不高，但棵棵挺拔如人，仿佛是阿妈妮的身影。风吹来，林木枝叶沙沙作响，好像是阿妈妮早年对她的儿女们说的话：“人生在世，要做对世人有用的事。”阿妈妮，请你放心，你的孩子们，没有辜负你老人家的教养之恩，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为人民作出贡献，生活也很幸福，你如有灵，该含笑九泉吧。

散文二题

林夕

男人的贞洁

国庆长假，和家人外出旅行。回来第二天，我正在家睡懒觉，突然响起的电话把我惊醒了。

“喂，你好，还记得吧，我们之间有个约定。”

那低沉温厚、熟悉而又有几分陌生的声音，一下把我拉回到四年前。

那时我还在报社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认识了他——这位在80年代一手策划并掀起中国钢琴热、而后进入地产界、很快便成功运作了一个巨额投资项目的成功人士。因为职业的原因，我认识一些大人物，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智慧的。博古通今，思想深邃且不张扬。我非常敬重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拜访他。每次都让我受益非浅。就在我想和他进一步接触、将来好好写一写他时，他突然告诉我，他要移居美国。我怀着异常惋惜的心情，约他一起吃饭，为他送行。

像往常一样，我们谈文学、音乐和哲学。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我想辞职回家写作。他略微思索了一下，点头道：“好啊。”

我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好什么好？本来我是想静下心来，练练文笔，将来好好写一写你。可你却要走了。”

他听了，宽厚地笑笑：“知道吗？你是第三个对我说这话的人。”

我曾听说过，有两位作家想写他，都被他拒绝了。我自嘲地笑道：“显然，我是第三个被拒绝的人了。”

他平静地看看我，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不，我准备接受。”

我不无惊讶地抬起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问：“为什么？我默默无闻，他们名气都比我大。”

“但他们时机不对。”

“可是——”我犹豫了一下，“我现在功力不足，恐怕难以担当此任。”

“没关系，我可以等。给你四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在国外旅行，你在国内磨砺文笔。”

现在，四年过去了，没想到他真的回来了。

“你真守约。”我由衷地说。

“我从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就一定守诺。”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说，“我认为，这是男人的贞洁。”

就在那一瞬间，我几乎爱上了他。

生活在这个自由开放、变幻莫测的信息时代，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人，说一些过后就会忘掉的话。虽然我们彼此有约定，但其实我并没有十分放在心上。毕竟，四年的时间太长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原以为他也这样想，没想到他如此认真，信守承诺。我十分感动。感动之余，是深深的自责和羞愧。

这么多年，我对家人和朋友，有过多少次食言，恐怕连自己也记不清了。最初有一点内疚，时间长了，便成习惯。语言成了消费，娱乐自己，愉悦他人。其实这样不仅伤害别人，更是伤害自己。作为思维的载体，语言和身体一样，需要小心呵护，认真对待，要时时检点自己，看说的话是否出于诚意，能否付诸行动。因为你是它的主人，要为其负责。这不仅是男人的贞洁，也是做人的贞洁啊！

背面是女人

近日，不知怎么张爱玲又热了起来，她的书以及由此改编的影视剧使原本就不寂寞的娱乐圈又增添了几分热闹。若是她泉下有知，不知该是高兴，还是漠然。恐怕还是高兴的成份多吧。我以为。虽说张性情孤傲，作品无一例外的是冷色调，荒凉，冷艳，把人生翻过来给你看，让你读罢浑身上下连牙缝里都透着彻骨的寒风。但此其文也，其人却不同。脱去作家这层外衣，张爱玲自己的人生还是想要那暖色调的正面的。

凭心而论，在中国所有的女作家中，除去李清照，张爱玲的文章算是最好，迷倒了无数读者。也包括我。我爱读她的作品。但她的为人，却让我无论如何也爱不起来。别的不说，单是她的两次婚姻，怎么看都不像她那种智慧的人之所为。

张爱玲对婚姻的阐述十分精辟，她说：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真是一针见血。但遗憾的是，生活中的张爱玲，对于婚姻的态度与表现，却又几乎翻了过去。

众所周知，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是大名鼎鼎的胡兰成，时为汪伪政府高官、《中华日报》的主笔，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有才无德。尽管如此，张爱玲爱上他也可厚非，爱情本来就是不讲道理的，以胡兰成的博学多才以及良好的艺术修养，让

同样多才且惜才爱才的张爱玲倾慕，应该说是一种必然。但爱就爱了，何苦要嫁？到现在我也搞不懂，对世事洞明的张爱玲难道不明白，爱和嫁不同，爱是相吸，有一样好即可。但嫁不同，嫁是相守，德才兼备最好；如若不能，宁可有德无才，不能有才无德。前者虽不具建设性，但也没有破坏性。令人不解的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张爱玲也像所有的笨女人一样，一头扎进了胡的围城。

就在二人订下婚约那天，胡兰成给了张爱玲第一张支票，她喜滋滋的拿去买衣服。出身名门、年纪轻轻就成了上海滩走红的女作家的张爱玲，不可能没钱花，大概骨子里还是觉得花男人的钱感觉好吧。她曾说过：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考验。由此可见，张爱玲第一次婚姻虽然客观上与钱无关，但主观上是否亦如此，尚可商榷。

不管怎么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合是感情多于利益，相比之下，她与剧作家赖雅的第二次婚姻就与感情没什么关系了，是一次为了生计之举。当时张爱玲刚到美国不久，靠着一份微薄的写作奖金，住在专门收留贫困作家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生活窘迫。不得已写信给赖雅，告诉他自己情况不妙。赖雅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写过不少作品。许是惺惺相惜吧，赖雅收留了她。这便是张爱玲的第二次婚姻。时年张爱玲三十六岁，赖雅六十五岁。

但可悲的是，二人结婚不久，赖雅便瘫痪在床，给张爱玲造成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为了生存，这期间她写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及剧作，委托台湾一家公司出版。

尽管张爱玲的散文数量也不少，但写得最好的还是小说。她用一枝柔情冷笔，刻划了一群旧式婚姻原生状态的女奴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男权中心对女性的盘剥和压迫。但是，由于社会和自身的局限，她并没有指出女人除婚姻以外的出路。同样，由于社会和自身的局限，她自己也是一度试图在婚姻中寻找出路。

因此，尽管张爱玲有着众多热爱她的读者，但最多也只能称其为出色的作家，却难言伟大。

关于爱情的话题

刘益令

朋友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来信约稿，请我写一篇关于爱情的文章，我哑然失笑，他显然是忘记了我的年龄，年过半百的人了，还有什么权利奢谈爱情？

但是朋友穷追不舍，来电话说，爱情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永恒的话题，说得也不无道理。

二十多年前，我当乡长的那个地方可以算得上是穷山僻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民风强悍，女人尤其刚强，且极有主张，完全不同于现在城里那些扭捏作态、总是自我感觉不错的贵夫人和娇小姐。上任不久，就听司法助理说了一件事——桦树沟老李家的新媳妇在新婚之夜咬掉了新郎的鼻子。助理说，其实也没有全咬掉，稍微破相而已，不过新郎再也不能仗着自己长得俏皮，动不动就往女人堆里钻了。

新郎是个很俊的人儿，家境又好，高中毕业后，上门提亲的人把门坎都踩平了，小伙子的父亲深谙“丑妻近地家中宝”的古训，看儿子已经开始招蜂引蝶了，就强拧着为他找了个丑媳妇。人呢，也算不得太丑，不缺胳膊缺腿，也不少鼻子瞎眼，无非是身板薄点，头发黄点，皮肤黑点，眼睛小点。不料这媳妇人丑心高，进洞房之后不忙做别的事，等新郎凑过来亲热时，先咬了他的鼻子。咬了不算，还坦坦然然地来到前屋跟公婆说，现在散伙也不晚，是不是老李家的媳妇，就等二老一句话。

婆婆哭了，公公乐了。

此事轰动一时，司法助理问过那个媳妇，打人犯法，咬人鼻子比打人还厉害，何况咬的是自己的丈夫，怎么下得了口？那媳妇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地说出一番道理，意思是，我要和他做白头夫妻，这就是长处之法，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跟我过日子，鼻子破了怕什么，他有腿断胳膊折的那一天，我养活他！我问助理，俩口子现在过得如何？助理说，好得不得了，快生小崽子了。

在我听到这个传闻之前，我曾在村小学当过多年校长，学校里有一个品学兼优、文静寡言的女学生，挺拔健美，漂亮得像山坡上的一株女儿树。这女孩小学毕业立即到生产队上班挣工分，一有空就在屋后的山坡上斩草开荒，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她是想人工栽种人参。

种人参是长白山里古老的挣钱门道，也是一件极苦的营生，要选择一块半阴半阳、坡度适宜的山坡，把上面的杂树乱草砍倒，放火烧荒，然后一镢头一镢头地深翻一遍，拣走石块，筛留泥土，培成两尺宽、数丈长的垅，再打好木桩，架好木杆，割来茅草打成草帘，半遮半盖在上面。人参籽撒在垅里，隔几年就要倒一次垅，到第六或第七个年头，人参长到大姆指粗细，才可以收获，卖价很高。栽种人参历来是男人干的活，女人是不准进参园的，但她父母就她这么一个宝贝女儿，阻止不了，听了别人的闲话，她也只是一笑。

一晃，就到了起参的年头，有经验的参把头估算了一下，最少能卖两万元，那时，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一大笔财富。这期间，女孩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不少人上门提亲，都被她一口回绝，也没有见过她与哪一个男青年交往。

就在起参的前一天晚上，这女孩突然给父母留下一封信，连夜到北大荒去了。信中说，她是去结婚的，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人参卖了钱以后，二老后半辈子够用了，不用惦念她，她也不用惦念家了。人们这才想起来，村里有一户成份很高的人家，多年前为逃避批斗，去了北大荒，那家有一个儿子，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

女孩的出走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山村的夜空，为丧失了人情的大批判运动呼唤出一声人性的呐喊，也为古老山村中世俗而重利轻人的婚姻平添了几分反叛的亢奋。让许多待嫁村姑在睡梦中惊醒。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那户成份高的人家一定是北大荒的黑户，她的未来注定要充满荆棘和风险，可能一生都将伴随耻辱，永无出头之日。但她还是抛弃了即将到手的财富和必将令人羡慕的婚姻，义无反顾地追随而去，像飞蛾扑火一般。尽管我听见的，大多是非议，但我这个昔日的学生，还是让我肃然起敬，以至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敢妄谈爱情。

最后一个关于爱情的话题，是留给我自己的。

三十六年前的正月十五晚上，我躺在辽东桓仁县一个小山村的青年点里，因为响应“在乡下过革命化春节”的号召，我们远离父母，蒙头睡觉，谁在被窝里掉眼泪，别人是看不见的。

突然有人像猫一样挤开门，蹑手蹑脚鱼贯而来，揭开被头，朝我们脸上胡乱涂抹。我们一跃而起，捉住对方，辨不清脸庞，只听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笑声，是压抑的女声，点亮油灯才发现，这是一伙初识不久的村姑。

下乡半年来，我们这些男知青没少被她们取笑，她们天生能干活会干活，扬场堆垛、赶车扶犁得心应手，且姿态优美，赏心悦目。我们的笨拙和无知，还有柔弱，常让她们撇嘴皱眉，但也换来了不少的同情和帮助。说实话，她们质朴善良的本性和粗衣裹

住的健美身躯，以及鬓发间插朵野花便自成一一道风景的娇憨，有时也不由得我们不怦然心动。

见我们懵懵懂懂，姑娘们各自递过一块青皮萝卜，转身就跑，我们虽然还是蒙在鼓里，却立即领会了其中的好意，毫不犹豫地追逐而去。青皮萝卜上蹭满了锅底灰，就叫“花泥”，散发着春的气息和家的温馨，被异乡姑娘的手涂抹在脸上，火烧火燎，横一道、竖一道，乌黑锃亮，模样怪怪的，很好玩，我的脸被几个姑娘抹过，我也学着她们的样子抹了她们，嬉笑欢闹中，心中有一股股暖流滚过。

过后我才听当地年青人说，这一夜，手持花泥去涂抹心上人的脸能够喜结良缘、白头到老，很灵验的。结过婚的男女，不管岁数大小，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向意中人抹花泥表示爱恋，连最封建的老人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加以干涉。更有痴情者，无论怎样山高水长，无论怎样穷困潦倒，也要在这天晚上赶到情人住处，将花泥涂抹在对方脸上，因此而成就婚嫁迎娶的不少，酿成孽债，上吊投河、寻死寻活的也常见。这风俗世代相传，其间的风流韵事，为深山老林里不大开化的守旧生活碰撞出一些灿烂的火花，掀起阵阵波澜和骚动。老年人却讲，正月十五晚上瘟神下界瘟人，人的脸上抹上花泥，人不人鬼不鬼的，容易被瘟神当成同类，就逃过一劫了。多年后，我把老年人的讲述写进民俗书，心中却始终赞同并坚信年青人的解释。

那天晚上，在这群向知青脸上猛抹花泥的村姑中，有一个人特别有意地追撵着我，那是一个被我们私下里评为村花、自己却浑然不觉的女孩。她的美，像山花、泉水和彩霞，而且还有如待收的庄稼和摇摇欲坠的鲜果般的成熟。对于一个情窦初开、前途无望、孤独无助的下乡知青，当我知道了抹花泥的寓意，又亲身体会了如此美妙多情之夜，心中对爱情的渴望，显然是毋庸言传的。

这个姑娘一连涂抹了我三年花泥，每次都得到我强烈回应，如此而已，一旦度过了那个肌肤相亲的浪漫时刻，城市知青和乡村姑娘之间的隔阂便如影随形介入其间。我们终年朝夕相处在心有灵犀的情感生活中，用共同的劳动求生存，在贫困中寻欢乐，在知青点没有建好之前，分散住在村民家里时，甚至相互就寝在同一屋檐下的南北大炕上，但彼此却不能给对方以任何感情方面的承诺，那实在是一种空前的、也许也是绝后的辜负和无奈。

第四个正月十五晚上，她从远山那边的婆家跑出，又最后地抹了我一次花泥。我能感觉得到她专程为我而来的心意，但似乎都不开心，虽然她还是像往年那样跳着、叫着、笑着向我迎面扑来。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刚刚有了一个知青妻子。

随后，我离开了那里，有点义无反顾，最终用行动证明了我是一个追名逐利之人，不那么高尚。我至今也不敢断言，在我与妻子结婚以前，我曾经享有过一次爱情，更不敢自作多情地说，我曾经拥有过人世间最美好的女人的爱慕，但这毕竟是一个关于爱情的话题，而且完全属于我自己。

编辑朋友说得不错，爱情的确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永恒的话题，但是关于爱情的话题并不一定都是甜蜜的、幸福的、令人陶醉的，有时候是辛酸的、痛苦的，甚至是残酷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真正的爱情绝不是舞厅昏暗灯光下的轻歌曼舞、虚张声势，也绝不是绅士与淑女间的卿卿我我、无病呻吟，真正的爱情，无论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都是惊心动魄的，沁人肺腑的，都是要被当事人和旁观者牢记在心、永远回味的……

发表于2004年第12期《海燕》

杂文 随笔

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

老兵

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将作何感想呢？

中国是四千多年的古国，在这四千多年漫长的岁月里，从来没有一天是中国人民自己当家的。现在，有了人民自己当家的国家，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先生吃了一辈子的苦，打了一辈子的仗，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今天这一天吗！今天这一天是来了，鲁迅先生却死了，鲁迅先生虽死了，可是他理想的国家却实现了。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将如何狂欢地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将如何兴奋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首先承认它，和它建立外交关系的是谁呢？是苏联。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鲁迅先生是很早就认清这一点，而且一力主张要和苏联交朋友的。他早已看清楚中国自1842年到1918年以前是没有朋友的，那些喊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国际朋友，其实都是趁火打劫，坐地分赃的国际强盗，直到苏联革命成功，中国人民才有了真正的朋友，可是反人民的家伙，是不愿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朋友的，为了这，鲁迅先生又和反人民的家伙打开了架，为了这，也不知受了多少恐吓和污蔑。现在中苏两国人民已经亲密地握手，热烈地握手，谁也不能阻拦他俩的握手，鲁迅先生假如还活着，他将如何热情地欢呼着中苏友好万岁，致力于中苏文化的交流呢。

鲁迅先生一生所遭逢的政府是些什么政府呢？先是昏庸贪污媚外辱国的满清政府；满清倒了，继之而起的是与军阀官僚妥协的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而为洪宪皇帝的独裁政府；洪宪死了，接着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辈争权夺利此起彼伏的北洋军阀政府。军阀垮了，最后遇到的凶残阴狠，集中外古今统治办法集大成的蒋介石政府……这些政府，都是祸国殃民的政府，都是鲁迅先生要用蚊烟把他们熏出去的政府。

鲁迅先生所理想的是一个全国人民自己当家的政府，他为此“理想”的实现而战斗，一直到他死。今天，这个“理想”实现了，那就是中国人民政协所产生的中国政府，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将如何欢喜赞颂来歌颂这人民政府，拥护这人民政府呢！

鲁迅先生一生所最痛恨的是封建文化、官僚文化、殖民文化，在《热风》里反对“国家学”，反对“保存国粹”，在《阿Q正传》里，反对“假洋鬼子”，在《幸福的家庭中》，反对“空头文学家”。至于“帮忙文学”“帮闲文学”酒场才子之流，在他笔下，是被暴露得体无完肤的，他自己也在这尖锐的战斗中，创造了他“匕首”和“投枪”式的文体，一直到今天，还是为解放而斗争的战士们所经常运用的武器。

现在他所痛恨的这些坏东西，都被大时代的烈火烧成灰了，在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指导下，中国的文艺，已走上新的道路，许多文化人，不管他来自何方，出身何地，都已准备投身到工厂、到农村，了解工农，学习工农，改造自己，转变作风，进一步而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不再做资产阶级的门客了，这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潮流，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将如何像高尔基在苏联似的，为新一代做导师，为新的文艺者先锋呢！可惜鲁迅先生死了，而且死了十三年了，十三年以前，旧社会所产生的一切苦果，他都含辛茹苦地吞食下去，十三年以后所产生的新的革命果实，他却不及享用，甚至不及目击，这是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今天，深深为鲁迅先生抱憾的！

然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鲁迅先生，他是不计较这些的。只要他撒下的革命种子开了花，结了果，他播种的目的就算达到了。这就是鲁迅先生的伟大，我们要学习鲁迅，应当从这里学起。

不废江河万古流

王凡

这几年人们常说到：“青出于蓝胜于蓝”，“后来者居上”，“学生超过先生”等等。大概我们年轻人很喜欢听这一类的话，听得多了不免有点陶醉，好像历史给予了我们一种“超过前人”的特权。但是，要想超过，谈何容易？你先要把前人走过的路走完，要把先生的本事学到手，否则是超过不了的。梅兰芳超过了前人，这是他下了苦功向师友学艺，毕生不懈，直至艺名满天下，仍然甘当小学生。最近一些追悼文章，几乎篇篇都说到这一点，可见其感人之深。谈到这里，想到了杜甫的两句诗：“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诗中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都是初唐诗人，他们比起杜甫这个博大精深的“诗圣”，当然是显得黯然失色了，但是杜甫却自视为他们的后继者。可见，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无不具有此种大气度，莫不得益一“学”字。

把向前人、向先生学习的问题，说得这样重要，岂不是有点缺乏革命气概吗？不然。在任何领域里，伟大的革命家、创造家，必然同时是这个领域里的最虚心的学生。杜甫诗本来是六朝“宫体诗”的对立物，但是他直到晚年仍在“颇学阴何用苦心”（阴铿、何逊，均为六朝诗人）。若非这等虚若无物的胸襟，怎能“尽得古今之气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元稹对杜甫的评语）？即使对于完全错误的东西，为了批判也要先学习。恩格斯为了批判杜林，甚至曾经放下别的工作，专门“来作不甚愉快的分析杜林先生著述的工作”（见《反杜林论·序》），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那种未窥前人之门户，未得问题之皮毛就妄加批判的作风，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人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开辟新的路径，永远向前，发展不息，正如杜甫所形容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发表于1961年8月30日《大连日报》

唐陆贽论九弊

剑鸣

唐陆贽上书德宗，指出当时上下之间存在九弊，分析得很是精辟，今天读起来，也发人深思。他说：

“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愿望，畏愎，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辨，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愿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愎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

试把这一段话译释如下：

“所谓九种毛病，君上有其中的六种，臣下有其中的三种。好压倒别人，以听到缺点错误为耻，强词夺理，卖弄聪明，盛气凌人，自以为是，这是君上的六种毛病。阿谀逢迎，看风使舵，顾虑重重，这是臣下的三种毛病。君上好压倒别人，必然喜欢恭维；君上以听到缺点错误为耻，必然讨厌率直的批评。这样，下面就有阿谀逢迎的人投其所好，而忠言就听不到了。在上的人强词夺理，必然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用言把人顶回去；在上的人好卖弄聪明，必然无端猜疑，对人耍手段。这样，下面看风使舵的人就自由主义，不敢畅言有棱角的话了。在上的人盛气凌人，必然不能平易近人；在上的人一味自以为是，必然不能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这样，下面顾虑多的人就会明哲保身，不提出合情合理的意见了。”

陆贽在历史上同魏征一样，都是以善谏著名的。两人的识见也不相上下。魏征所遇到的唐太宗，是历史上最能纳谏的一个开明的封建皇帝；唐德宗的才智比之唐太宗差得很远，不过也有发愤图强之志，还能够容纳谏言。凡是封建皇帝能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的，他的臣子就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毕竟很少，大多数是以不理或降职、撤职、充军以致杀头来打击敢于批评自己的人。不过这样的皇帝，其宝座也往往岌岌可危了。正由于中国历史上极富于这种政治经验，所以历来都是颂扬那种能接受批评的在高位者，而对于那种拒谏是非的总是目为昏暴，嗤为愚昧。这就形

成了以接受批评为荣的历史好传统，并且创造出许多有关这方面的精炼的格言，成为我们今天很宝贵的遗产。

陆贽在这段话里，把臣下的三弊的产生和抬头，归因于君上的六弊，这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要消除九弊，关键在于君上，今天说来，即关键在于领导。领导者如没有六弊，能克服六弊，被领导者的三弊便不能存在；纵然会有，也不能抬头。不过民主风气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固然主要有赖于领导者来发扬，但被领导者从下面来争取也是重要而且应该的。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尚且不断有硬骨头敢于冒犯危险去摸皇帝老子的老虎屁股，那么在认真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今天，作为一个革命者，倒怕狼怕虎，而无实行批评的勇气，还成话么！

脱胎而出

汤家康

京剧界流传着很多佳话，言菊朋学谭鑫培也是一个。言菊朋爱好京剧，对谭鑫培的表演艺术很钦佩。于是他“半路出家”，利用一切时机向谭学习。言菊朋刻苦学习的结果，掌握了谭鑫培的表演艺术；但是他不到此止步，而是经过自己的再创造，别具一格。于是京剧须生这一行中就出现了言派。言菊朋学习谭派又脱胎于谭派而创言派，丰富了京剧的表演艺术，这很好地说明了学习和创造的关系问题。

有前辈和老师的实践经验可学，这是后来者的幸福。我们就应该“如切如磋”，苦心学习，把艺术大师的表演学到家。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只知一味模仿前辈或老师，而不能神领意会，根据自己的条件，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和对角色创造的体会，而有所发挥，有所创造，那末即使把前辈或老师的一举手一抬足的微小动作，模仿得再惟妙惟肖，充其量只能达到“青出于蓝”而“等于蓝”的境地。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就永远超不过前辈或老师。

事物发展的规律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后来者居上”，是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强。这是因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总是在向前发展，前人辛勤经营的丰富果实，可供后代学习和借鉴，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给我们提供了更丰富广阔的天地。这只是客观上的条件。王献之固然有一个行书大家爸爸，但是有个故事说，只有在他写完十八缸水之后，才练出一手好书法。可见，客观条件再好，如果主观上不能刻苦学习，仍不能有所创造；没有创造，也就不能有所发展。梅兰芳和盖叫天等艺术大师，都各有老师，各有所宗，他们能够自有风格，成为当代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是“劳动的积累”——梅兰芳语，也就是他们除刻苦学习前人外，还要加上自己的琢磨研究。因此能集前人精华之大成，又能不囿于程式，有所创造和发展。创造发展也是客观的要求。因为时代不同，生活有别，观众的要求也各异，京剧从内容到形式到表演技巧，都要有所变革。

要变革，就要创造。如果只能跟着前人和老师的步子走，而没有个“想超过”的思想，这样下去京剧各行中的表演，就会出现“只此一家，别无分处”的局面。这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我们要的是政治方向一致下的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这就需要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需要脱胎而出的创造。对刻苦学习、勇于创造者，应该鼓励，再鼓励。

上面说的都是京剧界的事，不及其余；只是以此为例，我想其余各行各业也同此理吧。

1961年9月15日

从武则天和花想到的

张景勋

明朝游上苑，
火速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
莫待晓风催。

相传唐高宗皇后武则天自立皇帝后，群臣为她祝寿，武氏心血来潮，亲题此诗作为救命，要宫廷花园，一朝之内百花争妍，为她庆祝。此时正值初春，迎春花、杏花、桃花等这些早春花木，即使无有皇帝之旨，花当开的，自然开了。而在5月开放的牡丹，却没有使武氏如愿以偿，丝毫没有表示。则天女皇闻听，怒上眉梢，便下令牡丹移苑，贬谪洛阳，并将牡丹花改称洛阳花。

这固然是个传说故事，可是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当年则天女皇受历史的限制，只凭愿望，没有掌握百花的规律，自然不能改变牡丹的性格。可是换了人间，我们的园艺工人却创造出很多奇迹：大连劳动公园园艺工人，他们不仅能叫牡丹花指日怒放，而且有“聚四时之花，于一时开放”之本领。我们还记得在庆祝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园林职工们举办了百花齐放展览会，向全市人民展出了四季之花。这里有本来早春开花的金黄色的小喇叭似的迎春花，有叶红在万花凋谢的寒冬的一品红，有在秋天开花的短日照菊，而其中也有5月开放的国色与天香的牡丹花等一百余种。这个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他们认识了规律，运用了规律。他们依据自然界植物的发展规律，按照人们的需要而让其生长、开花、结果。例如，迎春花初春温度在2℃以上方可开花，花谢后，随着气温的逐渐增高，它便处于休眠状态——亦即积蓄营养、形成花蕊阶段。冬去春来，这反复过程，无非是迎春花的生长规律吧。这规律是由客观环境和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因而也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了 this 规律，便可运用这个规律，使主观和客观相吻合，我们的行动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园艺工人为了让迎春花延至于七一开放，于是便改造自然条件，降低温度，使其处于休眠状态。待需要时，再行改变其环境和条件，就可以达到指日开花了。又如，受阳光的影响——每天

日照十小时为适开花期，本来在秋天开花，而人们认识了它的习性和生长规律，在受日光时间多的季节里，依然保持十小时的短日照，这可叫它春、夏两季开放。

由此可见，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只有认识规律，运用规律，才会使其更好地发展，如果违反它，它就会使你难堪。当然要求多年前的武则天这样做，是不实际的，但武氏这个故事委实诱我们深思遐想。

发表于1961年9月29日《大连日报》

避聒与没字碑

甘日骆

近日翻阅书报，偶得有关碑文事两则，感有所触，摘录于下。

其一，《阅微草堂笔记》有李玉典言故事一则，略谓：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岩洞，聊想投憩，入洞则见前辈某公在焉，惧不敢进。然某公招邀甚切，度无他害，姑前拜谒，略问寒暖、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曰：“公墓在某地，何独游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第随人作计，为官第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一巨碑，螭额（碑首刻无角龙形图纹）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姗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于此。”

其二，郭沫若在《我怎样写“武则天”》一文中，记述曾游陕西乾县唐高宗与武后合葬墓——乾陵，见陵南有二碑，西为述德碑，东为没字碑。述德碑刻有纪念高宗的文字，即《述德记》，相传为武后所撰，中宗所书。没字碑，是纪念武后的碑，原无文字，现为宋、金以来的提议所刻，据说是根据武后“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不刻文字”的遗言而立的。

墓表、墓志铭、神道碑自秦汉以来，就成为我国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文体。《事物纪原·吉凶典制部》中记载：“秦汉以来，死有功业，生有德政者，皆碑之。”这种文体至汉唐已极盛。隋唐之制，官居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以扬其功德。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有专文论述谀碑，并有“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的记载。碑文是记叙死者姓氏、生平事迹，颂扬其公德及对死者表示悼念的。墓前树碑，是为了给死者“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隋书·杨素传》）。因此，历来悼念死者的碑文，都是歌功颂德尽说好话的。但亦有不少碑文诳言虚谤不符其实，如《后汉书·郭太传》记载：汉末太学生领袖郭太死后，蔡邕为郭作碑文时，曾对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由此可知，古人写碑文，连长于碑记的蔡邕也是常有“惭德”、愧色的。

上述故事两则，前者事属虚拟，后者或为史实。但两者疾恶虚词招谤，诳吹捧拍都是一样的。某公死后，见碑文所述其生平事迹，或为公不知，或言过其实，惧游人过读，不耐其聒，而竟避居山穴。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的女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

她竟能在自己与高宗合葬的墓道前，为高宗树述德碑，亲自撰文记功诵德，为自己树没字碑，留言不刻文字，让后人评价。这种痛恶诳言虚谤和颂旁人美德，隐自己功业的精神，至今也是值得颂扬的。

闲话《骂鸭》

甘日骆

在一次集会上，听到一位朋友讲述《聊斋志异》中《骂鸭》的故事。晚间归来，灯下寻书细读，愈读兴愈浓。这则故事虽是琐闻，但描写得简洁、委婉、曲折。抄录如下：

“邑西白家庄居民某，盗邻鸭烹之。至夜，觉肤痒。天明视之，茸生鸭毛，触之则痛。大惧，无术可医。夜梦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罚。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而邻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尝征于声色。某诡告翁曰：‘鸭乃某甲所盗。彼深畏骂焉。骂之亦可警将来。’翁笑曰：‘谁有闲气骂恶人。’卒不骂。某益窘，因实告邻翁。翁乃骂，其病良已。”

盗鸭者偷吃了邻翁的鸭子，长了一身鸭茸毛，又痒又痛，周身不舒畅。要舒畅就不能把自己的错误掩盖起来，把责任推给旁人；而只有“实告邻翁”，老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在邻翁的“责骂”下脱毛去病。蒲松龄在篇后评语中有一句话，我看倒很有意思。他说：“彼邻翁者，是以骂行其慈者也。”这种“骂”正是一种友好的、善意的帮助。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可是《骂鸭》和《聊斋》其他作品一样是有感而作的。他愤恨那些做了坏事又想把错误掩盖起来的人，而希望他们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在旁人的善意帮助下改正。在古代只有强权而没有公理的社会里，这种人实在是极少的。只有在我们光辉的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出现千千万万的真正大公无私，敢于责己，又善于帮助别人的优秀人物。

我们时代的真正的革命者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他没有任何私心，不做任何“亏心事”，对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勇于自己公开，认真改正，而不需隐瞒掩盖，更不必像盗鸭者那样诡告：“某甲所盗”，诬赖旁人。真正的革命者勇于进行自我批评，也不畏惧别人的批评。

现在，我们看到自己同志和朋友的缺点错误，当然不必像邻翁那样用“骂”去解决问题。但善意的、负责的、诚恳的批评则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批评正是“行其慈者

也”，是真正爱护同志和朋友的表現。而敷衍和迁就只能助长同志和朋友的错误，损害革命的利益。

真正的原则问题和是非问题是应当通过批评和斗争来解决的。但在对待纯粹日常事务，或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处理的问题上，我看是应该向邻翁学习一点“素雅量”和“未尝征于声色”的精神的。这样的“雅量”也决不是不讲原则，不辨是非，因为它是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有利的。那种把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随意扩大成为“原则问题”，板着面孔进行批评和斗争的做法，恰恰是最不讲原则，不辨是非，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事业的。

只要我们正确地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就能避免和克服工作中的一切缺点、错误，胜利前进。

识才者得才

于景宁

少时读《新民晚报》，有一则趣闻至今尚未忘怀：上海市文物店到民间收购文物，某君见行家登门求宝，于是乎便把自己珍藏的许多瓷瓶取出，请来者赏鉴。这些古色古香的瓷瓶虽被主人置于名贵的楠木文物架上，但行家看罢，却不过是不值几文的普通大瓷瓶而已。然而当文物店的同志告辞退出时，却突然被此君厨房灶台上的一个白色垫圈所吸引，原来这个被主人用来垫锅的锅圈，竟是战国时代的白璧！

本来毫无收藏价值的大瓷瓶子，却被主人当作珍贵的文物置于高架之上；本来是极有价值的战国白璧，却被主人当作锅圈垫于黑黑的锅底之下。若问此君何以如此？答曰：不识宝也。

识宝者才能得宝，不识宝者就容易把假宝当成真宝，而对真宝却弃之如敝屣。收藏文物如此，选拔、使用人才亦然。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如果仅有思才之心，却缺乏识才之能，那就难免把一些“大瓶子”视为珍宝了。“文物架”上的位置终究是有限的，“大瓶子”既然已经堂而皇之地摆满了一架子，那“白璧”当然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有些单位之所以选用了一批人之后，局面仍未打开，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和领导没有任用真正的人才有很大的关系。

上海市文物店的同志所以能识出被埋在烟熏火燎的厨房里的白璧，是因为他们有识宝之能。一个领导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就必须练就一双识才的慧眼。只有自己是行家里手，才能看出别人的本事怎样，“玩艺”如何；只有自己是“明白人”，才能分清真才、假才，英才、庸才，人才、奴才。所谓“英雄识英雄”正是此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正因为自己就精通数学，所以他才能从华罗庚《苏家驹教授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中，看出华罗庚的非凡的数学才华，并将这个“小地方”的初中毕业生调到清华园工作，得到了这块不易多得的被垫于“锅底”之下的“白璧”。

我们的事业需要千百万人才，发现、选拔、使用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改革之才、开拓之才，是每一个领导者一刻也不能忘记的时代“大计”。我们希望那些“才盲”和还不太会识才的领导同志，是不是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学习，向现代科学技术学习学

习，如果有时间也顺便到你们那里的“厨房”去走走，看看有没有被你当作“锅圈”的“白璧”。成了“明白人”之后，也就不难发现真正的人才了。

发表于1984年5月24日《大连日报》

1986年入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青年杂文选》

弄潮真当立涛头

于景宁

人之所好，大约总同地域有关，诸如草原牧民之赛马，江上人家之竞舟。滨海之城自然是无“原”驰骋，无“川”争流的了，但天赐银滩百里，湾拥碧波万顷，故不乏喜于迎涛搏浪的弄潮儿。

“弄潮”虽为赏心乐事，但弄得不好，也委实是有些风险的，所以一些怯懦的弄潮儿，只是在波平如镜之时，才肯下得水来，游它一游，或躺在“太平圈”上，一味地去享其太平了。但是不畏风浪的“海碰子”，全然不顾那许多，任凭风吼浪卷，偏要立于涛头之上，奋身激流之中，这虽远不如坐“太平圈”那般悠闲，但饱尝浪击水拍之苦、几经波埋涛掩之后，却实实在在地练就了一身搏击风浪的本领，获得了大海丰富的馈赠，到头来，未始不是赏心乐事。

我想改革者之所为，大概也有似于此，倘若不冒点风险，那是断难有所成就的。前些时，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决定为其北海油田建造三艘十一万五千吨穿梭油轮，消息传开，立即轰动了国际造船界，六十八家实力雄厚的造船厂，争相参加投标竞争，一时间，其势如滚滚滔滔的大海，波涌浪翻。我们中华儿女自有不惮于风险的“弄潮儿”，大连造船厂的改革者，明知建造穿梭油轮之艰、承担重任之险，但是他们认为，只有阔步走出去，才能大量引进来。于是我们的“冒险家”毅然赶赴挪威，参加投标，勇敢地投身到国际竞争的大海之中。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角逐，他们终于获得了十一万五千吨穿梭油轮的订单，成为当前颇不景气的国际造船业中的佼佼者。倘若他们只是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弄潮”，怎会有今天的夺标之举呢？看来，一个改革者如果不敢到涛头、浪尖上去搏击，那是决然练不出真本事，自然也就干不出大事业来的。

当然，“立于涛头”，那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或问：“立涛”之勇何来？答曰：胸中一无私念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戚戚于自家安危，但惟“四化”大业为重，这就是我们弄潮勇士们搏击风浪的“胆”。

我们的事业需要千百万勇于开拓、不畏风险的改革者，开发黄金海岸更需要众多无私无畏、神通广大的“弄潮儿”。愿锐意改革的英雄儿女，都勇敢地立于浪花飞溅的涛头上，积极进取，奋力搏击！

发表于1985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赞美后的思索

汤家康

自从党在农村的好政策导致农村富裕起来后，报刊常有有关致富个体户投资兴办一些修桥补路等公益事的报道。读后很受感动，不禁随着记者流于字里行间的赞美之情而加以赞美。

然而在赞美他们的同时，也令人想到另一方面：为什么人们日夜必经之路年久失修，无人过问？甚至因为没有一座小桥。五冬六夏必须趟水过河这样的问题，长期以来乡村的有关部门不去解决呢？

在忙于“割尾巴”，批判“资本主义道路”的年代，乡村干部有可能顾不到或不敢去解决有关群众安全、福利的事，尽管毛泽东同志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而且具体指出：“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但是还是情有可原的。那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呢？现在呢？我想我们的干部绝不可能像阴阳先生那样，预卜到有朝一日会有致富了的个体户，也不大可能料到这些万元户会投资建桥、筑路或干别的有益于群众生活的事。那为什么这类事长期没有解决呢？有人会说没有钱。对大多数地方来说，恐怕并非如此。建座小桥，铺段短路，投资不会太大，否则即使是万元户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如果少吃点大盘子，少支点公费借故外出游山逛景，少做点劳民伤财的讲排场、搞花架子的事，这笔钱是不难挤出来的。也许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该办的事也有别了；现在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这些“小事”没有时间来管了。固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但是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生活，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不可忘记。只要我们党存在一天，我们就该信守这一准则。

致富后的个体户兴办公益事，确实值得赞扬。而作为人民公仆的干部，是否需要从中想点问题呢？我看需要。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对“民间疾苦声”更该“一枝一叶总关情”。

发表于1985年12月19日《大连日报》

“不卑不亢”好

伍友明

我的一位朋友在明清小说研究方面成绩显著。近几年来，经常有国内学者访问他，也有不少外国学者慕名而来。一次，一位外国学者专程从万里之外飞来中国，要求访问他。接待部门派一名年轻同志用车去接他。在车上，这位年轻同志认为我的这位朋友穿便装去会见外国学者不甚妥，便建议说：“您应该穿西装去会见，穿便装不好。”我的朋友问：“既然是外国学者来会见我，我穿便服有何不可？你以为不合适请马上送我回去。”于是，车子返了回去。当这个部门的一位领导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批评了这个年轻人，亲自登门去接他。会见的结果使双方都很满意。

类似的小插曲，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仅此一例。如：一个外国商人在一个展室里参观，不允许我们省级报刊主编参观；一个外商花高价可住的客房不允许中国有关同志看一下，等等。每遇到这种场面，我都感到心灵受到了刺激和伤害。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对外交往中要不卑不亢，这话很对。但做起来，往往变了样。在对外交往中，相互尊重对方的习惯，是平等交往中的应有之义。着便装、穿西装，本来均无不可。如果认为非穿西装就是失礼仪，恐失之偏颇。我以为，既要有时代感又要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可能是中国民族服装发展的大趋势。那位年轻同志的做法显然是太过分了。

礼仪在各国各民族间是各不相同的，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也都在去繁琐而趋简要。而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则是礼仪中最重要核心。比如，我们中国已经去掉了跪拜之礼，用鞠躬、握手、问候代之。但是，有些人不知为什么对外国人的尊敬几乎到了跪拜的程度，而对自己的同胞却取轻慢的态度。这是可怜的。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时过这么多年，有些人不愿挺胸站立而是跪着。当然，也不是总跪着，有时在外国人面前跪着，相反却居高临下地对待自己的同胞。这种人身上既有十足的奴性，缺乏站起来的中国人的自尊，又有十足的傲骨，缺乏对自己同胞必要的尊重。两重性格、两副面孔集于一身，看上去极不协调。

在开放中，对外交往日益增多，应学会尊重四方来客，既要彬彬有礼，又要不卑不亢。对外国客人做到笑脸相迎、周到服务是完全应该的，但却不要以对自己的同胞甩冷眼为前提。

下跪是封建社会的礼仪，早已不时兴了。且跪着是很遭罪、很累的。还是站着做好。

发表于1986年8月2日《大连日报》

研究一下“劣根性”

曾祥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同样，即使是世界上伟大、优秀的民族，也会有缺点、弱点。这缺点和弱点，因是民族性之一，便被人们称之为“民族劣根性”。

我们炎黄子孙是世界上伟大、优秀的民族之一，但我们也有缺点、弱点，也有叫作“劣根性”的东西。但这“劣根性”是什么，说法却不尽相同。画家有画家的说法，作家有作家的说法。画家范曾在南开大学演讲时说，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在过去，是阿Q精神；在今天，则是妒嫉等。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李国文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是“内消耗”。何谓“内消耗”？李国文引用了一则发人深思的寓言。寓言的大意是：两个美国人赛跑，跑在后面的想的是如何凭体力、凭技术超过对方；两个英国人则是，后面的真心佩服前面的，他想，那向你献上第一束祝贺鲜花的，应该是我；两个日本人呢，后面的虽觉遗憾，但他此刻已开始想到下一步了，他要把这次竞赛做个很好的广告，搞点经济效益；两个中国人则是，枪响之后先不跑，而是扭打一处，当一个打倒了另一个时，方才慢悠悠地向领奖台跑去。两个中国人的竞争方式就叫“内消耗”。

画家与作家的说法虽然不尽相同，然而究其实质，“妒嫉”是根，“内消耗”则是此根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写到这里的时候，电台正在播送一则新闻。这则新闻说的正是“民族劣根性”，因而转述于下：一个叫白庆兰的人，因妒嫉夏敏即将升任组织部长，妒火中烧使她丧失了理智，便一连写了十封匿名信诬告夏敏有生活作风问题，使得夏敏夫妻分居并差点自杀。正当白庆兰打倒了对手准备慢慢去领奖牌之时，公安机关破获了此案。白庆兰被绳之以法，判以诬告诽谤罪，锒铛入狱。

白庆兰被判刑了。但生活中像白庆兰这样的难道还少吗？他们比白庆兰精，没有白庆兰那么傻，赤膊上阵。他们不写匿名信，不把把柄留给公安机关，而是咬耳根，说瞎话，嘁嘁喳喳，指指点点。等到被诽谤者察觉之时，已经是满城风雨了。而风源呢，却无法寻找，真是妙极！

鲁迅先生曾经非常气愤地说，他不能全力以赴地对敌作战，只能横着身子战斗，以防自己营垒里射来的冷箭。说得何等形象、何等深刻啊！

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任重而道远。在此时刻，研究一下我们民族的弱点和缺点并克服之，应该是十分有益的。否则，我们像鲁迅先生那样横着身子去战斗，两个文明的任务何时才能完成呢？如果连“嘁嘁喳喳”都克服不了，又如何谈得上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呢？

我们民族向来有同情弱者的美德，但是，却似乎缺少另一种更为高贵的美德，就是鼓励和支持弱者凭着自己的力气和本事去超过强者。嘁嘁喳喳的同情其实是腐蚀意志和社会的祸水，是“妒嫉”与“内消耗”赖以生存和传播的媒介。没有了这种媒介，诽谤者也就没有了市场，没有了土壤，就会如孤立的过街之鼠，人人喊打。到了那一天，我们民族的这种“劣根”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盼望着这一天早些来到。

发表于1986年11月2日《光明日报》

不要请个“爹”来

伍友明

笔者所录并非虚构。以其飨读者，愿共析之，共鉴之。去年，我市某单位在举办一次大型活动时，主办单位发请帖给某协会负责人。这一切都是正常和顺利的。出人意料的是，当被邀请人步出车站后，他嫌接他的车不够气派，接待人员只好临时换了辆车，才把他送到下榻的饭店。吃的特殊自不必说，住了一宿之后，他提出每天应有一两个西瓜以消炎热之暑；还提出大连既然有海水浴场，又正值炎热季节，游泳是必需的，但为了安全起见，必须有人陪游。又因他多吃了海物，难以消化吸收，便患了肠炎，住进医院。陪护自不待言，稍愈后又须有专人陪送回去。这一切费用，自然是应由邀请单位付给的。他给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无尽的烦恼。无怪乎有人气愤地说：“简直是请个‘爹’来！”

此例可能稀有，但类似情况并不少见。

现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又到了，作为旅游城市和避暑胜地的大连，又会逐渐热闹起来。这是广招游客和举办各种活动的黄金季节。敞开大门，迎接国内外游客，广交五湖四海的朋友，提供优质服务，是我们的愿望和责任。古往今来，择友而交，均无例外。只是择友的标准不同，难以胜举。但从总体上说，择友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一宽一窄。宽或窄是指范围而言，但因范围不同其结果是大不同的。在择友上，我主张还是宽一些的标准好，而且不一定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友人来只增加了解也是好的，了解是理解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朋自远方来，必利于我市。但是，对到处做“爹”的人，亦不可不稍加提防。

发表于1988年5月20日《大连晚报》

“母子观灯”与“小卡特”

吴政

也说不清是为了哪桩，我恨透了那些已经成人，却非要“缠死”父母，且自以为理所当然的儿女。在我们这个所谓崇尚孝道的古国里，越来越呈现着这样一种情形：相当一部分的儿女，他们与父母的经济联系已不是什么偶然“沾光”或顺手牵羊了，而是“投一得十”，有的简直是敲骨吸髓。更可悲的是，一些血脉不足的父母，认可苦死自己，甚而靠咸菜或清汤度日，也要把子女列为“特供”对象。他们潜移默化地娇惯孩子，遗害民族，还以为是孝忠列祖，尽职尽责！

这听起来，近似于耸人听闻。然而，如果是正视现实而不是回避现实，我们就应当承认：中国青年，包括已婚男女和做了小父母的一些人，对于他们父母的依赖程度，的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华君武的漫画“母子观灯”，尤其画中母亲对膝下小儿子的解释：“不亮灯的房子是爷爷留给你长大后住的”，决不是天方夜谭。恰恰相反，他是捉住了活生生的典型，入木三分地塑造了“中国特色”的依赖高度！它不仅深刻批判了愈演愈烈的裙带风，更把我们的依赖的延伸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是么？大凡建国以后出生的中国男女，有几个不是生下来就仰仗父母？有几个不是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婚前到婚后，离了父母之“资助”就玩不转？！特别是身为领导干部的父母们更是肩负着“连环‘承包制’”的重任：不仅要承包儿子、女儿、儿媳、女婿，还得承包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这是一种无限期的承包，惟有“蹬腿儿”了，“闭眼”了，方能中止。

如果看一看另一个世界，那情形就完全相反。前不久，美国前总统卡特之子杰夫·卡特，作为美国甘尼特报系董事会访华团成员，首次来我国有些人不知为什么访问。出于好奇，也由于工作的便利，新华社记者徐长银与“小卡特”进行了多次交谈。当徐先生问到他的经济来源时，杰夫回答：“我从来不依靠父亲，我父亲也从来不给我钱，我依靠自己的收入养活我的大家庭。”杰夫举例说：有一次他儿子耳朵出了毛病，需要动手术。手术前，必须向医院交付一大笔现金，否则就不予手术。因为是意外需要，没办法，他只好“从父亲那里借了一笔钱付给医院”。徐纳闷：“从你父亲那里借钱？”“难道你以后还给你父亲？”“小卡特”对这种发问感到奇怪，他回答说：“当

然还。”在闲聊之中，杰夫还很自然地告诉徐长银：“在美国，青年人都是靠自己奋斗，而不是依靠父母。”

请看，一个本身就是不发达的国家，却夜以继日，在赶制依赖的一代，代代的“依赖”，一个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国家，却从难从严，加紧造就自立的一代，代代的“自立”。两相对照，难怪有人后怕。长此以往，这“差距”不是要越拉越大么？而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距离的希望，不是要成为梦想么？！我们民族的脊梁正拼尽气力，在争取“小康”。即便真的把它给拼了来，下一代又将如何？

我不敢往下想。

发表于1988年9月8日《辽宁日报》

“井底葫芦”反正观

侯德云

一日到乡里搞调查，饭后茶余，被乡里的同志调侃了一下：你们这些下来搞调查的钦差级的同志，就像一个葫芦掉到水井里，从上面看，是深入下去了，但从下面看，还是浮在上面……

回到家中，吸上半盒香烟，低首沉思，良久方悟。盖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矣。推算出缘由来，免不了有点自我批评或批评的味道。这年头作自我批评或批评，好比穿长衫马褂混在比基尼堆里，扎眼得很。好在夜深人静，不妨用一枝漫画的笔，为“井底葫芦”们画出一幅活脱脱的肖像来。

凡下乡去搞调查啦研究啦之类者，自然是受领导差遣，然而领导也是无法，上级压得紧，不搞是不行的，而一搞就搞出许多“井底葫芦”来。笔者愚笨，便是其中一个。

不说别人，免生嫌疑。就拿自己来说吧，每大摇大摆下得乡下，必多方探究，发丹田之气，睁炯炯之目，多方位多角度立体交叉探究“先进事迹典型经验”等，闻风而笔动，飒飒有声，勤奋之，努力之，变着法儿让秃笔生花，迸发出甲乙丙丁一三四 A B C D，洋洋乎洒洒乎堪称牛皮大观。复印之，打印之，呈报之，让领导在百忙中批一“阅”字，便翘首挺胸，大功告成。倘是精明的，如“葫芦兄弟”那般聪明，便会把副本寄将出去，投给报社，反正邮费用的是公款。一旦发表，便更是了得，又出了名，又赚稿费，又讨领导欢心，又有可能加官晋级，一举若干得，于是乎整天价乐于此道而忘忧，这样一来，实实在在没有想到自己本是个“井底葫芦”，不幸如我者。

醒悟以后，想抖一下胆子反戈一击，借来武二爷的哨棒，横扫天下之“葫芦”。忽然，第七感官发来警告：这可万万使不得。假如打碎了“葫芦”，换成“铁砧”，一旦沉了下去，发现存在着问题甲乙丙丁一三四 A B C D，捅将出来，便如何是好？要知道谁也不愿意把脖子后面的灰扑给别人看，而相反，只要别人看不见，自己便觉得很干净、很自得。更何况，一旦露得太多，惹人大怒，曰：尔等小辈竟敢否认我方大好形势，左右，拿下！若陷入这般境地，“铁砧”们怎生逃脱？

要是目前的风气不变，我相信，怕是读者诸君也相信：“葫芦”依旧是“葫芦”，“铁砧”也会变成“葫芦”。

发表于1989年第8期《党风月报》

气球·风筝·奠基石及其他

方洁

据报载，几乎是《毛选》新版本出版的同时，《毛选》的注释本就出版了。广告中还特别说明，新注释本是由参加《毛选》新版本编选的几位专家参与注释的。细心的读者却发现，新注释本中的有些注释竟是根据原版本进行的；还发现所谓专家参与注释云云，原来是借用专家的知名度以扩大注释本销量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一现象，即借用名家的知名度或借用奖牌以抬高自身价值的现象在生活中是时有发现的。

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开工典礼之类的仪式中，为了造成热烈气氛放气球、放鞭炮是一样的，只热闹于一时，转瞬即逝。惟有那块埋在土里的奠基石能存之永久。还使我想起了春秋两季放风筝游戏。风筝凭借风力可直上青云。待风停之时，再好的风筝也还是要落地的。它的娱乐消遣功能是有的，也仅此而已。目前，放气球、放风筝的人越来越多了，可能与商品大潮中出现的浮夸之风有密切关系。一些假冒伪劣商品之所以能欺骗顾客于一时，是虚假的广告宣传的结果，而终究能赢得顾客的商品是靠其质量和信誉。于是，某人唱红了一首歌，便自诩或被吹捧为歌星；某人说红了一个段子，便被冠以笑星；某人写了一篇小说或几首小诗，便被请上作家、诗人的宝座。在吹捧之风面前，当事人也迅速膨胀起来。还有的人获了一项奖，而且有些评奖也是极廉价的，就觉得生活赐给他一块记功碑，功德无量，自我欣赏起来，也要求别人顶礼膜拜。这小石碑不是成为登上新台阶的踏脚石而是成了继续前进的绊脚石。这些到头来都如流星一样，只闪耀一下，便永远地消失了。

知名度与虚名度仅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通过长期积累拼搏，以真知灼见、真才实学获得的，知名度是社会对一个学者劳动成果的公正评价和应有赞誉，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后者是人工造起的沙塔，或用虚假手段立起的记功碑，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古往今来，有许多人费尽心机，假造虚名，结果也只能鼓噪于一时，最终都成了泡影。惟有那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靠心血和汗水浇灌的花果才是丰硕的。历史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给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人以应有的荣誉和公正评价，给造虚名者以冷嘲和热讽。历史又是一个大筛子，筛尽杂石，留下金沙。是金子一定闪光。但闪光的却不都是金子。图虚名者只能膨胀于浮夸的环境中，而务实者才能经得起大浪淘沙。这是生活的辩证法。最无情却实在。

发表于1991年9月21日《大连日报》

关于举办“狗尾巴花”节的补充通知

吴政

记者在某省一县政府办公室见一红头文件，反复阅之，发现内涵丰富，特全文录下：

全县各直属企事业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驻军、企业及本县所属村屯：
早在去年冬季，县里已下达过举办“狗尾巴花”节的通知和附件。为进一步提高认识，把“狗尾巴花”节的各项活动落到实处，经县两委班子今年第99次扩大会议研究，特做如下补充通知：

一、关于举办“狗尾巴花”节活动的重大意义的问题

据我县聘请的考古专家及植物学者反复论证，“狗尾巴花”的发源地即在本县红石乡苟家村，原通知中关于该花系国外引进的说法乃是误传。实际情况是，早在唐玄宗年代，（即杨贵妃时期）就有了这种状似狗尾巴的野花，经文人墨客的切磋，由白居易拍板，此花才命为“狗尾巴花”。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又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因此，举办这一盛大的节日活动，就不仅仅具有经贸的意义，扩大我县知名度的意义，更有弘扬民族古文化，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深远影响。

二、关于吸收外地办节经验、教训的问题

据“县‘狗尾巴花’节筹备办公室”主办的《筹节周报》透露，无论是V县的“山楂节”、D县的“豆腐节”，还是A县的“歪把子梨节”都有许多可供我县借鉴的东西。

1. 狠抓“信息”

所谓狠抓信息，说到底就是狠抓关系，狠抓关系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克服民族的劣根性——内心深处的自卑心理，把什么“我们是‘提格’仅一年的小县”等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县里的方针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为了把所有的关系都弄明白，要求县情调查队立即把“海外关系和关系的关系”调查表发下去，要通过县报、县广播站的宣传，使这一消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就是初中甚至小学生也要个个知道。A县的“歪把子梨节”之所以会请来美国和德国的两位老板，即得益于学生的提示。）

2. 狠抓“明星”

这是吸引国内外来宾，尤其是国内来宾的关键。事实证明，多数县级国际性节日，有一两个，三五个外宾即可，主要还是要靠国内各省市来宾撑架。D县国际“豆腐节”失败就失败在这里。据该县一份“内参”披露，他们的陈家乡原本是能够请来赵本山的（这个乡有一女子乃赵本山前妻同学的妹妹的姑姑），由于动作迟缓，邀请“撞车”，致使赵先生未能驾到。结果，D县只请来一位越南外宾、五位外省内宾。我县目前虽然尚未找到与赵确有瓜葛的人选，但是二中已有一位与黄宏有深交的教师，王家乡供销社马主任又与京剧艺术家马长礼沾亲（马长礼系原装刁德一）。我们深信，只要真正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就决不会酿成“豆腐节”的悲剧。

3. 关于全部活动经费来源的问题

经县财政局匡算，这次节日活动所需经费约在三百万元左右。如各单位，尤其企业能从政治角度出发算大账，懂得“丢了我县的人就等于丢了全市的人，丢了全市的人无疑就是丢了中国人的人”，不仅资金问题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问题都将不成为问题。正如有人所说，“只要县钢厂、县轴承厂和县拖拉机厂这三个支柱企业肯于‘献血’，县水果站及各村、屯砖瓦厂能敲敲‘边鼓’，加上群众自愿捐款，就是两个‘狗尾巴花’节也花不了。”

各主要单位必须承担金额的详细数字，见附表。

节后本县拟召开表奖大会，隆重表奖贡献突出的企事业单位。届时市电视台记者将前来录像。

中共××县委员会

××县人民政府

1991年5月20日

韦驮上增天王书

赵延德

天王殿下：

臣韦驮，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素不容为非之辈、不平之事，故令人妖鬼怪皆惧三分。想当年世尊涅槃，火化时一“捷疾鬼”贼胆包天，居然暗窃佛牙而去。虽说此事与臣无甚干系，完全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但臣想，倘放纵恶鬼作歹，势必天下难得宁日。于是，臣挺身而出，穷力殚精，终于生擒该恶鬼，追回佛牙。这等事，除非臣未有所闻所睹，否则金刚杵下绝不留情。故此，臣才有幸承蒙天王恩泽，位居四方三十二神将之首。

自唐初以来，臣即被置于寺院之中，一身武将装束，倒也颇为威风，虽然位居弥勒像之后，游人香客却也是焚香叩头不分彼此的。想来，扬善抑恶，天上人间同一理也。

然而，世事沧桑，尽管敬臣而效仿者代不乏人，如包拯、海瑞等，名扬千秋，懿行流芳，然而，观其一生也是多有坎坷与风险。后来如臣者，因“眼里留不住沙子”“得饶人处不饶人”，不少都吃尽了“眼前亏”或穿上了“小号鞋”。于是，原本“直肠子”的变得“弯弯”起来，棱角毕露的学会了藏锋匿芒，日渐圆滑与玲珑了。如今，来殿观瞻臣像的各路香客似乎热情不足，冷漠有余。臣前日稀的香火便是明证。

与臣同居一殿的弥勒兄，近年来却名声鼎沸，备受青睐。这倒不是因为他占居着殿中的“地利”优势，也不只是由于他的敞怀腆腹、笑容可掬与臣的怒目圆瞪、满面冷峻形成强烈的反差，而是因了他那套“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的“处世经”，为人所膜拜。一些人不独铭之于座右，且将这一理论“活用于实践，进而有所发展与创新。譬如，明明见到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贪污受贿种种不正之风，如果是上级，则笃信“胳膊扭不过大腿”而见怪不怪；倘若是同事，又会奉行“多个朋友多条路”而熟视无睹；假使是部属，就来个“打一巴掌揉半天”，口念“下不为例”之类送上一堆人情。再如，睁眼遇到有碍公益、损伤文明的人与事，一些人就会“曲径通幽”，绕道而行。倘有挺身而出者，每每会被人认为“六个指头挠痒痒”。凡受此“处世经”影响者，皆热衷于“栽花”，“栽刺”则躲之惟恐不及。

说来也怪，“弥勒经”及由此派生的种种奇论，常为其信徒开通人生之路，使之远比恪守原则者活得潇洒与风流。如升迁、评先、晋级等，人家自有一片“人缘好”的呼

声，从而会于“民意测验”中一“○”通过。而那些“死心眼”的较真人，则极难成为众人推崇的“香饽饽”。

虽说“容人是美德”，可如此“容”法，臣委实不敢苟同。作为护法神将，臣一向不容邪恶，不甘随波，故疾书陈情，聊表衷肠，敬请天王明察，以辨其良莠、分其皂白，臣无憾矣！

臣韦驮拜上

发表于1992年6月4日《大连日报》

水清也有鱼

曾祥明

读过一篇文章，内容是提倡一点儿“朦胧美”，说是凡事不必过分认真和硬要去追求透明，该糊涂时不妨糊涂，因为“水至清而无鱼”。

这理论是有市场的，有的地方招工搞了考试，却不公布分数；搞评选，公开投票，却不公布票数；发“红包”，不让打听数额。

真的“水至清而无鱼”么？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段文字不仅说明了水至清而有鱼，而且还说明了水之至清景色十分迷人。

“凡景语皆情语”。柳宗元的这段文字，难道不正是至清之景深深地打动了作者的心，使得他情不能自己，才写出了这段“情语”么？我想，不仅是文学家，凡有爱美之心的人处于这种至清至洁至美至圣的透明景色的氛围里，都会将自己的感情净化。入洁室脱鞋，入幽境敛声，新沐者弹冠，新浴者振衣，“鸢飞戾天，望峰息心”，皆环境而使然。

如果说朦胧也是一种美的话，那么这种朦胧须靠近透明；倘若近于浑浊，它还美么？如果把“水至清而无鱼”理解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纯，这是有道理的，但如以此作为谋私的借口，那就不可取了。

发表于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

流行性扁豆症

赵延德

我体察此症，自觉不及华老君武先生对种种“疑难杂症”的研究那么深刻，却不乏“典型意义”，故笔录在此，以俟方家明诊。

几年前，一位朋友向所在单位领导口头申请，欲包买单位一方“领地”及设备，“拉杆子跑单帮”，即眼下已流行的“私营”。领导一听，似闻现代“天方夜谭”，不禁火上脑门：“国营”鼻子底下干“私营”，哪来的“精神”？这位貌似“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词严义正”一番尚且不算完事，还暗差人马查访其人之“来路”与“背景”，诸如“曾受何人指使”“一贯表现如何”“此番用心何在”等等，就差“洒家与你大堂上见”了。

如此一桩极为平常的“请示”事件，又本是“胳膊与大腿的较量”，但在这位头头眼里，其“性质”之严重却不亚于当年广岛上落下了原子弹，真是可笑又可叹。

于是，我想起一则美丽的童话：古代有一王子，成年却未娶，其母为此日夜焦虑。某日，一少女来宫中避雨借宿。王后见其花容月貌，遂发娶媳之念，可又担心其出身卑微，有违王室祖规。聪明的王后急中生智——命宫人为少女铺上二十床锦褥，并于最底层置一小小的扁豆，以此验证其有无大家闺秀的“高贵皮肤”。是夜，少女躺在床上，居然感到扁豆硌身，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王后闻讯窃喜，遂郑重施礼，娶之为媳。后经核实，该女确系邻国的一位公主。

我们一些朋友的“皮肤”或许不那么“高贵”，但那上面的“神经”，其敏感性并不亚于这位高贵的公主，凡有“刺激”，哪怕来自于比“扁豆”小得多的“芝麻”，也会深感不安的。你看，一个不愿与你“合伙”而意欲“单挑”的申请，便搞得有人如芒在背，惶遽莫名，那神经不是脆弱得可以吗？于世间新人、时代新事，不摸“精神”，未见“条文”，闻之则脑涨，睹之则心颤，昼坐而难宁，夜寝而不安，此症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扁豆症”吧。倘按以现代医学，似可诠释为“神经过敏”。不过，医家确认的“神经过敏”尚未发现流行病例，“扁豆症”则酷似“流感”，一段时间，一地一隅，倘有发生，便有一批人感染：人人谨小慎微，个个畏首畏尾。所以，此症全称可谓之“流行性扁豆症”。

此症的历史溯源，似可归结于祖训的“慎言”、“慎行”之类。但昔时那些祖训的奉行者们，又似乎并不都像当今的“流行性扁豆症”患者那样，个个一副“欲出言而噤，欲投足而颤栗”的心态。譬如，通俗歌曲来了，仿佛昔日“孟姜女哭倒长城”的神话就要变成“歌子唱倒江山”的现实；王子裤、迷你裙、舞厅、酒吧来了，好像大禹治水时代“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危险又迫在眉睫；引进洋人的技术与管理，甚至划出一方土地，任其“独往独来”，又似乎要重演当年“鬼子进村”的惨剧……于是乎，这一颗颗“扁豆”的刺激，不仅使某些人偶感“彻夜未眠”之苦，且会并发类似“神经性颠狂”的症候：我们是姓“社”还是姓“资”？所以，“扁豆症”患者其言行必跟“精神”，甚至惟“本本”是从。他想搞股票，就找到当年马克思“炒股”的轶闻——这便是孩童无计可施时惯用的“俺爸说的”那一招，委实唬不着人的。马克思未说过的、未干过的事情太多太多，难道我们就永远不能说、永远不能干了吗？

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既然我们要“走前人未走过的路”，要“干前人未干过的事”，就不能受“扁豆症”的困扰，更不能让它“流行”下去。

一个民族的反思

——读《夏令营中的较量》

刘长恒

由日本福冈一个团体发起组织了七十七名日本孩子于1992年暑期来中国同三十名中国孩子在内蒙草原联合举办了一次探险夏令营活动。这次活动，本来是要对这些孩子进行生存能力、磨砺意志、保护环境、公德意识方面的教育的；然而，经过实地检验，中国孩子交了不及格的答卷。日本孩子在野营拉练的路上，即使病了，也能硬挺着走到底；中国孩子稍有不妥，便“泪如滚珠”，被送回大本营躺倒调养。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后，日本孩子依然精神抖擞，吼声在草原上空震荡；而中国孩子两天来在进军途中的全部表现，却只能在人们的心头压上沉甸甸的问号。难怪在场的日本人公开得出“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的结论。

日本人通过中华民族中亿万分之一二的三十名孩子短短几天的表现，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此，我们无需乎反唇相讥或提出抗议，因为日本人的评语虽然恼人，却不能不承认它的可信度。我倒是赞成《夏令营中的较量》的作者的基本态度——承认事实，并把问题引向深入：在七十七名日本孩子身后，他感到“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同样，在三十名中国孩子的身后，作者也使我们感到，站着的是我们的家长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这样，就推动我国社会的每一成员都需作一番反思自省——形成一个民族的反思。

不错，中国孩子，特别是“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又白又胖”的独生子女，确实太娇气，太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了。“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打孩子们的屁股吗？显然，谁都不会把责任往一群11~16岁孩子身上一推了事。打家长们的屁股吗？好像很应该，因为日本的一位身任市议员的爷爷，在看望两国的孩子时，发现自己孙子正在发高烧，许多人以为他会把孙子接走，谁知，他只鼓励孙子几句，便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而我们的一位少工委的干部，只因有一段道路被洪水冲垮，便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而去了。这样的家长，怎能培养孩子的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呢？这虽是一位家长所为，但在当今中国的学生家长当中不能说颇

有代表性；因此，作者向全社会和整个民族提出这次夏令营暴露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便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培养方式、培养途径一类的问题上，无可避免，会有不同的见解，这是可进行探讨和不断深化的。但在最重要的培养目标问题上，我们好像比许多国家都更清醒更正确。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就提出过明确的有关培养什么样人的教育方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我国的教育方针、指导思想、培养目标等，也反反复复提出了不少——一个“提高”：教育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两个“必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四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看这“一、两、三、四、五”，哪一条不涉及培养目标？哪一条不在强调培养跨世纪的合格人才？能说我们的培养目标不明确吗？

那么，我们的毛病主要出在哪里呢？首先需反思的是什么问题呢？我看，主要应反思的是，在我们中间常把讲“言不由衷”的话和干“言行不一”的事看作“小菜一碟”，不以为意，以致使孩子们耳濡目染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不是吗？——在中国，“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承办或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结果，中方的孩子在中国的土地，在草原英雄小妹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草原上参与这次活动的还不及渡海东来的日本孩子的半数，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却比人家多得多。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这类台上讲的是一套，台下做的是另一套的事情难道还少吗？“老三篇天天读”那阵子的事，且不去说它；就拿中国现代的孩子亲眼目睹、切身感受的事实来说吧，该有多少人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而实际却是“无利不起早，有利盼鸡啼”。虽然也讲“学雷锋”，但“雷锋三月来，四月走”，成了比较普遍的现象。嘴上说，教育如何如何重要，然而，包括一些乡村在内，不惜“一支烟，三两油；一桌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着一座楼”，却不愿向教育作像样的投入，有的甚至连教师养家糊口的工资也常常拖欠。嘴上说“教师光荣”，而实际上，一些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的子女避开中小学教师岗位惟恐不远。有些学校一边在喊“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一边在层层加码，加重负担；一边在喊“不要滥收费”，一边频频向家长伸手；一边在喊“全面发展”，一边在搞智育第一，升学惟先。很多地区一边任凭市场广告叫卖声高，另一边是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于市。……面对着这类“敏于言而‘懦’于行”的大量事实，在这些参与夏令营活动的孩子看来，即便在开营的誓师会上信誓旦旦，大表决心，而当遇到艰难险阻，来个“知难而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豪言壮语，可以掷地

有声，但那是在会上表态用的；遇到困难，就是当个“逃兵”，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全球在竞争”，竞争，既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它相信的只能是“言必信，行必果”。凡是真正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人，都有责任使我们的孩子从“巧言令色”、弄虚作假的氛围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在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中茁壮成长。而要做到这一点，任你怨天尤人或自怨自艾或摇头晃脑、自叹弗如都是于事无补的；迫切需要的是我们全民族进行反思和所有学校，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坐而言”何如“立而行”，为了“救救孩子”，迫切需要做到“心口如一”“表里一致”；再也不要做潜伏着巨大危险的“厝火积薪”一类的傻事了，再也不要矜矜然摇唇鼓舌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了。

发表于1994年《大连教育》

我们是“害虫”

侯德云

我们把一些昆虫叫害虫，把一些鸟叫害鸟，把一些兽叫害兽，因为它们有害。虽然这个“害”，充其量是它们为了生计，吃了些应该由我们消受的粮食、蔬菜、水果以及肉类等等。我们常常是一面欣赏赞美蝴蝶的翩翩起舞，一面咬牙切齿地诅咒它们的童年，并想方设法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这足以说明我们的霸道程度。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以自己的好恶给万物归类。

庄子在《齐物论》中有一段论述，用现在的话说，大致是这么个意思：“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疼、麻木，泥鳅偏偏喜欢潮湿；人爬上高树，会有恐惧感，猴子却没有；西施、王媪是人间公认的大美人，别的动物却无同感，鸟、鱼、鹿见了她们会被吓得四处逃散。为什么一定要用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学标准来统治万物呢？”

庄子的这一思考，虽不被后人所看重，但绝不是毫无意义。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世间万物——以植物的眼光，以动物的眼光，或以地球的眼光，那一切都会成为另外一种样子。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换到哪个角度，人类都将被称作“害虫”！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我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其他动物和植物的伤害，没有停止过对地球的伤害。这种伤害愈演愈烈，如今，已经到了怵目惊心的地步。

我们把无数动植物放进油锅，烹调出所谓的饮食文化。难怪有人感叹，那些印刷精美的菜谱，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犯罪全书。我们无情地把飞禽走兽拘禁到动物园里，还成群结队地去观赏，把欢乐建立在它们的痛苦之上。我们砍伐森林，污染河流，使千年之前被杜甫讴歌过的“好雨”变成酸雨，并使地球上每天都有二十七种物种灭绝。我们做了这一切，还要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许许多多的理由中，喊得最响的一条是“发展经济”。我忍不住要问一句，我们在地球上胡作非为，如果连生存的前提都弄丢了，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

老庄顺应自然的思想，陶渊明心中的世外桃源，都已经随风飘散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种情形，早已成为记忆中的片断。现在的青山见“我”，应是“多丑恶”，这样才更合情合理些。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忧虑地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危险的世纪，标志之一，便是“生态环境恶化”。实际上，这已不再是预言，而是我们眼前活生生的现实。

作家毛志成写过一篇有关环境问题的长文，标题是：“人类还能活多久？”这无疑又是一个“天问”。从目前的情况看，地球正在以耕地的沙化、干旱、洪水等手段来报复人类，假如我们执迷不悟，不主动跟地球“讲和”，总有一天，我们这些危害地球的“害虫”，会在地球上绝迹。

五十年前，人们将爱因斯坦的一封致五千年后人类的信，装入金属盒埋进地下。科学家们估计，到那时候，把信从地下挖出来的，很可能是老鼠。

发表于1996年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

随笔二则

马明捷

东京荧屏上的大连

访日期间，工作虽忙，睡前也想看会儿电视。有一天，我又随便选了个频道，见正播着一个类似中国电视《世界各地》的专题片，我平常就爱看这类节目，听不懂解说词也没关系，于是再没动手中的遥控器。

有了亚洲和澳洲的几个国家的风光之后，荧屏映出了一座城市中的广场，先看到的是大面积的草地、群鸽在绿草间觅食，儿童在广场上嬉戏。熙熙攘攘的行人衣着称不上华丽却也绝不落伍，脸上都很安详、闲适。虽听不懂解说词，但这个地方我好熟悉，特像大连的中山广场。刹时，广场中心的汉白玉坛，广场周边的中国银行、人民文化俱乐部、大连宾馆、省外贸厅，广场附近的富丽华大酒店、万达大厦……也都出现在荧屏上，紧接着又是夜景，广场上华灯齐放，周边是霓虹灯光的彩色世界，汉白玉坛上有小型演出，广场上人比白天多……我的心抖动了，后边播哪个国家也不看了，我想喊：这是中国，是大连的中山广场！

连，我生长了半个多世纪的城市，中山广场，消磨了我无数时光的广场，今天竟然以如此美丽，如此壮观的姿容出现在异国的电视荧屏上，一股豪气从心底腾起。虽然我看不出是不是日本电视部门制作的，但新大连、新中山广场在日本电视中播出了，我激情满怀，我想立即和国内的家人、朋友通话，告诉他们咱们大连中山广场在日本的电视荧屏上面多么漂亮，多么生机盎然，半点儿也不比别的国家差，大连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成绩是多么值得骄傲！当然也忘不了告诉他们，草坪上的废塑料袋和广场上垃圾桶旁边的烟蒂也出现在电视上，在日本可看不到这个。

发表于1996年12月9日《大连广播电视报》

等待那一时刻

近一年来，我每晚必看的电视节目是中央电视台的《香港百年》，主持人那句“距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天”，每听一次我的心都颤抖一次，阴云散尽，阳光普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953年，我上小学六年级，一位满口山东话的姓周的老师教我们历史课。讲到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国政府强迫清朝廷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时，周老师说：“从此，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再也不是完整的了！”全班同学都看见两行眼泪从他脸上滚落下来，教室里寂然无声。四十四年过去了，我从未忘记这堂历史课。

1990年，我随大连京剧团赴香港，在北角新光戏院演出。虽然办了出境手续才来到这土地上，但是，半个月的演出，我感觉和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没什么不同，全是自己的同胞坐在台下，听“西皮”“二黄”鼓掌、叫好儿。演出之外，接触的也都是中国人，只不过说广东话的多一些罢了，因此心情甚好。

结束演出后，在九龙火车站等车回大连时，我和杨赤拍了一张照片。回家冲洗出来一看，甬提心里有多么懊丧、恼火了，原来一面英国米字旗当正正地插在火车站楼顶，就飘在我的头上，它提醒我，这块生活着我的六百万同胞的土地至今还被人家统治着，这里仍不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不过，不久我又释然了，因为中英联合声明毕竟签过了，香港毕竟已经进入了过渡期了。米字旗，在这块土地上还能飘扬多久？

又是七年过去了，1997年终于到来，我平心静气地等待，等待1997年7月1日零时那一刻。每晚准时收看《香港百年》，听主持人那句“距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天”。等到米字旗悄然落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港岛、九龙等地的上空猎猎升起，永远飘扬在中国人头上的时候，我再去把在九龙火车站拍的那张照片放大，留给后代，让他们记住，在中国的这部分领土上，人家的国旗飘了一百五十多年。

发表于1997年4月24日《大连广播电视报》

词人莫要学“牛哥”

余音

今年《词刊》第二期上，发表了相声演员牛群的三首词作，几位词友读后，连连摇头。有人戏言：词坛又多了几首“此致敬礼”式的作品。或许是牛哥在相声疲软之际，有了多余精力，偶来灵感，写了几首游戏文字。他姑且写之，编辑姑且发之，读者姑且一读了之，本不必当回事。然而，词作一发，就有人在《音乐周报》上撰文，评论其为“沁人心肺的清新之作”，并“奉劝词人学牛哥”，这就有叫真的必要了。词无达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常有的事。但是，作为文艺作品，在衡量其价值高低、品位雅俗时，是有艺术尺度的。就牛哥的三首词作来看，不要说其立意之浅、角度之旧、意境之差，令人遗憾；单就其语言之贫乏、直白、俗套，就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以评论者十分欣赏的《同志哥》为例，其中“一声同志哥 什么也不说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吃多少苦都不多”，那“什么也不说”与军营歌曲《什么也不说》，那“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与港台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竟一字不差。如此东拼西凑的“打油诗”、“顺口溜”，却被捧为“有血有肉，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散发着生活的浓香”，读完评论，怎不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由此，我想到当前的评论界。一些评论刊物没人看，评论文章没有权威性，评论家不被人当回事，这种现象原因何在？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评论家们跟着明星转，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试想，歌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导，导而优则编、则摄影、则书法……则写歌词。全面发展，总有钱赚。明星们在文艺“圈子”里混久了，总会有一些社会各界的朋友，总能得到一些关照，总能发表一些“作品”，以展示其才，满足表现欲。明星们偶尔玩玩，虽然滑稽，也无伤大雅。但是，如果评论家们却咬着不放，妙笔生花，“爆炒”一番，作为被捧明星就可能飘飘然，受误导而不务正业；作为读者或观众，则会为如此“多财”的明星而感到可悲可叹，为如此胡吹乱捧的评论而感到可气可恼。奉劝牛哥们还是为振兴疲软的相声艺术多下些工夫吧。也奉劝评论家们自尊自爱，谨慎为文。更奉劝词人们不要向牛哥学习，粗制滥造“此致敬礼”式的作品，免得败坏了大家胃口。

发表于《歌词月报》1996年第6期

历史不是“情场厮杀”

余音

前不久，一位历史教师在讲授秦汉时期历史时，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刘邦为什么欲置项羽于死地？一学生回答：因为他怕项羽抢了自己的老婆。此言一出，引起哄堂大笑。教师不解地问：哪本历史书上是怎么写的？学生答：《西楚霸王》就是这么演的。这部电影在国际上还得了奖呢。教师无话可说，心里只是苦笑：以后，这历史还怎么教？据报道，《西楚霸王》在筹拍时，导演对如何招徕观众心中无底，便去请教另一位大导演，并得到“从情字入手”的真传。于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战场角逐，变成了项、刘二人的“情场厮杀”。不懂中国历史的外国评委看得热闹，给了这部影片一些大奖；作为龙的传人，眼见自己的历史被歪曲，心里是啥滋味？遗憾的是，歪曲中国历史，已经成为许多影视剧获得高额票房收入的一大“法宝”。最近，又一部在国内即将公映、已被外国人看好的电影《秦颂》，在历史上又作了“大胆突破”。这部电影不仅把秦始皇与高渐离的关系演绎得稀奇古怪，而且，还要让高渐离为了报复秦始皇的暴政，去强奸他的女儿栎阳公主，并意外地产生了生理奇迹：长年瘫痪的栎阳公主被强奸后，不仅欣喜若狂，而且治好了病，能够健步如飞……时至今日，背叛、篡改乃至歪曲历史，乱伦、性虐待、窝里斗，已经成为部分影视编导的“拿手戏”。这么肆无忌惮地进行“大制作”，用不了多少时间，中国的历史将被糟蹋殆尽。到那时，我们还能找到一段让子孙们引以为自豪的“干净”的中国史吗？应该说，文学与历史不是一回事。但是，作为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却不能脱离历史去胡编乱造，只能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地夸张，合理地虚构。比如，《三国演义》就是在《三国志》的基础上适当夸张、合理虚构而成的。其中《空城计》一段，据考证，并非诸葛亮的事迹，但罗贯中为了塑造智勇过人的诸葛亮的光辉形象，便对历史史实进行了移植，这么一来，既遵循了历史规律，又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在谈到夸张和虚构的关系时，鲁迅先生曾有精彩的一段论述，他说：如果说“燕山雪花大如席”，那是夸张；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是凭空虚构了。而当前的一些影视剧，对待历史则完全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凭空虚构”的态度。北大一位中文系教授，曾与一位国内著名导演交谈，那位导演反复强调自己不懂那一段历史，而且也不愿研究，他拍电影完全是凭当时的感觉，那瞬间感觉到的“历史”，就是电影要表达的主题。不懂历史，又不去研究历

史，却要再现那段历史，不靠胡编乱造靠什么？歪曲历史，说到底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这种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正直的中华儿女的鄙视和揭露。著名导演吴天明就拍案而起，批评过去一些拿到国际上去评奖的电影，是把中国传统中的阴暗面加以无限夸张，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些华侨也时常为外国人看中国电影后误以为中国历史是“乱伦史”“性虐待史”“窝里斗史”而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并呼吁影视剧的编导们尊重悠久、灿烂的中国文明，不要糟蹋自己国家的声誉，往自己祖先的脸上抹黑。歪曲历史现象，在影视剧乃至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都严重地存在着。日前，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复旦大学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最近看了国内一本传记文学《华罗庚传》，不忍卒读。对于华罗庚，我是了解的。作者坐在家里乱写，那怎么行呢？”为了向历史、也向子孙万代负责，我们大声疾呼：影视剧的编导们，文学家们，请不要再糟蹋历史！

发表于1996年6月26日《光明日报》

猫头鹰的叫声

常珩

猫头鹰的叫声“响亮而凄厉”，以致至今仍有人把听到它那难听的叫声当作不祥之兆，认为遇上了晦气。可是，稍有常识的人也都知道猫头鹰叫声虽然难听，而它本身却是难得的益鸟，它善于捕捉野鼠，尤其在繁殖期间，其捕鼠数目相当惊人。有的书上介绍，在擅长捕鼠发挥益鸟作用方面，它的声音还真起作用，“它那可怕的声音足以把猎物吓呆，使之束手就擒”。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宁愿鼠害横行也不愿听它那“可怕的声音”而盼它绝迹呢，还是甘愿听它那“可怕的声音”更盼它横扫鼠害、造福桑梓而发挥益鸟作用呢？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到底选择哪一种？在正常人或有点科学头脑的人看来，一般都会持后一种态度。不仅不盼它绝迹，而且希望它生息繁衍下去，并认为保护益鸟是作为公民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对待猫头鹰，人们还有容忍其刺耳声音的雅量；但是对有人常提意见，包括那些对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大有裨益的意见则觉得逆耳，以至由紧皱眉头，到“怒从心头起”，终而“恶向胆边生”，进而视提意见者为眼中钉；“左祸”泛滥时，不整他个死去活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或某一时期，时有所闻，数见不鲜，因而也使很多人学得“乖巧”了，把“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这句俗语当作个人生活的信条和教育子孙的家训。

不敢坦荡直言而千方百计做得“乖巧”的人当中是有所区分的：一种人本来就是惯于投机取巧的宵小之徒，他长于察颜观色、见风使舵、上蹿下跳、钻营奔走。尤其对那些有权有势能主宰个人升迁降贬的人，更是低首下心，声音柔和悦耳，或做胁肩谄笑的丑态，或做一本正经的伪装，或做“谄泪在脸，遇便则流”的可怜相，只要对方舒服，只要对己有利，什么原则，什么公道，什么人格，就连“国事”也可“管他娘”。另一种人原本也曾不失为“益鸟”，后来见得“多”了，识得“广”了，眼见出头的鸟遭枪打，出头的椽子先烂掉，或者自己也曾被鹰啄过眼，便也学会“乖巧”起来，特别是当他对上有所求时，或出于某种需要或迫于某种形势，在是非曲直面前已然失衡；为投上峰之所好，乃发违心之议论，一切以确保自身为依归。久而久之，良知泯灭，成了缩头缩脑、遇事绕道走的庸碌之辈。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假若人人争相效尤，猫头鹰的

声音必将喑哑，“益鸟”也将无法生存。“莫我肯顾”“莫我肯德”“莫我肯劳”的硕鼠横行之时，也恰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之日；到那时又怎能有“乐土”“乐国”和“乐郊”可以适往呢！

大要“乖巧”的人能得逞，说来说去主要还是取决于那些能左右某些人的升迁降贬的人是否保持头脑的清醒，不为所动。如果这些人硬是不买账，一任他能吹、善抬、能捧、善拍，叫他枉费心机，无从施其伎，溜须拍马的“英雄”们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为政掌权者应该深刻记取前人在这方面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和所得出的普遍性结论：

1. 高度警惕吹捧。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告诫人们“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事实恰是如此，从古到今除了诸葛亮骂死王朗——那是王朗罪有应得，合该骂死，当不属“乱骂”之列而外，被“乱骂”致死者确属寥寥；倒是被捧得晕忽忽、轻飘飘，终而至于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结果翻船落水者却颇不乏人。俗云：“嘴甜心苦”，巧舌如簧实际是坑人的陷阱。

2. 分清远近亲疏。诸葛亮劝诫皇室“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把“亲”什么样的人“远”什么样的人看作一个朝代兴衰之所系，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常说“谄佞之徒”，可见“谄媚”与“奸佞”有着不解之缘。自古以来，既没听说有阿谀逢迎的“贤臣”，更没听说有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的“小人”。

3. 从谏从善如流。“闻过则喜”并奖赏有加，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里就提及齐威王下过这样的明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显示出多么大的气魄，多么强的信心！能真正做到“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悛”，人民只会更加凝聚，国势自会日益增强。“此所谓战胜于朝廷”。由此看来，请不要计较猫头鹰的叫声如何刺耳和“贤臣”的忠言如何逆耳吧；经常听一听起警戒、激奋作用的声音，进而能“过则勿惮改”，则自然会从刺耳或逆耳的声音里深感“益鸟”和忠言之可贵了。

那是你家的东西

王健

显然，方程的到来就是为了使人难受。

办公室的人以为来了个新人，死气沉沉的气氛会被打破，谁知方程不但不谈物价，不骂腐败，不讲艾滋病，不与人闲扯唠嗑，反而以噎人为乐趣。当然，方程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只对那些成功和喜悦的话题怀有嫉恨。当有人被小偷掏去了二十元钱，骂骂吵吵时，方程便口气温和地说：“我当你被掏五十元哩，想开点。”

杨某的儿子考上大学已被炒得人人皆知。杨某在一家酒楼宴请一桌，方程初来乍到，有幸被邀。酒桌上，觥筹交错之中，是一片对杨某儿子的赞美声。方程却冷不防说：“如果你儿子再努力一点，考上上海交大那有多好。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在那里任教，人家那教学质量，高！”杨某真想把翻着白花的鱼汤泼向方程。

老张是个愿把家里事在办公室里张扬的人。上班后不久，就向众人宣布：“我老伴又出国了，考察，半个月，法兰克福。”

“我当是纽约、巴黎呢？到那样的地方该有多好。”方程说完就走进卫生间。老张一整天阴着脸，闷闷不乐。

青年人楚新谈了一位姑娘，绝对标致，在办公室招摇了一阵子，众人无不嫉羨楚的艳福。方程则惋惜地摇摇头：“她的个子要是再稍高两厘米，裙子下摆再宽一点，效果更好。”楚的好心情一落千丈。

人们恨透了方程，恨不能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

当然啦，好消息依然要按捺不住地张扬，关键是别被方程抹杀。于是，人们也学精了，在宣布好消息前，先给方程设一圈套。

你说，方程，时下什么品牌的音响最好？

当然是“索尼”了，欧美人最认。

你真有眼力，我们家新买了一台“索尼”，呱呱叫。

方程一时语塞，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谈话方式被打破，难受得憋红了脸。

方程，你说，咱们国家哪所大学顶尖？

当然是清华、北大啦。

我外甥考上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前途大大的。

方程的前胸剧烈地起伏，他手指插进头发里不停地揉搓。

尽管方程有水平，工作也热情，但办公室里的好事从没他的份，长级、评先进、出差，人家轮了一拨又一拨，就他没戏。

一天傍晚，方程与王健走了个正着，老同学，一阵寒暄，拐进一家餐馆。酒过三巡后，方程是嚎啕大哭：“我他妈的抱他们的孩子下苦井了？五年来，我换了七个地方，奶奶的，所有人都与我作对，明里暗里让我栽，我怎么这样倒霉……”

山东作家刘玉堂是王健崇拜的作家，刘玉堂曾在《议价表扬》这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人都怎么了？说一句表扬别人的话就那么难？那是你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可挖苦起人来又是那么大方，不挖苦白不挖苦似的。

发表于1998年6月16日《杂文报》

另一种溃堤

冯越

今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我到现场去采访，身临其境，得到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多少年来就在大连生活，城区和郊区没有什么大河，所以我根本想象不到，在长江流过的某些地段，江水要比地面高，大堤随时都有溃决的可能。那种骇人的景象，只要看了一次就忘不了，至今还时时在我的梦里萦绕。但还有一种也是十分骇人的景象，在我原先也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是灾区的居民超生相当严重。

还是先从我自己的感受说起吧。在湖南的岳阳市，一对夫妻领着三个孩子招摇过市，这是当地人见怪不怪的日常一景，只是让我们显得有点少见多怪了。在湖北的洪湖市，我到一所高中去采访，顺便问了一下初中、小学的开学情况，在场的高中生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家差不多都有三个孩子，弟弟妹妹是否开学了，他们还不了解吗？

我的感受是真是假，可以用最近出现的新闻人物来做个旁证。那个在湖北省嘉鱼县大水中抱住大树九个小时、最后被解放军救了出来的小姑娘江珊，现在她和一个姐姐被安排到北京上学去了，在洪水中她失去了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就是说，原先家里一共五个孩子。那个在电视上两次亮相的湖北省公安县的女考生陈凤，已被某大学录取，然后又免收了学费，她感激地说：“幸亏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不然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真没钱上学了。”她没说清楚家里到底几个孩子，至少也是三个了。那张风靡全国的赈灾照片《母女重逢》，其背景材料是：嘉鱼县妇女段德莲，领着一儿两女，都不到十岁，去躲洪水，失散之后又在此重逢了。9月10日的某报头版头条，用“三兄妹同题金榜”“两姐妹峰回路转”之类题目，报道了灾区里各方人士资助特困生上学之事，超生之多，生育之密，已经属于不打自招、不知羞耻了。这家报纸的“编者按”热情洋溢地说，“这使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这个“大家庭”叫你生这么多孩子吗？你把孩子生出来，当然就有责任让他过上好日子。家里那么多孩子，一口饭要好几个人分，好日子何时能光临到你的头上！相反，你这还耽误了别人的好日子，全国人民的好日子。

计划生育的大道理，自从党中央1980年9月25日发表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公开信之后，这十八年里宣传得比打雷还响，各个省市、各个基层政权都设有专业工作

人员；国家的宪法、地方的法规还有乡规民约，没有不写这一条的。实行计划生育，现在不单纯是一个道德感召、动员说服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基本国策问题。多少年来中国的、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人口过快增长是不行的。就拿这次长江水灾来说，如果人口少一些，何必要在上游砍伐那么多的天然林木，何必要在中游的长江河道里开荒种地、修筑民垸，何必围湖造田，减少了湖泊减弱水灾的能力？正是人口过多，破坏了人与环境的平衡。人为地加重了自然灾害！过去不懂那么多道理，甚至还以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现在这些道理已经家喻户晓了，计划生育从理论上、方法上到行政措施上都有了成套的体系，竟然还有人超生成风，这真是愚昧而且顽固不化，害人、害国、害己了。

今年的抗洪抢险已经结束，大河里的水位已经复原，“长江水位居高不下”等词语不再用了。而在这之前去看长江，随时都有溃堤的危险，其场面很是吓人。人们常常把计划生育工作比作“把守住人口增长的大堤”，现在我国的人口也处于“水位居高不下”的状态，也是同样松懈不得！人的生育期是漫长的，人口流动性比过去大多了，工厂、农村过去管理计划生育的办法也都遇到了新问题。对长江大堤要“死看死守”，才能防止溃堤，对于人口增长的大堤不也是一样？如果该管事的人不去管，该自觉的人不自觉，处处管涌，处处渗漏，“超生游击队”上了报纸、电视，名正言顺地成了“超生正规军”，那可就太可怕了！这种溃堤之危害，可要甚于长江的溃堤了。想想这些，各种险境如在梦中萦绕，真叫我不寒而栗！

发表于1998年9月26日《大连日报》

第九届 1998年 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

“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侯文学

今年7月3日，《燕赵都市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报道了河北省邯大公路线上的大名县、武安市餐饮、娱乐业兴衰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一位从邮局往家乡寄钱的打工妹，在汇款单“简短附言”栏中写道：“此地钱多、人傻，速来。”看后，让人忍俊不禁。

大概由于附言栏目容不得许多字，打工妹寥寥八个字，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然而，待把全篇报道读完，不仅惊叹打工妹高超的概括能力，而且再也无法笑起来。

一说“钱多”。大名、武安两个小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突然冒出一百五十多家饭店、宾馆和歌舞厅，甚至连一个养猪场都立时变成了“新世纪”歌厅。据统计，仅1996年，武安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支招待费就高达七千多万元。小姐们从武安拿走的也是七千万元。这两个七千万，能说这里的钱不多么？二说“人傻”。笔者揣度，当地近亲结婚的人绝不会多，属于生理上的“傻子”恐怕九牛一毛。所谓“傻”，无非是指那些经常光顾饭店、歌舞厅的人。这些人满足了一阵“口福”和感官上的愉悦之后，便大把大把地将“票子”装进老板和小姐的腰包，你说这些人“傻”不“傻”？但话说回来，这些人中多数花的是公款，而享受却是自己的，倒也算不上“傻”。因而，小姐的定论似乎有点绝对化，不过也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再说“速来”。仅就在武安饭店、舞厅打工的九百多名外地小姐而言，1996年就拿走七千多万元，年人均收入高达7.78万元。试想，靠在农村种田，还不得劳作二三十年？如此高的收入为什么不让亲戚朋友也来“沾沾光”？更何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呢？因此，“速来”反映出来的打工妹急切的心情。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管子·重令》有云：“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意谓自然界发展变化的道理是：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就要走向衰落。今年4月24日，武安市委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开处理违纪干部大会，对包括两名局级干部在内的十七名干部作了严肃处理，狠刹了公款吃喝玩乐的歪风。顷刻，饭店、宾馆日营业额下降了60%，舞厅营业额下降了80%~90%，妖娆的小姐们也陆续遁去。钱，自然“银根紧缩”；人，很快恢复了“聪明”；“速来”，也无人再提及。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对用公款大吃大喝和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等挥霍浪费的现象，作出了明令禁止的决定。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似乎仍有大市场，证之公款吃喝风，尤能说明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睁大眼睛，说不准打工妹们又在写那精彩的附言了！

卡拉未必“OK”

马力

“卡拉OK”如今早已风靡中国文化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从酒吧、舞厅到文艺舞台、电视荧屏，乃至家庭、校园……长驱直入猛烈攻击几千年悠久灿烂之文化堡垒，传统戏曲、民族音乐、民族歌舞，也包括引进西方文明的话剧、芭蕾、交响乐，甚至美术、雕塑、诗歌、纯文学，统统不堪一击。“卡拉OK”独秀于林。你得服，我们的邻居日本人脑瓜子就是够用，竟能琢磨出这么个文化娱乐玩具，而且用不了下多少推销的功夫就可以让整个中国的文化市场囫囵圉圉地吞咽了下去。日本邻居对此颇为骄傲，他们曾这样向他们的西方经济伙伴介绍经验：“日本的电子计算机和电视卡通片、卡拉OK机同时占领了世界。”

“卡拉”这玩艺儿确实“OK”。因为它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一把歌星的瘾，宣泄宣泄有害于“身心健康”的情绪，放松放松因工作紧张的神经。而且“卡拉”这声响玩艺儿能照顾所有的中国的有嗓子没嗓子的歌星，调门上不去的可以降低，嗓子不雅的可以配上共鸣狂轰滥炸。只要能有大把大把的进项，观众听不明白也没什么关系。相比之下，那些在练功房里、练琴房里几十年摸爬滚打、汗流浃背的戏曲演员、演奏家们就黯然失色了许多。不少人只好远走他乡“曲线救国”。

但是，“卡拉”这种普及性的肤浅的宣泄性的文化，是否该彻底取代几千年民族与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有了“卡拉”，走向物质生活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是不是也该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创造、更新出属于时代的精品文化，以不断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档次，是不是该值得眼下的文化市场的“有关部门”认真地思考与研究呢？

6月5日，面对电视荧屏上久违了的“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神圣而庄严的文艺晚会，耳听一百年来曾照耀和激励中华民族精神振奋一路前行的辉煌旋律，《黄河大合唱》《我爱你中国》……我突然涌上一种莫名忧虑和担心：正在“卡拉”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一代人，能否有机会体验真正的人类优秀文化？能否产生由优秀文化所培育出来的生命的淳朴和严肃？罪过罪过呀。

尤其当见到刚刚定居海外的中国钢琴界第一把交椅刘诗昆先生专程自香港回来只为了演奏一首半分钟的中国童谣时迷惘而困惑的目光，我之心已开始被悲哀深深地刺痛

了。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要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需要走进博物馆、文物店，甚至出国留学。杞人忧天？

曾创造过五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灿烂文化的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最近市政府下了一条深得市民们赞成的禁令：禁止各种场所都设置“卡拉OK”机，“如酒吧、舞厅欲邀请社会人士表演，可申领牌照”。他们认为这种庸俗吵耳的文化，如任它肆虐，佛罗伦萨的文化艺术传统终遭破坏。

佛罗伦萨城坚决捍卫传统文化艺术的做法未必人人效法，但意大利人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严肃精神却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卡拉”当然可以，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毫无顾忌地彻头彻尾地都在“卡拉”，根本见不到什么真正属于人类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形式、文化艺术精品，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不该再盲目地“OK”了。

杂文二题

邓刚

耳朵的幽默

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得到去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什斯克旅游的机会，于是我毛衣毛裤皮靴皮帽皮手套外加羊皮军大衣，像打虎上山的杨子荣，雄赳赳乐颠颠地踏上北去的列车。然而，就在差一步跨过国界时，我的照片出了麻烦，因为从照片上看不到我的耳朵。认真而严厉的边检官员把我从长长的旅游队伍中拽出来，他说上级有令，照片上必须有耳朵，他甚至一字一板地背诵上级的规定：“照片必须是正面见双耳。”

我说我的耳朵紧贴脑袋，照不出来；我说我所有的照片都没有耳朵，我说我绝对有耳朵，我说算命的说我的耳朵是天下少有的贵耳，两耳贴脑，福气不小！……但我怎么说也不行，严肃地说幽默地说肯切地说还是不行。边检官员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正面见双耳的“双耳”就是耳朵！如果没有耳朵就是违反上级规定。我说正面见双耳并不是单指耳朵，而是角度，如果见单耳就说明角度偏了，如果双面都不见耳朵也就是双面都见耳朵一样，角度正。边检官员火了，手一挥——你如果什么，没有耳朵绝对不行！我也恼火了，照片上头发是我的，眉毛是我的，眼睛是我的，鼻子嘴巴是我的，绝大多数器官都是我的，为什么不行？边检官员大概从未见过敢于与他顶嘴的旅游人员，他一声断喝：“没耳朵就是不行！”便转过头去，再也不理我了。

我像个犯了大罪的罪犯，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旅游队伍外面，恨天恨地恨官僚主义的边检官员最后还是恨自己的耳朵。我过去照相可谓多矣，但从未注意过耳朵的存在。我敢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照相照不出耳朵的倒霉鬼了！我第一次感到耳朵的重要性，特别是此时此地，使我几乎觉得没有脸可以，没有耳朵却不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这可恨的耳朵竟然被很多人赞美过。说是“双耳垂肩，能做大官；双耳紧靠，福星高照”。说是紧贴脑袋的耳朵是耳根硬，“耳根硬，主意定。”即有主见，不易动摇。数年前在南方的一座寺庙里，一个鹤发童颜，神仙般的老道看了我一眼，双目立即放光，呼道：“好有福气的一对耳朵！”总之，我曾为自己有这样吉利的耳朵而心下沾沾自喜，万万想不到这福星高照的双耳今天却遭此奇耻大辱。同行的作家为我出主意，用橡皮或是塑料做个假耳朵套上，到照相馆照快相。说完以后大家又和我一同苦笑，在这寒风凛冽的

北国边境，哪有条件做什么假耳朵，问题是时间也不允许，旅游证签发的日子过期作废，而且还影响旅游团其他人员顺利出境。万般无奈，我只好跑到一家立等可取的边境小照相馆求救。照相师对我的耳朵目瞪口呆，他干了大半辈子，给成千上万人照过相，从未见过我这份与脑袋相依为命的耳朵。危急之时从后屋走出他聪明伶俐的女儿，美丽的大眼睛略一转动，便出了个奇妙的主意：照相时，她躲在我身后，用两手把我的耳朵支撑起来。这个主意果然凑效，二十分钟后我便照出一张招风耳的照片。有了这张招风耳的照片，我顺利过境。为此，我加印了数十张招风耳的照片，以防不测。由于我耳根子硬，照相时那女孩不得不拼足力气使劲撑着我的耳朵，弄得我一面忍受痛苦一面佯装坦然，结果是表情照得不自然，再加上横空出世的两个招风耳，很多人说照片不像我。我说像不像没关系，关键是有耳朵！

食草与食肉

看电视《动物世界》，那色彩斑斓的景色，那残酷无情的撕咬，那阴险狡诈的埋伏，那拼死拼活的逃命，那婴儿般绝望的惨叫……你绝对是惊心动魄，目瞪口呆：动物们毫不掩饰的残忍，专横野蛮的性爱，与生俱来的机灵，永无休止的惊恐……你只能是无可奈何，感慨万千。如果与人类的生存行为联系起来，你却又感到我们这个自以为复杂的世界，其实是那样的简单。

你在尖锐的牙齿咬断柔软的喉管之时，会咬牙切齿地憎恨食肉动物，怜悯食草动物，同时你又会发现食肉动物的智慧大于食草动物。因为食肉动物趋于进攻——迂回，包抄，堵截，进攻，所以就大动脑筋；而食草动物惟一的能耐只是逃命，所以智商低下，只要听到风吹草动，就撒开四蹄一个劲儿地奔跑就成。由于缺少智慧，有时还稀里糊涂地撞进食肉动物的嘴巴里。更进一步你会发现食肉动物要比食草动物团结，而且还有着人类社会的纪律性和组织性。食草动物就不行了，它们表面看起来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情感联系，也决无相互责任，贴近在一起只是为了壮胆而已。更多的意识是：如此庞大的群体，如果猛兽来袭，怎么就会我倒霉呢！所以，当你看到画面上成千上万的角马、牛群、鹿群在奔腾，仿佛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征战——蹄声隆隆如战鼓如滚雷轰鸣，双角闪闪如刀剑如枪刺凌空；迷漫的烟雾托着一股势不可挡的气势，令你热血沸腾。然而，只要出现一只狮影，一只干瘦的草原狼，或是一只还没有角马腿肚子高的豺狗子，这成千上万的雄壮立即就一钱不值，就成了乌合之众，就四逃八散溃不成军。当然，在这总体的胆怯之中，也有细节的勇敢，例如一个母亲为了

保护自己的崽子，迸发出超动物的勇敢。不过这仅仅是为自己的儿女，别家儿女被撕咬的悲惨，所有的父母绝对是视而不见。眼睁睁地看着同类的肉体喂饱了敌害的胃肠，全体就轻松起来，渐渐放慢脚步悠闲地啃草。

食肉动物却不同，他们紧紧抱成一个团，队伍中任何一个受到威胁或受到伤害，全体都会为之拼命。狮子们的团队精神令你惊讶，最强壮者冲锋在前，次强壮者从旁协助，无能者在家里看孩子；鬣狗的队伍中以战斗能力强弱分尊卑，级别低者在职位高者面前只能是夹着尾巴表示谦恭和尊敬；荒野中一只独狼遇到危险，就会发出撕心裂肺的求救哀鸣，立即就有同伴从四面八方赶来救助。所有的食草动物都不具有以上食肉动物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更不具有什么救助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生存太容易，低头啃食一动不动的青草，抬头咀嚼老老实实长在那里的树叶。用不着厮杀，用不着拼搏，用不着呕心沥血地思索，各自吃饱就万事大吉。而食肉动物要喂饱自己的肚子，却十分地艰难，它要面对拼死的挣扎，疯狂的逃窜和绝望的反抗。它们必须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必须纪律严明，团结战斗。于是，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人类的艰难和安逸，奋斗和懒惰，想到“食肉和食草”似乎在昭示着人类。艰难困苦会使人迸射出惊人的聪慧，惊人的狡诈，惊人的贪婪和惊人的创造；饱食终日会让人变得昏昏沉沉，无所事事，简直就能变成滚圆的猪。这其实是极其浅显的道理，然而，人们最容易忘记也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浅显的道理。为此，我们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发展怎样先进，无论有多少教训有多少经验，最终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幸福充满痛苦，充满没完没了的喜怒哀乐。

杂感二题

王晓峰

歪想孔子

好过年了，就想起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年过的有滋有味的，因为只有过年才能杀年猪，才能大口吃肉。可能是小时候太胃亏肉了吧，到现在我还是顿顿离不开肉。在今天已经开始吃燕窝鱼翅的年代里还说吃肉，真有点老土了。其实也没什么，孔子也是个肉食主义者嘛。这是我反复读《论语》才发现的。

我的印象里孔子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数都数不清了，比我要多多了。历朝历代皇帝们给他的各种谥号又长又多，我记不住，写出来也太麻烦；能让我想起来的，有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估计能有十几个，只要提孔子，就必然要说这个家那个家的。但我还想到了他还是别的什么家。孔子一生留下的几本书，没一个是他自己亲自写的：《诗经》、《春秋》是他整理编辑的；他喜欢听音乐，便亲自动手整理过音乐，但这都不是原创，因此他顶多是个编辑家和出版家，也算个音乐家。他还是个商人。但孔子的经商理念在我看来比现在的商人要仁义多了，比如他坚决反对不当得利：不老老实实经商所得到的富贵，对他来说就是过眼烟云。同时他很懂得商机。他的学生子贡说假如有块美玉，问老师怎么办？孔子急切地说：“卖掉呀，卖掉呀，赶快卖掉呀！如果暂时卖不掉，留着涨价以后再卖掉啊。”孔子在言行举止方面是很有讲究的，因此说他还是礼仪专家。比如他上车，必然先端正站好，拉着扶手上车，不回头，不高声说话，不用手指指点点，很威严的感觉，你联想一下现在坐小公车的领导们，基本上都是按照孔子的这个方法去做的。过去，有一些人喜欢叫孔子为“孔老二”，因此我就猜测他还是一个性学专家吧？这么一说，孔子就是个全能的专家了。现在像孔子那样得到一堆堆荣誉称号的人可不少啊，在大街上随便一个什么人递来的名片上，准保能写有一大堆头衔。我的一个朋友，最近接到一个境外机构的来函，说是按照他的业绩和能力，早就达到了博士水平，因此只要他寄去几百元人民币，就可以得到该机构授予他的博士称号。该同志水平如何这里不论，但高中没毕业还是个问题，再怎么有业绩，也不至于一下子进入了博士啊。孔子那么大的学问，都没有得到博士学位，我们一般草民，怎么可以贸然给自己戴上博士帽子。好了，不开玩笑了，尽说废话，编

辑好不高兴了，又开始删我的稿子了，还是回过头来说说过年吃肉和孔子吃肉的事情吧。

在《论语》里，关于吃肉的话题有不少地方，看来孔子比较爱吃肉，只要拿着十串以上肉干的人，都可以做他的学生，而且保证与别人有一样的学生待遇，这说明孔子开创了教育收费的先河，更说明他爱吃肉。另一个例子是孔子听到好听的音乐连吃肉的香味都会忘掉的，连听音乐把吃肉的事忘了都感到遗憾，不是说明孔子对肉的偏爱吗。孔子吃肉，还有相当的一些规矩。首先是座位要好（“席不正，不坐”），坐姿要端正，还要不说话（“食不言”）。同时，颜色不好的、味道不好的、腐烂的、调料不对的、烹调方式不对的、放了三天以上的，都不能吃，可见孔子吃肉，是特别讲究的。最最重要的是，买来的肉，孔子是不吃的（“市脯，不食”）！最爱吃肉却不去买肉，那么他吃的肉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别人送来的，为什么别人都愿意送他肉吃？我想大概他是名人吧，还当过领导；辞职了以后就自办补习班，估计是个班主任，总而言之他还有一定的权力。

吃肉的行家里手从来自己不买肉；荣誉称号多得如同恒河里的沙子，但却从来不写书。莫非是孔子的那个时代就有着腐败？

开会

我最喜欢到外地去开会。在会上见到和结识一些文学显贵、名角对我来说是次而又次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他们和我也差不到哪里。我喜欢开会是在会上能享受到免费而丰富的早餐，通常是七八个小菜，还有品种繁多的主食。

我坚信早餐一定要吃饱吃好，否则，一天繁忙的生活和工作，空腹走下来会是很辛苦的。家里的早餐，大都很简单，常常糊弄进口也就完了事。我的一个朋友对他妻子在早餐方面给予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极为不满，但又不敢表示出来，只好养成了不吃早餐的习惯。我不。我在早晨的食欲最旺盛，一般的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片面包很难满足我的胃口。于是我就养成了喜欢开会的毛病了。

但在会场上我不希望我给与会领导及与会代表留下满身挂饭桶的印象。我要认真领会领导对繁荣文学事业的指示精神，认真听取与会代表对推动文学事业的真知灼见，认真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我还要积极争取在大会上发言，就当下文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我的声音就会和当红的名流混合在一起了，也顺便成为文坛上的主流声音了。能在大会上发言还有一个好处，将来再填写什么表评什么职称时，就可以自豪地写

上这样的一笔：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召开的由某某等单位主办的某某会议上，我的论文《某某某》在大会上发表，受到与会领导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并被指定为大会重要文献。

我不知道我对开会意义的理解是否含混是否偏颇。当我看见大会工作人员在费尽心机地为主席台上的桌牌的次序而痛苦不堪时，当我看到他们深更半夜还在起草大会讲话、印制各种会议文件时，当我看见他们要把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乌合之众安排同一时间吃早餐同一时间进会场同一时间乘车旅游时，我就觉得他们是一群可怜的人——古代汉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可爱”。

我知道文学的会议一般来说，经费和条件都不是十分理想。主办单位的努力和工作人员的辛苦，再加上与会领导和与会代表的共同合作，才有了在媒体上的丰硕成果。在经历了一次次文学会议之后，我常常在感动之余拼命地回忆显示在会议之中的笑容、声音……我不得不承认我当下的记忆实在是辜负了与会领导和与会代表的一片期望，我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惟一能让我有印象的就是那些早餐，那丰盛的早餐啊。

漫话人生“三看”

侯文学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一艘满载希冀和憧憬的船起锚远航。当你踏上征程的那一刻，便巴望着一帆风顺、无阻无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航行中，往往是风高浪急、暗礁密布。这时候，就需要拨正航向，也需要丢掉一些沉重的希冀和憧憬，以便轻舟远行。在人生的旅程中，如何能够审时度势、慨然丢弃？一次聚会中，一位朋友“人生三看”的高论，让大家茅塞顿开。

到贫民家看看。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一些人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小康生活，却常常与那些“大款”或高收入者相比，总觉得心里不平衡。这个时候，不妨造访一下贫困山区。看看那里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知道了他们的境遇，你或许就会调整好生活的基准线，不仅不会再怨气冲天，而且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心里也会平衡起来，即所谓“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到监狱里看看。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自由。当你拥有它的时候往往感觉不到，可失去它的时候才倍觉珍贵。在这一点上。监狱里服刑的犯人们体会最深。而他们之所以失去自由，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好人生的“度”。他们对“孔方兄”顶礼膜拜，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攫取不义之财，结果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乃至生命。因此，当你手握权柄、春风得意时，不妨到监狱看看。体味一下人失去自由后的心态，也许你就会遏制住不断萌发的贪念，在党纪国法的“警戒线”前戛然而止，即所谓“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

到火葬场看看。人，不论地位多高，名气多大，最终都会走完生命的旅程而被送进火葬场，过去所拥有的一切即时化为一缕青烟。对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有人却常常不能领悟，直到临终前，才大彻大悟地告诫别人：“名利是一根魔绳。千万别被他缠住了！”因此，当你因为仕途不顺郁都寡欢的时候，不妨到火葬场看看。如此，你大概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之百年，犹如一瞬。活着的时候，就该保留一颗平常心，既不能浑浑噩噩、不思进取，也不能被名利地位所累，即所谓“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在人生的大风浪中，我们常常学船长的样，在狂风暴雨之下把笨重的货物扔掉以减轻船的重量。”在这里，他所说的“货物”，大概

就是指因过多的欲望而带来的精神负担。若想丢掉一些不必要的负担，“人生三看”，或许便是一把启迪心灵的钥匙。

赵本山、末代皇妃与张艺谋

王毅

如今中国的搞笑明星无疑是赵本山坐第一把交椅。连续八年在央视小品类节目中获一等奖，艺术界无人能望其项背。众所周知，赵本山是说二人转出身的，二人转是东北的地方戏曲。本来和我国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市场经济中也是奄奄一息，只是在偏僻、落后的农村挣扎着生存。赵本山小品走红挽救了二人转，尤其是电视剧《刘老根》上映后，原来的二人转演员如今炙手可热。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既挽救了濒临绝境的民间戏曲，又使二人转演员有了广阔的艺术舞台。

赵本山及其二人转的走红，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非东北地区的人们看来，二人转不但属于偏远的农村，也属于全东北、属于全东北人。东北人都如赵本山的小品中、二人转的唱词中的人那样傻里叭叭、土里叭叭、疯疯癫癫、得得瑟瑟的。这种主观意识，已经像流行感冒一样传染遍全中国。不信，在任何一个非东北的地方，如果你告诉一个非东北人你是东北人，他一定会想这人会唱二人转、这人爽、直，还有没说出的潜台词：傻。没有人认为这是偏见，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偏见当作“真理”，而且把这个“真理”搬上屏幕，堂而皇之地作为历史事实上演。

电视剧《非常公民》讲述的是末代皇帝溥仪与几名皇妃的情感纠葛。我主观臆测，编剧在写此剧本时，一定做了大量的考据。因为此电视剧不是如港台的戏说，至少在观众看来，是比较严肃的正剧。男女情感纠葛只是吸引观众眼球的噱头。而且，这个电视剧还有顾问，都是对于清朝历史深有研究的专家或者学者。偏偏一群作家、专家、学者竟然犯了市井小民所犯的低级的错误，把偏见当作了历史真实。

在溥仪的第三个妃子谭玉玲被日本人害死后，日本人为溥仪选了旅顺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李玉琴。李玉琴是东北人，所以，在电视剧中溥仪的皇妃李玉琴也就成了傻里叭叭、土里叭叭、疯疯癫癫、得得瑟瑟会唱二人转的傻嫚了。电视剧中，李玉琴出尽了洋相、说尽了东北农村二人转中的土话，一个十足的丑角。电视剧早已播完，没有人提出异议，想来人们认为那是历史的真实了。

其实，这与历史大相径庭。

笔者注意到，电视剧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镜头，几个为皇帝选妃子的人到旅顺师范学校去，一个脏里叭叽的中国人拿出一堆学生档案，摆在桌子上任他们挑选。摄像机在一个特殊的角度，只拍了那个院子的后院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当然暗示着那是一个很小很不起眼的学校，但熟悉旅顺的人仍然能认出那就是当年的师范学校校址。

众所周知，大连、旅顺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称为关东洲。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这块珍贵的半岛的目的，他们不但将大连和旅顺划入日本的版图，还在大连搞惨无人道的铁桶般的殖民统治，让大连人民和中国人民完全隔绝。除了用武力统治大连人民外，又大搞奴化教育。所谓奴化教育，就是中国孩子在学校完全用日语授课，接受日本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用这种方法培养出一批高等华人，代替他们统治中国人。他们深谙以夷治夷的道理，企图用培养高级华人的方法为殖民统治培养鹰犬。

也正因为此，日本对教育是舍得下本钱的，在旅顺建立了旅顺工学院、旅顺师范学校和其他的学校。这些学校里，除了讲授古汉语的是中国人，其余的教师全是日本人。而且，这些学校的建筑都高大堂皇（旅顺师范学校建筑已经被大连市政府定为不准拆迁的大连首批一百栋历史建筑）。这些学校里的学生都是百里挑一考上的。别看只是一所师范学校，学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专，可那个中专不是今天的中专。当时，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很低，一个中专毕业生也是不得了的。因为他们毕业后从事学校教育，日本又特别看重在儿童时期进行殖民教育，所以，对这些未来的教师的教育可谓用心良苦。女学生不但学习知识，还开设裁剪、插花、待人接物的淑女教育。并且，这些女孩子是知道溥仪的。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实行铁桶般的殖民教育，但有一点他是永远做不到的，就是学生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知道日本是侵入者。学生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因为信息封锁，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消息一无所知，但知道满洲国，知道溥仪是满洲国的皇帝。并且，学生们对这位末代皇帝充满着崇拜和敬仰，原因是他是中国的皇帝，不是日本的皇帝。历史事实是，当年溥仪从长春到日本访问时，旅顺师范学校的学生们曾被学校安排去海港欢送。英俊的溥仪是学生们心中的偶像，甚至是神。

在这个环境中学习的李玉琴，怎么会从花轿里跌出来后，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傻丫头大叫：这是什么疙瘩地方啊？怎么会在没有人把她当人的皇宫里大唱二人转？怎么会不知道溥仪是谁？怎么会一点礼节不懂？怎么会傻里叭叽、土里叭叽的只知道唱二人转？

旅顺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二战”胜利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人民教师，对大连市乃至全东北的中学校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在档案馆里有历史记载的。如果李玉琴不被招为妃子，也将是一名出色的小学教师。

大导演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曾经被攻击为专门展示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尽管那是真实的现实。又因为西方一些国家人从张艺谋的影片里来评价今天的中国人。很多国人对此不屑、心理不平衡，认为洋人浅薄、无知。《非常公民》的编导们如今也犯了洋人的错误，无知、浅薄到了让人发笑的地步。

《刘老根》热热闹闹地上演着，赵本山和他的弟子的二人转继续走红着，偏见、浅薄和无知仍然继续蔓延着，在编导和专家学者的带领下，荒谬还在继续上演……

发表于2003年3月9日《今晚报》

报告文学

岁老根弥壮 阳骄叶更阴

张景勋

深秋，正是苹果下山的时节，我又旧地重游，再次访问了新金县的省、市劳动模范李德春。不过，此次相见，不是在挂符桥大队葱郁苍翠的果园里，而是在太平公社的另一个大队——五里台大队。我首次访他是了解他们果树队全省闻名的“老树更新”的事迹，而今访他是想知道这位年近花甲的老模范的近况。老相识重逢，分外亲热激动，不免感慨万千。是啊，十六年过去了，人间沧桑事，有笔难尽书。特别是“四害”浩劫的十年，至今谈及，仍不免令人毛骨悚然。我想，这对李德春来说，又是多么难熬的时日啊。因为我来新金县已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传闻，对他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我望着这位中等身材，浓眉、满嘴胡须的庄户人的面孔，说：“老李，你移地重操旧业，身体可好呀？”他微微一笑，说：“我在这儿很好，身体也好。只是腰痛……”他没有把话说透，仅三言两语作罢。固然，虚怀容人，忠厚诚实，内涵深厚，寡言少语是李德春的性格，但从他那深邃的目光和抑郁的神情，不难看出他有满腹话而又一言难尽。他不愿倾吐那令人心酸的往事。

“四害”横行，天下大难。在挂符桥大队，第一个遭劫的就是李德春，“假劳模”的大牌子，沉重地挂在他的脖子上。祸从天降，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是1966年11月底的事，一伙“造反者”闯进李德春的家，揪走李德春，抄走镶着玻璃框的十三个奖状，拿走一把杀猪刀，还诬称是杀人刀。真是强盗面前无真理，黑白颠倒！从此，李德春过上了“牛棚”的生活。成天价要他交代“假劳模”的“罪”，污蔑“老树更新”的事迹是“假”的。李德春没有假，无罪可交！苦命的李德春，四岁时就死去爸爸，由于生活所迫，十多个孩子，不得不离乡背井到普兰店“盛兴号”果园去当小伙计。于是他与果树有了交情。解放前为老财们卖命，解放后做了主人，当了集体事业的果树技术员、果树队长。他摸熟了果树的脾气，掌握了莳弄果树的本领。合作化、公社化后，他

搞了“老树更新”的法儿，把个老果树园子，变成了青春的果园。真是青枝绿叶翠，硕果满枝头。当时有棵四八年生的衰老的“红玉”，更新后仅七年就能产果一百五十斤，可是刚栽的小树，八九年后才刚见果呐。再看，挂符桥大队果树队的苹果总产量：1957年为18.5万斤；1960年为27.8万斤；1962年为30万余斤……这是李德春和社员们对“老树”进行“更新”而留下的足迹，是用无可计数的汗水换来的果实。可是眼下，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不完的“罪”。在“牛棚”期间，一边挨批斗，遭受折磨，又得赶车、看山、打井、放牛，还有一些零杂活儿。

建革后要整党，李德春心想，这回，可该正规了，谁知新的灾难又临头。他的党组织生活就是不能恢复，说他是“生产党”，不够党员条件。李德春怎么想也想不通，难道要建立一个不搞生产的党？不搞生产把脖梗扎起来吗？！这个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就知道能为国家多生产一个苹果、一斤粮食，为集体多做好事，他才心里熨贴。他不光是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就是在“牛棚”里也不例外。1967年春，李德春赶牛车拉碱皮泥垫圈攒粪，有个果树技术外行的社员把队里买来的果树苗，用碱皮泥压上，李德春发现后，心疼地说：“可不能用碱皮泥埋，快扒开，要不就盐死了……”1967年夏，果树生了红蜘蛛，李德春听说后，急忙赶到果园，告诉社员们如何兑药、喷药，要把红蜘蛛和卷叶虫一块消灭。李德春的人品、作为，赢得了党员、群众的赞誉。他最后终于恢复了党的生活，并担任果树技术员和果树队队长。好景不长。“四害”跳一跳，派性、帮风就刮一刮，搞得李德春上上下下不得安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春，李德春还在大队养猪场喂猪。新调来的公社党委书记惠恩举发现这个情况感到吃惊；五里台大队支书徐恒有闻讯争要李德春到他们大队任果树技术员。于是，太平公社党委同意了，他来到五里台大队安家落户了。

李德春来到五里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他要专心致志地为发展果业贡献余生。徐恒有乐呵呵地对我说：“我们大队今年苹果大丰收，总产达到八十四万多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7年六十六万斤，增加了十八万多斤。这里边有老模范李德春的汗水呀。”可是当我请这位老模范谈谈他迈出的新“脚窝”时，他却谦虚地一笑了之，并说：“我做得很不够，是党支部抓得紧，各个生产队果树技术员和社员努力的结果。你看，今年一开春，徐书记就不撒手地抓……”想从老李嘴里得到我要了解的情况，实在难啊。多亏生产队的果树技术员们帮了我的忙。

“你要问李德春的事吗？他对我们帮助可大啦。过去我们剪枝粗粗拉拉，剪剪就是。可他不行，总是具体详细指点，去留哪根老枝，培植哪根新枝；什么施农家肥要和

过磷酸钙和拌，结的果色好味美啦，他都一五一十地跟我们讲。”一队果树技术员王国君兴致勃勃地说，“哦，他还指导我们向树下撒药粉，这是过去我们没干过的。你看，他规定得多细：5月下旬地下虫蛹未出之前撒一次，再住半月又跟上一次，待虫子要出蛹再来它一家伙……漏网的虫子爬到果树上也跑不了，6、7、8月再喷三次药水，妥啦。我们小队今年上等果占95%！”王国君话音刚落，二队果树技术员唐多贵插言道：“他呀，干事可耐心、认真啦。有一次他外出开会，走前他告诉我如何稀间好果。我抱着当年红的思想，想多留多产。他外出回来后，发现我没稀果，就耐心对我讲，要当年红把果树累坏了，就要出现大小年，我们要的是年年高产稳产……同志，跟他可打不了马虎眼！”唐多贵停顿一下，接着又说：“他的腿可勤啦，每天都要到各队果园走两趟，仔细观察病虫害。今年7月20日他走到俺队一个偏僻地场，发现有红蜘蛛，于是我们及时喷了药，消灭了虫害……”

听了他们的介绍，使我脑子里又充实了许多。的确李德春做事是很有根底的，他的技术指导是实实在在有根有据。比如他家设了个“虫情预报”箱，他观察可细哩，早起看一次，中午来家看一次，午后上工前再看一次，晚上下工回来再看一次。他觉得这样才好把握灭虫除害时机，指导生产，心中有数。这里，我向读者透露一个秘密：这位胼手胝足的庄户人，还正在搞两项科学试验呢。一是“短化密植”的小果树试验；二是“丰产业园”的试验。我想，有志者事竟成，工夫不亏有心人，李德春为“四化”苦心经营的事业一定会获得成功！

在结束这篇小文之前，让我再啰嗦几笔前面提到的挂符桥大队。几年的风风雨雨，挂符桥大队的干部、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他们没有忘记在挂符桥的土地上，曾经成长起来的著名劳动模范李德春。今春，挂符桥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福财、副书记徐广奎亲自面请李德春回故乡干“四化”。李德春深情地说：“感谢乡亲和同志们的关怀。我听从公社党委的安排。”多么好的老同志，一生交给党安排！这样的同志越多，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越兴旺，四个现代化指日可待！

同这位老模范的会面，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过去，我从李德春的“老树更新”的成果上，看到了老树不老花争艳的令人奋发的景象；今天，我又从李德春这儿，听到了“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的过来人为“四化”进击的脚步声。幸福之花为勤劳的勇士们而开。让我们亮开喉咙，高唱新长征的进军凯歌吧！

发表于1979年11月11日《大连日报》

最干净的人

张琳

在全国先进模范人物中，还有“二十多年如一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清洁工人李守环”。

——《全总十大报告》

1

初冬。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正是上了一天班的人们回到家里，饭菜香味四处飘逸，引得人们饥肠辘辘的时候。在大连市繁华居民区人民剧院附近的一个小巷里，有一个身穿工作服，足登水靴，脖缠毛巾的人，从一家小院里挑着一担满满的大粪，小心而急促地走出来。

怎么，这是清洁工人在工作？挑粪的还打夜班？

只见他挑着粪担不往巷口走，却曲里拐弯，将粪水统统倒进另一处便所的粪坑里。屎窝倒尿窝，这闹的什么景？

原来这是他在给一户早便所设在家里的双职工老梁家单独挑粪。因为是业余时间，没有粪车跟着，只好先挑出来倒在别人家便所里搁着。

唉呀，这么耐心！难道老梁家和他沾亲带故？不！根本不认识。

哦，明白了，准是额外给他报酬！不，他成年积月地这么干，连人家一支香烟也不抽，纯粹尽义务。

唉，那，又何必呢！打听一下老梁两口子哪天公休哪天来掏不就够意思了？

主意不错。但是，他们公休，不一定就轮到粪车来这挑粪呀！

那，提前通知老梁家挑粪日期不也算尽到责任了？

是的，这也比简单的公事公办强多了。但就为掏粪这点小事，叫人家白请半天假在家候着，他觉得于心不忍。与其空手去通知人家，不如就手挑担粪桶去把粪倒出来，岂不更好！现在不是提倡因地制宜，不一刀切么！我挑几担粪，等于人家多为“四化”作半天贡献，说不定人家还少扣半天工资哩，这个账不能不算！于是，每隔一定时间，他就来给这个特殊户，特殊“照顾”。

他是谁？

他就是在全国总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点名表扬的十个健在的先进人物之一——辽宁省劳动模范李守环同志。

提起李守环，凡在大连市使用早便所的老百姓差不多没有不知道的。这不仅仅因为他从1959年还是个浓眉大眼、年轻漂亮的小伙时就开始挑起了粪担，二十四载，阴晴风雪，从未间断地走街串巷，为城市清除污物，为农村提供粪肥，如今已胡子拉碴，两鬓花白，还粪担不下肩，更主要的是那一颗事事为别人着想的心，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行为，深深地感动着千家万户。有人说他是大连的时传祥，有人叫他活雷锋，别看他干的是脏活，可他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人。

2

大粪，自然是脏东西，李守环刚刚挑粪的时候，虽说穿工作服，戴着皮手套，甚至还戴着大口罩，但眼睛看着，心里难免有点恶心，甚至吃不下饭。可他看见老挑粪工人们干起活来，大手大脚，爽利潇洒，中午吃饭很香。长了，他品出行动是思想支配的：老农民怎肯用手抓粪？还不是粪换粮食！母亲为什么高兴地给婴儿洗褊子？还不是盼儿女舒舒服服地健康成长！自己挑大粪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人们有个卫生的环境，叫农民多打粮！何况人民政府、共产党对挑粪工人一点也不小瞧。北京挑粪工人时传祥和刘少奇同志平起平坐，还说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哪个朝代、哪个国家能这样待承掏粪工人？……

这样一想，果然他不觉得脏了。

然而挑大粪，不光脏，还累呢。一百多斤的担子整天压肩上，走路还得带小跑，再加上大连市区是个丘陵地带，七高八矮。武昌街一个43号厕所，修在山坡上。上去一次得四十八磴台阶，多棒的小伙子也得呼呼带喘，一不小心，还有翻滚坡的危险。还有的地方，道路狭窄，汽车进不去，挑一担粪得往返三百多米。可是这有什么办法，能叫他们搬家，还是光吃不拉？我们是新社会，人民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呀！李守环这样想着，劲就来了。他总是把道路远的、难走的、出粪口小的厕所，争着抢着去干。

不久，他当上了挑粪组长。

有一天，他们分头在一条小胡同里挑粪。忽然，听到一个门洞里有人在争吵：

“唉呀，脏死人啦！”

“嫌脏把鼻子堵上！”

“什么话！你眼瞎了，看满地拉拉的……”

“吃饭还掉渣呢！我还管你收拾院子啊！”

“你这个挑大粪的怎么不讲理！……唉呀妈，看，被单也给弄上了，你赔……”

“谁叫它挡害了，活该！”

李守环赶忙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位大嫂和自己组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伙子在争吵。地上果然滴滴拉拉撒了一些粪水。他批评了小伙子两句，就给那家赔不是，又抄起一把竖在墙根的笤帚，扫了些土把粪盖上，还表示愿把弄脏的被单洗干净。大嫂见老李这般态度和气，知情达理，只好消气。

这件事使他想到，挑大粪光不怕脏、不怕累还不行，还得处处为群众着想。

从此，人们发现李守环小组的粪担上多了一把笤帚头子，挑完粪后必给人家收拾干净。进院后，见有晾晒的衣物，必先招呼几声，或亲自给往边上挪一挪，让出个过道。这样一来，果然群众满意了，再也没有发生争吵事件。

有一次他们挑粪挑到了新生街，正好遇上那里大修房屋。惟一的通道——一条狭窄的小胡同不仅堆了满地石头瓦块，还扎起了五六排脚手架，要挑粪得猫着腰穿过这绊腿硌脚的地方。有人提：算了，等房子修好再挑吧，责任又不在我们。可是那里有八个厕所，几十户人家哩，要等房子修好，厕所粪便不流满院子才怪呢！要是咱家就住在这胡同里呢？将心比心！干脆，咱来个障碍物竞走吧！说着李守环第一个钻进了脚手架，于是大伙随后跟上来。

是呀，将心比心！他们这样对待群众，群众也报之以笑脸，不光“师傅”相称，还点烟倒水哩！

3

李守环和他的伙伴们在挑粪中发现，凡有旱厕所的大都是年代久远的老房子。院子里泥地，取暖做饭烧的是自家打的煤坯，这样烧后的炉灰，有人就随手倒进厕所；还有把砖头瓦块，铁丝破布，甚至死猫烂狗什么的，也都一古脑地往便所里乱倒乱扔。这样不仅掏粪的次数增加了，而且干起活来也很费劲。有人说：“咱们挑粪的，还管清垃圾？”

“对，只要对群众有好处，对国家集体有好处，跟清除污物沾边，咱就管！”李守环坚定地说。挖这些积满杂物的陈年老粪底子要比站在外边掏稀粪难干多了，因为这需

要钻进厕所里边的粪坑里，用铁锹一点一点往外挖。虽说头上身上脚下全副武装，可也难免弄得满身是粪。斯大林路有一个两户用的小厕所，不知谁倒了一些六六粉，气味难闻。李守环下到里边呛得喘不过气，只好干几下，伸出头来换换气，粪池小，干活不得施展，他只得弯着腰，将头贴在膝盖上，一点一点，好歹才把淤积物全部挖上来。民生街有一座三层楼，厕所冻在上边，底下的粪池虽大，掏粪口却小，进不去人。他就找房产部门联系，在墙上打一个洞，他又自己掏钱买蜡烛，第一个钻进去，把粪池收拾得干干净净。

要问这二十几年，老李钻出爬进挖了多少厕所底子，他自己早已不记得了。只在1982年，为了他出席全国部分劳模座谈会，领导现给他统计了一下，这一年1月到3月，他和小组的同志们一起，挖了一百四十三个厕所底子，为四百六十八户、七千八百七十二人解除了用厕所难的问题。

1980年7月，他听人说北京街一个十六户人家的大杂院里，厕所冒了浆，叫垃圾污物填得只能盛三两担粪，挑粪工人三天两头顶架挑也挡不住粪水横流。实在没有办法，有人出头想找进城积肥的农民来给彻底挖一挖，人家张口要一百元报酬，也只好认可。可事到临头人家又翻了卦，说那数目还少。

老李听了，心中一急，说：“我们去干，一个子儿不要！”

可是北京街归第三现场，不归他们一现场管，更何况当时挑一担粪给一担的钱，干别的活没工资。要去，只好利用公休日。他把自己的想法对第三现场的同志刘春亭、于永涛说了。二人非常感动，说：“只要你领着干，我们都参加！”

这样，在一个星期天，他带领三现场的五名同志一起来到了这个被上厕所愁坏了的大杂院。居民们听说是自愿尽义务，更是感动，立刻把点心、水果、香烟摆出来请他们吃用。老李哪里还顾上这些，穿上雨衣、胶裤，一头就钻进掏粪口里。

这7月的大夏天，又闷又热，再加上那又臭又辣的沼气一呛直觉得鼻梁沟处液体在流，一时间竟也分不出是汗水是泪水。他们就这样整整干了一天，直挖得四角见了硬实的水泥底，这才爬出粪池。大杂院的居民见他们干得又快又干净，一点也没动给他们预备的食品，实在过意不去，现从每户拔了三元钱，一共四十八元，交给他们权当报酬，说这已经便宜了五十二元。

李守环笑着说：“大伙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钱高低不能收。我们干的就是这一行么。今后谁家有这样困难，只要给信儿，我们马上就来！”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个考验。

作为一个工人，李守环当然看不出这场“革命”有什么错误和给予什么抵制。不过，他觉得一个工人的天职就是做工，不做工的人叫什么工人？当他看到在“停产闹革命”的煽动下，很多工人离开工作岗位，有的工厂、学校弄成了武斗点，整天枪响炮鸣，热闹的大街变得冷冷清清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1960年他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遇到的那场“三年灾害”。那时候多难哪！以野菜充饥也填不饱肚子，可是工人们也没停工，仍旧咬紧牙关干活。记得有一个老工人因为双腿浮肿，下台阶迈不动步，一担粪水完全翻在地上，可是爬起来还是坚持干。现在吃得饱饱的岂能撂下工作不管！

有名的“炮轰卫校”的武斗那天，他正好领着小组在那附近挑粪。炮响了，他们在墙角房后躲一躲，抽袋烟，枪停了立刻挑起担子去掏粪。有人批他是“光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他说：“人在前边，不看路，车能动弹吗？”因此整个动乱那三年，他们小组一天也没停过工。

“文化大革命”中什么奇事都有！有一天，他在刘家屯掏公共厕所。当往桶里倒粪时，只听“当啷”一声，原来是一块银光闪闪的大头洋。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便小心翼翼地掏干了粪水，往底下一望，嘿！竟是明晃晃的一堆银洋。他忙下去拣出来，一数，连先头的那一块，整整二十一块！

有个人说：“这个挑大粪的真走运，发了洋财！”

李守环用清水洗净了银元，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摸弄着，也很高兴，要知道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呵！

按说，挑粪的掏出来值钱的物件，自己留下也无可非议。可是老李却感到一阵“拣洋捞”的耻辱，他觉得自己要留下，就是不义之财。他用手绢裹着，连夜都没过，赶紧上交了国家。

不久，他又接二连三地在中山公园和沙河口等处厕所里拣了三个黄澄澄的金戒指，还掏到了一枚铜合金大钱，据公安部门说那是日本统治者在本地地区制作的纪念币，只有两枚，对公安部门调查某一案件有直接帮助。

那一阵子，不但李守环，其他同志也有拣着金银财宝的，由于老李的带头，也都洗净擦干，照样交了公，尽到了一颗淳朴的工人阶级的心。

也许这拾金不昧的事儿登了报了吧，自那以后直到今天，陆续有不少群众的手表等贵重物品不慎失落到厕所里，总是来电话或亲自登门来请求帮助。他们也总是有求必

应，从不推托。今年夏季的一天，李守环正在开会，有一个女同志打电话给他说：“你是李劳模吗？我有件事想求你，实在张不开口……”

接着她用十分抱歉的口气，不好意思地说，她在普照街上厕所不小心把一块镀金手表掉到粪池里，想请李守环帮帮忙。

李守环脱不开身，组员小林说：“我去！”说着挑起粪桶，端起粪勺就去了。费了好大劲，终于给捞了上来。感动得那位女同志又要给钱又要送东西，都被拒绝。最后到底送了一个贝雕画，挂在他们现场办公室的墙上了。

有一次，一家商店被盗，更夫遭杀害。罪证之一的螺丝刀，被罪犯扔到一个厕所里。为了拿到全部罪证，公安部门向清洁工人求援，李守环和李长海、王太和三个人都抢着去了。

可是眼看着稀粪都掏干了，也没发现有什么螺丝刀的影子。公安人员有些泄劲了，叹了口气说实在没有就算了。李守环说：“先别的，我下去看看！”

他又使出下粪坑挖粪底子的功夫。但是这粪坑里乱七八糟的树枝子、劈材棍子、石头瓦块等等横在一起，用铁锨挖起来十分别扭。为了尽快拿到罪证，他一狠心，扔掉手套，赤着双手伸进粪便里捞。最后终于从污物垃圾里发现了一把一尺长的红漆木把电工螺丝刀，和罪犯交代的是一模一样！

公安人员感谢万分说：“唉呀老李，你可帮了我们的天大忙！快上来好好洗洗手！”

老李笑笑说：“没什么，做好事的手是脏不坏的，我们清洁工人一个月发八张澡票呢！”

大伙都被他这风趣而豪迈的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5

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到1979年，“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风气还像瘟疫一样，在清洁工人中间蔓延，不干工作，整天泡蘑菇，磨洋工的不少。

为了摸清情况，环卫处的城肥科长亲自下来到工人中间蹲点。为了改变那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坏风气，他提出：“咱们来个定额包工，超额有奖行不行？”

“怎么不行？”李守环第一个发言拥护。

可是定额多少合适，大伙翻来覆去地研究，决定每天六十担。

可第二天一公布，工人鼓槽了。这个说：“太多了！现在一天才挑二三十担，再怎么使劲也完不成！”那个说：“连基本工资都挣不出来，哪能有干劲！这个定额是谁定的，真不合理！”还有的说：“谁愿干谁干，咱没有那能耐！”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

“好！”李守环第一个站出来了，“我干！谁愿意跟我干个样儿看看？”

“你挑吧！”复员军人王明勤瞪着一双期望的眼睛表示支持。

“行！王明勤！李学海！……”一共点了八名工人。

看你们能干个什么样儿！一些人在心里暗暗地恨他。

可是试验的第一天就达到了一百担，第二天还超过了这个数。一连二十天，平均是一百一十担。叫嚷“连基本工资都挣不出来”的人不得不服了，只好乖乖地跟着下力干活。

当然，活是比以前晃悠着干累多了，可是多劳多得！年轻力壮的人累点怕啥，多挣了钱是买鱼不鲜还是吃肉不香？赶到月底，开了百十元钱。原来恨老李的那些工人反过来倒要感谢他了。

李守环笑道：“我挑了二十年大粪，心里能没数？按劳分配，这是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么！”

但是李守环知道：钻钱眼里出不来，一切向钱看，那可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因而打这以后，凡是要求去干挖便所、挑粪以外的活儿，他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和公休日，决不因没有报酬而推辞不干。一个星期天，老李带领六名工人主动去到大连福利厂为失明工人挖了一天便所底子。连家住远郊区，来回往返需要四小时的王明勤也参加了。

李守环到底干了多少个公休日，他自己一向不去计算。

1983年3月，为了他出席全国城市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有人统计了一下，1982年一年的五十二个公休日，他只休息了四天，其余四十八天，他都是在为群众尽义务中度过的。

想想吧，那是什么样的义务啊？又脏又累，还没有报酬！那些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斤斤计较个人私利的人，在他面前难道不感到脸红吗！

发表于1983年《辽宁工人》

安居巷的报告

李明

在西岗区幸福路和乐业街的中间，有一条整洁、宁静的小巷——安居巷。小巷的西头，路北，一座二层小楼上，有一间宽敞的住屋。屋里陈设古朴简洁，一尘不染。明亮如水的玻璃窗上，挂着雪白的窗帘；床上的被褥叠得棱角分明，旧式写字台上那座棕色的老座钟，强劲有力地唱着时间进行曲，橱柜里的罐头、水果、点心和糖、鸡蛋……堆堆擦擦，三张年画上的老寿星在墙上从不同角度，对这屋里的主人笑啊，笑！

主人是谁呢？

她叫李林枝。今年八十七岁了，骨骼硬朗，一身爽气。这老人整天和画上的老寿星比着赛笑。她笑起来，那道道纵横交错的皱纹，似金菊绽开的花瓣。

在这里，请李林枝大娘暂停笑声，时间需追溯到……

一

那是1966年的深秋，朔风阵阵，叶落花飞。一位年迈人抚尸大恸：“老头子呀，你好狠心哪，口眼一闭就走啦！哎哎……扔下我这孤老婆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可怎么活呀？”

这号啕大哭的人，就是李林枝。

怎么能不哭呢？她这一辈子，独、寡、孤三个字都摊上了。这三个字都和贫穷是一家呀！

李林枝是个独生女儿，吃糠咽菜长到四岁上，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又入黄泉。苦煎苦熬，十九岁便出了嫁。吃的是野菜糠粑，穿的是“仙衣八卦”。因为她没生儿育女，公婆当面不骂背后骂：“这是个铁杆扫把星！”三十七岁那年，“扫把星”真的“扫”走了男人，她成了寡妇。四十八岁，又把公婆送到黄土堆里，连骂“扫把星”的人也没有了。李林枝像一片早枯的落叶，在风雨中飘零。她由山东流浪来到大连，先是乞讨为生，后来给人家当保姆。1953年，五十七岁的李林枝与铁路工人崔长玉结了婚。老两口知疼知热，日子过得蛮舒心。没成想，十三年后的今天，与她相依为命的老伴又抛下她离开人间。李林枝觉得天塌了，地陷了！

李林枝的哭声，揪着安居巷人们的心。此刻，居民委主任李俊莲两眼红肿，声音嘶哑，心急火燎地在居民委办公室里挂电话。挂了一个，没人接。又挂一个，还是没人接。她耐着性子守在电话机旁，一次又一次地挂。终于和崔大爷生前所在单位接上话了，她几乎是喊着对对方说：“崔大爷死了，他还扔下一个老伴。你们得管……已经有了打算？……光打算不行，得马上有行动，老太太不能没有依靠呀！”又打通了，是区政府民政科：“快给李林枝大娘办理救济金，不能叫她生活没有着落啊……”电话又打给了附近的一个商店，她的口气是命令，也是哀求：“有新鲜鱼吗？给留点，能送来更好。大娘已经好几顿没有吃饭了，我们不能看着她倒了呀！”

她挂完了电话，又急匆匆地组织居民干部给崔大爷做寿衣。寿衣做好了，可是谁来给死者穿上呢？他的惟一亲人是老伴李林枝，而她哭得连站都站不稳。“还有谁呢？”人们茫然了。“还有我！”李俊莲在心里这样回答着。她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说半句话，拿起寿衣走到崔大爷的遗体前。僵尸！硬邦邦的死人哪，今天是一个非亲非故、遇到坟墓绕道走的青年妇女，给他穿上了寿衣。他若在天有灵，该做何感想呢？李林枝“哇”地一声哭了，围观的人们哭了，整个巷子都颤抖了。李俊莲悄悄扒开人群，抹了一下脸，又跑去催棺材去了。

趁此机会，我们来介绍介绍这位李俊莲吧。

她原籍山西，当年三十二岁，是街道的义务干部。描写她的形象只用两个字就够了，那就是：方，正。白净的四方脸，柔和的方额，线条清晰的方唇，匀称的中等身材，方平的肩。走起路来，稳重得似乎在迈方步，可是速度却不慢。不知她就有那一件方格衣裳，还是她的衣服都是方格的，反正很少见她穿别的花色衣裳。

李俊莲从十七岁起，当上了居民干部，和铁路工人王士清结婚后，有了孩子花钱找人看，自己却白给大家尽义务。哪家有困难她往哪家跑，谁需要帮助她往谁的身边靠。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把自家的粮食送给了人，自己却常常饿肚子。有人说她傻，她说：“傻就傻吧，反正我见不得人家哭。”是呀，别人眼圈一红，她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这几天，她忘了家，忘了自己。整天为李林枝大娘奔波。

崔大爷下葬那天，李俊莲带领居民干部孙淑娥、王秀英、吴殿荣等人，臂戴黑纱，搀扶着李林枝大娘来到坟地。当棺材入土时，李俊莲弯下腰，郑重地抓了三把土撒在棺材上。这情景使李林枝大娘怔住了，按老风俗，只有亲生儿女才能为死者下葬抓土。大娘呆呆地望着李俊莲，忽然手拍黄土哭述起来：“好人哪！你闭上眼睛吧，咱们没生没养，可有给你抓土戴孝的人哪……”

二

太阳披着彩霞，不慌不忙地抹去了星星，夜撤退了，小巷醒了。可是李林枝大娘家还没拉开窗帘。这窗帘向时时刻刻关注她的安居巷的人们报告了“情况”。居民组长刘翠香和大娘住对窗，她先跑了去。脚后，就跟着李俊莲、妇女主任惠桂花，调解孙淑娥等几个居民干部。

大家一进屋，不禁惊叫起来：“哎呀，大娘怎么吐了一地？”再看看躺在床上的大娘，脸色苍白。人们吓毛了，喊的喊，叫的叫：“大娘，你怎么啦？”大娘见床前围着人，故意装着没事似的说：“没怎么的，我睡了个早觉。”“还没怎么的，看这，不是你吐的吗？”李俊莲扶起大娘就要背她上医院。大娘见她们一个个眼泪汪汪的，就说：“我没什么大毛病，别大惊小怪的。昨个张玉兰送来些海蛎子馅饺子，怪鲜的，八成吃多了，反胃了，若是喝点羊肉汤……”大娘打了个哏，眼睛里流露出失悔的神色，又忙改口说：“看看，这是咋说的，一点小毛病把你们惊动得了不得。”

说的无意，听的有心。李俊莲和惠桂花立刻来到市场给大娘买羊肉。那时羊肉只供应给回族。她们在羊肉案前转悠了一会儿，就跑了出来，找到一家回族居民。对一个不相识的人恳求说：“大嫂，我们的老人病了，想喝羊肉汤，你能给一张肉票吗？”这位大嫂没言语，回屋拿出一张肉票交给了她们。李俊莲和惠桂花齐声道谢，然后又飞奔肉铺。

老人喝完鲜溜溜、热乎乎的羊肉汤，打了两个嗝，出了一身汗，觉得胃口舒服多了，身上也轻快了。大家喜眉笑眼地看着她，老太太像冷不丁想起了什么似的，手伸进怀里摸索起来，然后掏出了几角钱塞到李俊莲的手里，说：“孩子，这点钱怕不够吧？”李俊莲轻轻地推开大娘的手说：“大娘，在你的眼里我是谁？”“是谁？就是身上掉下来的肉也得有个深浅呀！”李俊莲没再答话，却把钱又给大娘装进她那贴身的衣兜里。

大娘坐在床上，看着大伙忙乎。崔大爷去世后，她这个乱七八糟的家，就是在这些人的手里变了样。今天。她家的玻璃更亮了，地板更光了，样样家具像洗了个澡，重新安排得整整齐齐。大娘那条厕上屎的裤子和其他一些脏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大娘看着看着，嘴角动了动想笑，却没笑出来。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林枝大娘再也不觉得自己是孤老人了，她相信安居巷的人们都是自己的亲人。她常常神秘地对人说：“你说这事怪不怪？咱安居巷各家各户的好东西，都像长了翅膀，瞅眼不见就飞到我这来了。”

这话不假。

端午节，大娘家的粽子有大的，有小的，有三棱的，有四角的；鸡蛋有红皮的，有白皮的。粽子鸡蛋装满了筐筐篓篓。都是谁送来的？老人说不清。

仲秋节，大娘家的月饼一包、两包、三包、六七包……堆成了堆。都是谁送来的？老人说不清。

安居巷的钱也长了翅膀，动不动就有几元钱出现在她的桌子上、抽屉里。有一次，矫淑滨偷偷地把五元钱压在大娘的写字台的座钟下面，刚要溜走，被大娘“捉住”了。

大娘一讲起这些事，就乐得笑出了眼泪。她永远也忘不了1966年的春节……

除夕之夜，天上群星闪烁，地上灯火辉煌，家家户户煎炒烹炸，欢声笑语。

可是小巷西头那座小楼上却是静悄悄、黑乎乎。北风婆子大概也是个老寡妇，倒是它钻了进来和她做伴，使得这屋里更冷清，更凄凉。

她在地上转悠了半天，不知干啥好，掀开粮箱子摸摸口袋，米没有了，面也不多了。她把口袋扎了扎，又盖上了箱子盖。一抬头，她看见一双眼睛，正是崔大爷那张小不点的遗像在直视着她。她用手轻轻地拂去了相片上的浮灰，对着相片看哪，看哪，她看到了一个欢乐的情景：崔大爷笑呵呵地举起酒杯：“来来，今儿过年了，咱老两口干一杯……”于是墙上映出两个碰杯的影儿。“叭”一声爆竹，眼前的幻影不见了。她仍然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桌前。

孤独，灵魂无依的孤独！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屋里的寂静。她开开门，一股热气扑面。“哎哟！大娘，大年三十的怎么早早就躺下了？”李俊莲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饺子高声说着走了进来。她“暖暖”两声，又到厨房拿来筷子递到她手里，低声说：“大娘，这是头锅饺子，你先吃。待会儿，我领孩子给你放鞭炮来。”

她像喝了一碗通气、开窍、活血的丹参汤，全身脉络畅通了。喜滋滋地说：“好，好，我吃，我吃。”忽然，她把手里的筷子放下了，认真地说：“我说俊莲呀，这大年三十的可不兴往外送东西呀！”“怎么？”“今儿个往外送东西，这一年光出不进，日子要紧巴。”李俊莲笑了，说：“大娘你放心吧，从咱们安居巷到安居巷，从我家到你家，不分里外。”她笑眯了眼，连连点头又拿起筷子。

爆竹声中，又是一家邻居端着饺子进了屋。接着，东家一碗，西家一盘，她的家像开了饺子馆似的，桌子上，小柜上，到处都是饺子。

那个除夕之夜，她家的门一直敞着，灯光彻夜亮着，当太阳公公笑眯眯地爬上窗台的时候，安居巷的人们又川流不息地来拜年了。这个问好，那个祝福。娃娃们把给老奶奶磕头当作乐趣，他们小屁股朝天，磕起来没个完，逗得大人们笑声不止，她更笑得前仰后合。是呀，李林枝大娘一辈子家里没来过这么多的人，一辈子没过过这样热闹的年！

四

谁知，好景不长，风云突变，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搅得安居巷不安起来。空气对流形成的旋风，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人间的一切都变了样。李林枝大娘的亲人们没有了，亲闺女般的李俊莲不见了，政府的救济金停发了……。

一天，老人颤巍巍地走下楼梯，来到小巷，她想找个人问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下子她又孤独得无人过问了。哎呀！小巷里铺天盖地贴着红的、绿的、白的纸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小“苍蝇”，使得老人眼花缭乱，头昏目眩，忽然，一阵“打倒！打倒”的喊声差点把老太太震倒。她悄悄地自己叨咕说：“哎哟，开天劈地没见过，这回可真要天塌地陷了！”她回到屋里，像霜打的老瓜秧子，蔫在床上。

天黑下来了，她在床上翻腾着，耳朵里老响着“打倒！打倒”的喊声。她往左翻，床上是针，一直刺到心里；又翻到右边，枕头上是刺，扎她的头。老人再也躺不住了，她坐起来，下了床。她要去看俊莲。俊莲呀，我的好俊莲，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啊！

李俊莲，这盆不冒烟、不蹿苗的炭火，被一盆盆冷水从头顶浇到脚后跟，炸了。

听听吧：

“李俊莲为什么把那个孤老婆子当佛敬，还不是等老太太一伸腿，好擎受那间房子……”

“人都是无利不起早，李俊莲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好往上爬……”

“那个老婆子为什么从山东来到大连？说不定是个逃亡地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李俊莲对地主好，就是对人民的恨。”

……………

一夜之间，李俊莲变了形，走了样。

李俊莲气昏了，病倒了，双腿瘫痪了。这个常年脚步不停的人，如今不能动了，上医院都得人背、车推。

李林枝大娘蹒跚地摸索到了李俊莲家。她看到李俊莲那方正的脸庞成了瓜子形，柔和的方额上凭空出现了几道皱纹，那双有力的方肩像被削去一半，窄了。大娘的心像猫抓的一样痛啊！她紧紧地拉着李俊莲那双冰冷的手，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话来。

李俊莲见了她日夜惦记着的大娘，多么想痛痛快地哭一场，倒一倒肚子里的苦水呀！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她把涌上来的苦、辣、辛酸使劲地往肚子里咽，嘴角上故意露出一丝微笑。可是这笑，在大娘看来，比哭还难受。李林枝也听到一些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她也屈。可是她信命，命里八尺，难求一丈，自个本来是要饭的命，想吃现成的当老太太，这不是罪过吗？倒是俊莲不该为我受冤枉啊！她扑到李俊莲身上，抚摩着她的脸，断断续续地呜咽着说：“孩子，你为大娘操碎了心，出尽了力，到归终好心不得好报啊！大娘替你屈得慌……再别管我了，我这一把年纪了，你为我受这份罪，划不来呀！”

老太太一句一泪，珠珠泪水落在李俊莲的脸上。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双手搂住大娘，真的大哭起来。

五

一天，李俊莲的丈夫王士清下班回来，眼睛鼻子都歪扭了。他把帽子使劲地摔在床上，坐在那里发怔。李俊莲很少见他这副样子，就问道：“你怎么啦？”王世清闷声闷气地说：“我在街上看见大娘了。”“她上街干什么？”“她穿件破褂子，背个破麻袋捡破烂。”“啊？！”李俊莲脸涨得通红，眼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天哪，七十多岁的人，连走道都不灵便，还能捡破烂？！”“这是逼的！”王世清几乎是在喊。“谁逼也不行，有咱们在，安居巷的人不死光，就不能让她去扒拉脏土堆！”李俊莲斩钉截铁地对王世清说，“你去把大娘找回来。”王世清一时没有动弹。李俊莲发怒了：“你去把大娘给我找回来，现在就去！”王世清出去了。李俊莲望着丈夫的背影，自语道：“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当然，捡破烂并不是坏事情，也并非丢脸，可李俊莲有她特殊的理解。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有要饭的，有儿有女的老人去捡破烂，说明儿女的不孝。李林枝没有儿女，可是有安居巷啊，有她李俊莲呀！既然安居巷没有家家户户都去捡破烂，李林枝大娘就不能去。

当天晚上，李俊莲就让王世清去给大娘送米、送面、送油、送菜、送钱。虽然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王世清也没断给大娘送这送那，这阵李俊莲却觉得不够，远远的不够。

灯光下，她又强咬牙关，忍着双腿的剧痛和两手的麻木，找出了一些新布、新棉花，还有准备给自己治疗老寒腿的新丝棉，给大娘做被、做棉裤、做小褂。在过去，她、刘翠香和大伙没闲着给大娘缝这补那，但那大部分是旧的。这回她要做新的，她要让李林枝这位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孤老人，穿的新，戴的新，铺的盖的全是新！

安居巷啊，不愧叫安居巷。人们在动荡中稳定了情绪，头脑更清醒了。随着李俊莲的脚步，大家又向李林枝伸出了援助的手。刘翠香、矫淑滨、孙淑娥这些居民干部、老邻居，还有周围的群众送吃的，送穿的，送用的……张玉兰这位长年为大娘清扫的卫生主任，仍旧天天来给大娘收拾屋子。她不仅扫去了屋里的灰尘，更扫去了大娘心头的忧愁。

李林枝大娘，在安居巷里又得到了安居。

六

动乱过去了，安居巷这朵精神文明之花，历尽严寒，开得更美更艳了；李俊莲这盆炭火，由于党和群众不断地加炭拨火，她不仅复燃了，而且越烧越旺，她和李林枝大娘情更深意更浓了。

李俊莲身体不好，从不舍得为自己买点好吃的，却花钱买来葡萄糖、麦乳精给大娘补养身体。老太太爱吃柿子，大连见不着，王世清从北京给捎来了。八月螃蟹顶盖肥，谁见了都要流口水，李俊莲高价买来，连只蟹腿都没拿给孩子，坐在大娘床边，把那白生生的蟹肉一点一点地挖出来，送到她的嘴里。

人们都说，闺女是娘的贴心小棉袄，恐怕未必天下的“小棉袄”都能做到李俊莲那样，不然的话，李林枝大娘为什么使一些老人羡慕呢？

这不，李林枝大娘和邻居闲唠嗑，无意中说了句：“我这两天心里老觉得闷得慌。”第二天，电影院里就出现了李林枝和李俊莲这一老一少的身影。李俊莲把嘴贴在大娘的耳根上，手不停地往银幕上指指点点。老太太张着嘴，一边笑一边点头。出了电影院，娘儿俩又坐在小馆里吃饺子。服务员端上饺子，李俊莲先夹了一个尝尝，不咸，于是肉蛋饺子馅都夹到大娘的碗里，她自己吃空饺子皮。同桌的两位老人对大娘说：

“老太太，你的命好哩，摊了个孝顺闺女。”大娘一边点头一边笑：“命，不信啦，是共产党好，才有这样好闺女呀！”听话的人不知内情，一直端详这娘儿俩的模样。

人们都说梧桐知秋，可是安居巷的人们秋分刚过，居民干部们就早早地给大娘安上了炉子，劈好了柴。李俊莲呢，她正迎着瑟瑟秋风，拉着一平车大块煤。这是她自己用一个月奖金买的一走来了。她一步一步地拉呀！周身的热量驱走了秋凉，汗水湿了内衣。车上装的是能发光生热的黑色金子，拉车人的血管里的血液正在燃烧，这是从金子般的心房里流出来的燃料啊！

有人粗略地计算一下，十几年，李俊莲为大娘花的钱，能买一台电视机还有余。

“李俊莲为什么对一个孤老人这样孝敬呢？”人们经常这样提出问题。李俊莲的回答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她说：“因为我是人哪！”“因为我是人”这句话似乎还不能让人完全理解她所做所为的动机，更不能把她的思想升华到一个高度。

其实，何须刨根问底？时代，我们的时代就是塑造美好心灵的熔炉，党的优良传统就是培育高尚情操的基因，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就是产生善与美的渊源。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对于做坏事的人似乎容易理解，当一个人做了好事，却总要打上几个问号。

七

春天，安居巷的春天。迎春花儿抖着金纱在召唤着海棠和玫瑰。李林枝犹如一枝老牡丹被簇拥在万紫千红之中。

“走，看看咱们的老太太去！”这是已经当了奶奶的老邻居苏联芳、王传珍两个老姊妹，拎着点心看望李林枝来了。

如今“咱们的老太太”已经是安居巷人们对李林枝大娘的共称。

安居巷有位患淋巴癌动过手术的王宝琛，有一手理发功夫，虽然身体一直没恢复好，可她把“咱们的老太太”时时挂在心上，每月都来给老人理发。惹得老太太心疼地说：“我说宝琛呀，你病病秧秧的，老惦记着我这几根头发干什么！”

在老一辈精神的熏陶下，这里的年轻人对老奶奶也深怀敬意，有的踏上工作岗位，第一次领到工资，首先给老奶奶买点礼物。真叫前有车后有辙，什么染缸出什么色的布。

十九岁的朱莉每年冬天都给老奶奶倒炉灰，每逢电视播放电影，她都跑来提个醒。若是安居巷哪家娶媳妇嫁闺女，头一件事就是请老太太去坐席。有时老太太不愿动弹，办事的人家就把席上的菜，般般样样地送些来。要问这两年安居巷娶了几房媳妇，老太

太吃了几家酒席，李林枝自己也记不清。还是安居巷的人们回答得好：“老太太！你的家大，人口多，孙子、重孙子也多，往后你就擎等吃大盘子吧！”

是啊，安居巷有多大，李林枝的家有多大，安居巷有多少儿女，李林枝就有多少儿女。不，这还远远不够，你看：

三元街粮站服务员送粮来了。

云山煤场的服务员抬着大块煤来了。

铁路西站送劈柴来了。

崔大爷生前所在单位周水子车站送补助费来了。

广和商店营业员推着秋菜来了。

铁路卫生所的大夫背着药箱来了。

解放军开着吉普车来了，他们拉着大娘去观看市容的新变化。

市、区、街道党政领导同志来了，他们向李林枝问候。祝她健康、长寿！

来了，来了，社会方方面面怀着一颗颗火热的心为孤独的老人送温暖、送情意来了。

来了，《大连日报》社的记者，

来了，大连广播电台的记者，

来了，大连电视台的记者，

来了，《北京周报》的记者。

他们在这里把美好的镜头，动人的场面摄取下来，报道出去，并向人们说，要了解我们国家的风貌吗？请看安居巷！要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吗？请来安居巷！

在这篇报道脱稿时，李林枝大娘告诉我说，李俊莲作为一位群众新选的代表，出席了大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完会她给大娘带回来两个会上发的肉包子，还悄悄地对大娘说：“这几天开会，吃得可好啦！我真想用塑料袋样样给你捎点来，又怕人家笑话。”老太太用手挖着她的额头：“你呀，可别给我丢人啦！”

发表于1984年《海燕》

张学思将军（节选）

刘永路

溪口探兄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向中国腹地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当卢沟桥炮声隆隆的时候，张学思正在北平。他在6月末，向万福麟请假回天津探家。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到北平向冯静安汇报工作，并请他尽快帮助自己找到原组织关系，恢复党籍。

七七抗战打响后，社会上风传张学良将出来继续领导东北军。舆论代表民意，就连宋哲元、傅作义这些国民党大员也希望蒋介石能放张学良出来抗战。在这种情况下，狡猾诡诈的蒋介石也放出了可以释放张学良的风声。

张学思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他想，大哥若能获释，不仅可解除身陷囹圄之苦，而且会大大有利于中国的抗战。经过西安事变之后，大哥一定会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从而积极和共产党合作，全力以赴率东北军抗日复土。张学思和冯静安商量，决定亲自去奉化溪口探望被幽禁的张学良将军。

华北弥漫着硝烟战火。卢沟桥激战犹酣，平汉线不通车，平津线也时断时通，张学思颇费一番周折，才从北平回到了天津。7月中旬，他从塘沽港搭乘英商太古公司轮船，从海路到达上海。

在上海，张学思与大嫂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见了面。自从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被解到奉化溪口看押后，于凤至从美国回国，前往溪口探望张将军。不久，赵四小姐也从香港回来。两位女眷均住在上海，每周轮流由上海去溪口陪伴张学良将军，有时俩人一同去。

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对待张学思同亲弟弟一般。早在沈阳之时，她们就经常带他与张学良将军一块儿游玩，因而张学思同两位嫂夫人的感情一直很深厚。尤其在大哥被幽禁之后，两位嫂夫人作出了巨大牺牲，陪伴在大哥身边，体贴关怀，精心服侍，这使张学思对两位嫂夫人十分尊敬。

张学思向两位嫂夫人说明了来上海的目的，两位夫人自然非常高兴。她们告诉张学思，凡是去溪口探望张学良将军的人，都要经过军统局和蒋介石的亲自批准。她们担心

会有刁难。张学思认为，“二哥和三哥均在国外，家里只有我是他最大的弟弟，他们没有不批准的理由。”一天，蒋介石派来一位姓黄的代表到上海，约赵四小姐同去溪口见张学良将军。他会见了张学思，说蒋委员长早就有释放张将军之意，此次派兄弟我与张将军谈话，就是为张将军出来作准备。张学思向他诉说了自己探望大哥的愿望，经这位黄代表电请蒋介石，获得了批准。于是，张学思、赵四小姐，还有“黄代表”一行三人，一同乘上由上海开往宁波的客轮。

在宁波的轮船码头，张学思和赵四小姐受到警察局的严格检查。除带给张学良将军的一些食品和书刊画报外，他们并未发现什么“违禁物品”，这才由一个姓应的副官陪同，乘上了去溪口镇的汽车。

距溪口镇西北约十公里处，有一座巍峨秀丽、峰峦叠嶂的雪窦山。山上有座雪窦寺，它建于唐代，重修于明朝，是我国佛教禅宗著名十刹之一，庙宇宏伟，古色古香。在寺的西隅山麓五百米处，是水基岩风景区，建有中国旅行社的十几间房屋，结构美观，设备考究，十分宽敞。这些，对于有闲情逸致的人，当然是种高级享受，但是，对抱有满腔复土救国热情又被剥夺了自由的张学良来说，美丽的风景，舒适的生活条件，都只能加重他的精神折磨，这大概也是蒋介石的一大创造。他把张学良将军送往溪口，幽禁在这里，让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欣赏美景！此前，“中国旅行社”的牌子被摘掉了，改成了“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然而“招待”他的却是三十多名便衣特务和一个连的武装宪兵。

张学思一行到达雪窦山的当晚，就在这幢“招待所”里下榻。张学思被指定与特务队长刘乙光同住一屋。那位“黄代表”与队副徐建业住在另一屋，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当然被“招待”在最阔气的房间里。只要能把鸟儿关牢，再贵重的笼子，蒋介石也是舍得。那些特务和宪兵均在雪窦寺内，居高临下，便于执行他们的“招待”任务。

第二天早饭后，“黄代表”找张学良将军在客厅里单独谈话。张学思和赵四小姐与特务们打牌。直到天晌，张学良将军才出来。张学思发现大哥的面色不悦，心里感到蹊跷：“不是说蒋介石要释放大哥吗？难道……”他揣想，准是蒋介石又打大哥什么鬼主意了。他想问问大哥，但周围尽是特务监视，除了谈吃、喝、玩、乐外，不能说别的。

午饭是很丰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每顿必陪。张学思打心里讨厌他，张学良将军却毫不介意，谈笑自若，他的性格开朗得很。

午饭后，张学良将军兴致勃勃地邀张学思和赵四小姐去游览雪窦山名胜。张学思笑笑说：“大哥，天这么热，还是明早再去吧！”其实，他是想找机会和大哥说会儿话。因为他此行的目的不仅是看望大哥，更主要的是要探明大哥有无获释的可能，听听大哥

对东北军的前途和抗战事业的看法。“喂，你难得来一趟，怎能不尽情逛逛！”张学良将军似乎一点也没有理解四弟的意思，他一手拉着赵四小姐，一手拉着张学思：“走吧！走吧！不抓紧时间，过两天下起雨来，想逛还逛不成了呢！”

在特务们前后“簇拥”下，张学良将军游兴十足地上路了。他穿着短袖衬衣和短裤，特务们也穿着于凤至送给他们的汗衫和短裤，惟有张学思穿得很严整，风纪扣也不打开。张学良将军指着张学思风趣地对特务们说：“你们看，我这位弟弟，像不像一个标准的卫兵？”特务们哈哈大笑起来。张学思虽然也附和着笑了几声，心里却一阵心酸。大哥呀大哥，以前是忠于你的卫队保卫着你，现在是忠于蒋介石的一大群荷枪实弹的特务在看押你、监视你，只要主子一声令下，这帮特务随时都可置你于死地，而你又不不得不跟他们谈笑，跟他们游玩！

雪窦山是四明山支脉的最高峰，海拔八百米，属我国名山之一，风景优美，名胜很多。张学良将军一路指指点点，谈笑风生，赵四小姐温柔而活泼，不时地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惟有张学思不吭不响，想着心事。他们一行人走出二三华里，便来到了千丈岩风景区。张学良将军平时最喜欢到这里散心解闷。千丈岩是雪窦山最著名的地方，它悬崖峭立，高数千尺，有两条小溪汇合起来，从千丈岩顶倾泻而下，形成巨瀑，喷薄如雪崩。据说，雪窦山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千丈岩的对面，有个飞雪亭，从这里凭栏观瀑，其势犹如银河落天，龙虎怒啸，雷霆万钧，壮观不已。

“四弟，你听说过吗？北宋的王安石也曾在此处观过瀑布，还写过一首好诗呢！”张学良将军兴致极高，他不管张学思是否爱听，津津有味地吟起王安石的诗来：

拔地万里青嶂立，
悬空千丈素流分，
共看玉女机丝挂，
映日还成五色文。

“多么美妙啊！”张学良感叹起来，此刻，他的全部身心都仿佛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

这时，随行的特务拿出许多雪窦寺特产的大爆竹，张学良将军告诉学思：“这叫‘天地响’，放起来特别有趣。”说着，他点燃一个大爆竹，用力向对面的大瀑布扔去，顿时，一炮震天，万山呼应，巨大的响声回荡良久，张学良将军开怀大笑起来。

张学思也笑了，他是苦笑。本来是应该在前线炮火中指挥千军万马打击日寇的大哥，现在却只能在这里扔爆竹，蒋介石自己不抗战，还不让别人抗战。此时此刻张学思恨死了蒋介石。这笔账总有一天要算的，历史决不会饶恕这个民族罪人！张学思有一肚

子的话要和大哥说，哪有心思游山赏景呢？“莫非大哥忘却了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大志？”张学思望着闲情逸致十足的大哥，心在不住地下沉。

好不容易盼到了张学良将军回去吃晚饭，张学思心想，晚上一定要找个机会和大哥说几句话。然而，饭桌一撤，张学良将军却拉着他打起乒乓球来，还叫特务当评判。玩累了以后，张学良将军又拿出了国际象棋……张学思暗暗叫苦：“大哥啊大哥，你玩起来，把什么都忘了！”

其实张学良将军何尝不急于同弟弟谈话呢？但他知道，如今他处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与外人接触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细心观察、有人详细记录向上报告啊！

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在玩乐中消磨掉了。

第四天，也就是张学思临走的前一天，天空突然雷雨大作。张学良将军所预期的雨天果然来到了雪窦山。吃过早饭后，张学良将军对张学思说：“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书房里看看画报去。”这时，赵四小姐忙着张罗同特务们玩牌：“你们弟兄两个去吧，我们在这玩玩。”

张学良将军的书房，在走廊的尽头。里面有三座大书架，每座都六尺高，满满地摆着三层书，大多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此外还有一个报架！上面摆有《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报纸。张学良将军把张学思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座书架和一座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思顿时明白了，原来大哥已选好了谈话的场所啦！然而大哥示意张学思别吱声，他指了指墙壁，然后掏出了纸和铅笔。张学思会意，隔墙有耳呀，为了安全保险，大哥要用纸笔同他进行无声的谈话！

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飞写着：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将军看完后，用橡皮擦去铅笔字，也在纸上写起来……

他们的谈话是无声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似翻江倒海，电闪雷鸣！张学良将军告诉张学思，他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他“好好读书”。此次，蒋派那位姓黄的来，是要他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写信，嘱咐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张学良将军深为自己不能率军奔赴抗日疆场而激愤不已！他还告诉张学思，他是在宋子文保证之下跟蒋介石来南京的，未想到被扣。他要张学思设法告诉东北军各军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嘱咐张学思：“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张学思接过大哥递来的一张张字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腮边滚下，把字条淋湿了。灼热的文字，火一般的激情，燃烧着张学思的心。是啊！张学思怎么能不激动

呢！此刻，他心里想：多少年来，我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却因为政见不一，从没有谈过一次心。这一次是大哥在被看押的情况下和我谈的头一次心里话。可是，却只能用这种方式！张学思感到非常难过，他看到大哥满怀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却犹如猛狮入笼，壮志难酬。他想安慰一下大哥，可他自己却忍不住鼻酸泪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真想扑过去和大哥抱头大哭一场，把积郁在胸中的感情倾吐个痛快，可是，此时此地，哪里能倾诉兄弟之情呢？！对大哥的最好安慰，就是把他未竟的抗战事业进行到底！他在心里默念着：大哥啊，您放心吧，我已经找到了伟大的共产党，您的愿望一定会变为现实的。想到此，张学思擦泪挥笔，给大哥写下几个赫然大字：

“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突然，门外传来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声音：“张先生，下棋呀！”话音未落，门已推开。与此同时也传来了赵四小姐的清脆嗓音：“刘队长，你的牌还没出完呢！”刘乙光尴尬地把迈进门的一条腿又抽了回去：“哦，我对桥牌不感兴趣，想和张先生下下棋。”没等赵四小姐再说话，人已进屋。张学良早已收好纸笔：“你来得正好，看腻了。换换脑子！”

1985年

老树

——大连1986夏天的故事

陈昌平

一股台风在大连上空迅疾生成。

我说的不是1985年8月19日的九号台风，虽然九号台风以人类不可抗拒的强力，把大连裹在狂风暴雨里折腾了一天一夜，但是，它毕竟没给大连的今天留下点什么。

我说的是1986年6月的故事。阴霾的天空是由无数大脑及嘴巴并成的。一个“神话”，在呼吸80年代大城市空气的唇间传来递去，继而潮水般涌入每一个不甘寂寞或惯于寂寞或甘于寂寞的空旷心境。当时，这个故事几乎为所有的大连市民知晓并传诵。但是，在你看了我这些文字之前，你却未必知道我要说些什么。一切，似乎不着痕迹地滑过了所有记忆。

在世界上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城市道路面积一般占城市面积35%~40%，而大连仅占10.4%。大连市区现有的公路交通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了。大连市的总体规划里，确定要开辟、打通、拓宽的计有四十多条主次干线。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华北路。

打开大连导游图，在市内交通一图中，红线表明公共汽车的行驶线路，其中，红线稠密得以至形成一道红杠儿的路段，便是华北路。华北路原称沙周路。1986年春，华北路东侧拓宽工程开始。推土机、翻斗车、铲车、吊车和铁锹来了，现代化和半现代化的设备忙碌着。工程规定，凡属拓宽范围之内的，是房要拆是墙要扒是树得伐掉。拓宽工程像台坚决而又一往无前的铁道车。工程进展顺利。当进行到市第三中学门前时，铁道车却没有豪放地直驶。而是婉转地绕了个弯子，躲过了在拓宽范围之内的、本应伐掉的一棵树。

自然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台风袭来时，台风外圈和台风中圈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台风眼区却风平浪静。现在，三中门前就是平静的台风眼区。

机关无非是这样。老张知道，他八点上班或是九点上班，或是一天不上班，都不会影响局里工作的。但他依旧差五分八点便走进大楼。三十多年啦，他都是提前五分钟。今年开始干部休假制，他休了半个月，这半个月对他像关禁闭。休假后，他觉得大楼很可爱。

早上，一进办公室，他就听见有人说话。

“都这么说，我们家那儿传反啦。”

“谁割谁倒霉，还都去看呢。”

“不可全信——不可不信哪。”

老张向来讨厌早上磨牙闲扯。他随手翻过一页不着字迹的台历，又拿起桌上的“政工简讯”。

“喂，老张，你听说没听说你们家那儿树的事？”

“嗯。”他知道躲开那些扯皮的最好办法就是说你全知道了。

“真有一割就流血的事吗？”

老张应付地笑笑。他自己也不知支吾了句什么，就拿起暖壶。他发现水房里也有人在议论什么树不树的。厕所里也在议论。稍稍一用心，他发现各科室都在议论着大同小异的话题，有人在电话里也说，互相交流体会。

“打水呀，老张。”

“哦，局长，打水。”

“休假挺好呀，是半个月吧？”

“是半个月……”

“嗯，老张，你家是不是在刘家桥？”

老张想了想，觉得自己家是住在刘家桥，就郑重地点点头。

“怎么都说那块出了棵神树，到底——”

几乎是在同一天，也就是6月6日这天（我想提前一天或推后一天都没关系）。随便一座大楼，随便一处商场，随便一个车间，随便一节车厢或随便一处比如电影院酒店厕所之类的什么地方，人们都在生机勃勃地议论同一个话题。现在谁也不能阻止人们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了。同时，人们也有的是时间去发挥一下已被生活挤压得不那么丰富却仍然敏捷的想像力。区别仅仅是有的人充满激情并加以再创造，而有的则不那么热情，甚至呆板。如此而已。

三中门前，稀稀落落地有了百十号人，等待集合拉练似的。

谁要锯这树，谁就拉稀肚子疼。告诉你好汉架不住三泡屎。这树割（音 g ā ，大连方言。）就流血，泡你是儿。熊人？！嘿你这老兄，我们车间孙书记他老婆亲眼儿见的。看看，谁在那枝上挂了红布呢。听说有人上去割，一下子摔下来了，你猜怎么啦，胳膊断啦。放屁！树叶子能治病？！这玩意儿治病是这慢工夫。心肌梗塞癌伤风感冒肺炎小儿麻痹高血压鼻窦炎月经不调脚气长粉刺儿什么的全治。放屁。用三两树叶，晾干，捣碎，黄酒冲服，最好加几钱人参。老爷子有那么神吗？这年头信不信由你，心诚则灵你懂吗，不诚不灵半诚半灵四分之一诚四分之一灵……

过往的车辆大声鸣笛。挡着道儿的都往边上靠，给车让路。

有的车停下，司机歪出头打听……

要绿化处的人相信这些，就像要他们相信明天每人分套房子二室一厅有阳台朝阳或工资浮动二级奖金若干一样。

这棵树确实在被诛伐之列。它所以幸免，是由于——也仅仅是由于它老了。没人知道它有多少年历史，但它确实很老很老了。老了，便是资本。1981年，大连市搞古树名木调查，给银杏、刺槐、龙柏等树里的“寿星”挂上了小牌牌。牌子上写了此树属于保护树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之类的话。这棵老树，学名小叶朴，俗称黑弹树，又叫嘎巴树，是小叶朴家族中的长老，自然在保护之列了。

该给它一个镜头了。

位于三中校门的北侧，傍着校园的灰墙，躲车似的斜着树干，如果把它比作人的话，它绝对是个有着硕大头颅的车轴汉子（无论如何也配不上高大魁梧神采奕奕之类的词儿）。粗墩墩的树干上遍是怪模样的疙瘩。树干直径五十公分，胸干高1.7米，树高六米。枝叶依旧繁茂并散散漫漫，遮住一片时阴时晴的天空。

50年代，华北路铺设柏油，伤了它的些许根须。当时便想拿走它，可它太苍老了，和土地连得太紧，拿不走。

60年代，华北路拓宽，也拿不走。

它太老了，和土地连得太紧，拿不走。于是便绕着它修了个长五米、宽三米、高一米的水泥墙围，框着老树。此次拓宽华北路，正值春季。绿化处准备在冬天，把进入冬眠期的小叶朴移到旁边的春柳游园。

就是这么回事。绿化处的人跟人解释着。听的人都笑一下，不信。

这年头的人都认为相信别人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冒儿。

台风眼区的安静从来都预示着更大的风暴。

7日，华北路断断续续受到阻塞，尤其晚上。华北路是大连的咽喉。它是大连市区仅有的二条通向外界的干线。它联结旅顺，通向周水子国际机场，指向马桥子开发区，贯通着辽宁的第一大动脉——沈大公路。阻塞华北路，对三面环海的大连来说无疑是如刺在喉。

8日上午，大连市建委、市创三优街办公室、绿化处三方开会研究。会议结果：树，不动。做群众工作，反迷信。

老张一注意，发现左邻右舍大人孩子都在叽叽喳喳地说树。

饭后，走出家门，拐过道口，远远地，他看见三中那边许多人立着。走近了，看清了那些人都是嗡嗡地讲话，东一堆儿西一撮儿，更有许多人像逛自由市场一样左听听右看看的。讲的都是同一个话题，反过来复过去，没有太多的创新与突破，但讲到精彩处依然感叹。没话儿了，便都看树，眼珠亮亮的。

老张在基层干了二十多年，他知道这些人在厂子里是什么样的精神头儿。高压钠灯橘红色的灯光照着一张张兴奋的面孔，他又一次沉重起来。

他1957年从师专毕业，毕业了，便改行搞政治工作。说工作需要。这一改就是三十多年，成绩便是家里那足足一捆子奖状（前些年全在墙上挂着，后来让儿子全摘下来了。他又挂，儿子又摘下，说现在谁还兴这个呀）。他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最实际的认识，即别人想什么，你该知道，或者像前些年常说的那样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他一丝不苟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他知道即使现在他撒手西去，他也敢拍着胸口说我老张问心无愧。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越是认真地做，越是不知工人在想什么或者说为什么那么想。上个月，儿子突然说要停薪留职（他觉得现在的日子尽出些突然的事儿）。于是他这个当老子的第一次发火砸桌子摔碗，于是从前绵羊般的儿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很有主意地一言不发，然后走了。那天晚上，老张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是不是错了。

他知道他发火并不仅仅是冲着儿子，还有些别的说不清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并不仅仅代表自己，他无法接受“错”字。

旁边有几个熟人，他赶紧躲开。

孩子骑在爸爸肩上，妻子在后面扶着。

孩子问：“爸爸这树流血，给他打针吃药吗？他哭不哭？”

爸爸颠着孩子玩：“它是神树，不打针，也不吃药，谁要打骂它就不是好宝宝。”

“别迷信啦！”妻子嗔怪着。

“这也是知识嘛。”丈夫扭头。孩子大声喊着：“爸爸我不打他，我是好宝宝。”

围观者骤增，大趋势是越来越多，而且晚上比白天多。交警和公安警察都出动了。广播车来来去去地宣传。绿化处的十几个人围成一圈，边护着树，边解释。

有人在树上系了条条红布。绿叶烘托着，醒目无比。又有人在树干上贴了红纸，红纸上全是字（有几份楷书写得很漂亮），大意是祈求老天爷保佑……一浓眉大眼鼻直口阔的中年人，从枝桠上极小心地折一根小枝儿。有人问，他便说老母腿脚不便已有多多年，今儿个求点神枝带回家熬汤……有人不屑地笑，有人啧啧称是，但更多的则是温情的讪笑与宽容的注视。绿化处的人出来喝止，众人便一齐辩护……又有几个穿一套白衣的人（那是附近医院的）也争先上前，动作粗野，但表情虔诚。

一切解释，阻止和围护都如同油，“火”越烧越旺。春柳、车家村、刘家桥一带居民自不必说，连金西路寺儿沟栾金村一带的都来了。许多人下班后径直赶来，风尘仆仆，饿着肚子……事情完全按自发状态进行，任何宣传和解释甚至是不无粗暴的阻止，都恰到好处地刺激了围观心理的膨胀。

又一个“中国特色”。

此时中央电视台正播放世界杯足球录像。大连号称足球城。

我不说了嘛我就是来看眼儿的。

记者就扯屁，那个物价一个劲儿长，你们怎么不敢报。

我就乐看，这是我的权利。个人自由你懂吧。

您好，我是记者，能请你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吗？哪个事。就这树哇。唔——。随便说说。唔——。今年收成不错吧。我开车，不种地。那个体户了你，有技术，又赚钱。嘿嘿行吧。你相信这树有神。唔——都这么呛呛，恐怕成精了。你信吗？我——我们那儿有个算命的，前年春节就说我能交上好运，暖，真灵呢。你不认为是政策好吗。唔——反正好到一堆儿去了。

哦——我看，没必要说明我的工作单位了，普通一兵嘛。我也是随便来看看的，随便。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啦。我认为关键一点，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放松了。没有党的、

坚强的领导，没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我们的事业就没有保障。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你……我就不多说了。

青海塔什么寺，拜佛烧香的人老鼻子啦。可不我出差亲眼儿见的。走一步一磕头，头都乌啦，可……可忠于呐。噯，信仰自由，谁管得着吗，这也是前些年了，你说是吧记者同志。咱这也是自由。法律保护是吧记者同志？！

靠边儿靠边儿都让让让让来让让戴眼镜的那个。

他是这一带著名的疯子。他穿着整齐，且表情庄严。不说话，你还以为他是某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主任科员什么的。

但是前胸的那个像章却让人觉得这个人确实有问题。

家里人曾把他的像章摘下藏起来，于是他便失了魂魄般的疯起来，把衣服撕扯得一条条的，而且看见女的就把那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出来比画。家里人把像章给他别上，他立刻就规矩起来了。谁都没办法，只好由他去。

此时他正猫一样地接近人群，表情郑重地倾听，偶尔双眼发直：“革命群众们，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封建迷信向无产阶级专政丧心病狂进攻，海兰江畔战鼓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他脖颈上的经脉蚯蚓似的蠕动。

都露着或黄或白或黑的牙笑，听相声一样。

10日，混乱空前。

下午4时，车辆尚能改革一般艰难地通过华北路，但人群已散散漫漫地涨到路面。7时，华北路完全阻塞。

前车过不去，后面的又使劲儿按喇叭。一辆个体小三轮，仗着体积小车身灵，硬是钻进人群……有人横在轱辘前说撞着他腰了，于是司机赶忙拱出来，赔着笑脸和小心，并不分辈分地乱叫大哥。如潮如涌。不知谁发声喊，小东西就给掀翻在地了。反正个体的，众人看着仰壳的小三轮……一带拖斗的大解放进来了。司机有着导师一样的络腮胡子，又拍车门又鸣笛。人群，彼此都因为对方而无动于衷，有点众志成城，可“络腮胡子”也十分了得，大解放似的闯过人群。司机呼呼地喘着粗气，顺眼扫一下反光镜：拖斗？……

许多年轻人冲着脱钩的拖斗大笑大叫，像缴获了战利品。也有人在轻轻地叹息，默默摇头。

一辆鸣着音乐笛“泉水叮咚”的北京吉普，借着大解放的余威拱了进来。有人把拖斗里的绳子系到吉普车的油箱架上。

群情激愤，如火如荼。车前的人自动闪开，很有几分决斗的味道。吉普车引擎哐哐哐直叫，车轮纹丝不动，且慢慢后退……众人迸发出强烈的哄笑。这哄笑来自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平日，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单位，都少有证明自己自身的时候……吉普车在参差不齐的喊声里又一次向后退……

本文开头，我曾说过这一切都因为树。这是句蠢话。至于为什么，这是历史给我们时代的一个命题作文。这个作文的优劣，将决定我们是走进21世纪还是被拖进21世纪。

我曾极力想把握围观者的心态。

当然，这里有迷信有愚昧，有曾给我们民族带来灾难的疯狂激情，但这些毕竟不能用迷信二个字来解释。

当然，这里有社会心理经历一次大的跌落之后，条件反射式的怀疑，有社会突变时期倾斜心理的借机发泄，也有原因更为错综复杂的怨恨、不满，甚至还有现代社会唤起的人与人渴望重新温暖的朦胧愿望，但是，这些都不能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至于生活的单调与无聊带来的消遣心理，至于闲来无事看眼儿玩玩而已之类的说明，更给事件本身蒙上了一层平淡的色彩。

11日，上午。市建委等有关部门再次开会。会议结果依旧，不同的是保树的决心更大。

警察出动，连辽宁警校和大连警校的学员也动员了，便衣在警觉地观察。老树前的空气绷紧了。不断的推挡、工作、呵斥之后，围观者被阻在华北路两侧……很块，人们又在路的两端站上了。警察努力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体育场看台状的椭圆格式：四面皆人而中间空空。警察来了，便朝后退；警察去了，就朝前涌，其套路全然符合老人家的“十六字诀”。

下午，电视台录像。有抢镜头的，多是年轻人。

天开始暗。蓝蒙蒙的大气里浸透了起哄、喧笑、呵斥、议论及找爹喊娘的斑杂声响。人如蚁。有人说五万，有人说十万。谁也没见过这阵容，谁也咬不准。从刘家桥到春柳，伸脖子跷腿看，全是头，或黑或白或半黑半白。

楼越盖越高、越盖越漂亮，可人与人却越离越远。很多人来，就想看看这阵势。

人山人海啊……

回去吧大婶大爷同志小朋友大娘小伙子哪有什么神树有啥看头别迷信了什么年月啦往后后面去去你听见没有快点快三个数呀好一二三怎么回事聋啦往后往后。你有能耐你割呀你割呀你割呀割呀敢吗呀你不怕死你割给我看看来来来来呀这年头还玩嘴吗我说实在的。

许多喉咙一齐发出含混不清的喔喔声。喔喔什么，说不清，但喔起来、尤其是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地喔喔，却可以感到一种奇妙的快活，颤抖着，从头发丝儿到脚趾盖儿都有感觉。

这感觉是曾经有过而现今陌生的。

这是1977年之后大连最大的一次自发聚会。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事实。从前，这棵树后面是土地庙。庙后面便是这个村那个屯的。大连一解放，人们便把庙里的神像砸了，60年代，又把庙扒了。这样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结果一个规模更庞大气势更雄伟的祠庙却在建立，建设者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于是在人头浮动的“黑海洋”下面，我看到的是民族文化心理低层绵延不绝的浊流。

本世纪开始的风风雨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使jiedawang7848我们不可能把目光投向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上，夺取政权后的历次运动，不仅冲淡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力，而且使这股浊流在60年代末的中国激起了最大的未必是最后的浪花……噩梦乍醒，“腐朽的已经很腐朽了，而年轻的还很年轻”。每一个受传统观念浸淫而又呼吸现代空气的中国人，都不可能不在心灵深处感受到一阵阵痛楚的冲撞。

毕竟是80年代的敞开大门的中国啊，要在这开放的天底下不居人后，一切冲撞一切阵痛便都在劫难逃！每一次冲撞都在提示一个结局，正如每一次阵痛都在寻找一个开始……

八时，迫于无奈的现场聚会。

谁都明白这次会议需要什么样的决定了。

看见吉普车让人拽得嗷嗷直叫，他真想冲上去大喝一声，像火车站前“禁止携带危险品”的巨幅宣传画里的同志那样，伸出腿一样粗壮的胳膊，张开五根胡萝卜般的巨掌：住手！……

他似乎感到了众人听到他断喝之后呆若木鸡的表情。他没有这么做，但心里却稍稍宽敞了些。

路灯散发的桔色的灯光，给每一张兴奋的脸孔涂上了喜庆的色彩。耳边眼前嗡嗡嗡嗡的，像有无数蚊子。听不清人们都在说什么，人头高高低低地参差着并且不断动荡，表情依然是好奇兼饶有兴致，间或有人显出迷茫无聊的神色，那意思也是说这个节目没看头啦来下一个吧。所有的目光都包含着内容不尽相同的期待，可恼的是老张觉得自己也在莫名其妙地期待什么。这几天他已经习惯来这儿了。老张大哥吃啦，邻居问。出去溜溜，他顺口说。

而且，他觉得自己开始习惯这种气氛了，就像他习惯办公室那庄重又松懈的环境。他讨厌同屋人叽叽喳喳的碎嘴子这个长那个短的，可有一次他独自在办公室呆了一天，心里既慌又乱，那么渴望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眼前这阵势就是放大了千百倍的办公室，他觉得很像一只大锅，大锅热气腾腾，每一张嘴都是锅里的气泡，气泡一胀一灭又一胀一灭……自己就在这口锅的蒸气的笼罩里，轻轻地，心里有块什么东西、无可奈何地消融了、塌陷了、溃散了、逝去了……那东西曾是他多少年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仔仔细细保护的啊！

他撑不住了。

思绪飘来飘去……那是大连刚解放，金州镇里有座关帝庙。关帝庙砖瓦业已残破，但气势犹存。政府要扒庙。老人们都说这庙是海龙王借给关老爷的一箭之地，关老爷座位下有口倒扣的铁锅，扒了，锅就翻，锅要是翻了，海水就要淹了镇子。于是扒庙的前一天，镇里人都朝镇南的山上跑，携家带口背筐拐篓，像电影里表现的鬼子进村乡民转移一样，全镇人跑了一多半儿……那年老张十四岁，背着小脚老娘，颠儿颠儿地跟着人跑……

警察大汗淋漓地左挡右堵。前边的人往后退。有人重重地踩了他一下。一个小伙子缩在人堆里开警察的心……一瞬间老张突然觉得，从前的事和眼前的事隔得那么远，却竟然那么相像，像在什么地方怎么个像法，他说不清，但他朦胧地觉得，两件事里，人们都少了点什么……

冥冥之中觉得背上沉甸甸的仿佛依然背着早已死去的小脚老娘。

割树了割树了，有人乱喊起来。

齐刷刷地芭蕾舞演员似的踮起脚尖，同时伸脖子。

老张又一次被前后左右的人携裹向前。

老树，枝叶最后一次吸吮来自大地的营养，披着它不得不接受的月光灯光及目光，轻柔地婆娑……

时间是11日晚8点30分。

大铲车和大卡车隆隆而至。

华北路突然安静。

电锯，响起来啦！

……

老张也朝树的方向看，却只见一排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脖子，终于见着黑黝黝的巨大树冠，有枝桠无声落下……人群飘摇。

向前向前向前，碴口白花花的，没血，拉锯的囫圇着，胳膊腿儿俱在，肚子也没疼，走道儿的姿势正常。表情正常。

去了头枝，进口大功率铲车加大马力，轰鸣着杀向老树。

不成样子的老树在铲车野兽般有力的低吼里摇晃起来，旋即根须脱离大地，带上少许泥块……根不深，司机想，有点出乎意外。

没啦没啦丢啦丢啦呀，疯子在叫。趴在地上，两手痉挛地扒拉着皮鞋布鞋拖鞋高跟鞋旅游鞋儿童鞋。

谁也不知他在找什么。

“这人怎么啦？”

“彪子。脑子病。”

“找什么呀彪样儿？”

“鬼知道，他家的彪病遗传。”

“爸，树怎么没流血？”

“树睡觉了宝宝。”

“睡觉了就不流血吗，爸？”

“小孩子丫丫刨根儿问底儿干什么？！回家睡觉！……噯，明天孩子送他姥儿那儿吧，他奶病了。”

“他姥儿欠你的呀，就你老妈娇贵？！”

1 2 3 4 5 6 7 8……有人数老树的年轮，喃喃有声，可一数过一百，年轮便乱了。没人数得清楚。

树心是黑的。老树的心都是黑的。

不断有人涌到树坑前，凑着头看。没人注意围观者此时的表情及目光。曾经连接所有神经的一线无形的游丝风一样倏然没了，思绪流浪一样又一次沦入茫茫然无所归依的境地……

回去睡啦，明几个还干活呢。再说明早七点有球，现场直播，世界杯。
大连人能不看球吗？！

没了。

老张心里空荡荡的，慌得难受，他不知该干什么，所以也不知道该想什么。

明早同事会怎么议论呢。局长问，怎么回答呢。地上好多纸屑烟盒烟头什么的。他活动了一下紧绷的身子，觉得不该再站在这儿了。

他觉得自己似乎知道不该干什么了，可是，该干什么，他又不知道。“我该这么干。”儿子挺着脖儿梗梗着，在他反对儿子辞职时。也许，该问问儿子，“我该这么干”是怎么一回事。

耳边，远远近近总有割树的声音。

上楼时，他觉得自己老了。

夜相当深。所有的窗户都没了灯光，城市睡大觉。

三中门前，只有一个人趴在地上找什么……

1 2 日，1 3 日，不断有人到中山公园，看被卡车运到这里的老树树干。

树干，白花花的圆形截面，黑心，眦目欲裂……

现在是1 9 8 6年初，冬天。

故事似乎过去了。

去年1 1 月1 6 日，香炉礁高架立交桥主干线竣工通车，报上说这是全国目前最大的城市高架立交桥。报上说大连市区交通南北阻塞的危机得到缓解。报上说十多万群众扶老携幼争相观看大桥的雄姿。报上说大连又多了一件可以引为骄傲的东西。

开放城市工业基地港口城市避暑胜地“东北窗口”棒槌岛燕窝岭凉水湾滨海路足球城马林贾秀全苹果和苹果一样爽快干脆的大连小伙儿大连姑娘们……

哦，多么值得骄傲的城市啊。

一股巨大的情绪缓缓地淹没着我。我不知怎样给这篇文章结尾了。

最痛苦的不是吃苹果时咬着虫子，而是把虫子连同苹果一道儿吃下去了。我想起了这么一句不是什么伟人名家说的不寻常的话。

吃苹果时咬着虫子，吃的人自然知道，并且一定沮丧。可是把虫子连同苹果一道儿吃下去时，别人以为比咬着虫子更痛苦，可吃的人却根本不知道里面有虫子呢。

吃的人尚且不知，那别人又何从知道什么痛苦不痛苦呢？那么，怎么能说最痛苦的是把虫子连同苹果一道儿吃下去了呢？

你所体验的总是吃着虫子的感觉。

随便说一句，小叶朴在大连是常见的绿化树。

发表于1986年3月《鸭绿江》

橄榄绿色的叶片

崔梅

引子

人生，光怪陆离，就像一个万花筒。每个人都是这五彩缤纷中的一点色素，或红、或蓝、或绿……刘丽君，她属于哪一种？我一时说不清。她，太淡，太淡。

山林里来的人

“我知道有人要来写我，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事迹。真的。‘文革’那些年，要是能偷着多学点东西，现在工作会更好些。可是，唉……”

一见面，她不让坐，却急着倒出这席话。

在公园的紫藤架下，我打量着这位60年代初沈阳农学院的老毕业生：已是知天命的年岁，却不见老态，线条柔润的脸上，有阳光和山风留下的印迹，也有青春残存的秀美，举止谈吐，女人味十足。只是那衣着，令人想到拮据。

她娓娓诉说着那些够不上事迹的生活片断。

“我是沈阳人，父亲是资本家，‘文革’中，死了……”她眼圈红了，微微低头，咽了口什么。

“大学毕业后，我在新宾县陡岭林场呆了许多年，有欢乐，也有痛苦……那年，我四岁的儿子，丢了……”她凄婉地说着，眼角闪亮。

“离开林场七年了，真想呀。一定要回去看看。二十六年前，我俩栽下的落叶松，再过些年，我们老朽了，它们也成材了。”说着，那泪花花竟不顾她的羞涩，直涌出来。

不到一小时，这个山里来的女人竟掉了三次泪。看来，山风也无法切断“女人”与“弱者”的联系。

“刘工，你刚才说的‘我俩’，指谁？”我问。

“我和我爱人赵畔洲呀。他这个人呀……”透过羞涩，我第一次在她脸上找到自豪和骄傲。

我急于要见见赵畔洲。

拥挤，是这对副高级工程师家里的最大特点。一间小屋里，学生宿舍一样上下擦着二层四张床。这对知识型夫妇竟为我们拥挤得快要爆炸的地球贡献了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

赵畔洲来了。他，瘦瘦高高，那一脸的憔悴和通体的疲倦直向我扑来。我想到“鞠躬尽瘁”这个词。

听刘丽君说，他是甘井子区绿化站站长。这个区每年担负着全市50%的造林任务，成活率却只有30%。他把“提高石质山造林成活率”作为研究课题，一下把造林成活率提高到85%以上。

无疑，这是一对琴瑟和谐的事业型夫妻。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在艰苦的山区干一辈子，不但鞠躬尽瘁，而且死而后已，求个青山埋忠骨，万世留芳名呢？

山林里来的人啊，我该怎样理解你们？

青春的纤绳

刘丽君进山几天后，一场大雪封了山。她穿着单鞋，踏着没腿深的厚雪，每天走十几公里，在各作业小班测量、绘图，制定造林计划和幼林抚育方案。手冻得拿不住笔，可她不知道冷，只知道笑，只知道血，很热，很热。

四时序变。娇弱的刘丽君，脸，黑了；皮肤，结实了；人，丰满了。山林的艰苦造就着她，山林的绿汁洗染着她，她感到自己也绿了，绿得透明，绿得没有一丝杂质，就像一片活泼泼的叶，在阳光下，静静地，谦虚地垂着绿阴，编织着事业，也编织着爱情。

爱情结果了。一个女性小生命在春天诞生。1966年，他们又收获了一个儿子。同年，中国倾斜了。山林滑坡了。

资本家的出身，置她于针毡之上。

她无力保护自己。她要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她把一双幼小的儿女远远地送到婆婆家。

噩运，从来都不同情弱者。

一场大火，把她温暖的小家烧成废墟。

一纸电文，传来儿子出疹病危的恶信。

请假。不准！恫吓包围着她：“这是为逃避运动拍的假电报！”“他们要是敢走，回来以破坏运动论处！”

刘丽君一反弱者的温顺，背着回来挨批斗的十字架，和赵畔洲星夜直奔金县亮甲店。谁能想到，等待他们的，竟是太平间里一具冰凉的小肉体。

刘丽君变了。灵慧，烂漫，理想的光泽从她的额头、眼神中消失了。失子的惨痛，对现实的迷惘，使她对人生作出了再认识，再安排。

一片残月，在她身后拉出了细长的倾斜的影子，像一条沉重的纤绳。

当年冬天，她又生下了一个儿子。接着，又生了一儿一女。有了保险系数，她放心了。

“那些年，别人忙着搞运动，我忙着生孩子，真蠢呀。为了孩子，我养鸡、喂猪，种自留地。几次想放弃专业改行……”刘丽君向我叙述这段经历时，嘴角、眼梢流泻出的苦涩和失意，像山林里淡淡的晨雾，渐渐地把我笼罩住。我吸了一口她为我买来的山梨汁，不甜，只感到酸涩。

这是他们吗，两个有抱负的大学生？是他们。然而，能全怨他们吗？人，都有似我非我的心理矛盾；人生，都有是是非非的徘徊。更何况，在那特殊的年代，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在痛苦地蜕变着。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最关键的是对机遇的选择和把握。畸形的政治风暴把机遇送给了阴谋家和政治投机商。1975年，邓小平上台后的“复辟”，则为刘丽君带来机会。

她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以新宾县为试点，为全省拿出建立“森林档案”的经验。当时，我国对林业的管理是粗放式的，森林档案尚属空白。新宾县有三十五个林场，每个林场有几百个小班，她要一个个实地考察。那时，赵畔洲负责全县的造林工作，以身许山，大女儿十岁，小儿子一岁半。她把沉重的家务压到女儿娇嫩的肩上。把小儿子送到弟弟家，把自己交给山林。一次，路过弟弟所在林场，眼前的景象把她吓呆了：她的小儿子正在一个用原木做的桥上爬呢。桥下，是深深的沟，沟里，是湍急的水……

1978年，我省第一份“森林档案”在刘丽君的心血汗水中结晶出来了。1980年，她成为新宾县第一个女林业工程师。

日近西山色正浓

1981年，隆冬。大连市西北隅。山巅。一间护林员住的简易房里透出微弱的烛光。烛光下，刘丽君正伏案攻读“园林学”。烛火静静地燃烧着，鬓边，不知何时挺出一根白发，旗帜一样，宣告：老之将至。

一年前，在大连工作的老同学的几封信，扰乱了刘丽君平静的生活。“大连急需绿化人才，来吧！”来，谈何容易！十九年的山林生活，刘丽君夫妇已在大山扎下根。然而，毕竟是在人生的不惑之年，他们考虑问题也更实际了。辽东地区集中了全省的森林资源，也集中了林业人才。中国本来林业人才就缺，这种集中本身就是浪费。到大连，刘丽君必须改行，山林改园林，有难度。惟其难，也更有吸引力。还有孩子。沉重的家务使他们的大女儿仅仅得了个初中毕业文凭。他们不能再对不起剩下的三个孩子了，而 they 又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为孩子选择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是他们的责任。

在县林业局为他们召开的欢送会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对新宾县的山林建设，你们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你们把青春无私地献给了山林。”七年后的今天，赵畔洲动情地对我说：“我们苦苦地追求、奋斗，图什么？有这么句话，足够了。回首往事，没有遗憾只有留恋。”

我久久咀嚼着这番话，思索着自己刚见到他们时产生的疑窦。如果说刘丽君在作出来大连工作的决定时，能以一个成熟的人的思维，摆脱形式的羁绊，更多地考虑到内容的话，那么我，一个新闻记者，在对被采访对象的认识上，为什么要拘泥于那古老的、一成不变的模式？一个人，只要他不失时机，不管是在山林还是城市都一心一意奉献着，只要他回首往事无遗憾，就足够了。

老虎滩公园终于有了第一个园林工程师。然而，这位工程师却犯愁了：由于没有专业人员管理，驰名遐迩的老虎滩公园在十公顷面积上，竟有一万多平方米裸露着黄土、碎石，如块块“斑秃”；园内卫生极差，年年受到市政府批评；园林工人连花木名都叫不全……愁，愁得彻夜难眠，愁，愁出了一个改造公园的三年计划。

她办起老虎滩公园第一个技术训练班。

她带着工人在块块“斑秃”上铺草坪。草坪阴雨天铺成活率高。可阴雨天工人的脾气比天气还坏。怨声、骂声不绝于耳。她努力去理解这些手和嘴同样能干的年轻人。终于，人们在泄愤之后发现，这个年龄直奔五十的女工程师，钱不比他们挣得多，身上的泥巴却不比他们少。脸上，有雨水，更有汗水，也许还有泪水。

上帝被感动了。三年计划，两年告捷。

她浇灌下心血，得到了绿莹莹的回报：自1984年以来，老虎滩公园一直是省文明公园，市卫生先进单位；她连续四年荣获大连市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被任命为公园管理处副主任。

担子重了，使命感更强了。一个新的冲动使她寝食不安——她要为公园引进植物雕塑。

1987年夏天，来老虎滩公园的游人惊喜地发现，公园深处，处处有新景，处处添新趣：一对绿羽闪闪的孔雀“飞”进百虎厅，一条苍龙盘旋直上青空；大熊猫稳坐草坪贪食着竹笋……“这些都是用桧柏盘扎的。”刘丽君陪我欣赏她的艺术小品。“还有只虎，是用野牛草雕的。草雕一般都用五色草，大连没有。从沈阳买一棵五色草需要一角钱，雕只虎得上万元。而且五色草当年就枯死。我尝试用遍地都是而且越冬不死的野牛草代替五色草，没想到，只花了一百多元钱，成功了。这成功不但有经济意义，更有植物学意义。”她说着递给我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一只绿毛斑斓的老虎甚是可爱。“虎在哪？”我问。她神色黯然了：“一位行政领导看了，说不像，命令我们扒了。我至今也不服气。艺术不等于生活。艺术就是在似像非像之中把人带进一种美的境界……”她有些气喘，毕竟是五十岁的人了。“园林艺术是脑力与体力并重的艺术，今年，我明显地感到体力不行了。不过，我不会放弃植物雕塑……”

告别刘丽君，暮色将至。夕阳沉沉地挂在天边。一种苍茫感油然而生。两次采访刘丽君，犹如走进一片大山林，林木遮眼蔽路，繁叶铺天盖地。我艰难地寻找着。我找到了。不是那擎天大树，是叶子。是的，叶子太平淡了，它只是自然界中一片飘忽的掠影，然而，它把嫩绿送给了春，它用翠绿装点了夏，秋风中，它还有橄榄绿。橄榄绿色的叶片啊，只要它还挂在枝头，只要它还有叶绿素，它就孜孜不倦地继续着光合作用。

弱小的叶子呀，
骄傲些吧，
只有你普遍地
装点了世界。

1988年10月2日

走出谷底

张国巨

万物竞争，适者存。

——达尔文

沿沈大铁路南行二百九十二公里，或者由大连北上一百公里，便是瓦房店，全国二百多个县级市之一的瓦房店市的市府所在地就在这里。当历史的列车进入公元1986年的时候，这个小市的人民及其首脑们，突然警醒地发现，在改革大潮中慢了一个节拍。城市工业经济，仍旧在旧有模式的禁锢下艰难挣扎，出现了某种危机。

中华大地上的民族经济，经过了数千年的自我封闭，坚韧而默默无闻的发展，经过了无数的痛苦磨难与长期困惑，终于产生了某种成熟，在全球经济的冲击下，毅然走向世界，雄姿勃勃地挤进人类大经济的总体格局。瓦房店市发生的一切，正是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佐证。

被逼上“梁山”也是一种壮举

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郑重地悬着“瓦房店市工业改革理论研讨会”的横标。会场里分两侧对坐着五十多位与会者，他们分别属于以下五个层次：中共瓦房店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委员会以及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首脑；市直属各综合部门、企业主管部门的领导者；企业家；经济专家；有见识的企业职工。召开这样一种规格的研讨会，专事“理论研讨”工业改革的命题，在瓦房店解放以来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会议的气氛是庄重的。笔者受命组织并主持这一会议。我知道，这个会议的实质，是市委和市政府发动各层人士，给自己揭短，是面对一种历史性抉择的最后评判。它的背景是：瓦房店市城市工业在改革大潮涌起的年代里落伍了，跌入了谷底。

瓦房店市地处辽南中西部，原为复县。人口百万，版图三千七百九十三平方公里，辖十一镇、十七乡，市内设有七个办事处。海岸线四百六十一公里，全国第四大岛长兴岛与陆地隔海相望。苹果一百三十个品种，总产居全国县区首位，堪称苹果之乡。金刚石贮量极丰，中国金刚石贮量居世界第十位，而瓦房店市的贮量则占了全国的一半，可

为金刚石王国。这里还有一个职工二万、驰名全球的瓦房店轴承厂……小城的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历史上总产值久居前列。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4月1日撤县设市，同时承担起把这座小城尽快建设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地区经济中心的任务。这是瓦房店的光荣与骄傲。但是，到了1986年，城市工业下滑，产值迭降，利润出现负数。前三个季度，六十家市营工业，净亏一百七十三万七千元。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人们议论纷纷，开始怀疑“基础雄厚”到底是一种优势，还是一种包袱。开始思考着农村的大变革已经给近八十万农民带来了实惠，给农村带来了经济繁荣的春天，而当改革的中心转入城市之后，为什么却出现了城市工业的萧条。数万名职工要吃饭，企业要存活，刚刚建立的小市要加速建设，国家财政要收入。没有城市工业的大发展与好效益，便一切难以应付了。但是原因何在？是原材料涨价抑或是银根收缩？是设备陈旧抑或是技术力量薄弱？是企业领导者素质低下抑或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职工文化技术水准不高抑或是物质刺激不力而消极怠工？或者，根本症结并不是这些，而是另外的什么原因？这些沉重的问号，在不同的人群层次上，有着不尽相同的回答。

会议秩序少有的好。发言一直持续了八个小时。领导者们耐心而又冷静地聆听着，思索着。会议室里弥漫着浓重的烟雾，却没有人想到要去打开窗子……

全方位的群体智慧，终于拨开了困惑的迷雾；市营工业已出现的某种危机，正预示着机遇的到来，这就是改革的大政策与大环境。而寻求改革的深化与突破则是唯一出路。

这一天，是公元1986年11月1日。这次会议，成为小城经济爬出谷底的一个契机。三天之后，一位副市长亲自率员进行视察；十天之后，市委、市政府作了一个极有胆识的决策：立即在城市企业中实行经营权同所有权的分离。

1987年元旦届时来到小市。经过了四十几天的艰苦实施，已有三十三家市营企业实行了租赁经营，覆盖率38.3%，一举在全省领先。一种全新的经营机制，终于在经过生活的启示与痛苦的思索之后，鲜活而又蛮横地突破了旧有模式的坚壳，在辽南的大地上诞生。

我们民族的土壤，也有某一种板结

那些日子是火红的。多家报纸登载着瓦房店市公开招标的启示，几处电台的电波里，传送着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信息，从大连到长春的几个大、中、小城市的宽街闹市上，张贴着来自瓦房店的大红招贤榜：投标者不日而至，竟达百余人。从数千里远的广

州、深圳也有人来敲响招标委员会的大门。答辩会激烈而庄严有序。有时持续到夜半时分，市委书记和市长们亲临考评。他们对于决策的实施充满信心，大刀阔斧而又谨慎从事，深知这一次变革的历史性分量。

但是，他们终于逐渐感到，他们脚下的路不仅布满坎坷，且有政治与名誉上的风险。这分明是一次大胆超常的实践。一纸公证书，把集体企业的经营大权交给了个人，把全民企业的经营大权交给了个人，百十人的小厂是这样，两千人的大厂也是这样。与此同时，商业系统也有几十家公司、门点实行了“两权”。这是寻常的事业吗？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套用着某个几乎一成不变的模式，沿袭数十年，已被人们认定为不可更改的天条。但在80年代中期，却被决然否定。这在农村的改革中曾经引起震颤，而在城市的改革中，也必然引起震颤。许多人在心理上感到无法承受。我们的民族除了具有诸如坚韧、勤劳与善良等等优秀品格之外，也积淀并承袭着某些保守与偏执的痼疾。民族的土壤是丰厚的，但也有着某种板结，常常显出活性不足或过于粘滞和僵硬。它抑制着种子的萌发，常常使绿色生命难以出土，长不成壮势，或者干脆被扼杀了生机。

这场突破性的改革，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高一层的机关里，有人发出宏议：瓦房店市的改革搞大了，乱套了。普通市民的舆论更是毁誉参半。租赁中，没中标的大批原厂级干部就地免职，这本是市委与政府明文规定的一大原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有的企业主管部门却在发问：“我们红头文件中任命的干部，就这样不算数了？”一些企业职工开始上访，他们问：“这样做，还叫不叫社会主义？”一名工人曾经唉声叹气地对我说：“厂子租了，我们掉进后娘手里了，将来谁管我们死活？”个别职工乘机闹事，意在把承租者挤出去。充满活力的日子，却也是颇不宁静的时光。

有些事情实在难以说清楚。一个企业连年亏空，职工开不了工资，奖金分文无有，甚至不得不动员一些人放长假自谋生计，人们本是有气有怨的。如今面对新的选择，却又留恋着昔日的艰辛。在一些人看来，碗里的饭食虽然不足以裹腹，但毕竟那是个铁饭碗，捧着逍遥，落地不碎。而要改用另一种器皿，即或盛满了大酒大肉，也终觉别扭，难以食了。

经过竞争择优，一个个新的法人代表走马上任。他们交纳了数以千计的风险抵押金，揣了公证书，手握着产供销人财物经营大权，在全新意义上成了企业的中心地位者。他们是荣耀的，时代性的机遇使他们身价倍增。但他们同时也被投进了新旧更替的旋涡，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阻力与麻烦。狭隘的封闭观念与原始的群体意识，使部分企业的职工产生了排外情绪，不肯同新的企业领导者合作；那些被裁减或派做他用的管

理人员，对于机构精简与充实生产一线嫉恶如仇；实行劳动优化组合，使一些懒惰者破口大骂；废止大家均饭吃的工资制，令不学无术者日里拍案夜里砸窗子，甚至暗下手脚，把新厂长的儿子打得头破血流。一个工厂的原副厂长，在被就地免职之后，把手中已有的经济合同全部撕毁，或者转送他人。你不“组合”我，便给颜色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使变革的乐章大气磅礴而又充满噪音；使社会生活色彩斑斓而又冷暖失调。

一个季度过去。几乎所有的承租者都掉了肉，但是不少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回升，依然下滑。这本是预料中事。但一些人不能容忍了，挑剔与指责多了几分尖刻。

改革波及一切人，也检验着一切人。它重新清理并评价着过去，也重新描绘着未来。瓦房店市的领导者们指挥若定，义无反顾，显示了大将的风度与哲人的智慧。他们有一个绝好的判断：大的阻力反映了深的改革；有一个精辟的认识：改革，说到底便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触动着什么，不触不动，触了才动，小触小动，大触大动，这便是效应。他们到企业去，到车间群众里去，同那里的各层人们对话，现场办公，缓解并解决矛盾。又一个季度过去。气温的回升使大自然生机勃勃。租赁企业的生产终于出现回升，开始展现出赏心悦目的景观。

1987年，瓦房店市的社会生活在激动、震颤而又繁忙的快节奏中结束。无需公开发表统计资料，人们早已获得了如下的信息：二十三家租赁企业无一亏损，产值和利润大有增长。租赁前的1986年，共净亏九十二万五千元，这一年却实现利润五百六十万零二千元。其中亏损大户印染厂，由上一年亏损二百一十八万元，一举盈利四十五万元；阀门厂由上一年持平，夺利一百二十四万元。全市市营工业，在改革大潮推动下，终于走出谷底，实现利润八百万元，比1986年增加一千三百万元。

一举成功。一发而不可抑止。未待年末，整个城市企业的“两权”分离改革便迅速扩展开去。大连市在这里的一个现场会，可作为一个标志，肯定了这里发生的大变革。瓦房店小城以新的活力瞩目于竞争的世界。

文化跻身于实业，也许可以作为
民族的某种新意识的标志

大涛腾涌，很难说哪一朵浪花最先勃起；时代风貌，不好讲哪一位改革者最先风流。千顷波澜，需亿万朵浪花相互推助始成大势；改革大业，要无数才人志士彼此呼应方成壮景。但是古往今来，一切变革中，有识者捷足，有志者先赴，有勇者率阵，已是常规。

这里，暂不见马胜利那般宿将，也未现关广梅一类的名家，却实实在在出现了一批堪称实业家的人才。他们迎着大潮的风浪，勇敢而艰难地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成为瓦房店历史上新的一代风流。

我写过一点小说，可称半个文化人。大约因了这个缘故，我对文化界朋友跳出来租赁企业，便多有注意，多有感慨，并多了一些思考。在小市的中心区，面街向南，有一座二层旧楼。这是一家解放初建立的企业，那时叫作刻字社。四十年经营，至今固定资产净值仅有五万元，职工百多名，一直从事着刻字、修理钟表的行当。每年财务报表的利润栏里，几乎都写着负数。企业靠免税维持，职工靠铁饭碗喝粥。进入竞争时期，企业的存活已呈危势。1987年初，一个文化人斗胆承租了它。一年下来，竟实现利税十四万四千元，而上一年则为零。职工每人平均奖金三百元。这个文化人自己，被接纳为中共预备党员，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关于他的基本情况，可在入党志愿书上找到如下一些记载：

刘广圣，男，现年四十四岁，大专文化程度。十四岁从师学书画，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并大连美术协会会员。曾获大连市美术作品二等奖。参加过大连市同日本舞鹤市书画联展。喜欢篆刻，三十岁前爱好古文，后转爱西方文学……。

他身材修长，长脸长发，举止颇显文静，典型的文化人风采。他的办公室是一个实业与文化并容的天地。三五条幅悬于壁间，有字有画。均出于他的手笔。字尤佳，效吴昌硕手笔几可乱真。“花开时序春如锦，客至洽谈气如兰”，重墨不泼，笔工遒劲，章法错落，品其词意，才见企业家的胸怀。案头杂陈书册，有实业经营的专著，也有金石书画的范本。而在他家的斗室里，我还目睹过他同妻子翩翩起舞的风采。这一切不容不对他多一些思索。

正如同绝大多数他这一类文人一样，他的生活清苦，手头本较拮据，却交纳了二千五百元现金抵押，冒险接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烂摊子，投身于竞争的漩流。过去的一年里，为了救活企业，他跑遍大小上百个“有关”部门。为了调整人员，不但被辱，并且挨耳光。他说：“我生来不会攒钱，钱同书画相比，我更爱后者。现在依然如此。但是书画只是‘业余’，我为下半生选择了一个职业，就是实业竞争。文化同实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它们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的，这就是文明。”他不满足于三年租赁目标的实现，还要在1988年掀倒小厂的旧楼，投资百万，重建一座三千平方米的新楼，并使这座新楼别具风姿，成为民族风格与现代艺术统一的文化建筑。这便是一个文化人的新追求。

步出瓦房店车站，径直向前，穿过一处广场，迎面有一尊“站前酒家”的牌匾。推开明净的玻璃大门，里边是一个典雅的小天地。太阳神塑像面门而立。镶了壁纸的墙上，斜吊着盏琉璃壁灯。屋顶上是蓝线条的中国版图的图案，悬着铸铜吊灯，还有一盏宇宙灯。靠右侧有一个镂花木刻镶成的月亮门，里边是一间小厅，比外间更添了几分典雅。有条幅和盆花。那花架是整体树根雕成。这里的主人，便是我将要介绍的另一位文化人刘绍庆。室内的一切装潢都是他亲手的杰作。

在小店侧厅的圆桌前，我曾同他聊起他的事业。那张微黑的方脸上，棱角分明，刻着满意与自信。他告诉我说，从十六岁拜师学画时起，就对美术副业存有一种执著的追求。后来当了舞台美术师，在这个城市里也算小有名气了。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他渐渐把视野扩展下去，发现自己的价值还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实现。这种认识日益强烈，令他坐卧不宁。终于在1987年初，斗胆承租了这家小企业。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了，有人替他惋惜，有人担心他陷进去。但是他迈出的脚再未收回。他平时本是个话少的汉子，然而扯起这些事来，却有几分激动而又谈吐不俗。他不缺钱用。提个画箱出动，一个广告牌子亮起来，用不了三五日，少说百十元的票子便捏进了他厚实而又灵巧的大手，这是寻常事。而且那又多么逍遥，多么平心静气。但是他不满足于这一些。

上任之始，他曾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小企业，原是一个照相门市。站前广场是游人的好去处，也是留影的好处所。这家照相门市前面，正有一个花草挤满的花坛，四处而来的摄影摊子便在这里一字排开，挡住了门市，截留了顾客。官司打到公安局，始终难解难缠。他决心改营饮食，开了餐馆。门前的摄影师们全然不知上了他的“当”，甘尽义务把他的食客招徕上门。果然店业兴隆。当然，他的成功要素远不止于这一点。在外厅一处显眼的墙壁上，他把一张“请顾客周知”的告示指给我看，上边竟然是计量局、物价局、商业局、饮食公司的电话号码，还有“本店经理刘绍庆”几个大字。我即刻明白，那是恳请顾客监督的坦诚表示。然后，他又把一尊硬塑匾拿给我看，上边一行楷书：“物价信得过单位。”

上一年，这家小企业亏空四千元，没有纳税，1987年在他手里，却实现利税二万多元。属于他个人的收入，全部用于小店的装潢与空间的扩大。他是雄心勃勃的。除了眼下的小店，他打算再承租一个更大的企业。他要凑足属于他个人的三万元款子，在站前广场立一座理石雕像，“我要为瓦房店添一点艺术光彩。”站在广场上同他握别时，他平平静静地说。这便是这位三十三岁的文化人的心曲。

面临改革的大趋势，每个人都将接受考验，都必须做出回答。欢呼、勇赴是回答，指责、反对是回答，沉默、战栗同样也是回答。历史是无情的。它对每一回答，都将作

出公证的判断。历史也是宽容的。它可以给人以深化感知的过程，还可以给某些偏执者以自我否定的机会。但是历史一向坚持一个不变的原则：对于落伍者从不回首呼唤，从不伸回手去提携。它给予任何人的机遇都是均等的。它漫不经心地导演着人类发展史的正剧：竞争。中华民族在人类竞争中，一个成败攸关的时刻，高扬起改革之帜，和着历史的足音，匆忙而又稳健地冲上来了。文化人大步踏入实业经营领域，是否说明我们的民族在走进世界大经济的时候，确实有了某一种新的意识？在他们身上，是否多了一点特色？例如民族整体意识是否更强烈一些？文化是一个大概念。物质文明也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当代文化人的文化观念已经发生某种转变，更加看重物质文化的创造，从而让狭义的文化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这里还要提到一位弃官务工的机关干部，三十七岁的大学毕业生李忠煜。由此还要提及原来就从事实业经营的孙江泉同志。孙江泉是市水利工程公司的经理。1988年初，他要租赁这个企业，需要一位合作者，想到要选择一个文化人。李忠煜原是市体改委综合科科长。一个笔杆子，孙江泉于是盯准了他。对李忠煜来说，弃官下基层，投身于实业竞争，显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选择。思考一些时日之后，他去了，租赁后做了孙江泉的副手。

数十年来，人们的机关意识极强，而今开始淡化。这是改革深化冲击的结果，也是一种现代意识的强化。李忠煜说，务工经商需要大本事，文化人应该一试。孙江泉与李忠煜的亲缘，说明民族的现代意识有了某种演进。另一个大学毕业生张纯文，租赁了市印刷厂，他说：“大学生进机关，似乎只有那里才可用武，这是陈旧的认识。真正有文化的才人志士，应该到基层，到竞争的风险中自我实现。”

竞争赋予文化以新的使命，民族对于文化出现了新的渴求。这该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第一个吃蜘蛛者，未必不是英雄

瓦房店的改革中，有过两例租赁失败的事。

大约1987年4月一个星期天，一个小商店的承租者找到我说，他已中止了合同。他消瘦了许多，显得十分疲惫，神情抑郁，没有了先前的自信与欢乐。

他是三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原在一家大厂工作。1987年初，办了停薪留职，租赁了一个商业门点。这家小企业，多年来连续亏损，经理更替如走马灯，始终没有活气，是一个不好收拾的烂摊子。他是尽心尽力工作的，并且打算救活这门点，然后联租

多家，走关广梅之路，一显当代文化青年的风姿。但是他失败了。他把生活看得太简单，缺乏在竞争中翻斤斗的本领，对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无力应付。尽管店容整治一新，可效益急剧下降。他病倒了。躺在办公室的床上，一边输液一边处理工作。最终无力坚持，提出撤标，住进了医院。三个月经营，掉了二十斤肉。个人赔偿损失一千五百元。损失的，还有他的人格与名誉。当他出院回到原厂要求工作时，竟然遭到个别人士的冷遇。他苦恼着，没想到人们这般不宽容他。

另有一个企业，从外地招标选择了一个租赁厂长。同样地只干了三个月，也退了下来。他是有经验的，曾长期在一类企业当过厂长，并且有一定威望。但是他用人失误，失去了本应由他的个人品格凝聚起来的职工群众，陷入了孤家寡人的困境。因而，也在这一次的竞争中失败了。这一次他失去的，也不仅仅是数千元的赔偿金，更有他自身的一些重要的东西。

两例失败，曾经使一些人怀疑小市这一次改革的理论依据是否正确，“两权”分离的机制是否具有生命力。同时，对于两位失败者，出现了不公正的议论，称之为赶时髦者，贬之为梦想发财者，斥之为不晓得个人的斤两。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者却正视了这一点。公正合理地解除了合同，冷静地处理了撤标企业的工作。对于退下来的同志，也作了入情合理的安排。不但稳住了形势，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而且从中丰富了指挥改革的经验。

鲁迅说过：“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我们的改革，是前人未曾有过的伟大事业，改革就意味着风险。改革在总体上是会成功的。但是柳暗花明之中，也常常伴随着山重水复。

1989年10月

奇女子梁静枝

孙传基

龙王庙老乡亲们对这个梁静枝琢磨、研究、寄予深深的关注有三十余年了！龙王庙人不欺生，他们早把这个从山东来大连闯关东的女子当成自己人了。这个女子嫁给龙王庙人，在濒临渤海湾的“关外”山村里深深扎下根，并且，从60年代初起，她成了龙王庙的名人，金州的名人，成了在大连以至全省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名人。在那些年代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像是一个个离奇怪诞的故事，不仅给梁静枝的生活经历涂上了太强的政治色彩，而且还充满了令人叹服的传奇性。

该怎样看她这个人呢？她曾是个名闻全国的人物，小小的龙王庙村也曾因她而轰动一时，可是……

一个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庄稼院女子，论文化，充其量不过是个半文盲，还未长大成人就病魔缠身。就是这么个女人，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开始，她就当了积极分子，成了一名先是让人们感到好奇继而惊奇到后来不由得赞声啧啧的先进典型。她先后到过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她谈学习毛著心得体会的报告会，效果之好，人们欢迎的程度，常常让会议的主持人，甚至那些见多不怪的新闻界人士大出意外。这个极其平常的农村妇女，她的魅力在哪里呢？梁静枝从来不修边幅，她甚至根本不懂作为一个年轻女人，一个出了名的女人该有那么一点点修饰——人们有时会把这种有意无意的矫饰看成是名人的一种特点、一种风度，但梁静枝她不懂，她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些邋邋遢遢不利不索了，不了解她的人可能还会以为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矫饰，“活学活用”先进人物嘛，那年头又讲究和提倡艰苦朴素；但稍一接触就会明白，梁静枝就是这么个粗粗拉拉的女人，不优雅，肯定算不上漂亮，又绝不属能说善辩会交际者流。但她讲心得讲体会却别有一种让人说不清言不明的魅力，在那种“活学活用”成了一种普遍到全国的运动，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在那种“报告会”人们不情愿听却又不好不听不敢不听的情况下，却大受人们的欢迎和赞扬，特别是大专院校的教授讲师大学生们，他们对这位农村青年妇女的学习讲用，竟一致地表示特殊的青睐，她也引经据典，她也结合自己的生活和生产实际谈学习体会，但她自然而然

朴朴实实却又处处表示出毋庸置疑的真诚与自觉，同时又总能让人觉察出她农民式的大胆和机智——因为聪明的听众在她的“讲用”中每每会听出一些独到的想法，这在当时蔚然成风的用语录套扣行为用行为阐释语录的学习讲用活动中是颇不多见的。何况“讲用”人又是个据说只读过几天私塾馆的农家妇女！

在当时，大连金州海边小村这位青年农妇的名字，与李瑞环、廖初江等在业绩和学习上都相当突出的著名人物排列在一起，通过中央机关的报纸、广播很快便在全国传播开。她的讲用稿被编集出版，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合影留念……

到底该怎样看待这个梁静枝？

“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龙王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柳全安当即被宣布为“特嫌”，大字报垂垂挂挂揭露出他的罪状有二十三条之多，柳全安的下一步往轻里说是罢官免职听候批判。就是这个“活学活用”标兵梁静枝，顶着那场“横扫一切”的狂风，在党员批判会上公开宣扬柳全安的优点，同志们都暗暗为她捏把汗，柳全安感动得掉泪，批判会成了表扬会……本打算让梁静枝当支书的人大为恼火，批评她路线不清，威胁她“破坏运动没好下场”。这一来，好几个生产队长也一起宣布“柳全安要不干，我们都不干了！”……她居然真的赢得了大部分群众，大家还是真心实意拥戴支部书记柳全安。

如果这女人不是个普通农民，不是始终生活在金州海边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山村里，那么，单凭她这奇特的、矛盾的经历和表现，以及由此而断难避免的褒褒贬贬，便足以压垮她、摧毁她。

所幸的是，龙王庙人真正了解他们的梁静枝。

鬼怕恶人，病魔也怵强人——梁静枝半生中的又一奇事。不该干的，她不硬去干；该干的，她义无反顾地干……

谈到梁静枝的严重骨结核病，龙王庙人愿意从龙王庙70年代的一次重要“政权更迭”说起。那时，柳全安虽然还当支书，但由于那场运动的折磨，工作的劳累，委实难以继续胜任。上级党委、基层党员群众以及广大村民在龙王庙村党支部书记继任人这个问题上，很自然地想到了一起：柳全安决定培养二十二岁的王秀义当接班人，那时王秀义仅是三队一个社员，参加搞“四清”才回队，为使柳全安培养的接班人大得人心，梁静枝拖着一条病腿深入各生产队去宣传王秀义的事迹。

梁静枝十四岁时由苏联大夫做了第一次骨结核治疗手术。开始只发现右腿生了一个包，越长越大，带连整条腿红肿起来不能走路，不久便溃烂了，淌了大半盆带脓的黄

水……手术后，未等刀口愈合她就回家了。因为当爹又当娘的父亲经济拮据，送她住院已经借了很多钱，她不想再给父亲增加负担。不料手术后病情又有发展，原先的溃烂口子不但流脓淌血，还往外掉骨渣子。于是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没想到这次手术后陈病未除新病又添，本来病弱不堪的梁静枝又得了淋巴结核……就是在那种经济状况和农村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她似乎并不很在乎病魔缠身，她忍受病痛的折磨，在艰苦的劳作同时坚持读书学习。都知道梁静枝有什么病，但也都知道她里里外外是把干活好手，凡别人能干的，她都急着抢着干，抗旱的时候她不能挑水，就弄辆自行车推着往地里送。都知道她争强、好强，又实在是坚强的女子……她这一二十年就是这么挺过来的。鬼怕恶人，病魔想必也心怵这强人。都知道她这一二十年一直病着，但未见她老是躺着。如今，她又一瘸一拐地忙个不停。终于，支部把二十二岁的王秀义举荐到龙王庙支部继任人的位置上。这个年轻人有头脑，大胆泼辣，事业心强，有责任感……梁静枝先是深入到群众中介绍了王秀义这些长处和工作成绩，说明他当书记的诸般好处，又组织大家广泛认真讨论……

王秀义上任后，梁静枝如同帮助小弟弟似的关心和支助他的工作。龙王庙村的工作在70年代初期那接连不断的闹闹哄哄之中，仍能得到相对稳定、健康的发展，这同王秀义的领导和梁静枝对他的帮带，是有很大关系的。可是1974年王秀义被调到附近一个公社当党委书记，使龙王庙人的心又悬了起来。这回还能再找出个王秀义吗？乡党委书记林洪成提名梁静枝任龙王村党支部书记。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梁静枝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在王秀义之后继任了龙王庙村的党支部书记。

梁静枝两次手术未能成功，严重的使她饱受其苦的骨结核和淋巴结核却在近二三年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医院曾经决定给她截肢，她没同意，乡亲们也不同意，赤脚医生柳德民请部队任大夫和李长元大夫用偏方帮她治病。也许是人们这份苦心感动了上帝，也许是病魔顽疾终也缠磨不过这个具有超人毅力的奇女子，梁静枝在熬过1971年第三次痛苦的手术之后，病情大见好转，终于战胜了病魔。

梁静枝保住了腿，又获得了健康，这个奇女子精神抖擞地走马上任了。

状告梁静枝！她弄到了汽车“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得更快了……这多重先进身份的女子把个海滨山村轰轰烈烈地办成了“金龙”实业公司

大连市妇联很快就听到老梁——梁静枝在接连不断的政治风雨中进了不惑之年，是该称她老梁了。当了大队书记的消息。好极了！郊区农村大队级党组织有了我们女界的实权派，妇联应该立即去她那里搞个“点”……

梁静枝见了娘家人，很高兴，就提出“帮我们买一台汽车吧”。妇联寒波主任是个热心人，便找到了金县县委，县委姜书记暗暗乐了，同有关部门商量了一番，给龙王庙村弄了个车牌子。梁静枝一见车牌子，笑着揶揄地说：“县里怎么光给牌子不给车呀？”寒波主任说：“别不知足了，全县二百多个大队，你看县里给过谁车牌子啦……”

新任书记责成丈夫董文义赶快买件组装车，老董紧忙一顿，不久，龙王庙终于有了自己有史以来头一台汽车。石料可以大量外运，石坑添了生机，村里的经济开始活跃了。全村人都乐了，原来搞“点”还有这等好处！

正当龙王庙村的汽车隆隆兴兴地在村里出出进进时，一纸状子告到公社：梁静枝弄了汽车、拖拉机不好好治山治水，贩石料赚黑钱，她“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得更快了……接着而来的是，掐油断血，拖拉机只好冷寂寂地停在那里。花那么多钱弄了车却不让用，干脆卖掉算了。又有人发议论了。

梁静枝不解释，也不劝阻。这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能卖车，豁出压本钱，困难也不卖，不仅不卖，还得想法再弄第二台、第三台……龙王庙村想变变样，需要这东西。

她果然很快又弄到了第二台车。

上级同意地质队在龙王庙征地建办公楼，梁静枝对前来洽谈的人说：“征地费用，我们不要现款了，你们给一台汽车吧……”地质队的人对这位貌不惊人的乡下妇女不能不刮目相看了，这可是个有眼光的厉害女子呢！龙王庙由这么两辆车，发展成一个拥有五十多台汽车的蔚为壮观的专业运输队，这是后话。有了汽车，有了运输工具，整个龙王村便全盘活泛了。

几年来，在省、市、县、乡各级领导的热情关怀下，随着农村经济政策不断放宽，这位多重先进身份的奇女子，带领全村人，把个海滨小山村轰轰烈烈地办成了以“金龙”命名的实业公司。

她和她的伙伴们经过苦心经营，利用小村丰富的资源优势，先后办起了石矿、红砖厂、空心砖厂、水泥厂、白灰厂、理石厂，形成了以采石业为龙头的系列化建材生产体系。同时，还创办了塑料厂、饲养业、烧碱厂、冷冻冷藏等经营项目。最近，她和领导

班子正在运筹计划，一个生产碳酸丙烯酯的化工厂，还要投资五百万元建一个年产万吨的果葡糖厂，这个厂的年产值可达二千万……

前进中的龙王庙村已富庶起来了。1997年社会产值达二千二百多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将近一千五百万元，上缴各种税金一百多万元，集体人均收入一千五百六十元。

龙王庙是大连市最早提出给农民发退休金的村子，可望在近年达到每个退休养老者都发给一千元这个指标。同时决定，凡龙王村民，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住院费自付半费的待遇；并且决定建一座农民疗养院。还发给未参加过集体劳动的闲散老人一定数量的生活补助费。

1988年，企业产值可达三千八百至四千万；1989年再跳个高，可达七千万，而到了1990年，龙王村的产值就可以赫赫然地跃到一个亿这一指标了。

投身于现代经济活动中的梁静枝，十分看重管仲那句“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话。龙王村是县里最早开设村级图书室的村子，她亲自组织青年参加“山西刊大”学习，自己也同小青年一道听课，做作业。村党支部决定，凡龙王庙农民子弟，读大学的每年每人发给三百元助学金，近年之内可发到每人八百元，现在的标准是：中专生二百元，高中生一百五十元。并投资四十万元建立了一所一千八百平方的小学校舍，对幼儿入托实行免费学前教育……

龙王庙的父老乡亲们，请看重你们的梁静枝吧，她是你们的瑰宝，是你们开拓新业的好带头人！

企业家身边的女人（节选）

张玲

聪明的妻子一定会有效地唤醒自己丈夫的潜在实力，
使之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卡内基夫人

信息、专利、投标、贷款、拍卖、兼并、租赁承包、经济诉讼、技术引进、新潮产品、销售心理战、国际大循环……这就是当今的社会——飞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伴随着激烈的竞争。

竞争产生强者，强者赢得竞争。

这些强者以精明强干、博识多闻的男性为主力，在竞争中开发自我，超越他人……出现了一个个时代的骄子——厂长、经理、企业家……

当人们向这些戴着桂冠的男人们蜂涌而至的时候，我却把目光投向了他们身边的女人，那挂着泪花的微笑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觉得那微笑比桂冠更有魅力。

她们不愿暴露自己丈夫的单位，也不愿暴露自己和丈夫的姓名，她们只想向人们倾吐她们的苦与甜……

我也在塑造我的经理 丈夫当时是某工业公司经理

他当经理，全家人都跟着紧张。大工厂，一出事故就不得了啊！外面救火车、救护车一响，我女儿总是第一个跑出去。等我和老李跑到门口，我女儿喘着气回来搂着他爸的脖子说：“爸，往市内那边去的，不是你们厂的事儿，放心吧。”

去年十一，我买了几瓶啤酒，炒了几个菜，虽然就三口人，全家人聚在一起却挺难得的，我女儿高兴地举起酒杯对我说：“妈，我祝你身体健康！”母女俩一饮而尽。当她举起第二杯酒的时候，却寻思了半天，说：“哎呀，爸，我祝你什么呢？……对啦，我祝你们厂别出事儿吧。”

所以，我常对丈夫说：“你啊，干完这届别干了。要不然，你得短寿，我也得短寿。”

不光担心，还得操心呢！在他当领导之前，在车间我们有许多好朋友。有位老师傅，一直对我们俩特别好。结婚前，我和他两家都不在大连，每到过年过节，老师傅常把我们拽到他家去吃饭。去年，这位老师傅找到他这个当经理的，提出想要一套房子。他说房产委员会有原则，得按照原则办事。老师傅生气了，以为他是打官腔，当了干部就把老师傅给忘了。我丈夫一想起这事儿心里就难受。怎么办呢？那次过节，我拿出了他出国带回来的烟，还准备了几斤苹果，两瓶酒，两盒点心，对他说：“应该去看看老师傅了，这两年把你忙得也不知道走动了。”

他照我说的去做了，老师傅一看经理并没忘记他，想到大概确实是自己给经理出难题了，误解消除了。

像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他处理得对，愿意帮他操点心，使他做得更圆满些，可有些事儿他办得我实在是不赞成。

去年，企业内控百分之八十长工资，我丈夫提出他这次不长。

车间有的工人知道了，对我说：“你不能同意，你回家告诉经理，现在是80年代了，不是建国初期条件不允许，干部什么都带头让。他上来这几年，咱公司从生产到福利起色这么大，他不长我们大家都不过意。”

我回家跟他说，他就给你来个不吱声，结果还是没长。还有房子问题，我们这是刚搬家，油漆什么都是新刷的，你闻没闻到屋里还有股油漆味？原来我们一直住两间，现在搬到这三间也是老房，五几年的房子，刷墙时应该先把墙皮铲一铲，可咱哪有那个精力呀，凑合着刷了，你看现在墙皮直往下掉。

前年，公司盖了个大楼，条件特别好，谁见了都眼红，工人们都管它叫“红眼楼”，大楼一盖好，他就对我说：“‘红眼楼’我们不能进。”

去年，又盖起一个新楼，比那“红眼楼”的条件还好，人称“紫眼楼”。房子盖好后，有人悄悄来找我，说：“你去看看那房子，有三室一厅的，正适合你们住。”我看了以后心里的确挺痒痒的，可只能笑着说：“够呛，我家经理说过‘紫眼楼’公司领导一个也不能进，给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住。唉，我看看这房子，知道什么样儿就行啦。”

前些日子，不少人都对我说：“像这样的条件以后恐怕不会有了，经理那么忙，你们家又常得接待上面来的客人，应该住得像样一点嘛。”

还有的干脆对我说：“你不用管就搬进去，我们去帮你搬，看他能怎么样？这事儿理所当然，我们一百个赞成！”

工人的话说得很真诚，我真想照他们说的去做，又考虑到经理既然跟我讲了，也肯定在厂子讲了，一厂之长说话不算数多不好。

没进“紫眼楼”倒算不了什么。但是我认为他的思想不符合80年代，我说80年代的干部，不该得的不得，该得的就要理直气壮的得。经理也是人，你有公司，也有家庭，你得工作，也得生活，有个好条件，你可以生活得更好，工作得更好嘛！公司这几年效益不错，知名度越来越高，是靠你领着大伙干出来的，而不是靠你让出来的。

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到我们家一碰到经理干点家务便大惊失色：“哎呀，经理在家还刷碗哪？经理在家还拖地呀？经理在家还洗衣服呀……”

我听着这些话就不得劲儿，他经理在家给谁当经理呀？他经理要不要吃啊？要不要穿啊？这几年，他在外面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家里的地位只能越来越低，因为他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承担家务越来越少了。家里人都有工作都很忙，姑娘的学习也很紧张，经理抽空干点家务也是明智的。我常说：“你不能整天是企业的管理呀，经营呀，发展呀，后劲呀……思想总陷在一种事物里，效果不一定好。人不能总干一样事儿，小孩子玩游戏还天天换花样呢！得有适当的调节，调节就是相对的休息。”

实事求是地讲，他是严以律己的，不管回来多晚，只要我有事儿没顾上做饭，人家就自己下厨房，我没做好，他就帮着我做，衣服脏了，也常是自己洗。有时我帮他洗了，他还说：“谢谢你啊。”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家庭关系。家务活他主动干，我从不挡，他干得质量不好，我也不嫌，因为这样对他有好处。吃完饭就拿起生产计划不一定马上能看进去，擦擦桌子刷刷碗也是一种家庭享受。干事业在于持之以恒，不在于这十分八分钟。洗件衣服五分钟，就能影响公司的产量吗？

我是信口开河，讲的是自己的观点，别人不一定赞成，我觉得在这些小问题上妻子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嗯，可以这么说，我也在塑造我的经理，可他不一定听啊，人家是站在宏观的角度上看问题。

我没躺在他的树阴下
丈夫当时是某公司经理

说起来，我们家和车轱辘还真有点缘分，我在交通公司，他在运输公司。不过地位可不一样，我是乘务员，人家是经理。

现在社会上对企业家挺重视，说“当今是企业家的黄金时代”。我们也跟着提高地位啦，被称为“企业家夫人”“贤内助”。哎，你可别小看这些称呼，有些人就靠着它撑腰呢！

那次，省里开“贤内助会”，大连去了五个，我是其中一个，也算是开了眼界呀，企业家夫人也是什么人都有啊，我本来在火车上就把稿准备好了，可到那儿以后一句话也没讲，没法儿讲，有些人谁也不服气，专门评头论足，人家有的夫人讲拒绝收礼，告诉送礼的人如果再送就交到纪委去。她们就在底下议论：不收就不收呗，还送到纪委干什么？小题大做。有的介绍经验说有时陪爱人跳舞，让他放松放松。她们在底下说：忙得要命，哪有工夫跳舞；有人说心疼丈夫，参加宴会时怕他酒喝得太多，就往酒里掺水。她们也不以为然，说用不着……那天到丹东丝绸厂参观，车误了点，去晚了，厂长没等着接待，有的人就不满意了，说什么“他没把咱当回事儿，殊不知咱都是些管厂长管经理的人，回去跟老头子说说，不用跟他们厂做生意！”……

听说我是车务员，她们都乐得要命，说：“你爱人是经理你怎么还跑车？俺们可没有干这个的！”

我听着这些话真刺耳，这些人怎么那么傲！那么狂！不就因为丈夫是厂长、经理吗？女人得有自身的价值，自身的份量，不能像月亮似的，靠别人的光去炫耀。

我当了十年车务员，从1982年起连续五年被评为标兵，当车务员工作量就挺大，当标兵就更不容易了，经常是早晨四点钟就得爬起来，有时候一天得干两个班。光完成工作量不行，你得服务态度好，收入额还得高。那些夫人们瞧不起车务员，叫她来干还不一定能干好，这里面真有点学问呢！

有一回，我碰上这么三个小伙，收票时他们谁也不掏钱买票，你推他交，他推你交。对我说什么：“就你事儿多，俺上车从来不买票！这样吧，你说俺三个应该谁买票，说对了我们就买。”这是成心出难题。可我一点没发火，灵机一动，不紧不慢地说：“上车应该买票，这是规定，谁都得遵守，你们三个肯定是好朋友，谁也不会在乎这一毛两毛钱。这样吧，谁个儿最高谁交钱，大的让小的嘛。”他仨被我逗乐了，那个大个痛快地交了钱。

在车上干长了挺有意思的，一些老乘客看见我，哎呀那个亲呀，有人主张在车上要以宣传为主，我不这样看。我跟公司的领导也说过，应该以服务为主，多扶一把多为乘客解决一个困难比多说几句话好。我在车上就天天准备好几样东西，像方便钩呀、塑料

袋、塑料绳什么的，因为我跑的那条线路上有自由市场，乘客有时买了鱼买了蟹子拿上车，这些小东西就派上用场了。既不用担心弄脏别的乘客的衣服，也不会影响车上的卫生。时间长了乘客和我有了感情。有的站在车站专门等我的车，有的看见我的车大老远也喊着追来……这些场面都使我感到很大的满足，车务员就应该既按原则办事儿，又让乘客喜欢。

牵扯我精力最大的是得经常参加公司举办的各种活动：智力竞赛叫你去，业务竞赛也叫你去，领导考虑你是标兵啊，又是老人儿，去了不至于一问三不知，可人家出题不能光出眼前的啊，不准备哪行？一百道题够你背半个月的。碰着家里来人，我都是到旁边煤场去背，实在没有时间了，就借了一台录音机，自己做了答案录下来，一边洗衣服一边听，这些事儿花费我多少时间哪，全是业余时间干，有时候赛完了就得赶去跑车。我这个人看来挺胖，外强中干，血压不好，平时量都是100~140（mmHg），卫生所都知道。知道有什么用？还能不干哪，又是经理夫人又是标兵，家里单位都得干，还都得干好。

所以说，别看俺家老头当经理，我一点也不比他轻松，有时候累得都想大病一场躺它几天。有人劝我：“你爱人是经理，你天天太忙了，叫领导照顾照顾调到机关科室去弄个轻快活儿干干算了。”

我也想调动工作，可决不愿因为丈夫是经理而得到照顾，他也是这个意见，“不要提我，你当了这么多年标兵，公司领导会慎重考虑的。”说实在的，俺老头当了好几年的经理，俺单位不少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从来不说。这样有了成绩我觉得挺自豪，因为我没躺在他那棵大树下乘阴凉，我是自己干出来的。

后记

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是动人的。这独特的感受促使我奋然命笔。然而倾诉者似乎并不是都希望它公诸于世，是出于腼腆，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深深的顾虑……

这顾虑使我困惑……

我们有幸走出了历史的阴影，但心灵创伤的治愈仍需要时间。如果说当今时代需要科学和谨慎，那么它也同样需要真诚和勇敢。

感谢大连市企业家协会和大连市妇联对我的支持。

愿心泉畅流在理解的阳光下……

那死者，那活者，那火葬场

季福林

如果把妇婴医院比作是“降生者”的“接待站”的话，那么火葬场无疑就是“亡灵者”去另一个世界的“路口”了。

在这个“路口”工作的刘学，认识他的或熟悉他事迹的人就太多了。简单点说，他就是与一万多具死尸打过交道的“刘大胡子”——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政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和三次市特模、省劳模及两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1981年和1983年，我曾两次采访金州火葬场的火化工刘学。他的真情，他的厚意，他的追求，潺潺地流淌了十六个春秋……

1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刘学的“表演”，你就不能不感慨、折服他的“艺术”。我始终忘不了我第一次到火葬场采访时见到的第一个镜头——

接尸车刚在院里停下，一位细高挑、满脸络腮胡子的火化工急步上前。（陪我的民政局一位同志说：“他就是刘学。”）

他打开车门，一一扶下死者的亲属。（“人悲痛大劲，身子往往容易失控。”后来他告诉我。）

他帮抬下尸体，又抬到“告别厅”。他熟练地整理了一下死者的衣帽。（“这点不起眼的动作，对死者的亲属可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后来他对我说。）

乐曲响了，告别仪式开始。这时，刘学一身精神，“马不停蹄”“口若悬河”：“好，好，看一眼，老人很安详，很知足。这说明，你们子女及所有的亲属，在他生前是尽了孝道，尽了心意。好……”乐曲一停，“好，好，你们亲属都去休息一下……难得，太难得你们的一片孝心了。好！顶多五十分钟，我们一定处理得熨熨帖帖。你们放心，绝对放心，你们的老人，就是我老刘的老人……”（“这个过程要紧凑，话要热，一切从安慰生者的角度考虑，最大限度地减少生者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他们还要继续走人生的路，还要工作，还要为建设国家出力。”后来他对我侃了一遍。）

此刻，死者的亲属愣了，你看我，我看你，再看一看一脸诚意的刘大胡子，心底的悲痛仿佛去掉了一半！

就是这般神奇！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你说，这艺术不艺术？

每年，经刘学之手处理的尸体，少说也有两千具的面孔经他用酒精棉擦过。一位死者的亲属使劲握住刘学的手：“我是真正开了眼界。你们的‘为人民服务’是真正的，毫不虚假的，你们不是简单地接尸烧尸，而是上了形象生动的一课！”

在金州火葬场，生动的事儿几乎每天都有，我在这里绝无夸张。就是今年发生的事情，一单位正在建设的厂房突然倒塌，致使八人遇难。无首的，缺腿的，血肉模糊的，压成饼状的，真真惨不忍睹。为使他们的亲属不遭太大的刺激，事发单位请求金州火葬场处理。

刘学二话没说，把这“活”接了。紧接着，他和他的伙伴精心地“拼凑”和化妆。经过二十多天的“塑造”，终于“成型”。有人心里嘀咕：“这活，给一万块也不干！”实在。可刘大胡子，干得愉快，他说：“不干咋行？为了死了的，更为了活着的！”

难怪大连化学工业公司一位无子女的退休工人对其侄子说：“将来，我有那么一天的话，你一定把我送到金州火葬场！”

无怪三十里堡的一位老翁到金州火葬场看过回来后嘱咐其子孙：“我死了，一定要过那刘大胡子的手！”

风儿，就这么越传越快，越传越远。于是乎，“舍近求远”的事越来越多。近几年，市内和邻县来火化的，就占全场火化总数的三分之一。

2

在火葬场这个独特的世界里，不乏棘手之事。四年前发生的一幕早为新闻媒介所传播。我愿在这里把情节较为详细地展开，以让读者更好地“透视”一下刘大胡子，当然还有别的什么——

一位因意外事故而死亡的驻军某部战士被送到了火葬场。从家乡赶来的那战士的母亲和弟弟强硬地提出：“不定烈士不火化！”随之，哭，闹，吵，大有天翻地覆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工作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

刘学了解一下后，便将死者的弟弟拉到一旁：“能不能定烈士，政府有具体政策规定。够，部队不敢不办；不够，部队也不敢给办。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把事情

搞得太僵，能解决问题？我看你是个有觉悟有头脑的青年，不会不考虑到军民军政及各方面的影响。至于家中的困难，可以同部队商量，我看会解决。再说，你哥哥已死几日，再不火化，就腐烂得……我想，作为弟弟，你是不会忍心看到那种状况的。而且，部队来了七八十号人和几台车，都僵在这里恐怕也不太合适……”

有情有理。似春风细雨！

死者的弟弟“认了”。之后，老刘又同他一起做老太太的工作。老太太先提一问题：“把儿子擦洗一遍才能火化。”

这太好办了，刘学几乎每天都做这样的营生。于是，刘学用酒精和棉球仔仔细细地将她儿子的遗体擦洗了一遍。足足用去了两个钟点。还有什么要求？

老太太说：“按老规矩，男左女右，得用左边炉子火化。”

此时，左炉早已“排号”。候者有序，丧户哪个不想早一分钟将死者火化？即使金州火葬场美化得再漂亮，服务得再周到，又有哪个愿在这多呆一阵？

在场者，面面相觑。“老太太呀，你也太……”刘学的心底掠过一丝悲哀。是啊，这样的要求也太苛刻，太过分了嘛。为使问题顺利解决，老刘费了一番口舌，说服了左炉的“排号”者。

左炉已经倒了出来，不会再有别的岔子吧？电闸推上。当刘学正要往炉里送遗体时，老太太一声厉喝：“停下！不行，这炉里太脏，弄干净才行。”

这道题太难解了。一来，炉里已经掏净；二来，炉温这么高，如何进得去清扫？

“还没碰到这样的主儿！”几个火化工不乐意了。老刘说：“她儿子死于车祸，自然难过，咱得体谅和理解……”之后，他穿上洒上水的旧棉袄，戴着湿透的帽子，带着清扫工具钻进了炉里。

扫了一遍，老太太还是不满意。老刘又连扫两遍，老太太这才点头。当他从炉里钻出时，已成了汗人儿……

3

丧户最大的愿望是：火化快一些，好一些，把丧事办得顺顺当当。因此，出于感激，许多丧户都为火化工备点烟酒，甚至送上一两张“大团结”。

然而，钱财在这里却失去了魅力。9月4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人死亡。火化时，从深圳赶来的亲属掏出港币和一条烟：“一点小意思，我们那里都是这样……”

刘学一挡，“我们这里从没这个规矩。亲人去世、火化，你已经够痛苦和够破费了，如果我们再要你的港币和香烟，那不就缺八辈子德了吗？谢谢你，谢谢你了，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

此举此话，若谁的眼圈不湿润的话，也会感慨再三！据近十年的不完全统计，刘学拒收现金三千余元，好酒一千六百多瓶，香烟二百多条。俗话说：上梁正，下梁直。多年，金州火葬场上下一个“风”，许多丧户感叹：“这里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是的，刘学多次和大伙唠过：“钱这玩艺儿，的确好花。可来路不正的钱，花了心亏。”——这就是刘学的熠熠生辉的“金钱观”！

事实上，在“现代”的今天，即使把火葬工作的重要性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多少人乐意到那个瘆人的“鬼地方”去干。十六年前，刘学做到了。不过，他还想到了火葬事业的明天，明天这里更需一批有文化、有知识、事业心强的年轻人。于是，六年前他让他的儿子雨生做了火化工。自然，社会反响强烈，新闻单位也作过报道。这里，我只想谈一段“插曲”——大约是1983年的2月，当刘学准备让雨生当火化工的消息传到我耳时，不知什么“动机”驱使，我一个电话要到了金州火葬场：“老刘呀，你干那活倒也罢了，的确也干出了名堂，当上了‘状元’；可雨生高中毕业，又是你的独生子，接你的班是不是勉强了他呀？”

“都不干这活，那死尸不是摞成摞了吗？”老刘在电话里乐了，“雨生思想挺通，我看这小子能有出息，你老弟放心……”

后来，雨生果然没辜负他老子的心愿，干得相当不错。去年，他从省民政局干校毕业后，又回到了火葬场工作……

刘学，就是这样设计着火葬事业，设计着自己的人生和自己后代的前程！

采访一上午，老刘非拉我到他家吃午饭。走在古城大街上，老老少少包括那些俊姑娘俏媳妇，都愿和他打招呼。蓦地，一位丧户的话又在我的耳畔回响：“刘大胡子肯定能多活几百岁！”世上，活几百岁的事恐怕没有，但其中的意思都能自悟。

已切除左下肺、六十三岁的刘学哟，我和人们真挚地为你唱一支深情的感谢、祝福之歌！

清风两袖 正气一身

——郭世宽轶事 之一

高云

小序

他，在大连的建筑行业里，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这不仅因为，他把这个人员来自多方面的“三合一”的杂牌军——第五建筑公司，在短短的几年里使企业内部制度健全，纪律严明，在任务面前敢拼能上，勇打硬仗；更因为他能使企业不仅在国内建筑市场大展雄姿，并且还使“五建”成为我国第一家打入国际建筑市场的单位。

他就是大连第五建筑公司的经理兼党委书记郭世宽。

他的部属都亲昵地称他为“郭老大”。入乡随俗，在这里我们也跟着如此称呼吧。

“郭老大”的经历说起来十分简单。1938年4月28日生于旅顺龙王塘镇小龙王塘村，读过六年书。十七岁当上了村长，入了党。接着，到大连第二建筑公司当混凝土工人。之后，他就没离开这个行业。他先后当过团支部、团总支书记、工区主任、党总支书记，1981年，任第二建筑公司的党委副书记。隔了一年第五建筑公司建立时，出任“五建”首任经理。中间因发现矽肺病——那是他年轻时在打山洞时得下的——改任了一段党委书记，后因先后继任的两位经理都遇到困难，组织上才又安排他当了经理兼书记。

这里，并不是写他如何从一个工人，成长为一个领导三千多人大企业的经理的过程，而只是写了几段他的轶事。

郭老大厉责郝有明

郝有明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是五建公司劳资科的一位业务骨干，别人都尊称他“大拿”。郝师傅年过五旬，过去曾在市劳动局工作过，所以到上面办个事、沟通个信息、平衡人员工资什么的，也都有两下子。而这些在建筑行业来说，不仅不可缺少，有时还真能帮助解决点具体问题。

谁也没有想到这“老郝头”快退休的人了，竟栽了个大跟头。

那是1985年的事了。老郝山东老家来了个亲戚，想让老郝给找个临时工干干。当时第五建筑公司还正缺些人手，老郝就把这位亲戚安排到四工区。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郝有明干了快一辈子的劳资这差使，这次却出了毛病。忘了给这亲戚办个临时劳动手续。

一天四工区在金南路工地上施工突然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工伤事故——一位青年人的腿被砸断了。

郭世宽本来对安全生产就十分重视，他闻讯匆匆忙忙赶赴现场，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委，很快发现这个受伤者是通过郝有明塞进来的，而且未办任何手续。

应该说，郭世宽同郝有明也算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可是，这位“郭老大”却认为，这件事绝不能放过，否则就是自己失职。

他先找郝有明谈了三条：其一，不能算是公伤；二，一切费用自负；三，你——郝有明要下去劳动半年。

郝有明深知理亏，一一点头答应了。

星期六下午，郭世宽召开全公司干部大会，对郝有明的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

“有人说，只有前两条就可以了，老郝就不要下去劳动了。老郝也是老同志了，我说不行，因为他是干部。通过这件事，我们要教育全体干部，任何人不能玩忽职守；手中有了那么点权力就丧失组织观念，不通过组织程序，擅自做主，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

他停了一下，环视一下会场接着说：

“如果这件事经过请示，事前办个手续，他的这个亲戚在工地里干点活，我看是完全可以的。受了伤，当然是公伤。可他没有这样做，不经过必要的手续，这是纪律和原则所不允许的。有人劝我说，还有两年老郝就退休了，”他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不错，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就绝不是下去劳动半年的问题了——这点，我请所有的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要特别注意。”

到会的所有干部都默默地悟着他的话，每个人的脑子里都留下一个惊叹号！

郝有明下去劳动半年，在下面解决了不少工资定额等问题，半年后他又回到劳资科，还被提拔为副科长。

“老K”遭斥变“老Q”

人们对68届的“知青”总抱有十分复杂的感情。或曰惋惜，或曰怜悯。同时也对在他们身上沾染着的哥们义气一筹莫展。

大连第五建筑公司有这样一个青年汽车司机。他的真名实姓，我们暂且隐去吧！

这个小伙子膀大腰圆，浓眉大眼，爆炸头，卷胡须。很像扑克牌上的“老K”，所以人们就赠他一个“老K”外号。

人们说老K属土地庙的——有求必应。他自己又外加上两句：“有应必办，有办必妥。”

郭世宽对这些司机们有规定，不允许用公车办私事，违者必有处理。

也该老K有事。节前的一天，一位朋友求老K往家里送几筐苹果。开始老K有些犹豫，可是后来一瞅，反正也没人知道，再说，这点小事都不能帮朋友们的忙，人们以后还能瞧得起我老K吗？于是开车就离开了单位。

真是越怕出事越有事。在拐弯抹角处，他把一个进城办事的老农给撞了……

交通队把这事儿简单处理了一下，就摆到了郭世宽的桌面上。

虽然人没给撞坏，可郭世宽却在想，司机干私事用公车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而对老K这号人，一直没有人敢动他，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怎么行呢？

他把老K找来，严厉地进行了批评，并告诉他，“你这事，要公开处理。一、要吊销驾驶执照，二、要到工地去劳动。什么时候上来，那就看你的表现。”

老K懵了。心想，自己好不容易从挖地基的工作干到开汽车，一下子又要回去干力工，这可怎么和老婆交代呀。他昏头昏脑地离开了郭老大的办公室。

也不知是谁给他出的点子。老K晚上八点多种，提着满满一旅行袋的礼物，硬着头皮闯进了郭世宽的家。

郭世宽是个精明绝顶的人，他给老K开开门，一看这架势也就全明白了。

你别看老K平时也做些让人打怵的事，甚至连刺猬都能生吞下去，可今天，在双目犀利有神的郭老大面前，就觉得腿脚不那么灵便，舌头也有些发硬，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头，不由得低了下来。

此时的郭世宽，看老K这熊样儿，心中不觉一阵好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老K，把胳膊一横：

“老K，你不用开口，我明白。不过，我可告诉你，要这样，你就是瞧不起我郭世宽，既然如此，你这一辈子也就别想在我手下开汽车。让你下去劳动，是要教育教育你，至于能不能上来开车，什么时候能上来，那要根据你的表现，这一切就取决于你是否有骨气。你说，今天这事怎么办？”

郭世宽用手一指旅行袋，“今天这事，我一定要公开批评。否则都来送礼我应付不起，这旅行袋是拿走，还是留下，你看着办。如果留下，我就替你带到大会上，一件件摆到桌子面儿，指着东西批评你。”

老K无言以对，最后只好把东西拿了回去。

郭世宽望着老K弓着腰而去，侧面看，那身子就像没有合上口的老Q。

事后，“郭老大”把这张没曝光的镜头，也亮给了全公司的职工。会上他说：

“我绝不是和老K过不去，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现在不是说送礼成风吗？——我只想借这个机会对那些想送礼的人提前发个信号——谁若不信，你就试试。看看我‘郭老大’吃不吃这一套。”

再说老K这小伙子，也算要这口志气。在下面劳动期间，处处抢在前面，经常受到表扬，连年拿先进。

——你问他现在干什么活？

——咳，他早去开汽车了。

“有胆量闹事的，请到我家去”

郭世宽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感到，公司机关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再说第五建筑公司这样一个三千人的企业，第一线的工人只有一千多人，其余都在后勤辅助部门工作。这就造成头重脚轻的局面。一线工人意见也较大，影响职工情绪。

对此，郭世宽通过主持党政班子会多次讨论研究，最后决定进行一次机构精简。机关原有一百八十人，通过定岗定编，只剩下了八十人。

此时，已是节前年关，春节将至。一些同志说，等过了春节再公布名单吧。

郭世宽思前想后：

“不！节前，一定要公布！”

有人问：“为什么？”

他解释道：“节前不公布，过节期间，谁也过不好，大家忐忑不安的，免不了要到处打听。领导同志也不好办，一旦说露了，大家都麻烦。所以，干脆些，节前公布，让干部群众走的、留的，都一块石头落地。”

工会主席问他：“来到春节了，谁敢公布，一旦遇上个刺儿头，过节期间，给你带来个纠缠不休，再扔个砖头砸个门窗什么的，这节，还有个过吗？”

郭世宽一琢磨，这话，不无道理，矛盾怎能向下转移哪，于是说道：“明天把全体同志都聚集到会议室，我来讲这次精简问题。”

他先列举了目前机关中存在的问题和职工群众的意见，最后公布了留下八十人的名单和精简一百人的去处。他谈到了同志们的表态和决心书情况，表扬了大家的正确态度。突然，他话锋一转，严肃地说：

“据反映，也有的同志说，谁让我下去，他就不得安宁，弄到好处给他扔几块石头，弄不到好处，就叫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说着说着，他忽地一下子站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干出来的。我首先声明，我是经理兼党委书记，其中任何一个人，我不点头，他绝对下不去。因此，这次不以科室分别公布，由我一个人来讲。”

他看了看大家，说：“有人果真有胆量，想杀想砸的请你把目标对准我。”

“如果谁有思想问题，想不通，你也别找任何人，就找我。春节就到，我告诉你们一个地址，扔砖头别扔错了门洞，我家住在车家村一建宿舍三号楼三楼一号！”

散会后，有人替他担心说：“这郭老大，这不闹玄吗？”

——这个春节，领导们过的都挺安稳，没有人找，也没有人闹，再说郭世宽家，过了春节，也没有扔砖头的。

于是有人说：“这郭老大，有气魄！”

汪为荣痛疾叙往事

时间长了，人们都品味出郭世宽的为人。五建公司上上下下的人们一致说，“郭老大”这个人哪，怎么说？那真是刀嘴铁手如来肠子，好人一个。

不信？你看。

一天，郭世宽正在工地检查工作，突然工区主任从后面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他。

他闻声止步，回头问道：

“有事？”

工区主任喘了喘气说：

“汪为荣前几天，就让我捎信给你，请你一定到他家去一趟。”

这个汪为荣他认识，“文革”期间在“二建”当保卫干事，后来调到“五建”一工区当砖工班班长。这些年来工作十分踏实，曾多次荣获过生产标兵，去年发现得了癌症，听说已是晚期了。

“他叫我去？最近病情不好吗？”

“看样子是不行啦！”主任一边说一边晃着头。

“唉呀！这种人的口信，你怎么能压好几天呢？说过去就过去。”他埋怨道。

“看样子他是有事。”主任说。

郭世宽疑惑地转过脸来，想了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就是盼死了。”停了一下，说，“你找个车，咱们现在就到他家去。”

一看到瘦得皮包骨头的汪为荣，郭世宽眼圈红了。他坐在汪为荣的身边，握着他的手说：“老汪，好些了吧？”

汪为荣紧紧地握住郭世宽的手说：“我早就盼你来了。”

“别急，有事只管提。”郭世宽开门见山。

然而，汪为荣却说出了他意想不到的话：

“郭经理，‘文革’期间你在旅顺遭罪的事，你还记得吗？”

郭世宽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心想，什么事都能忘，这一生中我有两件事是绝不能忘的。一件是自己当工区主任时，在旅顺小坞施工的一个厅堂柱子曾发生质量事故，那是“文革”高潮期间，他正领着一个工区在瓦房店施工。一天，在他回家的路上，被一伙人绑架。这些人蒙住他的眼睛，把他推上了汽车，大约经过了两个小时颠簸，他被带到了一间房里，他一看房的格局，知道是一所学校。还没等坐下，就被从后面上来的几个学生模样的人，用棍子、三角皮带、啤酒瓶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好一顿毒打，只十多分钟，郭世宽就昏死过去了。就这样，他被关了整整三个多月，那真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三个月后，家里人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托了许多人，最后才将他放了出来。可是直到今天，每逢阴雨天，就腰痛腿酸，疼痛难忍。想到这，郭世宽不禁打了个寒颤。

汪为荣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知道是谁让旅顺的学生来抓你的吗？”

郭世宽摇了摇头，他的确不知道。

汪为荣突然激动地说：“郭经理，就是我呀！”说完放声大哭起来。

此时郭老大，心情十分复杂。旅顺这段事他刻骨铭心，那是九死一生呀！想到这，他追问道：“老汪，过去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没有。”

“那——”他疑惑了。

“郭经理，我们是一无冤，二无仇，那纯粹是派性在作怪呀。”汪为荣负疚地说道。

郭世宽心想，过去的事情毕竟过去了，就今天看来，他汪为荣难道就不是受害者吗？说不定他今天的癌，还和当年这件事有关系呢？想到这，他就安慰地说：

“我遭的罪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还想它干什么。你好好养病。”停了一下，接着说，“老汪，你也是个明白人，现在有什么该说的，尽管说，我尽力办就是了。”

在老郭的再三催促下，汪为荣才说出一件事：他的儿媳妇在长春工作，将来他一闭眼，剩下老伴和儿子，儿子又和儿媳分居，没人照顾，所以，他希望组织上能帮帮这个忙。

郭世宽一口答应下来，不过告诉他：“这种事情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办妥的，但是，我尽量办。你放心吧。”

半个月之后，汪为荣离开了人间。而在他死后烧百日的时候，他的儿媳，已经从长春调到了大连。

残疾人哭衷肠

在郭世宽未当五建经理之前，这儿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因工受伤造成高位截瘫的残疾人马文瑞 化名 大闹了经理室。马文瑞由家人抬着，躺在经理办公桌上，大吵大闹，最后又故意在经理办公桌上撒了一滩尿。

郭世宽到五建之后，也曾派人去做过马文瑞的几次工作，可是马文瑞的气仍然没有消。于是他决定亲访马文瑞。

马文瑞打量着来访的郭世宽：身穿溅着灰浆的工作服，脖子上围着白毛巾，脚穿一双胶皮水袜子，手里拿一副帆布手套……他不禁在想，来者不善呀。尽管马文瑞长年在家卧床不起，可也有几个“铁哥们”经常来看他，因而对郭世宽的处事为人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讲述的有关郭世宽的事情，使他感到这个人挺实在的，所以他一见郭世宽来看他，就连忙招呼他坐下。

两个人唠着，不知底的人还以为是老朋友呢。

谈来谈去，郭世宽问他：

“你上次到底为什么大闹经理室，难道你觉得做得对？”

“我觉得我提的问题他解决不了，还摆臭架子，我都是阎王爷也不要的人了，还怕他这一套。”马文瑞愤愤地说。

“那也不能闹呀？难道就因为你是工伤致残就有了这种资格吗？”

“……”马文瑞没有应声。

“有一点应该明确，健康的人，应该体谅你的难处，可你也应该体谅具体工作人员的苦衷。是不是有哪一种药能治你的病，他不同意买？你才闹！”

“不，不是的。”他连忙说。

“是呀，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副药能治好病，即使花上万儿八千的，他绝对能买的。为了治你的病，公司花了那么多的钱，你再闹就不对了。”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能不能和我说个心里话，你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现在我新上任，有话你只管说，也许今后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你不说，我不知道……”郭世宽用真诚的目光期待他。

马文瑞沉默了。

“郭经理。你仁我不能不义。”这个马文瑞还有点旧道德观念，“说实话，上次我提出到上海、南京治病是假，其实就是借机逛一圈，回来之后，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我没有直说就是了。”一行晶莹的泪珠悄悄流了下来。——这是绝望的眼泪。

郭世宽的眼圈也红了。他想，马文瑞还不到三十岁，可已经为国家作了近十年的贡献，若不是灾难夺去了他的健康，他还可以尽心尽力再干上三十年！而今，他只能在痛苦之中度过余生。你难道能说他的这点要求过分吗？如果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确实太残酷太悲哀了。想到这里，他说：

“小马，你振作起来，你又不是七老八十，肯定治不好啦，可你还不到三十岁，这个结论还不能下，你不是要逛逛上海、南京吗？我不仅让你逛，而且还要派两个人送你到上海、南京，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为你会诊，只要有希望，别说现在公司好了，就是公司借贷过日子，我郭世宽也认了……”

马文瑞听着听着，“呜”地一声扑在郭世宽的怀里：“郭经理，我不去，不用花那冤枉钱啦！”

郭世宽擦了擦眼泪，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马，别哭了，去会诊一下，你和我心中也都好有个数呀……”

几天以后，郭世宽派人送马文瑞到上海、南京等处，进行了一次会诊，可结论却是一致的：

马文瑞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回来之后，他的父母从山东农村为他找了个对象。公司也积极帮助姑娘办理了有关的手续。可是，就在大家忙着为他准备第二天的婚礼时，在头一天晚上，他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事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份遗书，其中这样写道：

“……几年来，我给组织上添了许多麻烦，我感谢领导……她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来照料我的下半生，这更使我感激不尽，明天将是我新婚之日，可我已丧失一个男人的能力，我不能昧着良心去害人……”

一个多么复杂而又纯洁的灵魂！就这样结束了。

“郭老大”换上了皮鞋

郭世宽从来都喜欢一副工人打扮：工作服，胶皮水鞋，帆布手套，即使外出办公也不换。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换上了皮鞋，别人就很纳闷，后来，人们渐渐地传开了，原来“郭老大”就因为这一套打扮被市政府守卫人员当作上访者。

事情是这样的：

平时郭世宽参加会议从来都是第一个到场。这年秋季的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到市建委开会，于是他放下手中的工作，直奔市政府大楼。

市政府守卫的老同志一看他这副打扮，心想，这个同志不是上访的就是走错门了，于是就迎过去：

“同志，你上哪？”

“上建委。”

守卫的老同志接着问道：“你上访呀？”用手一指，“上访在那面。”

“不，老师傅，我是来开会，我是‘五建’的经理。”他特意报出了门头字号。

守卫的老同志想，瞧你这副打扮，哪一条都证明你是个老工人，不过还是客气地说：

“噢，那请你把证件拿出来看看。”

郭世宽往衣袋里一掏，坏了，自己一着急，放在包里了，于是就笑着说，“没拿包，忘在包里了……”

守卫心说，我一眼就看你不像个经理。但对这样的人也不能刺激他，否则要坏事的，所以他用和蔼的口气告诉他：

“我不骗你，上访的请到那面。”说着往信访办的小楼一指——

“就是那个二楼。”

有的血型专家说，A B型血的人，脾气都比较急躁，此话可能有点道理。这时郭世宽压了压火气说：

“老师傅，我是来开会的。不信我打个电话……”

正在这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位建委的副处长，一把抓住他说：

“郭经理，来开会怎么不进去？”

郭世宽无可奈何地做了手势。

事后，郭世宽的爱人——在建筑机械厂工作的魏敏知道此事之后，埋怨他说，“早就不让你穿这胶皮水鞋。偏穿，怎么样？以后你上班呀，公司守卫的也快认不出这个经理了？”

她越说越生气，提着这双胶皮水鞋就给扔了。

这样，老伴硬逼他穿上了皮鞋，可是一转眼的工夫，他又把那双胶皮水鞋拾回来，擦干净，笑嘻嘻地说：

“别扔呀，下雨坏天，上工地方便！”

查细账，惟独没有他的名

大连玻璃厂的修窑任务是十分紧急和艰巨的。如果提前一天，就可以为工厂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所以，在他们给大连玻璃厂修九机窑时，厂方做出这样规定，如果提前五天，就奖励二十五万元，由工厂和施工工区各得一半。

这一次，他们还真提前五天，完成任务，高高兴兴地得到了奖金。

最后，按照当时的惯例，这笔钱当“小红包”给分了，而且机关干部都有份，大家一个个很高兴。公司一级的干部都在二百元以上。

可时过一年，主管部门说，这种发放“小红包”的方法不合理，责任由领导承担。但钱却需要按名单全部收回。拿多少“吐”多少。

当时分钱时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可收钱时，却张榜公布。大家一看榜，愣了：原来郭世宽自己一分钱也没要，所以，他就不用“吐”了。

通过这件事，大家一致说，这“郭老大”不愧是领导，真不一般！

瑞典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一架银灰色的波音747客机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机场徐徐降落。郭世宽一行三人走下飞机。在停机坪的欢迎人群中，他发现了他的瑞典老朋友——马丁先生。

高大的马丁，穿着银灰色的大衣，微笑着向他频频招手，欢迎他们的到来。

据说马丁先生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瑞典籍，由于他在青年时期曾参加过共产党，所以他对社会主义有一定的感情。

而今早已成了实业家的马丁，近几年来曾多次到中国进行考察，他曾参观了很多建筑公司，但惟独对郭世宽领导的大连第五建筑公司很感兴趣。他说：

“我一进到这宽敞、整洁，而且布局合理的厂区，我就知道它的主人是位思路清晰、胸怀宽阔，工作起来严谨，节奏感很强的人。”

为此，他们经过多次交往，交上了朋友。后来，马丁对郭世宽说，他在瑞典花了一百八十万美元买了一座叫摩明儿的六千平方米的小岛，他想请中国建筑专家去帮助设计一下。

郭世宽微微地摇了摇头。他不是拒绝朋友的盛情。而是他知道，在世界上，有四个国家，是别国建筑行业永远打不进去的，瑞典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丁自然知道郭世宽的心情，笑了笑说：

“郭先生的心情我理解，可是这次，非你莫属了。因为我要把这座小岛，建设成一座有中国传统风格建筑特色的旅游小岛。若不请中国专家，难道能请瑞典的建筑师吗？”接着他介绍说，瑞典是个旅游国度，如果不搞点别具一格的建筑，那将只能是毫无意义。

于是，郭世宽来到了瑞典。

瑞典确实是个现代化的国家，也无怪乎别国的建筑队伍永远也打不进去，所有的建筑都是那样别具风格，设计精巧，装饰豪华，而这种建筑水平的确是我们目前的建筑水平所不能及的。

他们一行三人，认真地考察了摩明儿岛，并和马丁谈了初步构思。马丁先生听后感到十分高兴，愉快地说：“从明天起，我领你们游览瑞典最豪华的旅游区。”

可是，郭世宽却对马丁说：

“马丁先生，我们的考察任务既然已经完成，我想在明后两天里就返回去了。”

马丁感到十分惊愕，不解地问道：

“郭先生，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还是因为什么？”

“不，马丁先生，我的公司里还有三千多名工人要吃饭哪——何况我们的工作很顺利，我就不如早点赶回去了。”

就这样反复协商，马丁也只好勉强同意了。

同来的那两位同志却有些不高兴了。其中的徐德宁同志很坦率地对他说：

“郭经理，我们的出国护照是二十八天，现在才十天就回去，不太可惜了吗？”

同行的老牟也觉得，现在出一趟国不容易，自动放弃机会岂不可惜？

郭世宽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当然能体谅理解他们的想法，于是便说：

“你们留下来住到底。不过，可要好好看看，特别是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我们可不能花那冤枉钱呀。我得回去了，一是家中还有一摊事，再是，我们住在这最便宜的房子，一宿也要花一百美元，太贵了，我心痛。”

徐德宁很坦率地说：“你多捧一个大件回来，不就能找回来一些吗？”

“能找回来些？”郭世宽笑了，“别说捧回一件，就是捧回十件，难道不还是我们国家的钱吗？”

这样，他只住了十二天就返回来了。

尾声

没接触过郭世宽的人，都说这个人了不起，不一般；接触过他的人说他“两下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你现在明白了吧。

收录于199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桥魂》

生命无字书

张可绣

生命，是一本无字的书，只有默默而无私奉献的人生，
才能谱写出闪光的诗文

——题记

1991年11月5日13时40分。一辆蓝色的“130”呼啸着，风驰电掣地射进庄河县长岭医院。噩耗，顿时不翼而飞，震惊了庄河县北部山区崇山峻岭沟沟岔岔千家万户的心灵。

——邓长敏被车撞啦！正在抢救！

——老邓骑摩托车去撵偷税的牛贩子，叫车撞死啦！

——活该！再叫他六亲不认……

惊讶、惋惜，也不乏刻薄的诅咒。

急救室里一片紧张地忙乱……

庄河县税务局刘局长，眼泪暴滚，望着脸色煞白双眼紧闭的邓长敏，对从大连赶来的佟医生央求地说：“求求你们，一定要把他救活……”

不用编造的“悼词”

四十二岁的邓长敏，五大三粗，1.78米的个头儿。他生长在山区，属于大山的儿子，有山里人憨厚倔强的遗传基因。196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2月入党。1973年3月复员回到庄河县税务局工作。1989年，调到徐岭税务所任集贸专管员。连年被市县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市局税务系统优秀专管员和最佳专管员……

邓长敏荣誉称号很多，但他的外号也不少：“搂钱的筛子”“死心眼”“死不了”……有褒有贬。

外号之一：搂钱的筛子

邓长敏这把搂钱的筛子，是把筛齿很细很细的小密筛。他“搂”的地盘之大，方圆百余里，纵横五个乡镇、七个集市、两个牲口交易市场。这五个乡镇，都是县里榜上有名的贫困乡，人均收入低，税源细小。邓长敏就一天一个集，天天不脱空。一周在同一天里还有两个牲口集。收了东集奔西集，群山踏遍了他的足迹，溪水印满了他的身影。他的收税计划额是按天，一天集上完成不了，就窜乡跑屯，收乡间流动商贩零散税。

苹果下来了，他白天赶集，晚上就挨个果园查堵偷税的，一查就是几十天。山上的草谁都拉家去了，他的苞米秸子还扔在地里喂散放的牛。妻子气得说：“俺家邓长敏没有家，这家是他的店！”有时回家住两宿，夜里“忽”地爬起来：“快，快做饭，赶集

晚了！”打灯看表才下半夜两点。妻子又好气又好笑，指他脑门说：“我看你是收税收傻啦！”他不好意思地说：“刚才我做了个梦，看见有伙牲口贩子没交税，偷偷跑了……”

去年10月13日早上，邓长敏像往常一样守候在老父亲的病榻前，尽着一个为儿子的义务，他知道爹怕是不行了，可他又实在扔不下集上的事，踌躇了半天，最后还是忍痛离开了弥留之际的父亲。不料当他回来的时候，老人早已被抬上了灵床。他“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放声大哭。这哭声，这震撼人心的悲嚎声，是诉说一颗不孝的心灵吗？是在请生育他养育他的父亲的宽恕吗？也许，是在诉说“尽忠难尽孝，忠孝难两全”的道理吧！

集贸市场上收的是“芝麻粒”税，税票最大五元，小者一元。难怪有人嘲讽他说：“你这是‘要小钱’！”邓长敏毫不愧色地说：“对！我这是按章为国家聚财，这个‘小钱’我还要上瘾了。”他说得半点也不假。他所里老董说：“哪天要是赶上坏天，他急得抓耳挠腮，就像得了场病……”

邓长敏这把捞钱的筛子，究竟“捞”得如何，让下面这串数字概括也许更有说服力：1989年，邓长敏工作了仅八个月，收税三万九千元，是这个所1988年四个人一年收税的十一倍。钱，可是硬头货，没有哪位专管员会从腰包里往外掏的！

截至1991年末统计，邓长敏工作三十二个月，赶了八百多个集，跋涉两万五千多公里的路，开完税证两万四千组，征税十四万五千八百元。从1989年到1991年，连续三年超额300%完成所里下达的任务。捞钱的筛子，名不虚传。

外号之二：死心眼

山乡集市，是金钱与物资交流的河汉。邓长敏，就是这河汉中汇集涓涓溪流的河床。

当上集贸专管员那天，邓长敏这个“酒癖”“烟鬼”就把烟酒戒掉了。他说他怕有人“烟酒”他！他是这山区的坐地户，老亲故邻、七姑八姨多，但收税，谁也别想少交或不交税。

1990年7月，有位商贩把两套名牌衣服送到他家。邓长敏知道后，立即送了回去。那位商贩说：“叫你死心眼可真是死心眼。我送给你的，别人不知道，怕什么？”老邓说，“我当税官的可不能贪赃枉法。”那商贩佩服而又同情地说：“老邓

啊，我不到你家去我还真想不到。哪有当税官的家还铺编织袋补的炕席？我算服了你！”

服了？不服也得服！老邓说过：向情不向理，护私不能收税。他哥是个卖肉的，弟有时也倒腾点鱼虾什么的。集市上，邓长敏总是先拿他的哥兄弟“开刀”。当初，弟气得不上门；哥嫂气得找他妻抱怨，找老邓“翻小肠”：“你没钱买化肥找到你哥哥嫂嫂，收税差一毛都不行，今后你还认我这个哥不？”老邓说：“我干了这么个活，不先收咱哥兄弟的，别人不就‘瞪’死了吗！”……后来，老邓的哥弟也理解了他。

去年11月的一天傍晚。下集时老邓发现一帮牲口贩子的税收没交就溜走了。他骑上摩托就撵，顺公路撵到三县界边，往返一百多公里不见牲口贩子的影。他一想不对，又从一条翻山越岭的小路追去。这时天下起了雪，呼呼的大北风凶猛扑下来。老邓把车熄了火，在小路边沟里趴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寒夜风雪越来越大。不知等了多久，终于听到山坡有说话声：“今天这个邓黑脸可叫咱耍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能走这条路……”正当这帮牲口贩子自以为得意的时候，老邓突然把车灯打亮。贩子们傻眼了，有个贩子急忙拿出一张大票，往老邓兜里塞：“这一百，小意思……”老邓大吼一声：“少来这一套！交税，三百八十元！”仅去年一年，邓长敏黑灯瞎火追撵偷税贩子九伙，追补税款三千九百元，拒收现金三千五百元，交公物品折价两千四百多元。

外号之三：死不了

邓长敏当专管员第二十八天的夜里，大门哐的一声响，老邓出去一看没人，只见一把匕首扎在门上，有张方格纸，歪歪斜斜写着一行字：邓长敏，小心你的狗脑袋！妻看着这恶毒的话和锃亮的匕首，顿时吓哭了：“老邓，咱不干这活吧，我怕……”“怕什么！听兔子叫还不敢种豆子啦！”第二天，照样去收税。

去年1月的一天，几个卖肉的合伙来起哄，围着老邓瞪眼扒皮地说：“邓黑脸，今天你收我们的税，就叫你过不去这个年！”老邓对着几把明晃晃的杀猪刀，大衣扣一解：“来吧，有胆的就朝这里捅！我就是死了也照样有人收你们的税！”……有时确也伤过，鼻青脸肿，头包绷带，但照样不耽误收税。邓长敏对硬的不怵，对遵纪守法的生意人，按政策该照顾或减免的也不乏人情味。有位五十多岁卖服装的妇女，在集上被几个痞子抢走两条裤子，老邓撵上硬是制服了那几个痞子，迫使他们乖乖地把裤子送回来。在邓长敏众多的外号中，还有一个绰号，那就是“业余警察”，可见他在集市上制服不法分子偷、摸、抢、拿案件已成为他的“第二职业”。

有人看硬的对付不了老邓，就来暗的，不时深更半夜砸他家窗门玻璃，吓得老婆孩子嗷嗷哭。

灯下，妻子正给老邓缝蓝大衣。这是去年11月2日在集市上被人铰的，大口子足有尺把长。妻子边缝边说：“今几个能铰你的大衣，明几个就能要你的命……”老邓说：“怕什么，邪不压正！就是我被杀死了，也是为收税死的，光荣！”

邓长敏有过多次数祸。车祸的主要原因都是去追撵牲口贩子补税。最危险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90年11月的一天下午，当发现一帮牲口贩子溜了，他骑上摩托就去追。追到时，因山路道窄，一头毛驴一惊，把他连人带车撞到两丈多深的沟里。血，染红了山坡，他休克了三十多分钟，头上划开了一条大口子；第二次他滚了三个个儿，胳膊脱了臼；第三次，就是去年11月5日。

长岭医院惊慌而紧张的夜……

满天的星斗，睁着泪汪汪的眼睛，在凝望，在等待，在祈祷一个生命的醒来。

医院里里外外挤满了人，有他的妻子儿女，有他的领导和同志，有乡亲还有那些做小买卖的男女老少。每双眼睛里都含着一汪悲痛的泪。那位五十多岁的卖服装的妇女，挤在人群里抽泣……

灯下，医生把那条左小腿全部撕到背面的皮肉，轻轻拉过来，包上那白花花的小腿骨，精心缝上了一百零五针，又给接上了右胸的肋骨……

也许，死神也不愿意过早地把这位好“税官”领走。二十四天后，邓长敏又奇迹般地出现在集市上。尽管他的腿依然一瘸一拐……

肩起一面智业的大旗

刘汝达

一个暮春的下午，我走进了中兴智业公司总经理邢义军的办公室。当时，阳光透过落地的大玻璃窗正满室灿烂着。墙上一幅字画，上书“执著·义军同志勉之·丙子年冬月·柴泽民”。字迹古拙浑厚，不露锋芒，与“执著”二字正相符合。柴泽民是中国驻美大使，现任中国国际公共协会会长，邢总说。

在很好的光线下，我端量着刚过不惑之年的邢义军。一张挺秀气的脸，眉毛很浓，但不含强梁霸气，有一种挺文雅的走势。单眼皮，很薄，比双眼皮来得简洁轻灵。眼睛澄澈透明，如清泉石上流。泛青的下巴，显然在清晨刮过，隐蔽着不易被人觉察的阳刚和坚硬。

邢义军是中国国际公关协会会员，这个协会会员全国仅有四人，北京占去三人，大连仅他一人。1996年邢义军获“中国优秀公关工作者”称号，“第二届中国策划金奖”。国际公关协会主席柯林·切奇先生亲自到北京为他发奖，亲笔为他题辞，还当即写了邀请函，请邢义军到印度参加国际公关研讨会。柯林·切奇握着邢义军双手的时候，大大的蓝眼睛流露出对这个东方人的由衷的钦佩和赞赏。

任何人都离不开造就自己的那块舞台。那个下午，邢总的谈话勾勒出一幅丹青水墨，有泼墨，有白描，浓淡相宜，蔚成气韵：

我1989年从部队转业到中兴大厦，总经理张麟祥让我任公关部部长。“这是个新产业，肯定会有新旧观念的大碰撞，你大胆干，不要怕，我全力支持你。”张总很干脆地说。虽然邢义军那时并不清楚公关的全部内涵，但他却感到张总给了他一方天地，这方天地很辽阔很高远，正可以扬蹄疾驰。

公关是个边缘学科，几乎囊括了所有学科的知识。邢义军即刻潜进学问的海洋里了。阅读了许多公关专著，研读与公关有关的书籍，《易经》《三国韬略》《孙子兵法》……深夜孤灯，他神游八极，和孙子对话，和诸葛孔明对话，和曹孟德对话，和周文王演周易八卦……叩问玄机，参悟机理，启发心智，作着千年的交流。邢义军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无价之宝，充满博大精深的智慧，终生受用不尽。

邢义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暂且不说，反正不久他应邀到大学讲课，从大连的大学讲到青岛大学，讲到北京国际公关学院。他讲公关，讲营销，讲策划，课题清新，立意雄健，语言机智幽默，常常被掌声打断……

没有资金，没有设备，只有脑袋和脑袋里的智慧，算是无形资产。邢义军开始小试牛刀。1992年他为海尔集团策划了一场文艺晚会，效果很好。过后，海尔集团寄来了四万元钱，邢义军给寄回去了。他们又寄了回来，邢义军又给寄了回去。当时邢义军的公关公司十分需要钱，但他把眼光放的很远。这四万元寄来寄去寄出了一种友谊，这友谊是区区四万元钱万万买不到的。当时海尔产品十分走俏，邢义军向他们要货，随要随给，一批一批。其他商家有意见了，海尔集团说，他们并不占你们的份额，是我们集团特批的。

有人找邢义军策划，问，要多少钱？邢义军说，先尝后买，办好后，看着给。这不但是风度，更是自信。自信是邢义军的性格，有时自信到了狂傲的地步。有人说，邢义军是个工作狂、事业狂，狂中有傲，傲气冲天。邢义军说，我是狂中有傲，但没有傲气，只有傲骨。邢义军有先哲的人生态势。

一次，妻子留了一张字条，写着：“老干部都退休了。饭在锅里。我到母亲家去了。”

老干部都退休了，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也注意休息啊？邢义军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唱卡拉OK，每天晚上八时三十分以前准时到家，只是夜晚十二时以前从来不睡，看书学习写笔记写文章，有时拿张大白纸，在上面画方阵图，胸中是否涌荡创意的激情，耳畔是否响起啸傲的鼓角？常常至下半夜，甚至迎来熹微的晨光。那次他为企业策划，亲自到现场边指挥边干，都累得跪下了。他说，工作上我有强烈的欲望，私欲上，清心寡欲。我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就是要把事业干得出色。有人说我怪，思维怪，性格怪，怪在哪里呢？无非是张扬了个性。我不是圣人，但可以成宿成宿地不睡，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也有人说，我是伟大的男性，不是伟大的男人。妻子都说，和你生活了这么些年，不知你有什么兴趣和爱好。邢义军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邢义军和他的智业公司名气渐渐大起来。朋友和客户纷至沓来。

为一流企业服务，借势扬势，借智扬智，借船出海，是邢义军的又一战略。他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在大连首次引进名牌产品“康师傅纯净水”，一下子进了四火车皮，推向了市场。这里面有着多次谈判的交锋。他和《中国公关报》联手，策划了一个专版，宣传’97大连国际服装节，在全国包括北京、天津、济南等十大城市发行一百万份，

还用丝绸做了一张纪念版，永久保存下来。邢义军说，我要为企业塑造形象，为企业打开市场，更要为大连早日建成北方香港作出贡献。

邢义军认为，公关人员应具备宣传家的口才、外交家的风度、企业家的头脑。邢义军有个客户想引进国外一个大品牌商品，这种商品在市场上很抢手。国外在北京的分厂又十分傲慢，事情难度很大。受客户委托，邢义军亲自到了北京。他走近厂门时，正碰上门卫换岗，只见保卫人员迈着军人的步伐正步走，立正转体，很是规范。厂区整洁肃静，红花绿草相互映衬。邢义军想，果然是个管理森严，在国际上堪称一流的企业。

他打通电话，对方说，等十分钟。邢义军足足等了四十分钟，才被请进屋去，那位洋人靠在椅背上，连屁股都没抬。是太傲慢了，先打掉他的锐气。邢义军递上了私人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有“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员”，“中国优秀公关工作者”。邢义军说，我到北京开会，受朋友之托，顺便来到这里。那个洋人说给你十分钟谈话时间。

邢义军单刀直入：“中国和外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中国市场的潜力是任何国外市场所不可比拟的。许多国外有眼光的商人、企业家已经关注到这一点，并着手挖掘这巨大的潜力，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激烈争夺的强劲势头。”邢义军扫了一眼对手，对手已经将身体前倾，神情也专注起来。

邢义军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从国内市场讲到大连市场。“大连的特点是……”洋人完全被吸引住了。

“十分钟已到。”邢义军突然打住话头站起来。

“不能走，不能走！请讲，请接着讲！”

又过了十分钟，洋人仍不让邢义军走，后来，竟拉着邢义军的手，请他到样品间看样品。中午了，非要请邢义军吃饭不可。邢义军说：“北京×××请我吃饭，已经定下来了，您看，外面的车还在等着我呢！”洋人耸了耸肩膀，完全不是先前那傲慢的模样。

邢义军气宇轩昂地走了。

不久，他的客户成了大连地区的总代理。

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邢义军却如探囊取物。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诸葛孔明在东吴舌战群儒的形象，那口才、那神韵、那智慧、那纵论天下大势的雄韬伟略，他轻摇羽扇带来了一阵一阵清风，仿佛拂到了我的脸上。

中兴模特队是邢义军的又一得意作品。有人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戏剧杂耍；宁带戏剧杂耍，不带模特队。邢义军不但带起了模特队，而且管理得十分出色，大腕名模在他面前不敢有半点轻狂，甚至连说话也放低了声音。

邢义军一脸威严，一身正气，骨子里又有一颗温热的心。有一次，他突然异想天开，带着模特队到庄河贫困山区演出，模特们不怕苦不怕累，一场一场演出，为农民送去了现代文化气息，给沉睡的山村一个历史性的惊诧。比起1996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搞的模特下乡演出，足足早了8个月。

邢义军曾带着模特队到香港演出，大获成功。香港主办方特调一台奔驰600轿车专门接送邢义军。邢义军打开车门，见队里一个名模端坐车内，他厉声道：“下来！你还没有资格。”那个名模慌慌地下了车。在场的香港人士都吃惊，名模是老板都怕的哟，这位内地老板可是了得。事后，邢义军说，对模特，特别是名模，必须从严要求，不能让他们滋生一丝一毫骄傲的心理，这对她们整个人生都有好处。

还有一次到无锡电视台演出，人家送到后台三箱矿泉水。演出结束后，邢义军指着三个模特说，你们一人给我扛一箱去。三个女孩子扭着纤纤细腰，扛着矿泉水的步态蹒跚得好笑，一直扛到外面的车上，香汗淋漓。邢义军不笑，很严肃。

那个春日的下午，我和邢义军交谈时，模特队长过来向他请示什么。我看出她对邢总的敬重，也看到她端庄的举止，文雅的气质，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莫不是邢义军调教的结果。

邢义军对我讲，公关是个新产业，必须由特殊人才组成。外国人在中国一年拿走我们几亿元，仅美国一家公关公司一年从北京就拿走七八百万元，为什么我们的钱让外国人拿走？我们应该有一支自己的队伍！他目光坚定，手在空中那么有力地一挥。是的，眼下我们这支队伍还不够强大，但已经出现了佼佼者，他就是邢义军，正如中国公关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翟向东评价邢义军说：“你扛起了智业的一面大旗！”

邢义军在北京参加了由美国爱德曼公司公关集团举办的“建立合作伙伴网络新闻发布会”，会上他作了演讲。他说：“我是中国公关工作者，虽然我们踏入这个产业比国外晚了六十余年，但是，正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它昭示着一个崭新的未来，这个未来必定飞扬着鲜活而蓬勃的神采！”会上，他赠送给这个集团主席爱德曼先生一面中国国旗，他要让这面旗帜在世界经济大潮中高高飘扬！

老乔大叔

马力

我们点起一支支蜡烛
光照别人
自己却没有取暖的火

老乔大叔是我住西山村时的邻居。

那是一个亦城亦乡的三合小院。处于红旗镇与这座城市的交接地段。南面的三间，由老乔大叔和小儿子世和住。尽管红旗公社早已换了个很现代很开放的大名——大连渤海农工商总公司，但老乔大叔每月一次地穿戴齐整了去公司领那五元钱的养老金时，总先在小院门口清长地喊一声：“俺今儿去红旗社啦——”那意思是说，小院上午没人看门，各家门户好自看之。

东头两间半，住了户养猪的，隔了道矮墙不大交往。北面的三间，由我家住。我家只是一种概念，丈夫在外地，儿子随母亲去，平日屋里如只空鸟笼子。门前一左一右有两个花坛，是我的杰作。从春到秋，各种草本杂花不知疲倦地开着，我常痴立于花坛前遐想。一会儿，花骨朵变作小儿子舞舞扎扎的小手扑来；一会儿，花儿变作梵高笔下疯狂的《向日葵》……偏偏就在这种时候，老乔大叔便搬出小凳钉子样坐到花坛前。先问一句：“看花呐？”再补一句：“你呀，可惜了这块地方，要是栽菜够你一人吃的，省得你下了班慌模急促地去买菜！”得，好端端的一个心境顷刻间搅得一塌糊涂。

老乔大叔也在适应潮流。他开了个个体浇注模型房。活儿不大好揽。一没活儿，老乔大叔就骂世和。世和是老乔大叔的小儿子，在一家中型企业里当厂长。老乔大叔骂人的主题并非专一。有时是因了哪个儿女多日没见面；有时是因了街上铺沥青的工人偷工减料；有时是因了好好的果园给平了搞房屋开发搞经贸货运……“妈的，都不走正道！”一般情况下，是世和与妻子丽敏任凭老爷子骂去。实在受不了，两口子就一前一后笑嘻嘻地出了小院，到铁道学院丽敏的父母那里避难。

有一阵儿，我一下班老乔大叔就随进屋里，似有什么话要说。终于有一天憋不住了，他问我：“你是记者，经历的场面多，能见到×市长吗？就说红旗社里的乔传义问他好！”我诧异了。原来，老乔大叔60年代是个辉煌的人物，大连市的技术革新能

手、劳模。当时那位市长同志每年春节都来看望他。“我还和钱令希教授到各大学讲过课呐！”他强调再三。

打那以后，老乔大叔上我家勤了，尤其是在丈夫和儿子回来的周日。抄着手当地立着，像个单纯的孩子。

有一段时间，儿女们见老乔大叔孤单就操办着给他介绍老伴儿。他常把相每个老伴儿的过程讲给我听。一次他竟熟练地运用起“她一见我就钟情”这样很时髦的话。其实，包括老乔大叔的儿女们在内都晓得，那些相亲的“老伴儿”大都是冲着老乔大叔的模型房来的。

有年冬季很冷，老乔大叔拎了个“土发明”送我。说我一个人在家生炉子一时半会儿不暖屋。那是个回水式的空心炉盘，上面插了根又黑又粗的胶皮管子，又笨又难看。惟一的益处是可以把炉盘上有限的热量回送到土暖气的热水管内。朋友们上门都笑话这玩艺儿太土气。我就卖给街上收破烂的了。

一日，老乔大叔追问我：“你看见×市长没有？他咋说的？”我为难了。不久前的艺术节上我确看到了那位市长，可当时人很多，我上前给老乔大叔带这个好不唐突吗？再说，作为一位市级领导，一生中会接触多少曾经先进或正在先进的人物，他能记得我的邻居老乔大叔吗？可讲了实情，老乔大叔肯定会伤心的，我就支吾他说：“见到了，他还问你好呢！”老乔大叔真信了，顿时红光满面，说：“他那个人挺好！”接着就忆起那位市长当年拜年时的每个细节，诸如坐哪儿啦先和谁握手啦等等。一连半月，小院里听不见他的吵骂声。

那年九号台风袭击我市时，我正在金州农村采访，交通堵塞回不来。我一边踩着齐腰深的水步行在灾民家，一边思忖：比大街矮半米的我家准泡汤啦！三天后我回到市内，家里却安然无恙。后院老李大娘说，那天深夜十一时多，老乔大叔领着世和和丽敏先在我家的后墙挑了个水沟，又搬了几个盛煤的纤维袋子把房门堵住。七十岁的老人啊！我过意不去。第二天下班特意绕到天津街一家副食品门市，给老乔大叔买了一瓶酒、两盒花样糕点送过去。老乔大叔压根儿没让我进屋，说我是念书念多了、迂了。

小院动迁了。

回迁时，我家在一号楼，老乔大叔在二号楼。这时他却患了血栓病，卧床，不常见面。

一日，母亲说：“你老乔大叔叫你去一趟！”我问：“干啥？”母亲说，他的楼下招了户炸油条的，烟老往二楼蹿，呛得老乔大叔上不来气。他找了居委会找了派出所，谁都不管，想求我在报纸上写篇稿子说一说。可我当时因病正住疗养院，再说这样的民

事纠纷报纸不好管，我就借口没去。下一个周末晚上，我从疗养院回来，母亲沉着脸告诉我：“你老乔大叔老了！”那一瞬间，我愣了。然后是泪水蒙面。再然后是一阵阵地内疚：淳朴、单纯的老乔大叔啊，把人生最后的真诚与公正托付于我，我就那么轻易地置于一边……

每每，走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的易拉罐般的楼群里，注视着楼洞里进出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眼前不知不觉地就闪现出那个小院和老乔大叔每月一次清长的一喊。那是一种安全感，一种咀嚼不尽的温馨啊。

生命之歌

王成贤

当你走进森林动物园，一种远离喧嚣、洗净尘埃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进入另一种生存状态。这里，一砖一石都会激起你对原始生命的向往。这里，一草一木都向你摇曳着生命的鲜活。这里，展示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命运与共、爱心永恒的不朽风景。这里，一山一水流响着一曲曲生命之歌。

生命咏叹调

在一个秋雨霏霏的日子，我来森林动物园的动物公墓，许多人称它灵骨塔。公墓依山而建，坐北面南，圆圆的青冢芳草萋萋，石栏环绕。沿山拾阶而上，黑色扇形的大理碑在苍松翠柏中峭然静立，俊逸的楷书“动物是人类的朋友”镌刻在墓碑上，并注明：为在园中死去的动物而立。迎着细雨，明亮如镜。墓碑前横卧着一米多长的黑色理石，下面是墓穴，安放死去动物的灵骨。

这里有长颈鹿“樱樱”尸骨，1995年动物园迁建大事记这样记载：是年8月17日6时55分，动物园一雌性长颈鹿突然倒地死亡。该长颈鹿系1990年日本北九州市动物园与我市交换的动物。在此之前该动物未有任何病史。18日19时至22时30分经北京动物园高级兽医师王复权和大连医学院的四位解剖专家及本园兽医师的解剖会诊后，死亡原因确定为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至今，时隔三年，已退休的饲养员杨向群提起她的“樱樱”仍泪水涟涟：那天是阴天，一早儿我就心发慌七上八下地，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一早六时跑到园里。唉！可怜的樱樱啊，得了这么重的病，大夫说，就是人也挺不过两个小时，可我的樱樱一直等我到早晨。本来已经不行了，一听我唤它，一个高儿地蹿起来朝我奔呀，扑通又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樱樱”去了，带着主人的永远的思念去了。为了不让另一个长颈鹿“朱丹”到新家发生意外，在森林动物园乔迁之前，老杨从家里拿块吸铁石，忍着腰酸腿疼蹲在地上一寸寸地吸出一个个废铁、残钉。三百多平方米的草坪，洒下她无数晶莹的汗水和对长颈鹿的一腔“寸草”深情。倘若“樱樱”有灵，会深情地说“谢谢”，这只是发生在森林动物园无数个人同动物挚亲挚爱故事中的一个。动物园从领导到员工每每提及他们园

中的动物都是喜形于色，如同朋友。因此，动物园组织了为珍惜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的数次义捐、义演，两千多少先队员代表全市五十三万红领巾举行了“热爱动物”的庄严宣誓。因此，每发现一只珍奇野生动物，不管多远，园领导都要趋车前往，亲自抱回。因此走失了四十五天的小熊猫安然回家。因此，短短两年中，上百只野生动物在园中安家落户。因此，才有这个“动物永远是人类的朋友”的墓志铭。

人类为动物立碑，恐怕在动物园建设史上还前无古人吧。凭吊中，我突然感到在穿越时空的大自然怀抱中获得了宁静和谐的生命启示。心相约，人类在为动物立碑的同时，也找回了自己灵魂栖息的家园。

生命交响乐

雨过天晴，我信步虎山，这时别有一番生趣。

“虎狗六兄弟”，是大连森林动物园的杰作，可谓“家喻户晓”，世人皆知。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观赏一奶同育的虎狗亲昵憨态后风趣地夸赞：“谁说狗娘养的不是好东西，这不就是好东西吗！”虎年吉祥，如今虎狗家族兴旺，又添三虎，已组成九口之家。森林动物园共展养动物一百三十余种，一千多只（头）。他们在动物展养的“新奇特”上做文章，员工们为动物的繁衍生息殚精竭虑，乐此不疲，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谱写着一曲曲生命乐章。

在虎山，我遇见了育虎近七十只的臧著斌老师傅。这位曾上过《世界名人录》的养虎大师，虽年过花甲，仍面色红润“虎步生风”。他一唠起本行，顿时神采飞扬，“谈虎色变”。一次电台打来热线电话，点名让臧师傅接，“武松”说：“观众问我在《水浒传》里打的是不是真虎？我说是，观众说把打虎英雄演绝了……”臧师傅不等人家说完，立刻虎下脸：“你算什么英雄，全国野生虎就剩十几只了，你还打！”对方说：

“我不打它，它就吃我。”“那是你活该！谁让你吃饱了撑的，无事生非，半夜三更上什么景阳冈，犯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有理呢！”臧师傅手拿电话越说声越大，满屋震得嗡嗡响，真有点儿“虎啸山林”的架势啦。原来他把电台有意导演的对话，假戏真做啦。在他四十四年的养虎生涯中，真可谓虎迹斑斑，奇迹不断。一是“英雄虎妈妈”，在他的精心饲养下，十年产仔二十六只，成活二十一只，世界闻名。这只英雄虎妈妈的孩子已在全国十九个大城市动物园繁衍后代，其中有一只还远涉重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耀武扬威去了。二是“虎狗六兄弟”。三是老虎“宝宝”乔迁新居后，两年高产，共生三胎九仔，效率之快，创同类最高记录。四是虎、狮、熊同窝喂养，开不同物

种动物合笼饲养先例。不信你到虎山看看，它们除小打小闹外，基本相安无事，给游人带来无尽的童真乐趣。当然，最开心的是臧师傅本人，他是真正的“虎王”，只要他一声吆喝，它们都俯首称“臣”。尽管他早已退休，返聘虎山，可老虎不势利眼，因为在它们眼里的臧师傅，“虎老雄风在”。人有心、虎有情，那是他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凛凛虎威！

在森林动物园，有许多像臧师傅一样视动物如己的饲养员。王利和商淑云夫妇，成功地哺育了“小迷糊”和“六一”两只小熊猫幼仔，开创了国内全人工哺育小熊猫的先例。当我采访他们时，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是异口同声地说“太难了”，便泣不成声，因为他们生活的每一天都为小熊猫生死冷暖心动情摇。把黑猩猩毛毛培养成动物明星的王玺臣自己还没结婚，却像个家长一样陪毛毛吃住在一起训练，不知牺牲了多少个节假日、朋友聚会日。在人们目睹毛毛升园旗，服装节巡游精彩表演的背后，小王的胳膊、腿上已是疤痕累累。曾有句名言：“成功的花朵洒满了牺牲的血雨。”谨此献给森林动物园谱写动物生命乐章的人们。

生命圆舞曲

在7.2公顷的森林动物园中，一草一木都跳动着“绿色与生命”的音符，旋转着天人合一的旋律。“建一流园区，创一流服务”，“管好自己的家园，耕好自己的田”，全体员工用爱心编织着生命圆舞曲。

一位腿有残疾的外地朋友游完大连森林动物园感慨地说：在这里感受大自然赋予温情的同时，印象最深的是动物园为游客提供的种种方便。他没想到一进公园大门就得到免费使用轮椅的服务。一对对新婚夫妇，徜徉在白云雁水间，流连于小动物村，在热带雨林馆尽情拍照、摄像，接受森林动物园为他们开设的免费服务和新婚祝福。听说瓦房店泡崖乡张屯贫困的一百名孩子想到森林动物园看看，园长隋建国亲自带着两辆客车，把孩子们接到园里。看动物表演，与叔叔阿姨联欢。孩子们依依惜别后，将上百封信寄来。我在园报上看到四年级的翟华小同学写道：“我多么希望毛毛表演的时间长一些，因为我喜欢毛毛，更喜欢大连森林动物园。”开园以来，森林动物园已免费接纳了军烈属、老干部、劳模、残疾人、七十岁以上老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近二十万人。

“一个员工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景点”，用最佳的服务增添移动风景。这是动物园赋予管理的更高要求和人文色彩。从虎山下来，我遇到了正在干活的园容队长初培海。他告诉我，全队四十多名职工要保证十一个公厕，近三十万平方米的绿地道路整洁干净可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园里规定不准收费，不许罚款。园长说，游客是来寻求心情安静，而不是来吵架，遇到不合适的行为，也要耐心劝解。我们有时遇到不讲理、乱扔东西的人，就是满心不愿意，也只能跟在后边悄悄打扫。一次，一位游客拍照，我们的浇草水车开过来，由于拍照太专注，尽管疏导也没躲开，打湿了相机、衣服。工作人员向他再三道歉，他正要发火，隋园长赶到，立刻给他买了套衣服，还包赔了上千元相机。游客被深深感动了。园容卫生要求高，一到春夏季游人多，我们常常干到中午不休息，直到下午两点以后才有十多分钟吃饭时间。你看下雨后，路面泥多，我们要用水车冲干净。一个夏天，答应儿子上海玩玩都没去成，太忙了。放眼望去，有几个园林工人正在绿草铺就。

的十二生肖图案上修剪着，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栩栩如生、永不褪色的常青之树，换来了姹紫嫣红的不朽风景。

下山时，正是夕阳斜照、晚霞散金，秋日的山谷层次错落，在五颜六色的建筑点缀下，愈发色彩缤纷，余晖摇曳。鹿鸣幽谷、鸟唱群山、熊咆虎啸、百鸽飞旋，整个山谷淹没在生命的喧嚣中。生命因创造更美丽，人、自然、动物，一切生灵的爱犹如一首回肠荡气的主题歌，伴你永远。

为了这方土地（节选）

黄瑞

第十六章 难忘的片段

两个土豆

1994年夏。一天，开发区办室主任孙士勇从大连开会回来，急忙赶到姜云胜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会议情况。

孙士勇一进办公室，看见姜云胜正在打吊瓶，就拿个椅子过来，坐在姜云胜的身边，向他汇报。炮台镇的干部们，看姜云胜打吊瓶，早已习惯了，所以，不论请示工作，还是汇报情况，都是照常进行，从不耽误。

十一点的时候，孙士勇汇报完了，刚要走，姜云胜又把他叫住了。

“士勇，你先别走，我告诉医生不来了，一会儿就点完了，你帮我把针拔下来。”姜云胜边说边翻了一下身。

孙士勇把椅子放回原处时，一眼看到了姜云胜的饭盒，突然想起了午饭的事。看一眼药瓶里的药水，还得十分八分的，就对姜书记说：“我上趟厕所，马上就回来。”下了楼，他就直奔食堂。他转了一圈，看什么菜都没了。

他问厨师：“你们知不知道姜书记病了，菜怎么都没留点？”

厨师说：“不知道姜书记病啊，他早晨告诉我们，说带饭了。”

孙士勇说：“给他下点面条吧，打两个荷包蛋，也好补补他的身子。”说完就赶忙上楼了。

回到姜云胜办公室，正好药水刚要点没。

拔下针后，姜云胜揉了揉手背，看看手表：“都十一点多了，得吃饭了。你就在我这吃吧，正好我今天胃口不好，吃不了多少。”说完就去拿他的饭盒。

孙士勇忙说：“姜书记，我看你的饭也没热，就让厨房给你做了碗面条，打了两个荷包蛋，一会儿就好了，你还是吃碗热面条吧，对你胃也有好处。”

姜云胜不高兴了，“我怎么特殊啊，还吃上小灶了呢，快告诉他们，做了我也不吃，我自己带饭了。”

这时，姜云胜把饭盒打开，孙士勇一看，竟是四个土豆，两块咸菜，他的心立刻难受起来。

姜云胜说：“这东西好吃，你要是不吃就算了，你去把那面条吃了吧。”孙士勇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从姜云胜的饭盒里，拿出两个土豆，陪着他一起吃。

姜云胜吃得很香很快，孙士勇却吃得很慢，不是土豆难咽，而是他在思考一个问题：炮台镇的富裕，能不能与姜书记吃土豆有关？

一盘海参

1993年春。

整个上午，姜云胜的心情十分愉快，没想到一顿饭把他的好心情全搅和了。

早晨，他同镇建筑公司的一名经理，去旅顺看一个医院的建筑。医院的造型和结构他一眼就看中了，就是医院的绿地留得太小了。

他对经理说：“咱们的医院，就要这种造型，结构也可以，直接用他们的图纸把设计费都省下了，就是院子太小，我们不能学。”

经理说：“你选的位置很好，盖完医院，门前还有很大一块面积，绿地除外，还能种两个大花坛。姜书记，我们都看三家医院了，这回满意了吧？”

姜云胜说：“那叫一百八十万啊，能随便怎么样就怎么样吗？盖上了就扒不了，那是咱自己的钱，市里一分也没投，不细行吗。”

离开那里，已经十一点了，经理说：“吃点饭再走吧，都中午了。”

姜云胜说：“还是走吧，城里吃饭贵，走到路上再说，小店便宜。”

走了一会儿，经理说：“吃饭吧，我饿得受不了，早晨就没吃饭。”

车在路边一个小店前停下了。姜云胜闲不着，他要到村里去看看，就告诉经理，要碗面条就行，吃了就走。经理说他不喜欢吃面条，喜欢吃米饭。姜云胜说那就点两个小菜。

姜云胜走了，经理进了饭店。他想点什么菜呢，点好的肯定挨批评，但他想，反正今天我花钱，就让他批评一次吧。他听说姜云胜没吃过海参，就想让他尝一尝海参的滋味，只要你吃了，挨批评也值。

老板按他要的菜，马上派人上市场去买，姜云胜回来前，买菜的人回来了。

姜云胜回饭店后问：“都要了什么菜，多了可吃不了。”

经理说：“没要什么，一个拌黄瓜，一盘豆腐，还有一个……”经理原想，菜上来再告诉他有海参，没想到姜云胜先问了，就吞吐起来。

姜云胜又问了一遍：“还有一个什么菜？”

“还有一个烧海参。”

姜云胜马上说：“什么，你还要了海参，退了退了。海参坚决不能要。”

经理说：“姜书记，今天我花钱，你就尝一尝吧。”

姜云胜说：“你花钱也不行，你花钱还不得回去报销，不还是镇里的钱？”

经理说：“今天我个人花钱，不要票子，我请你。”

姜云胜说：“你个人花钱也不行，咱们什么胃口，还吃上海参了。”他站起来就去找老板，要把海参退掉。

老板不干了，老板说：“菜都做好了，不要怎么行，你们这是逗人玩啊，现去市场买的，你们不吃可以，钱得给我。”

姜云胜看出来，这菜要是真的不要，老板都得动手了。

三个菜都上来了，可海参摆在那儿，姜云胜一口也不动。经理见姜云胜不动，自己也没动。吃完饭，姜云胜问：“海参多少钱？一共多少钱？”

老板说，“活海参，一百元，一共一百二十元。”

姜云胜掏出一百元就放在了桌子上。

经理说：“我说了，这顿饭我请客，不用你花钱。”

姜云胜看看那盘海参说：“可你这盘海参我没说要，你请我的是那二十元。”

炮台镇的干部都知道了海参的事。以后，不论谁与姜云胜公出，他们只管帮着书记拎包，买饭的事，就归姜云胜了。

复州城人的感叹

1996年10月，姜云胜到复州城办事，走得晚，到中午时，事没办完，只好下午再办。他和司机走进一家小饭店。

车停在饭店门口，老板娘以为来了大吃主，很热情地迎了上去。

坐下之后，老板娘把菜谱拿过来，站在姜云胜身边准备记菜单。姜云胜摆了摆手说：“菜单拿走吧，我们不点菜。”

老板娘说：“坐车来的大老板，哪能不点几个菜呢，我们店不大，特色菜可很多，不尝一尝，那可是遗憾。姜云胜说：“我们有事，没有时间，就两碗米饭，两碗羊汤吧。”

老板娘说：“像你们这样的客人，太少了，都这样，我这饭店就得开黄了。”她看了姜云胜一眼又说：“你们一定是个体户了，要是公家人，怎么忙也得要几个好菜，就是吃一口，也要尝尝。”

她一边说着，一边看了姜云胜几眼，觉得十分面熟。

进到里间，她对丈夫说：“你看外边那个人，好像电视里的姜云胜，长得像，一个菜都没要。你去看看。”

丈夫出来一看，正是姜云胜。马上就热情起来：“你不是炮台镇的姜书记吗，唉呀，你怎么连个菜都不吃呢，今天我请客，不要你钱。”接着他向里边喊：“来个活炖鲤鱼炆海螺外加一个老鸡汤越快越好。”他一口气说了三个菜。

姜云胜忙说：“老板，我谢谢你了，什么都别做，我真是没有时间吃。”

老板忙说：“你谢我什么，我还要谢你呢。我老丈人在你们松木岛村住，要不是你修了柏油路，去年雨天，那些贝壳粉就全扔了，六千多元呐，损失了钱，我还不得补一半。你说，给你做几个好菜吃，不应该吗？”

姜云胜说：“修路是应该的事，感谢什么。”边说边端起了饭碗。

老板说：“哪有那些应该的事，有多少干部，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就不给老百姓办一件事。别的村我不知道，松木岛村我是知道，老百姓真是感谢你，那个村家家都有贝壳粉，没修路时，一到雨天就发愁了，车进不来出不去。现在多好，不管什么天，那买贝壳粉的商人，自己带车就来了。”

老板向里面喊了句：“怎么还没好，”回过头又对姜云胜说：“姜书记你慢点吃，哪怕吃一口，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唉，姜书记，你说咱们这些农村的干部，要是都像你该多好，老百姓得咋乐。”

姜云胜摇了摇头说：“可别都像我，都像我，你这饭店都得黄了。”

老板说：“那样，不开饭店了我也高兴。”

还没到十分钟，姜云胜就把饭吃完了，不论饭店老板怎么拒收，姜云胜还是把饭钱汤钱留下了。

我真想为他作弊

一天，姜云胜拿着一百五十九元钱，到镇财政所找所长。所长不明白他的意思，问：“什么钱，我没借过你钱啊？”

姜云胜说：“我什么时候借你钱了，开票，这是电话费，这个月事太多了，没办法。”所长这才明白，姜云胜是来交超用的电话费。姜云胜把镇里的每部电话都限定了数额，超过的，自己拿。这是他两个月超用的电话费。

所长摇摇头说：“姜书记，这点钱你也交，可你应该得的，你为什么不要呢。”

财政所所长在镇里已经干了十五年，姜云胜当书记时，他就是现金会计。可是十四年以来，姜云胜没报过一次出差补助。最早时每天两元，后来每天三元、四元、五元，直到现在每天八元，十四年了，他一次补助没报过。

财政所所长清楚，十四年来，姜云胜还没报过一次饭票子。一年是做个样子看，二年也是做个样子看，可他一做就是十四年，他还是做样子给人看吗？

他不请客也不陪客。一开始有人说他这也是装的，来了管他的官看他陪不陪？

1990年夏天，瓦房店市委组织部长来炮台检查工作，中午了，得吃饭了。姜云胜按镇政府规定的标准，开了四十元钱的票子，让厨师到市场买菜。他为了给镇里省招待费，上边来客人时，他总要自己亲自定菜单，定好菜单，让人到市场去买菜。

四菜一汤上来了，姜云胜向部长摆摆手：“一定吃好。”然后，他回办公室吃自己带的饭去了。

这是主管他命运的人，他不陪，别人他还能陪吗？

谁不会拿公家的钱交人、送礼跑官当，谁不会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买关系，姜云胜也不傻，可他不干。

就因为他不干，炮台镇的招待费才年年下降。由原来每年十三万元，逐渐减少到6.7万元、5.8万元、4万元，最少一年3.8万元。

物价年年上涨，炮台镇的招待费却年年下降。

1997年夏，姜云胜去省城沈阳开会，会议开到中间时，他突然晕倒了。同去开会的瓦房店市委书记曾维，急忙把他送到沈阳医院治疗。

曾维说：“老姜，你就在这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不能再挺了，身体重要。”可是第二天，姜云胜不顾医生的挽留，出院回了炮台镇。

他在沈阳晕倒的事，镇里领导都知道了，他回来后，大家硬逼着他去大连全面检查。医生拿着检查结果说，这样的人要是再不住院，就没有病人了。

姜云胜不但有严重的胃病，而且他的血压高得吓人。脑部严重供血不足，还有风湿症，骨质增生。他的胃部有深深的三道沟痕，严重的溃疡面已达三分之二。

姜云胜还是不想住院，硬是被镇长徐士会留住了。

徐士会真诚地说：“姜书记，你住下吧，就是你再想干，不还得有个好身体吗？身体垮了，什么都完了。咱炮台镇刚刚起步，干部离不开你，老百姓更离不开你。有病你挺着干，几天不还得倒下？病治好了，你想怎么干，我们就跟你怎么干。”

姜云胜知道拧不过大家，就答应住下了。

住院期间，镇财政所所长准备了五千元钱，让人送到医院，给姜云胜作住院费。

根据姜云胜的病情，医生说最少也要两个月，身体才能恢复。

那时，炮台镇的修路工程、苗圃工程、建桥工程、养鸡工程、建校工程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姜云胜人在医院，心却早就回到那些工地上去了。

姜云胜只住了十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

回到镇里，他第一件事就是归还了镇里的那五千元钱，财政所所长接过那包钱一看，自己包装的纸绳都没变。

这次住院，一共花了两千八百元钱，镇长要按镇里的规定给他报销，姜云胜没同意。姜云胜说：“咱镇还不算富裕，再说，我自己还能应付得了，算了吧。我这要是松个口子，镇里明年的药费就会长起来了。”

徐士会说：“花了这么多钱，你不报，那你把补给你的工资钱算算吧。一个月七十多元呢，多少个月了，那是你应该拿的。”

姜云胜说：“我说不要就是不要，给我提个副县级，那还不是大家的功劳，工作是大家干的，谁少出力了，长的那工资也应该是大家的，我怎么能拿？”

采访时，财政所所长说：“你看，姜书记就是这样，他不贪不占不吃不喝，而且属于自己的那份儿他也不要，这样的人你说有吗？这样的镇党委书记，我敢说在中国也没有第二个。有时我真想为他作弊，给他报点票子，让他买点好的，吃点好的。他出差都不给他妻子买东西，他是真没有钱呐。别人不知道，这十四年了，他有没有钱，我是最知道的。他当了十四年党委书记，到了今天，他没有好房子，没有车子，没有票子，儿子生气还离开了他。说起我们的书记，心都疼啊！”

1998年夏，瓦房店市委书记孙学斌，在一次会上说，“学习姜云胜的地方很多，闻世震书记给他总结了五种精神，我们就说他一个方面的，细算算账，要是能学来，那是什么结果。”

孙学斌指的是姜云胜的廉洁和节俭。以吃饭和车子为例：他个人不下饭店每年为镇里可节省两万元；他压低招待费每年可为镇里节省八万元；他没有司机，每年省一万元；没有车每年省五万元。这是最保守的数字，一年省多少钱谁都会算了。

这是直接的数字，间接的有多少，更无法算清。

炮台镇修路投入了一千八百万，教育投入了一千四百万，农田水利投入了两千五百万，这些钱是哪儿来的？是招商引资得来的，是凭血水汗水挣来的，也是姜云胜和炮台人一分一厘节俭下来的。

在炮台采访期间，我曾产生过一次假想：如果中国的乡镇，有十分之一的乡镇党委书记像姜云胜这样，有十分之一的乡镇像炮台镇这样，那中国的农村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五分之一呢？要是都这样呢？

那时，中国将不再评选优秀基层党委书记，不用再树勤政廉政好公仆的典型。

老人们的微笑

俗语说，老小孩小小孩。不知从哪年开始，敬老院里的老人们，竟也盼起了年。一过腊月，他们就开始数着，二十九、二十八，一天一天的往下减。三十这天上午，他们就早早地起来，他们知道，九点多钟，姜书记准会来。姜书记来了，他们就开始真正过年了，因为姜云胜一来，他们就有了烟，有了糖，有了酒，还有压岁钱。

老人们没有白盼，九点刚过，姜云胜和镇里的几名干部就来了。烟、酒、糖、茶分发之后，每人还得个小红包，钱虽不多，这可是过年的象征，也是他们希望之果。希望不管大小，有了希望生活就有情趣，就有意思。

姜云胜就是想让老人们的生活有意思，有情趣。三十送点东西初一问声早安。当然，这些不会是老人有意思生活的全部。

夏天到了，老人们又想过点有意思的生活。屋子里闷热，连点风都不透，老人们就想，要是有个电风扇，那生活可就有意思了。躺在床上，不论黑天白天，小风一吹，不凉不热，想睡就睡想醒就醒，那该多有意思。

姜云胜满足了老人们。一个屋立刻多了个大风扇，十几个大风扇一吹，竟吹得老人们睡不着了。睡不着了就起来讲，当然还是要讲有意思的事，还要讲关于姜云胜有意思的事，别的有意思的事不能讲。

老人们真有意思。七十七岁的陈民超讲了个有意思的事，他说，你说有没有意思，1995年冬天，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被大雪盖住了，那个冷啊，一下子就醒了，原来

是被子薄了，给我冻醒了，我就想，这要是有个毛毯该多好。嘿，当天下午，毯子来了，是姜书记给的，大连奖励他的。

七十五岁的田阳川说，你这没有我的有意思。去年夏天，我的背心坏了，心想补一补再穿，朱总司令还缝缝补补穿三年呢，别说咱们。你们听说过朱德的故事吧！我不是瞎编吧。可那个背心也太糟烂了，缝完后，一扯线头，把后背撕开了。这下完了，连是连不上了，我一气之下，扔了，我说了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嗨，也真有意思了，不一会儿，咱院长拿来了两件衬衫回来了，看我正光着膀子呢，啪，扔给我一件，说姜书记给的，另一件扔给了耿仁庄。

老人们有意思的事很多很多，什么药的事，病的事，电视的事，讲起来就刹不住车，直到听见镇子里的鸡叫了，这才说，还是睡觉有意思。

等老人们醒来时，他们的居室已焕然一新了。

1996年夏，姜云胜到敬老院看望老人们时，他突然发现老人们的地下很湿。他怕潮气影响老人们的健康，就决定为老人们装修居室。

他对院长说：“老人的事，就是咱们的事，他们都力不从心了，心里想着的事也是干着急，咱们要是不给他们张罗，只有遭罪了。镇里的资金再紧张，也要挤出一部分，不能委屈老人们。”

姜云胜一次投了十万元，给敬老院装饰一新。老人们的屋里都安装上了地板、天棚，墙壁也粉刷了，被褥也换成新的了。老人们的嘴乐得闭不上，都说，这不是重新活了一回吗？

房屋装饰后，姜云胜发现老人们洗澡很不方便。老年人，身体洁净对健康很有好处，不能洗澡，就会影响老人们的身体健康。姜云胜又想办法给老人们安上了太阳能热水器，一年四季，随时可用。

热水器安好后，姜云胜来检查。老人们都围了上去，一个个说着感激的话。田广有老人拉着姜云胜的手说：“姜书记，我们可怎么感谢你啊，我们没儿没女，却比有儿有女的老人幸福啊。”

陈民超老人说：“你说我们这些人啊，真是的，旧社会累坏了我们，新社会养活我们。哪管能年轻十岁呢，也能再帮你出一把力。老了，只有看着的份了。”姜云胜说：“你们能高兴，这就好。不用感谢我，是咱们的社会好，党好。等咱镇经济好一好时，政府再给你们盖一个新楼，争取瓦房店咱们第一，到那时，你们就会更高兴了。”

老人们都笑了。

特别奖金

1997年腊月二十八，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来大连检查工作。她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临近春节，许多工作都等着安排。

她原想上午听完大连市纪检委的工作汇报，在市里看两个单位，下午就返回北京。

大连市纪检委书记王希智开始汇报了，他汇报的内容中，有个主要的内容就是介绍姜云胜的事迹。

王希智一件事一件事地讲着，刘丽英书记仔细认真地听着，听到最后，这位老纪委书记激动了。她那正直之心又一次受到了震动，就像当初接手“四人帮案件”一样震动，当然那次她是要为民除害，而这次，她是要代为民言。

她激动地说：“真是难得，很少有这样的基层干部。给房子不要，给车子不坐，给票子不拿，给儿子还撵走了。现在有多少人，花钱买官当，上下跑官当，送礼要官当，整天钻营升迁之事，管你老百姓什么路啊树啊的，这样的干部真是少啊，好啦，会，我看就到这，我要去看看姜云胜。怎么样，王书记？”

王希智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只是刘书记太辛苦了。”

刘书记笑了笑说：“那咱们就都学学姜云胜吧。对了，咱们不能空着手去，过春节了，买个大花篮吧，慰问一下姜云胜。”

春节来临，小镇一派兴旺繁荣景象。十一点十分，刘丽英书记一行来到了炮台镇。姜云胜从市场赶了回来。

刘书记仔细端详着坐在身边的姜云胜，心中十分感慨，他真不同别的党委书记呀，就他这身着装，老百姓也不会反感他。

姜云胜详细地向刘丽英书记汇报了炮台镇的情况，刘书记听得十分认真，特别对炮台镇班子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很感兴趣，她一边听着，还不时地记录着。

原定二十分钟时间，可刘书记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将近一点了，才停了下来。

刘书记高兴地说：“王书记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介绍了炮台镇的情况，都很好，你在基层这么干，不容易呀！基层有你这样的干部，难得，我得派人总结总结你呀。”

姜云胜急忙说：“刘书记，你可别总结我，这些事，都是应该干的，一总结倒不好了。您能来炮台镇，这就是我们很荣幸的了。”

临走时，刘丽英书记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一千元钱，对姜云胜说：“这钱是我个人的，就算老大姐对你的奖励吧。你有那么多病，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吧。”

姜云胜推辞不掉只好收下了，“谢谢刘书记，可我，真是受之有愧啊。”

刘丽英摇摇头说：“应该奖励你，也希望你再再接再厉。”

第二天，姜云胜就用那一千元钱，给敬老院的老人们买了过年的礼品。

青青校园

这一天，在老教师单文壮的人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她觉得，在自己的大半生中，还从没有这样开心过。她想，如果有人问她，最难忘的一天是哪天，她会说，今天，就是1997年10月7日这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不但是她难忘，也是曙光小学所有老师们最难忘记的，更确切地说，是原桥东村小学和原老染房村小学的老师最难忘记的。

单文壮想，这辈子的老师还真没白当，能在这样的教室里教孩子，也就值了。她在桥东小学工作三十二年了，那是什么房子啊，冬天是那么冷，夏天又是那么热，她真羡慕城里的教师啊，暖气楼，不愁冬不忧夏的，她做梦都想那样的学校。哪想到，要退休了，这个梦真的实现了，能不高兴吗？

况且，这一合校，孩子们多了，站在讲台上，讲课的精神头立刻就足了。

晚上回到家，她特意让老伴多做几个菜，说要庆贺一下。老伴问明白后说：“我以为你又长工资了呢，学校剪彩和你有什么关系？”

她说：“就想长工资，你不会理解当老师的心情，咱家盖了新房，我都不会这么高兴。你去看看那学校，真叫人喜欢。”

曙光小学建筑面积一千二百六十平方米，投资九十六万，三层小楼，太阳能取暖，教室明亮整洁，操场宽敞美丽。曙光小学，是镇里为两个村合建的小学。

合建小学，是姜云胜一个创新。姜云胜有个习惯，一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看学校，第二去看困难户。

1997年春天，他去桥东村和老染房村检查工作，他看了两个学校，发现教室里的孩子只有十几名，每个班级都是这样，两个学校也基本相似。他突然想到，两个村都要建学校，学生又是这么少，何不让两个村合建一处学校呢，既能减少投资，又能减掉素质差的教师，提高了教学质量，也节省了开支。

他还分析，生源少的情况，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有所改变。所以合并建校，肯定是农村学校的一种必然趋势，他的分析和想法，党委们都很赞同。没想到，他的这一创新，得到了辽宁省教委的肯定，并要加以推广。

炮台镇经济发展了，姜云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教育投入。他对干部们说：“我们炮台镇要想大发展，真要有后劲，提高全镇人口素质是最关键的，怎样提高人口素质，这就得从学生开始，甚至要从幼儿园抓起。所以，我们挣钱了，就要多往教育上投，孩子们才是我们炮台镇的真正未来。”

姜云胜的性格，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他说出了为了孩子们的话，就开始做为了孩子们的事。

投资一百万的幼儿园建成了，成了瓦房店市一流的红旗幼儿园；投资二百万元的镇中心小学建成了，成了全市最好的小学；投资二百八十万元的镇中学建成了，也成了全市最好的中学，升学率全瓦房店市第一；镇职业中学建成了，干河村小学建成了，咏泰小学建成了，东方小学建成了，车甸村小学建成了，曙光小学建成了……

阳光灿烂。青青校园。

老师们笑了。孩子们乐了。姜云胜坐着摩托车一处一处地去瞅去看，好像欣赏自己收藏的艺术品。

老百姓们看着自己的书记，看着总投资一千四百多万元建起的一个个学校，一下子又想起了他饭盒中那四个土豆，那两块咸菜。

长跑中历练的“地下爱情”开花结果

——“中国田径第一人”曲云霞

独特的爱情与婚姻

津子围

曲云霞，被誉为“最早震惊世界的中国径赛冠军”“中国田径第一人”。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良曾这样评价她：“曲云霞的突破，是中国田径历史上的突破，揭开了中国田径史新的一页。”她曾经作为辽宁省女子中长跑运动队队长与王军霞一起被并称为“马家军”的领军人物，震惊了整个世界田坛。由她打破的1500米世界记录、与王军霞双双打破的3000米世界记录，被国外媒体称为“田径史上令人震惊的功绩”。当时的马家军被这样描述：“作为新一代王朝的出现，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

那些年，曲云霞被巨大的光环所笼罩，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诸多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她驰骋赛场的英姿和骄人的成绩，使她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辉煌无比。而作为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一向低调的曲云霞的爱情却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谜。

2004年5月，曲云霞夫妇在大连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们鲜为人知的爱情与婚姻。

“地下爱情”在长跑中历练成熟

曲云霞出生在大连市金州区得胜乡玉皇顶小山村，从家中到学校有六公里的路程。从念小学起，曲云霞就上学跑着去，放学跑着回，上山下坡练就了一双铁脚板，显露出了长跑天才。小学三年级时，曲云霞就被体育老师张成群选为运动员参加比赛。进入中学后，她在金州区运动会上夺得了1500米和3000米的第一名。1988年，刚刚被推荐到金州区体校试训三个月的曲云霞幸运地遇到了来金州体校选苗子的辽宁省女子中长跑运动队教练马俊仁。慧眼识珠的马指导一下子就选中了曲云霞。父母把家里的一头猪卖了，用卖猪的钱给女儿买了一双新运动鞋，曲云霞就这样进入了“马家军”，日后成为了名震体坛的世界冠军。

1990年8月，在保加利亚普罗夫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曲云霞取得了1500米赛的冠军，瞬间引起轩然大波，震惊了东西方田坛，被称为“中国田径第一人”。在1992年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上，曲云霞在1500米决赛中跑出了3分56秒8的好成绩，打破亚洲记录。一年后，在德国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她又获得了3000米冠军，在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激昂的国歌声中，迎来了属于中国的第一块世界田径大赛长跑金牌。十几天后，在全国第七届运动会上，曲云霞以3分50秒46的成绩掀翻了前苏联名将卡赞金娜保持了十三年之久的1500米世界记录。随后，曲云霞和队友王军霞并驾齐驱，在3000米预赛和决赛中双双打破世界记录……

“丑小鸭”变成了飞向世界的白天鹅，荣誉与光环接踵而至。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件飞到了马家军驻地，其中自然会有一些慕名的求爱者。然而，那个时候，正值青春年华的曲云霞却禁闭着爱情的大门，爱情的庭院里一片空白。而每天繁重的训练也不适合爱情这根青藤的生长，她是沙场女将，无暇去理红妆，每天早晨天一亮，训练就开始了，一跑就是三四十公里。一天下来筋疲力尽，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况且，作为队长的她必须起带头和表率作用，她要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训练中去。那时，她心里牵挂的事只有一个，就是要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争光。

一直到了1995年，已经二十四岁的曲云霞才在周围姐妹和朋友的关心下，谈起了恋爱。

给曲云霞牵红线的人是田径队的教练常姐。热心的常姐发现整天埋头训练的曲云霞极少接触男性，就决定采取介绍对象的方式来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仍保持密切关系的昔日战友——在沈阳司法部门政治部工作的郑姐，让她帮忙在周围寻找一位合适的小伙子。不久，沉稳、英俊、干练的方雷闯入了她的视野。

方雷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读中学时就是校田径队的主力，径赛成绩不错，上大学后十分上进，担任过校学生会干部、系团总支书记。毕业后，方雷到公安系统当了一名人民警察，工作不久，他被抽调到单位的政治部协助工作。

这天，郑姐找到他，问：“小方，有女朋友了吗？”方雷摇了摇头。郑姐说：“常姐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见方雷微笑着不说话，郑姐就把曲云霞的名字说了出来。当即，方雷愣住了，他连说了几个不可能。那时，马家军如日中天，曲云霞的名字正蜚声国内外，自己怎么可能跟一个世界冠军谈恋爱呢？郑姐鼓励方雷说，处一处看，不行就交个朋友。最后，在郑姐的热情撮合下，他还是决定“见一面”。

那是1995年春的一天，常姐和郑姐陪同方雷，一行三人来到了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界来说十分神秘的马家军训练基地。教练马俊仁得知他们到来的意图，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让曲云霞和方雷单独见了面。

两人虽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半点陌生，话题很多，除了双方的工作等情况外，方雷还问了曲云霞很多好奇的问题，曲云霞有问必答，两人聊得十分投机。随后，曲云霞还带他们参观了训练基地，观看了马家军小队员的训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天晚上，方雷返回沈阳。坐在火车上，他想了很多，他感觉到，尽管接触的时间短暂，可作为世界冠军的曲云霞的质朴和诚实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着想着，他竟一点困意都没有，一方面，他期望能和曲云霞深入交往下去，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跟曲云霞差距太大，心里十分矛盾。而此时，在马家军的宿舍里，曲云霞也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学识渊博、沉稳干练的方雷给她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她想，难道自己的感情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吗？

曲云霞和方雷的感情生活真的就这样开始了。他们鸿雁飞书，每周一封，还时常通电话。由于曲云霞训练的流动性大，方雷专门买了一个传呼机，当曲云霞想与方雷通话时，她就先给方雷发一个信息，方雷就会找电话给曲云霞回复，两颗相距遥远的心就这样越贴越近了。一个月以后，方雷再次到大连看望曲云霞，他们已是一对难舍难分的热恋中人了。那时，运动队里有许多“清规戒律”，如，不准涂脂抹粉，不准留长发，不准谈恋爱等等。尽管马指导已经同意老队员曲云霞“谈朋友”，可作为队长的曲云霞处处要做表率，以免因此而影响其他队友，因此，他们的交往不得处于“地下状态”。方雷每次来大连都是偷偷的，他比曲云霞考虑得更多，压力也更大。他想，自己和曲云霞谈恋爱，如果曲云霞的成绩好，那没什么可讲的；可一旦曲云霞的成绩下去了，别人定会认为是他们谈恋爱而影响了曲云霞。为此，他们自觉地遵守队里的纪律要求，维持了长达两年多的“地下爱情”。

相隔两地，还得偷偷地恋爱，加之特殊的环境，他们不得不采取十分独特的约会方式。每逢曲云霞去外地训练，他们就想办法见上一面，可见面却不容易。为此，他们颇费脑筋。于是，公路上出现了这样的独特风景：曲云霞和队友们在公路上长跑训练，方雷就开着车，偷偷地跟在长跑队伍的后面看着曲云霞，而曲云霞和队友并不知情。到了驻地，曲云霞给方雷挂传呼，方雷再把电话打过来，约好会面的地点。可是，每次会面总是匆匆忙忙，到了运动员吃饭时间，曲云霞还得返回驻地吃饭。这是田径队严格的纪律。方雷无奈地望着曲云霞的背影，依依不舍。

1995年冬，方雷以这种独有的方式陪伴曲云霞去了抚顺和盘锦。到了正月十五，曲云霞在瓦房店训练，方雷又偷偷去了。辽南的冬天特别寒冷，瓦房店小城沉浸在节日的浓浓气氛里，方雷独自走在寒风中，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了下来，焦急地盼望着曲云霞打来的传呼。传呼响了，方雷告诉曲云霞自己所在的位置，两人终于在万家灯火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拥抱在一起，感觉相聚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

那时方雷的工资低，每月七八百元的工资都贡献给了铁道部 车票 和邮电部 长途电话费 。为了不影响工作，方雷常常是坐一夜的火车，白天跟曲云霞见一面，晚上再坐火车返回沈阳。

1995年12月8日，马家军为了迎接奥运会，开始了“长征拉练”训练。曲云霞随队出发之前，方雷偷偷去了大连，他们在大连友好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然后一起吃了一顿饭，那算是一次比较“奢侈”的约会，方雷不能公开给曲云霞送行，只能在宾馆门口跟她告别，默默地祝福她一切顺利。

那次拉练，曲云霞随队从大连出发，跨海到烟台，横穿山东半岛，过徐州、经合肥、越九江，由北到南，途经九个省市，每天跑二十四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了云南松茂训练基地。一路艰辛疲惫，曲云霞特别想念方雷，想念他那厚实的肩膀。那些日子里，曲云霞一到驻地就给方雷打电话或发传呼，向他倾诉衷肠倾诉自己的思念。他则鼓励她、告诉她他对她的牵挂，有时两人一通电话就说上二三个小时，常常是，看时间不短了，曲云霞就说，好吧，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聊。可电话还是不肯放下；再聊一会儿，方雷又说，太晚了，你休息吧，可电话也还是久久地在手里握着……

那段时间，恰逢云南发生地震，方雷从媒体上得到消息之后，立即给曲云霞挂电话，结果怎么也联系不上，方雷焦急万分，紧张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第二天，曲云霞从昆明打来电话，方雷这才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听到方雷说，他担心她一夜都没睡时，曲云霞在电话那端感动得泪流不止，她哽咽着说：“在昆明，我每天都在想你！”

马家军拉练训练结束，曲云霞回到沈阳，火车到站已是凌晨三点多钟。曲云霞下了火车，一眼就看到早已等候在寒冷站台的方雷，她大步向方雷走去，两人再也不顾周围那么多双眼睛，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低调结婚，世界冠军没有婚礼

1997年10月，经过长期准备的曲云霞满怀信心地参加了全国第八届运动会，这一届运动会在曲云霞的运动生涯里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运动会结束以后，在国内外田径赛场上拼搏了十年的她将面临退役，她想在这届运动会上为自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方雷理解曲云霞的心情，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她。当时，曲云霞的训练成绩始终保持在特别优异的水平上，甚至平时的训练成绩比在过去比赛中的成绩还好，完全有能力打破几项新的世界记录，她信心满怀地要圆自己在八运会上冲击世界记录的梦。

曲云霞随队出发了，方雷把她送走，自己却偷偷买好了去上海的火车票。他要坐在赛场的观众席上，以一名普通观众的身份为曲云霞加油呐喊助威，同时他也要为曲云霞突破新的世界记录做历史的见证。怕曲云霞知道自己去了会分心，他没敢告诉她。

方雷一到上海就去了八万人的体育场，买好了田径票。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曲云霞在赛场上拼搏的英姿，他还特意买了一个望远镜，并为照相机准备了充足的胶卷和电池。

第二天，比赛正式举行，在方雷既紧张又急切的期待下，1500米决赛开始了，随着发令员的一声枪响，选手们犹如脱僵的骏马，在塑胶跑道上飞奔起来。看台上的方雷神经紧绷，觉得全身都在为曲云霞用力，手心里都攥出了汗……

就在曲云霞快速跑到方雷所在的看台前时，意外突然发生了，方雷眼看着曲云霞的脚下被人一绊，她重重地摔在跑道上，紧跟上来的队员的钉子鞋踩踏在她的肩膀上……方雷一下子傻了！

当曲云霞咬着牙爬起来时，其他选手已经跑出百米以外，她奋力向前追去，然而已回天无力。就这样，曲云霞冲击世界纪录的梦意外地破碎了。

方雷真想立即冲下看台，去搀扶曲云霞，可此时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在赛场上被意外的失败击打，他心痛欲裂。晚上，运动员都回到驻地宾馆以后，方雷再也忍不住了，他抱着一大束鲜花混进了运动员住的华夏宾馆，直接去找曲云霞。

队医正在给曲云霞处置伤口，方雷悄悄地推门进来。曲云霞先是一愣，继而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意外、委曲、遗憾一齐涌上心头，她扑在方雷怀里痛哭失声。方雷搂过曲云霞，心中涌起万般柔情与怜爱，从不轻易流泪的铮铮男儿竟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两人相拥着，方雷安慰曲云霞说：“别难过，你尽力了，我看到了，所有观众都看到了。没什么遗憾的。”

在方雷的鼓励下，12日的女子5000米决赛，曲云霞又上场了，但是由于大腿肌肉拉伤，成绩自然受到很大影响，没有取得理想成绩。令她感到安慰的是，在她的参与配合下，同队小队员董延梅、姜波双双打破了女子5000米的世界记录。

八运会抱憾而归，曲云霞为自己意外的失败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回忆多年来的赛场征战，她感觉自己实在太疲劳了，从体力到精神都极度的疲劳，她有了退役、集中精力读书的想法，方雷十分赞同，同时，她的想法也得到了马俊仁教练的批准。

1997年11月27日，在大连开发区面对大海的房子里，曲云霞和方雷结婚了。一向质朴低调的曲云霞对方雷说：“我们结婚就不操办了吧，我不喜欢把场面搞得很大，惊动很多人，麻烦别人。再说，你通知人家，人家就得拿钱，咱们结婚不是为了让别人出钱。”对此，方雷十分理解。他们没办一桌酒席，没请一位亲戚朋友。在赛场上叱咤风云名扬四海的世界冠军结婚竟然没有举行婚礼，这令许多人为之不解。登记之后，曲云霞和方雷去了趟上海，在繁华的南京路，在入夜之后灯影流萤的黄浦江畔留下了他们幸福的身影。

“平静是真”，将当年的辉煌推到历史幕布上

和方雷结婚之后，曲云霞正式到东北财经大学读书，方雷为了跟曲云霞在一起，停薪留职来到了大连，他们在东北财经大学附近租了房子，新婚的曲云霞卸掉“戎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把自己的小家布置得十分温馨、漂亮。

也许是十年的运动生涯令曲云霞过度疲劳了，躺在自己家的床上她就不想起来。她太喜欢这个家了，整天呆在家里都不觉得闷。她喜欢收拾家，每天都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还喜欢养花，小小的房间里布满了各色各样的人工花草，除此之外，她就集中精力读书学习。为支持曲云霞学习，方雷每天下班后都先到市场买菜，回家后扎起围裙就进厨房。方雷做菜又快又拿手，一番忙碌，色香味俱全的几道菜就摆上了餐桌：“开饭喽！”于是，夫妻俩围坐在桌子旁，吃得有滋有味，感觉甜蜜极了。那段时间，原本就低调的曲云霞处事更加低调，她一心扑在学习上，几乎跟外界断绝了来往。方雷怕曲云霞闷着了，一到周末，就开车拉上妻子去旅顺、开发区、金石滩、滨海路兜风。方雷知道曲云霞喜欢大海，就经常陪着她去赶海。在退潮后的海滩上，方雷跟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曲云霞学到了很多海生物知识。一次，曲云霞拾起一只海螺壳递给方雷，说，到了晚上，你把它放在耳边，就可以听到海潮的声音。回家后，方雷试了一下，果然听到了海水漫过沙滩的声音。那一刻，他直感到幸福的潮水漫过心头……

1998年10月，在大连市有关领导的关心过问下，方雷从沈阳调到了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工作，曲云霞也于1999年7月毕业留校做了体育教师。他们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方雷调到公安局后，工作忙了起来，曲云霞全力支持着方雷，自己很快学

会了做饭。在曲云霞的支持下，方雷的工作十分出色，才能逐步显露，很快在全局“标准练兵”竞赛中获得第一名，立功受奖也是支队里最多的一位。

2001年10月18日，曲云霞和方雷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方嵩皓诞生了。由于曲云霞过去的运动量过大，在生产前检查时发现心电图有些异常，医生决定给曲云霞做剖腹产手术。早晨八点二十分，曲云霞被推进手术室，方雷焦急地等在门外，紧张的心情如同当年云南发生地震跟曲云霞联系不上时一样，他一方面担心妻子的安全，另一方面感到十分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迎接和面对即将面世的小生命。九点五分，医生告诉方雷，曲云霞一切正常，顺利生下了一个重三千二百克的男孩，面对现场采访的记者，方雷一时激动得讲不出话来。

孩子的出生，使得这个小家庭充满了生气，也更加完整和温馨了，房间里的欢声笑语顿时多了起来。儿子一天天长大，也许是跟妈妈的时间长一些，他刚谙世，就总是坚决地站在妈妈的立场上，有时候方雷故意开玩笑打曲云霞一下，儿子立刻不愿意了，他蹒跚地走过来，用稚嫩的小手，替妈妈打爸爸一下。望着儿子煞有介事地保护妈妈的神情，曲云霞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么多年来，曲云霞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始终是一个默默的奉献者。早在还是马家军的队长时，她就时常表现出高风亮节，不争奖金不争荣誉。退役之后，她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当年的辉煌已被她推到了个人历史的幕布上，她质朴地说：“平静是真，有时，在平静的生活中才能领略生活的真谛。”

在曲云霞最为红火的时候，曾经几次有人动员她去国外轻松地获取名利都被她拒绝了；她退役后，一家国外研究机构甚至想花高价买她的血样做研究，也被她拒绝了；大连火车站前一家水产批发市场想通过赠送四十几万的出租摊位为代价请她做广告宣传，她又拒绝了；北京一家减肥产品公司以高价请她做形象代言人，她仍然拒绝。谈到这些，曲云霞说，我并不是个特别有钱的人，也并非故作清高。我觉得，要做事的话，就要做自己最喜欢和最想做的事情。她说，她一直想找个合作伙伴，共同筹建一个运动俱乐部，她想把体育竞技转化为运动，为人们的健康造福。

每到星期天，在被称为亚洲第一大广场的大连星海湾广场上，远眺阳光跳跃的海面，沐浴习习海风，如果巧合，游人就会碰到曲云霞和方雷夫妇带着孩子放风筝，他们的快乐的身影、欢乐的笑声，会深深感染你的。

横渡渤海海峡世界第一男人 ——张健（节选）

杜 敏 梁红岩 郝 岩 王希君

与海共舞

紧急情况一路不断。10日凌晨两点三十分，也是两天两夜没睡的章大队长和舰上官兵观测发现，军舰在向西顶流前进。此时的流向是向东，流速很小，时速只有0.4~0.5海里，而张健此时的游速是1.5海里。张健向西游，却向南偏移，偏出了近两公里多。

有人提出是观察流向出现错误，应改变登陆地点。

当初，旅顺海军基地为张健选择了两个登陆地点：一个是蓬莱新港，直线距离短，但由于是专供船舶停靠的码头，没有沙滩，游泳者登陆十分困难；另一个是八仙渡浴场，这里虽然比蓬莱新港多了3.7公里路程，但沙滩平缓，水质优良，上岸条件非常好。

章坤明和原家玮分析认为，张健此时的体力消耗已经相当大，在新港登陆的危险性实在太大。而且到了早晨五点，潮水又要转向西流，流向是270度，这样又能推动张健前进。而向新港150度方向前进，逆流和礁石对张健不利。在这间不足三平方米的绘图室里，几个人都冒汗了。

紧急时刻，章大队长和原家玮主任果断决定：811舰开到渔船前面，让渔船和张健跟着军舰走，保持正确游向。经过半小时的校正，张健的游速由每小时的1.2海里提高到1.7海里，并且很快进入顺流。张健看到了海边，时速也加快到2海里。

天越来越亮了，远方岸边的群山和高楼大厦已尽收眼底。张健游得越来越快了。

眼看着胜利在望，811舰上的人们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

两天两夜的焦虑和操劳，此时都幻化成了激动和喜悦。现在，大家的共同特征就是皮肤晒得黝黑，眼睛熬得通红，一脸的胡茬子……

看到岸上的欢迎人群，已经两天两夜未曾合眼的刘仁枫开始品尝胜利的甜蜜。这位大汉和他的渔民兄弟们一样，眼睛熬得通红。他的嗓子早已哑得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

地坐在船边遥望海岸。望着，望着，一路上从未露过笑脸的他，幸福地笑了。不一会儿，就在张健拥抱胜利的前夕，他竟带着微笑睡过去了。

10日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张健距离岸边只有2.5公里了。岸上迎接他的人们打出的欢迎横幅，他已经朦朦胧胧看到了。海上突然刮起了东南风，造成逆流，张健的游速又开始降下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一团暗红色的浮游物向他慢慢袭来。是海蛰！他心一紧，疾速向左拐去，瞬时觉得胳膊刷地疼了一下。

与此同时，小船上的人惊叫一声，把正在打盹的刘仁枫猛然惊醒。他忙抓过鱼叉赶走了海蛰。

张健的胳膊上留下了一道红红的血印。

九点四十分，距离岸边不到一公里了。老天似要在最后时刻考验一下张健，五六级的大风迎头吹来，涌急浪高，顶得张健很难前进。倔强的张健知道成功就在眼前，紧紧地咬住了牙关。

“呜——呜——”军舰长长的鸣笛把张健的视线拉向右方：811舰正在与自己保持平行的距离共同前行，官兵们在甲板上站成一排，向他不停地招手致意。两天的相伴同行，尽管张健与官兵们没有言语交流，但他身上透出的顽强意志和非凡毅力深深感染了舰上的每一个血性男儿。章大队长感叹，这次导航，就是一次特殊的军训，横渡渤海海峡不仅仅体现了张健“亲和自然，挑战自我”的非凡胆识和敢于向生命极限挑战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张健奋力拼搏的分分秒秒，将会永远鞭策、激励着官兵们，使他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会无所畏惧，对未来充满信心。

舰上的官兵打出了醒目的红色条幅：811舰全体官兵祝张健横渡渤海海峡成功！
沸腾的热血注定了张健的飞快加速，他有了无穷的动力。

离岸越近，海水越浅，811舰因为无法靠岸，已经改变航向驶进了港口，最后的导航都是由小渔船来完成的。

当张健离岸边不过三百米时，六名蓬莱的游泳爱好者游到了他的近前。他们一边谨慎地与张健保持着距离，避免身体接触，一边挥舞着手臂高喊着：“张健加油！张健加油！”

张健奋力游着，用明显的加速向他们致意。许是这几位游泳者太激动了，其中的一人突然沉了下去。此时，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张健身上，而张健却恰好看到了那个溺水者正向下沉去，他焦急地喊了一声：“快救人！”

小船上的国际裁判周玉成闻声望去，见那个溺水者正离自己不远，赶忙示意小船靠上去，将那个人拖到了船上。

岸上的人此时纷纷向水里涌来，海水没过了他们的脚面，直至膝盖……

人们欢呼着、喊叫着，全然不顾冰凉的海水把衣服打湿。

张福海和老伴庄燕霞也夹杂在欢迎的人群中，他们焦急地向海里张望着……

张妈妈和李小娜等人一起赶到蓬莱后，并没有找到张福海，她们随便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来。10日凌晨两点，张妈妈、李小娜等人就赶到了海边。她们来得太早了，天还黑沉沉的，可岸边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了。她们找了个高处站下。

黎明前的天空格外黑暗，突然，岸边燃起了三堆篝火，李小娜拖着张妈妈等人朝那里跑去。篝火映红了岸边，一蹿一蹿的火苗将几个忙碌的身影拖得长长的。跑近了，张妈妈一眼看见老伴张福海和李世悦、李恒学、李刚等人正在往篝火里添着树枝呢。原来，按老哥儿几个的算计，张健游到蓬莱应该在清晨，他们怕张健找不到登陆点，便在此燃起了篝火。

火光一闪一闪的，映出了随风飘扬的一面面彩旗。也映红了亲人们满是期待和牵挂的一张张面孔……

有记者寻过来采访，方知这些人是张健的亲人和朋友。当周围的人们得知眼前的庄燕霞就是张健的母亲时，顿时将她围住，一声声问候，一句句安慰，令张妈妈感动万分。

张健游过来了。

由于张健游泳的方向距离预定的登陆点偏差了两百多米，迎候他的人们趟着海水，随着他前进的方向一会儿奔向东面，一会儿又回头奔跑。欢呼声、掌声和脚下哗哗的海水声伴随着涌动的人流，汇成了狂欢的场面……

按照规定，从入水到完全出水的整个过程里，张健不能借助任何物品，否则便被视为犯规，成绩无效。为此，蓬莱警方派出警力，维持现场秩序，生怕出现意外。

上万人的欢迎队伍里，若是冲出一两个激动万分的人拥抱张健，或是心疼地上前扶上一把，那可真是让所有人的辛勤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了。

8月11舰进港后，原家玮、胡江宾等人迅速赶过来，与9日便离舰赶往蓬莱的曾繁新会合后一起融入欢迎的人群中。北体大的田麦久副校长和侯向前处长在旅顺为张健壮行后，又赶到蓬莱迎接。当他们看到张健终于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立即用手机把喜悦传给了一直在北京等候消息的校长金季春。

在警察的护卫下，激动的人群闪到两旁，人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用最钦佩的目光为张健加油。

此时的张健已经是游在夹道中了。

小渔船上的张军目送哥哥游向岸边。突然，他在人群中发现了站在水中的母亲。母亲那灰白的头发被海风吹得很零乱，母亲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海里的儿子。

欢呼的人群向张健移动着，险些撞倒了张妈妈。她在水中晃动了几下，一旁的李小娜连忙将她扶住。站在一旁的曾繁新用他那瘦弱的身体挡在前面，但还是被人群拥倒在水里。手上也被划了一个深深的口子，但他顾不了许多，爬起来后尽力向外推着人墙。

张健游过来了！

拥抱了张健五十个小时的大海在轻轻喘息着，似乎在抚慰、赞叹着张健这个大海的骄子。张军跳下渔船，拨开人群，奋力挤到母亲身边，他激动地叫了一声“妈——”，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张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多少天的担心，多少天心中的煎熬，在这一时刻全部爆发了出来……

英雄张健冲岸了！

8月10日十点二十二分，随着上万人的欢呼声和加油声，横渡渤海海峡的世界第一好汉张健双脚触到了沙滩。他站起来，由于长时间浮在水中身体失重，他向后仰倒在水里。很快地，他又咬住牙关站起来，回头望着自己游过的一望无际的大海，不由攥紧拳头振臂一挥，随之又扑进水里。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又缓缓地站了起来，迎着欢呼雀跃的人群，稳稳地向岸边走去……

张健走出了大海，他在人群里张望着，寻找周玉成，此时，他最想见到的就是这位国际裁判。

周玉成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张健。此时，他挤到张健面前，迎着无数双激动而期盼的目光，庄严地大声宣布：“张健，你完成了人类横渡渤海海峡挑战自我极限的壮举，创造了男子横渡海峡最长距离的世界纪录。时间为50小时22分，实际游程123.58公里！符合要求，成绩有效！”

周玉成的话音刚落，人们的掌声、欢呼声骤然响起。一直平静地站在那里的张健却很平静，任身边人声鼎沸，他就那样静静地立在那里……

人群闪开了一条通道，张妈妈缓缓地走到张健跟前。她轻轻拉起儿子的手，相视无语。她的眼中满是泪水，她多么想放声痛哭一场。又怕这种情绪影响了已经疲惫至极的儿子。她拼命忍着，忍着，可在心里，她还是禁不住大声喊着：“宝贝儿子，妈心疼你呀！”

维和高官传奇（节选）

余音

3月27日，廉长刚作为东帝汶维和警察总部行政总长走马上任。虽然他的心中洋溢着成功的喜悦，但他的脸上仍然不露声色，中国人的谦逊掩盖了他胸中怒放的心花，而肩上的重任又使他感到高官之路并不平坦，面对维和行动中的各种挑战，面对欧美国家部下们挑剔的目光，他只能一往无前地向前走，而且不能在行动中表现出任何的怯懦、任何的失误……

第一次行使职权

3月27日上午九时，按照日程安排，廉长刚准时出现在联东当局的会议厅里。除了自己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联合国总部官员、联东当局各部门官员、世界银行的代表以及维和高官们。那天会议的议题是：维和经费的预算准备及其执行。预算财政年度为2000年7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会议开了一上午，最后决定采用联合国资金的预算向联东当局预算过渡，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和预算。

维和警察部队的费用是惊人的。散会之后，廉长刚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认为东帝汶维和警察总部应设立预算计划处，对整个财政年度的资金使用提出方案，这样就可以量入为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防止浪费。但是，初任行政总长，就对原来的维和总部架构提出改革意见，说三道四，是不是锋芒太露？如果总警监不采纳，自己的形象必然受到损害。整整两个小时，廉长刚两眼盯着电脑显示屏，一个字也没敲出来。

午餐时，他有意识和总警监卡洛司先生坐在一块，似乎是无意中聊起了设立预算计划处的话题。没想到卡洛司先生非常感兴趣，他很信任地说：廉长刚，放手去干吧，用不着畏首畏脚。只要对维和行动有益的建议，我都会支持你。

当天下午，廉长刚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预算计划处的请示》，就成立预算计划处的意义、预算计划处的职责、编制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请示》报给卡洛司先生，他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当即签字表示同意，然后，把批件递给廉长刚，说：廉长刚，预算计划处归你领导。

廉长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马上打电话叫来了人事局长，要求他在三天之内推荐两名懂财政预算、会熟练操作电脑 特别是 E x c e l 财务软件系统 的警察，以供挑选。

3月30日，人事局长送来了三份来自不同国家的警察档案。廉长刚看了一遍，摇摇头，感到不太满意。人事局长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

“你对中国维和警察徐少华的情况是否掌握？”

徐少华来自中国公安部，计算机专业毕业，出国前任公安部信息通讯局副局长。

“我……我马上回去了解！”人事局长双腿“啪”地一并，敬礼后退出。

4月1日，徐少华满面笑容地走进行政总长办公室，恭恭敬敬地向廉长刚递上一份调动通知书：警察徐少华调到维和警察总部任预算计划官，其部门列入行政总长管理序列，4月3日起生效。

廉长刚满意地握着徐少华的手，表示祝贺。

一个星期以后，廉长刚签署命令，将在撒密警察局工作的美国维和警察戴维调到预算计划处。

因为戴维不是中国人，所以，廉长刚可以毫无顾忌，不必经过人事局就可以直接下达任命状。而人事局长只是按照命令办理相应手续罢了。

不到两周时间，廉长刚已充分认识到自己手里的权力有多大：在东帝汶维和警察部队中坐在第三把交椅上，不仅分管人事、培训等工作，而且还兼管督察部、后勤部、办公厅等，共管理着十二个部门，维和警察总部的多数文件都需要经过他的签字才能生效。

廉长刚的心中，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欣喜。

不惧怕挑战

也许是锋芒毕露，也许是不同的价值观发生了激烈冲突，廉长刚总是站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各国警察一律平等”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有意无意之间，触犯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警察高傲而脆弱的神经，于是，各种挑战便接踵袭来。

一次，廉长刚发布了一个情报分类命令。该命令将重要情报分成十八类二十四项。命令发布不久，他就接到一位来自西方某大国的地区司令官的电话，指责其分类不科学，其中关于犯罪情报那部分不合适，应该修改，其用意不言自明。

廉长刚非常客气地说：“请问先生，你在贵国就读哪所大学？”

那位司令官答道：“我是从一所社区大学毕业。”

廉长刚严肃地说：“你应该好好学学现代刑侦管理体制。不瞒你说，我曾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以高分获得了刑事司法硕士学位。我所发布的命令，是根据世界最现代的警务管理体制，结合东帝汶任务区的实际和联合国的有关政策统盘考虑的，对此提出质疑，有何必要？”

那位司令官听后，对密歇根大学如雷贯耳，马上改变语气，连声说：“总长先生，真对不起，是我理解错了，误会，的确是个误会。”

放下电话，廉长刚露出胜利的微笑。

又有一次，在高官例会上，廉长刚就当前治安形势下达了四项命令。散会前，一位大鼻子高官突然站起来说：“廉长官，我认为你讲的第二个命令不太合适，请你收回。”

廉长刚看了他一眼，语气果断地说：“是吗？你的建议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关于第二个命令的理由我已陈述再三，大家都听明白了，为什么你听不明白呢？”

“既然你说我没听明白，那么，我怎么去执行？”

“啪”廉长刚把手轻轻地往桌子上一拍，站起身来，大声地说：“狡辩！根据联合国文件之规定，决定既已下达，必须坚决执行。出了问题我负责。不执行命令，你就是违抗上级命令，后果自负！”

那位高官无奈地摇摇头，说：“好吧，我去执行就是了。”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再起。

一天，联合国新任命的一位来自欧美副总警监推门进来，他的个子比廉长刚要高一个头。他看了一眼正在办公的廉长刚，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你手下的后勤官皮克警官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和他有什么不愉快，我要拿你是问！”

按照工作分工，作为行政总长，廉长刚归副总警监比尔分管，这位副总警监不但不分管此项工作，而且他提出的要求也很荒唐。

“要是皮克工作不称职呢？”廉长刚抬起头来，知道来者不善。他的双眼盯住这位副总警监，绵里藏针地反问了一句。

“那……那也不准你处理他。”

廉长刚嘴角一撇，冷冷地说：“尊敬的副总警监先生，你应该知道，我才是皮克先生的直接长官。如果他工作不尽职尽责，出现问题，我不但要批评他，而且还有权处分他，撤他的职。我觉得你刚才提出的要求是无理的，我没有办法执行。我很忙，请你马上出去。”

那位副总警监愣愣地看着这位黄皮肤、黑头发的小个子，一动不动，似乎弄不明白他怎么如此大胆。

廉长刚见他不走，马上抓起电话说道：“秘书，这里有人干扰我办公，你马上过来把他请出去。”

两位秘书推门进来。

副总警监这才缓过神来，摇摇头，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次日，廉长刚在高官例会上不点名地严肃地批评了他。会后，他找到廉长刚说：“我知道你今天是在说我。”

事过不久，由于这位副总警监到处指手画脚，威信太差，屡遭下属投诉，就被联合国维和总部调到别的任务区去了。

大写的廉字

为了更好地与各国警察友好相处，廉长刚还十分留心学习亚非拉国家的常用问候语，在接见各国警察时，接待各国慰问团，参加东帝汶政治集会时，不失时机地说上几句，颇受大家的欢迎。

当然，他也非常注意把中国话糅进日常生活、工作之中，使许多外国人在与中国维和警察打交道时，也会很自然地说上几句“你好”“再见”。

廉长刚担任行政总长后，东帝汶治安方面的许多政策都由其研究、制订，形成文件后由其签名颁布。在签名时，他总是写上一个大大的“廉”字，以表明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在东帝汶维和警察部队，大家对他手书的“廉”字一点也不陌生。一次，一位刚休假归来的地方司令官批评副司令官滥用职权，副司令官很不服气，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副司令官从柜子里拿出一份文件说道：“我是按照廉总长的命令行事的。”司令官不再言语，看了那份文件上果然有个大大的“廉”字，便改变口气说：“廉总长的命令没得说，应该坚决执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正巧，有位中国警察在这个警察局工作，他见两个老头对“廉”字那么敬服，内心充满了自豪感。

作为维和高官，廉长刚经常要参加一些东帝汶的高层社交活动，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双重身份就显示出来了，既是维和高官，又是中国警队的大队长，一旦遇到外国人有意无意诋毁中国的言行，他都会迅速做出反应，维护祖国的尊严。

2000年4月22日，葡萄牙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对东帝汶进行正式访问。

4月23日上午，廉长刚正在自己的办公室草拟一份发往全国各地警察局的文件，突然有人敲门，他抬头一看，一位高大魁梧的葡萄牙警察走进来，手上捧着几张像贺年卡一样的东西。他礼貌地：“长官，我国总理请你参加在葡萄牙银行大楼举行的宴会。”说罢，他递上由葡萄牙总理签名的用葡萄牙语写的请柬。维和警察总部被邀请的还有总警监和副总警监。

中午回住处吃饭时，廉长刚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同住的其他三位中国警察，他们都很高兴。一位警友告诉他：“我们帝力市警察局今天晚上计划调动一部分警力前往宴会大楼，担任警卫任务。你应邀参加这样高层次的宴会，我们感到自豪。上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来东帝汶访问设宴时，我正巧被派去宴会楼前警卫。一晚上进进出出的被邀请赴宴客人很多，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亚洲人都寥寥无几，我的心中很不是滋味。”

晚上6时30分，廉长刚驱车前去赴宴。经过一层层的警卫盘查，一次次出示请柬和身份证件，廉长刚才走进宴会大厅。宴会大厅虽然简朴，但也很典雅。宴会大厅周围悬挂着许多火炬，外面的树上点缀了许多小蜡烛，充满异国情调。

走进大厅后，廉长刚发现宴会厅里站满了人，大约一百来位。从着装看，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派遣到东帝汶任务区的葡萄牙维和部队的官员、快速反应警察和一般维和警察。看来葡萄牙总理要慰问全体被派遣到东帝汶任务区参加维和任务的葡萄牙人。突然，他眼睛一亮，发现了撒密市警察局司令官安托尼先生也在人群中。于是，便健步走过去，主动问候道：“长官，晚上好！”安托尼先生高兴地举起酒杯，立即纠正说：“不，我现在该称你为长官了。”安托尼是葡萄牙警察，接替布罗先生担任撒密警察局司令官。老友相见分外亲。廉长刚正兴致勃勃地与安托尼先生叙旧时，卡洛司总警监走了过来。总警监今天晚上容光焕发，情绪饱满。廉长刚说：“总警监先生，贵国政府总理光临东帝汶访问，你作为葡萄牙人一定很高兴吧。”

卡洛司和廉长刚碰了碰杯，满面微笑地说：“是的，我非常高兴。”接着，卡洛司简要介绍了一下葡萄牙代表团的组成情况，除总理外，还有几位部长、部队高级将领等。葡萄牙政府对东帝汶的局势极为关注，原因之一是东帝汶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现在东帝汶还有些葡萄牙人的后代，混血儿居多。

借着和总警监交谈的空隙，廉长刚仔细观察了一下参加宴会的其他客人。除了葡萄牙官兵外，还有几位著名的当地人。他们当中有的是C N R T 帝汶全国抵抗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有的是当地的大主教和神父。其他客人都是联合国过渡当局各部门的头面

人物。由于经常在一起开会，所以廉长刚认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除了当地人之外，亚洲人寥寥无几。

过了一会儿，廉长刚遇到一位貌似亚洲人种的官员，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一交谈才知道他是美国人，他的母亲是从越南移民去美国定居的，所以他有亚洲血统。后来，廉长刚又碰到一位韩国人，他是联合国驻东帝汶军事观察员总部的高级官员。两个人都很高兴，在一起交谈了挺长时间。

宴会大厅中间的几张长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和水果。四周墙边的桌子上摆满了啤酒、果酒、白酒和饮料。几位葡萄牙女兵正热情地为客人服务。酒会没有人主持，像自助餐一样，客人可以挑选自己喜欢吃的食品，边吃边聊。酒会进行了一段时间，总理开始切蛋糕，然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卡洛司总警监拿出一瓶果酒向廉长刚招了招手，廉长刚点点头，忙走过去。他指着果酒对廉长刚说：“这是葡萄牙最好的果酒，名扬欧洲，你应该多喝一些。”廉长刚笑了笑，说：“味道很美。可惜，我不胜酒力。”卡洛司摇摇头，说：“不。我曾陪我国总理访问过中国，见过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这种场合上，中国官员友好好客，举杯频频敬酒。中国人很能喝酒。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海量，就是能喝干大海的那种酒量。”廉长刚颇含歉意地解释道：“对不起，总警监先生，我可不是那种能喝干大海酒量的中国人”。在总警监的建议下，廉长刚又喝了一大杯。由于回去他还要开车回去，所以即使是好酒，也不敢贪杯。

告辞总警监，廉长刚又来到了葡萄牙总理的旁边，此时，葡萄牙总理正在和东帝汶解放阵线的副主席 主席是古斯芒先生 亲切交谈。廉长刚悄悄地问总理的保镖：“我可以和总理合影留念吗？”保镖说：“你亲自跟他说吧。”廉长刚转过身来对总理说：“我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维和警察廉长刚，现任警察总部行政总长，很高兴在此与总理相见。我想跟你合影作个纪念，可以吗？”总理爽快地说：“当然可以。”

然后，他转过身来，跟旁边的一位官员说：“来，跟这位中国的警察合张影。我到中国访问过，那可是个非常伟大的国家。”与总理合影后，廉长刚又和那位副主席照了张像。廉长刚问道：“古斯芒主席今晚来了没有，我今晚上没有见到他。”他说：“主席有事，可能晚些时候才能过来。”这时，一位葡萄牙警察指着一位身着便装的葡萄牙人向廉长刚介绍说：“长官，这是我们葡萄牙的国防部长。”廉长刚主动上前两步，和他握手交谈，并合影留念。

宴会临近结束时，廉长刚正在和当地的一位牧师交谈，一位来自欧洲某个国家的官员向廉长刚走来，他好奇地端详着廉长刚的警服，问道：“先生，请问您是来自哪个国

家的警察？”廉长刚笑着说：“中国。”“先生，您能告诉我是哪个中国吗？是台湾还是北京？”

听了这句话，廉长刚马上收起笑容，严肃地说：“先生，您向我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正如你们的首都是帝力市。”

那位官员见他表情严肃，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连忙道歉：“先生，请您千万别介意，我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有点弄不清。是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廉长刚仔细端量了他一下，感觉他并不像有什么恶意，就改变语气说：“中国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请你理解我的心情。”那位官员干笑着说：“是的，从你的面部表情上，我就意识到自己问了一句蠢话。”

一天，廉长刚从某地区视察归来，认为当地治安形势转好，警察管理严格，工作成绩突出，便给该警察局发了一份传真予以表扬。

该地区警察司令官来自塞内加尔，收到传真件后，心里非常高兴，一边听着轻音乐，一边细细品味着廉总长的褒奖。不一会儿，一位在该警察局任职的中国警察敲门进来，请示工作，司令官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指着传真件说：“廉总长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啊。”

中国警察看了一遍传真，点头笑了笑，转身要走。

“唉，你怎么走了？这么大的喜事，应该庆祝一下。”

第三天，这位司令官专门开车来到帝力，走进行政总长办公室，郑重其事地说：“廉总长，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工作的支持和鼓励。我有一个请求，不知你能否满足我？”

廉长刚想了一下，说：“你说说看。”

“我想要你亲自签名的那份传真的原件。这样，我准备把它挂号寄回塞内加尔，因为这是我们警队共同的荣誉。”

廉长刚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临别时，这位非洲警官诚恳地说：“廉总长，我认为，你不仅是中国派遣队的队长，也是我们第三世界国家警察的代言人，保护伞！”

平息骚乱风波

廉长刚问道：“是什么性质的骚扰？”

“是民事方面的。”

“如果是军事方面的骚扰，要立即报告，必要时我可以请维和部队协助平息，不得掉以轻心。”

后勤部长汇报道：“联合国维和总部给我们任务区新调来二十五辆警车，这是分配方案。”说罢，他将打印好的分配方案呈送到廉长刚的面前。

廉长刚看了一遍，说：“关于车的问题，可以拨两辆给警察学院，其余的就按预案进行分配。还有什么问题？”

情报总长想了想，说：“目前，东帝汶家庭暴力案件呈上升趋势，女警力有些不足，希望尽快解决。”

“这样吧，以总警监和我的名义向联合国维和总部发一份传真，提出增派女警察的请求。”

不久，东帝汶任务区又增派来了几十名女警察，中国也增派了两名女警官，加上第二批的三位，一共五位，她们是任务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还有一次，情报总长来自英国的资深高官得到确切情报，大约有一千多人第二天将在某地区发动骚乱，情况万分危急。高官会上，大家议论纷纷，多数高官表示要坚决镇压。廉长刚考虑再三后，做出全面部署：其一，采取以内人治内人的方针，迅速集结已经培养成熟的二百四十五名当地警察，由他们形成第一道包围圈，直接做劝说、疏导工作；其二，二百八十名维和警察分乘二十八辆警车，部署在当地警察身后，既给当地警察壮胆，又可以对骚乱分子产生震慑作用；其三，请求维和部队增援，出动坦克、装甲车放在第三层，以防不测。

虽然这种立体部署大家没有疑议，但有人还是担心骚乱分子先动手，维和警察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如果维和警察出现伤亡，将会产生国际影响，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廉长刚想了想，语气果敢地宣布四条纪律：尽量不开枪；如果需要，第一遍要朝天鸣枪示警；如果自身安全或警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可以开枪，但要打非致命部位；实在不行，开枪将其击毙，出现问题，责任由我承担！各位请按分工抓好落实，不得有误。散会！一席话，掷地有声，高官们不得不暗自佩服他的魄力。

次日，骚乱果然出现，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手持大砍刀和火把，高喊口号，情绪激昂。当地警察、维和警察、维和部队按照部署各就各位，严阵以待。站在第一道的当地警察用土话大声呼喊：同胞们！我们是奉命来维护治安，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你们的老婆孩子、父亲母亲在家等着你们！如果你们再闹下去，肯定要吃亏……

廉长刚乘坐直升飞机在空中坐镇指挥。

四十五分钟后，骚乱阵线发生动摇，乌合之众四处逃散，骚乱土崩瓦解。世界为此松了一口气。联合国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帝力市有一处露天市场，因为地处市中心一带，历史又悠久，所以生意兴隆，被东帝汶人称作“中央市场”。但是，从治安方面来看，“中央市场”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由于商贩占道，阻碍交通，经常发生打架斗殴问题；由于露天销售，无遮无盖，瓜果皮核遍地，蚊蝇成群结队，食品卫生得不到保证，而且偷税漏税；又由于这里人来人往，吵吵嚷嚷，难以管理，多次发生凶杀、抢劫等犯罪问题，是帝力市主要犯罪发源地之一。联东当局一直想清除这一市场，为此，还特意建立了两个大棚市场，动员商贩进棚经营。可是，阻力重重，政令得不到有效执行。有关部门三次组织迁移，受到当地社团组织、商贩团体的严重干扰，三次迁移三次流产，联东政府的威信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损害，影响非常不好。

2001年9月，联东当局下定了决心，要求维和警察部队坚决清理这一非法市场。当时，苏撒先生正在联合国述职，不在东帝汶。作为代理总警监，廉长刚很清楚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存在就是合理的。为什么三次迁移，三次失败？这说明消费者已习惯在“中央市场”购物，而商贩们在“中央市场”既可以买卖兴隆，又能偷税漏税，挣得更多的钱。这么一块聚宝盆，谁愿意拱手让出？而且，商贩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他们的生活费都来自于这个“中央市场”。如果采取过激行为，就会造成严重冲突，显然，这不符合维和行动的宗旨。

连续三天，廉长刚闭门不出，面前摆着一张“中央市场”分布图。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就像大战前夕运筹帷幄的指挥官一样，他在深入地思索着战斗方案。

治标先治本，擒贼先擒王。第四天，一个“铁桶合围”计划在廉长刚心中酝酿成熟：

首先，动员一部分守法业主到两个大棚市场经营；然后，派出维和警察和当地警察一起将“中央市场”封锁，禁止消费者进入，使固守“中央市场”的顽固商贩釜底抽薪，没有生意可做，没有钱可赚。等他们坚持不下去了，再采取行动。

9月22日，廉长刚一声令下，二百多名维和警、当地警察一起行动，将“中央市场”围得水泄不通。一开始，顽固商贩还不在于，吹着口哨，扮作鬼脸，向警察挑衅。警察们不理不睬，只是不放一个消费者进去。对消费者来说，他们购物都是个人行为，远没有顽固商贩那样容易抱团。再说，到哪不是花钱买东西，何必自找麻烦呢？

第二天，到“中央市场”的消费者少了一半。

第三天，基本上见不到再有人到“中央市场”来买东西了。

而顽固商贩却头顶烈日，一呆一整天，分文挣不到。而警察们吃的是“皇粮”，根本不在乎；商贩们卖的是瓜果、蔬菜、小食品，做的是小本生意，这样对抗下去，不但挣不到钱，而且还要赔本。赔本的生意谁肯做？与此相比，进大棚市场的业户生意越来越好。冷静下来一想，饿着肚皮与“吃皇粮”警察较劲，岂不太傻？

第四天以后，商贩们坚持不住了，陆续将商品搬上联东当局提供的卡车，进了大棚市场。

连续五天，廉长刚都在“中央市场”亲自督战，鼓舞士气，解决棘手问题。

一个星期以后，“中央市场”门可罗雀，联东当局出动几辆铲车，将违章建筑夷为平地。从此，“中央市场”在帝力人的视野里永远消失了……

后记

这本书的长度是60年，它与这套丛书别的几本没有两样。不同的是它所覆盖的宽度，它是将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捆在一起成书，编辑者最多的精力并不是审看稿子，而是在时间和人群里寻找。这是一个漫长而纷乱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口干舌燥地打了无数个电话，我们打出去的电话常常就是一个空号或查无此人。然而有一天，在我们的眼前，从城市和乡间发来的信件居然就堆成了小山。于是，我们马上就富有得像打谷场上的农人，当我们按门别类把这座小山分成一个个谷堆，那些仍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文字，便如一颗颗金黄色的米粒，卡通般在我们的眼前跳动闪烁，直到眩晕了我们的眼睛。2004年从夏到秋的几个月，苦和甜就这样厮混在一起。我们终于感知担当这本书的编辑是个好角色，它让我们得以重温那已逝的往昔岁月，得以熟悉许多已然陌生的名字，得以知道那些不曾经历却隐约听说过的故事。

在已经过去的60年里，可以拿来阅读的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不知有多少，收入书中的这些篇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现在，它们被按照年代的顺序排列下来，看看目录就知道，由于时间的久远，由于政治的原因，上个世纪中期可供选择的作品非常稀少，而80年代以后的作品却是越来越繁密。杂文和报告文学作者相对比较集中，而散文的作者却阵容广阔，不光写散文的在写，写小说、写诗的也在写，而且官员、学者、记者都在写。散文这个品种由于是大家族的经营，所以就显得格外的丰富，格外的热闹。选入本书的散文和杂文，大多是获市级二等奖以上的作品。也有一部分虽未获奖但较有影响的作品入选。少数重点作者选用两篇。报告文学因篇幅太长，每篇只选取四千字左右，以一斑而窥全貌。而“文革”前一些前辈文人的作品，我们则尽其所能，翻阅资料，查找作品，但至今有部分作品未能找到，这也是我们编选中的一大遗憾。

在此，我们特别要感谢《大连日报》副刊编辑肖正女士，编辑目录确定之后，她在前期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几乎所有稿子都是经她的手送到我们面前。2004年最后一天，我们在上岛咖啡会稿，她向我们转述了组稿期间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所有入选的作者都太看重这本书了，因为这是大连文人60年埋头笔耕的收成啊！

是为后记。

本卷编者

2005年3月

DALIAN YOUXIU WENXUE YISHU ZUOPIN XUAN

责任编辑：张洪宇 程晓红
封面设计：关慧良

长篇小说卷 · 短篇小说卷 · 诗歌卷 · 评论卷 · 摄影卷 · 舞蹈卷 · 杂技卷 · 民间艺术卷 · 儿童文学卷 · 戏剧卷 · 音乐卷 · 曲艺卷 · 杂技卷 · 民间文艺卷 · 摄影卷 · 书法卷 · 音乐卷 · 文艺卷 · 小说卷 · 散文卷 · 报告文学卷 · 诗歌卷 · 儿童文学卷 · 文艺评论卷 · 戏剧卷 · 音乐卷 · 美术卷 · 书法卷 · 摄影卷 · 影视卷 · 民间文艺卷 · 曲艺卷 · 舞蹈卷 · 杂技卷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全集17卷，文字卷12册，光盘5张，收录十七大文艺
门类（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杂文、
随笔、报告文学）、诗歌、儿童文学、文艺评论、戏
剧、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影视、民间文艺、曲
艺、舞蹈、杂技）

ISBN7-5039-2718-6/I-1235

定价：全12册420.00元 本册35.00元

ISBN 7-5039-2718-6



9 787503 927188 >